

复活
· 复活 ·
第一部

—

尽管这块不大的土地聚居着好几十万人，而且已被这里的居住者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这些居住者把石头砸进地里，阻止任何植物的生长，尽管刚出土的小草被一概清除干净，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得漫天烟雾，尽管树木被伐光，鸟兽被赶尽，可是即使在这样的城市，春天依然还是春天：和熙的阳光照耀着大地，青草死而复生，不但生长在林荫路的草地上，而且从石板的夹缝里往外钻，在一切没有被除根的地方生机勃勃地生长。桦树、杨树、稠李树都长出了发黏的清香树叶，椴树上鼓起一个个正在绽开的新芽。

乌鸦、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来临了，开始欢快地搭起窝来。就连苍蝇都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在墙脚下嘤嘤嗡嗡地飞。植物也好，鸟雀也好，孩子们也好，全都欢欢喜喜的，生机盎然。只有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地欺骗着自己，也欺骗着别人，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迷人的春日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赐福人类所创造的、使万物趋向和谐互爱的美好人间，而是他们自己创造出的用以统治他人的种种手段。

因此，省监狱办公室里的文职官员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大自然的生灵们都在尽情享受的春色和欢乐，而是前一天接到的一份编号盖印、写明案由的公文。

公文上指明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务必把三名看押在监而且受过审讯的犯人，一男两女，送交法院审理。在那两名女犯当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遵照此指令，现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钟，监狱看守长走进了女监那昏暗而恶臭的长廊。一个女人也跟着他走进长廊，她面容疲惫，鬓发花白，身穿制服，袖口上镶着金黄色的丝绦，腰系一根蓝边带。这是女看守。

“您要提的是玛丝洛娃吧？”她跟值班的看守长一起走到长廊上一个牢门跟前，问道。

看守哐唧唧打开铁锁，拉开牢门，顿时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扑面而来。他吆喝道：

“玛丝洛娃，过堂去！”说完，他又带上牢门，等待着。

监狱院子里的空气就新鲜多了，那是从郊外的田野上吹过来的。但监狱走廊里却弥漫着饱含着伤寒菌的污浊空气，散发着粪便、煤焦油和霉烂物的令人作呕的气息，凡是进来的人都会感到郁闷和不快。女看守虽已习惯这种污浊空气，可刚从院子里一进来，仍旧会生出这样的感受。她一走进走廊，就觉得疲惫无力，精神恹恹。

牢房里响起女人的说话声和光着脚板走路的忙乱的声音。

“喂，快点，玛丝洛娃，手脚麻利点！”看守长对着牢门嚷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个子不太高、胸脯较为丰满的年轻女人走出牢门，她很敏捷地转过身来，在看守长身旁站住。这个女人内穿白上衣和白裙子，外套一件灰色长囚衣，脚穿

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几绺髻曲的黑发随意地从头巾里滑落下来。如同所有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她的脸上显出一种特别惨白的颜色，犹如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那双短而宽的手以及从囚衣的肥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也都是这种颜色。她的眼睛有点浮肿，可是在苍白无光的脸色的衬托下，显得很黑很亮，生动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稍稍带有斜睨的意味。她挺起丰满的胸脯，将身子站得笔直。她走到长廊上，微微仰起头，直盯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一付悉听尊便的神情。看守长正想关上牢门，不料从牢门里探出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的苍白严厉的皱脸来。老太婆刚跟玛丝洛娃讲了几句，看守长就把牢门抵住老太婆的脑袋关上去，那个脑袋就缩了回去。女人们一阵哄笑在牢房里响起。

玛丝洛娃微微一笑，转过脸去瞧牢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老太婆在里面把脸凑近窗洞，沙哑着嗓子说：

“千万别说废话，咬定了别改口。”

“好歹有个结果，比现在糟不到哪去。”玛丝洛娃晃了晃头。

“结果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摆出长官的架势煞有介事地说，显然自以为说得很俏皮。“跟我来！”

老太婆的眼睛从窗洞里隐没了。

玛丝洛娃走在长廊中间，迈着很快的碎步跟在看守长身后朝前走。他们顺着一道石砌的楼梯下去，经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的男监，男监的各个小窗口里都有眼睛紧盯着他们。最后他们来到办公室里，那儿已站着两个持枪的押解兵。坐在那儿的文书员把一份沾满烟味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列兵，指着玛丝洛娃说：

“这个女犯交给你了。”

那个红脸膛长有麻子的押解兵是下诺夫哥罗德的农民，他把公文掖在外翻的袖里，眼睛盯着那个女犯人，向他的同伴，一个高颧骨的楚瓦什人，笑嘻嘻地挤了一下眼睛。

这两个列兵押着女犯人走下台阶，向监狱出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小门开了，两个列兵押着女犯穿过这道门走到院子里，再走出围墙，来到砌石铺成的大街上。

街上的马车夫、小店老板、厨娘、工人、文官们纷纷停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人。有人摇摇头暗想：“瞧，不规规矩矩地做人，就会落到这般田地！”孩子们恐惧地盯着这个女强盗，但想到她被士兵押着，不能再干坏事了，便放下心来。一个刚卖完煤的乡下人，在茶馆里喝够了茶，

这时候走到她身边，在自己胸口上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

女犯人涨红了脸，垂下了头，嘴里嘟哝了一句什么。

女犯人感到众人的目光都向她这边射过来，但并不扭转头，只是悄悄地斜起眼睛瞟了一下那些瞧着她的人。这种对她的注目，使她暗暗高兴。这儿比监狱里清爽得多，带有春天般气息的空气，这使她高兴。不过由于她已好久没有这样走路了，此刻又穿着笨重的囚犯穿的棉鞋，所以她的脚走在石块上磨得很痛，她瞧着脚底下，尽量地想走得轻一些。女犯人走过一家门前有许多鸽子的面粉店，那些鸽子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摇摇摆摆，不受人打扰。

女犯人的脚差点儿碰到一只瓦灰鸽，它扑啦啦地飞了起来，掠过女犯人的耳畔，给她送来一阵清风。女犯人浅笑了一下，再想到自己的困境，不禁叹息了一声。

二

女犯人玛丝洛娃的身世很是平凡，她是一个未婚的女农奴的私生子。这女个农奴在乡下与饲养牲口的母亲住在一起，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园里干杂活。

这个没有结过婚的女农奴每年都生一个孩子，而且照乡下的习惯，都给孩子受了洗，可是做母亲的却不给自己认为不受欢迎的、不需要的、妨碍工作的孩子喂奶，因此每个孩子很快就饿死了。已经有五个孩子如此死掉了。第六个孩子是她同一个过路的茨冈私通后生下来的，是个姑娘。她的命运本来也会和她那些兄姊一样，可是凑巧那天那两个老处女中的一个来到了牲口棚里，她是为训斥饲养牲畜的女工不该把奶油做得有牛骚气而来的。

当时产妇和她那个白胖可爱的娃娃在牲口棚里躺着，那老姑娘骂奶油做得不好吃，又骂不该让产妇睡在牲口棚里，骂完正要走开，忽然看见那娃娃，觉得很招人喜欢，动了恻隐之情，就自愿做她的教母。她给女孩受了洗，又怜悯她的教女，常给做母亲的送点牛奶和钱。这样，女孩就活了下来。两个老姑娘从此叫她“救下来的娃娃”。

孩子的母亲在她三岁那年得病死了。饲养牲口的外婆嫌弃外孙女是个拖累，两个老姑娘就把女孩带在身边。这个眼睛乌溜溜的小女孩出落得活泼可爱，两个老姑娘就常常拿她解闷消遣。

老处女是姊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小姑娘受洗的就是她，姐姐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却比较苛刻。妹妹替小姑娘打扮，教她念书，准备收她做养女。姐姐却坚持要把她训练成一个得力的使女，所以对她很挑剔，倘若心绪不佳就处罚她，甚至打她。因此，在这种环境下，小姑娘长大成人后，就成了半是使女，半是养女。连她的名字也不高不低：卡秋莎，既非卡吉卡，也非卡坚卡。她缝缝补补，收拾房间，擦洗圣像，烤肉，磨碎咖啡豆，煮咖啡，洗零碎东西，间或陪两个老处女坐着，为她们朗诵书籍。

有人来向她提亲，但是她一个也不应承，她认为嫁给卖力气干活的人，与他们一起生活未免太清苦，她已经习惯在地主家里过舒适的日子了。

她就这样生活到十六岁，在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在大学念书的阔绰的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里。卡秋莎暗恋上了他，却不敢向他表白，甚至连自己也不敢承认产生了爱情。又过了两年，这位侄少爷奔赴战场，途经姑妈家，顺便呆了四天。临行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动身时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他走了五个月后，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变得情绪焦躁，一味想着怎样避免即将降临的耻辱。

她服侍老处女不仅不热心，敷衍了事，而且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了，竟忽然发起脾气来。她冒犯老处女，说了不少顶撞的话，事后又后悔，就要求辞掉工作。

两个老处女对她也很不满意，就答应了她的要求。她从她们那里被辞退后，就去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家里当使女，可在那儿仅呆了三个月又因无礼而被辞退。因为那局长虽然五十岁了，却总想调戏她。有一回逼得特别紧，她心中冒火，骂他“混帐”和“老鬼”，拼命推他，竟把他推倒在地。在这次被解雇后不久她就要分娩了，无法再找工作。于是她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去住，那人是接生婆，兼做酒生意。她分娩顺利，可是接生婆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后，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

生下来的男婴只好被送去育婴堂。但据送去的老太婆说，婴儿一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搬进接生婆家里时，身上带有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挣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公爵少爷送的。等她从接生婆家里出来，身上只剩下六个卢布。她不懂得俭省，而是很能花钱，待人又糊涂，总是给别人钱。接生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伙食费和茶点钱，把婴儿送到育婴堂又花了她二十五卢布。另外，又向她借了四十卢布买奶牛。剩下的二十几个卢布，卡秋莎自己买衣服、送礼，就零零碎碎地花掉了。等卡秋莎身体复元，她已身无分文，非得找份工作不可。于是她到林务官家去干活。林务官虽有老婆，但跟警察局长一个模样，从第一天起就紧缠着卡秋莎。卡秋莎讨厌他，极力躲避他。但他比卡秋莎有心计，因为他是东家，可以任意支使她，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强行占有了她。林务官的老婆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瞅见丈夫单独同卡秋莎呆在一个房间里，就张牙舞爪地打她。卡秋莎不甘示弱，两个人厮打起来。结果卡秋莎给撵出来了，连工钱都没给。后来卡秋莎来到城里，在姨妈家住下。

姨父是名装订工人，原本生活还不错，如今因没有主顾，就酗起酒来，变卖了所有能够到手的东西。

姨母开一家很小的洗衣店，以此养活儿女，供奉失意、穷困的丈夫。姨母让玛丝洛娃在她的作坊里做事。可是玛丝洛娃见到姨母那里洗衣女工所过的艰苦生活，就犹豫不定，自己跑到佣工介绍所去找女佣的工作。她找到了一户只有一个太太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的人家。可惜她做工仅一个星期，年纪较大而且生了唇髭的中学六年级学生就丢下功课，对玛丝洛娃纠缠不清，不让她安分。他的母亲将此归罪于玛丝洛娃，她再次被辞退。此后她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是有一次玛丝洛娃到佣工介绍所去，恰巧在那儿碰见一位手上戴着宝石戒指、裸露的胖胳膊上戴着镯子的太太。那个太太知道玛丝洛娃的状况以后，留下地址，约她去找她。玛丝洛娃就到她家里去了。太太热情地款待她，请她吃馅饼和甜葡萄酒，并吩咐她的使女送一封信到某处。傍晚时分，一个留有长长的白发和长长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房间里。这个老人一进屋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笑嘻嘻地端详她，逗她说笑。女主人把他叫进另一个房间里，玛丝洛娃只听见女主人说：“刚刚从乡下来的雏儿。”后来女主人把玛丝洛娃叫去，跟她说这人是作家，有许多钱，只要她如他的意，他就肯花大钱。她果然遂了作家的意，他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许诺以后常来见她。那笔钱很快就花光了，一部分付清她在姨母家的费用，一部分添置了新的衣服、帽子和丝带。

过了几天，作家派人来请她去，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让她搬到一个私人的寓所去住。

玛丝洛娃在作家替她租下的寓所里住着，却爱上了同院居住的一个快乐的店员。她主动把这事告诉了作家，然后与店员搬到一个更小的私人寓所里去住。那个店员起初答应同她结婚，后来竟不辞而别，去了下城，明显是把她抛弃了。这样，玛丝洛娃又成了孤身一人。她本想独身继续住在那个寓所里，可是人家不答应。派出所长对她说，她要领到黄色执照，并且接受医生检查后，才能继续居住下去。于是她又回到姨妈家。姨妈见她穿戴着时兴的衣裙、披肩和帽子，就恭敬有礼地接待了她，再也不敢要她做洗衣工，以为她现在的身价高了。对玛丝洛娃来说，她根本不会去做洗衣工。她瞧着前面几个屋子里的洗衣工，对她们怀怜有悯的心情。她们脸色憔悴，胳膊干瘪，有的人已患上痼病，像苦役一样生活。房间里不论冬夏，一直敞着窗子，女工们就在三十度高温的肥皂蒸汽里漂洗熨平衣服。

她一想到自己也可能做这种苦工，就不禁心惊肉跳。

就是在这时候，在玛丝洛娃孤苦无依、衣食不保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妓女的鸨婆找上了门。

玛丝洛娃早就吸上纸烟了，在她跟那个快乐的店员相好的后期，以及遭他遗弃以后，她就越来越喜爱喝酒了。她之所以酷爱喝酒，并非仅仅因为她觉得酒好喝，更主要是因为喝酒可以使她忘却她经受过的悲惨遭遇，使她能暂时地纵情欢笑，维持她的尊严。倘若不喝酒，这种精神状态是没法维持的。不喝酒时，她就消沉而羞愧。

鸨母款待了她的姨妈，预谋把玛丝洛娃灌醉，要她到城里一家上等妓院去做妓女，又向她列举干这个买卖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屈辱地当女仆，这必然逃避不了男人的纠缠，不得不同人临时或秘密通奸；要么取得生活有所保障而又合法安定的地位，就是进行法律所允许的公开的而且报酬丰厚的经常的通奸。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想用这种生活来报复诱奸她的公爵少爷、店员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同时还有一个条件让她动心，使她最后下定决心，那就是鸨母答应她，她想穿什么样的衣服就可以做什么样的衣服，丝绒的、法伊缟的、绸缎的衣裙和袒胸露臂的舞衫，任凭去订做。玛丝洛娃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亮黄的绸缎衣裙，镶着黑丝绒的花边，露出丰满的胸脯的情形，再也经不住诱惑，就把身份证交给了鸨母。当夜，鸨母雇来一辆马车，把她送进了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里。

从此以后，她过着违背上帝对人类道德的诫命的“犯罪”生活。

这是千千万万妇女过着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但得到关心国民福利的政府当局的批准，而且得到了它的奖励。这种生活以这类妇女当中十分之九的人以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夭折作为结局。

她们夜间纵酒行乐，早晨和白天却昏沉沉地大睡不醒。下午两三点钟左右，她们才疲乏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喝碳酸矿泉水解酒，喝咖啡提神，只穿着罩衫、短上衣或者长睡衣，懒洋洋地走动，或者隔着窗帘朝外望，无聊地相互对骂几句。然后洗漱，抹油，往身上和头发上喷香水，试衣服，为服饰与鸨母争吵，仔细照镜子，往脸上涂脂抹粉描眉，吃油腻的甜食，然后穿上袒胸露背的鲜艳绸衫，走进陈设奢华、灯光辉煌的大厅。客人陆续到来，于是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同男人们调情通奸。客人应有尽有，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几乎还是孩子的，有已有花白胡子的；有单身的，有成家的；有商人，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的，有穷的；有健康的，有虚弱的；有酩酊大醉的，有头脑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界的，有文职的；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总而言之，不分阶层、年龄、性格。叫嚷声夹杂着调笑声，打架声混合着奏乐声，吸烟喝酒，喝酒吸烟，从黄昏到天明，音乐声片刻不停。直到早晨她们才得以空下来，疲乏地倒头昏睡。

天天如此，个个星期这样。一到周末，她们乘车到政府机关——警察分局，那里坐着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有时表现出严肃认真的态度，有时是轻薄调笑的态度，泯灭了上帝赋予人类、甚至禽兽的一种防止犯罪的羞耻心，给这些女人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批准她们可以和同谋者继续进行同上星期一样的罪行。下一个星期又是这样。不分冬夏，没有假期，天天如此。

玛丝洛娃过了七年这样的生活。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回医院。在她妓院生涯的第七

年，也就是她初次失身后的第八年，那时她才二十六岁，不料出了一个乱子，使她下了监狱。

玛丝洛娃在监狱里与杀人犯和盗贼们一起生活了六个月以后，现在被押送至法院去受审。

三

玛丝洛娃跟随押解兵走了很长的路，累得筋疲力尽，在她即将到达地方法院那所大厦的时候，她养母的侄子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当年诱奸过她的那个男人，正舒适地躺在一架高大的弹簧床上，床上铺着羽绒褥垫，被单已经揉皱。他身穿干净的、胸前皱褶熨得很平的荷兰细麻布睡衣，敞着领口，吸着纸烟。他正呆望着前面发愣，考虑着今天要做的事和昨天发生过的事。

昨天他在家财万贯、门第显赫的科尔卡金家呆了一个晚上。大家猜想他会跟他们家的小姐结婚。他想起这些事，不禁叹口气，丢掉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出一支烟，忽然又改变主意，从床上耷拉下两条光滑的白腿，用脚钩到拖鞋。他拿起一件绸缎晨衣往丰硕的肩膀上一披，迈着沉沉的步子，快步走到卧室旁的盥洗室里。那里充满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刺鼻的香气。他在那里用特等牙粉刷他那些补过多处的牙齿，用喷香的漱口水漱口。然后擦洗身子，再用各种样式，用途不同的毛巾擦干。他先拿香皂洗净手，再用刷子仔细地刷净长指甲，在大理石的洗脸盆里洗了脸和肥胖的脖子，然后走进卧室旁的第三个房间里，那里已有人为他准备好了淋浴所需的一切。

在那儿他用凉水冲洗发达的肌肉、脂肪丰厚的白净身体，然后用松软的毛巾擦干，穿上洁净的、熨平了的衬衣衬裤和一双亮得像镜子似的皮鞋，再在梳妆台前坐下，用两把梳子理顺卷曲的小黑胡子和头顶前半部已渐渐稀疏的鬃发。

只要是他使用的物品，包括内衣、服装、皮鞋、领带、别针、袖扣，件件都是最高级、最昂贵的货色，雅致，大方，耐用，珍贵。

聂赫留朵夫从众多条领带和胸针当中信手拿出两样(从前他做这种事是满怀兴趣的，如今却完全无所谓了)，然后穿上一套早已被刷得干干净净，放在椅子上的衣服。就这样，他即便算不得神采飞扬，也显得颇为干净利落，周身喷香的他走进了长方形的饭厅。

饭厅里的镶木地板昨天已由三个农民擦得锃光闪亮，上面放着麻栎制的食壁橱和一张活动大饭桌，桌腿雕成狮爪有力地张开的形状，很有气势。桌上铺着浆硬的、绣有巨大花体字母拼成的家徽的薄桌布，上面摆着盛有香气四溢的咖啡的银壶、银糖缸、盛有煮沸过的奶油的银壶和装满新鲜白面包、面包干和饼干的篮子。他的食具旁放着新收到的信件、报纸和一本刚刚出版的法文杂志《两个世界》。聂赫留朵夫正要拆信，忽然通向走廊的门打开了，悄悄地进来一个体态丰腴的老妇人。她身穿丧服，头上扎着花边头饰，以遮盖她那宽阔的头发缝。她叫阿格拉斐娜，原是聂赫留朵夫母亲的侍女，不久以前他的母亲在这个大宅里去世，她留在少爷家里担当女管家。

阿格拉斐娜曾跟随聂赫留朵夫母亲出国，前后在国外住了十几年，很有贵妇人的风度和气质。她从小就生活在聂赫留朵夫家，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叫米坚卡的时候就了解他了。

“您早，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有什么新闻吗？”聂赫留朵夫玩笑着问。

“科尔卡金公爵家的女佣送来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

那个女佣人早就送来了，她现在还在我的房间里等着。”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说着，一边把信交给他，一边会心地微笑。

“好，稍等一会儿。”聂赫留朵夫说着接过信，当注意到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时，又不禁皱起眉头。

阿格拉斐娜的笑容暗示他，信是科尔卡金公爵小姐写来的。她满心以为聂赫留朵夫打算同这位公爵小姐成婚。阿格拉斐娜笑容所表达的内容却使聂赫留朵夫心里不快。

“那我去叫她再等一下吧。”阿格拉斐娜说，然后拿起那把放错地方的扫面包屑用的刷子，将它放回正确的地方，又悄悄地走出饭厅。

聂赫留朵夫拆开那封香气扑鼻的阿格拉斐娜拿给他的信，抽出一张边缘不齐的灰色厚信纸，上面的字迹幼细而尖利，他读到：

“我既然承担了随时提醒您一切事情的责任，那么现在就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得出庭做陪审员，因为像按您以前的粗略的作风，像昨天您答应过的陪我和科洛索夫去观看画展，结果却失约了。除非您情愿向本地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购置的那匹骏马的价钱，只因为您没有准时出庭。昨天您一走，我就想起这件事。请您一定不要忘记。

玛·科尔卡金公爵小姐”

信纸背面又附了两句：

“母亲嘱咐我告诉您，为您备下的餐具将等您一直到深夜。请您务必光临，时间悉听尊便。玛·柯”

聂赫留朵夫皱起了眉头。这封便函不过是科尔卡金公爵小姐近两个月来对他不断耍手腕的又一高招而已，为的是要用一根根肉眼无法察觉的细线将他和她越来越紧地系在一起。可惜大凡年纪已经不轻而又没有热恋着的男人，在结婚问题上总是迟迟疑疑，犹豫踌躇不已。再者，另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使聂赫留朵夫即便下定决心，也不能马上向她求婚。这个原因倒不是因为十年前诱奸过卡秋莎，后来又将她抛弃，他已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了，何况他并不认为这会给他的结婚造成障碍。使他不能马上向科尔卡金小姐求婚的原因在于这段时期他同一个有夫之妇的私通关系，虽然就他这方面而言，这种关系现在已经了结，可是她却否认这一点。

聂赫留朵夫见着女人很怕羞，然而正是这种羞怯，才引起了那位有夫之妇的征服欲望。

这个女人是聂赫留朵夫每年去参加贵族选举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她果然把聂赫留朵夫勾引入自己的绮帐。聂赫留朵夫一天天地迷恋这层关系，同时又一天天地嫌恶这层关系的存在。聂赫留朵夫起初抵挡不住她的诱惑，后来又对她产生内疚，所以若没有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也正因此，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他愿意，也无权向科尔卡金小姐求婚。

桌上正好放着那个女人的丈夫写来的信。聂赫留朵夫一瞥见他的笔迹和邮戳，就心惊肉跳，面红耳赤。他每次面临危险，总产生这样的体验。不过，他的紧张是多此一举的。那个丈夫，聂赫留朵夫主要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信中通知聂赫留朵夫说，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会特别会议，他要求聂赫留朵夫务必出席，以便在讨论有关学校和公路等现今重大问题时站在他这边，因为预计将遭到反对派的强烈反对。

首席贵族属于自由派，他与一些禀性相合志向相投的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逐渐抬头的反动势力，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斗争，压根儿也没想到他的家庭生活正遭受着不

幸。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的内心因为这个人而产生的诸多烦忧。他想起有一次他以为她的丈夫已经察觉这件事，他就决心在与这位丈夫决斗时朝空中放枪。他还想起她跟他大闹过一场，她气愤之至，奔向花园里的池塘，准备投水自尽，他赶紧追过去阻拦。“我不能到那边去，而且在她没有回答我以前，我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聂赫留朵夫心中思忖着。一个星期以前，他已经给她写过一封言辞坚决的信，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准备不惜用各种方式来弥补。可是替她着想，他坚持认为他们的关系应该就此了断。现在他就在期盼这封信的回音，但还没有等到。不管怎样，她没有回信倒是个好兆头。倘若她不同意一刀两断，她早该写信来了，或者索性照她以前做过的那样亲自来了。

聂赫留朵夫听说现在有个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有些嫉妒，但同时又感到高兴，因为他可以不再撒谎做假。

另一封信是经营他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说，他聂赫留朵夫务必亲自到乡下来一趟，以便办理继承手续，同时就经营农业的方式的问题做出决定：是继续按照公爵夫人在世时采取的经营方式呢？还是采取他以前曾向公爵夫人提出，现在再向公爵少爷提出过的经营方式：就是增加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由自己耕种。总管建议说按照自己耕种的经营方式要划算得多。总管还道歉说，原定本月初应汇出的三千卢布得耽搁一下，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推迟的原因是农民缴不上租，他收不齐钱，不得不求助于官府，强制他们缴出钱来。聂赫留朵夫对这封信，是既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感到自己拥有了大量产业。不高兴的是他年轻时是斯宾塞的忠实信徒，而且身为大地主，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这个论点深深震动了他。他凭着青年人的正直和果敢，不仅口头上拥护土地不该成为私有财产的观点，上大学时还就这个观点写了论文，而且实际上也把一小部分土地（那块土地不属于他母亲所有，而是他从父亲名下直接继承来的）下放给农民。他并不愿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现在继承了母亲的田产而成为大地主，就必须在两个方向中间选择一个。要么像十年前他处理父亲的二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的财产，要么用默认的方式承认他从前的想法都是荒诞虚假的。

他无法选择前者，因为除了土地以外他没有任何生活资料。他不愿意去做官，可是他又丢不掉早已养成的奢侈生活习惯。何况，他青春时代那种对信仰的追求、那种果敢、那种要干一番惊人事业的好胜心和愿望，已经都化为虚无了。如今的他已感觉不到有什么必要去改变目前的生活。至于选择后者，对于他也是不可能的。“占有土地是不正当的”，这个确凿无疑的论点原是他从前在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里汲取来的，以后又在亨利·乔治的著作里找到光辉论证的，如今却要加以否定，他可不大愿意。

就因为这个缘故，总管的信又使他不高兴。

四

喝完咖啡，聂赫留朵夫到书房查一下法院通知应该几点钟出庭，他还要给公爵小姐写信。去书房得先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一个画架，架子上面倒立着一幅已经开了头的画稿，墙上挂着几张画稿。看到这幅他用两年功夫完成的画稿，看到那些画稿和整个画室，他强烈地感受到，他的绘画水平已无力再进步了。

这种感觉时常向他袭来。他解释这是因为他的审美感发展得过于精致的缘故。话虽如此，这终究不是什么美妙的滋味。

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的天赋而辞去了军中的职务。他认为艺术事业高于一切，就

有点小瞧任何其他的工作。如今事实给他有力的一击，证明他无权这么认为。也正如此，任何有关绘画的记忆都是不愉快的。他心情沉重地注视着画室里的各种奢华设备，郁郁寡欢地走进了书房。书房高大宽敞，内有种种的摆设、用品和舒适的装潢。

聂赫留朵夫立刻在大写字台上一个标明“急事”字样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了解到他必须在十一时出庭。接着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表示，感谢她的邀请，并将尽量赶去吃饭。但他写了信就把它撕掉，觉得信上的口气太亲热。他重新写了一封，这一回嫌口气太冷淡，会令人看了生气。于是他又把信撕掉，然后按了按墙上的电铃。一个脸面阴沉的老仆人走了进来，他留着络腮胡子，上唇和下巴刮得光光的，腰系一条灰细布围裙。

“麻烦您去雇一辆马来。”

“是，老爷。”

“再对科尔卡金家来的差役说一声，说我谢谢他们东家，我会尽量赶到的。”

“是。”

“这样不合礼仪，可是我又没法写回信。没关系，反正今天我会跟她见面。”聂赫留朵夫心中暗念道，走出书房去穿衣服。

等他穿好衣服，走到了门廊上，一辆熟悉的、装着胶皮轮胎的出租马车已经在那儿恭候着他了。

“昨天，您刚刚离开科尔卡金公爵家，”马车夫微微扭转他那套在白领口衬衫里的黝黑而结实的脖子，说，“我就赶着马车到了。他们的看门人说：‘他老人家才离开。’”

“连马车夫都知道我同科尔卡金家的关系。”聂赫留朵夫想，头脑里又考虑起近来经常盘旋在他心里的问题：该不该同科尔卡金小姐结婚。这个问题如同当前他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一样，不知该如何选择解决的方式。

聂赫留朵夫想结婚的理由有如下两点：第一，除了可以获得家庭的温暖，还可以避免发生不正常的两性关系，过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希望家庭和子女能使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充实起来。他想结婚的理由很一般。至于不想结婚的理由也有两点：第一，唯恐丧失自由，这是不再年轻的单身汉都有的顾虑；第二，对女人这种神秘的生物抱着一种潜在的恐惧。

但是一些特殊的原因促使他愿意跟米西(科尔卡金娜的名字是玛丽亚，可是如同上流社会某些家庭里的情形一样，她得了这样一个译名)结婚：第一，她出身高贵，从装扮到谈吐、举止、笑容，在各个方面都与普通人有所不同，这并非源于她有什么地方超凡脱俗，而是因为她是“正派”，他找不出更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这种品质，但是他是看重这点的；第二，他认为他比常人更优秀，因此他也认为她是了解自己的。这种对他的了解，也即这种对他的高尚品格的承认，在聂赫留朵夫看来，证明了科尔卡金小姐才智过人，有极强的判断力。但也有些原因使他不愿意跟米西结婚，第一，他极可能找到一个比米西更优秀，因而与他更相称的姑娘；第二，她已经二十七岁，因此以前她一定有过恋爱史，这个想法使聂赫留朵夫很难受。他一想到那时候她不爱他，他的自尊心就无法忍受，尽管那已经是以前的事了。

当然以前她不可能知道日后会遇见他，但是一想到她可能爱过别人，他感到受了侮辱。

这样，想结婚和不想结婚，都有势均力敌的理由，二者不相上下，因此聂赫留朵夫嘲

笑自己是布里丹的驴子。他给终拿不准，不知道在两捆中该选哪一捆干草好。

“反正我还没有收到玛丽亚(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那种关系还没有断绝，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言自语道。

想到他可以而且能拖延一段时间去做出决定，他不由感到高兴。

“不管怎样，这些事我以后再好好斟酌吧。”他自言自语道，这时他的四轮轻便马车已静静地行驶在法院门前的柏油路上。

“现在我得本着良心履行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了，我一向就这样做，而且坚信应该这样做。再说这种事本身也很有趣儿。”他对自己说着，从看门人的身边走过，踏进法院的前厅里。 五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法院的走廊上人们已经在紧张地活动了。

法警手拿公文办上边交下来的任务，有的甚至还走得很快，有的一路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沙沙地擦着地板，都累得喘气。民事执行吏、律师和法院执事川流不息，来来往往，原告和没有拘捕的被告垂头丧气地挨着墙边踱来踱去，有的则坐在那儿等待。

“地方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

“你要找哪一个法庭？有民事法庭，有高等审判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就是找刑事庭。您早该说清楚。从这儿向右走，再向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沿他指点的走去。

在法警所说的那个门口，有两个人站在那儿等着。一个是高大肥胖的长相慈善的商人，显然他刚喝过酒，吃过东西，心情非常舒畅，另一个是犹太籍的店员。他们正在谈论羊毛的价钱时，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这儿是不是陪审员的议事室。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脾气温和的商人快乐地挤挤眼问。“喔，我们就一块合作口罗。”他听到聂赫留朵夫的肯定回答，接着说，“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肖夫，”他伸出一只宽软而肥厚的手掌说，“我们得辛苦一番了。请教贵姓？”

聂赫留朵夫说了自己的姓名，然后走出陪审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各个行业的人。大家都刚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踱着步，互相打量着，相互作着介绍。有一个退役军人身穿军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只有一个人穿着农民的长袍。

虽然其中有很多人是耽搁了正事来做陪审工作的，嘴上抱怨说陪审工作是件麻烦事，实际上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重大的社会工作，脸上都洋溢着得意的神情。

陪审员们有的已经自报家门而相识，有的仍还在揣摩着对方是何人，但是他们彼此都交谈起来，讲天气，讲早春的季节，讲即将开审的案子。凡是还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都赶紧托人介绍与他相识，分明以此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耀。聂赫留朵夫正像平日里应酬陌生人一样，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倘若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高一等，他也会瞠目结舌，因为他的全部生活确实没有什么更高明于别人的地方。是的，他会流利地讲英语、法语、德语，他身上的内衣、外衣、领结、袖扣都是最上等的货色，可是他自己也万分清楚，不管怎么说，这些是不能作为他自居于优越地位的理由的。不过他又毫不怀疑这就是他的长处，认为别人对他尊重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假若有人不这么做，他倒会生气，觉得窘迫。遗憾的是，目前在这个陪审员的房间里，就有人已经对他表现了不恭敬的态度，也正因为此，他的心情极不舒畅了。

在陪审员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人，叫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他姓什么，很瞧不起他，不屑于同他交往)，以前做过他姐姐家的家庭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很反感他的随随便便，以及他那种旁若无人的纵声大笑，对他那种像聂赫留朵夫姐姐所说的“没有教养”，很厌烦。

“嘿，连您也掉进这个圈套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纵声大笑，“您也躲不开吗？”

“我根本就不想躲避什么。”聂赫留朵夫严厉而淡漠地回答。

“嗯，这倒称得上是公民的献身精神哪！不过，您等着吧，他们会搞得您吃不好饭，睡不着觉的。到那时您就不会是这种调子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笑得更响亮。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以‘你’来称呼我了。”聂赫留朵夫暗想，脸上呈现出仿佛刚接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的那种极其伤心的神情。他抬脚离开这个人，朝人群那边走过去。那边一个身材很高、仪表堂堂、胡子光光的上等人在一群人中间，正兴致勃勃地讲着什么。这个上等人讲的是现在民事庭里正在审理的一个案子，他似乎对案情非常了解，谈及法官和著名的律师时总是称呼他们的教名和父名。他正在讲一个著名的律师如何神通广大，如何将那个案子出人意料地扭转过来，迫使诉讼的一方——一个尽管有理的老太太，如何不得不白白地拿出一大笔钱来付给对方。

“真是一个天才的律师啊！”他感叹道。

大家都肃然起敬地听他讲话，有些人想插嘴发表一些看法，可是都被他打断，好像只有他一人真正知道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来迟了，但还得等待好久。法庭的一名法官直到现在还没有来，耽搁了审讯工作。

六

庭长一早就来到法庭。他体格魁伟，留着一大把逐渐变得花白的络腮胡子。

他有老婆孩子，可是生活极其放荡，他的妻子也是如此。他们彼此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接到一个瑞士女人的来信，通知他今天下午三点到六点去城里的“意大利餐馆”约会。这个女人去年夏天在他家里做过家庭教师，今天刚从南方来，到彼得堡去，路经此地。因此，他殷切地盼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审完，以便腾出时间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去年夏天他和她在乡间别墅里已经有过一段火热的罗曼史了。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

从文件柜的底格拿出一副哑铃，向上，向前，向两边和向下各举了二十下，然后又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轻松蹲下三次。

“要体质强壮，再没有比洗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锻炼办法了。”他边想边用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部隆起的一大块紧绷的肌肉。他还要练出剑时的挥旋动作(他在准备长时间的审理案子的工作以前总要做这两种运动)。不料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庭长赶紧把哑铃放回原处，打开房门。

“对不起，打扰您了。”他说。

一个法官走进房间，他个子不高，戴着金边眼镜，耸着肩膀，眉头紧锁。

“马特维·尼基丁季奇又没来，”法官抱怨道。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到。”庭长一边穿上他的制服，一边回答说。“他老迟到。”

“真搞不明白，他怎么不觉得难为情。”法官说着，恼怒地坐下来，拿出一支纸烟。

这个法官为人死板，他今天早晨与妻子吵了一架，因为他妻子已经提前花完了他交给她的月钱。当她提出要预支一笔钱，他拒绝说决不改变自己的规章制度。

结果就大吵大闹起来。妻子说，既然如此，那就家里不开伙，他回到家里别想吃到饭。他听了这话转身就走，深怕妻子真的照她威胁的那样办，因为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循规导矩、不逾道德过日子就落得如此下场。”他暗想，瞧着那容光焕发、面带笑的庭长。庭长正宽宽地叉开两肘，用白嫩的手理顺绣花衣领两边又长又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心满意足，可我却总在活受罪。”

书记官走进来，拿来一份案卷。

“多谢，”庭长说着，点上一支烟。“我们先审哪个案？”

“我看，就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漫不经心地说。

“嗯，行，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暗想这个案子倒可以在四点钟以前了结，审完后自己就可以走了。“那么马特维·尼基季季奇没有到吗？”

“还没来呢。”

“那么布雷威到了吗？”

“他倒是来了。”书记官回答道。

“那么，如果您见到他，就麻烦您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布雷威是在这次审讯中负责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在走廊遇见布雷威。布雷威耸起肩膀，没有扣制服胸前的扣子，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沿着走廊匆匆走来，鞋后跟踩得嘎吱嘎吱响，那只空手甩来甩去。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您一下，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说。

“当然，我准备好了可以出庭，”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个案子？”

“毒死人命案。”

“好极了。”副检察官嘴里这样说着，其实他丝毫也不觉得好，因为他通宵没睡。

他们为一个同事送行，喝了很多酒，又玩纸牌，一直玩到凌晨两点钟，后来又坐着马车去找女人，他们去的地方恰巧就是玛丝洛娃六个月前呆过的那家妓院，所以他根本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一案的卷宗，此刻想去草草地浏览一遍。书记官明知他没有看毒死人命一案的卷宗，存心刁难，故意建议庭长先审这一案。书记官素来与布雷威不和，因为按思维方式来说他是自由派，甚至是激进派。而布雷威是保守派，甚至与所有在俄国做官的日耳曼人一样，他尤其笃信东正教。书记官不喜欢他，而且眼红于他的职位。

“哦，那个关于阉割派教徒的案子怎么样了？”书记官问。

“我已经说过，我不能答应审理这个案子，”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这一点我也将向法院声明。”

“事实上那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无法审理，”副检察官说，依然电动着胳膊，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他借口一个证人传不到庭而拖延审理阉割派教徒的案子，其实这个证人对本案无足轻重，他之所以拖延审理时间，是担心由受过教育的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被告很可能被宣告无罪释放而结案。但一旦同庭长商量妥当，这个案子就可以转到县城法院去审理，那里陪审员中农民身份居多，因而判罪的机会也就大得多。

走廊里人来人往，越发热闹。人们多半聚集在民事法庭附近，庭上正在审理那个喜欢打听案情、仪表堂堂的先生向人群讲过的案子。在审讯的休息时间，民事法庭里走出一位老太太，那个天才律师从她身上硬敲出一大笔钱，白白给一个生意人，其实那个生意人根本无权得到这笔钱的。这一点法官们都很清楚，原告和他的律师当然就更加清楚，但是他们设下的圈套太阴毒了，逼得那老太太不得不拿出这笔钱给原告。老太太身材肥胖，套着华丽的衣裙，帽子上插着几朵大花。她从门里走出来，伸开两条又粗又短的胳膊。

她对她的律师反复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倒要请教！”她的律师眼睛盯着她帽子上的花，心里思虑着什么事，并未听她说什么。

跟在老太婆身后的就是那个著名的律师，他迅速从民事庭的门里走出来，衬衫上的硬胸衬嵌在领口很宽的背心里，平滑发亮，他的脸因得意而神采飞扬。他玩弄手腕，致使戴花的老太婆倾家荡产，赔了那个送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十万以上的卢布。律师感觉到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他用身体语言表示：“其实不必对我做出什么万分崇拜的表示。”他很敏捷地从大家身旁走过去了。

七

马特维·尼基丁季奇也终于来了。

还有那个长脖子的精瘦的民事执行吏，下嘴唇撇向一边，也趑趄着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这个民事执行吏是个老实人，受过大学教育，没任过什么职位，因为他嗜酒成癖。三个月前他妻子的保护人，一位伯爵夫人，给他谋得了这个职位，他总算把这个职位保持到现在，为此他暗暗高兴。

“怎么样，诸位先生，人来齐了吗？”他戴上夹鼻眼镜后，四处打量了一下，说。

“看样子全到了。”那个快乐商人说。

“好，现在我们来核实一下。”民事执行吏说着，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单子，开始点名，眼光时而从眼镜里面，时而从眼镜上面看一看被点到名字的人。

“五品文官伊·马·尼基丁福罗夫。”

“在。”那个仪表堂堂、熟识一切讼案的先生答道。

“退役上校伊万·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

“有。”一个瘦子，身穿退役军官制服，回答道。

“二等商人巴克拉肖夫。”

“到。”那个性情温和、咧开嘴巴笑的商人答道。“都准备好了！”

“近卫军中尉聂赫留朵夫公爵。”

“是我。”聂赫留朵夫回答。

民事执行吏从眼镜上面看他，特别恭敬而愉快地向他鞠躬，似乎借此表示聂赫留朵夫的身份与众不同。

“上尉丹钦科，商人库列肖夫。”等等，等等。

除了两个人，大家都到了。

“现在，诸位先生，请出庭。”民事执行吏愉快地说着，做了个手势指着门口。

大家纷纷起身，在房门口互相让路，穿过长廊，走进法庭。

法庭是个又长又大的房间。房间的一端是一个高台，要走到高台上必须经过三层台阶。高台中央摆放着一张桌子，桌上铺有一块绿呢子布，布的边缘坠有深绿色的穗子。桌子后边放着三把有扶手的椅子，雕有花纹的椅子的椅背很高。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金边镜框，里面镶有将军的一张全身肖像，色泽鲜明。将军身穿军服，挂着绶带，一只脚向前跨出一步，一只手握着佩刀的柄。右边墙角上挂着一个神龛，里面供着头戴荆冠的基督圣像，神龛前面立着读经台。右边摆放着检察官的斜面高写字台。左边，在写字台的对面，远远的摆着供书记官使用的一张小桌。靠近旁听席有一道光滑的橡木栏杆，里边有供被告人坐的长凳，此刻还空着没有人坐。高台的右边放着两排供陪审员坐的椅背很高的椅子。高台下边有几张供律师们用的桌子。所有这一切就是大厅前半部的摆设。有一道栏杆把法庭分

成两部分。后半部摆满了长凳，一排比一排高，一直延伸到后墙。在法庭的后半部，有四个女人坐在前排的长凳上，可能是工厂的女工，也可能是谁家的女仆。另外还有两个男人，也是工人。

他们显然给法庭的庄严气氛镇住了，胆怯地压低声音交谈。

陪审员们一落座，民事执行吏就趑趄着步子来到法庭大厅的中央，仿佛要威吓在场的人似的，放开嗓门叫了一声：

“开庭！”

大家都站起来。法官纷纷登上高台：走在前面的是体格魁伟、留着漂亮的络腮胡子的庭长，接着是那个脸色阴沉、戴金丝边眼镜的法官。现在他的脸色越发阴沉，因为他在出庭前遇到内弟，一名见习法官，内弟告诉他说，刚才他到姐姐那里去过，姐姐向他宣布今天家里不预备饭了。

“那么，我们似乎只能上小酒馆了。”他的内弟笑嘻嘻地说。

“你笑什么笑？”脸色阴郁的法官说，他的脸色变得愈发阴郁了。

第三个上去的法官，就是那永远迟到的马特维·尼基丁季奇。他留着一把大胡子，长着善良慈爱的大眼睛，眼角老往下耷拉着。这个法官患有胃炎，遵照医嘱从今天早晨起接受新的疗法。也正是这种疗法使得他今天比平日来得更晚。现在他正向高台走去，脸上带着一种专心致志的特殊的表情，因为他已养成习惯，经常用诸多可能的方法来预测向他自己提出的各种问题。此时他就在卜卦：假若从办公室门口起到他的座位那儿止他所走的步数可以用三除尽，那么新的疗法就能够治好他的胃炎，假若除不尽，那就治不好了。本来他只需走二十六步，可是他特意缩小最后一步，正好在二十七步的时候来到了他的座位跟前。

庭长和法官穿着的衣领上镶有金线制服走上高台，气势威严。他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好像为自己的威严气度感到不好意思，赶快谦逊地低下眼睛，坐到铺着绿呢桌布的桌子后面的雕花扶手椅上。桌上竖立着一个上面雕着一只鹰的三角形打击器，还放着几个在食品店里用来盛糖果的玻璃缸，以及墨水瓶、钢笔、纸张和几支削好的粗细不同的铅笔。副检察官随着法官们一起走进来。他还是那么匆忙，腋下夹着公文包，一只手甩来甩去，一走到窗边他的座位上，立即就埋头翻阅文件，利用每一分钟时间为审理案件做着准备。副检察官提出公诉不过是第四次。他热心功名，一心想爬上高位，因此他力图凡是由他提出公诉的案子，最后非判罪不可。这个毒死人命案的性质他大致了解，并且已拟好发言提纲，不过他还需要一些资料作为论据，此刻正急急忙忙从卷宗中摘录着这些信息。

书记官坐在高台对面的远处，把可能要他宣读的文件已经全部准备妥当了。这时候他正在看一篇他昨天才弄到手的被查禁的文章，这篇文章他已经看过一遍，但是他打算跟那个留着一把大胡子、同他见解一致的法官谈一谈这篇文章，因此想在讨论以前再好好研读研读。

八

庭长翻看了一些文件，又向民事执行吏和书记官提了几个问题，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就吩咐传被告上堂。

栏杆后面的那扇门立刻被打开了，两个宪兵头戴军帽，手握着出鞘的剑，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被告，前面的是一个红棕色头发、脸上布满雀斑的男人，随后是两个女人。那男人穿着一件同他的身材极不相称的又长又大的囚袍。他一走进法庭，就叉开两手的大拇

指紧贴住裤缝，以防过长的衣袖滑下来。他不看法官和旁听者，却注视着他将要绕过的那条长凳。他绕过长凳，规规矩矩地坐在凳子边上，好留出位子给别人坐，然后定睛瞧着庭长，两颊上的肌肉开始抖动起来，仿佛嘴里嘟囔着什么。后面进来的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身上也穿着长长的囚袍，头上包着一块囚犯用的三角围巾，面色灰白，眼睛布满血丝，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她看上去很镇静。她走到自己的位子旁边，她的长袍却不知被什么东西钩住了，但她不慌不忙地把长袍摘开，坐下来。

第三个被告是玛丝洛娃。

她一走进来，就聚集了法庭里所有男人的眼光，他们贪婪地长时间地盯着她那张俊俏的白脸、她亮闪闪的黑眼睛、她长囚衣里高高隆起的胸脯。就连宪兵也不例外，在她经过时，目不转睛地瞧着她，目送她走过去，坐下来。直到她坐好了，宪兵才猛然惊醒自己的失态，连忙转过脸去，振作精神，直愣着双眼望着前面的窗子。

庭长等着被告们在座位上坐好。玛丝洛娃刚刚坐下，庭长就转过脸去对书记官说话。

开始了例行的程序：清点陪审员的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的问题、决定他们的罚金、解决请假的陪审员的问题、为缺席的陪审员指派候补人选。

然后庭长动手折拢几张小纸片，把它们放进一个玻璃缸里，稍稍卷起绣花袖口，露出布满浓密汗毛的双手，像魔术师似的摸出一个个纸条，打开来，念着上面的名字。随后庭长放下袖口，请一个司祭带陪审员们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头，皮肤肿胀，脸色白里泛黄。身穿棕色法衣，胸前挂着一个金十字架，一枚小小的勋章别在他的法衣的侧面。他慢腾腾地挪动法衣里的两条肥腿，走到圣像下面摆着的读经台旁。

陪审员们都站起来，拥挤着走到读经台那边去。

“过来吧，先生们，”司祭说，用他胖得近乎浮肿的手摸着胸前十字架，等候所有的陪审员走过来。

这个司祭在职已经四十六年，预备再过三年就像不久以前大教堂里的大司祭那样庆贺他的任职五十周年纪念日。他自从法院开办以来就一直在地方法庭里任职，因此颇为自豪，因为经他带着宣誓的已经有好几万人之多，而且他到了晚年仍旧为教会、祖国和家庭的利益出力。日后他留给亲属的产业，除一所房子以外，还有一笔不下于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至于他干的工作是否正当，他却从不曾考虑过，因为他在法庭里的工作是带领人们凭《福音书》宣誓，而《福音书》上恰是明文规定禁止起誓的。他从不曾心有惭愧或厌弃过这种工作，而且极其珍爱这种干惯了的且常有机会结交许多上流人的职业。

今天他就认识了那位有名的律师，对他非常佩服，因为他仅仅办了击败那个帽子上插着大花的老太太一个案子，就净赚一万卢布。

等到陪审员都顺着台阶登上高台，司祭就偏着顶门光秃、白发苍苍的脑袋，套上油腻的圣带，理了理稀疏的头发，转过脸面对那些陪审员。

“请举起右手，手指象这样并拢，”他用苍老的音调慢慢地说，举起每个手指上生着小窝的肥胖的手，把手指并拢，做成捏住什么东西的姿式。“现在大家跟着我念，”他领头宣誓：“凭万能的上帝，凭着他神圣的福音书并赋与生命的十字架，我允诺并宣誓，在审理本案时……”他每说完一句话，就停顿一下。“手不要放下，这样举好，”他对一个放下胳膊

来的年轻人说，“在审理本案时……”

那个留着络腮胡子、相貌堂堂的先生，那个上校，那个商人和另外几个人，都遵循司祭的要求举起胳膊，并起手指头，而且俨然很乐于这样做，举得很高，做得很准确，可是其他的人却好像做得勉强，敷衍塞责。有些人背诵誓词的声音过于激昂，带有一股挑衅的意味，仿佛在说：“既然我非念不可，就大声念吧！”有些人只是含糊其词小声地念着，终于落在司祭的后面，后来又忽然惊觉，害怕似的赶紧跟上去，却已不再和调。有些人拼命地捏紧自己的手指头，唯恐漏掉什么东西似的。有些人却将手指头松开又捏紧。除了老司祭，人人都觉得别扭，也唯有他才深信自己的工作很有益很重大。宣誓完毕，庭长请陪审员们选出一名首席陪审员来。陪审员们就站起来，纷纷走进议事室。他们到了那儿，马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掏出纸烟来，开始吸起来。有人提议推选由那个仪表堂堂的先生担任首席陪审员，这个建议立刻得以一致通过，然后他们又纷纷丢掉或者熄掉烟头，回到法庭。当选的首席陪审员报告庭长说首席陪审员已经确定，于是大家又走到那两排高背椅跟前，跨过别人的脚，回归原位。

一切都按程序顺利进展，没有丝毫耽搁，显得颇为庄严肃穆。正是这种一丝不苟、循序渐进、庄严肃穆的气氛使得所有参与其事的人深感愉快，而且使他们的想法更坚定：他们是在做一件严肃重大的社会工作。聂赫留朵夫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等陪审员们坐好了，庭长作了一番演讲向他们说明陪审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庭长讲话时不断变换姿势，一会儿左臂肘支在桌子上，一会儿又换到右臂肘上，一会儿身子靠在椅背上，一会儿靠在椅子的扶手上，一会儿把一叠纸弄齐，一会儿摩挲着一把裁纸刀，一会儿摸弄着一支铅笔。

庭长说的就是，陪审员的权利是可以通过庭长质问被告，可以使用铅笔和纸，可以查看本案的物证。他们的责任是公正地审判，不作伪证。他们的义务是保守会议的机密内容，不得与外界透露消息，否则，将受惩罚。

大家认认真真、恭恭敬敬地听着。那个商人浑身的酒气四射，他小心地不断往下压他那响亮的饱嗝，每听完一句话就点一下头表示赞成。

九

庭长发言完毕，就转向几个被告。

“西蒙·卡尔津金，请站起来！”他说。

西蒙紧张地站起来。他腮帮子上的肌肉越发颤抖起来。

“你姓什么，叫什么？”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他粗声粗气地说得很快，显然事先已准备好了答话。

“你的身份？”

“农民。”

“哪一省，哪一县的人？”

“图拉省，克拉斐文县，库比扬斯克乡，鲍尔基村人。”

“你多大年纪？”

“三十三岁，生于一千八百……”

“信什么教？”

“我们信俄国教，东正教。”

“结过婚吗？”

“没有，老爷。”

“做什么工作？”

“我在毛里塔尼亚旅馆里当茶房。”

“以前受过审判吗？”

“从来没有，因为我以前生活……”

“以前没有受过审判吗？”

“上帝保佑，从来没有过。”

“起诉书的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请坐下。叶夫菲米雅·伊凡诺娃·博奇科娃。”庭长开始叫下一个被告。

可是西蒙依然站着，博奇科娃被挡在他身后。

“卡尔津金，请坐下。”

卡尔津金仍旧站着不动。

“卡尔津金，坐下！”

可是卡尔津金依旧站着，直到民事执行吏跑过去，偏着头，不自然地瞪大眼睛，怜悯地低声说：“坐下吧，坐下吧！”他才坐下来。

卡尔津金像他站起来时那么快地坐下，裹紧身上的长袍，两腿的肌肉又不出声地颤动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庭长疲惫地叹了口气，问第二个被告，眼睛没有看她，只顾查看着面前的文件。对于庭长来说，这种程序已成了惯性，若要加速审理的进行，他可以同时做两个事。

博奇科娃年纪四十三岁，身份是科洛姆纳城的小市民，工作也是在毛里塔尼亚旅馆里当茶房。她也没有受过侦讯和审判，也收到了起诉书的副本。博奇科娃回答时理直气壮，她回答每一句话的时候仿佛都表明：“没错，我就是叶夫菲米雅，我就是博奇科娃，起诉副本我收到了，我对此没什么好害臊的，任何人也不许嘲笑我。”庭长的话刚落音，还没有叫博奇科娃坐下，她自己就立刻坐下了。

“您姓什么，叫什么呢？”好色的庭长对第三个被告特别客气。“您得站起来回答，”他看到玛丝洛娃依然坐着，就用温和友善的音调补充了一句。

玛丝洛娃迅速地站起来，表现出依顺的神情，挺起高耸的胸脯，用她那双微笑的略微斜睨的黑眼睛盯着庭长，也没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溜波芙，”她很快地说。

这时聂赫留朵夫已戴上夹鼻眼镜，随着庭长审问的次序，挨个儿瞧着被告。他凝视着第三个被告的脸，暗想：“这不可能，她怎么会叫溜波芙呢？”他听见她的回答，心里考虑着。

庭长还想继续问，但那个戴眼镜的法官生气地把他拦住了，嘀咕了一句。庭长点点头表示同意，转头又对被告说：

“您怎么会叫溜波芙呢？”他说。“登记本上不是这个名字。”

被告一声不吭。

“我问的是您的真名字。”

“庭长问的是你的教名？”那个怒气冲冲的法官嚷道。

“我从前的名字是叶卡吉琳娜。”

“这决不可能。”聂赫留朵夫仍在暗自嘀咕，但是现在毋庸置疑了，他很清楚这个女犯就是她，没错，就是那个他一度真心实意地爱恋过的姑妈家的半是养女半是侍女的姑娘，当初他在一种失去理性的疯魔状态里诱奸过她，事后又抛弃了她，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想起过她，因为对这些事的回忆太令人痛苦，这件事也太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这件事表明他这个时常自诩为正派的人非但不正派，对待这个女人的态度甚至可以用下流卑鄙来形容。

对，就是她。这会儿他清晰地看出了她脸上那种与众不同的神秘特点。这种特点使她的脸都独一无二，与另一张脸不同。尽管她的脸色是不自然的苍白和丰满，她的特点，那与众不同的可爱的特点，还是表现在她的脸上，她的嘴唇上，表现在她那略微斜睨的黑眼睛里，尤其是表现在她那天真、微笑的目光中，表现在她的脸上和周身都流露出来的依顺的神态上。

“你早就该这样说。”庭长仍特别温和地说。“你的父名呢？”

“我是私生子，”玛丝洛娃说。

“那么按你教父的名字该怎么称呼你呢？”

“米哈依洛娃。”

“她会做出什么坏事呢？”聂赫留朵夫心里考虑着，他的心情有点紧张了。

“你的姓，人家习惯叫你什么？”庭长继续问。

“习惯用母亲的姓玛丝洛娃。”

“出身呢？”

“小市民。”

“信东正教吗？”

“信东正教。”

“职业呢？你从事什么工作？”

玛丝洛娃默不出声。

“你从事什么工作？”庭长又问。

“在一种院里，”她说。

“什么院？”戴眼镜的法官严厉地问。

“什么院您心里清楚。”

玛丝洛娃说着，嘲弄地嫣然一笑，然后很快地瞅了瞅四周，立刻又直直地盯着庭长。

她那不同寻常的表情，她的回答所包含的意思，她的嫣然一笑，她向法庭的匆匆一瞥，都那么可怕而又可怜，庭长不由得低下了头，整个法庭一片肃静。这种肃静被旁听席上一个什么人的笑声打破。有人赶紧朝他唏嘘。庭长抬起头来，接着审问：

“您以前没有受过侦讯和审判吗？”

“没有。”玛丝洛娃叹了口气，轻声说。

“收到起诉书的副本了吗？”

“收到了。”

“请坐下。”庭长说。

被告把她身后的裙子底摆往上提了提，就像盛装的女人整理长衣裙那样。然后坐下，将一双小巧的白手拢在囚衣的袖管里，一眨不眨地望着庭长。

这之后就开始传讯证人，再把他们带下去，接着又推定法医，请他上庭。然后书记官起身宣读起诉书。他念得清楚而响亮，但是太快，而且念 π 和 p 这两个字母的音含糊不清，因而他的声调就变成了蜜蜂式的不间断的嗡嗡声，让人昏昏欲睡。法官们时而将胳膊肘倚在圈椅的这边扶手上，时而倚在那边扶手上，时而倚在桌上，时而把身子靠在椅背上，时而合上眼睛，时而又睁开，互相咬着别人的耳朵低语。有一个宪兵难受地压回好几次都想打出来的呵欠。

玛丝洛娃听书记官宣读，忽而直直地盯着他，忽而全身震动一下，似乎打算反驳，脸涨得通红，后来却沉重地叹着气，把手换一种姿势放着，四处看了看，接着又盯住书记官。

聂赫留朵夫坐在第一排尽头倒数第二座的高背椅上，他摘下夹鼻眼镜，盯着玛丝洛娃，他的灵魂里展开了一场痛苦而复杂的活动。

十

起诉书内容如下：

“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毛里塔尼亚旅馆里有一名旅客突然死亡，经查明该旅客是库尔干二等商人费拉邦特·叶梅利亚诺维亚·斯梅利科夫。”

“经本地警察局第四分局医官验明，斯梅利科夫系因饮酒过量导致心力衰竭而亡。斯梅利科夫的尸体当即予以掩埋。”

“数日后，斯梅利科夫之同乡及友伴，一个叫季莫欣者的商人，从彼得堡归来，听说斯梅利科夫死亡一事，表示怀疑，声称必是有人见财起心，于是投毒谋财害命等等。

“关于此项怀疑已由预审查明事实如下：（一）斯梅利科夫于死亡前不久从银行提出现款三千八百银卢布。然而在封存死者的财产清单中仅开列现金三百一十二卢布十六戈比。（二）斯梅利科夫临死前一日曾在妓院和毛里塔尼亚旅馆同妓女溜波芙（即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相处达一昼夜之久。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曾受斯梅利科夫之托，自妓院径赴该旅馆取款。该妓女玛丝洛娃立即会同毛里塔尼亚旅馆茶房叶夫菲米雅·博奇科娃和西蒙·卡尔津金进入房内，使用斯梅利科夫给她的钥匙，开启皮箱，取出现款。玛丝洛娃打开皮箱时，博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均在场亲睹箱内装有若干叠卢布钞票。（三）斯梅利科夫偕同妓女玛丝洛娃自妓院返回旅馆后，该妓女玛丝洛娃受茶房卡尔津金的怂恿，将其交与的若干白色粉末掺入一杯白兰地中，使斯梅利科夫饮下。（四）次日上午该妓女玛丝洛娃将钻石戒指一枚售与女掌班，即妓院老鸨和本案证人基塔耶娃，声称该戒指系斯梅利科夫所赠。（五）斯梅利科夫死后次日，毛里塔尼亚旅馆女茶房叶夫菲米雅·博奇科娃去本地商业银行，在本人活期存款户头下存入一千八百银卢布。”

“经法医解剖斯梅利科夫之尸体，并化验内脏，结果查明死者体内确有毒药，据此足以断定该人系中毒而亡。”

“审讯被告玛丝洛娃、博奇科娃、卡尔津金时，三人均否认犯此罪行。据玛丝洛娃供称：斯梅利科夫在伊‘工作’之妓院中（‘工作’二字乃伊本人说法），确曾被差去毛里塔尼亚旅馆为该商人取款，伊用该商人交伊之钥匙开启皮箱，遵照该商人吩咐取出四十银卢布，分文未曾多取，该供词均由博奇科娃及卡尔津金证明属实，盖因彼二人亲眼目睹伊开箱、取款、锁箱之全过程。伊又供称：伊第二次到商人斯梅利科夫房间后，确曾受卡尔津金教唆，以掺有若干粉末之白兰地酒劝该商人饮下，以为该粉末乃安眠药物，商人饮下后即可昏睡，伊则可借此及早脱身。”

“钻石戒指一枚确系商人斯梅利科夫本人所赠，因该商人酒后将其殴打，她放声痛哭，

且欲 离去，该商人相赠钻石戒指云云。”

“据叶夫菲米雅·博奇科娃供称，关于失款一节她毫不知晓，她从未进入该商人房间，仅有 玛丝洛娃一人出入该房间，故该商人如有失窃情事，定系玛丝洛娃持商人 钥匙取款时乘机窃财。” 玛丝洛娃听到这里，全身剧烈一震，张开嘴巴，把头瞧了一眼博奇科娃。“当法庭向叶夫菲 米雅·博奇科娃查询一千八百银卢布存款单来源时，彼供称：此乃其同西蒙·卡尔津金 十二年的积攒以备同西蒙·卡尔津金结婚等。又据西蒙·卡尔津金初审时供称， 玛丝洛娃自妓院持钥匙来旅馆，唆使其与博奇科娃共同窃取现款，事后三人平分赃款云云。”

玛丝洛娃听到这儿，全身又一阵哆嗦，忍不住跳了起来，满脸涨得通红，开口争辩了一句什 么，但是被民事执行官拦住了。书记官接着念道：

“最后，卡尔津金供认确曾将药粉交给玛丝洛娃以使该商人熟睡不醒。但第二次受审时竟又 推翻前供，声称自己从不曾窃取钱财，也不曾交与玛丝洛娃药粉，所有罪行均属玛丝洛娃一 人所作。关于博奇科娃存入银行之款项，彼供词与博奇科娃相同，声称所有款项均系二人于 旅馆中工作十二年旅客所赏之小费云。”

在这以后起诉书列举犯人对质的记录、证人的供词、法院鉴定人的意见等。

起诉书的结尾这样写道：

“综上所述，鲍尔基村农民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夫菲米雅·伊凡诺娃·博奇科娃，年四十三岁，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米哈伊洛娃·玛丝洛娃，年二十七 岁，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共同预谋盗窃商人斯梅利科夫之钱财及戒指一枚，价值二 千五百银卢布，并蓄意以毒酒将商人斯梅利科夫灌醉，谋财害命，致使该商人中毒身亡。”

“查此项罪行符合《刑法》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第四款及第五款规定，依据《刑事诉讼程 序条例》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将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叶夫菲米雅·博奇科娃及小市民叶卡 吉琳娜·玛丝洛娃交由地方法院法官会同陪审员进行审判。”

至此，这份冗长的起诉书才结束。书记官把这个文件收拾好，在座位上坐下来，用两只手顺 了顺他的长头发。

大家都轻松地吐出了一口气，愉快地感到审讯即将开始，一切都会水落石出，可以申张正义 。只有聂赫留朵夫一人没有这种感觉。他想到十年前他所认识的天真可爱的姑娘玛丝洛娃 竟会做出这样的罪孽，不由得胆战心惊。

十一

等到念完起诉书，庭长同两个法官商量了一会，然后转脸面对卡尔津金，脸上流露的神情分 明在说：现在全部案情都会水落石出了。

“农民西蒙·卡尔津金。”他的身子朝左边倾斜，开口说。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双手紧贴大腿，整个身子向前探出去，腮帮子上的肌肉不停地颤抖 。

“您被控在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串通叶夫菲米雅·博奇科娃和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盗 窃商人斯梅利科夫皮箱里的钱款，然后拿来砒霜，教唆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投入酒中，让 商人喝下去，导致斯梅利科夫中毒身亡。您承认犯过这些罪行吗？”他说，又将身子朝右 边 斜回来。

“绝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工作本份是伺候客人……”

“这话你留到以后再说。你承认自己犯下这些罪行吗？”

“百分之百没有，老爷，我只是……”

“别的话以后再说。你承认犯过这些罪吗？”庭长从容而坚定地又一次问道。

“我不会干这种事，因为……”

民事执行官连忙又跑到西蒙·卡尔津金身旁，怜悯地低声劝住他。

庭长露出结束对他的审问的神情，把拿文件那只手的胳膊肘换了个地方，扭头对叶夫菲米雅·博奇科娃说话。

“叶夫菲米雅·博奇科娃，您被控在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毛里塔尼亚旅馆里同西蒙·卡尔津金和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一起盗窃商人斯梅利科夫箱子里的钱财和戒指一枚，三人平分赃物，后为遮掩罪行用毒酒灌醉商人斯梅利科夫，致使其中毒身亡。您承认犯过这些罪行吗？”

“没有，我什么罪也没犯过，”博奇科娃理直气壮地、很镇静地说。“我连那个房间都没进去过……既然那个下流女人进去过，所有的一切就都是她干的。”

“你先别这么说。”庭长又软中带硬地说。“这么说您不承认犯过这些罪吗？”

“我没拿过钱，我也没劝过酒，我连那个房间都没进去过。如果我进去了，我肯定会把她撵走。”

“你承认自己犯这些罪吗？”

“根本没犯过。”

“很好。”

“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庭长扭头问第三个被告，“你被控带着商人斯梅利科夫的皮箱钥匙从妓院去到毛里塔尼亚旅馆，盗窃箱里现款和戒指一枚，”他像背书似的流利地说，并把耳朵凑近左边的法官，法官对他说，按物证清单查对还少一个酒瓶。“盗取箱里现款和戒指一枚，”庭长重复一遍，“你们私分了赃物，接着你又同商人斯梅利科夫一起回到毛里塔尼亚旅馆，你给斯梅利科夫喝了毒酒，致使他毙命。你承认犯过以上罪行吗？”

“我什么罪也没犯过，”她着急地说，“我原来怎么说的，现在也怎么说我没拿过钱，没拿过钱，没拿过钱，我什么也没拿过。戒指是他自己送我的。”

“您不承认您犯过盗窃二千五百卢布的罪行吗？”庭长说。

“我说过：除了四十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拿。”

“那么，您不承认犯过给斯梅利科夫喝药酒的罪行吗？”

“我承认这件事。但是我真的以为那是安眠药，吃了它没什么关系。正像人家告诉我的那样，我从不曾要毒死他，我从不曾有过那种坏念头。我向上帝发誓：我从不曾有过那种坏念头。”她说。

“这么说，你不承认犯有盗窃商人斯梅利科夫现款以及戒指的罪行，”庭长说，“不过你承认给他喝过毒酒，对吗？”

“承认是送过酒，不过我认为那是安眠药。我给他喝是为了要他睡觉。我没有想要去害死他，我没有这个想法。”

“很好，”庭长说，显然对取得的证词很满意。“那么你就把事情经过说一遍。”他说，同时身子往椅背一靠，两手搁在桌上。“请你说一遍事情全部的经过。你老实坦白就可以得到

从宽发落。”

玛丝洛娃的眼睛直盯着庭长，一语不发。

“请你说说事情的经过。”

“你指的是经过？”玛丝洛娃忽然很快地讲道，“当时我乘马车到了旅馆，他们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里，他已经喝得烂醉了。”她一提“他”时，脸上立刻露出异常恐惧的神色，眼睛也睁得老大。“我想离开，他不放我走。”

她不再说下去，仿佛思维中断，或者想到了别的事。

“嗯，后来呢？”

“什么后来呢？后来我在那儿呆了一会儿，就回家去了。”

忽然副检察官很造作地用一个胳膊肘撑在桌上，欠起半个身子站了起来。

“您想提问吗？”庭长说。在得到副检察官肯定的答复后，庭长就对他做个表示给予他提问的权利的手势。

“我想问一句：被告在这以前跟西蒙·卡尔津金熟识吗？”副检察官说，并没有看一眼玛丝洛娃。

他问话完毕，就紧闭双唇，紧锁眉头。

庭长重述了一遍这个问题。玛丝洛娃惊恐地打量着副检察官。

“西蒙？我们以前就认得。”她说。

“我现在想了解一下被告跟卡尔津金的交情。他们是否时常碰面？”

“交情怎么样？他常找我去接客人，算不得什么交情。”玛丝洛娃回答，心神不安地瞧瞧副检察官，又看看庭长，扭头又瞧瞧副检察官。

“我想了解，为什么卡尔津金专找玛丝洛娃接客，而不找别的姑娘。”副检察官眯起眼睛，现出阴险多疑的笑容，说。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玛丝洛娃恐慌地向四下里看了看，她的目光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停留了一下。“他想找谁就找谁。”

“难道她认出我来了？”聂赫留朵夫胆战心惊地想，觉得血涌到了脸上。其实玛丝洛娃并没有认出是他，她立刻又转过脸去，又带着惶恐的神情盯着副检察官。

“那么，被告否认她同卡尔津金有某种特殊亲密关系，是吗？很好。我没有其它的话要问了。”

副检察官立刻把他的胳膊肘从写字台上移开，提笔做起什么记录。事实上他什么也没有记，仅仅用钢笔描了描他文稿上的字罢了，他只不过模仿有些检察官和律师们的做法罢了：每当他们提出一个精彩的问题以后，就在他们的发言稿上记下几句足以给对方致命打击的话。

庭长没有立刻向被告重复检察官的提问，因为此刻他在问戴眼镜的法官是否同意提出那些早已拟定在纸上的问题。

“后来怎么样呢？”庭长继续问玛丝洛娃道。

“我回到家里，”玛丝洛娃接着说，她已经比较大胆、镇定地只瞧着庭长一个人，“我把钱交给女掌班，就上床睡了。我刚刚入睡，我们的姑娘别尔塔就把我弄醒了。‘去吧，你的商人又来了。’我不乐意去，但是老鸨硬叫我去。他就在那儿，”她说到“他”字，脸上就显露出那种显而易见的战战兢兢的神色，“他死劲地灌姑娘们喝酒，后来他还要买酒，但是他的钱全花光了。女掌班不相信他。于是他派我到他的旅馆房间里去。他告诉我他的钱

在哪儿，应该取出多少。我就坐上车走了。”

这时候庭长在跟左边的法官交头接耳，根本没有认真听玛丝洛娃说话，但是为了表示他全听见了，就把她最后的一句话学着说了一遍。

“您就坐上车走了。哦，后来又怎么样呢？”他说。

“我到了那儿，依他的吩咐办事。我走进他的房间时，还叫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叫了她。”她指着博奇科娃说。

“她瞎扯什么呀，我从来就没进去过，……”博奇科娃似乎要争辩几句，可是被人制止了。

“我当着他们的面拿了四张红票子。”玛丝洛娃继续说，她皱起眉头，眼睛没有看博奇科娃。

“那么，被告取出四十卢布的时候，没有看见那儿有多少钱吗？”副检察官又问。

玛丝洛娃一听到副检察官提问，就打了个寒颤。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凭直觉认为他对自己没安好心。

“我没数。我只看见那都是一百卢布的票子。”

“被告看见了那些一百卢布的票子，那么，我没有其它问题要问了。”

“那么，后来你取来了钱吗？”庭长看看怀表，继续问。

“取来了钱。”

“嗯，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把我带回了旅馆。”玛丝洛娃说。

“那么，你是怎样把药粉放在酒里拿给他喝的？”庭长接着问。

“怎样给他喝吗？我在酒里洒了药粉，就拿给他喝了。”

“你为什么要给他喝下药酒呢？”

她没有立刻回答，只沉重地长叹了一口气。

“他怎么也不肯放我走，”她沉默了一会，说道，“我被他弄得疲惫极了。我就出来，走到廊里，对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巴不得他能放我出去，我累极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他把我们也闹得烦死了。我们给他一点安眠药粉吃，他一睡着，你就可以摆脱他了。’我说：‘好吧。’我还以为那不是害人的毒药。他就真的给了我一个小纸包。我走到房间里，他在隔板后面躺着，一看见我就吩咐我给他倒一杯白兰地。我从桌上拿起一瓶上等白兰地酒，倒了两杯，一杯给自己喝，一杯给他喝。我在他的杯子里洒了药粉。拿给他喝。我要是一旦知道那是毒药，怎么会给他喝呢？”

“嗯，那个戒指你是怎么弄到手的？”庭长问。

“那是他自己把戒指送给我的。”

“什么时候他送给你的？”

“我跟他一回到他在旅馆的房间就想走掉，他就使劲地打我的脑袋，竟然把梳子都打断了。我生了气，一定要走。他就脱下手指上的戒指送给我，要我别走。”玛丝洛娃说。

这时副检察官又欠起身子，仍旧装出无邪的模样要求庭长允许他再提出几个问题。在取得庭长的许可后，他把脑袋歪靠在在绣花衣领上，问道：

“被告能否告诉我你在商人斯梅利科夫房间里停留了多少时间。”

玛丝洛娃又露出惊惶的神情，目光惶恐不安地从副检察官脸上移到庭长脸上，急切地说：

“我不记得停留多久。”

“那么，被告是否记得，她从商人斯梅利科夫房间里出来以后，是否到旅馆其它的地方去过？”

玛丝洛娃想想说：

“我到隔壁空房间里去过。”

“你到那儿去干什么？”副检察官忘了自己的身份，直接向她提问了。

“我去理一理我的衣服，等马车来。”

“那么，卡尔津金有没有到那个房间同被告会面？”

“他去过。”

“他到那个房间去干什么？”

“我们一块儿喝了那个商人剩下的一点白兰地。”

“哦，一块儿喝了。很好……那么，被告跟西蒙谈过什么话吗？”

玛丝洛娃忽然皱起眉头，涨红了脸，急速地说：

“谈了什么？我什么也没谈。那天的情形我全说了，别的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您想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吧。反正我是无罪的，就这样。”

“我没有别的话要问了。”副检察官对庭长说，然后很矫揉造作地耸起肩膀，飞快地在他的发言大纲上记下被告的供词：她跟西蒙一块儿去过一个空房间里。

法庭上一阵寂静。

“您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了吗？”庭长问。

“所有的话我都说完了。”她叹息了一声，说道，坐了下来。

庭长开始在一纸上写字，随后听到左边的法官凑在他的耳朵上低声说了一句话，就宣布讯暂停十分钟，然后匆匆站起来，走出法庭。左边那个身材高、大胡子、生着善良的大眼睛的法官向庭长商谈的是这样一件事：他觉得胃里略微有点难受，想要按摩一阵，喝点药水。他将这件事告诉庭长，庭长就依照他的提议宣布休息。

陪审员、律师、证人跟着法官们纷纷站起身来，大家欣慰地感到已审完一个重要案件的一部分，开始走散。

聂赫留朵夫走进陪审员议事室，坐在了窗旁。

十二

对，这个女犯人就是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的关系是这样开始的。

聂赫留朵夫初次见到卡秋莎，是在他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年夏天他住在姑妈家，打算写一篇内容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学期论文。

以往的夏天，他总是同母亲和姐姐一起住在莫斯科附近他母亲的大庄园上避暑。可是那一年他的姐姐已经出嫁，母亲出国去一个有温泉的地方疗养。聂赫留朵夫又必须写那篇论文，因此他决定到姑姑们家里来消夏。她们的庄园幽静，远离尘嚣，没有什么事来打扰他的心神，分散他的精力。姑姑们万分钟爱他这个侄子和遗产继承人；他也敬爱她们，喜欢她们那种古老简朴的生活方式。

这年夏天聂赫留朵夫在姑姑们家里生活愉快、心境昂扬兴奋。

作为一个青年人，第一次不按照别人的指点，亲自领悟到生活的美丽和重要，领悟到人在生活中应尽的职责的全部意义，看到人的心灵和全部世界都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可能。他不仅满怀希望去实现这种完美，而且充分相信能够实现这种理想。那年他在大学里悉心阅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关于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叙述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这特别是因为他是个大地主的儿子。他的父亲本身并不富有，但母亲有大约一万俄亩土地的陪嫁。那时他第一次明白了土地私有制的残酷和不公正，而他又十分注重道德，认为因道

德的要求而做出的自我牺牲是最高的精神享受，因此他决定放弃自己的土地所有权，把他从父亲名下所继承的土地送给农民。现在他正在写一论文，集中论述这个问题。

那年他在乡间姑妈家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

他每天太阳还没出来就起床，有时甚至还只是三点钟，他总是在还是满天晨雾的时候，就去山脚下一条河里洗澡。当他返回时，青草上和花朵上的露珠还晶莹欲滴呢。早晨他喝过咖啡，有时就坐下来写论文，或者阅读与这篇论文有关的资料。但更多时候他却是既不看书，也不写作，干脆走出房外，到田野和树林里去散步。午饭前，他常在花园里找个地方眯盹一小会儿，临到吃午饭，他总是快快乐乐地说一些有趣的事，引得姑姑们满心愉快，笑声不断。饭后他就骑马或者划船，傍晚时分再看书，或者坐下来陪姑姑们摆牌阵。晚间，尤其是如水的月夜，他往往由于胸中激荡着的生活乐趣过于强烈而睡不着。后又索性不再睡觉，带着他的幻想和思绪在花园里走来走去，有的时候一直到天明。

就这样，他在姑姑们家里快活而恬静地度过了一个月，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那个半养女半使女、眼睛乌黑发亮、走路轻快敏捷的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那年才十九岁，一直在母亲的养育下长大，是个心地十分纯洁的青年。在他的想象中，只有成为他的妻子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凡是在他看来不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都算不上是女人，而只是普通的人。但有一次，就是那年夏天的升天节，姑妈家的一个女邻居带着她的孩子们来做客，其中有两个小姐、一个男中学生和一个在她家做客的农民出身的青年画家。

吃过茶点以后，大家就在正房前面修剪平坦的草场上玩“捉人”游戏。他们把卡秋莎也叫去参加。玩了几回以后，轮到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一起跑。平常聂赫留朵夫看到卡秋莎，总感到高兴，但他的头脑里从没想到他同她会发什么特殊关系。

“哎，现在这两个人可说什么也捉不到了，”那个“捉人”的快乐的画家说，他那两条农民的又短又结实的罗圈腿跑起来非常敏捷，“除非他们自己绊倒在地上。”

“哪儿能呢，您能够捉住的！”

“一、二、三！”

他们拍了三次手。卡秋莎忍不住格格地笑起来，灵敏地跟聂赫留朵夫调换位置，用她粗糙而有力的小手握了握他的大手，一直往左边跑去，她那浆过的裙子地直响。

聂赫留朵夫跑得飞快。他不想让画家捉住他，就竭尽全力往前跑。

他回头瞧一眼，瞧见那个画家在追卡秋莎，但卡秋莎挥动那两条年轻的富有弹性的腿飞跑着，灵活地不让他捉住，直奔左边跑去。前面是一个丁香花丛的花坛，没有人曾跑到那里去，但卡秋莎扭过头来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向他点头示意，要他也跑到花坛后面去同她会合。聂赫留朵夫明白了她的暗示，就往花丛后面跑去。谁料花丛后面有一道小沟，沟里长满带刺的荨麻，聂赫留朵夫不晓得，一脚踩空，掉到沟里去了。他的两只手被荨麻刺破，还沾满了黄昏前晚露。但他立刻爬了起来，笑自己的鲁莽，跑到一块平坦的地方。

卡秋莎那双湿润的乌梅子般的眼睛也闪动着盈盈的笑意，迎着他也似地跑来。他们跑到一块儿，互相握住手。

“我看，您的手准是被荨麻伤了。”卡秋莎说。她用另一只手理理松散的辫子，不住地

喘气，带着盈盈笑意的眼睛照直打量着他。

“我根本不知道这儿有一条小沟。”他也笑眯眯地说，而且一直紧握着她的手。

她朝他靠近了点。他自己也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把自己的脸凑到她跟前去。她没有躲闪，他就握紧她的手，吻了吻她的嘴唇。

“哎呀，这是干什么！”她说，很快地抽出自己的手，从他身旁溜走了。

她跑到丁香花丛那边，摘下两根正在凋谢的白色丁香，拍打着她那发烫的脸，又扭头看他一眼，灵活地摆动着双臂，走回做游戏的人那边去。

从那以后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形成了纯洁天真的男子和同样纯洁无邪的少女因为相互爱慕而经常产生的那种独特的关系。

每当卡秋莎刚走进房间，亦或聂赫留朵夫远远地望见她的白围裙，世间万物在他眼中就仿佛蒙上灿烂的光辉，一切都变得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义，生活也更加充满愉悦。她也有同样的感受。但是，不仅卡秋莎就在身边或者同他相隔不远时他有这样的印象，而且聂赫留朵夫只要一想到世上有卡秋莎存在，他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同样对卡秋莎来说，只要想到世上有聂赫留朵夫存在，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聂赫留朵夫收到母亲写来的令人不快的信件也罢，论文写得棘手也罢，或者心头生出了青年人常有的莫名的忧郁也罢，只要一想到世上有卡秋莎的存在，他可以见到她，一切惆怅就都烟消云散了。

卡秋莎在家里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她总能把那些事一件件做好，还偷空来看些书。

聂赫留朵夫就将他自己刚刚读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书拿给她看。她最爱读的是屠格涅夫的《静静的河流》。他们俩偶尔碰上就交谈几句，有时在过道上，有时在露台上，有时在院子里，有的时候还在姑姑们的老女仆玛特廖娜·巴夫洛夫娜的房间里，因为卡秋莎与她共居一室，聂赫留朵夫就时不时到她们的小屋里去含着糖块喝茶。当玛特廖娜·巴夫洛夫娜在场时，他们交谈起来更舒服畅快。倘若屋里只剩下他们俩，谈话却有些别扭。他们的眼睛所讲的，与他们嘴里所讲的无法统一，而且眼睛交谈的东西更多更重要，他们的嘴唇紧闭着，心里害怕，不一会儿就匆匆离开。

第一次在姑姑家度过的那个夏天，聂赫留朵夫与卡秋莎始终保持着这种纯洁美妙的关系。

两个姑妈发觉他们这种关系，有点恐慌担忧，甚至写了封信到国外去告诉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叶莲娜·伊凡诺夫娜公爵夫人。玛丽亚姑妈担心德米特里会同卡秋莎产生暧昧关系。不过她这种担心显然是多余的，因为聂赫留朵夫如同一切纯洁的人那样，不自觉地就爱上了卡秋莎，他这种不自觉的爱情无论对她还是对自己都成了他们不致堕落的保障。他不仅没有占有她的肉体的欲望，而且一想到居然要同她发生这样的关系就感到害怕。但颇有诗情的索菲娅姑妈的忧虑就要实际得多。她生怕凭着他那果敢执着的性格的德米特里万一爱上这姑娘，就不顾她的出身和地位的人，毫不犹豫的同她结婚。

如果聂赫留朵夫当时清楚地知道到自己爱上了卡秋莎，特别是如果当时有人劝他万万不能也，绝不应该把他的命运和这样一个姑娘结合，那么，凭着他的直率地处理问题的性格，他会做出决定一定同她结婚，不管她是个什么样的出身和地位，只要他爱上她。不过，两位姑妈并没有把她们的忧虑向他说明，因此他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对这个姑娘的爱情，就这样离开了乡间。

当时的他坚信自己对卡秋莎所产生的感情，不过是那时候生活乐趣充满他的全身心的一种表现罢了，并且那个妩媚快活的姑娘也与他有着相同的生活欢乐。但是等到他动身的时刻，当卡秋莎同姑姑们站在门廊上，用她那满含泪水、略微斜睨的黑眼睛注视他时，他这才体会到他正在割舍一种美丽的、宝贵的、逝去永不可得的东西。他心中不觉一阵怅惘。

“再见，卡秋莎，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他坐上马车，隔着索菲娅姑妈的罩帽望过去，对她说。

“再见，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她用亲切悦耳的声音说，她忍住满眶的泪水，跑向门廊里去，在那儿她才痛快地放声哭了起来。

十三

从那以后，聂赫留朵夫连续三年没有见过卡秋莎。一直到他刚被提升为军官，准备出发去军队，途经姑姑家时，他才跟她见面。

但这时候同三年前的夏天在她们家住过的那个人时相比，他已经完全不同了。

那时他是个正派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人，乐意为一切美好高尚事业献身；如今他可成了彻底的利己主义者，贪杯好色，享乐成癖。原先，上帝创造的世界在他心目中是个秘密，他带着极大的热情企图解开这个秘密；如今，这个世界中生活的一切事情都再简单不过，已经由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中的各种条件一一安排的。原先，同大自然交流，同前人——在他以前生活过的、思索过和感觉过的哲学家、诗人交流——是重要的；如今，重要的是当今的社会制度以及跟同事们之间的交际活动。原先，他觉得女人显得神秘而迷人，正因神秘就变得更加迷人；如今，女人，除了自己的亲属和朋友的妻子以外的任何女人，她们的功用都很清楚：女人只不过是尝试用于享乐的最好的用具。原先他不需要钱，他的母亲给他的钱连三分之一都用不完，他可以放弃他父亲名下的继承的地产，分赠给他的农民；如今，母亲按月给他一千五百卢布，他总是不够用，常常为了钱他跟母亲闹得很不愉快。

从前，他认为精神得以存在才是真正的自我，如今却认为他那精力充沛的兽性的自我才是真正的自己了。

这一切可怕的变化发生在他身上，只是因为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理论而开始相信别人。他为什么会开始怀疑自己而相信别人，原因在于倘若相信自己，过日子就会太困难：相信自己，所有的问题就得亲自解决，而那种解决总是不利于他那追求轻浮享乐的兽性的自我，而且几乎总是与它相违背；倘若相信别人，那么所有的问题就都不需要解决，所有的问题都已由别人处理好了，而且那种解决虽然同精神的自我抵触但有利于兽性的自我。何况，如果他相信自己，却总是遭到人们的非难与指责，如果他相信别人，倒会获取他周遭的人们的赞扬与称颂。

比如，聂赫留朵夫思索上帝、真理、财富、贫穷等问题，阅读有关这些问题书籍并同人家讨论，周围的人就会觉得他不合时宜，甚至有点滑稽可笑，他的母亲和姑妈就会好意地用讽刺的口吻，戏称他是我们亲爱的哲学家。但他看无聊的小说，讲猥亵的故事，到法国

剧院看滑稽的轻松喜剧，并且快活地谈起其中的情节，大家反而就称赞他，鼓励他。如果他节省过度，穿旧大衣，不喝酒，大家就认为他脾气古怪，有意追求标新立异。可是当他在挥金如土地置办打猎的用具，布置奢华书房，大家反而就吹捧他风雅，还送给他许多贵重礼品。他原来保持童贞无邪，并且想一直保持到结婚那天，但他的亲人却为他担忧，以为他心理上有病。后来他母亲听说他从同事手里把一个法国女人夺过来，成了真正的男人，不仅不难过，反而为他感到高兴。但公爵夫人每年一想到儿子同卡秋莎的那段危险的插曲，而且可能同她结婚，就不免感到忧虑。

同样，当初聂赫留朵夫成年以后，他把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一块面积不大的地产分赠给农民，因为他认为这种土地所有制是不合理的。不料他这种举动却使他的母亲和亲戚大惊失色，而且这件事从此成为大家不断嘲弄取笑的话题。大家多次告诉他，农民得到土地后不仅没有发财，反而更穷了，因为他们开了三家小酒店后，索性不干农活了。

但是当聂赫留朵夫参加了近卫军，因为与那些门第高贵的同事们一起穷奢极欲和赌博挥霍而花掉很多的钱，迫使叶莲娜·伊万诺夫娜不得不动用存款的时候，她竟没有感到丝毫的心痛，相反却认为这是人之常情，甚至认为趁聂赫留朵夫年轻，让他照这样在上流社会里种一种疫苗增强抵抗力，倒不失为一件好事。

初始，聂赫留朵夫也奋力反抗，无奈这种反抗过于艰难，因为有些事情每当他坚信是好的时候，别人却都认为是坏的；反之，有些事情每当他坚信是坏的时候，他周遭的所有人却都认为好的。最后，聂赫留朵夫放弃了自己的信念，遵从了社会习俗，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了。他如此否定自己，在起初是颇不愉快的，但是这种不愉快的心情并没维持太长时间。后来聂赫留朵夫开始抽烟喝酒，很快那种不愉快的压抑感觉荡然无存了，他甚至感到颇为轻松。

聂赫留朵夫天性活泼热情，他在搬到彼得堡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他周遭的所有人共同称颂的新生活中，他心灵深处其他的追求一概被排斥在外了。他的这种变化在他进入军队中工作的时候就彻底完成了。

军官生活本来就易使人堕落，进入军队的人处于完全闲散的状况下，也就是不用参加合理而有益的劳动，传统的军队、军服、军旗的荣誉取代了他们应承担的义务。军官生活一方面使得担任军职的人对其他人享有无限权势，另一方面却又迫使他们在长官面前卑躬屈膝、奴颜媚骨。

然而，除了进军队服役同军服、军旗和名正言顺的暴行屠杀所导致的一般性堕落之外，在门第高贵的公子哥群中选拔军官所组成的近卫军团中，军官们由于富裕和与皇室接近而格外堕落。这些人很容易堕落成疯狂的自私自利的人。自从聂赫留朵夫担任军职，开始像同僚们那样生活以来，他就陷入了这种疯狂的利己主义的泥沼之中。

他整日无所事事，只要穿上由别人并非是自己精心缝制、刷洗干净的制服，戴着头盔，拿上他人制造、擦亮并递到他手上的武器，骑着一匹由别人饲养并且训练的骏马，跟着那些与他相同的人一起去参加练兵或者检阅，也就是纵马奔驰，耍弄马刀，开枪射击，并且把这整套教给别人就可以了。他们没有其他的事可以做，可是那些达官显贵，无论老幼，甚至沙皇同他的亲信都称赞他们的工作，并由此表扬他们，对他们表示感谢。这些活动完成了以后，他们就去军官俱乐部或者豪华的饭店里吃吃喝喝，任意浪费不知从哪里搞来的金钱；然后就是剧院、舞会、女人，不然就是骑马、耍刀弄枪、奔驰，之后又是奢侈浪费、酗酒、玩牌、追女人。

这种生活非常厉害地腐蚀着军人们。因为如果一个普通人过这种生活，他就会在心底感

到羞愧。军人过这种生活却毫无罪恶感，甚至自吹自擂，以此为荣，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聂赫留朵夫恰好是在对土耳其宣战之后参加军队的。“我们预备为国牺牲生命，因而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但是可以谅解，而且对我们是必需的。所以我们过这种生活。”

在聂赫留朵夫一生中的这段时期，他也存有这种朦朦胧胧的思想。在整个这段时期，他一直欢天喜地，因为他摆脱了从前他为自己设定的种种道德束缚，他也一直处于狂热的利己主义的疯魔状态里。

当他三年以后重返姑姑家时，正是处于这种状态中。

十四

聂赫留朵夫这次之所以会到姑姑们家里去，第一是因为她们的庄园恰好就在他追赶他所在的已开赴前方的部队的一条必经的大道旁边，第二是因为她们殷切地要求他去一趟，此外他这一次去，主要还是为了看一看卡秋莎。

或许在内心深处他已经被那如今摆脱束缚的兽性所支配，对卡秋莎有了歹心，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不过是想回到他曾愉快地生活过的地方，看望两位对他一直非常慈爱和赞赏、令他觉得可笑而又亲切的姑妈，看望给他留下快乐记忆的纯洁可爱的卡秋莎。

他是在三月末耶稣受难日那天抵达的。那时冰雪刚刚融化，道路泥泞，并且下着倾盆大雨，淋得他浑身湿淋淋的，身子也被冻住了似的，可他依然生气勃勃，精神焕发——那段时间里，他一直是这样的。“她是否还在她们家里？”马车抵达姑妈家熟悉的老式地主庄园时，他暗暗地想着。庄园院子里堆着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积雪，周围圈着一道矮墙。他一心希望，她一听到他的铃铛声就会跑出来到台阶上迎接他，可只看到两个裙裾掖在腰里的赤脚女人从边门里提着水桶走出来，她们显而易见正在刷洗地板。

正门的门廊上没见到她的身影，只有听差吉洪一个人走出来，他身上系着围裙，大约也在忙于打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身穿一件绸料连衣裙，头戴一顶包发帽，来到前厅。

“你终于来了，这真好极了！”索菲娅·伊万诺夫娜说着，吻了吻他。“玛

丽亚有点不舒服，她在教堂里站累了。我们领过圣餐了。”

“恭喜您，索菲娅姑姑，”聂赫留朵夫说着，拿起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手吻了吻，“真抱歉，我沾湿您的衣裳了。”

“快进房间里去，你身上都湿透了。看你已经长了胡子了……卡秋莎！卡秋莎！快拿咖啡给他喝。”

“我马上就来！”走道里传来熟悉的悦耳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的心快活得怦怦直跳。“她还在这里！”犹如太阳破云而出。聂赫留朵夫兴冲冲地随着吉洪到他从前居住的那间卧室里去换衣服。

聂赫留朵夫非常想从吉洪那里打听一些卡秋莎的消息：她身体怎么样？过得好吗？是不是要嫁人了？可吉洪一直是那么毕恭毕敬，庄重严肃，甚至坚持要亲手给他倒水洗手，让聂赫留朵夫不方便跟他询问有关卡秋莎的事，只得问候他的孙子们的情况，那匹叫作“老兄”的老马与那条看家狗波尔康好不好。原来他的孙子们和老马都不错，挺强壮，只是波尔康去年疯了。

聂赫留朵夫刚将所有的湿衣服脱下，想换上干净衣服，就听见了匆匆的脚步声，然后是敲门声。聂赫留朵夫从脚步声和敲门声就能猜出是谁来了。这样走路和敲门的，只有她。

他拿起湿漉漉的军大衣，披在身上，走向门口。

“请进！”

没错，正是卡秋莎。她和从前还是一样，只是出落得越发娇柔妩媚了。她依然笑盈盈地低着头从下往上打量人，用的依然是那清澈纯洁的、微微斜睨的黑眼睛。

她依旧系着雪白的围裙。姑妈吩咐她送来一块刚刚拆掉包装的香皂同两块毛巾：一块是俄国式大浴巾，一块是毛巾。无论是刻有清楚字母的新香皂，还是那两块毛巾，或是卡秋莎自己，全都那么干净整洁、新鲜、纯朴、招人喜欢。她那两片棱角分明的可爱嘴唇，和上次看到他同样，因为心底难以抑制的快乐弯了起来。

“欢迎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她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出来，脸蛋涨得红红的。

“你好……您好，”聂赫留朵夫拿不准称呼她是“你”好或是用“您”好，脸孔变得和她一样红红的。“身体怎么样？”

“上帝保佑……您看，姑妈让我为您送来了您喜欢的玫瑰香皂。”她边说边把香皂放在桌上，把手巾搭在椅子扶手上。

“侄少爷自己有。”吉洪得意地指着聂赫留朵夫的那个已打开的大梳妆箱说，为客人自备具的豪奢气派辩护。箱子里露出许多小小的银瓶盖，里面还有大量的玻璃瓶、刷子、发蜡、香水和各式各样的化妆用品。

“请您代我向姑姑道一声谢。啊，我多么高兴又来到了这里。”聂赫留朵夫说着，觉得自己的心灵变得同从前一样开朗和柔和。

她听见这些话，只以微微一笑作为回答，转身离开了。

两位姑姑一向就钟爱聂赫留朵夫，这一回见到他，更是分外欢喜。德米特里要出发去打仗，没准会负伤或阵亡呢。这使两位姑姑对他格外亲热和心疼。

聂赫留朵夫原本只打算在姑姑们家里停留一天一夜，但当见到卡秋莎后，就答应在姑姑们家里多留两天，一块儿过复活节。他发电报给他的朋友和同事申博克，请他也到姑姑们家里来，他们原定在敖德萨见面的。

聂赫留朵夫从第一天看见卡秋莎，对她就重燃旧情。他同上次一样，看到卡秋莎的白围裙就激动，听到她的说笑声就兴奋，看到她那双潮湿乌黑的眼睛，尤其是在她微微含笑的时候，他就禁不住心动，特别是当他和她碰面的时候，他一看到她羞涩的模样，就心神慌乱。他觉得自己坠入情网了，但与以前不同的是他不再觉得恋爱非常神秘的了，他那时连自己都不敢承认他在恋爱，而且认为人的一辈子只会有一次恋爱。现在他再次坠入情网了，并且明白了这一点，还为此感到快乐。他模模糊糊地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会导致什么结果。

聂赫留朵夫也同其他的人一样，身上并存着两个对立面。一方面是精神的，他所向往的是那种利人利己一致的幸福；一方面在于兽性的，他只顾追求个人利益，甚至为了自己利益不惜损害所有人的利益。在目前这个时期，彼得堡生活和军队生活唤醒的个人主义在他身上恶性发作，兽性的方面在他身上占了优势，完全压倒了精神的方面。不过，他与卡秋莎重逢，重燃旧情，精神的方面又抬头了，而且重新在他的行动中占支配地位。在复活

节之前的两天中，聂赫留朵夫未意识到自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内心斗争。

在理智方面，他很清楚自己应该离开了，没有必要再留在姑姑们家里，也很清楚这样住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是他是那么兴奋，那么快乐，结果他没有正视即将到来的危险，又住下来了。

在基督复活节的前夜，星期六傍晚，一个司祭带着助祭和诵经士乘雪橇到这儿来做晨祷，他们声称他们走完从教堂到姑姑家的三俄里路真是费尽了心力，他们是穿越了水塘和雷地才到达的。

聂赫留朵夫同姑姑和仆人们站在一块儿一边做晨祷，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卡秋莎，她站在门口，送来了手提香炉。他依照复活节的规矩同司祭和姑姑们互相吻过三次之后，正打算去睡觉，忽然听见外面过道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老女仆玛特廖娜·巴夫洛夫娜正准备跟卡秋莎一起动身到教堂去给复活节的甜面包和甜奶渣糕做受净化礼。“我也去！”他暗暗下定决心。

去教堂的路，不管是乘雪橇还是坐马车，都不好走。

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一直都如同自己家里一样的随意，他让仆人备好那匹叫“老兄”的雄马的鞍子，不去上床休息，却穿好帅气的军服和紧身马裤，披着长长的军用风衣，骑着那匹嘶叫不停的健壮的老公马，穿过水塘和雪地奔向教堂。

十五

这次晨祷在聂赫留朵夫的一生中都刻下了非常鲜明的印象。

他骑马，趟着水，走完几堆白雪零星点缀着的漆黑道路，进了教堂的院子。他那匹马一看见教堂周围的点点灯火，就竖起了耳朵。这时候，礼拜已经开始了。

有些农民知道他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侄子，就将他领到一块干燥的地方下马，帮他把马拴好，带他走进教堂。教堂里已经挤满了过节的人。

东边是些男人们：老头们穿着手纺布长袍，脚包洁净的裹脚布，外套树皮鞋；年轻人身着簇新的厚呢料的长袍，腰口扎着颜色鲜艳的宽腰带，脚上穿高统皮靴。西边是些女人，她们中年轻的头上围着红绸的围巾，上身穿着棉绒紧身背心，配上红袖子和蓝色、绿色、红色或是大花的裙子，脚穿着钉了掌的短靴。年纪大的妇女穿着很朴素，他们站在年轻女人的后面，头戴白头巾，身穿深色短袄，和旧式毛纺的裙子，脚穿平底鞋或是崭新的树皮鞋。孩子们也挤在人群里，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头发擦得油光闪亮。农民们虔诚地画十字，低头鞠躬。女人们，尤其是那些年纪大的，睁大她们变得混浊的眼睛盯着蜡烛和圣像，并拢着手指用力按了按包了头巾的额头、双肩和腹部，嘴里暗暗祈祷，鞠着躬或者跪下。孩子们看到有人在看着他们，就模仿大人的样子，使劲儿祷告。

一些大蜡烛烛身缠绕着金色螺旋纹，它们的四周是许许多多的小蜡烛，明亮的烛光照得金黄的圣像壁金光闪闪。枝形大烛架上也插满了蜡烛。夹杂着粗重的男低音和尖细的童高音的业余歌手的欢快歌声从唱诗班那边传来。

聂赫留朵夫朝前边走去。上等人站在教堂的正中央，其中有一个地主带着他的妻子和穿着水兵制服的儿子，有警察分局局长，有电报员，有一个穿着高腰皮靴的商人，有一个佩戴着徽章的乡长。在读经台右边，玛特廖娜·巴夫洛夫娜站在地主太太身后，她穿着亮闪闪的淡紫色连衣裙，戴着坠流苏的白色披巾。

卡秋莎和她站在一起，穿着一件胸前打了褶的洁白连衣裙，腰上系着一条淡蓝腰带，一个鲜红的蝴蝶结扎在乌黑的头发上。

整个教堂里都充满着快乐、庄严、欣喜和美好的气氛。司祭们身穿闪着银光的法袍，颈上带着金十字架。助祭和诵经士身穿金银丝绦花边的祭服。业余歌手们也都身着节日的盛装，头发也抹得闪着油光。节日的赞美诗听起来跟欢乐的舞曲似的。司祭们高高举起插了三支蜡烛、装着花卉的烛台，不断为人们祝福，嘴里不停地欢呼：“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所有的人和物都非常美丽，可最美丽的却是那身穿洁白连衣裙、腰扎浅蓝腰带、黑亮的头发上顶着鲜红蝴蝶结、眼神里充满快乐的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察觉得出尽管她没有回头，却已经看见他了。这是他经过她的身旁，走向祭坛的时候看出来的。他原本没有什么话要跟她讲，但他思虑了片刻，在经过她身旁的时候说：

“姑姑说，她在做完晚午祷以后就开斋。”

正如每次她见到他一样，她青春的热血涌上了她那张可爱的笑脸。她微微抬起乌黑的眼睛快活而天真地望着聂赫留朵夫。

“我知道。”她笑盈盈地回答。

这时，一个手上拿着铜咖啡壶的诵经士，在人群中穿过，在走过卡秋莎身边时不小心让他的祭服下摆碰到了卡秋莎。那诵经士明显的是出于对聂赫留朵夫的尊敬，特意从他旁边绕过去，结果碰到了卡秋莎的。聂赫留朵夫暗自惊奇，那个诵经士为什么不明白，这里的全部，甚至整个世界都全部是因卡秋莎的存在而存在的，他可以忽略世间万物，可却不能轻慢卡秋莎，因为她才是世界的中心。因为有她，圣像壁才发出闪闪金光，蜡烛才在烛台上燃烧发光；因为有她，人们才纵情欢歌：“基督复活了，欢呼吧，人们哪！”世上所有美好是因为有了她，因她而存在的。他想卡秋莎也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她。聂赫留朵夫目不转睛地看着她那穿带皱褶白色连衣裙的苗条的身影，注视着她那全神贯注的溢满快乐的脸庞，心里这样想着。

从她脸上的表情他可以看出，她的灵魂和他的灵魂齐唱着同一首歌。

在早午祷和晚午祷中间的那个时刻，聂赫留朵夫走出了教堂。人们纷纷给他让路，对他鞠躬行礼。有的人认得他，有的人却问：“他是谁家的？”他在教堂的门廊上站住。乞丐们纷纷围上来，他就将钱夹里的所有零钱统统分给他们，再从台阶上走下去。

尽管太阳还没升上来，但天色已经很亮了。人们分散在教堂周围的坟地上。卡秋莎仍然留在教堂里，聂赫留朵夫就停下来等她。

人们陆续走出教堂来，他们鞋底的钉子把石板地踏得不断地发出叮叮声。他们从台阶上走下来，分散到教堂前的院子中和墓园里。

玛丽亚姑姑家的点心师傅，老态龙钟，不断地晃着头，拦住聂赫留朵夫，跟他互相吻了三下。点心师傅的妻子头上围着一块丝绸三角围巾，头巾下面的皮肤皱缩成一团。她手帕里拿出来一个染成黄色的复活节彩蛋，送给聂赫留朵夫。这时，一个健壮的年轻农民，穿着一件崭新的紧身外衣，腰里扎着一条绿色宽腰带，笑容满面地走向他。

“基督复活了！”他眼睛里含着笑意说。他把脸凑到聂赫留朵夫耳边，使他闻到一股农

民身上所特有的好闻气味，他那卷曲浓密的胡子把聂赫留朵夫的脸扎得痒痒的，然后就用他那宽厚的湿润的嘴唇在聂赫留朵夫的嘴上吻了三下。

正当聂赫留朵夫跟这个农民亲吻，收下他赠送的一个深棕色复活节鸡蛋的时候，玛特廖娜·巴夫洛夫娜亮闪闪的紫色衣裙和那个扎着红蝴蝶结的可爱的乌黑脑袋出现了。

她越过走在她面前的人们的头顶，瞧见了她。他也看到她喜气洋洋的、神采飞扬的脸。

她与玛特廖娜·巴夫洛夫娜一同走出来，在门廊上站住，向乞丐们散了一些钱。有一个乞丐已经烂掉了鼻子，痊愈后只剩下一块红疤，此刻正走到卡秋莎跟前来。她就从手绢里拿出一个什么东西，送给他，然后凑到他跟前，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厌恶神情，吻了他三次，她的眼睛依然闪烁着快活的光芒。正当她亲吻那个乞丐时，她的眼光碰上了聂赫留朵夫的眼光。她的眼神仿佛在问：我这样做好吗，对吗？

“你做得好，做得对，亲爱的，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美，我爱这一切！”他的眼睛好像在这样说着。

她们从台阶上走下来，他就走到她身边。他没有想过去依复活节的规矩与她互吻，只想挨她尽量近一些。

“基督复活了！”玛特廖娜说着。她低下头，含着笑，那口气似乎是在说：今天我们都是平等的。然后她把手绢揉起来，擦了擦嘴，朝他的嘴唇凑过去。

“真的复活了！”聂赫留朵夫答道，与她接吻。

他转过去看了看卡秋莎的脸。她飞红了双颊，同时挨向他身边。

“基督复活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真的复活了！”他回答，同她接了两次吻，好像迟疑了一会儿，是不是要再吻一次？最后觉得再吻一次才行，他们就吻了第三次。然后两人都笑了。

“你们准备去找司祭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卡秋莎说。她用整个胸部深深地呼吸着，俨然刚完成一项愉快的工作。她抬起那双温顺的、贞洁的、热烈的、稍稍斜睨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

男女之间的爱情达到既没有什么自觉的、理性的控制，也没有什么肉欲的非分之想时，便是达到了顶点时刻。对聂赫留朵夫来说，这个基督复活节的夜晚，就达到了这样的顶点时刻。虽然他跟她在各种场合见过面，可是只要他一回忆起卡秋莎，首先映入他脑海的总是这个时候的情景。她那长满乌黑、柔顺、光亮的长发的小脑袋，她那件紧紧地包裹她的苗条身材和不高的胸脯的、带着皱褶的白色连衣裙，她脸上涌现的红晕，她那对因通宵未眠而略带斜睨的、柔顺的、亮晶晶的黑眼睛，她的全身上下，都焕发出这样两个主要的特征：

她拥有纯真无邪的少女的爱，不但爱他——他很清楚这点，——而且世上所有人，所有事物；不但爱这人间所有美好的事物，而且爱她刚才吻过的那个乞丐。

他明白她心里有着这种爱，因为他觉得，他那一整夜也有这种高尚的感情，并且意识到，将他和她联结一起的正是这种爱。

唉，如果他们能保持住那天夜里的感情该多好！“不错，那件邪恶的事是发生在复活节

夜晚之后日子啊！”现在聂赫留朵夫在陪审员议事室窗边坐着，暗暗地想着。

十六

聂赫留朵夫从教堂回到家里以后，就跟他的姑姑们一同开斋，并且为了提神，依军队里的习惯，喝了一些白酒和葡萄酒，随后他回到自己的卧房里，和衣躺下，不一会儿就睡熟了。他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他从敲门声上听出是她来了，就揉了揉眼睛，坐起来伸了个懒腰。

“卡秋莎，是你吧？快进来！”他下了床说。

她轻轻打开房门。

“请您去饭厅，开饭了。”她说。

她依然穿着那件白色的连衣裙，但摘下了头发上的蝴蝶结。

她笑盈盈地望着他的眼睛，似乎她来告诉他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喜讯。

“好，我这就去。”他回答说，拿起梳子，想梳一下头发。

她还站在那儿。他发觉了这一点，就扔下梳子，朝她走过去。但就在这一刻，她又很快地扭转身子，像平素一样，踩着她那又轻又快的步子沿着过道上的长地毯离开了。

“我真蠢，”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我应该把她留住呀！”

他跑进过道里赶上她。

他想要对她怎么样，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不过他想到，刚才她到他房里时，他应该做一件

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的事，可是他却没做。

“卡秋莎，你等一等。”他说。

她转过头来看着他。

“您有什么事么？”她站住说。

“没什么，只是……”

他认真想象着在这类情形下，在他如今的地位，别的男子一般会采取什么举动，忽然他鼓足勇气伸出胳膊搂住卡秋莎的腰。

她静静地望着他的眼睛，没有动。

“别这样，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别这样！”她又说，脸涨得通红，眼泪也几乎流了出来，同时她用自己那结实有力的手推开他那只搂住她的腰的胳膊。

聂赫留朵夫放开了她。那一刹那他感到别扭，羞惭，甚至厌恶自己。

他本应该相信自己的这种感情，可是他不明白正是这种羞耻心才使他灵魂中最高尚的感情流露，反而认为他自己傻，他应该像一般人所做的那样去做才对。

他再一次追上她，抱紧她，吻她的脖子。这一次的吻与前两次的一——同在丁香花坛后面那次情不自禁的一吻和今天早晨在教堂那儿的吻完全不同。她也感觉到了这次的吻是可怕的。

“您想干什么呀？”她害怕地叫起来，好像他打坏了一种无限珍贵的东西，再也无法挽回似的。她慌张地从他身边跑开了。

他走进饭厅。两位穿着讲究的姑妈、一位医生和一位女邻居已经站在摆好了冷盘的桌边等他。

一切都跟往日一样平静，但是聂赫留朵夫内心深处却掀起了狂澜。别人对他说话，他压根听不见，他的回答也是风牛马不相及。他全心全意地想着卡秋莎，回味刚才在过道里他追上她后的那一吻。他已无心去思考任何别的什么事。每当她走进房间里来，他的眼睛没看见她，却真真切切地感到她近在咫尺，他必须努力克制自己才能不抬起眼睛来看她。

饭后，他立刻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在房间里久久地走来走去，心情极为兴奋，认真地聆听这所房子里的所有动静，期待着她那又轻又快的脚步声响起。

他心底那个兽性方面，现在不仅重新抬头，而且将他刚到时和今天早晨在教堂里还存活着的 精神的一面完全压倒。如今这个可怕的兽性的方面完全占据了他的灵魂。尽管他整天都跟踪着她，今天他却一直没有机会与她单独在一起。大概是她故意避开他吧。可是在傍晚，她 恰巧要去他隔壁房间里去做事。原来那位医生要住下来，卡秋莎只好去为他铺床。聂赫留朵夫刚听到她的脚步声，就屏着息，轻手轻脚地跟着她走进那个房间，像是要去做什么罪恶的事似的。

她正把两只手伸进干净的枕头套中，紧抓着枕头角，转身看了他，小心地笑笑，但这笑已与 原来那种轻松欢喜的笑容不同，而是一种勉强而且可怜带着恐惧的笑。

这个笑容似乎在向他诉说：你要做的事是可耻的，是不允许的。一刹那，他呆立在那儿。现在还有挣扎的余地。他对她的真诚的爱的声音，虽然微弱，可是毕竟响起来了，他不得不顾虑她，她的感情，她的生活。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又在他心底回响：注意，你莫错过你自己的享乐，你自己的幸福了。第二个声音最终盖过了第一个声音。他毅然决然地走到她跟前 去。那种可怕的和无法抑制的兽性已驾驭了他。

聂赫留朵夫紧紧地搂住她不肯松开，硬将她按在床上坐下。他觉得还需要做点别的什么事，就挨着她坐下。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行行好，求你放开我吧。”她说，模样可怜兮兮的。“玛特廖娜·巴夫洛夫娜来了！”她一边叫嚷，一边极力挣脱身子。门外果然有人走来。

“既然如此我晚上去找你，”聂赫留朵夫说。“你不是只有一个人住在屋里吗？”

“您在说些什么哪？千万不要这样！别这样！”她嘴中这样说着，可她慌张羞涩的神情说出来 的却似乎是完全不同。

走进来的果真是玛特廖娜，她走进屋子里，胳膊上搭了一条被子，以责备的眼光朝聂赫留朵夫瞅了一眼，责怪卡秋莎把被子拿错了。

聂赫留朵夫不作声低着头走了出去。他甚至没有觉得羞耻。他从玛特廖娜的神情上明白，她在 责备他，而且责备的正确，因为他自己也明白他干的是罪恶的事，可他原来由于对她的纯洁 爱情而被抑制的兽性如今控制了他，占据了他，扼杀了他其他全部的感情。现在他意识到，要满足这种兽性该做些什么，并想方设法做到一切。

整个黄昏他都失魂落魄，他时而走到姑姑们的房间里去，时而又走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时而又在门廊上站住，只有一件事充斥在他的大脑里，那就是考虑如何才能跟她单独

见面。可是，不仅她在躲避他，玛特廖娜·巴夫洛夫娜也主严肃地看守着她。

十七

聂赫留朵夫就这样度过了整个黄昏，直到黑夜降临。那个医师去休息了。姑姑们也安然入睡了。

聂赫留朵夫知道玛特廖娜这时在姑妈起居室里，女仆住的屋里只留下卡秋莎一人。他又走到台阶上。户外一片黑暗，但是潮湿，温暖。遍天都是白茫茫的大雾。在春季，这种雾能让残雪融化，或许雾本来就是因残雪融化而起的。房子之前百米左右的陡坡下有条小溪，从那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那是冰层在融化破裂发出的。

聂赫留朵夫从台阶上走下来，走过冰雪覆盖的池塘，来到女仆屋子窗边。

他自己都能听见他的心在胸膛里扑通乱跳。他一会儿屏住呼吸，一会儿又费力地深深地吐一口气。女仆房间里点着一盏小灯。卡秋莎一个人坐在桌旁沉思，眼睛呆望着前面。聂赫留朵夫静静地瞧了她很久，想知道她在以为无人注意她的时候她会做些什么。就这样过了两分钟，她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然后抬起眼睛来，微微一笑，摇了摇头，俨然自我责备似的，接着将两支胳膊猛地往桌上一放，变换了一个姿势，呆呆地望着前面。

他站在那儿瞧着她，不由自主地听着他自己的心跳声和从河上传来的奇特的响声。

那边，弥漫着雾气的河上，正在进行着不停的延续而缓慢的变化：一阵儿是什么东西在呼呼地喘气，一阵儿像是嚓一声裂开，一阵儿是哗啦一下塌下去，一阵儿是薄薄的冰片像玻璃似的互相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他站在窗边，瞧着卡秋莎因为内心矛盾重重而看起来烦恼的沉思的脸庞，他对她很怜悯，但奇怪的是，这种怜悯反而却让他对她的欲念变得更强烈了。

这种欲念已经完全霸占了他。

他敲敲窗子。她仿佛遭电触似的全身一震，脸上显现出恐惧的神情。然后她跳了起来，走到窗前，把脸贴近窗玻璃。直到她伸出双手当作护眼罩放在她的眼睛两旁，认出是他的时候，那恐惧的神情还依然留在她的脸上。他以前从没见过她象现在这般严肃的脸。直到他微微一笑，她也才微微一笑，但这个微笑似乎只是为了应酬他才发出的，她根本不想笑，有的只是满心恐惧。他向她招手示意，让她到院子里来找他。但是她摇摇头，好像是拒绝出去。她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子那儿。他再一次把脸凑近窗玻璃，想喊她出来，可是这时候她回过头去看房门口，显然有人在叫她。聂赫留朵夫就从窗子跟前走开了。

雾非常浓，在距房子五步光景就不能看到窗子，只留下一片黑暗的阴影，中间有一个看起来很大的红色灯光。河那边依然传来奇怪的喘气声、崩塌声、坼裂声和冰块碰撞的哗啦声。在附近布满浓雾的院子中，有一只公鸡打起鸣来，附近几只公鸡也跟着啼起来，然后远处的村子里也传来互相响应、汇成一片的鸡叫声。可是，除了河那边，周围还是一片宁静。这时鸡已叫过两遍了。

聂赫留朵夫沿着房子墙角来回走了两遍，好几回踩进水洼里，然后又走向女仆屋子窗口。灯依然亮着，卡秋莎还坐在桌边，好像对什么事下不了决心似的。他刚走到窗边，她就看了他一眼。他敲了敲窗户。她没去看是谁在敲，就跑出屋子。他听到门钩咔地响了一下，然后外道门吱地一声打开了。他在过道里等她，马上默默地搂住她。她紧靠着他，仰起头，

嘴凑过去同他接吻。他们站在过道转角那块干燥的地方，他全身充满了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突然外道门又吱吱嘎嘎的响起来，并传来玛特廖娜充满怒气的声音：

“卡秋莎！”

她挣脱他的怀抱，回到女仆房间里去。他只听见嗒地一声，门被扣上了。除了一片迷雾和河上的响声外，接下来一切又都回复寂静了，窗子里的灯火也熄灭了。

聂赫留朵夫走到窗子跟前，但他什么人也没看见。他敲了敲玻璃，也没有人回音。聂赫留朵夫绕到前门的门廊上，返回正房，但却无法入眠。他将靴子脱下，光着脚，顺着过道朝她的房门口走过去，她的房间同玛特廖娜·巴夫洛夫娜的房间紧挨着。起初他听见发出平稳的鼾声，他正想往前走，忽然玛特廖娜·巴夫洛夫娜咳嗽起来，翻了个身，弄得床吱吱嘎嘎地响。他的心似乎止住了跳动，在那儿呆站了大约五分钟。等到一切又归于沉寂，平稳的鼾声又响起来，他就尽量地把他的脚踩在不容易发出嘎吱声的地板上，往前走，来到她的房门口。房内异常地安静，连她的呼吸声也听不到，她分明没有睡着。

他刚压低声音叫了一声“卡秋莎”，她就立刻跳起来，走到房门口，生气似的——他有这种感觉——让他走开。

“这像什么样子？唉，这样可不行！姑妈她们会听到的。”她嘴里这么说着，可是却像是说：“我是全部属于你的。”

这句话只有聂赫留朵夫才明白。

“喂，你开一下门吧，我求你了！”他胡乱地说。

她不再说话了，然后他听到一只手摸索着找门钩的声音。门钩啪地一声被打开了，他溜进打开的门内。

她这时只穿着又粗又硬的布内衣，胳膊裸露着；他一把抓住她，把她抱了起来往外走去。

“哎呀！您这是干什么呀？”她悄声抱怨道。

可是他没有理睬她，只是抱着他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哎，别这样，放开我吧！”她嘴上说着，身子却与他贴得更近了。

.....

等到她周身发抖，默不吭声，也不理睬他说的话，从他那儿走掉后，他便也走出去，来到门廊上，认真考虑着刚才发生的这件事的意义。

屋外面亮了些了。河那边冰块爆裂、撞击发出的声音更响了。在这些响声之外，现在又增加了哗哗流水的声音。迷雾开始变淡，一弯残月从雾幕后面浮出，悲凉地照着一片黑暗和阴森的地面。

“我到底是怎么啦，是走运还是倒了霉了？”他自忖道。“这种事是司空见惯的，大家都会这样干的。”他自己这样想着，就回房间里睡觉去了。

十八

第二天，申博克衣冠整齐、兴致勃勃地来聂赫留朵夫姑妈家与他汇合。

姑姑们满心欢喜地接受了申博克，因为他既文雅殷勤、乐观慷慨，又对德米特里万分热爱。但是他的慷慨虽然很受姑姑们欢喜，却似乎太过火，使她们又为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门外来了几个瞎眼的乞丐，他一伸手就给一个卢布。给仆人们的赏钱，也一下子就是十五

卢布。他呆在这儿的时候，正碰上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小狮子狗修泽特卡的爪子受了点伤，出了点血，他就自告奋勇为它包扎，毫不迟疑地取出自己的带花边的麻纱手绢，将它撕成一条条，给修泽特卡当绷带(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知道，象那样的手绢每打的价钱不会低于十五卢布)。姑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哪曾想到这个申博克其实欠债高达二十万卢布，而他 自己非常清楚这二十万卢布他今生今世是还不清了，所以十五卢布上下的钱对他而言也就 不足挂齿了。

申博克只住了一天，当天晚上就同聂赫留朵夫一起出发了。

他们再不能停留了，因为军队报到的最后期限已经到了。

在姑妈家度过的最后一天中，聂赫留朵夫脑子里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前一天晚上的事。他的 心中有两种感情在斗争着：一种是兽性的性欲引发的火辣辣的色情的记忆，这种情欲尽管不 如原 来想象的那样醉人，但总算是达到了目的，因而多少得到了一些满足；另一种感情是意味到 自己干了一件很坏的事，必须加以弥补，这种弥补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她。

利己主义的思想已完全控制了聂赫留朵夫，他顾虑的只是他自己，所担心的是假如别人知道 他如何对待她，他会不会因此而受到责难，这种责难会有多厉害。他并没有顾虑她目前的心 境如何，这件事会对她以后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他以为申博克猜出他同卡秋莎的关系了，这使得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难怪你对姑姑们忽然如此孝顺，竟在她们家里逗留一个星期。”申博克见到卡秋莎以后， 对他说。“换了我，我也不愿意走了。她真是个迷人的姑娘！”

聂赫留朵夫还想到，尽管没有充分享受与她恋爱带来的快乐，就这样离开难免有些遗憾，可 既然必须得走，那么干脆就让这种无法保持的关系一刀两断，反而会是一件好事。他还想起， 应该给她一些钱，不是为她着想，也不是由于她可能需要钱，而是由于碰到这种事，大家 都是这样做的。既然他玩弄了她，如果不给她一些钱，别人会认为他是个不正派的人。于是 他就给了她一笔钱，那笔钱，以他的地位和她的身份而言，他认为是非常丰厚的。

他离开的那天，午饭后他在过道里等她。她一看到他，脸立刻红了。她朝他看了一眼，示意 他女仆房间的门开着，想走过去，可他拦住了她。

“我想跟你告别，”他一边说，一边在手里揉着那个里边装着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的信封， “这是我给你的。……”

她猜出那是什么了，就皱起眉头，摇了摇头，推开他的手。

“不，你收下吧！”他说话吞吞吐吐，把信封塞进她的怀里后，立即跑回自己的房间，他 仿佛被火烫伤了似的，皱起眉头，哼哼唧唧。

接着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想到刚才那个场面就浑身颤抖，甚至跳起来，长长地叹息，似乎他的肉体上有什么痛苦。

“可我又能怎样呢？大家一向都这么办。”

“申博克

跟家庭女教师做过同样的事，这是他亲口说的。格里沙叔叔也做过这样的事。父亲也 干过这种事。那时父亲住在乡下，跟那个农家女人有了个私生子米金卡，那孩子现在还活 着。

既然人们都这么做，那么当然是合乎情理的。”他这样安慰自己，可是怎么也做不到心安理得。他一想起这事，他就受到良心的谴责。

在他的心中，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意识到了他的行为的卑鄙、恶劣、残酷。一想起这事，他不但不能指责他人，甚至不敢正眼看人，更不用说跟原来那样自诩高尚、纯洁、慷慨的青年了。可他必须依靠原来对自己持有的那种的看法，才能快快活活地充满信心活下去。为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忘掉它。他就这么做了。

他在军队的生活，那种新的环境、新的同僚和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做到这一点。他生活得越是长久，那件事被遗忘得就越多，最后果然一点点印象也没有了。

仅仅有那么一次，那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他途经姑姑家，希望能见到卡秋莎，却得知她已经不在那里了。他走后不久，她就离开姑姑们的家去分娩，在某个地方生下了一个孩子。后来，据姑姑们听说，她完全堕落了。听到这些，他非常难受。从时间上推算，她生下的那个孩子可能就是他的，不过也可能不是他的。姑姑们说她变坏了，说她跟她的母亲一样天生淫荡。他很高兴听到姑姑们的这种推断，因为这仿佛减轻了他的罪孽。

刚开始他还想寻找她和孩子，可后来，因为想起这事在内心引起的极度痛苦和羞耻，就不再努力去寻找，反而忘记了自己造下的罪孽，不再去想它。

可是现在，这种出乎意料的巧遇让他想起了这一切，并迫使他承认自己没有心肝，承认自己的残酷卑劣，良心上背着这样的罪恶，竟然还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了十年。不过，现在让他彻底承认这些，还为时过早，眼下他所考虑的不过是这事不能让别人知道，她自己或者她的律师不要把这事讲出来，让他当众出丑。

十九

聂赫留朵夫正是在这种心情之下，从法庭走进陪审员议事间的。

他坐在窗边不停地吸烟，听四周的人谈话。

那个快活的商人显然很赞同商人斯梅利科夫的享乐方法。

“嘿，老兄，他玩得可真痛快，颇有些西伯利亚人的风格呢。他眼光不错，看中的那个妞儿多漂亮！”

首席陪审员大声议论了一通，认为这个案子的关键是鉴定。彼得·格拉西莫维奇正跟那名犹太籍店员说笑话，为了一句什么话哈哈大笑起来。聂赫留朵夫对别人的问题，老是用一两个字就应付过去。他只是希望人们都别来打扰他。

民事执行吏步履踉跄地进来请陪审员回法庭，聂赫留朵夫觉得心惊胆战，好像他不是去审问别人，而是自己去接受审判。

在心灵深处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个坏人，正眼看人时应感到羞愧，不过习惯还是占了上风，他登上那个高台时依然大模大样，他紧挨着首席陪审员，在原来所坐的第二把椅子上坐下，跷起二郎腿，手里摆弄着他的夹鼻眼镜。

本来已被押出去了的被告们，这时又被押了回来。

法庭里添了一些新证人。聂赫留朵夫注意到玛丝洛娃有好几次瞅着一个珠光宝气、周身裹满绸缎丝绒的胖女人，长时间地望着她。那个女人坐在栏杆前面的头一排座位上，戴一

顶很高的帽子，帽子上面扎着大花结，从手到肘部的胳膊都裸露着，挽着一个精致的手提包。

聂赫留朵夫后来才得知，她是证人，就是玛丝洛娃所在那个妓院的掌班。

开始对证人进行审问，问他们的名字、宗教信仰等等。接着庭长征询法官意见，证人是否要宣誓。然后那个老司祭费力地挪动两腿走上法庭，拉拉绸法衣上的金十字架让它正过来，又那么从容镇定地带领证人和鉴定人宣誓，充分相信他正在做着一件重要而且意义非凡的事。在宣誓完毕之后，证人都被带出法庭，只留下妓院掌班基塔耶娃一个人。法官问她所知道的有关本案的事情。

基塔耶娃一脸的谄媚，每说一句话就缩一下戴着帽子的脑袋。她用带有德国口音的话，详详细细、有条有理地将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首先是她所熟识的旅馆茶房西蒙，到她的妓院里来，帮一个西伯利亚的富商物色一个姑娘。她就打发柳芭莎(溜波芙)去。不一会儿柳芭莎领着那个商人回来了。

“那个商人已经有点迷迷乌乌(糊糊)了，”基塔耶娃笑嘻嘻地说，“他到了我们这儿还不停地喝，还招待那些姑娘们。但是他身上的钱不够，就派这个柳芭莎去他的旅馆房间里取，他已经对这个姑娘很有意了。”她看一眼女被告说。

聂赫留朵夫感到玛丝洛娃听到这里好像微微的笑了笑。这种笑让他觉得恶心，他心里生出一种说不出的嫌恶，同时还杂带几分怜悯。

“那么你怎么看玛丝洛娃呢？”那个指定为玛丝洛娃做辩护的实习法官涨红了脸，胆怯地问。

“她很好，”基塔耶娃答道，“姑娘受过教育，很有派头。她是上等人家出身，看得懂法国书，她有时多喝几杯，可从来不撒野。是个十足的好姑娘。”

卡秋莎瞅着女掌班，接着突然又将眼光转向陪审员这边，她的视线落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她的神情变得严肃，甚至满是愤恨。她那两只充满愤恨的眼睛当中，有一只是斜睨的。这奇特的双眼将聂赫留朵夫盯了许久。他虽然提心吊胆，却又不能将他的目光从她的双眼上移开，他也静静地望着那双明白清亮、目光斜睨的眼睛。那个可怕的夜晚突然浮现于他的脑海：那崩裂的冰块、那弥天浓雾，特别是那将近早晨才升上来的弯弯的残月，照着一个乌黑而令人恐怖的什么东西。现在这两只似乎瞧着他又似乎并没瞧见他的黑眼睛，使得他想起了那个乌黑而恐怖的什么东西。

“她认出我来了！”聂赫留朵夫心想。

他把身子缩成一团，好像在等待着当头一棒。但她并没有认出他来。她平静地叹了一口气，又开始朝庭长看。聂赫留朵夫长出了一口气。“唉，希望快些儿结束。”他想。他这时的心情好像一个猎人不得已弄死一只受伤的小鸟：又是厌恶，又是怜悯，又是懊悔。那只垂死的小鸟不停地在猎袋里挣扎，让人感到既讨厌又可怜，真想尽快弄死它，然后忘掉。

聂赫留朵夫这时听着审问证人，心里就充满了类似的错综复杂的感情。

可是，仿佛故意与他作对似的，这个案子审讯了很长时间。先是法庭依次查问每个证人和鉴定人，接着副检察官和辩护人照例装模作样地提出种种不必要的问题，然后庭长请陪审员们察验物证，其中有一个镶有梅花形钻石的很大的戒指，很明显这原本肯定是戴在一个极粗的食指上的。

还有一个滤器，里面的东西验出有毒。这些东西都盖上了火漆印，上面贴着标签。

陪审员正预备去验看那些物证，不料副检察官又站起身来，要求在察看物证之前先宣读法医的检验报告。

庭长满心期望早点结束此案，以便尽可能快地去会见他的瑞士女人。他很清楚宣读那个文件除了惹人厌烦，推迟吃中饭的时间以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效果，他也知道副检察官之所以要求宣读那个文件，仅仅是因为他有提出这种要求的权利，因此庭长只能无奈地表示同意，不能拒绝书记官取出那个文件，又用无精打采且分不清卷舌音 π 和 p 的声调念起来：

“于外部检查结果表明：”

“（一）费拉邦特·斯梅利科夫体长二俄尺十二俄寸。”

“那家伙块头不小。”那个商人关切地在聂赫留朵夫的耳边低声说。

“（二）据外表推测，年纪在四十岁左右。”

“（三）尸体浮肿。”

“（四）全身皮肤均呈淡绿色，若干地方有深色斑点。”

“（五）尸体表皮上长有大小不等的水泡，有几处皮肤脱落，状如破布。”

“（六）头发为深褐色，非常浓密，一经摸触，非常容易脱落。”

“（七）眼球暴出眼眶以外，角膜浑浊。”

“（八）鼻孔、双耳、口腔等处流出泡沫状浓液，口微张开。”

“（九）面部及胸部十分臃肿，以致颈部几乎看不见。”

等等，等等。

就这样，外部检查情况一共二十七条，写满了四张公文纸，详详细细地描述了那个在城里寻欢作乐的商人的可怕的、高大的、肥胖的、不断臃肿而且正在腐烂的尸体。

聂赫留朵夫听过这篇验尸报告之后，心里原有的那种无法言传的厌恶感更加强了。卡秋莎这一生、从死尸鼻孔里流出的浓液、从眼眶里突出来的眼珠、他自己对她所做的一切，这些对于他都是类似的事物。这些事物自各方面紧紧地围住了他，吞没了他。终于外部检查报告总算宣读完毕，庭长放松地呼出一口气，仰起头，希望这种宣读到此为止。不料书记官马上接着宣读内部检查报告。

庭长又耷拉下脑袋，一只手托着腮，合上了眼睛。坐在聂赫留朵夫身边的商人费力地克服着睡意，身子不时地晃晃。被告们却与他们身后的宪兵一样，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

“内部检查结果表明：”

“（一）头盖骨表皮极易与头盖骨脱离，无一处有瘀血迹象。”

“（二）头盖骨呈中常厚度，完整无损。”

“（三）脑膜坚硬，有两小块业已变色，每一处长约四英寸，脑膜本身呈浊白色。”

等等，等等，另外还有十三条。

接着是当时在场的见证人的姓名和签字，然后是医生得出的结论。结论认为，依据尸体解剖结果并做了正规记录，死者胃部同他的肠子和肾脏发生局部变化，从而可以非常肯定，斯梅利科夫的死确实是因为喝了掺了毒药的酒所造成的。根据胃和肠子的局部变异，不能够断定用的是哪种毒药；但可以肯定毒药是和酒中喝进胃里的，因为在胃里发现了大量的酒精。

“看来他喝得可真不少。”那个商人刚打完瞌睡说道。

这份报告宣读了差不多一小时，可是仍然没有满足副检察官。等宣读完报告，庭长就跟他说：

“我觉得内脏检查报告就没必要再念了。”

“我要求宣读这个检查报告”，副检察官说，他微微欠起身来，眼睛并不看着庭长。他说话的口气如此严厉，以致于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它的份量：要求宣读是我的权利，我决不放弃这个权利，拒不承认我的权利我就有理由上诉。

留着大胡子、生着和善的往下耷拉着的眼睛的那个法官，因为害胃膜炎而感到身体不适，就对庭长说：

“有必要念这个吗？白白浪费时间罢了。这些新扫帚无法扫净灰尘，而只会多耗费些时间。”

戴金边眼镜的那个法官却一声不吭，阴沉而执著地盯着前面。妻子也罢，生活也罢，他对一切都不存有任何好的指望。

书记官又开始宣读文件了。

“一八八×年二月十五日，本人受医务局委托，按照第六三八号指示，”书记官提高嗓门，像是想唤醒所有在场者的神志，又断然念起来，“由副医务检察官来监督，进行以下内脏检查：

“（一）右肺与心脏（放在六磅玻璃瓶中）。 ”

“（二）胃内之物（放在六磅玻璃瓶中）。 ”

“（三）胃（放在六磅玻璃瓶中）。 ”

“（四）肝脏、脾脏和肾脏（放在三磅玻璃瓶中）。 ”

“（五）肠（放在六磅陶罐中）。 ”

从这次宣读一开始，庭长就向一个法官侧过身去，悄声说了句什么，然后又向另一个法官侧过身去。在得到他们的肯定回答之后，他就立刻打断了书记官的宣读。

“法庭认为没有必要宣读这个文件。”他说。

书记官就停了下来，将文件收起。副检察官满面怒容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什么话。

“诸位陪审员先生现在可以去检查物证了。”庭长说。

首席陪审员和其他几个陪审员立即站起来，走到桌子那边去，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只是轮流看过戒指、玻璃瓶、滤器。那个商人甚至把戒指戴在他的手指头上试了试。

“啊，手指可真粗，”他退回他的座位，说道，“跟条粗黄瓜似的。”他补充道，充满兴趣地想象那个因毒丧命的商人肯定像个大力士一样的。

二十一

在检查完物证之后，庭长宣布法庭审问结束。他希望快点儿结束这个案子，就继续审判，请提起公诉的副检察官发言，心想他同大家一样，也要吸烟吃饭，肯定会体谅他们的。没想到副检察官既不体谅自己，更不顾惜别人。

这个副检察官天生下来就十分愚笨，恰巧中学毕业的时候被授与过金质奖章，在大学因为写过一篇关于罗马法地役权的论文又获得了奖金，所以颇有些刚愎自用，洋洋自得（他在女人方面得到的成功越发促成他这样），也因此他变得更加愚笨。等到庭长让他发言，他就把两只手按在写字台上慢悠悠地站起来，显出他那穿着绣花纹的制服的优美身段，他微微低下头，向整个大厅扫了一眼，但并不看被告们，开始发言。

“各位陪审员先生，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个案件，”他开始宣讲刚才在宣读报告过程中准备好的宏篇大论，“这是个典型的——可以这么说——犯罪案件。”

副检察官自认为他所做的报告将具有社会影响，就如同那些名律师进行令他们一举成名的演讲那样。不错，只有三个女人坐在旁听席上——一个是裁缝、一个是厨娘跟西蒙的姊妹，加上一个马车夫，可这完全不会影响他的演讲。那些著名人物也都是这样开始出人头地的。

副检察官所推崇的做事原则，就是要永远站在比实际更高的地方，学会极目远眺，或者说要探索罪犯的心理意义的奥秘，要揭露社会的痼疾。

“在你们面前，各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看见的这宗案件，倘若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是一种世纪末的典型的罪行。这种罪行具有所谓可悲的腐败堕落特征。在如今这个时代，我们社会里的某些人，处在这个腐败社会的强烈的风气的影响下，已经深受其害……”

副检察官讲了很长时间，一边搜肠刮肚地想他已经准备好的种种警句，一边为使他的演讲能通顺流畅不能有所停顿，口若悬河地口罗嗦了一小时加一刻钟。期间他只停顿了一次，咽了一会儿唾沫，可马上抖起精神，更加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来补偿这个停顿。他一会儿换一下重心站着，眼睛盯牢陪审员，对他们曲意承迎；一会儿瞧瞧笔记本，声音镇定而老练；一会儿又用万分激动的语气进行控诉，身子一会儿对着旁听席，一会儿向着陪审员。只是看也不看那三个被告，尽管他们都张大着眼睛望着他。他的演说中提到了当时在他们中间很时髦的最新理论。这些理论不但在那时很流行，就是到现在也还是给当作学术上的新事物，其中包括遗传学、遗传犯罪说、隆勃罗索、塔尔特、进化论、物竞天择、催眠术、暗示说、萨尔克、颓废论。

按照副检察官所下的定义，商人斯梅利科夫，可堪称俄罗斯人的典型，强壮淳朴秉性宽厚，宽宏大量但因为轻信别人，而不幸落在腐败堕落的人们的手里，导致死于非命。

西蒙·卡尔津金是农奴制度的隔代遗传的产物，他长年遭受压制，没有受过教育，做事没有原则，甚至不信宗教。叶夫菲米雅是他的情妇，她是遗传的受害者。她的身上有精神退化的人的各种症状。

但玛是斯洛娃才是造成罪行的主要原因，她是颓废派的最罪恶的代表。

“那个女人，”副检察官眼睛看着陪审员们，说，“受过教育，根据我们刚才听到的她的

掌班的证词。她不但能读会写，还学过法语。由于她是孤儿，差不多天生带着犯罪的根苗。她生长于有教养的上流家庭，原本可以依靠诚实的劳动生活，可她却抛弃她的恩人，放纵情欲。为了得到情欲的满足而投身妓院，并因为受过教育而在妓院中走红。不过，各位陪审员先生，正像刚才你们所听到的她的掌班的证明，主要是因为她能用一种神秘的力量使嫖客受到控制。这种能力最近已被科学，尤其是萨尔克派研究出来，称作‘暗示说’。

她就是利用这种特性而控制了那个俄罗斯壮士即那个秉性宽厚但容易轻信他人的富裕的商人，利用这位商人对她的信任先盗取钱财，后又残忍地毒死了他。”

“嘿，他简直胡扯起来了。”庭长侧过身去笑嘻嘻地对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地地道道的蠢货。”严厉的法官说。

“各位陪审员先生，”这当儿副检察官依然优雅地扭动着他的细腰，接着往下说，“这些人的命运现在由你们掌握，其实社会的命运也或多或少由你们掌握，因为你们的判决将影响社会的命运。你们要认真体会这种罪行的意义，注意像玛丝洛娃这类病态的人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你们要保卫这个社会使其免受他们的传染，要保卫这个社会的清白健全的分子使其免受传染并避免遭受常见的不幸。”

检察官因自己的演说而陷于自我陶醉，但就要作出的重要判决像是慑服了他，他终于疲惫地坐回椅子上。

剥去在他的演说中的华丽词藻，主要意思就是，玛丝洛娃利用催眠术迷倒商人，骗取他的信任，拿了钥匙去旅馆房间偷钱，本来是想独占那些钱财，可西蒙和叶夫菲米雅撞见了她，不得已才跟他们分赃。这之后，为了掩饰她所犯下的罪恶，她又与那商人一同回到旅馆，在那里毒死了他。

副检察官发言完毕之后，就有一个穿着礼服、胸前露出半圆形硬衬的中年人，由律师席上站起来，神气活现地为卡尔津金跟博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用三百卢布请来的辩护律师。他替他们两个开脱罪责，认为玛丝洛娃应该承担所有的罪责。

律师驳斥玛丝洛娃所讲的她拿钱时博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全都在的说法，一口咬定她既然是名毒死人命的被告，那么她的供词就失去了全部价值。他还说，讲到两千五百卢布，这是两个诚实勤劳的茶房的劳动所得，他们偶而可以从客人那里得到三、五个卢布的小费。说起商人的钱，那是被玛丝洛娃偷走了，可能已交给其他某些人，也有可能是丢失了，因为那时候她神智不太清楚。肯定是玛丝洛娃一人毒死了商人。

正因为此，他要求陪审员们判决卡尔津金和博奇科娃在盗窃钱财方面无罪。假若他们一定要判决这两个被告有盗窃嫌疑，那么至少不要判决他们参与毒死人命罪，或者曾参与预谋。

这个律师在结束发言的时候，故意刺了一下副检察官，指出副检察官先生关于遗传学的一番宏论虽然阐明了遗传方面的科学问题，但并不适用于本案，因为还无从得知博奇科娃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副检察官听得牙痒痒的，他在纸上记下一句什么话，并带着鄙夷而惊讶的神情耸了耸肩膀。

然后，玛丝洛娃的律师站起来进行辩护。他说话磕磕绊绊，显然有些怯生生的。他的辩护承认了玛丝洛娃参与偷窃钱财，而断定她没有故意毒死斯梅利科夫，让他吃药只是想让他睡觉。他想发挥一下他的口才，就大致地讲了玛丝洛娃当年被一个男人诱奸，那个男人现在仍然逍遥法外，而她却必须承担起堕落的全部罪责。可律师从心理学方面的分析完全

失败了，因为人人听得都为他感到害臊。他谈起男人的残酷粗俗和女人的悲惨可怜时，已经言词混乱，庭长想要替他解围，就让他注意要讲与本案件相关的实质问题。

这个律师结束辩护后，副检察官又起身，驳斥第一个律师的话，维护自己的遗传学观点。他说，即便是博奇科娃的父母身份还不清楚，遗传学说的正确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科学已充分证明了遗传规律，我们不但能由遗传推断犯罪，而且能由犯罪反推遗传。关于另一位辩护人所说的，玛丝洛娃曾因一个凭空想象的（他用恶狠狠的口气说了“凭空想象的”这几个字）勾引者的腐蚀而堕落，那么种种事实无非是说，是她勾引了许许多多男人，使他们成为她的手中的无谓的牺牲品。他说完这话，洋洋得意地坐下。

然后，法庭允许被告们自我辩护。

叶夫菲米雅·博奇科娃不断重复说她什么事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过，一口咬定所有的罪行都是玛丝洛娃独自一人犯下的。西蒙只是翻来复去地说下面的几句话：

“你们要怎么处置都随你们，反正我是无辜的，我是无罪的。”

唯独玛丝洛娃什么话也没说。庭长告诉她有权进行自我辩护，她只是抬起眼睛来望了望他，又望了望所有的人，惶惶然有如一头被追捕的野兽。然后她低下眼睛，先是抽噎，后来放声大哭起来。

“您怎么了？”坐在聂赫留朵夫身旁的商人听见聂赫留朵夫喉咙里忽然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就问道。原来聂赫留朵夫正在压抑着自己不发出哭泣声来。

聂赫留朵夫没弄明白他眼下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就把他勉强克制住的呜咽和泪水归咎于自己的精神软弱的表现。为了保持形象，他戴上夹鼻眼镜，然后拿出手绢，擦了擦鼻涕。

他想到如果法庭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做过的丑事，他就会颜面尽失。这种恐惧战胜了他的内心矛盾，在这时候，这种恐惧比什么时候都强烈。

二十二

被告们进行自我辩护以后，法官们又花了不少功夫开始讨论应采用何种方式提出问题，以便陪审员们去判决这个案子。最后所有的问题都已拟定，庭长就开始做总结发言。

在讲述案情之前，他用和气的语气向陪审员解释了好一阵儿，解释说抢劫就是抢劫，偷窃就是偷窃，从上锁的地方偷盗就是从上锁的地方偷盗，从没有上锁的地方偷盗就是从没有上锁的地方偷盗。他做这些解释的时候，总是看着聂赫留朵夫，好像希望他明白这个关键，明白之后好向同伴们说明。然后他想陪审员们已深刻懂得了这些道理，就开始说明另一个道理：导致人死亡的行为叫做谋杀，所以毒死也是一种谋杀。

等到依他看来陪审员们已对这个道理心领神会以后，他就向他们解释说，如果偷盗和谋杀是同时发生的，那么偷盗和杀害就构成了犯罪要素。

虽然他本人也期盼着尽快脱身，因为那个瑞士姑娘正在等他，但是因为工作习惯，他一讲开头就怎么也止不住，因此详细地给陪审员们解释，说如果他们认为被告们有罪，他们就有权利宣判他们有罪；如果他们认为被告们没罪，他们就有权利宣判他们无罪；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犯了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他们就可以宣判他们犯了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随后他又向他们解释说，尽管他们拥有这项权利，但他们应该合理地使用这项

权利。他还准备对他们解释说，如果他们对所提出的某个问题做出肯定的答复，他们的肯定答复就意味着裁定了那个问题所提出的全部罪行；如果他们不同意那个问题所提出的全部罪行，他们就得出声明表示他们不同意那些罪行。

这会儿，他拿出怀表来看，发现已经两点五十了，于是决定马上开始案情叙述。

“本案的有关情况是这样的。”他开始讲，重复了好几遍辩护人、副检察官和证人们说过的话。

庭长讲着话，坐在两边法官都做出沉思的模样听着，不时的看看表，觉得他说的不错，就是说按规矩做事，不过长了些。无论是副检察官，还是法庭上其他官员同在场的人，大家都有同样的想法。最后，庭长结束了总结发言。

看样子，该说的都说完了。但是庭长迟迟不愿放弃他说话的权利。他陶醉于自己悠扬的音调，觉得有必要再说几句，有必要讲一讲陪审员们享有这种权利的重要意义，有必要强调一下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利而不能滥用，也有必要提醒他们已经宣过誓，他们就是社会的良心，议事室里的秘密应严加保守，等等，等等。

玛丝洛娃从庭长开口讲话起，就一直牢牢地盯着他，似乎唯恐听漏一个字。因此聂赫留朵夫不用害怕遇到她的目光，可以放心地目不转睛地打量她。他心里正在发生一种常见的现象：乍一看一张久别重逢的脸，即使是自己深爱过的人的脸，心中不禁暗暗惊讶，因为分别期间这张脸的外部已发生了变化，但紧接着那张脸逐渐恢复到多年以前的模样，一切已经发生的变化统统消失了，然后在自己的精神的视野出现了那个独特的、非凡的、精神的人的主要面容。

此刻，聂赫留朵夫心头涌现的就是这种现象。

不错，虽然她穿着囚袍，身体略胖，胸部高耸，虽然她下巴变宽，额头和鬓角长出了皱纹，眼睛有些肿，但她确就是卡秋莎，就是在复活节清晨时纯真快乐地打量着自己这个她心爱的人的卡秋莎，她那时的眼神里充满了生活的快乐。

“竟然会有这么凑巧！恰好排在我做陪审的庭上受审，十年不见，恰恰在这里的被告席上看见她！这事会怎么结束啊？希望快一点，快一点结束吧！”

忏悔心理已在他心头产生，但他依然不愿屈服于它。在他看来这件事纯粹是一种巧合，不久就会过去，他的生活不会受到影响。他认为自己如同一只在房间里做了坏事的小狗，主人揪住它的颈圈，在它做出丑事的地方死死地按着它的鼻子。小狗尖声叫着，往后倒退，想逃离自己做坏事的地方越远越好，并且想忘掉它，但是铁面无情的主人就是不愿意就此松手。

聂赫留朵夫也觉得他从前的所做所为非常卑劣，也觉察到了主人那只强壮的手，可他仍没意识到他所做所为的后果，也不承认他有一个他的支配他的主宰。他仍不肯相信现在发生的这件事是他所造成的。可是那只看不见的手牢牢地抓紧他，让他觉得无法脱身。他表面上还装作一本正经地，佯装无事地坐在最前面第一排第二座位上，跟往常一样很自然地把二郎腿翘起，手里随意地摆弄着他的夹鼻眼镜。可是，在心底他已意识到，不但那种行为，甚至他的整个懒散、放纵、残忍和满足的生活都是那么地残酷、卑鄙和恶劣。以往的十二年中，他的眼睛一直被可怕的帷幕挡住，使他无法看清那次罪行和那之后所有的经

历。现在这块帷幕正在移动，他 开始看清了幕后的真像。

二十三

庭长终于结束了他的发言，极其潇洒地拿起那张问题表，交给朝他这边走过来的首席陪审员。陪审员们也纷纷起身，为现在可以走出去而暗暗高兴，可是因为不知道该把自己的双手放在何处为最好而似乎颇为窘迫。他们依次走进议事室。他们刚刚关上房门，一个宪兵就走到这个房门口来，在门外站住，从刀鞘里拔出军刀靠在自己的肩头上。

法官们站起身走出法庭，在门外站住。被告们也被押走了。

陪审员走进议事厅，与上次相同，第一件事就是开始吸烟。方才在法庭里，他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每人都有些觉得自己的所处境地有些尴尬，自己的行为有些装模作样，可一回到议事厅开始吸烟，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他们像卸下重担，在议事室里各自坐下，立刻就兴高采烈地交谈起来。

“那个小妞儿没有罪，她只是被牵连在其中，”好心肠的商人说，“应该从轻发落才是。”

“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首席陪审员说。“我们不应当凭主观印象裁决。”

“庭长的总结发言讲得很好。”那个上校说。

“哼，确实不错！我几乎睡着了。”

“问题的症结是：如果玛丝洛娃没有跟那些茶房串通，他们是不会知道有那么一笔钱的。”长得很像犹太人的店员说。

“那么依您的意思是说，是她偷的钱口罗？”一位陪审员问道。

“这话我怎么也不信，”善良的商人喊起来，“所有把戏都是那个红眼珠的女骗子干的。”

“他们全是一丘之壑。”上校说。

“但她坚持她没有进过那个房间。”

“您怎么这么相信她了，我这辈子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那个贱胚子的。”

“可是，您只是不相信她，也解决不了问题。”店员说。

“她手中有钥匙。”

“她手里有又如何？”商人反驳说。

“可戒指呢？”

“但是，她说过了的，”商人又叫起来，“那个大个子商人脾气本来就暴躁，又多喝了几杯，就狠狠地揍了她一顿。嗯，当然了，后来，他感到过意不去了。就说：‘喏，你拿去吧，别哭了。’这个人可是出奇地壮呢：刚才我听说他的身材有两俄尺十二俄寸高，有八普特重呢！”

“这些都不重要，”彼得·格拉西莫维奇插嘴说，“关键在于：这件事到底是由她教唆和出谋划策的呢，还是那两个茶房？”

“仅仅只有那两个茶房做这件事是不可能的。钥匙在她的手里嘛。”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进行了相当久。

“对不起，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坐到桌子这边来讨论吧。请。”说着，他自己在主席的位子上坐下。

“那种女人都不是好东西。”店员说。因为想要证明玛丝洛娃是主犯，他就讲起他的一个朋友如何在林荫道口被一个这种女人偷走了怀表。

上校乘此机会讲了一个更令人惊叹的偷窃银茶具的案子。

“各位先生，大家请按顺序讨论问题。”首席陪审员拿铅笔敲敲桌子说。

大家都不作声。要讨论的问题有下面这些：

“(一)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克拉斐文县鲍尔基村农民，年龄三十三岁。他是否犯了如下罪行：在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某某城，为劫夺商人斯梅利科夫的钱财，蓄意将其杀害，于是与他人串通，将毒药投入白兰地酒内，诱其喝下，致使斯梅利科夫丧命，并且盗窃他的钱财约二千五百卢布和钻石戒指一枚？”

“(二)平民叶夫菲米雅·博奇科娃，年龄四十三岁，她是否犯有第一个问题里所举出的罪行？”

“(三)平民叶卡吉琳娜·米哈依洛夫娜·玛丝洛娃，年龄二十七岁，她是否犯有第一个问题里所举出的罪行？”

“(四)倘若被告叶夫菲米雅·博奇科娃没有犯第一项所列的罪行，那么她是否犯了这样的罪：在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某某城，她在毛里塔尼亚旅馆工作的时候，在旅馆客人，即商人斯梅利科夫所住的房间里，从一个锁着的皮箱里秘密盗窃现款二千五百卢布，并且为此目的，用事先配好的一把钥匙开启那个皮箱？”

首席陪审员重新读了一遍第一个问题。

“如何，各位先生？”

大家很快回答了这个问题。所有人都说：“不错，他犯了罪。”——确认他参与谋财害命。只有年纪较大的劳动组合会员认为卡尔津金无罪，无论什么问题，他都替被告开脱。

首席陪审员认为他不懂法律，就向他解释，无论从哪个角度，卡尔津金和博奇科娃毫无疑问是有罪的，可是他却说他也懂得这一点，可还是宽大为怀为好。“我们大家谁也不是完人。”他固执地讲明自己的意见。

至于第二个有关博奇科娃的问题，经过大家的长久讨论和解释，得出的答复是：“她没有犯这样的罪”。因为缺乏确凿的能证明她参与毒死人命罪的证据，她的律师曾经特别强调过这一点。

商人有意为玛丝洛娃开脱，就坚持认为博奇科娃是一切罪行的主谋。许多陪审员都同意他的意见，但是首席陪审员要严格地依法办事，就坚持说没有证据证明她是毒死人命罪的同谋犯。经过长久的辩论，以首席陪审员的意见获胜而终结。

至于第四个有关博奇科娃的问题，大家的答复是：“是的，她犯了这样的罪”。后来，经劳动组合成员的坚持补了一句：“但是应该从轻发落。”

和玛丝洛娃相关的第三个问题却导致了一席激烈争论。首席陪审员认为，她在投毒谋杀和偷盗财物上都犯了罪，商人与他的意见不同，上校、店员跟劳动组合会员都同意商人的意见，剩下的人摇摆不定，可是首席陪审员的意见渐渐占了上风，主要是由于陪审员们都累了，宁可附和一种可以尽快获得一致的意见，让大家尽快结束这讨论的束缚。

聂赫留朵夫根据法庭的审问和他所了解的玛丝洛娃的情况，深信她在偷盗钱财和投毒杀人两方面都是无罪的。

刚开始，他相信大家都会这么认为，可是后来却发觉大家倾向于裁定她有罪，那个商人的辩护极其笨拙，很明显他出头辩护只是因为他看中了玛丝洛娃的姿色，这一点他自己毫不掩饰，并且首席陪审员正是针对这一点进行了反击，更主要的是，大家都已经疲惫不堪了。聂赫留朵夫原想反驳他们，可是他又害怕替玛丝洛娃讲话，觉得如果这样，大家就会立刻知道他同她的关系。但是他又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就照这样发展下去，必须反驳才行。

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刚要开口，正巧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开口说出他想说的话，彼得·格拉西莫维奇 到这时候为止一直沉默着，现在显然被首席陪审员的权威口吻所激怒，开口反驳起他来。

“请容我说几句，”他说，“您说因为钥匙在她的手里，钱就是她偷的。那么难道那两个茶房就不能在她离开后另配一把钥匙来开启那个皮箱吗？”

“不错，不错！”商人附和着说。

“而且，她也没有可能拿那些钱，因为按她眼下处境来说，她没有放钱的地方。”

“不错，我也这样想。”商人同意他的说法。

“很可能是她去旅馆取钱，让那两个茶房生了歹意。他们就乘机作案，然后又将全部事情推 到她身上。”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讲这番话时情绪很激动。首席陪审员也气恼起来，因此更加固执地维护 自己的意见，可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讲的道理很容易让人信服，多数人都认为他的话是正确的，认为玛丝洛娃与盗窃钱财和戒指无关，是商人把戒指送给她的。当谈到她是否参与 投毒杀人时，一心为她申辩的商人说，必须判定她没犯这种罪，因为她根本没有必要毒死他 。首席陪审员却说，不能判定她无罪，因为她本人承认是她放的药粉。

“虽然是她放的，但她不知道那是毒药。”商人说。

“可是鸦片也能害死人。”上校说。他喜欢把话岔到题外去，就借机大谈特谈他内弟的妻子 如何想服鸦片自尽，如果附近没有医生，不能赶紧采取急救措施，她必死无疑。上校讲得如 此动听，如此从容，又如此威严，以致于无人有足够的勇气打断他。只有那个店员受到这个 例子的启发，决心打断他的话，好讲一讲他的故事。

“但有些人却习惯了服鸦片，”他开口说，“一次就能喝四十滴。我有一个亲戚……”

可是上校不容许别人插嘴，继续讲鸦片对他内弟的妻子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我说，诸位先生，现在已经四点多钟了。”其中一个陪审员叫道。

“那么到底怎么办呢，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总结说，“我们就裁定她犯了罪，但并非蓄 意劫夺钱财，她没有盗窃他的钱财。就这样行吗？”

“可应该从宽发落。”商人补充道。

大家都同意，只有劳动组合会员自己还坚持：“不，她是无罪的。”

“这样不就是说，”首席陪审员说明道，“没有蓄意抢劫，也没有偷盗财物。这样，她就 无罪了。”

“就这么定了，再加上一句从宽发落，那就完美了。”商人高兴地说。

大家争论得晕头转向，都非常疲惫，没有人想到在结论里要补充一句：是有罪，可不是故 意杀人。

聂赫留朵夫也十分激动，也没有发现这个疏忽。结论就这样记录下来，呈送给法庭。

拉伯雷记述过一位法学家，他在办案时引用了许多法律条款，读了二十页不知所云的拉丁语 法典，最后却提出由法官掷骰子，由单数双数决定结果。是双，就是原告获胜；是单数，就 是被告获胜。

当前也是如此。大家做出这样的而不是另一样的决定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大家都同意这样做， 却是因为：第一，庭长虽然讲得很久的总结发言，却偏偏漏掉了他往常总要交代的话，也 就是陪审员们回答问题时可以说：“是的，她犯了这样的罪，但是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第 二，上校讲他内弟的妻子的事讲得太长，太乏味；第三，当时聂赫留朵夫过于激动，竟忽略 了这句“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之类的保留意见被漏掉了，以为仅仅“没有劫 夺钱财的意思 ”这样一个保留条件就不会判罪了；第四，当时彼得·格拉西莫维奇不在房

间里，首席陪审员重读那些问题和答案的时候，他恰巧出去了；第五，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大家都已疲惫万分，都期待着尽快散会，所以就同意了这个可以把事情快一些了结的决定。

陪审员们摇了摇铃。宪兵原本就站在门外，手里握着拔出鞘了的军刀，这时候就把军刀收回鞘里，躲让到一旁。法官们纷纷就位。陪审员们也依次走了出来。

首席陪审员非常郑重地拿着那张结论表。他走到庭长身边，送给他那表格。庭长看完表格，明显的非常惊讶，双肩耸着，就与另外两位法官商议。庭长觉得惊讶，由于陪审员提出了第一个保留条款：“并非故意抢劫”，却没有提出第二个保留条款：“并非蓄意杀人”。按照陪审员这个结论只能得到这个结论：玛丝洛娃既没偷盗，也没抢劫，却毫无原因地投毒杀了一个人。

“您看，他们的结论多么荒谬啊，”庭长对左边的法官说，“这样就要判处她服苦役，可她

却是无罪的。”

“嗯，她为什么是无罪呢？”那个严厉的法官道。

“她就是无罪。照我看，这种情况可以根据第八百一十八条。”（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法庭发现判决不妥，可否定陪审员的决定。）

“您看如何？”庭长问那个和气的法官。

和善的法官没有马上回答，却看一下桌面上那份公文的编号，算了一下那个数字是否能被三整除。他计算着，如果能整除，他就同意。结果这个数字不能整除，可由于他这人心地善良，还是对庭长的意见表示赞同。

“我想是应这么办。”他说。

“您的看法呢？”庭长转过身去，问满面怒容的法官。

“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很果断地答道。“报纸本来就已经议论纷纷，说陪审员们总是替罪犯开脱；如果法官也这样，那它们又会怎么说呢？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庭长看了看他的怀表。

“真可惜。不过有什么办法呢？”说完，他就将那张问题表交给首席陪审员，让他宣读一遍。

全体起立。首席陪审员清了清嗓子，将身体重心移到另一脚上站稳，把问题和答案念了一遍。法庭上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书记官、律师们以至副检察官在内，每个人都露出惊讶的神情。

被告们显然没有了解答案的意义，坐在那儿纹丝不动。大家又坐下来，庭长就询问副检察官，他认为应该依据什么条例对被告们处以惩罚。

这种对玛丝洛娃的处理使副检察官得到出乎意料的胜利。他心里十分兴奋，并把这胜利归功于他非凡的口才。他查了一下法典，起立说道：

“我认为对西蒙·卡尔津金的判处应依照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条跟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对叶夫菲米雅·博奇科娃的判处应依照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条，对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的判处应依照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

这些条款都是法律所能给予的最严厉的刑罚。

“暂停审理，法官讨论判决。”庭长一面说，一面站起来。

大家都同他一起站起来，怀着办完一件好事似的轻松心情陆续地走出法庭，或是在法庭中踱步。

“喂，老兄，我们做错了一件事，真丢脸。”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走到聂赫留朵夫身边说，这会儿首席陪审员正与聂赫留朵夫交谈。“我们这是送她去服苦役呀！”

“您说什么！”聂赫留朵夫喊起来，这时他完全忽略了这位教师随便的态度。

“难道不是吗？”他说。“我们在结论中没有说明：‘她有罪，可不是蓄意杀人。’”刚刚书记官跟我说：副检察官判处她十五年苦役刑。”

“我们难道不是这么作出结论的吗？”首席陪审员说。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争辩道，既然她没偷那钱，她当然也不会故意杀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刚才在从议事室离开之前我可是念了一遍结论的啊，”首席陪审员争辩说，“当时可没有人反对。”

“那时我恰巧不在议事厅，”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您怎么会注意不到呢？”

“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聂赫留朵夫说。

“您没想到不要紧，现在可好了。”

“这还可以纠正。”聂赫留朵夫说。

“哎，不行，现在已经晚了。”

聂赫留朵夫瞧着那些被告。他们，这些命运已被决定了的人，依然呆坐在栏杆和士兵之间，一动也不动。玛丝洛娃不知为什么在微笑。一种卑劣的感情在聂赫留朵夫的灵魂里游弋。这以前他原以为她会无罪开释，并在这个城里住下，他正犹豫不决，对于他而言，跟她保持任何关系都是困难的。因此正苦恼于今后应该如何对待她，可是现在，她得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这样他跟她保持任何关系的可能性就完全消除了：那没有打死的鸟不再在猎物袋里扑腾，也就不再使人想起它了。

二十四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推论不错。

庭长从议事厅回法庭，手里拿着公文，读起来：

“一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地方法庭刑事庭遵照皇帝陛下谕旨，根据各位陪审员先生结论，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七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第七百七十六条第三款和第七百七十七条作出如下判决：农民西蒙·卡尔津金，现年三十三岁，平民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年龄二十七岁，剥夺全部公权，放逐服苦役：卡尔津金服刑八年，玛丝洛娃服刑四年，并承担刑法第二十八条所列后果。

小市民叶夫菲米雅·博奇科娃，年龄四十三岁，剥夺其个人和按其社会地位所享有的一切公权及特权，处以三年徒刑，押送监狱执行，并承担刑法第四十九条所列后果。本案诉讼费用应由各被告平均负担，若被告无力负担，则由国库支付。本案各项物证变卖，戒指追回，酒瓶销毁。”

卡尔津金依旧挺直身子站立在那儿，两只胳膊紧贴着裤腿，手指头翘起，脸上的肌肉不停地蠕动。博奇科娃显得镇定自若。玛丝洛娃听到宣读之后，脸色涨得通红。

“我是无罪的，我没有罪！”她突然在法庭上大声喊起来。“冤枉啊！我没有罪！我从来没

有想过做坏事，连想都没有想过。我说的是真的，真的！”她说完一下子坐在长凳上，高声痛哭起来。

卡尔津金和博奇科娃走出法庭，但玛丝洛娃仍旧坐在那里大哭，结果宪兵只好去拉她的衣袖。

“不，不能够这样就算了。”聂赫留朵夫从刚才那种卑劣的感情中挣脱出来，自言自语。他不由自主地赶到过道里，想去再看她一眼。那些陪审员和律师挤在门口，他们说笑着，为案子办完了而感到高兴。聂赫留朵夫不得不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待他来到过道上时，玛丝洛娃早已走远了，他飞快地追过去，顾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直到赶上她方才停住。她已经不再号哭，只是不停地抽噎着，用头巾角儿擦着她那红一块白一块的脸。她头也不回地走过他的身边。直到她过去了，聂赫留朵夫赶忙转身往回走，想要找庭长，可是庭长已经离开了。

聂赫留朵夫一直追到法院看门人的房间里才赶上他。

“庭长先生，”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说，那时候庭长已经穿上薄大衣，正从看门人手中接过他那根银顶手杖，“我能同您谈一谈刚才判决的那个案子吗？我是陪审员。”

“哦，当然可以，您就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吧？真高兴见到您，我们以前见过面。”庭长说着，跟聂赫留朵夫握手，愉快地回忆起跟聂赫留朵夫相逢的那个晚会，当时他舞跳得那么漂亮，那么欢快，使其他的青年人都为之逊色。“有什么事要我为您效劳吗？”

“关于玛丝洛娃那个结论有个误会。她没有犯投毒杀人罪，法庭却竟判了她苦役刑。”聂赫留朵夫紧锁着眉头说。

“法庭是按照你们得出的结论判决的，”庭长一边说，一边走向大门口，“虽然法庭也觉得你们的结论与案情不符。”

庭长这时才记起来，他原想跟陪审员们强调，既然他们结论是：“不错，她犯了罪，”而对蓄意杀人没有否定，那就意味着对蓄意杀人的肯定。但他当时为了尽快把这个案子办完，竟没有说明这一点。

“是这么回事，可是难道不能纠正错误了吗？”

“要上诉总是能够可以找到理由的。这事得跟律师去讨论。”庭长说，将帽子有些歪地戴在头上，朝门口走去。

“这可真是太糟糕了。”

“没错，您要知道，玛丝洛娃的前途原本无外乎有两种选择。”庭长显然想尽量讨聂赫留朵夫的欢心，对他谦恭些。他把络腮胡子理到大衣领子外面，伸手温柔地挽着聂赫留朵夫的胳膊肘，往门口走去，并问道：“您一定也要走吧？”

“是的。”聂赫留朵夫回答着，匆忙地穿上大衣，跟他一起走出去。

走在令人愉悦的灿烂阳光下，他们不得不大声说话，这样才能盖住车轮辗过马路时所发出的辘辘响声。

“您知道，这个局面，是有些奇怪的，”庭长提高了音量，继续说，“本来这个玛丝洛娃的前途不外乎两种：或者是无罪开释，仅须坐一阵子牢，而且还可以从她先前监禁的日子中扣除，甚至只须短期拘留一下；或者就是去做苦工。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如果你们补加一句：‘但是没有致人死命的意图’，她就会被无罪开释了。”

“我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可真该死。”聂赫留朵夫说。

“不错啊，这才是关键。”庭长边笑边瞟了一眼表。

这时距克拉拉约定的时间只剩四十五分钟了。

“您如果愿意，现在去找律师还是可以的。必须要找个上诉的理由。要找肯定是能找到的。去贵族路，”他对马车夫说，“三十戈比，多一个戈比也不给。”

“好的，老爷，请您上车。”

“再见，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请光临贵族路德伏尔尼科夫家。这地名容易记。”

他亲切地一鞠躬，坐上马车走了。

二十五

聂赫留朵夫通过同庭长交谈，又呼吸了新鲜的空气，心情这才稍稍安定了些。这时候他暗想，他所感受的那种难受的心境，仅仅是因为在极不习惯的氛围下呆了整整一个上午罢了。

“这事真是一点儿也没料到，太可怕了！无论如何要想出办法来减轻她的苦难，而且必须赶快着手，马上就着手。不错，我必须在这里问一下，阿纳托思或者米基兴住在哪里。”他想到了两位名律师。

聂赫留朵夫转身返回法院，脱掉大衣，走到楼上。他在第一条过道里就碰到了阿纳托思。

他拦住阿纳托思，说有事要跟他商量。阿纳托思认识他，也知道他的姓名，就表示将尽其所能为他效力。

“虽然我已经累了……但是如果不须占用太多时间，您就把您的事给我讲一讲吧。我们到这边来。”

聂赫留朵夫跟着阿纳托思走进一个房间，那多半是某个法官的办公室。他们在一张桌旁坐下。

“那么，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

“首先我对您有个请求，”聂赫留朵夫说，“别让任何人得知我在参与这个案子。”

“噢，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

“我今天当了一次陪审员，我们让一个女人，一个无罪的女人被判处服苦役。这件事令我非常过意不去。”

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没料到，竟然脸红耳赤，无法说下去了。

阿纳托思看了看他，又低下头听着。

“噢。”他只回答了一下。

“我们错判了一个没罪的女人。我希望撤销原判，将这个案子转交给最高法院。”

“转交枢密院。”阿纳托思纠正他说。

“这就是我想求您承办的事。”

聂赫留朵夫想尽快地将最难出口的话说完，因此他毫不停顿地继续往下说：

“至于这个案子的酬劳费和所有开支，一律由我承担，不论多少。”他说着，脸红了。

“哦，这一点我们以后再商量好了。”律师看到聂赫留朵夫在这方面毫无经验，就宽厚地笑着说。

“那么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聂赫留朵夫从头至尾讲述了一遍经过。

“好吧，我明天就来办这件事，要对案情进行一下研究。后天，不，星期四晚上六点钟您来我家里，我来答复您。怎么样？那我们走吧，我还有点事，要在这里留一会儿。”

聂赫留朵夫跟他告别，走了出去。

他与律师交谈了，又想了办法为玛丝洛娃辩护，感到心里安宁了些。他走出了法院。天气很好，他舒畅地呼吸了一下春天的空气。马车夫纷纷朝他兜揽生意，可是他宁可步行。关于卡秋莎以及他对她所做事情的种种想法和回忆，立刻在他的头脑中开始翻腾。他又变得闷闷不乐，心情沮丧了。“不行，以后再想这些吧，”他对自己说，“现在我从这些烦恼中解脱出来，去散散心。”

他想起科尔卡金家的宴会，就看了看怀表。赶宴会还来得及。恰巧一辆公共马车响着铃铛朝他驶来。他赶紧跑了几步，跳上车去。他在广场下了车，转雇了一辆漂亮的街头马车。十分钟以后，他就到了科尔卡金家的大门口了。

二十六

“老爷，请进，他们在等您，”科尔卡金家那个肥胖的看门人亲热地说，拉开装有英国制的铰链的橡木大门，大门无声地开了。

“他们已经先入席了，但嘱咐过，您一到就请进。”

门房走到楼梯口，拉一下与楼上相通的铃。

“有客人吗？”聂赫留朵夫边脱衣服，边问。

“有科洛索夫先生和米哈伊尔公子，其他都是自家人。”门房答到。

楼梯上边，站着一个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的漂亮的听差，他朝下看了看。

“老爷，请上来，”他说。“主人吩咐过，您随到随进。”

聂赫留朵夫走上楼梯，穿过他所熟悉的一个宽敞华丽的大厅，来到饭厅。在饭厅里，除了那位从不走出她的卧房的母亲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外，全家人都已经围坐在饭桌边。

饭桌主座是科尔卡金老头，他的左手边是医生，右手边是客人科洛索夫，科洛索夫曾做过省首席贵族，现在是银行股东，是科尔卡金一位具有自由派思想的朋友；左边接下来是米西的妹妹的家庭教师蓝德小姐，再接下来是她那才四岁的小妹；与她们相对的，右边接着的是米西的弟弟，科尔卡金唯一的儿子，六年级中学生彼嘉，全家人就是因为他考试未结束没有离开这里；彼嘉身旁是一个做他的补习教师的大学生；左边接着的是斯拉夫信徒、四十岁的老姑娘卡吉琳娜；与她相对的是米哈伊尔，也叫做米沙，他是米西的表兄。饭桌下首是米西自己，她身旁放着一份没用过的餐具。

“哦，就坐在这里罢。请坐，我们刚开始吃鱼，”

老科尔卡金抬起看不见眼皮的布满血丝的眼睛瞧着聂赫留朵夫，他正小心地用假牙咀嚼，费力地说着，“斯捷帕。”他又扭过脸去叫那个壮实而庄重的饭厅仆役，因为他嘴里塞满了食物，所以只用眼睛指了指那份空着没有人用的餐具。

虽然聂赫留朵夫同老科尔卡金已经很熟，他们一起吃过很多次饭，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今天特别看不顺眼老科尔卡金那通红的脸，那发出吧唧吧唧声的厚嘴唇，那粗壮的脖子，特别是他那挺着将军肚的外形。

聂赫留朵夫禁不住想起这个老头的暴行。他在作地区长官时，经常毫无道理地鞭笞人，甚至绞死人，其实他有财有势，根本没有必要依靠这种办法去邀功请赏。

“立刻就来。老爷。”斯捷帕说，边从摆满银餐具的酒柜里拿出一个大汤勺，又朝那个蓄边鬓胡子的英俊侍仆点头示意。那个仆人就摆正米西旁边那套没有用过的餐具。那套餐具上原先盖着一块绣着家徽的整齐地折好的餐巾。

聂赫留朵夫围着整个饭桌走了一圈，与所有的人握手寒暄。他走过去的时候，除了老科尔卡金和女士们以外，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他以前同其中的大多数人从不曾交谈过一句话，今天却绕着饭桌兜了一个圈子，同他们一一握手，这种事今天在他看来显得特别无聊和滑稽可笑。他为自己的迟到道了歉，正想在饭桌尽头米西和卡吉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之间的空位子上坐下，可是老科尔卡金坚持说他即使不来一点白酒，也应该先到另一张桌子那边吃一点冷荤菜，那儿摆有龙虾、鱼子酱、干酪和咸青鱼。聂赫留朵夫也没有料到自己竟会那么饿，等到他一开始吃夹干酪的面包时，就止不住嘴，狼吞虎咽了起来。

“哦，怎么样，你们彻底颠倒是非了吧？”科洛索夫引用反动报纸上抨击陪审制度的一句话讥讽地说。“你们把有罪的判成了无罪，把无罪的判成了有罪，对不对？”

“完全颠倒是非……完全颠倒了是非……”老公爵说，他对这位自由派同事朋友的博学多才具有充分信任。

聂赫留朵夫顾不得是否失礼，没有理会科洛索夫，坐到一盘刚放在桌上的冒着热气的汤旁边，继续吃着。

“您让他先吃吧。”米西微笑着说，以“他”这个称呼显示她和他的密切的关系。

这时科洛索夫心情激动，高声谈起那篇引起他怒气的抨击陪审制的文章。公爵的外甥米哈伊尔与他的看法一致，讲述了那家报纸上的另一篇文章的内容。

米西与平时一样打扮得非常雅致，她衣着讲究，但穿着并不刺眼。

“您肯定累坏了，也饿坏了，”她等聂赫留朵夫嚼完，就说。

“不，并不特别累，特别饿。您呢？去看画展了吗？”他问。

“没有，我们改天再去。我们在萨拉玛托夫家里打 lawntennis 来着。确实，克鲁克斯先生打得非常出色。”

聂赫留朵夫原是为了散一散心才到这儿来的。他在这个家庭里一向颇感愉悦，这不仅是因为这儿的豪华优美的气氛令他心情快乐，而且也因为无形之中这儿总有一种阿谀的亲热气氛围绕着他。不过今天，聂赫留朵夫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厌恶这所房子里的一切，包括看门人、宽楼梯、花卉、听差们、桌上的摆设，甚至米西本人。

他想到米西今天一点儿也不可爱，装模作样，非常做作。他对科洛索夫那种狂妄的自由派论调非常厌恶，厌恶科尔卡金老头那种公牛般身材，厌恶斯拉夫派信徒卡吉·琳娜张口闭口的法国话，厌恶女家庭教师跟补习教师那畏首畏尾的样子，特别厌恶米西用代词“他”来称呼他……聂赫留朵夫对米西的感情常常变化：有时他好像微张着眼睛或者在月光下面看着她，看到了她所具备的所有的优点，他觉得她非常的娇嫩，漂亮，伶俐，而且大方……有时他好像在阳光的照射下瞧她，看到她所有的各种缺点。今天对于他就是这种情况。今天他看见她脸上所有的皱纹，看见她头发散乱，看到了她丑陋的臂肘尖，特别是看见她大拇指上宽大的指甲几乎与她父亲的手指甲完全相同。

“那东西没劲，”科洛索夫讲起网球时道，“我们小时候玩的棒球才有意思呢。”

“不，那种乐趣你没实际体验过。那种球好玩透了。”米西反驳说。聂赫留朵夫却觉得她说那个“透”时特别不自然。

于是一场争论开始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卡吉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也参加了进来。只有家庭女教师、补习教师和孩子们沉默不语，他们分明觉得没有意思。

“总是吵嘴！”老科尔卡金大笑着说，取下掖在背心里的餐巾，从饭桌旁站起来，哗啦一声把他的椅子往后一撤，一个听差立刻接过椅子。其他的人也都跟着他站起来，往一张放着些盛满香喷喷的温水的漱口盅的小桌子那边走过去。他们漱过口，继续谈那些大家都认为乏味的话。

“您认为是这样吗？”米西转过头跟聂赫留朵夫说，想要他赞同她的意见，她想，人的脾性只有在运动中才暴露得最为清楚。但她却从他脸上看出他心事重重甚至——她觉得——愤愤不平的神情。她感到害怕，很想明白那是为什么。

“坦白的说，我不知道，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聂赫留朵夫答到。

“您想看看妈妈，对吗？”米西问。

“好，好。”他边说，边拿出香烟，可他的语气明显表示出他不愿意去。

她不说话了，困惑地看看他。他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对啊，既然来看他们，不要让人家扫兴啊。”他心里想，就努力装作亲切的模样道，如果公爵夫人乐意接见，他非常高兴去的。

“当然了，妈妈见到您会很高兴的。在那儿您也可以抽烟。伊万·伊万诺维奇也在那儿。”

这个家庭的女主人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长年卧病在床。她躺着见客已经有八年了，她身上穿着花边和缎条，她周围满是天鹅绒、银金的摆设、象牙器皿、青铜器、漆器和各种花卉。她也从来不乘车出门，只接见一切依她看来在某一方面超群出众的人，即她所谓的“自己的朋友”。聂赫留朵夫也属于她的“自己的朋友”之列，因为她认为他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母亲原本又是这家人的亲密的朋友，如果他能和米西结婚，那就更好不过了。

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的房间在大客厅和小客厅的后面。米西原本在聂赫留朵夫前边走的，等进到大客厅后，却突然用手扶住一把涂金的小椅子的椅背站住了，瞅着他。

米西很想出嫁，而聂赫留朵夫就是一个好的人选。另外，她喜欢他，有一种想法已在

她头 脑中形成并固定了：他是属于她的(不是她属于他，而是他属于她)。为达到她的目的，她就 经常采用精神病患者用的那种无意识的然而固执的狡猾手法。现在她跟他谈话，就是为了要 他透露出他的心事。

“我看得出您发生了什么事了，”米西说，“您没事吧？”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在法庭上与卡秋莎的相见，就锁起眉头，涨红了脸。

“不错，发生了点儿事，”他说，想老实地说出今天发生的事，“一件奇怪的、非同寻常的 重要的事。”

“什么事啊？您是否能告诉我呢？”

“现在不行，请您不要问我。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思考。”聂赫留朵夫说着，脸变 得更红了。

“您都不肯讲吗？”她的脸颊跳动了一下，挪了一下手中的椅子。

“不，不行！”他答道，感到这样回答她，相当于在回答自己，承认的确发生了一件非同一般的事。

“哦，既然这样我们走吧。”

她摇了摇头，似乎是要甩掉那些不必要的思虑，然后以比往日更快的速度往前走去。

他觉得她好像为了忍住眼泪不自然地抿紧了嘴唇。看到他自己惹得不高兴，他不禁又羞愧 又难过，但是他很清楚，如果他略微表现一点软弱，他自己就会毁掉自己，这就是说，他自 己就会跟她联系在一起，无法拆开了。可是今天，他最害怕的是这一点，于是他跟她一起 走到公爵夫人的私室里时沉默不语。

二十七

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已经吃完她那顿极讲究、极滋补的饭。她老是独自一个人吃 饭，为的是不让外人看见她做这件缺乏诗意的事时的模样。

她的床旁边放一张茶几，上面放了咖啡。她在抽烟。

索菲娅公爵夫人细长身材，黑头发，长长的牙齿，大大的黑眼睛。她一直努力打扮得非常年 轻。

有关她跟医生的事，有很多流言蜚语。聂赫留朵夫从前没有想过这些，可今天他不但想到了 这些，而且看到那个长着闪着油光分成两半的大胡子的医生坐在她身旁的软椅上，他觉得有 说不出的恶心。

科洛索夫坐在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身旁的矮沙发上，他在搅动桌上的咖啡。小桌上放着一 杯甜酒。

米西和聂赫留朵夫一起走进她母亲的房间里，但她并不留在房内。

“等到妈妈累了，赶你们走，你们就来找我好了。”她说，从她的口气根本听不出她跟聂赫 留朵夫之间闹过什么别扭。她转过身来对着科洛索夫和聂赫留朵夫快活地笑了笑，踩着厚地 毯安静地离开了房间。

“哦，您好，我的朋友，请坐，来跟我们谈谈，”索菲娅公爵夫人道，脸上堆满一种几乎 分辨不出的假笑，露出满嘴跟真牙完全相同的精致漂亮的长长的假牙。“听说您出了法院后，心情非常不好。我明白，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做这样的事是非常痛苦的。”她用法语说。

“不错，这话完全正确，”聂赫留朵夫说，“你会常常觉得你没有……你没有资格去审

判……”

“这话说得真是对极了！”她好像由于他的话正确而非常感动，实际上她从来就是这么巧妙地对与她谈话的人谄媚的。

“那么，您那幅画怎么样了？我非常喜欢它，”她又说。“如果我身体好，我早就去府上欣赏欣赏了。”

“我根本没顾上它！”聂赫留朵夫勉强答到，今天他觉得她的假意逢迎像她要掩饰她的老态似的让人一看便知。他却无论如何也装不出和气的样子。

“这可不行！说实话，列宾亲口告诉过我，他非常有才华。”她与科洛索夫说。

“她这么说谎，怎么脸都不红一下？”聂赫留朵夫的眉头皱起来了，他暗自想道。

等到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终于相信聂赫留朵夫心绪恶劣，无法让他愉快隽永地谈话时，她就转过脸去看科洛索夫，询问他对一出新上演的戏的看法，那种语气好像科洛索夫的意见肯定会解决所有的疑问，他的意见每一个字也肯定会隽永不朽似的。科洛索夫将这出戏批评了一通，还借机发表了他对艺术的看法。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很惊讶于他的见解的正确，又想竭力为这个剧本的作者辩护几句，不过她马上又让了步，或是寻求中庸的说法了。聂赫留朵夫在一旁看着，听着，但是他所见和所听的却与他面前的情况根本不是一回事。

聂赫留朵夫一会儿听听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讲话，一会儿听听科洛索夫讲话，最后他发现：

首先，无论是索菲娅公爵夫人还是科洛索夫全都对戏剧没有丝毫兴趣，他们之所以要交谈，不过是想在饭后让舌头和喉头肌肉活动一下；另外，科洛索夫喝了伏特加、葡萄酒跟甜酒之后，有点醉了，但与很少喝酒的农民那样烂醉如泥不同，他是像嗜酒成癖的人似的微醺。他走路来并不摇晃，嘴里也不说胡话，只是有些情绪反常，洋洋得意，非常兴奋；第三，聂赫留朵夫注意到，索菲娅公爵夫人在交谈时一直心神不宁地看着窗子，因为有一缕阳光斜射进窗口，这样就可能把她的老态暴露得太明显了。

“这话一点儿也不错。”她针对科洛索夫的一句评论说，然后按一下床头的电铃。

这时医生站起身来，没说一句话就走了出去，跟这个家里的人似的。索菲娅公爵夫人说着话把他目送出去。

“菲立普，麻烦您放下那个窗帘。”那个漂亮的听差听到她的铃声一走进来，她就拿眼瞟了瞟窗上的帘子说。

“不，不管您怎么说，某些地方还是具有神秘主义，如果没有神秘主义的东西也就不成为诗了。”她一边说，一边斜睨着一只黑眼睛，生气地瞅着那个放下窗帘的听差。

“没有诗，神秘主义就成了迷信；而没有神秘主义，诗就成了散文。”她悲戚地微笑着说，眼睛一刻也不放松往上拉窗帘的听差。

“菲立普，您不该放下这个窗帘，要放的是大窗户的窗帘。”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生气地说，她显然很心疼自己，因为交代这些话不得不费那么多气力。为了安慰自己，她立刻抬起那戴满宝石戒指的手，把那根正冒烟的香味扑鼻的纸烟送到嘴边。

美男子菲立普胸脯宽阔、筋强力壮，一言不发，他赔礼似地微微一鞠躬，迈开他那健壮有力、腿肚发达的两条腿在地毯上轻轻地走动，温顺地走到另一个窗口，小心地看着公爵夫人，不让一丝阳光照到她的身上，动手拉窗帘。可惜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法做得很到位，

于是苦恼不已的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又不得不停止她被关于神秘主义的谈话来纠正那个反应不灵敏、残酷地折磨她的菲立普。一时间菲立普的眼睛里有个火星闪了一下。

“‘鬼才知道你想怎么样。’他心里大概在这么说。”聂赫留朵夫在一旁观看这整幕戏，心想。不过，菲立普，这个美男子和大力士，立刻收起他的不耐烦的心情，沉住了气，又开始拉窗帘，完完全全依照疲惫不堪的、虚弱无力的、矫揉造作的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吩咐他的话去做。

“达尔文学说当然有些道理，”科洛索夫说，摊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矮沙发上，同时睁着惺忪的醉睡眠看着索菲娅公爵夫人，“但他有些过分。不错。”

“那么您对遗传怎么看？”索菲娅公爵夫人向聂赫留朵夫问道，对他的沉默感到奇怪。

“遗传？”聂赫留朵夫反问道。“不，不信。”他这么心不在焉的说着，头脑里却莫名其妙的充满了许多古怪的形象。他头脑里浮现出大力士和美男子菲立普赤裸着身体，身边则是赤身裸体的科洛索夫，肚子圆得跟西瓜似的，脑袋光秃，两条干巴的胳膊像两根枯藤似的。他还模模糊糊地想象着索菲娅公爵夫人在绸缎同丝绒之下的肩膀实际上是什么样子，不过这种想法太可怕了，他连忙将它驱逐出脑海。

索菲娅公爵夫人却拿眼睛从上到下打量着他。

“哦，米西在等您去呢。”她说。“您去她那儿吧，她想给您弹舒曼的一个新曲子……那是一支很有意思的曲子。”

“她压根儿就不想弹什么曲子，不知为何她总这样撒谎。”聂赫留朵夫暗想。他站起来，握了握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那枯瘦的、戴满戒指的手。

在客厅里他迎面碰上了卡吉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她立刻与他攀谈起来。

“说真的，我能看出来陪审员的职务使您万分苦恼。”她照例用法语说。

“是的，请您谅解我，我今天心情不佳，而我没有权利使别人扫兴。”聂赫留朵夫说。

“您为什么心情不佳呢？”

“请您原谅我不愿谈为什么。”他一面说，一面找他的帽子。

“您应该还记得，您以前说过，人应当永远说实话，并且您当时就对我们大家讲了很多很可怕的实话。可是为什么您现在就不愿意谈了呢？你记得吧，米西？”卡吉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扭过脸去对正朝他们走过来的米西说。

“因为当时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聂赫留朵夫严肃地回答。“开个玩笑是没关系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糟透了。

我是说，我是糟透了，至少我没办法把实话说出来。”

“您没必要改口，最好还是说一下，我们哪里糟糕了。”卡吉琳娜说。她抓住聂赫留朵夫的语病，似乎对他的严肃的神情没注意到。

“再没有比承认自己心情坏更糟的事了，”米西说。“我就从未承认过，因此心情总是不错。走，去我那儿吧。让我们来尽力把你的坏情绪驱走。”

聂赫留朵夫感到他就像一匹被人哄着而将被套上笼头、去拉车子的马。今天他非常反感拉车。他道歉说他得回家去，就向大家告辞。米西比平时更长久地握住他的手。

“您要记着，只要是对您重要的事，对您的朋友有相同的重要性。”她说。“您明天来吗？”

“大概不来。”聂赫留朵夫说着觉得不好意思，但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为自己不好意思还是为她不好意思。他的脸变红了，匆匆的离开了。

“这到底是怎么了？我可非常有兴趣呢，”聂赫留朵夫刚走，卡吉琳娜就说。“我非得要弄清楚。准是一件有关体面的事，我们的米哈伊尔在耍脾气呢。”

“恐怕是件不体面的桃色事情吧。”米西本想这么说，但是没有说出来，她傻傻地瞪着前方，那郁闷的神情跟刚才看他的温和态度完全不同。可是，即便是对卡吉琳娜，她也没有说出这句酸溜溜的俏皮话，而不过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快活的日子，也有不快活的日子。”

“难道连他也要欺骗我？”她暗想。“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这样做就太不应该了。”

倘若一定要米西解释一下她所谓的“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到底指什么，她也无法说出一个所以然来。然而她又毫不怀疑地知道，他不但勾起了她心中的希望，而且几乎已经向她允许了。这并不是说他许过什么明确的诺言，而是说他作的那些眼神、微笑、暗示和沉默。她一直认为他是属于她的，如果失掉了他，对她而言，真是太难受了。

二十八

“既可耻又可恶，既可恶又可耻。”聂赫留朵夫经过熟悉的街道走回家，一路上不停地想着。刚才他跟米西交谈时的郁闷的情绪到现在还没有改变。他从外表上看——如果能够这么说的话，——他没有对不起她什么：他从未对她许下过什么承诺，也没有对她求过婚，可他觉得事实上他已经同她联系在一起，已经答允她了。

可是今天他却深切地感到他无法与她结婚。“可耻又丑恶，丑恶又可耻。”他不断地对自己重复这一句，这并不是单指他跟米西的关系，而是针对一切事情。“一切都丑恶而又可耻，”他走到自家的门廊上，暗自又重复了一遍。

“我不吃晚饭了。”他对跟着他走进饭厅里来的听差柯尔涅伊说，饭厅里已经准备好了餐具和茶。“您走吧。”

“是。”柯尔涅伊说着，可是并没有离去，动手收拾饭桌上的东西。

聂赫留朵夫看了看柯尔涅伊，觉得很厌恶他，他希望谁都别再来打扰他，让他静一会儿，但大家却好像都故意与他作对似的，偏偏缠住他不放。等柯尔涅伊拿着餐具走开，聂赫留朵夫刚要去茶炊旁边倒茶，忽然听到阿格拉斐娜的脚步声。他匆忙走进客厅，顺手把门关上，避免跟她见面。这个做客厅的屋子就是他母亲三个月前去世的地方。这时，他走进这个光线很好的屋子，看见那两盏带了反光镜的灯，一盏正对着他父亲的画像，另一盏对着他母亲的画像，他禁不住想起了他与母亲最后一段时期的关系。他觉得这种关系是做作的，令人厌恶的。这也是既可耻又可恶。他想起，在她生病的后期他甚至盼望她早些死掉。他对自己说，他这是希望她尽早从痛苦中解脱，实际上是希望自己尽早从她那里摆脱出来，以免面对她那副痛苦的模样。

他一心想唤起自己关于她美好的记忆，就看了看她的画像，那是用五千卢布由一位名画师所作。

画中的她身穿黑色天鹅绒连衣裙，胸脯袒露着。很显然，画家特意用心描绘两个乳房中间的肌肤和美丽迷人的肩膀和脖子。这分明是十分可耻而又丑恶。把他的母亲画成一个半裸的美人，这件事本身就具有一种可憎的、亵渎的味道。而三个月以前的情形使这件事尤为可憎，那时，他的母亲就躺在这个房间里，枯瘦干瘪得如同一具木乃伊，而这具木乃伊使得整个房间里，而且使得整所房子里都充溢着一股浓重难闻的气味，这种气味至今还无法消除。他现在似乎依然能闻到那种气味。接着他又想起她临终前的那一天，伸出一只露出关节的、颜色发黑的手来，抓住他的强壮有力的白手，望着他的眼睛说：“米佳，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你不要责怪我。”泪水涌上了她那双因痛苦而黯淡无光的眼睛。现在他瞅着那个半裸体的女人，以及漂亮的、大理石般的肩膀和胳膊、得意洋洋的笑容，就又对他自己说了一句“多么丑恶”。这个画像上袒露的胸脯使他想起另一个年轻女人，那个女人就是米西。前几天他看见她也是这样袒露着胸脯。有一天傍晚她找了一个借口，要他到她的房间里，去看她出外参加舞会时穿上舞衫的模样。他带着厌恶的心情想到她那美丽的肩膀和胳膊，也想起她那个粗鲁的、野兽般的父亲和他的往事和残忍的行为，还有她那个名声可疑的自作聪明的母亲。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可憎的，同时也是可耻的。简直可耻而又丑恶，丑恶而又可耻。

“不能这样，不行，一定要摆脱……一定要摆脱跟科尔卡金一家人同玛丽亚的虚伪关系，放弃遗产，放弃所有不合理的事情……对，要毫无拘束地生活。出国，去罗马，去学绘画……”他想起他不能肯定自己具备这种才华。“哦，那也不要紧，毫无束缚地生活就可以。先去君士坦丁堡，再去罗马，但必须要快些辞去陪审员职务，还要跟律师商量好这个案子。”

于是忽然间，那个女犯人的影子以及那对斜睨的黑眼睛异常逼真地浮现在他的头脑里。在被告们提出最后供词的时候，她那么伤心地哭，哭得那么厉害啊！他匆匆地在烟灰缸里揉搓了一下吸完的纸烟，将烟头捻灭，另外又点上一支，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于是他同她一起经历过的那些场面就开始一幕一幕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起他跟她最后一次的相逢，想起当时支配着他的疯魔的欲望，想起欲望得以满足之后他所感到的惆怅与失落。他想起她那件白色的连衣裙和天蓝色的腰带，想起那次晨祷。“没错，那天晚上我爱她，我确实怀着美好而纯洁的爱情真心实意地去爱她，而且在那之前我就已经爱她了，我第一次住在姑姑们家里，写我的论文的时候，我就已经深深地爱着她了！”接着他又回忆起当年他自己的模样。

他整个人朝气蓬勃，洋溢青春的活力。想到这些他现在觉得非常伤心。

那时的他与现在的他，根本完全不同。这种差别，与教堂里的卡秋莎和那个陪商人酗酒而今天上午受审的妓女之间的差别相比，只有更大而不会更小。当年他朝气蓬勃，无拘无束，前途一片光明，现在他却感觉到自己陷入粗俗、空虚、苟安、平庸的生活陷阱中，看不到丁点儿出路，甚至没想过要摆脱这种束缚。他想起那时他以性格坦率而骄傲，发誓要永远不说谎，并且严格遵守这个原则，可现在他完全陷入虚伪狡诈的泥潭中，陷入那种被他周围全部人看作真理的虚伪至极的泥潭中。在这种虚伪泥潭中找不到任何出路，至少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找到任何出路。

于是他深陷于此，日子长了倒习以为常，觉得自在逍遥了。

应该如何解决他跟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关系，解决他跟她丈夫的关系，才能使他敢正眼看那个丈夫和他的孩子们而不感到羞惭呢？如何才能坦坦荡荡地结束他跟米西的关系呢？他一方面承认土地私有制不合理，一方面又因为继承母亲的财产而占有土地，这个矛盾该如何解决呢？如何才能在卡秋莎面前赎清自己的罪过呢？他不能对这件事袖手旁观。“我不能抛弃一个我爱过的女人，不能仅仅靠付给律师一笔钱，以便解除她原本就不应遭受的苦役。我也不能拿金钱来赎罪，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仅给她一笔钱还自以为做了一件份内的事。”

于是他又非常清楚地想起当时的情景：他从过道里赶上她，将钱塞在她手里，就离开了。“唉，那笔钱！”他想起当时的情景，心里也跟当时似的既恐惧又嫌恶。“唉，真是卑鄙！”他也同过去一样骂出口来。“只有痞子，流氓，才能干出这样的事！我……我就是痞子，就是流氓！”他高声道。“难道我当真是……”他停了停，“可我当真是流氓吗？我要不是流氓，那还有谁呢？”他自言自语。“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吗？”他继续对自己批判。“难道你跟玛丽亚的私情，跟她丈夫的关系就高尚、光彩吗？另外你对财产的态度呢？你以是你母亲遗留下来的钱作借口，就享受着你自己的也认为不是合理的财产。你的生活根本就是无所事事、卑鄙下流的。而你对卡秋莎的所作所为可说是罪大恶极。无赖，流氓！人家想怎么议论我就怎么议论我罢了，我能够欺骗他们，可是我却不能够欺骗我自己。”

猛然间，他茅塞大开，原来在最近这段时期他对人们所产生的憎恶心理，特别是今天对公爵、对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对米西、对柯尔涅伊所产生的憎恶，实际上只是对他自己的憎恶。说来奇怪，这种剖析自我承认自己卑鄙的心情，虽然使人痛苦难受，却也使人快乐欣慰。

聂赫留朵夫生平已经多次进行过“灵魂的扫除”。他所指的“灵魂的扫除”，是指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通常经过一段时期后，他忽然感到自己的内心生活疲倦了，有时甚至停顿了，就开始动手把淤积在他灵魂里的造成他思想停顿的垃圾统统清除出去。

在这样的觉醒以后，聂赫留朵夫总要给他自己定出一些打算从此以后永远遵守的规则来，例如写日记，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并希望这种生活能坚持下去，也就是如他告诉自己的一样：turning a new leaf。可惜每一回，他总是被人世的诱惑所降伏，不知不觉中他又堕落了，而且往往比以前堕落得更厉害。

他这样清理灵魂，自我反省，已经有多次了。那年夏季他去姑妈家里，是第一次这样做。那次觉醒令他充满生气、精神奋发，而且保持了很长时间。后来，在战争期间，他辞掉文职，加入军队，决心以身报国，也进行过一次这样的反省。但不长时间灵魂中又积满了灰垢。后来还有过一次反省，那是他主动退役，出国学画的时候。

从那时候到今天，他很长时间没有打扫过灵魂了，所以他现在精神上无比的肮脏，与他良心上要求过的生活完全相反。他意识到了这个矛盾，禁不住心寒。

这个差距是如此之大，积尘是如此的多的，以致他开始对净化失去了信心。“你难道不曾试图修身，希望能成为个高尚的人，却一事无成吗？”魔鬼在他心中说，“那又有什么必要再试呢？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魔鬼这样说。可是，那个独立的精神方面已经在聂赫留朵夫心中苏醒了，他是真实、强大并且永恒的。聂赫留朵夫只能信任他。无论他过去所过的生活与他的理想之间相差有多大，

对一个精神觉醒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

“我不管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要冲破这种束缚我的追求的虚伪的罗网。我要承认这一切，对所有的人说实话，做实事，”他很坚定地对自己大声说。“我要对米西说实话，告诉她我是一个极其放荡的人，配不上她，不能与她结婚，我仅仅是无端地打搅了她。我要对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首席贵族的妻子)说实话。不过，我对她已无话可说了。我要告诉她的丈夫我是个坏蛋，欺骗了他。我也要处理得合乎道理。我要对她，对卡秋莎说，我是个坏蛋，我对她有罪，我要尽我所能来减轻她的厄运。对，我应该去见她，请求她的宽恕。对，我将像小孩子那样向她讨饶，”他收住脚，站定，“必要时我就跟她结婚。”

他定定地站在那儿，像儿时那样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仰望苍穹，对上帝祈祷：

“仁慈的主啊，求你帮助我，引导我，住在我心里，帮我清除心中的一切污垢吧！”

他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到他的心里来住下，清除他心中的一切污垢，这样他所要求的那些事就可以实现了。因为他灵魂里的上帝，已经在他的意识中苏醒过来。他感到了上帝的存在，所以他不仅感到自由、勇气、生活的乐趣，而且感到了善的所有力量。此刻他认为只要是人所能做到的好事，一切最好的事，他自己都能够做到。

他在与自己说这些话时，眼睛里含满了泪水，既有美德引起的泪水，又有丑恶引起的泪水。美德引起的泪水是因为这些年来在他的心中一直沉睡的精神方面终于醒来了；丑陋引起的泪水是由于他的自怨自艾，自诩有什么美德。

他觉得浑身发热。他走到窗边，把窗子打开。窗子通往花园。这是一个空气新鲜且无风的月夜，街上响起一阵马车的车轮声，接着是一片宁静。窗外长着一棵高高的杨树，那光秃的交叉的树枝，影子被清楚地投在干净的旷地上。左边是仓房。它的房顶，被明亮的月光照得白花花的。前面是一片交错在一起的树枝，在树枝的掩映下可以看到一堵黑乎乎的矮墙。聂赫留朵夫看着月光之下的花园和屋顶，望着杨树的阴影，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多好啊！多好啊，哦，我的上帝，多么好啊！”他欢呼雀跃，为自己灵魂的觉醒而高兴。

二十九

一直到傍晚六点钟玛丝洛娃才回到她的牢房里。她已经不习惯于走远路，如今却在石子路上步行了十五俄里，感到浑身酸软无力，脚也疼痛不已；再者，那个出人意料的严厉的判决弄得她垂头丧气，况且她的肚子也咕咕地叫了。

在第一次审讯暂停时，法警们在她身边大嚼面包和煮鸡蛋，当时她嘴里就涌口水上来。她觉得饥饿，但要她去向他们讨一些来吃，又感到没面子。这之后又等了三小时，她已不再想吃东西，只是感到浑身无力。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出乎意料的判决。起初时，她以为是她自己没听清，不能相信所听到的，不能将苦役犯这种词儿跟自己联系在一起。不过，当她看到法官同陪审员脸上都那么严肃，毫无感情，判决时都若无其事时，觉得非常气愤，就朝整个法庭高声喊冤。而当她看到那些人对她的冤屈也不当一回事，自己又难以改变局面时，她就哭起来，觉得不得不顺受那个强加到她身上的天大冤屈。特别令她觉得惊讶的是，这么残酷地给她判刑的居然是那些一直亲切地对她打量的中年和年轻男人。

她看得出来，只有一个人，也就是副检察官，心境与别人完全不一样。起初她坐在犯人室里，等候开审的时候，以及后来在审讯暂停的时候，她看见那些男人为了仔细地看她一眼，怎样装做是为了办别的事而在她的门口来来回回，甚至干脆走进她的房间里来。谁知一转眼，尽管她没有犯那些控诉她的罪，那些男人竟无缘无故地判了她苦役刑。刚开始她悲恸地哭了，不过后来她停止了哭泣，她的精神已经完全麻木，只是坐在犯人室里，等着

被押回狱。此刻她只期望能做一件事：吸一支烟。当博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在被宣判以后押到这个房间里来时，正碰上她处于这种状态。博奇科娃一见到玛丝洛娃就大声辱骂，叫她苦役犯。

“怎么样，你打赢官司啦？你没罪啦？”

这次怕无法逃脱吧，贱人！你这是自食其果。去服苦役，看你怎么卖俏？”

玛丝洛娃把双手插在囚袍袖口中，坐在那儿，垂着头，木木地看着前面两米外那块踩得很脏的地板，嘴里只顾喃喃着：

“我没犯着您，您也不要来惹我。我可没犯着您。”她重复了几次，就不再说话了。直到卡尔津金跟博奇科娃给押走了，一个法警送给她三个卢布时，她才变得有点儿活力了。

“你可是玛丝洛娃？”他问。“拿着，这是一位夫人送给你的。”法警说着交给她那钱。

“哪位夫人？”

“你拿着就行了，谁愿意和你多口罗唆。”

这笔钱是妓院的女掌班基塔耶娃请他送来的。她走出法庭的时候，找到民事执行吏，问她是否可以送玛丝洛娃一点钱。民事执行吏告诉她可以。在获得许可后，她于是脱掉钉着三个纽扣的麂皮手套，露出肥胖白嫩的手，从绸裙子后面的皱褶里拿出一个很新潮的里面有相当厚的一大叠息票的钱夹，这些都是她刚从她在妓院里挣来的证券上剪下来的。她从中理出两卢布五十戈比的息票，又加上两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和一枚十戈比的硬币，交给民事执行吏。民事执行吏叫来一个法警，当着基塔耶娃的面把那些钱交给法警。

“请您一定送到。”基塔耶娃嘱咐那个法警。

法警由于别人的不信任而变得气愤起来，所以才那么生气地对待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非常高兴有钱，因为有了钱就能够弄到这时她唯一想要的东西。

“真想搞支烟来抽抽。”她非常想抽烟，暗暗地想。她非常想吸烟，就使劲儿吸着

从那些办公室里散出来的、弥漫在过道中的烟味。可她还待等待好多一阵儿，因为负责派人押她回狱的书记官忘了被告，光顾着跟一名律师讨论一篇被查禁的文章，几乎与他吵了起来。审判停止之后，有一些年轻的和年老的男人特地走来看了她，交头接耳地谈论着什么。但她这时根本不想答理他们。

最后，直到四点多钟，她才被押解回去。两个押解兵，那个下城人和楚瓦什人，从法院的后门押着她走出去。她刚到法院的门道里，就交给他们二十个戈比，托他们买两个白面包和一包纸烟。楚瓦什人笑着，接过钱说：

“好吧，我去给你买就是了。”他说完，果真老实地为她买来了白面包和纸烟，并还给她找剩的零头。

路上禁止吸烟，因此玛丝洛娃不得不带着仍没有得到满足的吸烟的欲望走向监狱。她在两个兵的押送下刚走到大门口，正好碰上一百名从火车站送来的男犯人。

这些男犯人从玛丝洛娃面前经过时，都色迷迷地盯着她。那些犯人有留着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俄罗斯人，也有其他民族的人。有些人半边头发已剃掉，脚镣哗唧唧地作响。他们弄得前屋里充溢着令人难受的灰尘味、脚步声、谈话声、汗酸气。他们中的有些人走到她跟前，故意擦着她的身子走过去，脸上流露出淫欲的神情。

“嘿，这娘们儿，长得多俊。”一个犯人说。

“你怎么样了，小妞。”另一个挤着眼睛说。

一个肤色黝黑的犯人，后脑壳刮得泛着青光，刮得光光的脸上长着小胡子，脚上拖着咣口当响的脚镣，跑到她身边，一把抱住她。

“难道都不认识老朋友了吗？哼，别装模作样了！”他露出牙，眼睛里发着光，嚷道。玛丝洛娃推开他。

“你这是想做什么，混蛋？”副典狱长从后面赶上来，喝开他道。

那犯人缩紧身子，连忙跑开了。副典狱长就转身骂玛丝洛娃道：

“你待在这儿做什么？”

玛丝洛娃想说她刚出了法院，但她实在累极了，所以懒得张嘴。

“她刚从法院回来，长官。”押解兵穿过人群，把手举到帽沿上说。

“哦，那就把她交给看守长。这儿闹得太不象话了！”

“是，长官。”

“索科洛夫！把她带走，”副典狱长大叫道。

看守长走过来，恼怒地推了玛丝洛娃的肩膀一把，对她点一下头，领着她走向女监的长廊。到了长廊上，女看守摸索、搜查了她的全身，也没有发现什么东西（那包纸烟已经塞进白面包里），于是她就被送进今天早晨她被押走的那个牢房里了。

三十

关闭玛丝洛娃的牢房呈长方形，长九俄尺，宽七俄尺，有两扇窗子，靠墙砌着一个灰泥剥落的大炉灶。几张木板已经干裂的板床，占去房间里三分之二的空地。乌黑的圣像对着房门口，挂在房中央，圣像旁边插着一支蜡烛，下边挂着一支积满尘埃的蜡菊。房门左边，放着一个臭烘烘的木桶，木桶下的地板颜色已经发黑。

看守刚察过人，就把女犯人们关在牢房里过夜。

这间牢房共计关着十五个犯人：十二个女人和三个孩子。

天色还不晚，只有两个犯人躺在板床上：一个是由于没带身份证而被关进来的傻妇人，她几乎一直都把囚衣盖在头上睡觉。另一个生着痲病，因犯偷盗罪而被判刑。这个女人把头枕在囚袍上，睁大两只眼睛躺着却没睡，使劲地忍着咳嗽，压下一口涌进嗓子里而感到痒痒的粘痰。其他的女人都散着头发，只穿着一件土布衬衣。有些人坐在板床上缝补，有些站在窗边看着院子里经过的男犯。

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当中，有一个就是今天早晨送别玛丝洛娃的名叫柯拉勃列娃的老太婆，她满脸皱纹，神色阴郁，下巴底下皮肤松弛得像挂着一个口袋，总是皱着眉头。她是一个高大健壮的女人，淡褐色的头发编成短小的辮子，两鬓已经花白，脸颊上有一颗长着汗毛的疣子。这个老太婆因用斧子砍死自己的丈夫而被判处苦役刑。她所以砍死他，是因

为他对她的 女儿纠缠不清。她是这个牢房的头目，还偷卖私酒。她戴着眼镜做针线活，用三个手指头捏着针，像一般操作惯粗活的农妇那样，针尖对着胸口。坐在她身旁的一个女人，正缝着一个帆布口袋。她身材不高，肤色有点发黑，长着狮子鼻，眼睛又小又黑，脾气温和，总是在不停地唠叨。她是铁路上一个看守人的妻子，因为在火车来时没有举起旗子而导致了一场车祸，而被判处三个月徒刑。第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是费多霞，同伴们叫她费尼琪卡。她是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女人，具有粉白的皮肤，红润的脸色，孩子气般的、亮闪闪的天蓝色的眼睛，两条淡褐色的长发辫盘在小小的脑袋周围。她遭到监禁是因为她想蓄谋毒死自己的丈夫。她结婚时才十六岁，刚结完婚就想立即毒死丈夫。可是在她取保出狱，等候开审的八个月中，她不但已与丈夫和好，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他，等到法庭开审，她已能和和美地与丈夫生活在一起了。虽然她的丈夫和公公，尤其是非常喜欢她的婆婆，竭尽全力在法庭上为她开脱，但是她还是被判决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这个善良、达观、时常微笑的费多霞的板床正好挨着玛丝洛娃的，她不但喜爱玛丝洛娃，而且认为为她操心，替她出力是自己的本份。此外，板床上还坐着两个闲着不干活的女人。其中一个大约四十左右，面容苍白憔悴，以前可能生得很美，如今却消瘦惨白。她抱着一个娃娃，还袒露着一个又白又长的乳房喂他吃奶。她的罪行是这样：她的村子里有一个壮丁被押走去当兵，农民们认为抓走这壮丁是不合法的，于是拦住警察分局局长，把新兵夺回来。这个女人就是那个被非法抓走的壮丁的姑母，她第一个抓住那个带走壮丁的兵的缰绳。另一个无事可做的女人也是一个老太婆，她身材不高、满脸皱纹、性情温和。她已白发苍苍，脊背伛偻。

这个老太婆坐在火炉边上的板床上。一个头发很短、长着大肚子的四岁小男孩，嘻嘻哈哈地跑过她旁边。她假装要抓住他。那孩子只穿一件很短的衬衣，在她面前来回跑的，嘴里不停地嚷着：“嘻嘻，老奶奶，你抓不着我的，你抓不着我的！”这个老太太跟她的儿子一起因纵火罪而被捕。她平心静气地忍受着监狱的生活，只是惦念同时被捕的儿子，可她最不能放心的还是她的老伴，生怕她不在时他会长一身虱子，因为儿媳妇也离开了家，没有人叫他洗澡。

除这七个之外，还有其他四个女犯人站在一扇开着的窗子前面，双手抓着铁栏杆，跟刚才在门口碰到玛丝洛娃。这时正走过院子的男犯人搭话，又是打手势，又是喊叫。其中有个由于犯偷窃罪而被抓住的女人，长得高大笨重，满身是肉，发红的头发，白里泛黄的脸上和手上长满雀斑，粗壮的脖子从敞开的领口里露了出来。她朝窗声嘶力竭地嚷着一些下流的粗话。她身旁站着一个肤色很黑、相貌丑陋的女犯人，上身很长，两腿非常短，身材像未成年的小姑娘。她脸色红红的，脸上长着疱疹，两只黑眼睛之间离得很远，嘴唇又厚又短，盖不过她那白白的暴牙。她看到厅院里的情况，尖利地大笑起来。这个女犯人喜欢打扮，大家把她叫做“俏妞”。

她犯盗窃罪和纵火罪而受审。她们身后站着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穿着脏兮兮的灰布衬衫，形体枯瘦，青筋暴起，模样极其可怜。她因为窝藏赃物而受审。这个女人一言不发，但对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她始终露出赞许和动情的笑容。站在窗边的第四个女人是一个身材不高然而较健壮的农村妇女，眼睛很突暴，面容温和，她因为贩卖私酒而在服刑。这个女人就是跟老太婆玩耍的小男孩的母亲。她另外还有一个七岁的小女儿，也跟她一块儿关在监狱里，因为这两个孩子找不到人来照看。她也同别人一样瞧着窗外，可是手里不停地织着一只袜子，听到走过院子的男犯人所说的话，就蔑视地皱起眉头，闭上眼睛。她的那个披散着淡色头发的七岁女儿，只穿一件小衬衫，站在红头发女人身旁，伸出瘦小的手揪

住她的裙子，神情呆滞，但她认真地听着那些男女犯人互不相让的对骂，然后学着小声念一遍，仿佛要将它背熟似的。第十二个女犯人是教堂诵经士的女儿，她把自己的私生子扔在井里淹死了。这个姑娘身材很高，神态端庄，淡褐色的头发扎成一条不长的粗辫子，但是已经松散开来，乱蓬蓬的。她那对暴眼睛呆呆地出神。她漠视她周围发生的一切，只穿着一件肮脏的灰色衬衫，光着脚在牢房的空地上踱来踱去，每当走到墙根底下，就很迅速地转过身来。

三十一

铁锁咣口当地响了一下，把玛丝洛娃又关进牢房。牢里的人都转向她。甚至诵经士的女儿也停了下来，扬了一下眉毛，看了一眼进来的人，但她没说什么，又继续迈开她那有力的步子走了起来。

柯拉勃列娃将她的针扎在棕色的粗麻布上，探问似地从眼镜里瞧着玛丝洛娃。

“哎哟！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会无罪释放呢。”她的声音沙哑低沉，差不多跟男人一样。“看来，他们要你坐牢了。”

她摘掉眼镜，把活计搁在身边的板床上。

“好闺女，我前一阵儿还跟大妈说过，或许会当场就放了你的。听说这种事是经常会有。还会给点儿钱呢，一切得看你的运气了。”道口工马上用唱歌似的悦耳的声音说。“唉，真是出乎意料。看来我们猜的全不对。好闺女，看来上帝的安排无法预料啊。”她一口气说出许多亲切动人的话来。

“莫非真的判刑了？”费多霞露出充满同情的神情，拿她那双流水般清澈的蓝眼睛看着玛丝洛娃，问道。她那张愉快而年轻的脸全都变了颜色，像是要哭起来。

玛丝洛娃默默地走向她的床位，在床板上坐下，没有回答一句话。她的床紧挨着柯拉勃列娃，从尽头数起是第二张。

“你肯定还没吃饭吧。”费多霞说着，站起来，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玛丝洛娃依然没有回答，只是把两个白面包放在床头上，开始脱衣服。她脱下满是灰尘的囚衣，摘下包着髻曲的黑发的头巾，坐下来。

稍有点驼背的老太太在板床另一头和小男孩逗着玩，这时也走到玛丝洛娃身边。

“啧啧，啧啧！”她满心同情地摇一下头，叹着气说。

那个男孩也跟在老太太后面走过来，把眼睛瞪得老大，弯着上嘴唇，瞪着玛丝洛娃拿来的白面包。在这一天的折磨之后，玛丝洛娃看着这一张张充满同情的脸，她禁不住想哭，嘴唇也哆嗦起来。可她使劲儿忍住，直到老太太跟男孩走向她。当她听见老太婆满怀同情的叹息声，看到男孩子一心瞪着白面包的眼睛又朝她看过来时，她再也不能忍住了。她整个脸都颤抖着，然后放声大哭起来。

“我早就叮嘱过：你必须请一个本事高超的律师。”柯拉勃列娃说。“怎么，法庭要判你流放西伯利亚了？”她问。

玛丝洛娃刚想要回答，可又无法开口。她流着眼泪从白面包里取出那盒纸烟，烟盒的图

案是一个脸色红润的太太，她的头发梳着很高，袒露着一块三角形的胸脯。玛丝洛娃把那包烟递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看了看烟盒上的那幅画，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主要是不同意玛丝洛娃这样胡乱花钱。她从烟盒里取出一支，凑着灯点上，自己先吸一口，再将它塞在玛丝洛娃手里。玛丝洛娃没有停止哭泣，一口连一口地狠命吸那支烟，然后喷出烟雾来。

“判服苦刑。”她哽咽着说。

“这帮恶棍，该杀的吸血鬼，不尊敬上帝。”柯拉勃列娃说。“无缘无故就把人家闺女判了刑。”

这时，那些站在窗口的女犯人大声哄笑起来。小女孩也笑起来。她那细尖的孩子的笑声，跟三个大人嘶哑而尖利的笑声汇成了一片。院子中有名男犯干了什么怪事，让窗口的犯人都禁不住大笑出来。

“喂，这条剃了秃头的公狗！他这是做什么呀！”那个红头发的女犯人说，笑得全身的肥肉都颤动起来。她把脸靠在铁栏杆上，嘴里不停地嚷着粗话。

“嗨，这没心肝的家伙！有什么可笑的！”柯拉勃列娃冲红头发女人摆着头，道。然后她又问玛丝洛娃：“判了很多年吗？”

“四年。”玛丝洛娃说。她的眼泪如泉水般地涌了出来，有一颗甚至掉在纸烟上了。

玛丝洛娃愤怒地将那支烟捻灭，丢掉，又取出一支来。

尽管铁路看守人的妻子不吸烟，她却立刻将烟头拾起，把它弄直，嘴里不停地唠叨着。

“好闺女，看样子，俗语说得对，”她说，“真理让猪吃掉了。他们乐意怎么判决就怎么判决。马特维耶夫娜刚才还说：他们会把她放出去的。当时我就说了：不可能的，我的好大婶，我的心都觉出来了，他们不会饶过可怜的姑娘的。事情果真这样呀！”她说，很得意地听着她自己的声调。

这时，男犯人都已走出院子，跟他们搭腔的女人也从窗口那走开，走到玛丝洛娃身边。首先走过来的是领着女孩的突起眼睛的私酒贩子。

“为什么判得这么重啊？”她一面问，一面在玛丝洛娃身边坐下来，手里继续很快地织着袜子。

“因为穷才判得这么重。如果有钱，请来一个厉害的律师，肯定就没有事了。”柯拉勃列娃说。“那个伙计……他叫什么来着……披头散发的，大鼻头……嗨，我的太太，如果能请他来，他肯定会从水中捞起你，让你不再有一点儿麻烦。”

“哼，拿什么去请，”俏娘们露出牙冷笑了一下，坐在她们身边，“不用一千卢布你就不要想把他请动。”

“看样子，你也是命中注定这样的。”囚犯纵火罪而坐牢的老太婆插嘴说。“我也一样苦命啊，人家拐走了我的儿媳妇，还把我那儿子关进监牢里来喂虱子，我这么大年纪也没法逃脱。”她又开始叙述自己的身世，尽管大家都已听过了一百遍。“看样子，监牢和讨饭任谁也無法躲避。不是讨饭就是监牢。”

“是的，他们那班人都是一丘之貉，”贩卖私酒的女人说。她瞧了瞧她的女儿的头，就

放下手里的袜子，将小姑娘拉过来夹在两条腿当中，伸出手指头开始灵敏地在她的头发里找虱子。“他们审问我：‘你为什么卖私酒？’可是，我不卖私酒又怎么来养活我的孩子呢？”她边说，边熟练地做她经常做的工作。

玛丝洛娃听完贩卖私酒的女人的这些话，想喝酒了。

“能弄点酒来喝就好了。”她跟柯拉勃列娃说，拿衬衫袖子擦了一下眼泪，只不时地抽搭一下。

“想喝吗？可以，拿钱来，”柯拉勃列娃道。

三十二

玛丝洛娃把钱从面包里拿出来，拿给柯拉勃列娃一张息票。柯拉勃列娃拿起息票，看了一眼。她不认得字，但相信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俏妞。俏妞告诉她息票相当于两卢布零五十戈比。柯拉勃列娃爬到通气口边，拿出藏在那里的一瓶酒。女犯们，除了挨在玛丝洛娃身边的几个外，看到这些，全都回到各自的床铺上去。

玛丝洛娃抖掉她的头巾和长囚衣上的灰尘，爬到自己的板床上，开始吃白面包。

“我给你留着茶呢，可能已经凉了。”费多霞从墙架上取下一个用包脚布裹着的白铁壶和一个带把的杯子，对她说。

茶不仅完全凉了，而且白铁味比茶味要重，但她还是倒出一杯，就着茶咽白面包。

“费纳什卡，接着。”她叫着，掰下一块面包，递给眼睛一直瞪着她嘴巴的小男孩。

这会儿，柯拉勃列娃将酒瓶跟酒杯递给玛丝洛娃。玛丝洛娃约柯拉勃列娃同俏妞一块儿喝。这三个女人是监狱中的贵族，因为她们只要有了钱，有了东西就一块分享。

过了一会，玛丝洛娃兴奋了，快活地说起法庭上的情景和法庭上非常令她惊奇的一件事，还滑稽地学着检察官的举动。她说，法庭上的男人全都兴奋地看着她，为此还故意闯进犯人室中。

“就连押解兵也说：‘他们全都是来看你的。’经常有一个什么人借口取一个什么文件跑进来了，或者办一件什么别的事，但是我心里清清楚楚，他哪儿是要找什么文件，无非是想死命盯我两眼罢了。”她笑着说，仿佛纳闷似的，摇了摇头。“分明是些戏子哟。”

“这话可是一点也不假。”铁路看守人的妻子接过她的话，她那银铃般的说话声立刻滔滔不绝地响了起来。“这如同苍蝇见着了糖。他们不在乎别的，单单见了女人就没魂儿了。他们这班人宁愿不吃饭也不愿……”

“这儿也相同的。”玛丝洛娃插话。“到了这里，我也碰见了那种事。他们刚带我回来，恰好有一伙犯人从火车站上带下来。他们一再无赖地纠缠人，我几乎不知道如何去脱身。幸亏副典狱长赶走了他们。有一个纠缠不休，费了好大劲我才挣脱了。”

“那家伙长什么样子？”俏妞问。

“肤色黑黑的，长着小胡子。”

“应该是他。”

“他是什么人？”

“就是谢格洛夫。你瞧，他才走过去。”

“这谢格洛夫是谁呢？”

“你连谢格洛夫都不知道！谢格洛夫两次从做苦工的地方逃出来。现在他又被抓住了，不过他肯定还会逃的。连看守们都怕他。”那个俏娘们说，她跟男犯人互通消息，监狱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没有她不知道的。“他肯定会逃走。”

“他走他的，总不会把我们也一块儿带走。”柯拉勃列娃说。“你最好还是讲一讲，”她又将脸对着玛丝洛娃说，“关于上诉的事律师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你目前总应上诉吧？”

玛丝洛娃说她一无所知。

这时候，红头发女人把两只雀斑累累的手伸进蓬乱而又稠密的红头发里，用手指甲挠着头皮，向这几个正在喝酒的贵族跟前走来。

“卡秋莎，我告诉你应该办的事。”她张嘴说。“首先第一件事，你得写个条子，说你关于那个判决的意见，然后再跟检察官提出。”

“与你有什么关系？”柯拉勃列娃生气地压低着嗓子说。“你都吁出酒味了。这事你不要多嘴。你不说，别人也明白该做什么，你不必多嘴。”

“别人又不是在同你说话，要你口罗唆什么！”

“想喝些酒吗？也凑过来了。”

“好吧，就让她喝一些吧。”玛丝洛娃说。她从来都很大方，有了东西就大家分。

“来，我让她尝一下……”

“哼，你过来吧！”红头发女人说着，逼近柯拉勃列娃。“我才不怕你呢。”

“臭囚犯！”

“你才是臭囚犯。”

“骚货！”

“我是骚货？你这苦役犯，杀人凶手！”红头发女人大叫起来。

“我警告你最好给我走开。”柯拉勃列娃阴沉着脸说。

相反，红头发女人越发向前逼近，柯拉勃列娃就伸出手去朝她那敞开的肥胸上推了一把。红头发女人似乎早就预料到她这一手，用迅猛得出奇的动作一把抓住柯拉勃列娃的头发，又举起另一只手想打她的脸，但柯拉勃列娃抓住了这只手。玛丝洛娃和美人儿拉住红头发女人的胳膊，用尽全力想将她拖开，可是她的手牢牢地揪住了柯拉勃列娃的辫子，不肯撒手。她突然稍稍把头发松了一松，但仅仅是为了把头发缠在她的拳头上罢了。柯拉勃列娃歪着头，伸出一只手去抓红头发女人的身体，龇咧着牙要咬她的手。所有的女人都围拢过来，开始劝架、叫嚷。就连害痨病的女人也走到她们旁边来，一边咳嗽，一边瞅着那扭成一团的两个女人。

孩子们挤在一块儿，哭叫着。女看守听到吵闹，同一名男看守进来。他们拉开打架的女犯人。柯拉勃列娃散开她那花白的头发，拉掉那几缕被抓下来的头发。红发女人拉开了撕破的衬衫，遮住枯黄的胸膛。两人都哭诉着，高声喊叫。

“哼，我明白这全部都是用酒灌出来的。明天我跟典狱长说，让他来把你们收拾一下。我能闻出来，这里有酒味。”女看守说道。“你们小心点儿，快拿开那些东西，不然你们会吃苦头的。我们可没时间来替你们讲理。现在各自回到你们的铺上，保持安静。”

但过了好一阵儿还没有静下来。两个女人互相对骂了一会儿，争论着吵架是谁起的头，是谁的错。最后，男看守跟女看守全离开了，女犯人才平静下来，开始睡觉。那个老太太

接着跪在 圣像前面开始祷告了。

“你们两个苦役犯凑在一块儿了。”在房间另一头的板床上忽然传来红头发女人沙哑的声音，她每说一句话就加进几句刁钻古怪的骂人话。

“你当心别再找揍！”柯拉勃列娃马上回敬她说，同时也添上些骂人的话。接着两个人的嘴巴都闭上了。

“如果没有他们来阻拦我的话，我早就将你的眼珠子挖出来了。……”红头发女人继续说，柯拉勃列娃没容她久等，立即也回敬她一句。

接着又沉静下来，这一次的间隔比较长，接着对骂又开始。最后，间隔越来越长，双方终于完全沉寂下来。

大家都睡了，有些人甚至已发出呼噜声，只有那个老太婆一向祷告很长时间，这会儿还跪在圣像前面。还有那教堂诵经士的女儿，等女看守一走，就立刻从床上下来，又在牢房里踱来踱去。

玛丝洛娃在板床上辗转反侧，不停地想着她如今竟成了苦役犯。她已经被人叫了两次苦役犯：第一次是博奇科娃，第二次是红头发女人，然而她还不能适应这种叫法。柯拉勃列娃原本背对着她躺着，这时转过身来。

“唉，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想不到。”玛丝洛娃悄声说。“人家什么坏事都干，也没关系。我无缘无故，却要受这些罪。”

“不要伤心，闺女。西伯利亚一样有人生活。你去那里也会没事的。”柯拉勃列娃替她宽心道。

“我知道会没事，但究竟太让人生气。我不该有这种命运的，我一直习惯过好日子。”

“人没办法跟上帝拗呀！”柯拉勃列娃叹息了一下说，“人是没法拗过上帝的。”

“这我明白，大娘，但实在太难受了。”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

“你听见吗？哼，又是那个骚娘们儿。”柯拉勃列娃说，把玛丝洛娃的注意力转移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上去，这种声音是从房间另一头的板床上发出的。

这是红头发女人正勉强忍住的抽噎声。红头发女人哭泣，是因为她刚才打也挨了，骂也遭了，可是她那么想喝的酒，却还没有喝上。她哭泣，还因为她这一辈子除了挨骂、被嘲弄、受侮辱、遭打以外，什么也没品尝过。她本想回忆一下她与工人费季卡·莫洛江科夫的初恋来自我安慰一番，不过她一想起那次恋爱，也就想起了那次恋爱是如何终结的。

那个费季卡有一回喝得大醉，为了开玩笑，用明矾往她身上最娇嫩的地方抹，然后看着她痛得把身子缩在一起，就与同伴们哄堂大笑。她的初恋这么就结束了。她想起这件事，就感到非常伤心，认为没有人能听到，就放声哭起来。她哭得跟个孩子似的，嘴里哼哼着，抽着鼻子，吞着咸滋滋的泪水。

“她真是太可怜了。”玛丝洛娃说。

“可怜是不错，可她不应来胡闹嘛！”

三十三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一觉醒来，顿时感觉他一定遭到了一件什么事。他甚至还没弄明白那研究

竟是一件什么事，就确信那一定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好事。“卡秋莎，审判”。对，从此以后不但要停止撒谎，而且要完全讲真话。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天早晨，首席贵族的妻子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终于给他来了一封信。

这封信聂赫留朵夫盼望了很久，现在对他尤其重要。玛丽亚答应给他完全的自由，并祝他以后婚姻幸福，生活快乐。

“婚姻！”他嘲讽地说。“我如今与那种事离得太远了！”

他想起昨天还想要告诉她丈夫全部真相，并向他道歉，并且愿意由他发落。可今天早晨他感到这事与昨天想的不那么简单，不容易办到。“再说，既然他不知道，又有什么必要让他难堪呢？要是他问起来，那我肯定对他说实话。可又何必主动去跟他讲这些呢？不，这是没有必要的。”

要对米西毫无保留地说出真话，在今天早晨也似乎颇为困难了。所有的一切不仅不便于开口，而且一说出来就会得罪她。有的事，和世俗方面的许许多多事情一样，只能心照不宣。这天早晨他只打定了一个主意：以后不去他们家里了，如果他们追问缘由，他就说实话。

不过，对于卡秋莎，却不必隐瞒什么话。

“我要到监狱里去，把一切都告诉她，请求她的宽恕。如果必要，对了，到了必要时，我就干脆同她结婚。”他想。

宁可牺牲所有跟她结婚，来实现道德上的修复，这个念头今天早晨使他感到非常感动。

他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精神振奋地迎接新的明天了。阿格拉斐娜刚走进来，他就坚决——甚至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会如此果断——告诉她，他再也不需要这座房子，而且不再需要她的照顾了。本来他与阿格拉斐娜对一件事心中有数，他租着这座租金高昂的大房子是为结婚准备的。所以，退租这事就有特殊的含义。阿格拉斐娜吃惊地看着他。

“我很感激您，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您一直都对我非常照顾。不过我现在不需要这么大的房子和所有的仆人了。如果您愿意帮我的话，那就请您费心清理清理这些东西，暂时把它们收藏起来，就像妈妈在世时常做的那样。娜塔莎来后，她会处理这些东西的。”（娜塔莎是聂赫留朵夫的姐姐。）

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摇摇头。

“这些东西怎么能清理呢？这些东西都是要用的呀。”她说。

“不，没用处了，阿格拉斐娜，大概没用处了。”聂赫留朵夫看到她摇头，就这么答到。“还要麻烦您操心跟柯尔涅伊谈一下，我多付他两个月的工钱，以后就不用他了。”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您可不能这么做啊！”她说。“嗯，您即便是要去外国一趟，今后回来仍会需要一所住宅的。”

“您误会了，阿格拉斐娜。我不到国外去，我要去其他地方。”

他的脸马上变红了。

“不错，应该跟她说，”聂赫留朵夫想，“没必要隐瞒，应该告诉所有人全部真相。”

“昨天我碰上一件既出乎意料又非常重大的事情。您还记得我姑姑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家里的卡秋莎吗？”

“当然记得，我还教她做过针线活呢。”

“喏，这个卡秋莎昨天在法庭上受审，我恰巧当陪审员。”

“哎呀，上帝，多么可怜啊！”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说。“她因为犯了什么罪而受审讯？”

“杀人罪。这都是我干出来的。”

“这怎么可能是您干出来的呢？您这话说得太离谱。”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说，一种调皮的火星在她那对苍老的眼睛里显现。

她知道聂赫留朵夫与卡秋莎的那件事。

“没错，这一切都因我而起。也正因为此，我才改变了我的全盘计划。”

“但是这件事怎么能使您发生变化呢？”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忍住了微笑，说。

“是这样的：既然是我促使她走上这条路，我就得竭尽所能去挽救她。”

“这是出于您的善良，其实在这方面您并没犯下什么不可饶恕的过错。好多人都干过这样的事，只要冷静地想一想，这件事原本很平常很无所谓，将它忘掉，人不就生活下去了。”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说，态度既严厉又严肃。“您没必要把罪名都往自己身上揽。我听说她早就走上了邪路，这又能怨谁呢？”

“这错全在我，因此我想弥补。”

“啊，这事可不容易弥补。”

“可这是我的义务。您如果有什么难办的事，那就想一下我母亲生前的希望……”

“我向来没有什么可为难的。我对老夫人一直非常感激，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我的丽莎叫我去(丽莎是她的已嫁人的侄女)，如果这儿不再需要我了，我就去她那儿。您可没必要担心那种事，谁都是难以避免的。”

“噢，我可不这么想。但我还是麻烦您帮我把这座房子退掉，收拾一下东西。您也不要生我的气。我是十分感激您的各种好处的，非常感激的。”

说来很奇怪，在聂赫留朵夫意识到自己的卑鄙开始憎恨自己的时候起，他再也不憎恨其他人。相反，他却觉得阿格拉斐娜跟柯尔涅伊和气而可敬。他很想告诉柯尔涅伊自己的懊悔感情，可看到柯尔涅伊那副恭恭敬敬的模样，他又没办法这么做了。

聂赫留朵夫到法院去，仍然坐着从前的那辆马车，走过平日经过的那些道路，可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他今天完全成了全新的一个人了。

同米西结婚的想法，这在昨天还显得合乎情理，今天却万万不可能了。昨天他是这样考虑的，认为凭他的地位，她嫁给他无疑会很幸福。可是今天他认为他不仅不配跟她结婚，而且不配与她亲近。“一旦她了解我是怎样的人，无论如何她也不会跟我来往了。我还为她向那位先生卖弄风情而暗自责备过她呢。不行，哪怕现在她愿意嫁给我，但是既然我知道卡秋莎关在这儿的监狱里，明天或者后天就要与大批犯人一起流放去做苦工，那么暂且不谈我能不能得到幸福，我的良心难道能够平静吗？那个人，那个被我抛弃的女人，就要动身去服苦役了，而我，却在这儿接受大家的祝贺，带着年轻的妻子一起出门会客。或者，我去开会，跟那个首席贵族，跟那个受到我和他的妻子无耻欺骗的人一起在会议上点票，统计票数，计算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背着他又去同他的妻子约会。多么卑鄙啊！或者，我继续画那幅分明永远也不会完成的画，因为我原本就不应该干这种无聊的事，我现

在根本就 不愿做这种事了。”他对自己说，不禁暗暗高兴于他内心所起的变化。

“现在，”他想，“我首先要去见律师，问清楚他的意见，然后……然后到监狱里去看她，看昨天的那个女犯人，将我心中所想的全部讲给她听。”

他一想起怎样见到她，怎样说那些心里话给她听，怎么朝她认罪，只要能赎罪他愿意去做任何事，甚至愿意与她结婚——他一想起这些，心情特别的激动，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三十四

聂赫留朵夫一抵达法院，在过道里与昨天那位民事执行吏相遇，就朝他询问已判决的犯人住 在哪里，要见这种犯人必须得到谁的许可。

民事执行吏告诉他这类犯人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又说在没有最后宣布判决之前，探望这类 犯人必须经检察官批准。

“等法庭的审讯一完结，我就来告诉您，亲自陪您去。检察官直到现在还没来。您就等到审讯结束以后再说吧。现在请上法庭陪审。审讯马上就要开始了。”

聂赫留朵夫认为这个民事执行吏今天的样子非常可怜。他对他的好意表示了谢意，向陪审员议事室那边走去。

他刚到那个房间附近，陪审员恰好陆续地走出来，到法庭去。那个商人跟昨天一样非常快乐，同样吃完了东西喝过了酒，一看到聂赫留朵夫，就像个老朋友似的跟他打招呼。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亲切态度和大笑声，今天也没有令聂赫留朵夫感讨厌。

聂赫留朵夫非常想把他同昨天那个女被告之间的事情对全体陪审员说明白。

“其实，”他暗想，“昨天法庭审讯的时候我就应该站起来，当众宣布我的罪状。”但是当他同其他陪审员们一起走进法庭，一切程序又照昨天那样开始了：还是一声大叫：“开庭！”还是那三个衣领绣花的人登上高台，依然是一片肃静，陪审员们还是在高背椅子上坐下，还是那几个宪兵，还是那幅画像，还是那个司祭，聂赫留朵夫这时才体会到尽管他应该那样做，可是今天也跟昨天一样，他是无力打破这种庄严的法庭气氛的。

开审以前的种种准备工作也跟昨天一样，只是省掉了陪审员的宣誓和庭长对陪审员的一番交代。

今天审理的是一个撬锁盗窃案。被告是个瘦骨嶙峋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由两个宪兵押上来，他们手中握着的军刀已经拔出刀鞘。这个小伙子两肩很窄，脸色苍白，毫无血色，身上穿着灰色长囚衣。他一个人孤伶伶地坐在被告席上，皱起眉头打量每个走进法庭的人。

这个年轻人被控与一个伙伴把仓库的挂锁撬开，从仓库里把价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的陈旧的粗地毯偷走。起诉书中说，这个年轻人同一个撬粗地毯的伙伴在一块儿走，被警察逮住了。他们两人马上承认罪行，于是一起进了监狱。那个同伙本来是名小炉匠，不长时间就死在牢中。这样，今天就只剩这个年轻人独自受审。破旧的粗地毯被放在证据桌上。

审讯案件跟昨天完全相同，有许多证据，有物证，有人证，有证人宣誓，有审问，有鉴定人，有互相盘问，等等。那个当证人的警察在庭长、检察官们问话时，一直是无精打采

地回答几个字：“是，大人。”或是“我不清楚，大人。”然后又是“是，大人。”……可是，虽然他表现出当兵的那种木呆呆的样子，说着简洁刻板的话，但还是能看出来他很可怜年轻人，不大想讲述逮捕的过程。

另一个证人就是失主，一个年老的房产主，他就是那几条粗地毯的所有者。这个老头似乎肝火旺盛，当法官问他那些粗地毯是否他的财物时，他很不高兴地回答说是的。但是当副检察官开始盘问他准备拿那些粗地毯干什么，他是否极需用那些东西时，他就火冒三丈，回答道：

“去他妈的吧，这些粗地毯。我根本用不着这些破玩意。如果我早知道它们会为我带来诸多麻烦，我不仅不会找它们，而且乐意倒贴一张红票子，即使倒贴两张也乐意，我何苦让人家硬拉到这儿来受审。单单坐马车我就花掉差不多五个卢布了。再说我的身体又不好。我有疝气病，还有风湿病。”

证人们就讲了这么一些话，被告自己承认全部的罪行。他像是一头被抓住的小野兽，迷茫地左顾右盼，同时吞吞吐吐地将犯罪的过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案情很清楚，但副检察官跟昨天一样，耸着肩膀，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想让狡猾的犯入上钩。

他在发言中证明，这个偷盗案是在住人的房屋里发生的，门锁被撬开了，所以这个小伙子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法庭指定的律师却证明这个盗窃案并非是发生在住人的房屋中的，所以罪行虽然不能否认，可罪犯还并不会像副检察官所断定的那样严重危害社会。

庭长装作跟昨天那样不偏不倚，大公无私的样子，而且跟陪审员详细说明那些他们早就清楚、实际上也不可能不清楚的原则。法庭又跟昨天似的暂停了几回，大家仍然又是抽烟，又由民事执行吏高喊“开庭了”，两个宪兵又是费力地克服着睡意，拿着拔出的军刀坐在旁边，威吓犯人。

人。

经过审讯弄清楚了，这个年轻人原本由他父亲送到香烟厂作学徒工，在那里生活了五年。今年，工厂跟工人闹起纠纷，老板解雇了他。他找不到事儿做，在城里晃来晃去，把最后一个子儿拿去买酒喝。他在小饭馆中遇到那个比他更早失去工作、酒喝得更厉害的小炉匠。他们一块喝得大醉，深夜把锁撬开，拿去了第一眼看到的东西。他们被抓住了，承认偷盗地毯，就全被关进牢中。小炉匠在审讯之前就死了。如今，这个年轻人被看作是个危险人物，必须与社会隔离开，并且被审讯。

“如果说他算得上危险人物，那他倒跟昨天那个女犯人差不多了。”聂赫留朵夫听着法庭上人们所说的话，暗自想道。“单单他们危险，我们就不危险？……我本人就是个好色之徒，浪荡君子，骗子，所有我们这类人，所有熟悉我的根底的人，不仅不鄙夷我，反而尊敬我，莫非我和我们这类人就不危险了？再者，就算只有这个孩子在这个法庭里全体在场的人当中是个对社会最危险的人，那么现在他被捕了，按常理来说，应该如何处置呢？”

“事实上，大家对这件事看得一清二楚，这个孩子根本不是什么多坏的坏蛋，仅是非常普通的人罢了。他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样的人，也仅仅是因为他处在会产生这种人的社会环境之下罢了。因此，事情明明白白：不想再出现这样的年轻人，就得努力消除产生这种不幸的人的社会环境。”

“然而我们是怎样做的呢？我们单凭偶然抓住这样一个不幸的年轻人，同时很清楚地知道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至今没有被抓住。然后就把他投进监狱，使他终日闲散无聊，或者逼迫他从事对他的健康极其有害又毫无意义的劳动，让他结交一批跟他一样软弱而且在生活里迷失了方向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将他夹杂在最腐败的人中间，从莫斯科省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去。”

“我们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社会环境，相反却一味鼓励那些制造这类人的机构。众所周知，这些机构就是工场、工厂、作坊、小饭铺、酒店和妓院。我们不但不能撤消这种机构，还把它们看作是不可缺少的，鼓励并协调它们。”

“我们用这些方法培养出来的人何止一个，甚至于有上百万个。接着我们抓住了一个，就自以为做了一件大事，为自己的安全提供了保障，再也没必要做什么事了，我们就将他自莫斯科省放逐到伊尔库茨克省。”聂赫留朵夫在上校身边坐着，听着律师、检察官跟庭长的各种语调，看着他们狂妄自大的神态，心情激动地想着。“嗨，演这种闹剧得浪费多少精力呀。”聂赫留朵夫在这个大法庭的四周打量着，看着那些画像、灯具、转椅、军服跟厚墙同和窗户，继续想。他想着这栋壮观的建筑物，还有那更为壮观的所有机构的整体，以及由全部的官僚、文案、看守、宪兵等组成的巨大的组织。这种组织不但这里有，并且俄国各地都有，他们领取工资，就是为了参加这种表演。“如果我们拿出这些精力的百分之一去为被抛弃的人提供帮助，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可如今我们当他们是我们的安逸和舒服服务所必需的劳动力而已。实际上，在他因为家境贫困而从农村来到城里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同情他，接济他就没事了。”聂赫留朵夫看着小伙子被吓着的病容，暗暗的想着，“或者，在他进了城，在厂里干完了十二小时的活之后，被上了年纪的伙伴拉进小酒店里时，这时候如果有人跟他说一句：‘不要去，凡尼亚，你到那里去不好。’那么小伙子也就不会去，不会堕落，不会做什么坏事了。”

“可是自从他猪狗般地在城里过学徒的生活，为避免长虱子而将头发剃光，为给师傅们买东西而东奔西跑的时候起，整个这段时期，没有出现过一个有心怜悯他的人。恰恰相反，自从他在城里住下之后，他从师傅们和同伴口里听到的，却不外乎‘谁会骗人，谁会骂人，谁会喝酒，谁会打架，谁会放荡，谁就是好汉’之类的话。”

“到后来，这些有碍健康的工作、酗酒、放荡等，戕害了他的身心，使他生了病，他就稀里糊涂，头昏脑胀，梦游般地，毫无目的地在城里闲荡，一时鲁莽，钻进人家的一个板棚里，从那儿偷走几条谁也不需要的粗地毯。可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这些衣暖食饱、生活富裕、受过教育的人，不仅不去尽力消除那些导致年青人腐败堕落的原因，却要惩罚他，想要借惩罚来改变这种状况。”

“太恐怖了，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是因为残酷，或许还可能有些荒谬，谁也说不上来。不过，再怎么讲，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都已达到了极限的地步。”

聂赫留朵夫一门心思思考这些问题，他的心早已经不在听庭上的这些审问了。这些想法恐怕使他自己也偶尔感到害怕。令他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这种情况以前他怎么会没有想到，为什么别人怎么也没有看到或注意到呢。

三十五

等到法庭第一次宣布审讯暂停，聂赫留朵夫就马上起身，走到过道上，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到法庭去了。他们爱怎么处罚他就怎么处罚好了，反正他再也不想参加这种既可憎又丑

晒的 蠢事了。

聂赫留朵夫多方打听到检察官办公室坐落在什么地方后就马不停蹄地去找他。尽管差役不肯放他进去，口口声声说是检察官此刻恐怕有事。但聂赫留朵夫不答理他，径自走进门去。这时候有一个官吏迎面走过来，聂赫留朵夫就请求他向检察官通报一声，说他原来是陪审员，有重要的事会见他。或许公爵的头衔和考究的衣着帮了聂赫留朵夫所有的忙。那官吏连忙报告了检察官，于是聂赫留朵夫就进去了。检察官站着接待他，好像对聂赫留朵夫执意要求见他的事，似乎不太理会。

“您有什么事请教？”检察官严肃地问道。

“我是陪审员，姓聂赫留朵夫，我迫切地想见一见女被告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迅速而果断地说，他的脸涨得通红，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对他今后的生活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

检察官身材不高、肤色发黑，花白的头发短短的，两只敏锐的眼睛熠熠发光，翘起的下巴上蓄着浓密的、剪短的胡子。

“玛丝洛娃吗？这个我当然明白。她被指控犯了毒死人命的滔天大罪。”检察官煞有介事地说。“那么您究竟有什么事要见她能告诉我吗？”接着要缓和一下口气，又一次补充说：“我若不知道为什么事，就不能安排或准许您见她。”

“我要见她，是因为我确实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聂赫留朵夫猛然涨红了脸说。

“噢，原来是这样。”检察官说，抬起眼睛，把聂赫留朵夫仔细地瞧了瞧。转过头就问：“她的案子有没有审问过？”

“昨天她受过审，非常不公平地被判决去做四年苦工。她是冤枉的。”

“原来如此。既然她昨天才被判决，”检察官说，根本不理睬聂赫留朵夫那句声明玛丝洛娃是冤枉的话，“那么，在正式宣布判决以前，她依然得被关押在拘留所里。在拘留所，只有在特定的日期才能够去探监。我建议您到那里去咨询应该什么时候去。”

“但是我想尽快跟她见面。”聂赫留朵夫说，他的下巴在颤抖，他感到决定性的时刻到了。

“您到底有什么事非见她不可呢？”检察官扬起眉毛，有点心神不宁地问道。

“因为她没有任何罪，却被错判服苦役。真正说起来我才是大恶人。”聂赫留朵夫用发抖的声音大声说，同时又觉得他似乎没有必要说这些话。

“哦，这话什么意思？”检察官颇感兴趣地问。

“因为我害了她，害她沦落到现在这种不堪的地步。要不是我逼得她走上歧途，她也不可能受这样的无耻控告了。”

“我仍是不理解，这事同探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因为我特别想跟她去，还要征得她的同意……同她结婚。”聂赫留朵夫说。他一讲到这件不平事，眼泪就突然又夺眶而出了。

“是吗？原来是这样。”检察官恍然大悟。“这倒真是个非常意外的事件。您是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地方自治会的议员，我说的对吗？”检察官问，似乎对此刻宣告奇怪决定的聂赫留朵夫，他以前见过面似的。

“对不起，我想这与我的请求无关。”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愤怒地答道。

“是的，确实无关，”检察官带着若隐若现的笑容，毫不窘迫地解释道，“可是您的愿望未免太蹊跷，太出人意……”

“那么，我能够得到许可吗？”

“许可？能，我现在就给您写一个许可证。请您稍候。”

他走到一张桌子旁边坐下，开始写起来。

“请您略为坐一会儿。”

聂赫留朵夫站着没有动。

检察官写完许可证，把字条交给聂赫留朵夫，好奇又惊讶地瞅着他。

“另外我不能不声明，”聂赫留朵夫说，“我没有能力再参与审讯了。”

“如果是这样，您就得向法庭提出正当的理由。这一点您应该知道。”

“原因就是：我认为一切审判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没什么讲道理。”

“噢，原来如此，”检察官回答时依旧带着隐约可辩的微笑，似乎用这样的笑容表示只有他熟悉这种意见，且认为是种可笑的谬论。“不过您一定明白，我身为法庭检察官，决不能同意您的意见。当然我劝您快点向法庭提出这事，法庭会决定您的申请，裁定您的理由是否正当。如果不合理，您就得付出一笔罚款。这个问题您去向法庭交涉吧。”

“我声明过了，哪儿也不去了。”聂赫留朵夫非常生气地说。

“那么再见。”检察官鞠躬说，显然他是想尽快摆脱这个莫名其妙的来访者。

“刚才来找您的是谁？”在聂赫留朵夫出去以后，一个法官紧跟着走进检察官的办公室，问道。

“是聂赫留朵夫。您不知道，他以前在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县的地方自治局里就发表过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您猜怎么着，他现在做了陪审员，谁知有一个女被告被判决去服苦役，据他声称，他曾欺骗过她，于是现在他打算同她结婚。”

“竟会有这种事？”

“他确实是这样跟我说的，……而且异常激动。”

“现在的年轻人都有点神经质，有点反常。”

“但他也不算很年轻了。”

“哎，老兄，您那个大名鼎鼎的伊瓦申科夫可真让人厌烦。他讲这讲那，没完没了，简直想磨死人嘛。”

“必须阻止这种人口出狂言，要不然可能真是十足的捣乱公堂……”

三十六

聂赫留朵夫从检察官那里奔将出来，乘车径直奔拘留所。可是打听后方知道那里根本没有玛丝洛娃这个人。所以照聂赫留朵夫理解，她准是还在老的解犯监狱。于是聂赫留朵夫就决定上那里去。

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确实被关在那儿。检察官忘了大约六个月以前，当地发生过一起政治事件，由于宪兵们夸大了事件，结果许多大学生、医师、工人、高等女校学生、女医士都被关进了拘留所的牢房里。

拘留所和解犯监狱相隔很远，直到傍晚聂赫留朵夫才到达监狱。他想走进那幢阴森森的

大厦的门口，可是被岗哨拦住了，只让他拉了拉门铃。

看守听见铃声就跑了出来。聂赫留朵夫马上出示许可证，但看守坚持说没有典狱长的批准谁也不能放他进去。聂赫留朵夫又回头去找典狱长。他在上楼时听见里面的房间里传出一阵钢琴声。有人在弹奏一首错综复杂而又雄浑的乐曲。一个不知什么原因一只眼睛包着纱布的侍女怒气冲天地给他开了门。这会儿，琴声从房里直冲出来，直灌到进的耳朵里。那是一首李斯特狂想曲，虽然弹得很不赖，但总弹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然后又回头从头弹奏起。聂赫留朵夫就问侍女典狱长在不在家。

侍女告诉他典狱长已离家好一会儿了。

“是否快回来了呢？”

那首狂想曲又停住，又从头开始，声音既嘹亮又热烈，又向那个仿佛被魔法锁定的地方弹过去。

“我帮您去问一下。”

侍女走了。

那首狂想曲刚刚又生机勃勃起来，突然在还没弹到那个被魔法锁定的地方就中断了。一个人的说话声传了过来。

“你去跟他说，典狱长没在，今天也不会回来。他外出做客去了。这些人为什么老是纠缠不清。”从房门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说话声，随后狂想曲又响了起来，忽然又停住，传来了推开椅子的声音。看来，定是弹钢琴的女人发脾气了，要亲自教训一下这个来得不是时候却又纠缠不休的客人了。

“不用问了，爸爸不在家！”一个蓬松着一头长发、面容忧郁的姑娘从里间走出来，生气地说。她面色缺乏血色，眼睛疲劳无神，眼圈发黑。一看见是一个身穿考究大衣的年轻人，口气马上又变得温和了。“请进来……您有什么事啊？”

“我正准备到监狱里去探望一个囚犯。”

“恐怕又是个政治犯吧？”

“不，不是政治犯。我出示了检察官的许可证，可他们仍不让我进。”

“嗯，我不知道，爸爸总是不在家。您请进来！”她从狭窄的前室里招呼他。“要不您去找副典狱长吧，这会儿他正在办公室里，您可以去同他谈一谈。能否告诉我您贵姓？”

“谢谢您。”聂赫留朵夫急急地表示感谢，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径直就走了。

后房门还没有关上，雄壮而快乐的琴声又响起了。可这琴声和那个郁郁寡欢却顽强地学琴的姑娘都是很不相符的。聂赫留朵夫在院子里遇见一位撇小胡子并且在头发上抹过油的年轻军官，就向他打听副典狱长在什么地方。没想到原来他就是副典狱长。他接过许可证，检查了一会儿说，这是拘留所的许可证，所以他不敢让聂赫留朵夫到监狱里探望。再说现在也迟了……

“您就明天来吧。明天十点钟人人都可以探监。您到那时候再来，狱长本人也在家。那时候您可以在大房间里见她，不过要是狱长愿意的话，您也可以办公室里跟她见面。”

就这样这一天聂赫留朵夫探监始终没有成功，只好回家去了。

聂赫留朵夫走在大街上，想到明天就可以见到卡秋莎，心情非常激动。这时候他不再回想法庭上的种种情形，只回想起他同检察官和两个监狱的长官的谈话。他想到自己想设法要见她，想到他怎样将自己的打算讲给检察官听，想到他为了同她见面而去两个监狱，他的心情就不由得一阵激动，久久不能平息。他一回到家里，就拿出那本已经很久没有动过的日记，念了其中的几段，然后记下下面这些话：“已经有两年没写过日记了，以为自己从此再也不会做这种孩子气的事。事实上写日记并非什么孩子气的事，相反这都是在

跟我自己谈话，同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真正的、神圣的我谈话。在整个这段时期，我一直在沉睡，我没有一个能与之沟通的人。四月二十八日我被惊醒了，被那件在我做陪审员的法庭里所发生的非同寻常的事惊醒。我看见了，看见了被我欺骗过的卡秋莎，穿着长囚衣，坐在被告席上。

由于一系列荒唐的误会和我的不可原谅的过错，她被错判服苦役。我刚才去找了检察官，还去过监狱。尽管他们不让我进去，但我决定要尽我所能同她见上一面，并向她认罪，甚至采取同她结婚的方式来赎我的罪。主哇，你一定帮助我！我感到很充实，心里充满欢喜。”

三十七

这天夜里，玛丝洛娃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

她躺在那儿，睁大眼睛望着那时而被走来走去的教堂诵经士的女儿挡住的房门，她听着红头发女人的鼾声，暗自思忖着许多事。

她心想，不管怎样，到了库页岛以后绝不能嫁给苦役犯，定要想方设法另寻归宿，譬如嫁给一个什么长官，或者嫁给文书员，最差也得嫁给看守，或者副看守。

他们一样都是色鬼。“我不能再受下去，要不然就完了。”她想起那个辩护人是如何地盯住她，庭长怎样盯住她的秀丽的脸，法庭上遇见她和故意在她身边走过的男人怎样瞅她。她忽然想起别尔塔到监狱里来探望她时说起那位她在基塔耶娃妓院里爱上的那个大学生曾问过她，他对她的遭遇很表惋惜和怜悯。她想起红头发女郎打架的事，她很同情这个红头发女人。她又想起面包店老板如何又给了她一个白面包。一霎间她想到许许多多的人，除了那位为了她可怜巴巴的聂赫留朵夫。她的童年，包括以后的她的少女时代，特别是原来她对聂赫留朵夫的爱情，她从来不会去想，因为回想起来太离奇太荒谬了。这些往事已深埋在她的心底。她一次也没有梦见过聂赫留朵夫。昨天她在法庭上没有认出他来，倒不是因为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还是个军人，没有留什么胡须，只蓄着两撇小胡子，自然鬈曲的头发很短也很浓密，如今他却留着一大把胡子，显得特别老成，而主要是因为在她的心里她从未想到过他。在那个可怕的黑夜，她已经把她过去同他发生过的事情全部埋葬了，因为那个黑夜他从军队回来，却没有拐到姑母家去看她。

在那个夜晚以前，她一直怀抱希望，以为他会回来，所以她不但没有嫌弃她心口底下的那个小娃娃，而且每当他在她的肚子里轻柔或是剧烈地动弹时，她时常怀有一种惊讶又亲切的感动心情。可是从那天夜晚起，一切都改变了。肚里未来的宝宝也变成纯粹的累赘了。

姑姑们一直都期盼着聂赫留朵夫，邀请他顺路回来一趟，可是他发来电报说他不能回来，因为他得按期赶到彼得堡。

卡秋莎知道这件事情后，打算到火车站去见他一面。火车是在夜晚两点钟时经过那儿的车站。卡秋莎小心服侍两个较老姑娘上床睡着了，就怂恿那厨娘的女儿玛莎和她一同去。她穿着一对旧的半统靴，戴着头巾，收拾好衣服，就和玛莎一块往火车站跑去。

那是一个秋夜，黑暗而风雨交加。温暖的两点大滴大滴时下时停。

在野外，脚下的路无法看清，树林里黑 NE065 NE065 的，如同炉子的内壁。虽然卡秋莎对这条路很熟，却还是在树林里迷失了方向。聂赫留朵夫所乘的火车在这个小站上只停留三分钟，她原本希望能在火车到达之前赶到车站，可是当她跑到那儿时，第二遍

铃已经响过了。卡秋莎一跑到月台上，就在头等客车的窗子里看见了聂赫留朵夫。这辆客车里灯火尤其明亮。有两个没有穿上衣的军官面对面坐在丝绒靠椅上，打纸牌。靠窗的小桌上点着几支流油的粗蜡烛。他穿着紧身的马裤和白色的衬衫，坐在丝绒靠椅的扶手上，他的胳膊肘支在椅背上，不知为何脸上笑容可掬。她一认出他，就举起冻僵的手拍窗子。可惜恰在此刻第三遍铃声响了，火车徐徐开动了，它先是往后退一下，接着相连的车厢碰磕着，一节节地往前移动。两个打纸牌的军官中的一个站起来，手里操着纸牌，朝窗外张望了一下。她又敲了敲窗子，把脸贴近窗玻璃。这时，她面前的车厢也猛地一颤，走动了。她就跟着它往前走，眼睛望着那个窗子。那个军官想将窗子放下来，弄了好一会儿却打不开。于是聂赫留朵夫站起来，推开那个军官，亲自动手将窗子放下。火车的速度加快了。卡秋莎也加紧步子跟上去，想追上它，然而火车越开越快，当窗子放下来的那一瞬间，一个乘务员走了过来，将她推开，跳上车厢去。卡秋莎被抛在后头了，但她依然沿着月台淋湿的木板死劲往前跑。到了月台尽头，她才放慢步子以防跌倒，沿着一级级的梯阶跑下去，来到地面上。她依然在朝前跑，然而那节头等车厢已离她很远了。二等车厢也已从她身旁驶过，接着好几节三等车厢以更快的速度驶过她的身旁，但是她依然跑个不停。当尾部挂着一盏提灯的最后一个小车厢驶过去时，她已经越过水塔，四周没有一点遮拦了。风猛烈地刮着她的脸，掀起她的头巾，她的双腿被迎风那面的衣裾紧紧包裹。她的头巾已经被风刮在了地上，可是她还在不停地跑。

“卡秋莎阿姨！卡秋莎阿姨！”玛莎喊着，好不容易才追上卡秋莎。“您的头巾掉了！”

“他在灯光雪亮的车厢内，坐在丝绒软椅上面有说有笑，吃喝玩乐；而我呢，却在这儿，在黑暗的泥地里，淋雨，吹风，站着哭泣！”卡秋莎想着就站住了，身子朝后一仰，用手抱着头，大声哭了起来。

“他已走啦！”卡秋莎喊道。

玛莎很害怕了，搂着卡秋莎已经湿淋淋的衣服。

“阿姨，我们回家去吧。”

“等下列火车开过来，朝轮子底下一钻，就可以完事了。”卡秋莎想着，没有去回答小姑娘的话。

她打算这样做。但就在这会儿，如通常在激动以后接着平静下来时那样，她肚子怀着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孩子，忽然颤动了一下，用劲一撞，然后慢慢地伸开四肢，接着用不知什么又细又软而且尖的东西碰了一下。突然间，那些在一分钟前仍旧那么折磨她、让她觉得简直无法活下去的种种苦恼，以及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满腔的愤恨和她不惜一切来向他报复的想法——这所有的一切立刻都消失无踪了。她安静下来，理了下衣服，扎好头巾，急忙朝家走去。

她浑身都湿透了，沾满了泥浆，万分疲惫地回到家里。从那天起，她的精神上就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化，正因为这种变化她才成为现在这样的人。经过那个可怕的夜晚以后，她再也不相信善了。从前她自己相信善，而且认为别人也都相信善，然而从那天晚上起，她坚信谁也不相信善，相信上帝相信善这样的话，会在每个人的嘴上流露，可是他们这样做仅仅是愚弄人罢了。她深信，她爱他，他也会爱她，但是现在他玩腻她了，糟蹋够了她的感情，就抛弃了她。然而他在他所认识的人当中还算是最好的一个，其他人比他还要坏得多。这一点在她后来遭遇的各种事情中，一步步地得到了证实了。他的姑姑们，那两个笃信宗教的老姑娘，在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服侍她们的时候，就将她赶走。她碰到的所有女人，都极力利用她来赚钱；她碰到的所有男人，从年老的警察分局局长到监狱里的男看守，

都只把她视为 调笑的对象。对任何人来说除了享乐，除了肉体上的享乐，世界上别的东西都无关紧要。她 更能证实自己这种想法的时间，是在她自由生活的第二年，当时，她与一位老作家同居。那 位老作家就把这种享乐叫做诗和美，并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人生的全部幸福就在于能进行这 种享乐。

每人活着都是为了自己，为了给自己寻找欢乐，所有和上帝和善有关的话都是骗人而已。要是她心里产生疑问：为什么人间的安排都这样糟糕，为什么人们之间要欺凌，大家受尽苦难？那么，最好还是不要去想它。要是她觉得苦闷，那就抽烟，喝酒，和男人谈一谈爱情，这样也就能把苦闷忘掉。

三十八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晨五点时，女监里照样响起哨子的声音，柯拉勃列娃早已经起床，这时候就把玛丝洛娃叫起床。

“我已经是一个苦役犯了。”玛丝洛娃恐惧地暗自思虑着，揉着眼睛，不由自主地呼吸每到早晨就臭烘烘的空气。她准备再睡一觉，重返那毫无知觉的睡乡，可是睡意被担心受怕的习惯驱除走了，她爬了起来，盘腿坐好，打量着周遭。女人们已经起床了，孩子们依然在酣睡。贩卖私酒的女人睁着一对暴眼睛，小心翼翼地在她孩子们身下抽出她那件长囚衣，生怕惊醒他们。阻拦征兵的女人在火炉旁边晾那些做尿布用的破布，她的婴儿在蓝眼睛的费多霞的怀里大声啼哭，费多霞摇晃着他，温柔地唱着催眠曲。害肺病的女人伸手抓住自己的胸口，不住地咳嗽，她的脸被涌上来的血涨得通红；每逢咳嗽停下来，她就拼命呼气，那种响声不亚于在叫嚷。红头发女人醒过来以后，仰面朝天躺着，弯着两条肥腿，兴奋地大声讲述她所做的梦。犯纵火罪的老太婆又站在圣像面前，小声念着永远相同的祷告词，在胸前画十字，鞠躬。

诵经士的女儿静静地坐在板铺上，那双睡意还犹在的呆滞眼睛无神地瞧着前方。那个姑娘们把她那抹过油的又粗又硬的黑发缠在一个手指上，要把它弄成髻曲。

走廊里响起大棉鞋走路时的啪哒啪哒声，铁锁咣啷一响，进来两个倒便桶的男犯，他们身上穿着短上衣和灰色裤子，裤管高出踝骨，板着脸，怒气冲冲地把便桶用扁担挑起来，将它送出牢房。女人个个到走廊里水龙头边洗脸。红头发女人站在水龙头旁和隔壁牢房里一个女人吵起架来。又是辱骂，又是叫嚷，又是诉怨……

“你们都想坐单人牢房，是不是？”男看守嚷起来，使劲地在红头发女人的赤裸而肥胖的后背拍了一下，声音清脆响亮，整个长廊上都听得见。“别让我再听见你的声音。”

“你瞧，老头子又没正经了。”红头发女人把这种拍打当做亲热，说道。

“喂，快一点！快穿好衣服去做礼拜。”

玛丝洛娃还没顾得上梳好头，典狱长带着他的随员来了。

“出来点名！”男看守吆喝道。

另一个牢房中也出来一批女犯人。全部的女犯人都走在走廊上站成两排，后面一排女人照规矩要把自己的手搭在前一排女人的肩膀上。所有人都被点了名。

点名完毕以后，女看守进来把女犯人带领到教堂里去。从各牢房中走出的女犯人大概共有一百多，她们排列成一行纵队。玛丝洛娃同费多霞就站在队伍中间。她们每人包着囚犯戴的白头巾，身上穿着白色衣裙，仅有少数几人穿着原本自有的花衣裙。这几个女人都带着自己孩子，是要随同丈夫一起去流放的。一整座楼梯全都被这一个队伍拥挤得无法再站人。只听得有穿大棉鞋走路的声音响起，说话声和笑声间或响起。在拐弯处，玛丝洛娃看到自己的冤家对头博奇科娃凶巴巴地走在前面，就叫费多霞看。等女人们走下楼梯时，不再说话，边画着十字，边鞠着躬，开始走向还很空的漂亮的教堂。按她们规定的位置坐

在右边。她们之间 挤抢着，停下脚步。在女人之后走进来的是那些穿灰色囚袍的男犯，包括有解犯，监犯，经村社判决的流放犯。男犯们大声咳嗽着，拥挤在教堂的左边及中间。在教堂的上边的敞廊里还站着许多先进来的男犯，一旁是被剃阴阳头、戴着脚镣的苦役犯；另一旁是没有剃头、没戴脚镣的拘留犯们。

这座监狱教堂是由一个富商耗费了几万卢布重新翻盖和装修的。整个教堂里色彩鲜亮、金碧辉煌。

起初，教堂里除了擤鼻涕声、咳嗽声、婴儿的哭叫声和偶尔夹杂着铁链的叮 口 当 声外一片寂静。不过后来，站在教堂中央的男犯人忽然往两边挤紧，闪出中间的一条道来。顺着这条道走来的是典狱长，他在教堂正中所有人的前面站住。

三十九

礼拜开始了。

礼拜以如下的方式进行：身着怪异又极不方便的锦缎服饰的司祭，把一块面包在碟子里切成很多小块，然后把它们放入盛着葡萄酒的杯子里，并且嘴里念着各种各样的姓名和祈祷词。同时，诵经士先是不停地念各种各样的斯拉夫语祈祷词，而后与一个由犯人们组成的唱诗班轮流歌唱它们，这些祈祷词原本就晦涩难懂，现在念得这么快，唱得也快，就越发让人费解。祈祷词的主要意思是祈求皇帝和皇室福乐康宁。大家跪着念许多遍这种祈福的祈祷词，时而还和其他的祈祷词一块儿念，时而又单独念。除此以外，诵经士又念了《使徒行传》里的几行诗，声调那么怪异，紧张，更加使人一句也听不懂。

司祭同样念了《马可福音》里的一段内容，倒念得非常清楚，是说耶稣复活以后在升天 坐到圣父的右边以前，先在抹大拉的马利亚面前显灵，把她身上七个魔鬼驱除掉，后来还向他的十一个门徒显灵，要他们给普天下的众民传布福音，而且声明不相信的会被定罪，相信而且受洗者必将得救，还能赶鬼，手按着病人，病人就会好，还可以说新语言，手能抓蛇，如果喝了一些毒物，也不会受害。

礼拜的要义听说是：司祭将面包切成小块，放进葡萄酒里，用一定方法和祈祷，就变成上帝 的身体和血。那方法是：司祭身穿着碍手碍脚的像口袋一样的锦缎法衣，不紧不慢地高举着双臂，一动不动，接着跪下来，吻一下圣坛及上面的陈放物。不过关键的仪式是司祭用两 手拿着一块餐巾，从容不迫地在碟子和金杯上轻轻挥动。

据认为，这样一来，面包和酒就变成了上帝的肉和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部分礼拜才做得尤其庄重严肃。

“隆重地祷告最神圣、最纯洁、最美好的圣母啊。”司祭把这些事做完以后，在一道隔板的后边大叫一声。唱诗班就庄重地唱道：无限的荣耀应该归于处女，她没有失去童贞而生下基督，为此她应该得到比某些司智天使更多的光荣，得到比某些六翼天使更多的荣耀。如此以后，据认为，变化就完成了。司祭拿开碟子上的餐巾，在碟子中央把一小块面包切成四份，先蘸一蘸酒，再送进他自己的嘴里。据说，这样他就吃了一小块上帝身上的肉，喝了一口上帝身上的血。接着，司祭掀开一道帷幕，推开隔板正中的那扇门，从门里拿着金杯走出来，请那些愿意进圣餐的人也来吃杯中那上帝的血和肉。

有些孩子想进圣餐。

司祭先询问了那些孩子的姓名，然后用小匙轻轻地从杯子中舀出一小块浸泡过酒的面包，轻轻地送入每一个孩子的嘴中。诵经士当场为孩子们擦净嘴，又欢快地歌唱孩子们吃主的身体，喝主的鲜血。跟下来，司祭把杯子放到隔板背后，在那里一口气喝干杯子里的鲜血，吃干净上帝 的身体，小心谨慎舔干净小胡子，抹干净嘴巴和杯子，高兴十足地从隔板后面踱出来，他的脚上那双极薄的后跟小牛皮靴发出一种吱嘎吱嘎的声音。

做到这里这个基督教礼拜的主要部分就完成了。可是司祭有心抚慰抚慰那些不幸的犯人，就在通常的礼拜之外再加上一个特殊的礼拜。这个特殊的礼拜的仪式是这样的：司祭站在一个 铸铁包金的、由十支蜡烛照亮的黑脸黑胳膊的画像面前——据认为，这个画像就是刚才被司祭吃掉的上帝。接着，他开始用一种怪异的、不知是说话还是唱歌的假嗓念出下面一段话：

“至亲至爱的耶稣啊，使徒的光荣，我的耶稣啊，殉教徒的赞美，万能的主耶稣啊，拯救我，耶稣我的救主啊，我的最美的耶稣啊，拯救来找你的人，耶稣救主啊，宽恕我，从祷告里诞生的耶稣啊，拯救你所有的圣徒，所有的先知，我的救主耶稣啊，赐给我们天堂的幸福，关爱人类的耶稣啊！”

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换了另外一种口气，在眼前画了一个十字，跪下去叩了几个头。大家也照他的样子那样。典狱长、看守、囚犯全部都跪了下去。上面走廊里脚镣的哐啷声格外响。

“天使的缔造者，万军之首领，”他接着念道，“最神妙的主啊，天使们的震惊，全能的主啊，祖先的救世主，至亲至爱的主，族长们的称赞，十分光荣的主啊，皇帝的支柱，友爱的耶稣，实现了预言，极顶神奇的主啊，殉道者的城堡，极顶温顺的主啊，修士们的欢心，极顶博爱的主啊，圣徒们的欢乐，贞洁的主啊，童贞者的贞洁，流芳百世的耶稣，罪人的救世主，耶稣，上帝的子臣，救救我吧！”最后总算读完了，又重复呼喊着“耶稣”，却声音更加沙哑了。他一手轻轻提起绸里子的衣服，弯着一条腿，跪在地板上叩头。唱诗班全部唱着末尾那句话：“主啊，上帝的儿子，救救我吧！”犯人们都伏在地，然后爬起来，把还没剃掉的一半头发向后一丢，那折磨他们瘦腿的脚镣马上哐啷发响。

每一个人照这样做了很长时间。起初总是那一套赞美词，末尾总是那一句：“宽恕我”，而后又换上一套新的赞美词，末尾改成另外几个字：“哈利路亚”。紧接着，犯人们在胸前画一个十字，跪下来，匍匐在地上。起初，每赞美一次，犯人们就跪拜一次，不过后来他们就隔一次才跪拜一次，再后甚至隔两次。等到念完所有的赞美词，司祭就轻松地吐了一口气，把书本合上，走到隔板后边去了，大家都非常高兴。最后剩下来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司祭拿起一个平放在大桌子上面的四端镶着珐琅质的圆形饰章包金十字架。而后他举着它走出来，走到教堂中央站住。首先是狱长走到司祭跟前，吻一下十字架，随后是副狱长，看守们，后来就是犯人们，相互推挤，嘀嘀咕咕，相续走过去。司祭一边跟狱长聊天，一边把十字架和他的手塞到那些走到他跟前的犯人们的嘴上去，有时候还戳到他们的鼻子上去了。犯人们极力吻十字架和司祭的手。

这个专门为安慰和教训迷路弟兄而做的礼拜如此这样结束了。

四十

到场的人，从司祭、典狱长到玛丝洛娃谁也没有想到，司祭如此奋力地反复念叨和用各种古怪字眼赞颂的耶稣本人，正好禁止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

他不但禁止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饶舌和自诩为导师的司祭利用面包和酒所做的渎神法术，而且坚决禁止某一些人称另一些人为导师，禁止在殿堂里祈祷，要求每一个人要单独祈祷。他还禁止修建殿堂本身，他说过他要毁坏殿堂，人不应该在殿堂里祈祷，而是在精神里，在真理中祈祷。更重要的是，他还禁止如这里所做的那样审判人，监禁人，虐待人，侮辱人，惩办人，禁止对人使用任何暴力。他还说过他的意愿是来释放囚徒，给他们自由。

这里每一个人都没有想到，正在这里进行着的一切是最大的渎神行径，所有这些以基督的名义做出来的事情恰恰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

谁也没有想到，司祭举着让别人亲吻的四面镶有珐琅圆饰的镀金十字架，不是什么别的，恰恰就是基督上刑的绞架的样子，而他上绞架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禁止现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谁也没有想过，司祭吃着面包子，喝着甜酒，自以为是在吃主的身体，饮基督的血，事实上他们确是在吃喝主的血肉，这并非由于他们吃了包子，饮了葡萄酒，而是由于他们不仅迷惑那些被基督认为与自己一模一样的“怯懦者”，而且剥夺他们更大的快乐，让他们遇到最残酷的刑法，不让人们知道主带给他们的福音。

司祭觉得心安理得地做着这一切，因为由于他从小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以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式，以前的圣徒都相信过它，此时的神职长官和俗世长官也全部都信奉它。

他其实并不相信面包会变成肉，说那么多那样的话会对灵魂有什么益处，或者他的确吃了上帝身上的一小块肉，这种事情是无法相信的，但他相信人应该有这种信仰。使他对这种信仰深信无疑的真正原因是他十八年来奉行这种信仰的种种规定，使他得到大笔收入，来赡养他的家属，供他的儿子上学，送他的女儿到宗教学校去。诵经士也同样相信，而且比司祭更坚信，因为这种信仰的教义的实质他都忘记了，只知道教徒所交的香火费、给追荐亡者所做的法事、诵经、普通祈祷、带赞美歌的祈祷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费用，凡是真正的基督徒都照付无疑，所以每当他喊着“宽恕吧，宽恕吧”那些指定的经文的时候，一直表现出一一种沉着的信心，深信这种事是非做不可的，就如同人们卖柴、卖面、卖土豆时所表现的信心一样。虽然监狱的长官和看守们从来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多问这种信仰有什么意义，在

教堂里所做的一切事情又有什么意义，但他们相信人必须有这种信仰，因为最高当局和沙皇本人都信奉它。再者，他们虽然隐隐约约，也确实体会到这种信仰在为他们残忍的职务辩护（至于到底怎么会有这种体会，他们自己都无法解释清楚的）。要是没有这种信仰，那么，让他们像现在这样用尽一切力量去虐待人们而又心安理得，不但会有很多困难，而且也许会根本不可能。狱长是好心肠的人，如果不是在这种信仰里找到了支持，就不可能照这样生活下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挺直了身体，一动不动站在那里，诚心的祈祷，在胸前画十字，当大家唱《那些司智天使们》时他就竭力使自己感动，当那些孩子来领圣餐时，他就走上前去，亲手举起一个领圣餐的男孩。

在犯人当中，仅仅只有少数几个看透这些玩意儿全部是骗局，用来糊弄这一类信徒，所以心里暗暗觉得好笑。决大多数人却相信，这些镀金的圣像、蜡像、金杯、衣服、十字架、重复念的“最爱的耶稣”和“宽恕吧”，全部都蕴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凭借这种力量就能在今世和来世获得许多益处。但是多数人都做过许多尝试，想凭借于祈求、祷告、蜡烛，现在得到益处，最后却什么都没有，他们的祷告也没有如愿，但大家都坚信，失败只是偶然的，这一套方法既然得到那些有学问的人和总主教的赞许，总是十分有道理的。即使对现在没有作用，那么对将来也一定会起作用。

玛丝洛娃也如此相信。她在做礼拜时也和别人一样，有一种既虔诚又烦闷的复杂心理。

开始 她立在隔板后面的人群当中，除了同牢的那些女伴以外，谁也看不到。再后，领圣餐的人 向前走去，她跟费多霞也一同往前走，接着就看见了典狱长，同时看见典狱长后面的看守当 中有一个高大的农民，留着浅褐长发，留着灰灰胡子。此人就是费多霞的爱人。他也正一动不动地盯着妻子。

唱赞美歌的时候到了，玛丝洛娃上下不停地打量着他，跟费多霞嘀嘀咕咕，直到大家在胸前 画十字，跪下去的时候，她才也跟着这样做。

四十一

一清早聂赫留朵夫就走出了家门。这时候从巷子里走过来一个赶着马车的乡下农民，用他特 有的声调吆喝道：

“牛奶啊，牛奶啊，牛奶啊！”

前天下了第一场寒冷的雨。所有没有修公路的地方全部都长出了淡淡的青草。花园当中的 桦树枝上长满了翠绿的绒毛，李树和杨树长出了芳香的长长叶子。住宅和商店都脱掉了套 窗，窗子被擦得很干净。在聂赫留朵夫坐车路过的旧货集市上，一座座货棚周围挤满 了人。一些衣服褴褛的人腋下夹着皮鞋，肩上挂着熨得笔挺的裤子和衣服，在市场上来来 往往。

小饭铺里已经挤满人，其中有穿着整洁的长上衣和发亮的皮靴、不再需要到工厂上班 的男人，也有头戴五颜六色绸头巾，身着镶小玻璃珠的外衣的女人。警察们挎着手枪，上面 还用黄带子系着，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小心注视着有没有什么纠纷发生，来借此驱逐他们难 以忍耐的烦闷。在林荫道的小路上，一些小孩和狗在刚刚变绿的草地上跑来跑去。保姆们则快 乐地坐在长凳上有说有笑。

大街上，左边半边路面阳光照不到，还十分潮湿阴冷，当中的路面早就干了。笨重的载 货马 车不停地在街上轰轰地驶过，四轮轻便马车隆隆地开着，公共马车不停地发出叮当的 声音。周 围响起教堂间断的钟声，震得空气不断地颤动，召唤人们去参加类似监狱教堂相 同的礼拜。衣着华美的人们，纷纷向他们的教区走去。

聂赫留朵夫所坐的马车没有把他送进监狱大门，却在通往监狱的路边停下。

在通往监狱的这个路口上，在离监狱大约一百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些带着大小包包袱 的 男人 和女人。右边是几间矮矮的木屋，左边是一幢挂有一个招牌的两层的楼房。前面那 座砖砌的 大厦就是监狱，然而探监的人被禁止走近那儿。有一个岗哨带着枪走来走去，每个 试图从他 身边绕过去的人都被他严厉地喊住。

右边，即木房的小门旁边，岗哨对面的长凳上坐着一个看守，他身着镶着丝绦的制服，手 里还拿着一个本子。来探监的人全部走到他面前，报了他们想探望的人的名字，他就记 下来 。聂赫留朵夫也走 到他面前，说了玛丝洛娃的名字，穿制服的人也写了下来。

“为什么现在不让人进去？”聂赫留朵夫问看守。

“他们现在做礼拜。等到做完礼拜，就让你们进去。”

聂赫留朵夫来到探监的人群里面，人群中走出一个人，衣服破烂，帽子揉成一团，光脚 上套 着一双烂鞋，脸上划着一道道伤痕，朝着监狱走去。

“你往哪儿跑啊？”带枪的兵向他吆喝道。

“你叫什么？”那个衣衫褴褛的人全然没有因为岗哨的吆喝声而恐惧，回敬他一句，然后走了回来。“你不让我过去，我等着就是。你这么大声嚷嚷，倒好像是个将军。”

人群里发出了赞许的笑声。探监的人大都穿得寒酸，甚至破烂，但是也有些衣着体面的男人和女人。站在聂赫留朵夫身旁的一个男人，衣着整齐，剃光胡子，脸色红润，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袱，里面显然是一身贴身衣裤。聂赫留朵夫问他是否是第一次到这儿来。他回答说每个星期日都到这儿来。他们就聊开了。原来这个人在一家银行看门。他来找这儿的目的是为了探望他的犯伪造罪而受审的弟弟。

这人样子和蔼，把自己的身世全部讲给聂赫留朵夫听，同时也想打听聂赫留朵夫的身世，但此刻来了一辆包着橡胶轮胎的轻便马车，由一匹健壮的良好黑马套着，车上并排坐着一个大学生及一个戴面纱的小姐。因此，他们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过去了。大学生手里搂着一个大纸包，走到聂赫留朵夫面前，向他打听，能不能散发施舍物(他抱来的白面包)，同时为此要办什么手续。

“这是女朋友要我来办的。她的父母要我们把东西送给犯人。”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不清楚，但我想你应该问问那个看守。”聂赫留朵夫说，用手指身穿制服、手里举着登记簿的看守。

就在聂赫留朵夫和大学生讲话的当儿，正中开着一个小窗口的监狱大铁门打开了，一个穿军服的军官和另外一个看守从门里走了出来。那个手拿本子的看守就宣布现在可以探监。

岗哨向一旁退开，所有探监的人一齐加快脚步，往监狱的门口涌去，唯恐落后了就无法进去似的。站在门口的一个看守认真清点从他面前走过的每一个探监人，大声报道：“十六个，十七个”，等等。为了不把探监的人留在监狱，也不致跑掉一个犯人，监狱的里边还有一个看守，用手拍着每一个走过第二道门的人数。这个负责清点的看守眼睛并不瞅着来探监的对象，一巴掌拍在聂赫留朵夫的背上。起初聂赫留朵夫对看守的这一拍感到侮辱，但他立即记起自己到这儿来的原因，就又立即害臊于自己的这种不高兴和受侮辱的心情。穿过二道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拱顶有几个不大的窗子的大房间，窗上全都被铁格子钉牢了。在这个名为聚会室的房间里，完全出乎聂赫留朵夫意外的是，壁龛里居然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大像。

“拿这个干什么？”他想，不自觉地吧耶稣像与自由人联系起来，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同囚犯联系在一块。

聂赫留朵夫慢慢地走着，让急于探监的人走到他的前面去。他百感交集，想到关在这里的罪人就感到全身发冷，但对昨天的年轻人和卡秋莎一样的无辜者则深表怜悯，而想到马上同卡秋莎见面，他情不自禁又觉得害怕和爱怜。他最后走出这个房间的时候，好像看见看守在那一头说着什么话。但聂赫留朵夫心事重重，没有听见看守的话，继续往多数探监人走的方向跟着。也就是走向男监狱，而不是他要去的女监狱。

聂赫留朵夫让着急的人先进去，然后最后一个人走进探访的房间。

他推开门，走进聚会室，第一件让他震颤的事就是成百条嗓门齐声叫喊合成的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嚣声。聂赫留朵夫直到走近那些人，看见他们紧贴在一道把房间隔成两半的铁丝网上像苍蝇聚在糖上似时，他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喧嚣声。这个在后墙上开着几个

窗子的房间，原来不是由一道铁丝网而是由两道铁丝网隔成两半，并且铁丝网都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板上。这两道铁丝网中间，几个看守来回巡视着。铁丝网的一边是犯人，另一边是探监的人。这两批人被两道铁丝网隔开，相离有三俄尺远，这样，双方不仅无法私自传送什么东西，而且很难看清对方的面貌，特别是对眼睛近视的人而言，那根本就看不见。说话如此困难，为了让对方听清，每个人不得不大声叫嚷。铁丝网两边都贴着许多张脸，那是妻子、丈夫、父亲、母亲、儿女的脸，他们竭力要看清对方的面容，说出想说的话。可是每个人都想让对方听明白自己，每个人身旁的人也这样希望，因此，他们的声音就相互干扰，这样，每个都要以压倒别人的声音极力叫嚷。使聂赫留朵夫一走进房间就感到震惊的喧嚣声正是因此而形成的。要想听清楚这些人在说什么，那是怎样也无法办到的。要推断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彼此的关系，全得观察他们的脸色。挨近聂赫留朵夫的是一个戴着头巾的老太婆，她紧贴铁丝网，下巴发抖，正在对一个脸色惨白、半边头发剃光的青年人嚷着什么话。那个男犯人的眉头扬起，额头紧皱，很仔细地听她讲话。老太婆身后是一个青年人，穿着长上衣的农民，把手在耳朵旁边做成扇状，听一个长相与他相似、形容憔悴、胡子花白的男犯人对她讲话，不

住地摇头。离老太婆远一点，站着一个穿着破烂的人，挥舞着胳膊，嚷着什么话，大声笑着。他旁边的地板上坐着一个头上戴着上等羊毛头巾的女人，怀抱着婴儿正放声大哭，她显然是第一次见到对面那个头发花白的穿着囚犯的衣服、剃光半边头发、戴着脚镣的男人。在这个女人的上方，就是跟聂赫留朵夫闲聊过的银行看门人，他正在拼命地朝对面一个头顶光秃、眼睛明亮的男犯人喊叫。当聂赫留朵夫意识到他也得以这种方式讲话时，他就不由得对那些竟然规定而且实行这种办法的人产生了满腔的愤慨。使他感到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任何人认为这种可怕的局面和这样对人感情的嘲弄，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

士兵也好，典狱长也好，探监的人也好，囚犯也好，都在如此做，仿佛觉得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

聂赫留朵夫在这个房间里等了五分钟，心里感到有种说不出的痛苦，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同世界无法相容。他精神上感到十分厌恶，难过得好像晕船一样。

四十二

“但是，该办的事还是该办。”聂赫留朵夫勉励自己说。“但是该怎么办呢？”

他开始用眼睛搜寻长官们。他看见一个戴着肩章的军官，身材不高，面容消瘦，留着唇髭，在人群的后面走来走去，就向他问道：

“先生，您能不能告诉我，”他的态度特别紧张谦恭，“女犯关在什么地方？在哪儿才能够跟她们见面？”

“怎么，难道您是要探望女监？”

“是的，我想与一个关在监狱的女人会面。”聂赫留朵夫依然那么紧张而谦恭地回答。

“您早在聚会厅里就应这么说了。那么您要见什么人？”

“我想见玛丝洛娃。”

“她是不是政治犯呢？”副典狱长问。

“当然不是，她仅仅不过是……”

“她怎样，判决了吗？”

“当然，她前天判决了。”聂赫留朵夫安静地回答，恐怕破坏这个好像同情他的副典狱长的心理。

“如果您是要探望女监，那么请往这边走。”副狱长说，很明显他已经从聂赫留朵夫的衣着推断出这个人是他效力的。“西多罗夫，”他叫着一个留着很长的唇髭、胸前挂着几个奖章的军士，“将这位先生领到探望女犯人的房间去。”

“是，长官。”

这时候，一阵撕裂人心的痛哭声从铁丝网那边传来。

聂赫留朵夫觉得一切都非常奇怪，而最奇怪的是虽然副狱长和看守长在这幢房子里做着种种残酷的事情，他却得感激他们，而且得很领他们的情。

看守长带着聂赫留朵夫走出男监探望室，到了长廊上，立即推开对面的扇门，把他领进女监探望室。

这个房间也同男监探望室相同，由两道铁丝网分成三部分，但是地方更加小得多，过来探监的人们和囚犯也少些，但是里面的吵闹声和男监相似。在两条铁丝网当中也有个监狱官在来回走着。但是，这里的看守是一个女人，同样穿着制服，制服袖口上绣有丝绦，镶嵌着蓝边，腰间也同男看守相同系一条宽阔腰带。那边铁丝网上面，也同男监探望室相同，贴满了犯人：这边是穿着各种各样衣服的城里人们，那边是站着穿着白色囚衣和便服的女囚徒。整个铁丝网上面都挤满了犯人。有人踮起脚，这样才能超过别人的头传话过去，使对面的人听得清楚些；有些人则坐在地板上与对方谈话。

在全部女犯人当中有一个女人尤其显眼，她的喊声和样子也尤其引人注目。

这个女人是吉卜赛人，她生得极其瘦弱，头发蓬松，头巾已经从髻曲的头发上滑下来。她在对面的铁丝网那边，所站位置差不多是房间的正中。她接近柱子，正在对一个穿着蓝色上衣、腰底下勒紧了皮带的吉卜赛男人嚷着什么话，同时飞快地打着手势。吉卜赛男人身旁的地上坐着一个兵，正跟一个女犯人讲着什么。再过去是一个留着浅色胡子的、矮小的年轻农民，脚上穿着树皮鞋，他紧贴铁网站着，拼命地强忍眼泪而脸色涨得通红。与他通话的是一个相貌俊俏、头发浅黄、有着亮晶晶的天蓝色眼睛的女犯人，她正深情地望着他。这就是费多霞和她的丈夫。站在他们旁边的是一个衣服褴褛的男人，在跟一个头发凌乱的宽脸庞的女人讲话。再过去是两个女人，一个男人，又是一个女人，他们分别同对面的与自己有关的女犯人讲话。玛丝洛娃没在女犯人中间。

可是在那一边，在所有女犯后面还立着另外一个女人。聂赫留朵夫马上悟到那个女人才是卡秋莎，他的心怦怦地蹦着，气都有点喘不过来。决定性的时刻来了。他走到铁丝网周围，认清了是她，她站在蓝眼睛的费多霞背后，微笑地听她讲话。她不像前天那样穿着囚袍，而是穿着一件绑紧腰带的白上衣，高挺着胸膛。头巾里露着微曲的黑发，和那天在法庭上相似。

“立刻就可以讲清楚了，”他暗自想。“我到底怎么招呼她呢？或许她会自己过来吧？”

结果她并没有走过来。她还在等克拉拉，压根没有想到此男人是要来找她的。

“您想要找谁？”那个在铁丝网当中踱步的女监狱官员走到聂赫留朵夫面前问。

“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好不容易才说了出来。

“玛丝洛娃，有人找你！”女看守大喊一声。

四十三

玛丝洛娃转过身来，将头抬起，挺直胸脯，脸上显现的依然是聂赫留朵夫所熟悉的那种温顺的神情。她走近铁丝网，夹在两个女犯人中间，带着惊奇而询问的表情打量着聂赫留朵夫，却没有认出他来。

但是，她由衣衫上发觉他是个富人，就妩媚地一笑。

“您是来找我吗？”她问，用她那张眼睛斜挂着的笑盈盈的脸靠近铁栅栏。

“我想找……”聂赫留朵夫不知道如何用“您”还是应该是“你”，但马上决定使用“您”。他讲话的嗓音并不比以前高。“我想看到您……我……”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废话了。”他旁边那守着破烂的男人喊道。“你究竟拿过没有？”

“我对你说，他快要死了，你还说什么？”对面有一个人嚷道。

玛丝洛娃听不清聂赫留朵夫所说的话，但他说话时脸上的表情使她忽然间想起了他。可是她不敢确信。她收起脸上的笑容，开始痛苦地皱起眉头。

“我看不见您在说什么。”她喊道，眯缝起眼睛，额头上的皱纹越来越深。

“我来……”

“是的，我要做我活该做的事，我要认罪。”聂赫留朵夫心里想。他一想到这儿，眼泪就夺眶而出，喉咙也哽住了，他用双手抓住铁栅栏，无法说下去，努力控制住情绪，免得哭出声音来。

“跟你讲：你去管不相关的事干什么……”这边有人喊道。

“老天爷有眼，我连了解也不了解。”那边有个女犯人拼命说。

玛丝洛娃见到聂赫留朵夫激动的样子，认出他是谁。

“您似乎是……但我不敢认。”玛丝洛娃眼睛不瞅他，叫道。她那张涨红的脸马上变得灰灰的了。

“我是来请求你的宽恕的。”他大声而呆板地喊道，像是在背书似的。

喊完这句话后，他觉得很羞惭，朝四下里瞅了一眼。但他立即暗自思忖，如果他觉得羞惭，那倒更好，因为这种耻辱本来就应该由他承担。于是他继续大声说道：

“我求你宽恕我，我非常对不起你……”他又喊道。

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用斜睨的眼光紧紧盯着他。

他无法继续说下去，就离开了铁丝网。他心里不停翻腾，好不容易才忍住自己没有放声大哭。

把聂赫留朵夫带到女监来的监狱副典狱长，明显对他产生了兴趣，此刻走了过来。他发现聂赫留朵夫没有站在铁栅栏旁边，就询问他为什么不与他要探望的女犯人讲话。聂赫留朵夫擦了擦鼻子，提起精神，尽量让自己平和下来，回答说：

“中间有铁栅栏不能说话，什么也无法听见。”

副典狱长好好思索了一下。

“嗯，那么，把她带到这里来一下也好。”

“马丽雅·卡尔洛夫娜！”他回头对女看守说。“请把玛丝洛娃领到栅栏外边来。”

仅仅过了一分钟，玛丝洛娃从偏门走出来，她轻轻地走到聂赫留朵夫面前站好，皱着眉头看了他几眼。她乌黑的鬈发也和前天一样一圈圈飘在额上，苍白但有点微肿的脸显得有点病态，但十分可爱，十分平静，她那双闪闪发光的斜睨的眼睛在厚厚的眼皮下看起来特别有神。

“你们可以在这儿谈话。”副狱长说完退到了一旁。

聂赫留朵夫向靠墙的一条长凳走过去。

玛丝洛娃带着疑问而惊讶的神情瞧了副狱长一眼，耸了耸肩，跟着聂赫留朵夫走到长凳那儿，理了理裙子，挨着他坐下。

“我很清楚，祈求您的饶恕是困难的，”聂赫留朵夫开口说，可是止住了，觉得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不过，过去的事既已经无法挽回，那么我现在一定要尽我所能去做。请您告诉我……”

“您是怎么找着我的？”她没有回答他问的话，反问。她那双斜睨的眼睛似乎瞧着他，又似乎并没有瞧着他。

“主啊！求你帮助我，教我应该如何去做！”聂赫留朵夫自语道，瞧着她那张已经变形不再漂亮的脸。

“前天您受审讯的时候，”他说，“我在做陪审员。您认出我了吗？”

“不，没有认出。我没有工夫认人。而且我压根没有看。”玛丝洛娃说。

“后来有过一个孩子吗？”聂赫留朵夫问她，感到脸发热了。

“感谢上帝，他马上就死了！”她愤愤地简单回答，别过眼睛不看她。

“真的？是怎么死的？”

“我那时自己病了，差一点也死了。”玛丝洛娃讲，没有抬起头来。

“姑妈她们为什么会放您走的？”

“有谁还会把一个怀孩子的女帮手留在家中呢？她们一发现这事，马上把我赶出家门。说这些有什么用呀！我什么全不记得，全部都忘了。那事已经完了。”

“不，事情并没完。我不能丢开那件事不管。即使到了现在，我也要赎我的罪。”

“您没有什么可赎的罪。事情已经发生了，也已经过去了。”她说。然后，使他万分意外的，她忽然微微笑着看他一眼，那是一种媚笑，一种令人嫌恶的、可怜的、妩媚的笑。

玛丝洛娃做梦也没有料到会再见到他，何况在此时此地。正因为此，他一出现就让她感到震动，迫使她回想起她不愿去回忆的事。起初她依稀回忆起那个爱着她又为她所爱的漂亮青年为她打开的充满新奇的感情和思想的美妙世界。可是她又回忆起他那令人无法理解的残酷，回忆起接连的屈辱和苦难，而这些都是在那种令人心醉的幸福之后接踵而来，并且是从那里面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她感到痛苦。但她又无力理解这些事，于是她现在也像往常那样，竭力把这些回忆驱除掉，用她堕落生活的那种特殊的迷雾遮掩住这些回忆，现在她就这样做。起初她把现在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人同自己以前爱过的那个漂亮青年联系起来，但接着她觉得这样做太痛苦，就又将这两个人区分开来。如今，对她而言，这个装束整齐、脸色红润、胡子上洒着香水的老爷，已经不再是她所爱过的聂赫留朵夫，而只是这样的一类人：这类人在需要时会玩弄她这样的人，而她这样的人因利益需要也尽量利用他们。也正因为此，她才对他媚笑。她稍稍沉思了一会儿，考虑应如何利用他。

“那事很快就完了。”她说。“现在我被判决，马上去服苦役了。”

她讲出这句悲愤的话，嘴唇都在发抖了。

“我了解，我深信，您是无罪的。”聂赫留朵夫说。

“我本来没有罪。我又不是骗子，又不是土匪。这儿大家全都说，一切全在于律师，”

她接着说。“大家全部说应该上诉，但是得花许多钱……”

“当然，肯定要上诉。”聂赫留朵夫说。“我早已找过律师了。”

“不要舍不得花钱，最好请一个好律师。”她说。

“我肯定尽我全力去办这件事。”

接着是一段时间的沉默。

她又和刚才那样格格一笑。

“我想求求您……给点钱，如果您答应的话。不多……仅仅十个卢布就可以。”她突然说。

“好，好。”聂赫留朵夫十分为难地说，伸手去拿钱包。

她马上看了一眼正在屋里坐着的副典狱长。

“在他的面前不要给，等他离开了才给，要不然肯定被他拿走的。”

副典狱长一转过身，聂赫留朵夫马上掏出钱包，但他还没有把十卢布钞票拿给她，副典狱长马上转过身来，脸面对着他们。他只好把钞票团在手心里。

“要知道，这是一个已经丧失生命的女人了。”他暗想，瞧着那张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妩媚可爱纯洁而现在有点臃肿的脸，以及从那对斜睨的射出的妩媚的亮光的黑眼睛。她的眼睛正紧盯着副典狱长和聂赫留朵夫捏紧钞票的手。在那一刹那他内心动摇了。

昨晚同他说过话的诱惑者，现在又诱惑聂赫留朵夫的灵魂了，依然教导他不去考虑他应该如何做，而应考虑他所做的会造成什么后果，如何做才切合自己的利益。

“你已经无法挽救这个女人了，”那个声音说，“这样你就好比把一块石头吊在你的脖子上，而这块石头会把你活活淹死，阻碍你去做另外对他人有益的事。你倒不如把钱给她，把你身边的现钱全部给她，然后跟她分手，从此一刀两断，这样或许会更好。”他情不自禁地暗自思虑。

但是他立刻感到现在，就在目前，他的灵魂里正在发生一种极其重大的变化。此刻他的内心生活似乎搁在一个晃荡着的天平上，无论在哪边稍稍加一点力量，天平就会倾斜。于是他使出他的力量，向昨天他感到存在于他灵魂里的上帝求助，上帝果然立即在他的灵魂里响应了他。他下定决心现在要向她说出所有的话。

“卡秋莎！我来找你是要求你宽恕我，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你是否已经宽恕了我，或者你以后能不能宽恕我。”他说，忽然将“您”改为“你”了。

她并没认真听他说什么，却一会儿瞧瞧他的手，一会儿瞧瞧副典狱长。等到副典狱长转过身去，她就连忙朝他伸出一只手，抓住那张钞票，将它塞在腰带里。

“您说的话挺古怪的。”她微笑着说，但依他看来，这是一种鄙夷的冷笑。

聂赫留朵夫感觉到她内心有一种敌视他但保护着她自己的东西，使她乐于保持她现在的样子，不让他去触动她的内心。

但是，说也奇怪，这种东西非但没有使他离开她，反而变成另外特殊的崭新的力量，促使他去和她接近。聂赫留朵夫感到他应该在精神上唤醒她，这当然非常困难，但正由于困难就尤其吸引他。他此时对她的这种感情，是从前所不曾有过的，对于其他人也不曾有过，当中不带一点私心。他对她一无所求，只求求她不要像现在这样，只求她能觉醒，能恢复她的本来面目。

“卡秋莎，你怎么说这种话？你一定明白，我是相信你的，我想起当时你在达达巴诺沃的模样……”

“为何提那些陈年旧事？”她冷冷地说。

“我想起这些事是为了要改正错误，以弥补我的罪，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开了个头，其实 还想说他想同她结为夫妻，但接触到她的目光，感到其中有一种很原始的、拒人于千里之外 的东西，他不敢再和她讲了。

此时，探监的人全都出去了。副典狱长来到聂赫留朵夫面前，提醒他探望的时间结束了。玛 丝洛娃站起来，温顺地等待别人把她带回牢房。

“后会有期，我还有许多话想对您讲。但是，您看，此刻没时间了。”聂赫留朵夫一边说着 一边伸出一只手。“我还会来的。”

“该说的话好像都已经说了……”

她伸出她的一只手，只是没有同他握手。

“但是，我要想办法找个可以谈话的地方下次同您见面，我有着十分重要的话想对您讲。”聂赫留朵夫说。

“那么，那您就来吧。”她说，挤出一一种想令男人喜欢的笑容。

“对我来说，您比我的姊妹还要亲。”聂赫留朵夫说。

“这话可真古怪。”她重复了一遍，摇着头，往铁丝网的另一边走去。

四十四

初次见面，聂赫留朵夫原本以为卡秋莎见了他，得知他将为她尽力去做一些事，听到他忏悔的话，就会又高兴又感动，并变成原来的卡秋莎。然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看出 卡秋莎已经不复存在，只有现在的玛丝洛娃了。这使得他既惊奇又害怕。

令他感到惊奇的是玛丝洛娃不但不以自己的身份感到耻辱(不是指她囚犯的身份，当囚犯 她是觉得丢脸的，而是特指她妓女的身份)，好像还觉得很满意，甚至感到自豪。但是话也得说回来，一个人站在那样的地位，也就只能这样。不管什么人，如果要生活，只能自信他的活动是必要的，有用的。因此，一个人，不管地位如何，他对人生只能具有这样的看法，使他觉得他的人生是重要的，有益的。

人们通常总以为盗贼、凶手、暗探、妓女必定承认自己的行业很卑微，并以此为羞辱。事实 却证明恰恰相反。大凡因为命运或者因为自身所犯的错沦到某种地位上的人，不管他们的地 位多么卑微低下，他们都总会对生活形成一种看法，认为他们的地位又正当又高尚。为 了维持他们的这种看法，他们总是本能地依附那些承认他们对生活所形成的观念，承认他们 对自己的生活地位所形成的观念的人。但如果盗贼炫耀他们的本事，妓女炫耀她们的淫荡， 凶手炫耀他们的残酷，我们往往会万分惊讶。而我们万分惊讶的原因，无非是由于那些人的 生活圈子和生活气氛局限在狭小的范围里，我们却处于局外罢了。但是，这与富翁炫耀他们 的财富，也就是他们的掠夺，军事长官炫耀他们的善战，也就是他们的屠杀，统治者炫耀他 们的威力，也就是他们的强暴，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们想不到这些人扭曲了生活意义，看不出他们为了给自己的职业辩护而不分好歹，这无 非由于他们的圈子比别人大，人数比较多，同时我们自己也生活在这个圈子里。

玛丝洛娃就是如此看待她的人生意义和她在世界上的职业的，她是个下等人，被判处服苦役，但是她也有她自己的世界观，同时凭这样的世界观她能孤芳自赏，甚至自命清高。

这个世界观就是：凡是男人，不管年老年轻，不管是中学生还是国王，不论受过教育

的 没有受过教育的，毫无例外，每个人都认为与富有魅力的女人上床才是人生最好的乐趣。所以，凡是男人，看起来都好像在为别的事奔波，实际都一味希望着做这种事而已。她是一个十分有魅力的女人，当然可以满足，但是也可以不满足他们压抑的欲望，因此她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少的人物。她过去的处境和现在的处境全都证实这种看法是对的。

这十年来，她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察觉并看出：所有的男人，从聂赫留朵夫和年老的警察 分局局长到监狱里的看守们，都需要她。对那些不需要她的男人，她却没有看见，也没有加以注意。因此，在她眼里，大千世界仅仅是一伙好色之徒的渊藪，他们从四面八方窥伺她，使尽其浑身的解数，例如暴力、欺骗、金钱、诡计等，极力去占有她。

玛丝洛娃对生活的理解就是这样的，根据这样的人生观她不仅不是一个渺小得不足挂齿的人，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玛丝洛娃把这样的人生观看得重于人世间的一切东西，于是她不能不重视它，因为她一旦改变自己的人生观，就丧失了因这种观点而产生的她生存的重要性。为了不失掉她生存的意义，她就本能地去依附那些对生活的观点与她相同的人。这样，当她察觉到聂赫留朵夫想将她引入另一个世界，当她预料到他引导她去的那个世界里，她会丧失自己的这种生活地位和这种生活地位所带给她的自尊和自信时，她就抵制他。也正因为如此，她才竭力避免回想她年龄不大时的那些事情及当初她同聂赫留朵夫的那种关系。她现在的世界观与这些记忆格格不入，因而这些记忆已不复存在于她的脑海，或者说她将这些记忆埋藏在一个什么地方，不去触动它，把它封存严紧，如同蜜蜂封存一窝螟虫那样，不留一点点缝隙，免得它们糟蹋蜜蜂的全部劳动成果。

所以，此时的聂赫留朵夫对她而言已不是她曾经用纯洁的爱情爱过的男人，而仅仅是一个有钱人。她可以理所当然地利用他，她与他只能保持她和所有男人那样的关系。

“当然，我没有能把重要的话说出来，”聂赫留朵夫与人群都往出口处走去时想，“我还没有告诉她我想同她结婚。当然没有说，但是我会这样做的。”

门口的两个监狱长又用手挨个拍着探监的人，数着，以免多放一个人出去，或者多把一个人关在牢里。这一次他们用手拍聂赫留朵夫的背部，聂赫留朵夫不仅没有生气，甚至根本没有感觉到。

四十五

聂赫留朵夫想痛改前非：退掉这座租宅，解散仆人，自己搬到旅店去住。可是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再三劝阻他，说没有任何理由在冬天以前改变生活方式，因为谁也不会夏天承租住宅，再说也必须有个住人和存放家具什物的地方。因此虽然聂赫留朵夫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像大学时代那样简朴，但他的全部努力却成了泡影。这所房子不但一切照旧，而且大家还开始紧张的工作。仆人把所有的毛料和皮子衣物全都拿到院子里来晾晒，挂得满院都是，不停地掸去上面的灰尘。扫院子的仆人，他的助手，厨娘，甚至连听差柯尔涅伊也参加了这个工作。他们首先搬出一些军服和一些谁也不曾用过的、奇怪的皮货，晾在绳子上，然后搬出地毯和家具。扫院子的仆人带着他的助手，卷起衣袖，露出肌肉发达的胳膊，很有节奏地用力敲打那些东西。樟脑味儿充溢着各个房间。聂赫留朵夫走过院子或者从窗子里往外看到这些多得吓人、而且毫无用处的东西时，常常暗暗惊讶，心想：“这些东西唯一的用处和目的，就在于给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柯尔涅伊、扫院子的仆人、他的助手和厨娘等提供一个活动筋骨的机会。”

“玛丝洛娃的事还没有结束，暂时不用改变生活方式，”聂赫留朵夫想道。“再说改变生活方式也实在是困难。等到她得到释放或者是被流放，我也要跟着她去，到那时候生活方

式也就自然的改变了。”

在阿纳托思律师约好的那一天，聂赫留朵夫乘着马车去看他。律师的私人住宅富丽堂皇，摆着大大的花盆，窗子上挂着美丽的窗帘。总之，排场十分庞大，表明主人一定是发了横财，因为这样大的排场只是暴发户才会有。聂赫留朵夫走进了这座房子，他在接待室里看见许多来访问的人，好像是在医生的候诊室那样，所有的人都没精打采地坐在几张桌子旁边，翻阅提供给他们排闷的画报，等待着律师的接见。律师的助手正坐在一张高大的斜面办公桌子旁边。他认出了聂赫留朵夫，就走过来招呼他，说他这就去报告律师。不过并没等律师的助手走到办公室门口，房门就开了，响亮而活泼的谈话声从里传了出来，一个中年男人正在同阿纳托思本人谈话，他身不高，体态丰满，脸色红润，留着浓密的唇髭，还穿着全新的衣服。两个人脸上都现出凡是刚办完有利可图而又不大正当的事情的人所常有的那种表情。

“老兄，您自己也有罪啊。”阿纳托思笑嘻嘻地说。

“我倒情愿进天堂，无奈罪孽深重，上天无门，”

“得了，得了，我们清楚得很。”

两人都不自然地笑起来。

“啊，是公爵，请进来，”阿纳托思看见了聂赫留朵夫，说道。他对刚走出的商人又点了一下头，就把聂赫留朵夫领进了他那间陈设庄重的办公室里。“请吸烟。”律师说着就在聂赫留朵夫对面坐了下，尽力忍住因刚才那件得意的买卖而带来的笑容。

“谢谢您，我是为了玛丝洛娃的案子而来的。”

“好，好，我们这就来看看。哼，那些财主们都是骗子！”他说。“您看没看到刚才那个家伙？他有一千二百万家产。可他还在说什么‘上天无门’。哼，只要能够从您身上弄到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他就是用牙也要把它咬到手中。”

“他说‘上天无门’，可是你却说什么‘二十五卢布的票票儿’。”这时候聂赫留朵夫暗自嘀咕，对于这个举止毫无顾忌的人产生一种难以克制的憎恶，他说话的口吻俨然他跟他聂赫留朵夫是同一个阵营，而那些来找他的委托诉讼的人和其他的人，却属于另外一个与他们截然不同的阵营。

“这个大混蛋，他简直要把我折磨死。我真想松一口气。”律师似乎在为他不急于谈正事进行辩白。“好，现在我们来谈谈您的案子……我已经把案卷仔细查阅了一遍，但正如屠格涅夫说的一样，‘不赞成它的内容’，也就是说那个差劲的律师太糟糕了，没有留下任何可上诉的理由。”

“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

“等一下。请你告诉他，”律师转过身来对进来的助手说道，“我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办；他认为可以，那就很好；如果他认为不行，那就算了。”

“但是他不同意。”

“哼，那样就算了。”律师说道。他的脸色立刻由快乐和善转变得阴郁愤怒了。

“有的人说，律师们都是白拿别人的钱的，”他恢复了原来的快乐神色，说道，“不久前有个破产的人受到诬告，我拯救了他。现在大家都纷纷找来找我，但是每办一个案子我都得花费不少心血。有一位作家讲，将自己身上的一块肉放在墨水里，这句话对我们同样适用。那好，现在就来谈谈您的事情，或者说，您有兴趣的那个事情吧，”他接着说，“情况很糟糕，没有充足的上诉理由，但是试一试还是可行的。您瞧，我写了这样的一个诉状。”

他拿起一张写满字的纸念起来，很快地跳过某些没有趣味的公文套头，着重强调其余的部分：

“谨呈刑事案上诉部，等等，等等。申诉事由，等等，等等。该案经某某决定，等等，等等，做出裁决，等等，等等，某某玛丝洛娃犯用毒药害死商人斯梅利科夫罪，依照刑法典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等等，判处该犯服苦役刑，等等。”

他停住嘴。很明显，尽管他处理这种事已经轻车熟路，可是依然对他自己的状子听得津津有味。

“这项判决的后果乃是诉讼程序上的严重违法和错误所造成的，”他继续念道，声调庄重有力，“因此理应撤消这项判决。第一，在开庭审讯时，刚开始宣读斯梅利科夫内脏检查报告，就被庭长制止。”这是第一点。

“但是，话说回来，是公诉人要求宣读的啊！”聂赫留朵夫不胜惊讶地说。

“那没有什么关系，辩护人也同样有理由要求宣读理由的。”

“但是，说实在的，宣读理由毫无必要。”

“可是这毕竟是个上诉的理由哇。还有：‘第一，玛丝洛娃的辩护人，’”律师接着念了下去，“‘在作发言时有意识地说明玛丝洛娃的品质。而关系到她堕落的内在原因，却被庭长所阻挠，原因是辩护人讲的这些话和案情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根据枢密院数次指示，在刑事的案件中，被告品质和精神面貌关系甚为重要，至少有利于制定罪责。’这是二。”他看了一眼聂赫留朵夫，说道。

“那家伙当时说得很糟糕，简直叫人摸不着头脑。”聂赫留朵夫感到更加惊奇，说。

“那小子很愚蠢，当然说不出来什么很有道理的话来，”阿纳托思笑着说，“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原因。好了，下面还有。‘第三，庭长在作总结时完全违背《刑事诉讼法》第八一条第一款，他没有向陪审员们作出解释，犯罪的概念是依据什么法律的因素组成的，也没有向他们解释，即使他们认定玛丝洛娃曾经对斯梅利科夫下毒事实确实这样，也无权依据她并非蓄意谋害而确认她有罪，因而也不能确定她犯有刑事罪，仅仅只是由于一种过错，一种大意，使商人出乎玛丝洛娃的预料死于非命’。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这一点我们自己也应该能够理解。这是我们的失误。”

“最后，第四，”律师接着念下去，“‘陪审员们答复法庭所提出的玛丝洛娃犯罪的问题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矛盾。玛丝洛娃被控蓄意毒死斯梅利科夫纯粹是出于图财的目的，由此可见她杀人的唯一动机就是谋财。可是陪审员们在答复中否认玛丝洛娃有劫夺钱财的目的，也否认她参与过盗窃贵重财物，这样就显而易见：他们原本就是要否认被告有蓄意毒杀的意图，引起误解的原因只是因为庭长的总结发言不完备，以致这一点陪审员们在答复中没有用适当的方式表明，所以，对陪审员们的这种答复，必须援引《刑事诉讼程序法》第八百十六和八百零八条，即庭长应当向陪审员们解释他们所犯的过错，退回答复，责成他们重新协商，并对被告犯罪问题表决做出新的答复。’”阿纳托思念到这里停住了。

“那么为什么庭长不这样做呢？”

“我也想知道这个原因呢。”阿纳托思笑嘻嘻地说。

“那么，枢密院会纠正这个错误吗？”

“这就要看到时候枢密院审理这个案子的，是哪些老废物了。”

“为什么叫老废物呢？”

“就是敬老院里的老废物哇。对，就是这么一事情。接下去是如此：‘这样的裁定使法庭无权判定玛丝洛娃刑事罪。对她应用《刑事诉讼法》第七七一条第三款，显然是严重损害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准则的。由于上述理由，谨呈请某某和某某依据《刑事诉讼法》中的第九九条、第九一条、第九一二条第二款和第九二八条等等，等等，收回原判，并把本案转交该法院另组法庭，重新进行审理。’就是如此。只要能做的，都已经做过了。但是恕我直言，成功的希望是很渺小的。但是话又说回来，重点在于枢密院中审理这个案件的是哪些人。要是是熟人，您可以去走走。”

“我得其中一些人。”

“那可是就得抓紧，要不然他们都出去医治痔疮，那就得等上三个月了……嗯，要是不能成功，还能够向皇上告状。这也要靠一些幕后活动。在这方面我也愿意为您出力，但是不是指幕后活动，是指写状纸。”

“感谢您，那么关于您的酬劳……”

“我的助手将会给您一份已经誊清的状态，他会告诉您情况的。”

“我还有一件事要向您讨教。检察官还给了我一张到监狱探望犯人的许可证，但是监狱官员向我说，如果在规定日期和地点以外想要探监，还得经省长特别批准。真的需要通过这个手续吗？”

“我想是这样的。不过既然现在省长不在，那就由副省长管事。可他是个完全的笨蛋，您如果找他那什么事也办不好的。”

“你是指马斯连尼科夫吗？”

“对。”

“我认识他。”聂赫留朵夫边说边站起来，准备向他告辞。

这时候，一个面黄肌瘦、生着狮子鼻、十分丑陋的矮小女人快步走进房间里来。她是律师的妻子。她对自己的丑陋明显毫不在乎，不仅着装得与众不同，十分稀奇——身上的衣服不是丝绒就是绸缎，色彩鹅黄和碧绿，——并且她那头很少的头发也卷过了。她高兴兴地跑进接待室。与她一起来的是一个大大个子男士，面色如土，满面春风，身着缎子翻领的礼服，系一根白领带。他是个作家，聂赫留朵夫认识他。

“阿纳托里，”她推门进来，说，“去我那儿吧。你看，谢苗·伊万诺维奇答应朗诵他的诗，你呢，也得念一下迦尔洵的作品。”

聂赫留朵夫刚想走掉，可这时律师的妻子贴近她丈夫的耳朵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又立刻朝他转过身来说。

“请原谅，公爵，我认识您，就不必再介绍了。请您务必光临我们的文学晨会。很有趣味的。阿纳托里的朗诵非常精彩。”

“您瞧，我的杂差真多！”阿纳托里说，微笑地摊开双臂，指一指他的妻子，似乎表明自己无法抗拒这样一个千娇百媚的女人。

聂赫留朵夫神情悒郁而严正，很客气地向律师的妻子道谢，说一些承蒙邀请，不胜荣幸，只因无暇奉陪，不得不谢绝的话，说完他就走进房外的接待室。

“这家伙装模做样！”律师的妻子等他走出去以后，评论道。

在接待室里，助手把一份已经抄好的状态交给聂赫留朵夫，当提及酬劳费时，就告知说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指定一千卢布，同时又解释说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原本不处理这类案件，这一回接受了完全是看在聂赫留朵夫公爵的面子。

“这个状子该如何签署，由谁出头？”聂赫留朵夫问道。

“可以让被告自身出面，但如果有困难，那么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也能接受她的嘱托，让他出面。”

“不，我得去一趟，叫她自己签上名。”聂赫留朵夫说，为有机会在预定日期之前看到玛丝洛娃而感到快乐。

四十六

监狱看守一到规定时间就在走廊里吹响哨子。铁锁和铁门叮 口 当 口 罗地响后，走廊门与牢房门便相继打开，光 脚板和棉 鞋 后跟发出啪哒啪哒与咯噔咯噔的声音。倒便桶的男犯在走廊里来回忙碌，搞得空气里满是恶 臭。

每个男犯和女犯都洗脸，穿衣服，然后到走廊上来点名，然后再去取开水冲茶。

这天喝茶的时候，各个牢房里都议论纷纷，气氛十分活跃，原来今天有两个男犯人要遭受 用树条抽打的刑罚。这两个男犯当中，一个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店员瓦西里耶夫；他出于 嫉妒，一时性起打死了他的情妇。因为他总是兴致勃勃，性情慷慨，牢房里的犯人们都很喜 欢他。他懂得法律，总是要求依法律办事。因为对监狱当局态度强硬，所以监狱当局不喜 欢他。三个星期以前，一个犯人由于把粪汁溅在一个看守的新制服上而遭到了看守的殴打。瓦西里耶夫为倒粪桶的犯人打抱不平，说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允许随意殴打犯人。那个看守就 说“我要叫你了解一下什么叫法律”，并对瓦西里耶夫破口大骂。瓦西里耶夫也回骂他。看 守想要揍他，可是手被瓦西里耶夫一把抓住，并被紧紧地捏了大约三分钟，最后瓦西里耶 夫拧着他的手叫他转过身去，把他推出房门。

看守告到上司那儿，典狱长就命令把瓦西里耶夫关进单身牢房。

单身牢房是一排阴暗的仓房，外面加了锁。这种牢房既黑又冷，没有床，也没有桌椅，关在 里面的人只能在不干净的泥地上坐着或躺着，任凭老鼠在身边或者身上来回奔跑，而那里 的老鼠又特别多特别胆大，因此在阴暗中连一块面包都没法保留。老鼠常常跟囚犯抢面 包吃，如果是囚犯纹丝不动，它们就会咬他们的身子。瓦西里耶夫不肯住单身牢房，说 他没有犯罪。几个看守强行把他拉去。他拼命反抗，有两个男犯帮他 从看守手里挣脱身子 。看守们都跑过来，其中有个名叫彼得罗夫的，以力气大闻名。犯人们打不过，全都被关 进单身牢房。省长马上得到报告，说出现了一件类似暴动的事件。监狱里接到一纸命令，命 令对两个主犯，瓦西里耶夫与流浪汉聂波姆尼亚西，均被树条鞭打三十下。

这条刑罚将在女监探望室里进行。

关于这事昨天晚上全体囚犯就都知道了，因此每个牢房里的犯人们便都纷纷议论着即将 进行 的处罚。

柯拉勃列娃、俏娘们、费多霞、玛丝洛娃坐在她们的墙角那边，个个脸色通红，精神抖 擞。因为她们刚喝过伏特加，现在玛丝洛娃老是买酒喝，而且颇为慷慨地请她的同伴们一 块儿喝 。这时候她们正喝着茶，也在谈论这件事。

“这件事也不是因为他胡闹！”柯拉勃列娃所说的他就是指瓦西里耶夫。她用结实的牙齿咬 下一小块一小块的糖。“他仅仅是为他的同伴抱不平罢了。再说，现在确实不兴打人 嘛。”

“据说，他这人挺不错的。”费多霞补充了一句。她坐在板床对面的木柴上，没戴头巾，

盘在头上的两条长辮露在外面，板床上放着一把茶壶。

“喏，应当把这件事跟他说一下才是，米哈依洛娃。”铁道看守人的妻子对玛丝洛娃说，这个“他”指的是聂赫留朵夫。

“我会跟他说的。他肯为我做任何事。”玛丝洛娃回答道，微笑着扬了扬头。

“可就是不清楚他何时来。据说立刻就要去揍他们了，”费多霞说。“可糟了！”她叹了一口气，又讲。

“我有一次是在乡公所看到一个庄稼汉被打。那一天我公公让我去找乡长，我刚到那里，抬头一瞧，他呀……”道口工就讲出一个特别长的故事来。

道口工故事进行到一半，楼上走廊里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把她打断了。

女人们镇静下来，细心听着。

“他们来抓人了，这些魔鬼。”俏娘们说道。“这下子能把他生生打死的。那些看守们可把他恨透了，因为他从来不肯向他们低头认错。”

楼上的响声又安静了。道口工接着讲她的故事，讲到他们在乡公所仓房里如何毒打那个庄稼汉，把她吓得魂不附体。俏娘们却说，谢格洛夫受过鞭子，可他一声不出。随后费多霞把茶具撤掉，柯拉勃列娃和道口工开始做针线活，玛丝洛娃却抱住双膝，坐在床铺上，觉到十分没意思。她刚想躺下睡觉，女看守就跑过来喊她，说有人探监，让她到办公室去。

“你一定把我们的事都告诉他。”当玛丝洛娃照着脱落了一半水银的镜子整理她的头巾时，老太婆梅尼绍娃对她说。“放火的不是我们，是那个坏蛋自己，有一个工人亲眼看见了，他不会昧着良心讲瞎话的。你告诉他，让他去找米特利。米特利会清清楚楚、原原本本地给他讲事情的经过的。要不然，这都是为何呀：我们无缘无故地被关在监狱里；那个坏蛋呢，霸占着人家的老婆，倒踏踏实实地坐在酒店里。”

“真是没有王法！”柯拉勃列娃气愤地说。

“我去讲，我肯定去对他讲。”玛丝洛娃说。“要不，再喝一些壮壮胆，”她挤挤眼睛，补充说。

柯拉勃列娃给她斟了半杯酒。玛丝洛娃一干而尽，抹抹嘴，高高兴兴地又说了一次“壮壮胆也好”，随后摇晃着头，跟着女看守沿走廊笑哈哈地走去。

四十七

聂赫留朵夫已经在监狱的门廊里等了很久。

他刚来到监狱里时，在大门外拉了拉门铃，然后给值班的看守看了看检察官所开的许可证。

“您要探望什么人？”

“探望女犯人玛丝洛娃。”

“现在不行，狱长正忙着。”

“他在办公室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他在这，在探监室里。”看守回答，聂赫留朵夫感到他的脸有点惊慌失措。

“难道今天不是探监的日期吗？”

“不，今天发生一件特别的事情。”他回答。

“如何才能看到他呢?”

“待会他出来，您自己对他讲吧。您先呆一会儿。”

这时候，穿一身丝绦亮闪闪的制服、脸庞光亮、小胡子上满是烟草味的司务长从旁门里走了 出来。他神情严厉地对那个看守说：

“你把人带到这儿来干什么?……把他领到办公室去……”

“我听说狱长就在这儿。”聂赫留朵夫说，不由得暗自疑惑为什么司务长的神情也惶惶不安。

这时候，里边的一扇门开了，走出来的是满头大汗、神态激昂的彼得罗夫。

“这回他就会记住了。”他转过身对着司务长说。

司务长默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彼得罗夫就安静下来，皱起眉头从后门走了出去。

“谁能记住?为何他们都这样惊慌失措?为何司务长向他使了个眼神?”聂赫留朵夫心里寻思着。

“不可以在这儿等，请您到办公室去吧。”司务长又对聂赫留朵夫讲。聂赫留朵夫正要出去，典狱长刚好从后门进来，神色比他的下属更加慌乱。他接连叹气，一瞧见聂赫留朵夫，就 转身对看守说：

“费陀托夫，把五号牢房的玛丝洛娃领到办公室去。”

“您请到这边来。”他对聂赫留朵夫讲。他们沿着阴暗的楼梯来到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只有一扇窗，摆着一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典狱长坐了下来。

“这工作真苦，真苦。”他向聂赫留朵夫讲，拿出一支很粗的香烟来。

“您看来很疲倦了。”聂赫留朵夫说。

“这整个工作已让我厌倦不堪。这种职务很难干的。我想减轻犯人的痛苦，结果却反而更糟。我真想离开这里。这个职务真是苦不堪言。”

聂赫留朵夫不明白到底是哪些事让典狱长觉得难办，不过他看出来今天狱长的心境确实特别灰心沮丧，引人怜悯。

“是的，我想这是很苦的，”他说。“可是您为什么担任这个职务呢?”

“我没有家业，却不得不养活一家人。”

“但是，要是您觉得苦……”

“哦，我可以跟您说，我确实在尽力为他们谋利益和减轻他们的痛苦。如果换成别人，根本就不会这样的。您知道，这种事谈何容易：这儿有两千多人呢，而且都是什么样的两千多人。我们应当懂得如何对付他们。他们也是人，也需要人的怜惜。但是，纵容他们也不行。”

狱长就讲起不久以前因有些男犯人打架而闹出的人命案。

就在这时，看守带着玛丝洛娃进来，将他的话中断了。

玛丝洛娃来到门口，还没有见到典狱长，聂赫留朵夫却瞅见她了。她脸色红润，精神焕发地跟着看守进来，摇头摆脑，不停地微笑着。她一见到典狱长，脸上呈现出惊惶的目光盯着他，但马上镇定下来，大胆而快乐地向聂赫留朵夫打招呼。

“您好!”她拉长声调说，脸上堆着微笑，用劲握了握他的手，这和上次大不相同。

“喏，我为您带来了状子，您来签个字。”聂赫留朵夫说，对她今日见到他时呈现出来

的那副活泼高兴模样，感到有点纳闷。“律师写了个状子，您签上名字，我们就把状子拿到彼得堡去。”

“可以，签个名字也行。干什么都可以。”她眯缝着一只眼睛，笑哈哈地说。

聂赫留朵夫从衣袋里拿出一张折拢的纸，来到桌子旁边。

“她可以在这儿签名吗？”聂赫留朵夫问狱长。

“来，你到这儿，坐下，”狱长说。“这是笔。你会写字吗？”

“我以前写过。”她说，笑盈盈地理了理她的裙裾和短上衣的袖子，挨着桌子坐下，伸出一只有力气的小手笨拙地捏住笔，笑起来，又望了望聂赫留朵夫。

他告诉她应签什么名字，应在什么地方签。

她拿着笔小心地在墨水里蘸一蘸，抖掉一滴墨水，写下自己的名字。

“不用写别的了？”她问，望了望聂赫留朵夫，又望了望狱长，然后想放下笔，先是把它插在墨水瓶里，然后又放在纸上。

“我要跟您说些话。”聂赫留朵夫拿过她手中的笔，讲。

“好，您讲吧。”她说，忽然好像是想起了什么心事或者想睡觉似的，面色变得谨慎了。

典狱长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两人。

四十八

领玛丝洛娃来的看守在离桌子较远的窗台上坐下。

对聂赫留朵夫而言，现在就到了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他一直不断地责备自己，认为应该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把主要的话告诉她，说出他要跟她结婚的打算。现在他已经拿定主意，这次一定要把这话对她讲出来。她坐在桌子的一边，聂赫留朵夫坐在她对面。房间里光线明亮，聂赫留朵夫头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清楚她的脸、她眼角和嘴边的细纹以及她浮肿的眼皮。他比从前更加怜惜她了。

他把臂肘放在桌上，身子靠近她。这样讲话就不至于让那个坐在窗台上、络腮胡子花白、脸型像犹太人的看守听见，而只让她一个人听得见。他说：

“如果这个状子不中用，那就去告御状。只要办得到的事，我们都要努力去办。”

“唉，如果那时候有个好律师辩护就好了……”她打断他的话说。“那个十足的蠢才是我的辩护人。他总是对我讲肉麻话。”她讲着笑了。“如果当初人家知道我和您认识，情形就会大相径庭了。但是现在呢？他们始终把人家都看做窃贼。”

“今天她真奇怪。”聂赫留朵夫暗自疑惑，刚要说出他心里的话，不料她又在他之前开了口。

“我有一件事要跟您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太婆，她为人非常厚道，您要知道，大家简直都吃惊，这样一个再好不过的老太婆，却平白无故地被关在这儿，还有她的儿子也一样。大家都很清楚他们没罪，可偏偏有人控告说他们放了一把火，这样他们就被关起来了。您要知道，她听说我认识您，”玛丝洛娃说着，把她的头扭来扭去，时不时地瞟他一眼，“她就说了：‘你跟他讲一声吧，’她说，‘让他把我的儿子叫出来，我的儿子会把事情原原本本

讲给他听。’他们姓梅尼绍娃。怎么样，您愿意帮忙吗？您要知道，她是个顶好的老太婆，一看上去就知她是被冤枉的。我的好人，您就帮她办一办吧。”她说，看了看他，低下眼睛轻轻一笑。

“行了，我来做，我首先去了解一下。”聂赫留朵夫说，对她的态度如此随和，越来越感到惊讶。“可是我自己有事要跟您商量一下。您还记得我上次对您讲的话吗？”他说。

“您讲了很多话。那次您讲了些什么呀？”玛丝洛娃一边说，一边不住地微笑，脑袋一忽儿转到这边，一忽儿转到那边。

“我讲过，我来是为了请求您的宽恕。”聂赫留朵夫说。

“嘿，还有必要吗？总是饶恕饶恕的，用不着来那一套……您最好还是……”

“我讲过我要赎我的罪过，”聂赫留朵夫接着说，“不光嘴上说说，我要做出实际行动来。我决定同您结婚。”

玛丝洛娃脸上马上现出害怕的神色。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呆滞了，既像在看他，又像不在看他。

“这到底是为什么？”她气愤地皱起眉头说。

“我认为在上帝面前我应该这样做。”

“怎么又跑出来了个上帝？您说的话全都不对劲。上帝？什么上帝？当初那个时候您怎么想不起上帝呢。”她说，张开了嘴，但没有继续。

直到现在聂赫留朵夫才闻到她嘴里喷出来的浓烈酒味，才明白她激动的原因。

“您安静一点，”他说。

“我根本不用安静一点。你以为我喝醉了吗？是的，我喝了酒，但我非常清楚我在说什么，”她忽然飞快地讲起来，满脸涨得通红，“我是苦役犯，是妓女……，您是老爷，是公爵，你没必要跟我打交道，惹得一身麻烦。你去找你那些公爵小姐吧，我的价值仅是一张十卢布的红钞票。”

“无论你说得多么尖刻，你都无法说出我心里是何种滋味，”聂赫留朵夫小声说着，浑身发抖，“你无法想象，我感到自己对你犯下了的罪有多大！……”

“‘我觉得犯了很大的罪……’”玛丝洛娃恶狠狠地学着他的话说。“当初你可没有觉察到，只不过硬给我一百卢布而已。看，这就是你给的价钱……”

“我懂，我懂，可现在我该如何办呢？”聂赫留朵夫说。“现在我决心再也不离开你了，”他重复说，“我说到一定要做到。”

“但我敢说，你肯定做不到！”玛丝洛娃说着，大声狂笑起来。

“卡秋莎！”聂赫留朵夫一边说，一边碰碰她的手。

“你给我滚开！我是名苦役犯，你身为公爵，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她扯着嗓子喊道，脸都气得变色了，从他的手中抽出手来。“你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玛丝洛娃接着说，迫不及待地一肚子怨恨都讲出来。“你今生拿我寻欢作乐，来生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不喜欢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嘴脸。滚，你给我滚！”她猛地站起来，嚷道。

看守来到他们面前。

“你扯什么！怎么能这样……”

“您就由她去吧。”聂赫留朵夫讲。

“让她别太放纵了。”看守讲。

“不，请您再待一下。”聂赫留朵夫讲。

于是看守又走到窗子那边去。

玛丝洛娃又坐了下来，低下眼睛，把她那双小手的手指头紧紧地交叉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站在那儿弯下腰凑近她，但不知所措。

“你不相信我。”他说。

“您说您要与我结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宁愿去上吊！我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仍旧要为你尽力。”

“哦，那是您的事，但我并不需要您出什么力。我对您说的是实话。”她说。“哎，那时候我怎么没有死掉哟？”她补充了一句，悲伤地哭了起来。

聂赫留朵夫说不出话：她一哭，他也流泪了。

玛丝洛娃抬起眼睛，瞧他一眼，似乎感到非常惊讶。她开始用头巾擦掉顺着脸颊淌下来的眼泪。

看守这时候又走过来，提醒他们说分手的时间到了。玛丝洛娃站起来。

“您现在很激动。如果可能，我明天再来。但我请您还是考虑一下吧。”聂赫留朵夫说。

她一声不吭，也不看他一眼，就跟着看守走了出去。

“嘿，姑娘，这下子你可要交好运了，”玛丝洛娃回到单身牢房里，柯拉勃列娃就对她讲，“看样子，他被你俘虏了。趁他来找你，你千万别错过时机。他能把你救出去的。阔人什么事都有方法。”

“这倒是不假的。”道口工用唱歌一般中听的声音说。“穷人成亲夜晚也短，有钱人想什么有什么，要如何办就准能做到。好姑娘，我们那块就有一个阔人，他呀……”

“如何，我的事情你讲了没有？”那个老婆子说。

玛丝洛娃并没有回答同伴们的话，在床铺上躺下来。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呆滞地望着墙根。她就这样一直躺到晚上。

她的内心展开了一种痛苦的活动。聂赫留朵夫对她所说的那番话，使她又进入了她受过的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她并不了解，而且对它充满痛恨，并已经从那里走了出来。现在她已经不能再如原先一样忘却一切，浑浑沌沌地生活下去，但要清醒明白地生活下去，又未免太痛苦。傍晚时分，她就又买了酒，与她的同伴们痛饮起来。

四十九

“唉，那件事真是罪孽深重，罪孽深重啊。”聂赫留朵夫走出监狱的时候暗自思虑着，直到现在他才充分了解自己犯下的全部罪恶。

如果不是他决心改过自新，他也不会发现自己罪过的深重。不仅这样，他也不会感到他害她害到什么程度。直到如今，这一切才全部暴露，让人触目惊心。直到如今，他才发现他如何摧残了这个女人的内心；他也才知道她遭到的伤害是多么大。从前聂赫留朵夫一直自鸣得意，对自己的忏悔都很得意，如今他感觉这一切简直太可怕了。他觉得再也不能把她抛弃不管，但却无法想象他们之间将会有怎样的结果。

聂赫留朵夫刚来到大门口，就有一个满戴奖章的看守表现出一副使人厌烦的媚相，悄无声息地递给他一封信。

“这是一个女人写给阁下您的一封信……”他一边说，一边将信交给聂赫留朵夫。

“是哪个女人？”

“您看完信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女犯人，是政治犯。我在她们那儿管事。所以我将这事托付给我。虽然做这种事犯禁，但我出于人道主义的感情……”看守神情不太自然。

聂赫留朵夫暗暗纳闷，不明白一个专管政治犯的看守居然敢就在监狱里，几乎当着众人的面传递信件。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人既是看守，又是暗探。他接过那封信，一边朝监狱外走去，一边把信看了一遍。信用铅笔写成，字迹豪放，没有用旧体字母。信上写道：

“据说您对一个罪犯很关心，经常到监狱里来看望她。我非常想同您见一次面。请您请求当局准许您同我会面。假如得到批准，我能向您提供很多有关那个您代她说情的人和我们小组的重要情况，衷心感谢您的薇拉。”

薇拉原来是诺夫哥罗德省一个偏僻农村的女教师。有一次聂赫留朵夫和同伴到那里猎熊。这个女教师曾请求聂赫留朵夫给她一些钱，帮她进高等学校读书。聂赫留朵夫给了她钱，以后就把她忘却了。如今才知道她是个政治犯，关在牢房里。她也许在监狱里听说了他的事，所以愿意代他效劳。那时所有事情都很简单了，现在却变得那么复杂难懂。聂赫留朵夫动情而愉快地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他与薇拉认识的过程。那是谢肉节以前的事，在一个离铁路线六十俄里的偏远乡村。那次打猎很应手，打死了两头熊。他们正在就餐，准备动身回家。此时，他们借宿的农家主人过来说，本地教堂助祭的女儿来了，请求见一见聂赫留朵夫公爵。

“她长得漂亮吗？”有人问。

“喂，别胡说！”聂赫留朵夫严肃地说，从饭桌旁站起来，用餐巾擦干净嘴巴，心里暗暗吃惊，不知道助祭的女儿找他有什么事。他走进主人的私室。

那个房间里有一个头戴毡帽，身穿皮袄的姑娘，面容消瘦，脖子上露着青筋，长得并不漂亮，不过她的眼睛和眼睛上面扬起的两道眉毛却相当美丽。

“喏，薇拉·叶夫列莫夫娜，你自己跟他谈吧，”年迈的女主人说，“他就是公爵。我走了。”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呀？”聂赫留朵夫说。

“我……我……您瞧，您有许多钱，可钱被您花在了没意思的事上，花在狩猎上，这我知道。”那个姑娘很羞涩地说，“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我成为一个对人类有用的人，但是我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

她的一双眼睛诚挚而和善，脸上的神色又果断又羞怯，非常感人。聂赫留朵夫不由自主地设身处地地想着——他有这样的习性，——马上懂得她的心情，很可怜她。

“但是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我是个教师，想进高等学校读书，但是进不去。不过不是学校不让进，学校是让我进的，而是要交钱。您借我一些钱，待我将来毕业了偿还您。我想，有钱人打猎，还跟庄稼人喝酒，这些都无益社会。他们为什么不做点好事呢？我只要八十卢布就可以了。您要是不高兴，那就算了。”她生气地说。

“恰恰相反，我非常感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马上去拿来。”聂赫留朵夫说。

他走到外面的门道上，碰见他的一个同伴正在偷听他们讲话。他没有理睬同伴的取笑，从自己的钱夹里取出钱来，然后交给了她。

“您千万别道谢。其实该道谢的应该是我。”

此刻聂赫留朵夫想起这件事的经过，心情十分愉快。他很高兴地想起当年有一个军官想把这件事编成下流的笑料，他就几乎跟他争吵起来，又想起他的另一个朋友赞成他，他就因此与他交情更深，还想起那次既顺手又快活的打猎，以及夜间回到火车站他的舒畅的心境。双套马的雪橇一辆挨着一辆，排成一长串，在树林间的窄路上悄无声息地飞驰。一些枞树夹杂在道路两边参差不齐的树木间，枝头积雪累累。黑地里，一道红光一闪，有人点燃了一支纸烟，香气扑鼻。打熊的猎人奥西普从这个雪橇跑到那个雪橇上，白雪没及他的膝头。他一边打点东西，一边讲麋鹿现在在深深的雪地上怎样走来走去，啃白杨树的树皮。他还讲起熊现在在树木茂密的地方的洞穴里怎样睡觉，洞口冒出温暖的热气。

聂赫留朵夫想到这些，想到自己当年体魄强壮，无忧无虑，多么快乐。他鼓起胸膛，深深地呼吸着湿凉的空气。树梢上的积雪被马鞭弄了下来，掉在他脸上。他觉得周身暖和，面上凉快，心中没有忧愁，没有后悔，没有害怕，也没有奢望。那时是多么愉快呀！现在呢？我的上帝，现在一切都是多么难受，多么举步维艰哪！……

薇拉明显是个革命者，她因革命行动而坐牢。应该看看她，尤其是因为她答应替他出主意，来改变玛丝洛娃的情况。

五十

第二天清晨，聂赫留朵夫想想昨天的各种事情，心中不由得感到恐惧。

但是，虽然他心里害怕，他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信心，一定要把已经开了头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怀着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他走出家门，坐上马车去找马斯连尼科夫，希望得到他的批准，使他能够到监狱探望玛丝洛娃，以及办理玛丝洛娃要他办的梅尼绍娃母子的事。另外他还想请求准许他去看望薇拉，她可能对玛丝洛娃有益处。

聂赫留朵夫在军队服役的时候就结识了巴斯连尼科夫。巴斯连尼科夫那时任军队司库，尽职尽责，奉公守法，除了军队和皇室之外，也不关心天下任何事，也不想知道任何事。聂赫留朵夫发觉，他如今已当上行政长官，他所管辖的已经不是一个团，却是一个省和省政府。他娶了一个不但有钱而且泼辣的妻子，那女人强迫他脱离军队，改任文官。

她一会儿嘲笑他，一会儿又像对听话的小猫小狗那样爱抚他。聂赫留朵夫去年冬天曾到他们家去过一回，但他觉得这对夫妻十分无聊，之后再也没拜访过。

马斯连尼科夫一看见聂赫留朵夫来了，就笑逐颜开。如同当年担任军职时一样，他的脸依然又红又胖，体格依然肥硕高大，装束依然考究整齐。当初他总是穿一身干干净净的最时新的军装或者制服，把胸脯和肩膀裹得紧紧的；现在他穿的是最时新的文职服装，他那饱满的身体和挺起的宽胸脯仍被裹得紧紧的。今天他穿着一身文官制服。尽管他们年纪有一些悬殊（马斯连尼科夫近四十岁了），他们还是很亲热的用“你”相称。

“啊，你来了，真是太谢谢了。去我太太那儿吧。我现在正好有十分钟空闲，一会儿要去开会。我的长官出门了。省里的大事情现在我在管。”他说着，露出难以掩饰的得意神色。

“我有件事找你。”

“什么事啊？”巴斯连尼科夫好像一下子警觉起来，用惊慌而又有点严厉的语调说。

“我很关心监狱里的一个人(巴斯连尼科夫一听到‘监狱’两个字，脸色变得更严肃了)，我很想看望，但不能在普通探监室里，必须在办公室里，而且不限于既定的日子，要多看望几次。听说这事要由你决定。”

“没问题，老弟，我愿随时为您效力，”马斯连尼科夫说完，用手拍了拍聂赫留朵夫的膝盖，似乎表示自己很平易近人，“这事我可以办，但你也很清楚，我不过是个临时皇帝而已。”

“那你能为我开一张好让我可以与她见面的证明吗？”

“你要探望一个女人？”

“没错。”

“她是怎么坐牢的呢？”

“毒死人命罪。但她是被错判的，她没有罪。”

“对啊，这就是所谓的公平的审判制度了，ils n'en font point d'autres。”他说，不知为何讲起法语来。“我知道你不会赞成我的见解，可是，没办法，c'est mon opinion bien arrêtée。”他补充道，发表了他一年来在顽固的保守派报纸上所读到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文章里的某种见解。“我知道你是自由派。”

“我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属于自由派还是什么别的派。”聂赫留朵夫微笑着说。他时常暗暗惊讶：为什么人们老是把他归到一个什么派里去，而且还总说他是自由派，这不过是因为他主张在审讯的时候，先要听完人家所说的话罢了，他主张所有的人在法庭面前一律平等，主张在通常情况下不应当虐待和拷打人，尤其是对那些还没有定罪的人。“我并不知道自己是 不是自由派。我只知道当前的审判制度比以前的好，不管它仍然是多么的糟糕。”

“那么你请的律师是谁呢？”

“阿纳托思。”

“哎呀，阿纳托思！”马斯连尼科夫的眉头皱了起来，想起去年他在法庭上做证的时候，这个阿纳托思曾态度恭敬地盘问他，一连捉弄他半个钟头，惹得庭上的人们哈哈大笑。“我劝你还是不要跟他打交道的好。阿纳托思 est un homme taré。”

“我还有一事相托，”聂赫留朵夫没有回答他的话，继续说，“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一个原先当教员的姑娘。她非常可怜，现在也关在监狱里，希望跟我见面。你能不能再给我开一个条子，好让我去看看她？”

马斯连尼科夫略微侧着头，思虑着。

“她是个政治犯，对吗？”

“不错，听说是个政治犯。”

“不瞒你说，只要是政治犯，只能与他们的家属会面，不过我可以为你开一张特殊通行证，哪儿都可以使用。我知道你是不能随意滥用的。你关注的那个女人名字叫什么？……薇拉？她长得漂亮吗？”

“长得很难看。”

巴斯连尼科夫轻轻地摇摇头，来到桌子前面，在一张印有头衔的信纸上写道：“允许来 人聂赫留朵夫公爵在监狱办公室探望在押小市民玛丝洛娃及医士薇拉，请配合。”他写完信，又潦草签了名。

“你将会看见那边的纪律是个什么情形。那边的纪律很难维持，因为关押的人太多，特别是政治犯太多，但我还是对他们严加管教。我热爱这工作。你将会看见他们在那边生活得很好，大家都非常满意，不过就是要善于应付他们。前几天出现过一次麻烦，有人抵抗命令。如果是别人就会把它作为暴动来看待，很多人就会遭殃。但我们这里处理得很不错。一方面必须关心他们，另一方面又必须对他们严加管教，”他讲着，从衬衫的浆得笔直、扣着金钮扣的白袖子里伸出一只既白又胖的拳头，手指上戴着绿松石戒指，“必须做到恩威并施。”

“嗯，这些我确实不清楚，”聂赫留朵夫说，“我到那里去过两次，感到难受极了。”

“我实话告诉你，你必须跟巴赛克伯爵夫人会一次面，”巴斯连尼科夫谈得起劲，接着说，“她把所有心血都用在这项工作上。她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亏得她，让我不客气地说一句，也亏得我，这儿才面貌一新，扫除了以前各种可怕的现象，他们在那边的确过得很好。是的，你会看到的。至于阿纳托思，我与他没有私交，但从我的社会地位来说，我与他走的可不是一条道，但他确实是个坏蛋，他在法庭上竟然说得出那样的话语来，竟然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好，谢谢你。”聂赫留朵夫说着，接过那张通行证，没有听完就向他昔日的同事告别了。

“那你不去我太太那儿了？”

“不了，请原谅，现在我没有功夫。”

“嗯，说真的，她不会原谅我的，”马斯连尼科夫说，把老同事送到楼梯的第一个平台上。每逢他送客人到这里停住，就说明这个客人对他而言不是头等重要而是二等重要的人物，他把聂赫留朵夫就归在二等重要的人物里。“不，请你还是去一趟吧，即使只去一分钟也是好的啊。”

可是聂赫留朵夫坚持他原来的主意。当听差和门房跑到跟前，递给他大衣和手杖，推开有警察在外边把守的大门的时候，他就推辞说现在确实没有时间。

“好，那么星期四请你必须来。她每到星期四招待客人。我去通知她！”站在楼梯上的巴斯连尼科夫，向他大声说。

五十一

从巴斯连尼科夫家出来，聂赫留朵夫乘车来到监狱，向他熟知的典狱长家里走去。

如同上次一样，他又听见了那架质料低劣的钢琴的声音，不过这一回弹的不是狂想曲，而是克莱曼蒂的练习曲，也弹得依然异常有力、清楚、急速。走来开门的还是那个侍女，眼睛上依然包扎着纱布，回答说上尉在家，把聂赫留朵夫领到一个小客厅里，客厅里摆着一张长沙发，一张桌子和一盏大灯，那盏灯由一块用毛线织成的小方巾垫着，粉红色的灯罩已经有半边烧焦了。神色疲倦又阴郁的狱长走进客厅里来。

“请问有什么指教？”他一面讲，一面扣上制服中间的钮扣。

“我刚去找了副省长，这是探监许可证。”聂赫留朵夫把证件递给他，说。“我想瞧瞧玛丝洛娃。”

“玛尔科娃？”因为琴声很清晰，典狱长反问道。

“玛丝洛娃。”

“哦，这里有的！哦，这里有的！”

典狱长站起身来，来到门口，从那里传来克莱曼蒂练习曲的优美乐段。

“玛露霞，你稍稍停一会儿行吧，”他说，他流露的语气俨然这种音乐声成了他生活里的苦事，“什么都听不见了。”

音乐声中止了。一种不痛快的脚步声从那边传来，有个什么人朝房间里瞟了一下。

狱长仿佛因为钢琴不响了而松了一口气似的，点上一支味道很淡的粗纸烟，并恭敬地给聂赫留朵夫上了一支。但聂赫留朵夫谢绝了。

“我现在很想见一见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今天不方便会客，”狱长说。

“为什么？”

“没关系，这得怨您自己不好，”典狱长微笑着说。“公爵，您别把钱直接交给她。要是您愿意，可以交给我。她的钱仍是归她的。您昨天肯定给了她钱，她就买到了酒——这个坏习性她怎么也改不掉，——今天她喝得烂醉，醉得要酒疯了。”

“是真的吗？”

“是的，我只好采用严厉手段：把她挪到另一间牢房里。这女人原来倒挺老实。您以后再别送她钱了。他们那些人就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清晰地回忆起昨天的情况，心里又感到恐怖。

“那么，可以见见政治犯薇拉吗？”聂赫留朵夫沉吟了一下，问道。

“哦，这倒不难。”狱长说。“嗯，你来干什么？”他叫道。这时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正走进房门来，直奔她父亲的跟前，头却歪着，眼睛一直盯着聂赫留朵夫。“哦，你要摔了。”狱长瞧着小姑娘眼睛不看地，脚底下绊着地毯，往自己这边跑，不由得笑着说。

“那么，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去了。”

“行，去吧。”狱长抱起那个还盯着聂赫留朵夫的小姑娘说，然后站起来，温柔地把小姑娘放下地，走进前室。

典狱长拿过眼睛包着纱布的佣人递给他的大衣，还没等穿好，就走出门。克莱曼蒂练习曲的优美乐段声又清晰地响了起来。

“她本来在音乐学院里学琴，但是那边的教学方法不适合她。她这人倒是有才华的，”典狱长一面下楼，一面说，“她还想到音乐会上演奏呢。”

典狱长陪着聂赫留朵夫来到监狱门口。典狱长一靠近边门，那门就马上开了。看守们均把手举到帽沿上，目送典狱长走过去。四个留着阴阳头的人抬着很满的便桶，在前室里看见他们。那几个人一看到典狱长，都缩缩身子。中间一个身体弯得特别低，阴森森地皱起眉梢，一双乌黑的眼睛闪闪发光。

“是的，有才能总是不能埋没的，应该培养，但是您要知道在一个小宅子里练琴，那是惹人苦恼的。”狱长接着谈，毫不搭理那些犯人。他往前走，步子非常疲乏，同聂赫留朵夫一起走进聚会室。

“您想探望什么人？”狱长问。

“薇拉。”

“她关在塔楼里，您得稍等一下。”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么，趁这个时候我可以去看一看犯人梅尼绍娃母子吗？他们被控犯了纵火罪。”

“他关在第二十一号牢房。行，可以把他们叫到这儿来。”

“我能够去梅尼绍娃的牢房看他吗？”

“在聚会室里见面不是更清静一点？”

“但，我认为到牢房去更有趣味。”

“您居然认为这种事有趣味！”

正在这时，衣着整齐的副典狱长从侧门走出来。

“好，您把公爵领到第二十一号牢房。梅尼绍娃牢房，”典狱长向副典狱长说，“之后把公爵领到办公室。我去把她叫来。她的名字叫什么？”

“薇拉。”聂赫留朵夫说。

副典狱长是个年青军官，头发浅黄，小胡子上擦过香油，周身散发出花露水的香味。

“请吧，”他谦虚地对聂赫留朵夫说，“您对我们这里有兴趣吗？”

“是的，我对此人也有兴趣。听说她落到这里是确实冤枉的。”

副典狱长耸了耸肩膀。

“很正确，这样的事是有的，”他不屑一顾地说，很有礼貌地让客人走在前头，来到宽敞而发臭的走廊里。“可是有时他们也会说谎。请。”

牢房门均没有上锁。有几个男罪犯呆在走廊里。副典狱长向看守们点点头，眼睛瞧着犯人。那些犯人，有的身体贴着墙，跑回牢房里，有的双手贴在裤缝，像士兵一样目送长官走过去。副典狱长领着聂赫留朵夫走过走廊，把他带到由铁门隔离开的左边一条走廊里。

这条走廊比刚才那条走廊更窄小更阴暗，而且更臭。走廊两旁的牢门都上着锁。牢门上有一个直径约半俄寸、俗称小“眼”的小洞。走廊上除了一个满脸皱纹、神色郁闷的老看守外，一个人也没有。

“梅尼绍娃在哪个牢房？”副狱长问。

“左边第八个牢房。”

五十二

“我可以从“眼”里看看里面吗？”聂赫留朵夫问。

“请吧，”副典狱长微笑地说，马上就向看守问了些什么。聂赫留朵夫靠近一个小洞往里瞧：牢房里有一个高个子青年人，只穿一身衬衣裤，留有一小撮黑胡子，在快速地来回走。他一听见门外的响声，抬头瞅了瞅，皱起眉头，又接着来回走。

聂赫留朵夫从另一个小洞往里看，他的眼睛恰好遇到一只从里面向外望出来的害怕的大眼睛，他急忙避开。

他将眼睛对着第三个小洞，瞧见一个个子矮小的男人蜷着身体躺在床上睡觉，用一件囚衣蒙住那蜷缩的身体和脑袋。第四个牢房里坐着的男人，脸膛宽阔，面色苍白，两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头低垂着。他听见外面的脚步声，就抬起了头。一种万念俱灰的绝望神色弥布在他的整个脸上，特别是那对大眼睛里。显而易见，他无意弄清楚到底是谁到他的牢房来看他。同样显而易见，不论谁来看他，他都不指望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聂赫留朵夫心里不由得一阵害怕，就不再看别的牢房，朝梅尼绍娃的第二十一号牢房径直走去。看守打开铁锁，推开牢门。一个脖子细长、筋强力壮的青年男子站在一张小床旁，他生着一对

和善的圆眼睛，留着一把稀疏的小胡子，看到有人进来，连忙神色惊恐地穿上长囚衣。最让聂赫留朵夫心动的是他那对和善的圆眼睛，带着疑问和惊恐的神情先是瞧瞧他，又瞧瞧看守，再瞧瞧副狱长，然后又回过头来看着他。

“喏，这位先生要知道你的案情。”

“非常感谢。”

“是的，有人为我讲了您的案情，”聂赫留朵夫走进牢房里，站在安有铁栅的肮脏窗子旁，说，“非常想听您自己说一说。”

梅尼绍娃也来到窗前，马上讲起他的事情来。他先是害怕似地看看副典狱长，然后胆子渐渐大起来。待到副典狱长走出牢房，去走廊里去告诉什么事，他就毫无顾忌了。从话语和姿势上看，讲这个故事的人是一个非常淳朴善良的农村青年。可是在监狱里听一个身穿罪服的犯人亲自讲述，聂赫留朵夫感到特别不对劲。聂赫留朵夫一面听，一面打量着铺着草席的低矮床铺、钉有粗铁棚的窗子、涂抹得一塌糊涂的又湿又脏的墙壁，和这个身穿囚鞋囚服、受尽折磨着的人，他那难受的神色和身体，心中觉得越来越不好受。他不敢相信，这个非常善良的人所讲的事情是正确的。他想到一个人无缘无故被抓起来，强给套上囚服，锁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就因为有人要随意加以欺辱，他禁不住感到内心害怕。不过，想到如果这个相貌善良的人所讲的事情只是欺骗和伪造，他就感到更加害怕。事情是这样的：在他结婚后不长时间，一位酒店老板就抢了他的妻子。他哪都去申诉告状。但是酒店老板买通了地方官，官方就一直保护他。

有一次他将妻子强行拉回来，第二天她又逃跑了。于是他上门去要回他的妻子。酒店老板说她不在，但他走进去的时候，明明看见她在那儿，酒店老板命令他出去，他不走。酒店老板就带领雇工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酒店老板的院子起火了。于是他和他的母亲就被指控放火了，事实上根本不是他干的，起火的时候他正在他的教父家里。

“你真的没有放火吗？”

“老爷，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一定是那个坏蛋他自己放的火。听说，他刚刚给他的房子上过火险。他们口口声声说我和我的母亲去过他家，威胁过他。这话也不错，那一次我实在沉不住气了，确实骂过他。但讲到放火，我确实从不曾干过呀。再说起火的时候，我也不在那儿。但他存心诬蔑硬说起火那天我和我的老母亲都在场。他贪图保险费，自己放火，却将罪名栽在我们身上。”

“真有这样的事情吗？”

“老爷，我可以面对着上帝的面说一句，这都是千真万确的。您就当作是我的亲爹吧！”他说着就要跪下去。聂赫留朵夫费劲力气才把他拦住。“您把我解救出去吧，不然太冤枉了，我会不行的，”他接着说。

梅尼绍娃的脸突然哆嗦起来，他哭了。然后他卷起囚袍袖子，用脏乎乎的衬衫袖子抹抹眼睛。

“你们说完了吗？”副典狱长问。

“说完了。那么您不要灰心丧气，我们一定努力想主意。”聂赫留朵夫说完，走出牢房。梅尼绍娃还站在门口，所以看守关上牢门时，牢门刚好撞在他身上。看守锁门的时机，梅尼绍娃就从门上的小洞向外张望。

聂赫留朵夫沿着宽阔的长廊走回去(那正是吃午饭的时间，牢房都开门了)。长廊里挤满了人，他们都穿着浅黄色长囚衣和又肥又短的裤子，脚上趿着棉鞋，贪婪地瞅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经过他们身边时，心里不禁生出种种奇怪的感情：

既同情这些关押的人，又对那些拘捕他们的人感到害怕和惶惑，又因为自己对这些人冷眼旁观而羞耻。

在一个走廊里，一个人穿着棉鞋啪哒啪哒地跑过。他快速跑进牢房，跟着就有几个人从牢房跑出来，挡住聂赫留朵夫，向他鞠躬致敬。

“老爷，我不知道您贵姓，但是求您费心，您帮我们把事解决解决吧。”

“我不是长官，我什么也不知道。”

“那也没关系。您跟任何一个长官说一声就是，”一个愤慨的声音说，“我们没有犯一点罪，却无端在这儿受了一个多月的苦。”

“什么?这怎么可能?”聂赫留朵夫问。

“您看，就这样把我们关在牢里。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坐了一个月的牢。”

“是的，这是迫不得已，”副典狱长说，“他们被捕是因为没有身份证，本来应该把他们送到原籍，但是那里的监狱受了火灾，省政府来与我们联系，让我们别把他们送回去。您看，别的各省的人都已遣送回去了，就剩下他们这些人。”

“什么，就是因为这些事吗?”聂赫留朵夫在门口站住了，问道。

这群人大约有四十名左右，全都身穿长囚衣，团团围住聂赫留朵夫和副狱长。有几个人抢着说话。副狱长制止道：

“一个一个地说。”

一个大约五十岁、身量很高、相貌端正的农民走出人群。他向聂赫留朵夫解释道，他们原本是被送回家去的，现在却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关在监狱里。事实上他们有身份证，只是过期大约两个礼拜了。身份证过期的事年年都有，也从没有人遭到过什么处分，可是现在他们却象罪犯一样在这儿关了一个多月。

“我们均是泥瓦工，来自同一个作坊。听说省里的监狱烧毁了。但这又不能怨我们。看在上帝面子上，您做做好事吧!”

聂赫留朵夫听着，但根本没听清那个面容端正的老者在讲些什么，因为他始终注视着只有很多条腿的深灰色大虱子，如何在那个泥瓦工的络腮胡子缝里爬行着。

“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就因为这些事吗?”聂赫留朵夫问副典狱长。

“不错，这是上司们的疏漏，他们应该被送回家乡才对。”副典狱长说。

副狱长的话刚讲完，又有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也穿着一件长囚衣，模样古怪地撇着嘴，开始讲述他们无缘无故在监狱受折磨。

“我们连狗都不如……”他开口说。

“行了，行了，甭废话。闭上你的臭嘴，否则，你知道……”

“知道什么?”那个矮小的人气急败坏地大叫着，“难道我们有什么罪吗?”

“住口!”长官吆喝一声。矮小的人真的住了口。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聂赫留朵夫从牢房里走出来，暗暗地问自己。那些从牢门里往外看的犯人和迎面走来的犯人的成百双眼睛紧紧地盯住他，使他觉得自己仿佛在穿过一个棒阵似的。

“莫非确实把几乎没犯罪的人关起来了？”聂赫留朵夫与副狱长一同走出长廊，说。

“试问有什么方法？但是有很多话他们是胡诌的。按他们说来，根本谁也没有罪。”副典狱长说。

“但是，刚才那些人根本没犯什么罪。”

“那些人，就算是如此吧。但是老百姓都学坏了，非严加管教不行。有些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可不好管理呢。你看，昨天就有两个人非处理不行。”

“怎么处理？”聂赫留朵夫问。

“根据条款用树条鞭打……”

“体罚不是已经终止了吗？”

“篡夺公权的人不在其中。对他们仍是可以进行体罚的。”

聂赫留朵夫记起昨天他在前室等候的时候看见的种种情形，这才明白当时恰在实施那次惩罚。于是心头又立即涌上那种好奇痛苦又困惑的混杂心情。他精神上感到一阵恶心，而且这种恶心逐渐过渡到生理上去，虽然这种感觉从前也有过，但远不如现在这般强烈。

急忙走出长廊，往办公室走去，他不再听副狱长讲话，也不再往四下里看。狱长在长廊上一直忙别的事，忘了派人去把薇拉找来。直到看见聂赫留朵夫走了进来，才想起他答应过他的事。

“我这就叫人去把

薇拉找来，您等一会儿。”他说。

五十四

办公室共有两屋，第一间里有一个炉膛突出、灰泥剥落的火炉子与两扇肮脏的窗户。屋角立着一个专为犯人量身高的黑尺，另一个角挂着一幅很大的基督像——只要是捉弄人的地方总有这种画像，好像是对基督教义的嘲笑。几名看守立在这个房子里。

另一个房间里有二十来个男人和女人靠墙坐着，或两个一对，或几个一伙地低声谈着什么。窗子旁边摆着一张写字台。

狱长坐在写字台旁，请聂赫留朵夫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于是聂赫留朵夫坐下来，开始打量那些呆在房间里的人。

开始吸引他关注的是一个面容漂亮的穿短上衣的青年。那青年站在一个上了岁数的黑眼眉女人跟前，语调激动地对她讲着话，比着手势。附近坐着一位戴蓝眼镜的老者，拉着一个穿囚衣的青年女人的手，纹丝不动地听她对他说着什么。一个读实科中学的男孩，脸上表现出害怕的脸色，眼睛始终看着那个老人。离他们较远的角落里坐着一对情人。女的是个年纪很轻的姑娘，留着浅黄短头发，相貌可爱，容光焕发，身着一件时髦连衣裙。男的是个好看的男子，长得眉清目秀，头发鬈曲，身着橡胶短上装。他们两个坐在屋角窃窃私语，明显陶醉在爱情里。最接近写字台的附近坐着一个头发斑白的女人，身着黑色连衣裙，好像是个母亲。她圆睁一双眼睛，看着一位也穿橡胶上衣、面貌像得痼病的青年。她想讲话，但是嗓子被哽住，刚张口，就讲不下去。那青年手中拿着一张纸，明显不知道该

如何办，只生气地不停折叠和揉揉那张纸。他们身边坐着一个身材匀称、面色红润的姑娘，模样好看，但长着一双大眼睛，身着灰色连衣裙，外罩一件短披肩。她坐在伤心哭泣的妈妈旁边，柔柔地抚摸着她的肩膀。这位姑娘身上什么都美：那白晰的大手，卷曲的短发，轮廓清楚的鼻子和嘴唇。但是她脸上最美丽动人的却是那双忠诚善良像绵羊一样的深褐色眼睛。聂赫留朵夫一过去，她那双漂亮的眼睛马上从母亲的脸上挪开，与他的目光相遇。但她马上又转过头去，对母亲讲了些什么。离那对情人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肤色黝黑的男士。他头发蓬乱，面色阴沉，正生气地对一个像是阉割派教徒的没长胡子的探监人讲话。聂赫留朵夫坐在典狱长附近，有着强烈的好奇心琢磨着周围的事物。突然有个留光头的男孩来到他跟前，尖声问他说：

“您在等谁？”

听到这句问话，聂赫留朵夫不由吃了一惊，他瞧了一眼男孩，看到他的面容严肃而伶俐，眼睛活泼而专注，也就用严肃的态度回答他说，他在等一个他认得的女人。

“那么，她是您的妹妹吗？”男孩问。

“不，不是我的妹妹。”聂赫留朵夫惊讶地回答说，“你是跟谁一块儿到这儿来的？”他问那个男孩。

“我跟妈妈一块儿来的，她是政治犯。”男孩骄傲地说。

“玛丽亚·

巴夫洛夫娜，把柯里亚带走。”狱长说，大概认为聂赫留朵夫同那个男孩讲话有违规章。

玛丽亚·巴夫洛夫娜就是勾起聂赫留朵夫关注的那位长有一双绵羊眼睛的漂亮姑娘。她站起来，挺起高高的身体，迈着像男士一样有力的步伐，向聂赫留朵夫与男孩走去。

“他问了您哪些话？您是哪位呀？”她问聂赫留朵夫，开心地笑着，信赖地瞧着他的眼睛，面色那么坦然，看来她肯定对谁都是这样厚道、亲切和友好。“他任何事都想清楚。”她说，对着男孩流露出和蔼可爱的微笑，看见她的微笑，男孩与聂赫留朵夫也均忍不住笑了。

“不错，他问我来找哪位。”

“玛丽亚·巴夫洛夫娜，不许跟外面人讲话，这点您是清楚的。”典狱长说。

“可以，可以。”她说，用她白晰的大手握着一只盯住他看的柯里亚的小手，走到那个得病青年的母亲附近。

“这是哪家的孩子啊？”聂赫留朵夫问典狱长。

“他是一个女政治犯在牢里生下的孩子。”狱长用颇为得意的口吻说道，俨然表示他的机构是多么难能可贵。

“真的吗？”

“是的，不久他就要跟随他的母亲流放西伯利亚了。”

“那么，这个姑娘呢？”

“我不能回答您问的话了，”狱长耸了耸肩膀说着，“好，薇拉来了。”

五十五

薇拉·叶夫列莫夫娜脚步蹒跚地从后门走进来，她个儿不高，长得很瘦，头发剪得很短，肤色发黄，睁着一双善良的大眼睛。

“哦，您来了，非常谢谢。”她握着聂赫留朵夫的手说，“您仍记着我吗？我们坐下来说吧。”

“没料到您如今会弄成这个地步。”

“嘿，我倒觉得不错！不错，好得不能再好了。”薇拉说，仍旧圆睁着她那双和善的大眼睛，害怕地看着聂赫留朵夫，而且转动她那从又脏又破的短袄领子里显出来的青筋暴露的黄瘦脖子。

聂赫留朵夫问她是如何落到现在这步田地的，她就兴致勃勃地讲起她自己的工作。她的话里夹着例如宣传、解体、团体、小组、基层小组等许许多多的外来词。毫无疑问，她完全相信谁都懂这些外来语，事实上聂赫留朵夫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她不停地向他讲解自己所从事的活动，显然充分相信他很想知道，而且也乐于知道民意党的全部秘密。可是聂赫留朵夫却不胜惊讶地瞧着她可怜的细脖子，瞧着她稀疏又蓬乱的头发，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讲。他认为她可怜，然而他对薇拉的可怜与对农民梅尼绍娃的可怜完全不同，梅尼绍娃关在臭烘烘的监狱里，却并没有犯任何罪。她被关在监狱里，显然是因为她头脑里那些糊涂的思想。

她明显地自认为是个女英雄，为了他们革命的成功不惜放弃生命。事实上她不一定能说清楚他们的事业到底是怎么一件事，事业成功又是怎么一件事。

薇拉要向聂赫留朵夫说的是这样一件事：她有一位女朋友，叫舒斯托娃，听她说并不是她们的小组，五个月前和她一块被捕，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原因为从她家里找出别人让她保管的书籍和文件。薇拉认为舒斯托娃被拘捕，她要负一定责任，因而要求交际广泛的聂赫留朵夫想法把她解放出狱。薇拉请求聂赫留朵夫的第二件事，是想法帮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的古尔凯维奇讲个情，允许他与父亲见一回面，而且弄到必须的参考书，让她可以在牢中进行学术研究。

聂赫留朵夫答应薇拉，如果以后他到彼得堡，一定尽量去办。

薇拉·叶夫列莫夫娜谈她自己的事时说，她从助产学校毕业后，就同民意党人接近，与他们一起工作。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他们写传单，在各处工厂里做宣传工作，可是后来一个重要的人物被捕了，所有的文件被查获，于是开始捉拿其余的人。

“因此我也被捕了，现在就要流放出去了……”她讲完她的事说，“不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倒挺好，自己感觉还挺庄严肃穆。”她说着，微微一笑，那种笑容比较凄惨。

聂赫留朵夫问起那个生着一对羔羊般眼睛的姑娘。

薇拉讲她是一名将军的女儿，已参加了革命党，她犯狱是因为主动担负枪杀宪兵的罪名。她住在一个不被人知道的寓所里，那里有一台印刷机。一天晚上警察与宪兵来搜查，呆在里面的人决心自卫。他们灭了灯，开始销毁罪证。警察和宪兵闯进来，革命党中有人开了火，一名宪兵受了致命伤。宪兵队询问是谁开枪，她就讲是她开的，事实上她一辈子也没有拿过手枪，就连蜘蛛也没有打死过一只。罪名就这样确定下来了。现在她就要去服苦役。

“的确是个利他主义的好人……”聂赫留朵夫称赞说。

薇拉要讲的第三件事是有关玛丝洛娃的。她知道牢里的所有事情，也清楚玛丝洛娃的家

世和 聂赫留朵夫与她的事情。她告诉聂赫留朵夫为她讲情，把她转移到政治犯牢房，或者最低让 她到医院里去做一名护士。如今医院里病人非常多，特别需要护士。聂赫留朵夫感谢她的好 心，并讲要努力照她的话去办。

五十六

他们的谈话被站起身的狱长打断了，他宣布说探监的时间已到，必须分手了。聂赫留朵夫站 起来，向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告别，往门口走去，又在门口站住，瞧了瞧房间里的情形。

“诸位先生，时候到了，到时候了。”狱长说，时而站起来，时而又坐下去。

典狱长的命令只是让屋里的犯人和探监的人愈加紧张，他们均不想分开。有的人站起来，仍 还是讲个不休。有些仍然坐着讲话。有人在那边告别，哭泣。那个得痼病的青年与他妈 妈的 见面特别叫人感动。他始终摆弄着那张纸，但面色越来越气愤。他努力压抑感情，省 得受 他母亲感情的渲染。他妈妈一听说马上分手，就爬在他臂膀上，放声大哭，不停地吸 着鼻子。那个长有一对绵羊眼睛的女子——聂赫留朵夫忍不住注意着她——站在痛哭的妈 妈旁边， 安慰着她。那位戴蓝眼镜的老者，握住女儿的手站着，一边听她说话，一边接连 点头。

那一对相亲相爱的恋人站起来，执手默默相望。

“瞧，只有那两个人才高高兴兴的。”一个穿着短上衣的青年男子站在聂赫留朵夫身旁， 也 像他那样打量着分别的人们，指了指那对相爱的人说。

这对情人——穿橡胶上装的青年和浅黄头发、面貌可爱的女士——发现聂赫留朵夫和那 位 年轻人在瞧他们，就手牵着手，拉直胳膊，身体向后仰，一边笑，一边跳起舞来。

“今天晚上他们在这儿，在牢房中结婚，随后她和他一块到西伯利亚去。”那个青年说。

“他是何许人也？”

“是名苦役犯。就让他们俩高兴高兴吧，不然在这儿听着那些声音实在太伤心了。”穿 短 上装的年轻人一面听着得痼病青年的母亲的痛哭，一面又说。

“诸位先生！劳驾，劳驾！你们别逼我采取严厉的措施，”狱长。把这些话反反复复地讲 了好 几遍。“请吧，快点，请吧！”他的声调衰弱而迟疑。“这是怎么回事啊？探监时间早到 了。 要知道这样可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说了。”他有气无力地重复着，一忽儿点上他 的 马 里兰纸烟，一忽儿又把它掐掉。

很明显，那些允许人们损害另一些人而又使他们觉得不必为此负责的理由，无论多么巧 妙和 古老，多么司空见惯，狱长仍旧不能不感到自己也是造成这个房间里的各种痛苦的罪 魁祸首 之一。他的心情显得非常难过和沉重。

最终，犯人和探监的人都走散：犯人向里走；探监的人往外道门走。男士们，包括穿橡 胶 上装的，得痼病的与皮肤黝黑、头发散乱的，都走了；玛丽亚·巴夫洛夫娜领着在牢里 降生 的男孩也走了。

看望的人也均走了。戴蓝眼镜的老者挪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去，聂赫留朵夫也随着他出去。

“是的，这里的情形真怪，”那个善谈的年轻人和聂赫留朵夫一同下楼时说，好像他的话头刚被中断，这时继续说下去，“还得感谢上尉，他的确是个好心人，不死按规章制度。让大家说一说，心中也好痛快些。”

“难道在其他的监狱里不能如此探监吗？”

“哼！那根本不行。不仅一个一个地得分开见面，而且还得隔着铁丝网谈话呢。”

聂赫留朵夫同这个自称姓梅登采夫的、健谈的青年一边交谈，一边走进前室，这时候狱长脸色疲倦地走到了他跟前。

“那么，如果您想同玛丝洛娃见面，您就明天来吧。”他说，很明显他有意对聂赫留朵夫表示殷勤。

“很好，谢谢。”聂赫留朵夫说完，急忙走出去了。

梅尼绍娃没有犯罪而受牢狱之苦，这种事是可怕的，但他肉体上承受的痛苦的可怕倒在其次，更可怕的是他眼见人们那么平白无故而残忍地折磨他的时候，他内心必然产生困惑，以及对善和对上帝的不信任。一点罪也没有的那一百多个人，仅仅因为身份证上的几个字不对头，就得忍辱含垢，受尽苦难。这种事是可怕的。那些麻木不仁的看守竭力折磨他们的弟兄，却相信自己在做一件又重大又正确的事。这种事也是可怕的。

但是，聂赫留朵夫觉得最害怕的仍是那个年纪很大、心地和善的典狱长，他必须拆散人家的母子与父女，且他们都是亲骨肉，就与他和他的孩子一样。

“这到底是为何呀？”聂赫留朵夫问着自己，此时精神上感到非常恶心，又开始发展成为身体上的恶心。他每次来监狱都有同样的感受，但问题的答案始终没有寻到。

五十七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来找律师，把梅尼绍娃母子的案情讲给他，请求他代他们辩护。

律师听完他的介绍，就说他要亲自查一查案卷，又说事情如果真象聂赫留朵夫所说的那样，而那是非常可能的，他自愿承担辩护工作而不收分文的报酬。聂赫留朵夫又顺便提及那一百三十个人由于误会而关押在监狱里的事，问他这件事该由谁承担责任。律师沉默不语，很明显他想做一个准确的回答。

“谁的过错？谁的也不是。”他很果断地说。“您去找检察官，他会说这是省长的过错。您去找省长，他会说这是检察官的过错。一句话，谁都没有什么过错。”

“我马上去找巴斯连尼科夫，向他讲去。”

“哼，这不管用。”律师笑哈哈地反对说。“那个人，是个……他不是你的亲戚或者朋友吧？……他呀，我不留情面讲一句，是个蠢才，又是个狡猾的畜生。”

聂赫留朵夫想起巴斯连尼科夫说过律师的坏话，就一直没讲话，并向他告了别，乘车去找巴斯连尼科夫。

聂赫留朵夫有两件事请求巴斯连尼科夫：一件是把玛丝洛娃调进医院去，一件是帮助那一百三十名罪犯由于身份证过期而坐牢的事。去跟一个他看不起的人求情，显然很难堪，但要达到目标，这是唯一的方法，他必须硬着头皮去干。

聂赫留朵夫乘马车来到马斯连尼科夫的家门前，看见门廊附近停着好几辆马车，有四轮轻便马车，有带弹簧的四轮马车，有双座的四轮马车等等，他这才记起今天恰好是马斯连尼科夫太太的会客日，而且马斯连尼科夫曾邀请他来参加这个盛会。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到达这所房子跟前时，正好有一辆轿式马车停在门口，一个帽子上佩有帽徽的、身穿短披肩的听差搀着一个太太走下台阶准备上车，她稍稍提起衣裾，露出穿着黑袜子、套着浅口鞋的瘦脚踝。聂赫留朵夫在停下的马车当中认出了科尔卡金家的扯起了篷的四轮马车。那个头发花白、面色红润的马车夫恭敬而殷勤地摘掉帽子向他致意，他只有见到特别熟识的老爷才这样做。聂赫留朵夫正想向看门人打听一下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马斯连尼科夫)在什么地方，他本人就已经出现在铺着毡毯的楼梯上，将一个颇为显要的客人送下楼来，并且这一回不仅是送到梯台上就停住，而是一直送到楼底下来了。那个很显要的军界客人一边朝楼下走，一边用法语讲起为孤儿院募捐而即将举行的摸彩会，说这对各位太太小姐倒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工作：“这个工作既可以使她们玩乐一番，又可以募捐到钱。”

“让她们愉快愉快，愿上帝庇护她们……啊，聂赫留朵夫，您好！怎么好久没看到您了？”他跟聂赫留朵夫招呼说。“您去跟女主人道个好吧。科尔卡金一家都来了。还有纳丁·布克斯海夫登也来了。全市的美女都来了。”他一边说，一面稍稍耸起他那穿军装的肩膀，让那个身穿金绿制服的佣人帮他穿上军大衣。“再见，老兄！”他把巴斯连尼科夫的手又握了握。

“哦，上来吧，你来我真快乐！”巴斯连尼科夫高兴地讲，拉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虽然他身体肥胖，仍是快捷地把聂赫留朵夫领上楼去。

巴斯连尼科夫之所以特别高兴，是因为那位显要人物对他另眼相待。巴斯连尼科夫在近卫军团任职，原本就接近皇室，经常与皇亲国戚结交，但恶习却是越来越厉害，长官的每次垂青总使得巴斯连尼科夫心血来潮，得意忘形，好像一只驯服的小狗得到主人拍打、抚摩和搔耳朵一样。它能摇摇尾巴，卷成一团，扭摆身体，垂下耳朵，疯子似地乱转圈子。巴斯连尼科夫这时正处在这种状态。他本来没有看到聂赫留朵夫面上严肃的脸色，没有听他在讲些什么，就强行把他拉到客厅里，聂赫留朵夫没法推辞，只得随着他去。

“以后再谈正事吧。凡是你的吩咐，我一率照办。”马斯连尼科夫陪着聂赫留朵夫穿过大厅说。“去向将军夫人通报一声，说聂赫留朵夫公爵来了。”他边走边吩咐一个听差。那个听差就抢到他们的前头，一路小跑去通报。“Vous n'avez qu'à ordonner, 不过你务必要去见一见我的妻子。上次我没有带你去见她，就已经挨了一顿骂了。”

等到他们走进客厅，听差已经通报过了。自称为将军夫人的副省长夫人安娜·拉戈仁斯基耶夫娜，笑容满面地向聂赫留朵夫点头。此刻她正夹在长沙发四周那许多帽子和脑袋中间。客厅的另一头放着一张摆有茶具的桌子，几个太太坐在桌旁，身旁站立着几个军界的和文职的男人。男男女女的嘈杂说话声不停地传过来。

“Enfin! 您怎么不愿意跟我们来往啊？我们在哪方面得罪您了！”

安娜·拉戈仁斯基耶夫娜这样招呼来客，分明表示她跟聂赫留朵夫的关系极其亲密，事实上这种亲密从不曾有过。

“你们认识吗？认识吗？这位是别利亚夫斯卡娅太太，这位是切尔诺夫。请您坐得近一点。”

“米西，venez donc à notre table. Ou vous apportera votre thé……还有您……”她对正在跟米西谈话的军官说，显然已忘记了他的名字，“请到这边来。公爵，您要茶吗？”

“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说什么也不同意！她的确不爱他嘛。”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她只喜欢油煎包子。”

“您总是说没意思的笑话。”另一位头戴高帽、身穿绸缎、浑身珠光宝气的太太微笑着说。

“太漂亮了，这种华夫饼干，又薄又脆。您再给我们一些。”

“什么，您快走了吗？”

“今天是最后一日了。所以我们特地跑来。”

“春光太美啦，如今去乡下真是再好不过了！”

米西戴着帽子，身上那件深色条纹连衣裙紧裹着她那纤细的腰肢，没有一点折痕，仿佛她天生下来就穿着这种衣裳，看起来十分美丽。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脸腾地一下就红了。

“我还以为您早就走了呢。”她对他说。

“差一点走了，”聂赫留朵夫说，“由于有事耽误了。我来这儿也是有事情。”

“您去探望一下妈妈吧，她特别想见见您呢。”她嘴里这么说，心里知道这是在撒谎，并且他也懂得这一层，所以她的脸涨得更红了。

“恐怕没有时间了，”聂赫留朵夫回答道，脸色阴沉，极力装作没有看见她脸红。

米西生气地皱起眉头，耸了耸肩膀，轻身去应酬一个风度优雅的军官。军官接过她手里的空茶杯，气势雄赳赳地送到另一张桌上去，他身上的军刀不住碰到圈椅。

“您也该为孤儿院捐点钱才对。”

“我并没有推托，可是我打算把我的慷慨全部都留到摸彩会上去施展。到那时我可就要大显身手了。”

“哦，那您可要记住！”接着传来了一阵极不自然的笑声。

这个会客日十分圆满，安娜·拉戈仁斯基耶夫娜万分高兴。

“米卡对我说过，您在忙监狱里的事。我很了解这一点。”她对聂赫留朵夫说，她以米卡称呼她的胖丈夫马斯连尼科夫。“米卡可能有一些别的缺点，但您是知道的，他的心地非常善良。所有那些可怜的囚犯都似乎是他的儿女一样。他一向就以这种态度对待他们。Il est d'un ne bonté...”

她停住口，想不出用什么更合适的字眼来形容她那个下命令鞭打犯人的丈夫的善良。然后她转过身去，笑咪咪地招呼一个刚走进来的、满脸皱纹的、扎着淡紫色花结的年迈的老太婆。

为了避免失礼，聂赫留朵夫说了一些应该说的客套话，而且这番客套话说得确实毫无内容，然后站起身，往马斯连尼科夫跟前走过去。

“劳驾，你可以听我说几句话吗？”

“哦，当然是这样！你有什么要求办的事啊？我们还是到这儿来吧。”

于是他们走进一个装潢典雅的日本风格的小书房，在窗边静坐下来。

五十八

“嗯，那你来吧，我随时听候吩咐。对了，要抽一根香烟吗？等一会儿吧，我们最好别把这地方弄扫兴了。”马斯连尼科夫刚说着就拿来了一个精致的烟灰碟。“嗯，你说吧，还能有什么事？”

“可是我有两件事恐怕要麻烦你。”

“原来是这样。”

马斯连尼科夫的脸色变得抑郁不乐，阴沉无精神了。刚才他象一条被主人搔着耳背的狗一样兴奋不已，现在那种兴奋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客厅里传来了人们的谈话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Jamais, jamais je ne croirais.” 客厅里另一头有个男人在讲一件什么事，不断提及“La comtesse Voronzoff 和 Victor Apraksine”。从第三个方向传来的只是一片喧闹的谈笑声。马斯连尼科夫一面注意听客厅里发生的种种情形，一面听聂赫留朵夫讲话。

“我又为那个女人来找你。”聂赫留朵夫说。

“哦，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被冤枉定罪的女人。”

“我恳求你把她安排到这里的医院里去生活。我听说，允许这么办。”

巴斯连尼科夫马上抿紧下嘴唇，假装考虑起来。

“恐怕不可以，”他回答，“倒是，我去同他们再商讨一下，明天给你答复。”

“我倒听说那里病人很多，需要许多护士。”

“可以，可以。无论如何，我都会给你答复的。”

“那么，让你麻烦了，”聂赫留朵夫说。

客厅里不时传来一阵阵的哄笑声，听上去似乎不像是装出来的。

肯定地说“这是维克多在作祟，”巴斯连尼科夫大笑着说，“每当他兴致盎然时候，说话总是喜欢风趣一些。”

“还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说，“监狱里现在关着一百三十个人，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份证过期了，他们已经在那儿关了一个月。”

他就讲了讲他们被关押起来的原因。

“可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马斯连尼科夫问，他脸上忽然显现出焦虑和不满的神情。

“我本来是去看一个被告的，这班人却在走廊上围住我，要求我……”

“你去看哪一个被告？”

“是没有犯罪却遭到了控告的一个农民，我为他请了一个律师。但问题不在这儿。本来那些人没有犯任何罪，只因为身份证过期了就被关在监狱里，而且……”

“这是检察官的事，”马斯连尼科夫懊恼地打断聂赫留朵夫的话，“这就是所谓的敏捷公平的审判制度。副检察官原本有责任去视察监狱，查明关押在监的犯人的手续是否合法。现在他们却什么事也不干，只知道玩文特。”

“那你就别无他法了吗？”聂赫留朵夫一时想起律师曾说过，省长都要把责任往这些检察官身上推，于是老大不高兴地回答。

“不，别着急，我会处理的。我立刻就去解决。”

“可是对她来说，这样或许更糟。这个命苦的女人。”客厅里又传来一个女人尖刻的声音，她对才讲的那件事明显的没什么兴趣。

“或许那样更容易办，我把这个也拿走。”另一头不时地传来一个男人嬉笑的声音，以及一个女人的高声的大笑声，她似乎不愿意把一件什么莫名其妙的物品给他。

“不可以，不愿意，说什么也不能接受。”女人的声音说。

“好吧，那些事让我去解决吧，”巴斯连尼科夫随便地用戴绿松石戒指的白嫩的贵族的

手掐灭香烟，反复强调说，“现在我们到那伙儿太太们那儿去吧。”

“对了，我还有一件相托。”聂赫留朵夫本来没有走进客厅，就停在门口站住说道。“我曾听某人说昨天监狱里有人无端受了责罚。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吗？”

马斯连尼科夫脸红了。

“嘿，你要过问这件事？不行啊，老兄，不能再把你放进监狱里去，你简直什么事都要管嘛。走吧，我们走吧，Annette 在叫我们了。”说着，他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又露出刚才那位显要的军界客人赏识他后的兴奋的样子，不过这一次不是因为高兴，而是因为着急了。

聂赫留朵夫从他的臂弯里抽出胳膊，没有向任何人点头告别，也没有说任何话，脸色阴沉地穿过客厅和大厅，走进前厅里，经过那些赶紧跑过来的听差面前，走到街上。

“他怎么了？你怎么得罪他了？”Annette 问她的丈夫说。

“这是法国人的派头。”有人说。

“这哪儿是法国人的派头，这是苏鲁人的派头。”

“哦，不过他一向就是这个样子。”

有的人起身告辞，有的人刚刚光临，大家依然谈笑风生。这一班人干脆将聂赫留朵夫的这个插曲信手拈来，做为今天聚会的一个话题。

聂赫留朵夫拜访马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了他的信。马斯连尼科夫用优美、豪放的笔迹在一张光滑的、印有官衔的、打了火漆印的厚纸上写道，关于把玛丝洛娃调到医院里去的事，他已经给医师写过公函，他的愿望大概会实现。信的落款是“热爱你的老同事”，署名“马斯连尼科夫”字体却花哨粗大。

“笨蛋！”聂赫留朵夫禁不住发言道。从“同事”这两个字上尤其能感觉到巴斯连尼科夫可能对他有一种说什么是什么的味，表示他巴斯连尼科夫尽管担任着瞒天过海的无耻职位，仍自作多情地认为是个要人。他自称是他的同事，虽然不是有意奉承，至少也表明了并未因自己声名显赫而看不起他人。

五十九

很长时间里有一种迷信流传得很广，他们认为任何人都有原来的天性：有的善良，有的邪恶，有的机灵，有的愚昧，有的热情，有的对人冷淡，等等。

事实上人并非如此。我们谈论一个人，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蠢的时候，热情的时候多于冷漠的时候，或者刚好相反。但如果我们谈论一个人，说他善良或者聪明，谈论另一个人，说他凶恶或者愚蠢，那就不准确了。可我们又总是这样将人分类。事实上，这不合乎实情。人好比河：所有的河里的水处处都一样，可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而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而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澄清，有的地方河水混浊，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暖和。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人性的原始胚胎，只是有的时候表现人性的这一方面，有的时候又表现人性的那一方面。他常常变得完全不像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在某些人身上，这类变化特别明显厉害。聂赫留朵夫就属于这类人。他身上之所以会发生这类变化，既有生理方面的原因，又有精神方面的原因。此刻在他身上，就发生着这样的变化。

在法庭一审后，在慰问卡秋莎后，他领会到一种获得新鲜血液的庄严而欢快的心境。如今这种心情已随时间一去不回头，取而代之的是最近一次会晤后产生的恐惧甚至厌恶她的

心情。虽然他下定决心不能再抛弃她，也没有动摇同她结婚的信念，只要她希望这样的话，但是现在这件事却使他感到莫名的伤心痛苦和烦躁。

在走访巴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个早晨，他又坐车到牢房里去探望她。

狱长允许他见玛丝洛娃，不过不是在办公室，也不是在律师办事处，而是在女犯人的探监室。虽然狱长心地善良，但他这次对待聂赫留朵夫的态度却比从前冷淡了许多。毫无疑问聂赫留朵夫同马斯连尼科夫的谈话产生了后果：上边传下命令，指示他对这个客人要加以提防了。

“见面是可以的，”他说，“不过关于钱的事，请您一定最好照我要求的那样做……至于照大人的公文上所写的那样，把她调到医院去，那也是可以的，大夫也已经同意。但她自己不愿意去，还说：‘要我去给那些讨厌的病鬼倒尿盆，我才不干呢……’您要知道，公爵，她们本性就是这样。”他补充说。

聂赫留朵夫什么也不愿回答，只恳求允许他进去探望。典狱长于是就派一个看守领他去。聂赫留朵夫紧跟着看守走进一间空落落的女牢探望小厅。

玛丝洛娃已经守在那里。当她从铁栅栏后面溜达出来，模样文气而羞涩。她走到聂赫留朵夫的面前，眼睛不敢看他，嗫嚅道：

“请您宽恕我，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前天我话说得不好。”

“可此时还轮不到我来宽恕您……”聂赫留朵夫想说，但没敢说下去。他怕这会伤害到她。

“不过，您最好还是离开我。”她补充了一句，用比较斜睨的眼睛瞅了他一眼。聂赫留朵夫从她的眼睛里又看到了那种紧张而愤恨的神情。

“可是到底为什么要我离开您呢？”

“就该这样。”

“为什么就该这样呢？”

她又瞅了瞅他。在他看来，那眼光依然充满愤恨。

“喏，就该这样，”她说，“我对您说的是真心话，您得离开我。您干脆将您那个想法丢到九霄云外好了，我受不了。”她说，嘴唇在颤抖，沉默了一阵，又说“这是实话，我宁可吊死。”

聂赫留朵夫始终感觉，她这样表示拒绝，可能是她因为他加于她的屈辱而仇视他，不能原谅他，但也有可能夹杂着一种美好而重大的方面。她这样心平气和地再次排斥他，这就立刻打消了聂赫留朵夫心里的种种猜忌和怀疑，使他恢复了原先那种庄严、凝重和爱怜的情绪。

“卡秋莎，我原先是怎么说的，现在还会这样说。”他特别执著地说。“我请求你嫁给我。要是你不乐意，现在不乐意，那么，我还要跟着你，如果你被发送到边远的地方，我也跟到那儿去。”

“那是您个人的事。我没有别的话要告诉了。”她说，嘴唇又开始发抖起来。

聂赫留朵夫沉默下来，觉得再也说下去了。

“我现在先到乡下去一趟，然后就上彼得堡。”他终于强自安静说。“我将为您的事……为大家的事去奔走。上帝祝福我们，他们会被撤销原来的裁定的。”

“不撤销也无所谓了。即使我不为这件事，我也应为别的一些事遭这份罪……”

玛丝洛娃说着，拼命忍住眼泪。为掩盖自己的激动，她又突然问道：“您看到梅尼绍娃了吗？他们没有犯罪，对不对？”

“对，我认为是这样。”

“那个老太婆挺好的。”她说。

他就将他从梅尼绍娃那儿听到的种种情形全都讲给她听。然后他问她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她回答说什么也不需要。

他们又沉默了。

“哦，关于医院的事，”她用她的斜睨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忽然说，“如果您希望我去，我就去，我以后也不再喝酒了……”

聂赫留朵夫静静地凝望她的双眼。她的眼睛里笑意盈盈。

“那很好。”他所能说的只有这么一句，然后他就向她告辞了。

“是啊，是啊，她完全换成另一个人了。”聂赫留朵夫心想，他不但消除了原有的种种怀疑，而且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从不曾体验过的心情：他相信爱的力量无坚不摧。

玛丝洛娃在同聂赫留朵夫会过一次面以后，又回到满是臭气的女监里，脱下刚才穿着的囚服，坐到床上，两手支住膝盖。牢房里只有那么几个人：一个是原籍弗拉基米尔省、还带着没断奶的孩子的生病女人，梅尼绍娃的老母亲，还有道口工和她带来的两个孩子。诵经士的女儿昨天已被诊断患有精神病，即刻被送进了大医院。剩下的女人都洗衣服去了，老太太躺在铺上眯着，牢房门敞开着，几个孩子都在走廊里嬉戏。弗拉基米尔省的女人手里搂着孩子，道口工拿着一只袜子，另一面手指灵活地不断编织着，并且又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嗯，怎么样，是不是见到了？”她们齐声问。

玛丝洛娃没有作答，坐在上铺的铺上，摇晃两条腿恐怕也够不到地的腿。

“你为什么哭呀，又哭什么呀？”道口工问道。“千万别丧气。哎，卡秋莎！回答吧！”她两手又灵活地编织着，说。

玛丝洛娃没有吭声。

“她们都是洗衣服去了。听说，今天来了一大批从外地来的捐献物品。送来的东西可真多了，”弗拉基米尔省女人告诉大家。

“菲纳什卡！”道口工对着门外吼道。“告诉我，这淘气鬼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快回来！”

她紧接着抽出一根针，把它插在线团和袜子里，快步踱到走廊里。

正当这时，走廊里传来一片杂乱的脚步声和女人们的说话声。住在这里的女犯都没穿袜子只穿着棉鞋，逃回牢房，人人手里拿着一个长长的白面包，甚至有的还拿着两个。费多霞马上走到玛丝洛娃面前。

“怎么样，出了什么不顺心的事了？”费多霞亲切地瞧着玛丝洛娃，睁着她那对亮晶晶的天蓝色眼睛问。“瞧，这是给我们喝茶的时候吃的。”她说完，把白面包放到架子上去。

“怎么，难道他变卦了，不打算跟你结婚了？”柯拉勃列娃说。

“没有，他倒没有变卦，但我不同意，”玛丝洛娃说，“我已经照这样跟他说了。”

“你可真是傻瓜！”柯拉勃列娃沙哑着声音说。

“也是，如果不能住在一块儿，结婚又有什么意思呢？”费多霞说。

“可是，你的丈夫不就是跟你一起走吗？”铁道看守人的妻子说。

“那也是没办法，我跟他结过婚了。”费多霞说。“可现在既然他们不能住在一块儿，又何必结婚呢？”

“你可真傻！‘何必结婚！’倘若他娶了她，她可就阔气了。”

“他说：‘无论你被发送到哪儿，我总跟着你一块儿去。’”玛丝洛娃说。“其实，他愿去，就由他去；他不愿去，也随他不去好了。我绝不勉强他。目前他要到彼得堡去想办法。那儿几乎所有的大臣都是他的亲戚，”她接着说，“不过，我还是不需要他。”

“这个肯定是这样！”柯拉勃列娃突然赞同说，一面理着她的手提袋子，明显地又在想别的事。“如果不介意，咱们来喝点酒怎么样？”

“我不想喝了，”玛丝洛娃无力地说道，“你们痛快地喝吧。”

第二部

一

玛丝洛娃的案子或许过两星期后就由枢密院审查。在此以前，聂赫留朵夫计划先上彼得堡，只怕在枢密院无法成功胜诉，那就只有接受律师的主意，写状子去皇上那儿控告。

依照律师阿纳托思的看法，必须作好这次上诉可能毫无结果的准备，因为上诉的理由非常薄弱；如果事情真的这样，那么玛丝洛娃就极可能随同一批苦役犯一起在六月初动身。聂赫留朵夫已经拿定主意跟玛丝洛娃一起到西伯利亚去，所以，为了给这次远行做好准备，他现在必须先回一趟乡下，把他在那边的事情料理妥当。

聂赫留朵夫必须先乘火车到离此最近的库兹明斯科耶去，他在那个地方拥有一大块黑土地的地权，那是他收入的主要渠道。他在那里不知道度过多少春秋，度过童年和少年，成年后又去回过两次。还有一次他奉母命把德籍管家领到那里，同他一起审核农庄经营境况，因此他早就知道地产的方位，知道农民同管家的关系，也就是农民同土地的主人的关系。农民同地主的关系，说得明白些，是农民完全依赖管家，说得坦白些，是农民受帐房支配。这不是一八六一年明文禁止的那种公开的奴役，即一些穷人受一个主人的支配，而是所有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受大地主们的共同支配，甚至还受到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某些小人的奴役。这一点聂赫留朵夫明白，也不可能不明白，农庄经营就是以这种奴役为基础的，而他又自己过问过这种经营方法。但是，聂赫留朵夫不仅知道这一方面，他还明白这种经营方式是不合理的，没什么人情味的。早在学生时代，他就信奉亨利·乔治的学说并费心加以宣传。根据这个学说，他就把父亲留给自己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以为今天拥有土地同五十年前拥有半自由权的农奴一样都是罪恶。

不错，自从他到军队中工作，养成了每年挥霍大约两万卢布的习惯以后，他原先的一切见解被他一概忘光了，对于他的生活来说也已经不再有约束力，他不仅从不思考自己对财产应抱什么态度，他母亲给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而且极力避免去想这些问题。但等到他的母亲去世，他继承了遗产，并不得不管理他的财产，即不得不管理土地的时候，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就又摆在他的面前。倘若仅在一个月以前，聂赫留朵夫就会自我安慰，说他无力改变现行的土地制度，而且并非他亲自管理田产，这样他就多多少少能心安理得，仍旧住在离田产很远的地方，收取从那儿寄来的钱。然而现在他却打定主意：尽管不久他就要动身到西伯利亚去，就要同监狱生活发生许多又复杂又困难的关系，而这些都必须用钱来打通，但是他仍然不能容忍事情维持现状，一定要改变它，哪怕损害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为此他决定以低廉价钱将土地租给农民，自己不再经营土地，使得农民大体上可以不必依赖地主。聂赫留朵夫多次暗自比较地主同农奴主的地位，认为地主不雇工耕种土地而把土地租给农民，与奴隶主把农民的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几乎相似。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却朝着问题的解决方向迈出了一步：这是压迫由较为粗暴的形式过渡到较不粗暴的形式。这就是他准备做的。

聂赫留朵夫在吃午饭的时间到达库兹明斯科耶。他在生活上力求简洁，事先也没有打电话回老家，却在火车站雇了一辆双驾四轮马车。车夫是个年青人，身穿黄土布长外套，腰身又细又长，腰身以下打满褶的方位束着一根紧紧皮带。他按照一般马车夫的生活习惯侧

坐在 驭座上，很兴奋地同车上的老爷攀谈。他们这样一交谈，那匹既老而又瘸腿了的白色辕马和 害气肿病的瘦驴马就可以一步三回头慢慢走，那是它们求之不得的。

这位年青车夫讲起库兹明斯科耶的那个管理土地的人。他并不知道车上坐的就是原来这个庄园的主人。聂赫留朵夫特意不告诉他。

“好一个阔绰的德国人。”这个在城里住过，读过长篇小说的赶车人说。他坐在那儿，侧身对着乘客，手里一会儿握着他的长马鞭的柄，一会儿又握着长马鞭的梢，分明借此炫耀他的本领，“他买了一辆马车，配上三匹草黄色大马，带着他的太太出来兜风，嘿，那架势！”他接着说，“在冬天，圣诞节到了，他那所大房子里摆着一棵特别大的圣诞树。我送客人去过那儿。那儿点上电灯了，全省也找不出第二家来！他捞的钱可真不少！他掌着大权。听说他已经买下一份好田产了。”

聂赫留朵夫思忖道，不管那德国人怎样照料他的庄园，怎样抹他的油，他都不介意。可是那个腰身细长的马车夫讲的一席话，却使他不痛快。他欣赏这美丽的春天的景色，眺望空中不时遮住金色的阳光的浓云，看到春播作物的原野上到处都是农民的翻耕燕麦地，看到碧绿的草木上空机灵的翻飞着的百灵鸟。树林里除了迟到的麻栎外都已披上翠绿的小芽，草地上到处散布着一群群牛马，田野上看得见辛勤劳作的农民。他看着看着，忍不住心里又不快起来。他问自己，究竟什么事使他如此心烦？于是他想到车夫讲的那个德国管家怎样在库兹明斯科耶支配一切，恣意妄为。

一直等到聂赫留朵夫抵达库兹明斯科耶并着手处理事情以后，那种感觉才得以淡化。

聂赫留朵夫检查了一遍账目，跟总管谈了一次话。总管坦诚地谈到幸好农民缺少土地，幸好他们的土地夹在地主的土地当中，地主才得了不少便宜。他的这番话却越发使得聂赫留朵夫确定了他的打算：自己不再经营田产，而要把全部土地都租给农民。通过查阅账簿，通过他同总管的谈话，他了解到今年跟先前一样，有三分之二最好的耕地是由自己的工人使用改良的工具耕种的，其余的三分之一都雇农民来耕种，每俄亩付五个卢布，这就是说农民为了挣这五个卢布，就得把一俄亩地犁三回，耙三回，播下种子，然后收割，打捆，或者收割以后送到打谷场，但要是这些同样的工作雇自由的和廉价的工人来做，每一俄亩地至少就付十个卢布工钱。农民从账房那儿所取的必需品，都得以最高的价钱折合成工役来支付。大凡他们要使用草场，或是在树林里打柴，或是取得番薯的茎叶，都得做工，因此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欠账房的债。

如此这般，耕地以外的土地都由雇来的农民帮忙耕种，地主所得的利润就比用五分利计算的地租收入还多四倍。

这些事聂赫留朵夫尽管早就明白，但如今听来却又觉得很新奇。他感到奇怪万分的是，他们这些拥有这么多庄稼的老爷怎么会看不到这种不公平的事。德国总管提出种种条件，认为把土地交给农民会丢失全部农具，恐怕会连四分之一的本钱都无法收回，又说农民会践踏土地，聂赫留朵夫交出土地会吃大亏的。但这些理由却使聂赫留朵夫坚决地相信自己的信念，如果把土地交给农民，如果使自己丧失大部分利润，正是做了一件对得起人民的好事。他决定趁这次返乡的途中，把这件事清理顺了。收割和卖出已播种好的粮食，把农具和没什么重要的房屋出卖，这些事他已嘱咐总管在他走后解决。现在他要总管通知会库兹明斯科耶周围三村农户第二天来开会，向他们宣告自己的全部计划，并同农民商量出租土地的租金。

聂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坚定地抵制了总管的种种建议，想到自己愿意为农民做出牺牲，不由得心境舒畅，就走出账房，一边考虑目前要办的事，一边绕过正房，穿过一个今年已经荒芜的花圃(总管的房子前面却开辟了一个花圃)，走过生满蒲公英的 lawn tennis，信步走在椴树林里的林荫路。从前他经常到这儿来散步，吸吸雪茄烟。三年前美丽的基里莫娃到他的母亲家里来做客，还在这儿跟他调过情呢。聂赫留朵夫大致想好了明天他要对农民们说的话，就到总管那儿去，在喝茶的时候又同他商量一下应怎样清理全部田产的问题，当他在这方面完全放了心，才往那所大房子里一个房间走去。这间房以前专用来招待客人，这次却是专为他收拾的。

这个房间不大，非常干净，挂有一些威尼斯的风景画片，两个窗子中间挂着一面镜子。

房间里摆放一张整齐的弹簧小床，一张小圆桌，桌上放着一个极易认出的玻璃水瓶、一盒火柴和一个能把蜡烛弄灭的小东西。镜子旁边有一张大圆桌子，桌上放着他那只盖子已经被打开的皮箱，箱子里露出他的化妆用品盒和随身带着的几本书籍：一本是研究刑法的俄文书，还有一本德文书和英文书，可能都是同一类内容。这次返乡，他想抽空详读这几本书，但看起来今天已经没有空暇时间了。他准备要上床睡觉，明天可以早点起来，准备向农民说明他的计划。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把天然的红木镶花圈椅。聂赫留朵夫回忆起这把椅子原来放在母亲卧室里，此时一看到，忍不住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

这是一种不舍的感情，他忽然舍不得这所就要被拆毁的房子，舍不得这个就要荒芜的园子，舍不得这一片就要被砍倒的树林，舍不得这所有的畜厩、马房、库房、机器、牛马。这一切虽然并不是经他亲手购置的，但是，他很明白，这一切都是经过辛辛苦苦置办并保存下来的。以前他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放弃这些东西，可是如今他不仅舍不得这些东西，而且也舍不得他的土地，舍不得当前他很可能急需的那一半收入。这样，一种理论立刻来支持他这种不舍的感觉了，这种理论认为，把土地分给农民，毁掉他自己的田产，是不合乎情理，是荒谬愚蠢的。

两种声音在他心里回荡，一种说：“第一，我不应当占有土地。既然我不占有土地，也就不能维持这份产业。第二，我现在就要到西伯利亚去，所以房子也罢，庄园也罢，我都不需要了。”另一种说：“这话固然不错，不过，第一，你不可能在西伯利亚住一辈子。如果你结了婚，你就会有子女。你完完整整地得到这份田产，以后你也得完完整整地将它传给你的子孙。人要对土地负责任。”把土地都送出去，把庄园彻底拆掉，这都很轻松，但重新建立这点仅有的小产业可就困难了。你必须得考虑你的生活，决定今后怎么过日子，据此再来处理你的财产。你的决心到底能有多大？更何况，你现在这样做终究真的出于真心？还是只想做给人家看，好在他们面前夸耀自己的品德操行？”聂赫留朵夫这样扪心自问。他不能不认为，人家对他的行为说三道四，会改变他的决定。他越思考，问题越多，越不容易处理。为了摆脱这些干扰，他在白白净净的床上躺下来，想好好休息一会儿，到第二天头脑清醒了，再来处理这些目前扰得他头痛心烦的问题。但他好久都处于失眠状态，从打开的窗子里冲进清凉的空气，又从这儿泻下美丽的月光，从这儿传来一片蛙鸣声，还掺杂着夜莺的鸣唱——可以知道有几只在远处花园里，可能有一只就在窗下茂盛的丁香花丛中。聂赫留朵夫听着夜莺的鸣唱和青蛙的鸣叫，不禁想起了典狱长女儿的优扬的琴声。一想起这位典狱长，也就想起了可怜的玛丝洛娃，想起她说“您还是别作梦了吧”时，嘴唇不断地发抖，简直像鸣叫时的青蛙一样。于是那个德籍总管走下坡去赶青蛙，得把他赶紧阻拦住，但他不一会儿就走下坡去，而且变成了玛丝洛娃，还埋怨他说：“我是苦役犯，您

是公爵。”“不，我不能让步。”聂赫留朵夫说着，突然惊觉过来，自问道：“我到底做得算不算错？我也不理解，反正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所谓。但该休息了。”他也顺着总管和玛丝洛娃走过的路往下顺滑，于是一切又都无影无踪了。

二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聂赫留朵夫醒过来。账房里那个年轻的伺候主人的职员，一听见主人发出的动静，就递给他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和非常干净清凉的矿泉水，并报告说农民们正在陆续到会。聂赫留朵夫跳下床，头脑清醒了。昨天那种舍不得交出土地，舍不得毁掉自己的产业的感情如今消失得都无影无踪了。现在他想到那种感情，竟不禁暗自惊讶。

他考虑到当前要办的事就感到兴奋和骄傲。他从房间的窗口张出去，看见蒲公英丛生的一个绿茵茵的草地网球场。农民们只是遵照总管的通知集合好了，站在那里。昨天黄昏青蛙拼命乱叫，怪不得今天会天气阴凉。一早就下着温热的飘渺细雨，没有一丝风，树叶上、树枝上和青草上都到处滚动着水珠。从窗子里都是随时随刻飘进草木的芳香，甚至还有久旱的泥土的气味。聂赫留朵夫一边穿衣服，一面三番五次往窗外看去，看农民纷纷集合到网球场上来。他们三人两人地走来，彼此见面互相脱帽致意，拄着大拐杖，站成一个圈圈。总管是个身体强壮、肌肉发达的年轻人，穿着一件装有绿色大竖领和大纽扣的超短的棉衣。他走来通知聂赫留朵夫，人都集合好了，但可以让他们等候一下，聂赫留朵夫可以先喝点早茶。这两样东西都早已准备好了。

“这样不好，我还是先过去同他们会上一面。”聂赫留朵夫说，一想到马上就要同这么多的农民谈话，竟不时有种感到又胆怯又害臊的心情。

他就要去实现农民们就是幻想也无法实现的愿望，那就是以低廉的租金把土地交给他们。这就是说，他就要去赐给他们恩惠，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竟然有点羞愧。等到聂赫留朵夫往聚拢起来的农民们那边走去，那些生着浅黄色头发的、生着鬍发的、秃顶的、头发花白的农民，就纷纷摘下头上的帽子向他致意。可是他觉得很窘，一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天空仍下着淅淅沥沥的细雨，小雨珠挂在农民们的头发上，胡子上，长衫的绒毛上。农民们瞧着主人，等着他发话，但他却窘得什么也说不出。这种尴尬的沉默由从容不迫和刚愎自用的德国总管打破，他认为自己已熟识俄国农民的脾气，并且他能讲一口流畅而正确的俄国话。这个体格强壮、营养过剩的人，同聂赫留朵夫本人一样，与农民们那满是皱纹的瘦脸和在他们的长衫里凸起的肩胛瘦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家听我说，现在公爵爷要给你们恩惠，要将土地分给你们种，可说实话，你们不配！”总管说。

“我们怎么不合适，华西里·卡尔雷奇？难道说我们没有帮你干过活吗？我们一直特别崇拜先夫人，愿她在天上也平平安安。我们也很感谢公爵少爷，他没有撇下我们不管。”一个平时就喜欢饶舌的红头发农民兄弟说。

“我安排你们来就是为了清理这件事。要是你们高兴的话，我打算把全部土地都交给你们经营。”聂赫留朵夫说。

农民都默不作声，仿佛没有听明白他的话，或者根本不相信有这么一回事。

“把土地交给我们，您能说说这是什么意思？”一个身穿腰部打褶长袍的上了年纪的农民说。

“就是租给你们，好让你们以低廉的价钱就能够使用土地。”

“这事倒是满顺心的呢。”一个老人说。

“不过这个租价我们必须得出得起呀。”另一个老人说。

“给土地不要才是傻瓜！”

“种地是我们干惯了的活儿。我们就是靠地吃饭的！”

“这样您也省心得多，只管收收钱就行了，否则，麻烦可多了！”有些人说。

“麻烦是你们自己惹出来的。”德国人说。“如果你们守规矩，好好干活……”

“你的规矩我们可办不到，瓦西里·卡尔雷奇。”一个尖鼻子的瘦老头说。“你说：你干嘛把马放进麦田里？但是谁存心把它放进麦田里去呢？我整天忙着干活，使劲儿地抡镰刀，干一天好比干一年。夜晚放马，难免不打了个盹儿，那马就钻进你的燕麦地里去了。你呢，差点要剥我的皮。”

“你们本来是应该守传统的。”

“守传统，你说的倒轻巧，可我们怎么做得得到。”一个高挑个儿的中年农民说，他头发乌黑，满脸都是络腮胡子。

“可是我早就对你们说过，要建造一道高高的围墙。”

“只要你能提供给我们木材。”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儿农民七嘴八舌地叫道。“我原来就想用木头把它围起来，可你却把我关进这座牢里，喂了三个月虱子。嘿，恐怕这就叫造围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大声喝斥问总管。

“村子里的头一号小偷，”总管用德语说因为怕他们听明白了，“他年年在树林里偷树，都被别人抓住。你要先学会体恤别人的财产。”总管说。

“难道这么说来我们还不够尊敬你吗？”老头儿说，“我们不敢不能不尊敬你，因为我们的生活都捏在你的手心里，你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

“嗨，老兄您难道不知道，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只要你们不欺负人家就可以了。”

“哼，‘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去年夏天你打了我一记耳光，打了也就打了，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呢！跟有钱人没法讲道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是明摆着的事。”

“你做事只要守规矩就是了。”

这样，一场舌战展开了，参加的双方却都不清楚自己在讲什么，而且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但很明显，舌战的一方怒火满腔，只因为害怕而不敢发作罢了，而一方却认为自己地位优越，有权有势。聂赫留朵夫听着这场舌战很难过。他极力想让大家回到商定租价和交款期限的正事上来。

“那么，关于土地的事该怎么办呢？你们愿意吗？如果我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给个什么价钱呢？”

“土地是您的，价自然由您定。”

聂赫留朵夫就定出一个价钱。尽管聂赫留朵夫所出的价格比附近一带的租金低得多，农民们却照例开始讨价还价，认为价钱太高。聂赫留朵夫原以为他们会很高兴地接受他提出的价钱，谁知他根本看不出他们有任何满意的表示。只是根据一件事聂赫留朵夫推断他提出来的价钱对他们是有利的，那就是当后来大家谈到由谁承租土地的问题时，确定到底是

由整个村 社来承租还是另外成立一个合作社来承租的时候，农民中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其中的一派 想将体力不济和无力付款的农民排除在承租土地之外，另一派就是那些他们想排挤出去的农民。最后，幸亏由总管出力，价钱和交款期限才得以确定。于是农民们热闹地交谈着走下山 坡，走回村子。聂赫留朵夫就回账房，跟总管一块儿拟订租约。

聂赫留朵夫的愿望和计划基本上都实现了：农民得到了应得的土地，付的租金比附近一带地 区还要低三成；他自己从土地上获得的全部的收入几乎又减少了一半，但对他来说反正还是 绰绰有余，并且他卖掉树林、出售农具都还有进款。从外表看起来一切都顺顺当当，但 聂赫留朵夫还是一直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看到，农民中间虽然有人对他讲了一些感激涕 零话，但他们并不满意于这一些，而是指望更多利益。结果是他自己吃了一个大亏，却还没有使农民满意起来。

第二天清晨，在家里和农民签订了租契，还签了字。聂赫留朵夫于是就在几个推选出来的老 平民的护送下，怀着事情还没有彻底解决的落寞心情，重又坐上那辆总管安排好的被出租马 车 夫称为洋气的三轮马车，并且同那些脸上仍有困惑不解的神色、不满意的神情并摇头的农民 告了别，就径直奔向火车站。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这一切很不满意。

他究竟不满意哪一方面，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他老觉得有点愁闷和羞愧。

三

聂赫留朵夫从库兹明斯科耶出发，动身到他从姑姑们名下继承的庄园去，也就是他同卡秋莎 相识的地方。他打算照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用过的那种办法处理他这片田产上的土地。此外，他还想尽量打听一下关于卡秋莎的事，关于她和他的孩子的事：那个孩子真的死了吗？他是 怎么死的？他一清早到达巴诺沃。他乘马车走进庄园的院子，头一件让他心惊的事，就是所 有的建筑物，特别是正房，显出一幅衰败荒凉的景象。

本来的绿铁皮屋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漆油，早已锈得发红；还有几块铁皮磨卷了边，听说 多半是被这种暴风雨掀起的。正厅周围的护墙上的铁皮，有的早已被人偷走，特别是那些钉 子已经 生锈、特别容易撬掉的地方。这时前门廊和后门廊都早已腐朽坍塌，只剩下几个梁架。特 别是后门廊，他记得特别清楚，其中有几个窗子因为玻璃破坏了已钉了木板。原来管家住的 厢房还有吃饭的地方和马厩，都早已破旧，色泽灰色。唯独花园没有破败，愈发葱茏繁茂， 枝叶连生，百花争艳；从墙外就可以看见樱花、苹果花和李子花茂密地开着，白花花一片好 像天上的浮云。织成篱笆的丁香也好似十二年前一样茂密地开着，那年聂赫留朵夫曾经与 十六岁的卡秋莎一起玩小孩的游戏。他在这丁香花丛里曾经跌过一交，被荨麻狠狠地伤着了 。当年索菲娅姑妈在正边的房旁边种的一棵落叶小松树，那时小得特别像一个木橛子，如今 它已长大成材，细密的枝条上却长满了柔软的黄绿色松针。汹涌的河水在两岸之间奔腾流淌， 流到磨坊的小水闸上，哗哗地径直就往下冲去。这时对岸草地上放养着农家杂毛群的牛 马。管家本来是个没有毕业的神学学校学生，他乐呵呵地在院子里欢迎聂赫留朵夫，又乐呵 呵地请他到自己的帐房里去，乐呵呵地走到隔板后面，似乎在用这样的笑容表示可能将有什 么不一般的事在等着他。果然隔板后面有人在叽叽喳喳地一番谈话，不久以后又沉默了。这 时马车夫领到当天的酒钱后，叮哩咣啷地把车赶出院子，不多一会儿接着周围又静了下来。 不多时又有一个穿绣花衬衫的姑娘从窗外跑过，她光着脚，耳朵上也挂着绒球当美丽耳环。 一个农民又跟在她后面跑过，他的大靴子的铁钉在结实的地面上发出叮咚叮咚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在窗旁坐下，望着花园，倾听各种声响。春天的新鲜空气和翻耕地的泥土的气息从开着的两扇小窗的窗口飘进来，轻风微微吹动他出汗的额角上的头发，吹动刀痕累累的窗台上放着的一叠纸张。河边响起农妇们用洗衣棒捶打衣服的声音：“特拉拍塔，特拉拍塔”的声音，这些声音互相交错，此起彼落，飘荡在经太阳映射而闪闪发光的河塘上。磨坊那边，流水从高处倾泻而下，发出调和的声响。一只苍蝇响亮地嗡嗡叫着，惊恐地从他耳旁飞过。

聂赫留朵夫突然想起，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当他年纪很小、心里没什么复杂东西的时候，也在这儿，在磨坊边上有节奏的喧闹锣鼓声中，听见河上的捣捶衣服声；春风也该是这样吹动他湿漉漉的额上的头发和几个刀痕累累的窗台上的便笺；并且也有这样一只可怕的小苍蝇惊恐地从他耳边掠过。他不但想起了十八岁时的情景，并且还觉得自己也像当年一样意气风发，心地单纯，满怀抱负，同时又觉得仿佛梦景一般不可能再次出现，他感到无比惆怅。

“老爷，您什么时候吃饭？”管家微笑着问道。

“随您的便好了，我不饿。我想到村子里去走一趟。”

“不过，您乐意先到正房里去一趟吗？我已经将它收拾得整整齐齐了。劳驾您去看一眼吧，如果您认为房子的外观……”

“不了，以后再看吧。现在，请您先告诉我，你们这儿有一个女人叫玛特廖娜·哈林娜吗？”

玛特廖娜·哈林娜就是卡秋莎的姨母。

“怎么没有？她就住在村子里，我简直拿她没办法。她贩卖私酒。我知道这件事，揭过她的底，也骂过她，但又不忍心将她报告官府。她已经是老太婆了，还要养活孙儿孙女，”管家说着，一直笑容满面，他既想讨好东家，又深信聂赫留朵夫对一切事情的看法与他一样。

“她住在哪儿？我想去找她。”

“就住在村子末尾，从村边数起应该是第三家。左边原来是一所砖房，她的小屋可能就在砖房后面。这样吧，最好还是让我送您过去。”管家高兴地笑着说。

“不必麻烦了，谢谢您，我自己可以找得着的。不过我还要请您通知那些农户，叫他们过来开个会，我可能要同他们当面谈谈土地的事，”聂赫留朵夫说。他打算像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在这里同农民们解决好事情，并且最好就是今天晚上就办完。

四

聂赫留朵夫刚走出大门，就遇见一个农家姑娘。你瞧她身穿花花绿绿的围裙，耳朵上挂着漂亮的绒球，迈动两只厚实的溜溜的光脚板，穿过车前草和独行菜丛生的牧场，就顺着这条坚硬的小道飞奔而来。

她正要回家，左胳膊很快地在胸前来回甩动，右胳膊搂着一只红公鸡，把它贴紧她的肚子。那只公鸡看起来心平气和，抖动着红冠子，只是转动眼珠，一会儿把一条黑腿伸出来，一会儿又缩回去，姑娘的围裙时不时地被它的爪子钩住。姑娘走得离东家近了，就将脚步放慢，把跑步改成走路。她走到他跟前了，停住脚步，把头往后一仰，对他一鞠躬。等到

他走过去 了，她才抱着公鸡继续往前走。聂赫留朵夫走下坡，在水井那儿又遇见一个身穿肮脏粗布 衬衫的老太婆，佝偻的背上挑着一担沉甸甸的、装满水的桶。老太婆小心仔细地放下两只水 桶，也像那位姑娘一样把头往后一仰，对他一鞠躬。

过了这口水井就是村子。

天气如此的晴朗炎热，上午十点钟就闷热得厉害，此时的空中的浮云只偶然遮住太阳。整条 街上都到处弥漫着浓烈而并令人难以接受的畜粪味，有的是从上山时经过的直直的且又坚硬的路上的大车飘来的，但可能主要还是从各家院子里耙松的畜粪堆里突然冒出来的。聂赫留朵夫这时正好走过各家大门敞开的独门院子，却见有几个农民光着大脚板，裤子和布衫上溅满 不慎洒落的粪汁，赶着大车上坡。他们不时回头张望一下身材魁伟的小少爷，看他头上戴着 一 顶灰色礼帽，缎子的帽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手里拄着亮晶晶的银头曲节手杖，每走两步就 会拿手杖往地上轻轻一点，上坡往村子走过来。那些农民们从大田里赶着空车回来，就坐在 驭座上颠个不停，突然看见街上走了这么一个不入乡随俗的人，都习惯性地向他脱帽致 敬。叽叽喳喳的农妇们走到大门外，或者就站在台阶上，也对他指指点点，含情脉脉地目送他 走过。

聂赫留朵夫阔气地走到第四户人家的大门口，马上停住脚步，就着见一辆吱吱嘎嘎响的大蓬 车从院子里缓缓驶出来。

那辆大车吱吱嘎嘎响着，装满压得很紧、堆得很高的畜粪，上边铺着一张供人坐的椴皮席。一个六岁的男孩跟着大车走出来，正兴奋地等着上车。一个脚穿树皮鞋的年轻农民赶着 马，迈开大步从院门里走出来。一匹蓝灰色的长腿小马从院门里跳出来，不过见到聂赫留朵 夫就吓了一跳，赶紧贴紧那辆大车，用腿蹭着车轮，窜到它母亲那儿去，它的母亲正心神不 安地轻声嘶鸣着，它已经拉着那辆沉重的大车走出院门。接着一个清瘦矫健的老人又牵出一 匹马来，这位老人也光着脚，穿着花条子的裤子和肮脏的长布衫，尖瘦的肩胛骨凸现在背上 。

当那些马顺着缀满了仿佛烧焦了的灰色粪块的平坦道路往上走的时候，那个老人又走回院门 口来，朝聂赫留朵夫鞠了一躬。

“请问你是我们那两位可爱的小姐的侄儿吧？”

“是的，我是她们阔别已久的侄儿。”

“欢迎欢迎。你是不是过来看看我们两位老头子啊？”老头兴致极高地说。

“不错，对了。那么，能否告诉我你们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勉强回答，不知道应该说 什么才好。

“我们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啊！实话告诉你，糟得不能再糟了！”这位饶舌的老头急忙拉长 腔调说。

“可是怎么会这样糟糕呢？”聂赫留朵夫一面走进大门，一面大声询问。

“可是除了这种糟透了的生活，另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生活呢？”老人说着，跟聂赫留朵夫走 进院子。老人来到一个敞棚底下，在一块畜粪已经铲掉而露出地皮的空地上站住。

聂赫留朵夫跟着他也走到那个敞棚底下。

“喏，我全家一共十二口人。”老人接着说，指了指手里拿着大叉的两个女人，她们满头大 汗，头巾已经从头上滑下来，站在还没被清除出去的粪堆上，裙裾被掖在腰里，裸露

的小腿 肚子上有半截溅满了粪汁。“家里每个月都得买进六普特粮食，可是这笔钱从哪儿来呢？”

“难道你们自己打的粮还不够应付吗？”

“自己打的?!什么是自己打的?”老头冷笑一声说。“我的地恐怕最多也就是够三个人糊口，还吃不到圣诞节。”

“那你们如何处理呢？”

“我们就只好这么办了：一个孩子被送出去做长工，而且又向府上筹措了点钱。可能不到大斋节就花费没了，可是税还没有来得及缴呢！”

“税到底要缴多少？”

“我们一户每四个月必须上缴十七卢布。天哪，老天爷，这年头，连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对付！”

“我可不可以到你们屋里参观一下呢？”聂赫留朵夫说着，穿过老农的院子，从那已经铲除好畜粪的地方走到已经用大叉翻过、总是冒出强烈沼气味儿的红棕色的大进上。

“那有什么不行的，请吧，”老人说。他迅速迈动那两只光脚，粪汁从他的脚趾缝里冒了出来。他绕到聂赫留朵夫前面，为他推开小屋的房门。

那两个女人将头巾理好，把毛织裙子的裙裾放下来，带着好奇而惊恐的神情瞧着这个穿著讲究、袖口上有金纽扣的老爷走进她们的家。

两个穿着粗布衬衫的小姑娘从小屋里跑了出来。聂赫留朵夫略微弯下腰，脱掉帽子，走进门廊，又走进一个既狭窄又肮脏的房间，房间里摆着两架织布机，弥漫着食物的酸臭味。一个老太婆站在房内的炉灶旁边，露出两只又瘦又黑、青筋暴起的细胳膊。

“瞧，东家少爷探望我们来了。”老头兴奋地说。

“天哪，那太令人高兴了。”老太婆于是就放下卷起的袖子，亲切和蔼地说。

“我就是来看看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了。”聂赫留朵夫想了好一阵子终于说。

“这种日子过得如何，不是瞧见了嘛。这小房子眼看就快要倒了，可能哪天会压死许多人。可是这该死的老头子还说这破房子挺不错的。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天地，”口无遮掩的老太婆神经质地老是抖着脑袋，说，“过一会儿就要开饭了。我还得喂饱那些成天累死累活的人。”

“你们都吃些什么呀？”

“吃什么？我们的伙食好得很。第一道菜是面包下克瓦斯，第二道菜是克瓦斯下面包。”老太婆不时露出已被蛀掉一半的牙齿，讪笑着说。

“对不起，您别再开玩笑，能让我看看你们今天都吃些什么嘛。”

“告诉他吃什么，”老头儿笑着说，“你都知道，作为农民，我们的伙食并不讲究。你给他看看，老婆子。”

老太婆不满地摇摇头。

“你想瞧瞧我们庄稼人吃什么？老爷，我看你啊，真是什么闲事都爱管，什么事都想知道。我说过我们吃的是面包和克瓦斯，再加一点儿汤。那些娘儿们昨天送来几条鱼。喏，这就是汤。喝完汤就吃土豆。”

“没有别的了？”

“别的还能有什么呢，至多能在汤里添点牛奶。”老太婆瞧着门口，笑着说。

房门原是开着的，现在门道里挤满了人。有男孩、女孩、抱着婴儿的女人，他们都瞅着这个古怪的老爷考察庄稼人的饭食。老太婆分明很得意于自己善于同老爷周旋。

“是啊，我们的生活很糟糕，老爷，真糟糕啊，这是一望就知的！”老头说着，又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你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好，再见吧，”聂赫留朵夫说，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别扭，羞愧。

“多谢你来看我们。”老人说。

过道里的人互相挤紧，给聂赫留朵夫闪出一条道来。他走到街上，顺着斜坡往上走。有两个光着脚的男孩从过道里出来，跟着他走：一个穿着白底色的脏衬衫，年龄稍大些；另一个穿着瘦小的、褪色了的粉红色衬衫。聂赫留朵夫回过头来看他们。

“现在你到哪儿去？”穿白衬衫的男孩说。

“去找玛特廖娜·哈林娜，”他说，

“你们认识她吗？”

不知为什么，那个穿粉红色小衬衫的男孩笑起来，可是那个年龄稍大的孩子严肃地反问道：

“对了，哪一个玛特廖娜？是不是很老的那一个？”

“没错，她已经很老了。”

“难怪，难怪，”他拖长声调说。“那可能是谢梅尼哈，她本来住在村子末尾。我们会带你去的。走，费吉卡，我们带他去。”

“那么我们的马怎么处置？”

“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费吉卡答应了。他们一行三人就一起沿着这条街道往窄窄的坡上走。

五

聂赫留朵夫忽然觉得同孩子们一起比同一帮大人在一起自由自在得多。可以同他们随便聊聊。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却闭紧嘴不再笑，像那个大孩子一样很明白事理地说话。

“那么，你们村里谁最穷？”聂赫留朵夫问。

“谁穷？米哈伊尔穷，谢苗·马卡罗夫穷，还有马尔法也穷。”

“还有阿尼霞，她更穷。阿尼霞家里连一头奶牛都没有，他们在要饭。”小费吉卡说。

“她家里没有奶牛，但他们总共才三口人。而马尔法家里有五口人呢，”大孩子提出相反意见。

“可说到底阿尼霞到底是个寡妇哇，”穿粉红衬衫的男孩执著地坚定自己的看法。

“你说阿尼霞是寡妇，可人家马尔法也同寡妇差不多，”大孩子忙着说。“你也看见了同寡妇有什么区别，她丈夫不在家。”

“她丈夫在哪里？能告诉我吗？”聂赫留朵夫问。

“又蹲监牢，去喂虱子了。”大孩子用老百姓习惯用语回答。

“去年夏天因为他在东家树林里只砍了两棵小桦树，于是二话没说就被送去坐牢，”穿粉红衬衫的男孩赶紧说，“到如今差不多都关了有五个月了，他老婆还在要饭，另外还有三个孩子，和一个害病的老太婆。”他添油加醋地说。

“她到底住在哪儿？”聂赫留朵夫问。

“喏，就住在旁边这个院子里，”男孩用力指着一所房子大声说。在这所房子前面有一个瘦小异常的淡黄头发的男孩。那孩子天生一双罗圈腿，身子又一摇一晃的，站在聂赫留朵夫刚才走着的那条小路上。

“瓦西卡，你这淘气鬼，跑到哪儿去了？”一个女人从小屋里跑出来，大声嚷嚷着。她神色惊惶，身穿一件肮脏得好像沾满了炉灰的衬衫，径直跑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抱起那个孩子就往小屋里跑，似乎唯恐聂赫留朵夫会对她的孩子干出什么坏事来似的。

这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个女人，她的丈夫被关在监狱里，只因将聂赫留朵夫树林里的小桦树砍了两根。

“哦，还有那个玛特廖娜，她穷吗？”聂赫留朵夫问，这时候他们已经走近马特廖娜的小屋。

“她可不穷：她卖酒哩。”穿粉红色衬衫的瘦男孩果断地回答说。

聂赫留朵夫走到玛特廖娜的小屋跟前，打发走两个孩子，自己走进门廊，然后又走进房间。玛特廖娜老太婆的小屋长度只有六俄尺，如果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躺在火炉后面的那张床上，根本伸不直身子。“卡秋莎就是在那张床上生孩子的，”他暗自思忖，“后来又在那张床上生过病。”一架织布机几乎占满了整个小屋。聂赫留朵夫走进房门，头撞在低矮的门楣上的时候，老太婆和她的大孙女正在一起修理那架织布机。另外两个孙子紧跟在聂赫留朵夫身后，飞也似地跑进小屋，伸出手来抓住门框，站在他身后。

“你到底找谁？”老婆子可能因织布机出了问题，心里老大的不高兴，怒气冲冲地大声质问。再说，她可能会因贩卖私酒，见了陌生人就打心里害怕。

“我是这里的地主。我想跟您详细地谈谈。”

老婆子不作声，认真对他瞧了瞧，脸色立刻变了。

“啊呀，我的恩人，我这笨蛋可没认出你来呀，我还认为是什么陌生的过路人呢，”玛特廖娜作出亲热的样子说。“哎哟，我的大老爷呀……”

“我想与您独自谈谈，最好没有外人在场，”聂赫留朵夫望着敞开的门说。门边站着好几个孩子，孩子的后面站着一个瘦小的女人。她怀里搂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娃娃。那娃娃十分孱弱，但是一直笑嘻嘻的，孩子的头上戴着一顶用碎布缝成的小圆帽子。

“有什么好瞧的，我来叫你们晓得厉害，把拐杖递给我！”老婆子向站在门口的人叫道。“把门关上，听见了吗？”

孩子们全部走了，怀抱娃娃的女人把房门关上了。

“我正在想：谁来了？原来是老爷，您是我们的金子，讨人喜欢的美男子！”老婆子说着。

“你怎么肯光临我们这个穷苦地方了，也不嫌这儿脏乱。啊，你真像钻石一样好看！来啊，老爷，在这儿坐，就坐在这个矮柜子上吧，”她说着用围裙抹抹矮柜。“我还认为是哪个鬼进来了，原来是您，是好老爷，是恩公，是养活我们的大好人。你可得谅解我这老糊涂，是我瞎了眼睛了。”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老太婆站在他的面前，右手托住脸颊，左手抓住尖尖的右胳膊肘，像唱歌般地讲起来：

“你也显老了，老爷。想当年，你有如水果鲜嫩的龙牙草呀，可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看起来，您肯定也很操心。”

“我是来打听一件事：你还记得卡秋莎·玛丝洛娃吗？”

“就是卡吉琳娜吧？那哪能不记得，她是我的外甥女嘛……哪能不记得，我为她流过多少的眼泪，多少的眼泪哟。那件事我都清楚。我的老爷，多少人在上帝面前犯过罪，在沙皇面前犯过法？因为年轻，干出那种事也不足为怪，再加上喝茶啦，喝咖啡啦，最后就容易让魔鬼迷住心窍。要知道，魔鬼的威力挺大的。这有什么办法！倘若你扔下她不管，那就另当别论了，但你没有，你大大方方送了她一百卢布的钱呐。可是她干了什么呢？她就是太糊涂太没心眼儿。只要她稍稍听一些我的话，她就会过得挺不错的。她虽说是我的外甥女，但我还得说一句实在话：这个姑娘没出息。后来，我给她找了一个多么好的差使，而她偏偏不肯听话，骂起主人来了。我们这类人是可以骂主人的吗？得，人家就把她辞退了。后来她又到一个林务官家里去做女佣，本来也可以过得不错，但她竟又不乐意。”

“我想打听一下那个孩子的事。她不是在您这儿生了个孩子吗？那个孩子在哪儿？”

“我的老爷，为了那个娃娃，我可没少费心。那时她病得很严重，我估计她再也不能起床了，就照规矩给那个男孩受了洗礼，把他送进育婴堂。是啊，既然做母亲的都快死了，何必再让这个小天使的灵魂受罪呢？别的任何人处在我的位置，都会撂下这个娃娃不管，也不喂他，任他死去。可是我想，怎么能这么办呢，还是花点力气，把他送到育婴堂去吧。幸好有点钱，所以就找人把他送走了。”

“有没有登记号码？”

“号码是登记了，可他立刻就死了。她说刚刚送到，他就死掉了。”

“她是什么人？”

“就是住在斯科罗德诺耶同一个村子的那个女人。她专门干这个行当。她名字叫玛拉尼雅，现在已经死了。这女人可很聪明，干活干得挺灵巧！人家将娃娃送到她家，她就留下来养在家里，喂他饭。喂了一段时间，另外凑几个孩子再送去，咳，我的大老爷！等凑够三四个，一同送去。她干这种事可聪明了：先做好一个大摇篮，像是双层床，上下都装上娃娃，摇篮边上还有把手。她就如此一下子可以装四个娃娃，让娃娃的脚对着脚，脑袋不能挨着脑袋，省得相碰，这样一次就可以送走四个。她还作了几个假奶头塞进娃娃嘴里，这样娃娃就不会吵闹了。”

“后来情况怎么样？”

“后来，卡吉琳娜的孩子就这样被送走了。她在家里把他喂养了两个星期，那娃娃还在她家里就得病了。”

“那娃娃长得好看吗？”聂赫留朵夫问道。

“好看得很，再也找不着比他更加好看的娃娃了，长得就和你一模一样。”老太婆只将一只眼眨了眨，说。

“他怎么会这样虚弱？多半是吃得很差劲吧？”

“哪儿会好好喂！仅仅敷衍了事罢了。这也不足为怪，孩子又不是她自己的。她只要对付着让孩子活着送到那儿就行了。那个女人说她刚把孩子送到莫斯科，他就咽了气。她还带回来一个证件，看起来手续齐备。她是个聪明的娘儿们。”

关于他和卡秋莎的孩子，聂赫留朵夫所能获得的信息就只有这些。

六

聂赫留朵夫的头在这个房间的门楣和门廊的门楣上接连又碰了两次，他才走到街上。

穿着白衬衫的、穿着灰衬衫的、穿着粉红衬衫的几个小孩子都在门外边等他；还有几个孩子也都凑到他身边来；还有另外几个抱婴儿的女人也在等待着他，包括那个毫不费劲地

抱着 那个头戴碎布小圆帽子、脸色苍白的娃娃的瘦小女人。这娃娃的脸活像个小老头，但一直露 着古怪的微笑，摇动着痉挛的大拇指。聂赫留朵夫知道这是一种很痛苦的微笑。他打听那个 女人是什么人。

“她就是我曾经对你讲的那个阿尼霞，” 年龄大些的男孩说。

聂赫留朵夫转过身去对阿尼霞说话。

“你的日子怎么样？” 他问，“以什么养家糊口？”

“我的日子怎么样？我要饭，” 阿尼霞说着，哭了起来。

那个长得像小老头的娃娃带着满脸笑容，扭动他那细瘦得如同两条蚯蚓的腿。

聂赫留朵夫掏出他的钱夹，给那个女人十卢布。他还没来得及走出两步，就有另外一个抱着 娃娃的女人追上他，接着一个老太婆也追上了他，过后又来了一个女人。她们都向他诉说自己如何穷困，祈求得到他的周济。聂赫留朵夫把他钱夹里的六十卢布的全部零票统统散发出去，心情沮丧地向管家的厢房，即自己目前的家走去。管家面带笑容地迎接聂赫留朵夫，报 告说今天傍晚农民们将聚齐开会。

聂赫留朵夫向他致了谢，没走进帐房，而是走到花园里，在布满白色苹果花瓣、杂草丛生的 小路上徘徊，思考着刚才看见的种种情景。

厢房四周先是寂静的，但过了不久，聂赫留朵夫听到管家房里有两个女人气愤的争吵声，偶尔还掺杂着管家带笑的声音。聂赫留朵夫凝神倾听。

“我已经精疲力尽了，你为什么还要扯下我脖子上面的十字架？” 一个女人的气愤声音说。

“你要晓得，它刚刚闯进去，” 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我说，你还是给我吧。你干什么折磨牲口，还弄得我孩子没牛奶吃！”

“你们得赔钱，否则就做工来抵偿。” 管家声音平静地回答说。

聂赫留朵夫走出花园，来到厢房的门廊跟前，那儿站着两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其中有一个怀 着胎，很明显就快临盆了。管家也站在门廊的台阶上，双手插在帆布大衣的口袋里。那两个 村妇见到东家，就不再吭声，动手整理从头上滑落的头巾。管家将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脸 上堆起了笑容。

事情是这样：听管家说，农民经常故意将小牛甚至奶牛放在东家草场上。现在，这两位农 妇的两只奶牛就在草场上面被捉住，赶到这边来了。管家要处罚每头奶牛三十个戈比，或者 做两天工作抵偿。两个农妇一再说，第一，她们的奶牛确实是偶然闯进来的；第二，她们真 的没有钱；第三，她们就是答应做工抵偿，也要求首先立刻放归这两头牛，因为它们一大早 就在太阳底下晒，没有喂过一点饲料，正在那边可怜地哞哞叫。

“我向你们提过许多次了，” 管家一面笑着说，一面回过头瞧瞧聂赫留朵夫，好像要请他 做见证似的，“要是你们想要回家吃午饭，就一定得把牲口看好。”

“我刚刚跑开去看看我的孩子，那些畜生就走掉了。”

“你既然正在放牛，你就不能随便走。”

“那么让谁去喂孩子吃奶呢？你总不会去给他喂奶吧。”

“如果奶牛真踩坏了草场，那就另当别论，我也就不再多说，可事实上它只是刚刚跑到那儿去的。”另一个女人说。

“整个草场已经被踩坏了，”管家对聂赫留朵夫说。“如果不处分她们，将来就一点干草都收不到了。”

“哎，别作孽了，”怀孕的女人叫起来。“我的牲口从来也没被人捉住过。”

“但现在被捉住了，你就得赔钱或者做工。”

“行了行了，我做工就是，你还是快把牛放了，别让它挨饿呀！”她气冲冲地叫嚷着。“即使没有这些麻烦，我都已经干得没日没夜的了。我婆婆害着病，丈夫只知道灌酒，我自己什么事都要做，力气都快使完了。但求‘做工’两个字卡在你的喉咙里，将你活活地噎死！”

聂赫留朵夫让管家放还奶牛，又走到花园里去继续考虑一些事，然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依他看来，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清楚明白，所以他很纳闷为什么这么清楚明白的事情人们会看不出来，为什么他自己也很久都没有看出来。

“老百姓都在死亡。他们对于死已不当一回事，因为常常有人死亡。儿童死去，妇女干着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食品十分不足，尤其老年人缺乏可吃的东西。老百姓一步一步陷入这种悲惨的地步，他们自己却没有发现，也不怨天忧人。但是我们就认为这种状况向来如此，理所当然。”现在他十分明白，老百姓明白并经常指出，他们贫穷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唯一能用 来养家糊口的土地却被地主霸占了；他十分明白，儿童和老人都在死亡，因为他们没有牛奶喝，而之所以没有牛奶喝，是由于他们没有土地放牧牲畜，又收不到粮食和青草；他十分明白，老百姓的全部灾祸，或者说老百姓遭殃的主要因素，就是他们赖以生活的土地不在他们手中，而在那些具有土地所有权、靠老百姓劳动生活的人的手里。老百姓非常需要土地，因为缺地而死去，但土地又得依靠他们耕种，从土地上收获的粮食又都被卖到外国去，这样地主就能够给自己买礼帽、拐杖、马车、青铜摆设等东西。这一下聂赫留朵夫十分清楚，就像不放马到草场上去吃草反而把它们关在围墙里，它们吃干净围墙里的草就会瘦弱，就会饿死一样……这种现象真是太恐怖了，再也不能够这样继续生活下去。必须想办法消灭，最少自己不能参加其事。“我一定要想出个主意来，”他在最近一个桦树夹峙的小路上徘徊，同时思考。“各种学术团体、政府机关和报纸都在争论老百姓贫穷的因素和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办法，只是忽略那种切实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再从他们手中夺走他们需要的土地。”他清楚地回忆起亨利·乔治的基本原则，想起当初他对它的信奉，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土地不能够成为私有财产，不能够成为商品，就好像水、空气和阳光一样。人人都有权利享用土地，享用土地提供的所有利益。”现在他才明白，为什么他想起处置库兹明斯科耶土地的方法，就觉得害臊。他在骗自己。他明明晓得谁也没有权利占有土地，却还要确定自己享有这样的权利。他将一部分土地的收益赠送给农民，但在灵魂深处明白他是没有这项权利的。从今以后他不愿意再这样做，而且要改变库兹明斯科耶的那套方法。他心里确定了一个方法，把土地交还农民，收取租费，并确定地租是农民的私有财产，由他们自己自由支配，应纳税款不过用于公益事业。这不是单一税，但是在现行制度下是最近似单一税的方法，不过主要是他放开了土地所有权。

当他回到屋时，管家特别高兴地请他去吃午饭，而且表示担心地说，也许他的妻子在那个耳朵上戴绒毛球的少女的帮助下做出的菜煮得过了火候，或者烤得太熟。

饭桌上铺着一块粗糙的桌布，上面放着一块代替餐巾的绣花的布巾。桌上摆着一个已断了一个柄的汤盆，盆里盛着鸡块土豆汤，那只一会儿伸出这一条黑腿、一会儿伸出那一条黑腿的公鸡已被开膛破肚，剁成小块，许多地方还留有鸡毛。喝完汤以后，下一道菜还是

那只公鸡的肉，连鸡毛一起烤焦了。随后端上来的是加了大量白糖和牛油的煎奶渣饼。这些菜虽然并不十分可口，聂赫留朵夫却都吃下去了，他只是在认真思索，根本没留意自己吃的是什么。这种思索倒淡化了他从村子里带回来的愁闷心境。

每逢神色惊惶、耳朵上戴绒毛球的姑娘将菜端送到饭桌上，管家的妻子就贴近门缝往里偷觑。管家本人正暗自得意于他妻子的手艺，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欢畅。

吃完饭后，聂赫留朵夫好不容易让管家安定下来。为了瞧瞧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头，同时也想向人家讲讲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他就对管家讲解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方法，而且征求他的建议。管家笑了，作出一副模样，好像早就想到过这个问题，而且乐于听听聂赫留朵夫的主意。实际上他对这个方法可以说是一点不懂。这倒不是由于聂赫留朵夫没有说清楚，而是由于根据这个方法，聂赫留朵夫应该为别人取得利益而丢掉自己的利益。在管家脑子里有一个牢固的信条，那就是每个人都在损人利己。如今聂赫留朵夫居然主张土地的全部利益应成为农民的公益积金，管家就认为可能是有的话他没有听明白。

“我明白了。就是讲这笔公益积金的利息由您收取，是吗？”管家满脸堆笑说。

“根本不是。您要清楚，土地不能够成为私有财产。”

“这话很正确！”

“所以土地上的收益应归大家共享。”

“这么一来，您岂不是就没有什么收入了？”管家收起笑脸说。

“我偏不要。”

管家深深地叹息了一口气，又笑起来了。现在他清楚了，聂赫留朵夫这个人头脑有问题。于是他便研究聂赫留朵夫放开土地的方法，看能否从中寻找到对他有利的条件，而且断定聂赫留朵夫丢掉土地，他作为管家的一定能够捞到好处。

不过，当他清楚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时，他对这方法就不再有兴趣，而且只是为了讨好主人，脸上才保有笑容。聂赫留朵夫见到管家不理解他，就放他走了，自己就在刀痕累累、墨迹斑斑的桌子旁边坐下来，动手起草他的方法。

太阳已经落到刚长翠绿新叶的椴树后面，成群的蚊子飞进房间来，不住地叮咬聂赫留朵夫。他的草稿刚拟完，就听见村子里传来牛叫声、吱吱嘎嘎的开门声、来开会的农民们的说话声。聂赫留朵夫就对管家说，不必让农民到账房这儿来，他决定自己到他们集合的村长的院子里去。聂赫留朵夫很快地喝完管家端给他的一杯茶，步行去了村子。

七

村长的院子里，人声鼎沸。但聂赫留朵夫刚一走进去，谈话声就立刻停了下来，那些农民一个个摘下帽子，像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那样。这个地区的农民比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贫寒得多。姑娘们和村妇们耳朵上都挂着绒毛球，男人们几乎都穿着树皮鞋、土布衬衫和长外衣。有几个人刚干完活回来，光着脚板，只穿着衬衫。

聂赫留朵夫打起精神，开始讲话。他向农民们讲，他要把土地全交给他们。农民们都不吭声，脸上表情也毫无变化。

“因为我想，”聂赫留朵夫急红了脸说，“不耕种土地的不应该占有土地，并且人人都有权利使用土地。”

“这个自然，这话讲得很对。”几个农民回答说。

接着，聂赫留朵夫说土地的收入应该由大家平分，因此他建议他们接受土地，付出他们

所商定的价钱，将它合成一笔公积金，这笔公积金日后由他们自己使用。这时候仍不断有赞同的话语声传来，但农民们原来严肃的脸色变得更加严肃了。他们的眼睛先还瞅着主人，现在却都低下头去，仿佛主人的诡计已被大家看穿，谁也不会受他的骗，而他们又不想让他感到尴尬难堪似的。

聂赫留朵夫说得相当清楚，农民也全是明理的，但这会儿他们不明白他的话。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话，就如同管家无法理解他的话一样。他们相信，维护自身利益是人类的本能，这一点不容置疑。他们经过祖祖辈辈的教训知道，地主总是用损害农民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因此，如果地主把他们召集起来，对他们提出什么新方法，那一定是想用更狡诈的手段来欺骗他们。

“那么，你们计划定个什么价钱使用土地呢？”聂赫留朵夫问。

“为什么要我们来制定价钱？我们可不能确定。地是老爷的，把柄在您老爷手中。”人群里有人回答。

“不对，这些钱由你们自己用在村社将来的需要上。”

“我们不能这么办。村社是一回事，钱又是一回事。”

“你们要明白，”跟聂赫留朵夫一起来的管家，想把事情解释透彻，就微笑着说，“公爵现在把土地交给你们，要你们出一笔钱，但这笔钱又当做你们的资金，是供村社使用的。”

“这种事我们太清楚了，”一个牙齿脱落、神情气愤的老人，没有抬起眼睛来说。“这与银行的那套办法有些相似，反正我们得定期交钱。我们本来就已经够苦的，我们可不愿意这么办，再来这一套，我们这点家当就全完了。”

“这种办法没什么好处。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办事吧。”有几个不满意的、甚至粗鲁的声音说。

聂赫留朵夫提出要签定一个契约，他要在上面签字，他们也要签字。他们听到了，反对得更加的激烈。

“签字做什么？以前我们如何干活，以后仍然怎样干活。要来这一套做什么？我们全是粗人，没有什么文化。”

“我们不同意，由于这一套做不惯。以前如何办，以后也如何办。只要种子能够取消就好了，”几个人同时说。

所说的取消种子，就是说，按照现行规矩，在对于分制的农田问题上种子应让农民出，如今他们要求种子让地主出。

“这么讲，你们不允许这个办法，不愿意接受土地口罗？”聂赫留朵夫向一个年纪不轻、神采奕奕的赤脚农民问。这个农民身穿破敝的老式长外衣，曲着左胳膊，将他那顶破帽子举得非常直，就像军人听到脱帽的命令拿着帽子的样子。

“是，老爷，”这位农民答道，显然还未改掉军人的习惯，一听到命令，就好像受了催眠术。

“这么讲，你们的土地够种啦？”聂赫留朵夫问。

“不，老爷。”这个退伍军人装出愉快的神气回答，尽力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在面前，仿佛要将它奉送给想要的人。

“那么，你们还是好好琢磨一下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吧。”聂赫留朵夫万分惊讶地说，又把他 的建议重述了一遍。

“我们用不着琢磨什么，我们说话算数。”脸色阴沉、牙齿脱落的老人气愤地说。

“我明天还要在这儿住一天。如果你们改变了主意，就派人来跟我说好了。”

农民们沉默不语。

这样，聂赫留朵夫几乎一无所获地走回账房去了。

“我要跟您说句实话，公爵，”管家在他们回到屋里以后说，“您跟他们是没法谈拢的，他们这些人都特死心眼。大凡一开会，他们都特固执己见，谁也无法说动他们，因为他们害怕每一件事情。其实，那些不同意您的办法的庄稼汉，不管是那个白头发的，还是那个黑头发的，都挺聪明的。如果你请他到帐房里来喝茶的话，”管家含笑说，“那么一聊起来，您就 好比见到了智慧老人，他讲起各种事来头头是道。但只要一开会，他就像是完全换成另一个人，对他那一套死不改口了……”

“那么，能不能约几个最通情达理的农民到这儿来呢？”聂赫留朵夫说，“我想给他们解释得清楚透彻。”

“这没问题，”管家笑吟吟地说。

“那么，麻烦您约他们明天来。”

“这全好办，我叫他们明天过来就是了。”管家说，更加欢快地笑了笑。

“看，他这人太鬼！”一个皮肤黧黑、胡子纷乱的庄稼汉摇摇摆摆地骑着一匹大马，对旁边 那位身穿破旧的老式长外套、又老又瘦的庄稼汉讲。那个庄稼汉正骑着马，腿上系的铁索 叮当作响。

这两位庄稼汉在夜里到大路上遛马，纵容他们的马跑到地主的草场里吃草。

“‘你只要签上字，我就把土地免费送给你。’哼，他们作弄咱们还不足够吗！不行，老兄，作不到，如今我们也学会了。”他继续说，同时呼唤一匹离群的小马。“小驹子，小驹子！”他想把小马叫住，可是回头一瞧，马驹不在后边，而是往斜里冲到草场上去了。

“看你这狗杂种，跑到东家的草场上去了。”皮肤黧黑、胡子纷乱的庄稼汉看到那匹离群的小马一面嘶叫，一面在露珠滴滴、野草芳香的土地上奔跑，踩得格格嚓嚓发响，这样讲。

“你听见没有，草场上长满杂草了，等到过节应该打发娘儿们到我们那些对分制的庄稼地里 去拔杂草，”一个穿着破旧的长外衣的瘦庄稼人说，“要不然我们的镰刀都会被弄毁的。”

“他说：‘你签字吧’，”胡子蓬松的庄稼人继续发表着对东家的看法。“倘若你真签了字，他就会一口把你活活地吞进去。”

“这倒是实话。”老庄稼人回答说。

他们没有继续往下谈。空中只飘荡马蹄踏着坚硬的道路所发出的响声。

八

聂赫留朵夫回到屋里。供他过夜的账房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帐房中有一张高高的床，垫着鸭绒垫子，搁着两个枕头，还有一张厚得卷不起来的大红双人 被子，绗得很密，带着花纹，大概是管家妻子带来的嫁妆。管家邀请聂赫留朵夫吃中午留下 的饭菜，但是聂赫留朵夫拒绝了。管家对于伙食低劣和设备简陋致以歉意之后告别，把聂 赫留朵夫独自留在房间中。

农民们的谢绝并没有让聂赫留朵夫感到一点困惑。

刚好相反，虽然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们接受了他提出来的办法，不断向他道谢，而这儿的农

民们却不信任他，甚至公然敌视他，但他的心情仍然平静而欢畅。账房里闷热，不干净。聂赫留朵夫就走到房外，准备到花园里去，但他忽然记起那个夜晚，那个女仆房间的窗户，那个后边的门廊，就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觉得现在去重游那些被犯罪的往事玷污了的地点未免不愉快。他就又在门廊上坐下，久久地瞧着暮色苍茫的花园，吸着温暖的空气里弥漫着的桦树嫩叶的浓香，谛听磨坊哗哗的流水声和夜莺的好听的鸣啭声，另外在门廊附近的灌木丛中还有一只什么鸟发出单调的呼啸声。管家的窗子里发出来的灯光熄了。东边，在谷仓的后面，刚刚升起的月亮撒下万道银光。天空的闪电越来越亮，照着开满鲜花、葱葱郁郁的花园和颓败的正房。远处响起了雷声，有三分之一的天空布满了乌黑的雨云。夜莺和别的鸟停止了歌唱。磨坊哗哗的流水声中，间或夹杂着鹅的几声嘎嘎叫，然后村子里和管家的院子里，早醒的公鸡纷纷打鸣，遇到天气炎热而有雷雨的夜晚公鸡总是啼得很早。常言道，夜晚过得好，公鸡啼得早。对聂赫留朵夫来说，这个夜晚还不仅仅是过得好而已。这个夜晚对他来说，欢乐而幸福。当年他还很年轻纯洁时在此地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夏天，稍闭上眼，往事历历在目，他感到自己现在不但同那时候一样幸福，而且同他一生中一切最好的时刻一样幸福。

他不但记得，并且重新经历了，在十四岁那年他对上帝祷告，请求上帝向他明示真理；他仍然还记得，小时候如何伏在妈妈的膝盖上，哭着向她告别，答应她一直做个好人，决不让 她伤心；他仍然记得小时候同尼科连卡·伊尔捷涅夫一起讲定，他们会互相帮助度过高尚的生活，并尽量为一切人谋求幸福。

这时候，他想起他在库兹明斯科耶受到的诱惑：他想念他的房子、树林、农庄和土地。现在他问自己：我是不是还舍不得那些东西？他更觉得奇异，他居然会想念那些东西。他回忆起白天看到的种种景色：那带着几个小孩子而丢掉丈夫的女人，她的丈夫就是由于砍伐他聂赫留朵夫家森林里的树木而被捕的；还有那荒谬的玛特廖娜，她竟然认为或者最少口头上讲：像她们那样的女人理应当作东家的情人；还有她对孩子的态度，和把孩子送到育婴堂的作法；那个头戴着小圆帽、样子好像小老头、不停地苦笑的不幸孩子，由于吃不饱而险些饿死；那个怀孕的瘦小女人，因为劳累太多没有照看好饥肠

鹿 鹿 的奶牛 而被迫为他免费做工。他又回忆到了监狱、阴阳头、牢房、臭味，同时也回忆到了自己的和京城里所有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事情清清楚楚，不容置疑。

一轮像一个圆盘似的明月从谷仓后面升上来，一些物体在月光的映射下显出乌黑的阴影，铺满了整个院子。颓败的正房的铁皮房顶开始闪闪发光。

沉默了一阵的夜莺仿佛不愿意辜负这皎洁的月光似的，又在花园里唱起了歌。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的时候，怎样开始考虑他自己的生活的，开始解决他要做的事和应如何去做的的问题，想起这些问题是怎样将他困住，无法解决，因为每一个问题都引起那么多的顾虑。现在当他重新考虑这些问题时，却不由得惊讶地发现一切问题原来都很简单。而为什么会变得简单，只是因为他现在不考虑他将因此而遭受的后果，他对这些后果已不再有兴趣，他所考虑的只是他应该做哪些事。说来奇怪，他自己需要什么，他怎么也拿不定主意，至于他必须为别人做些什么，他却很清楚明白。现在他就毫无疑问地知道保留土地是不对的，必须把土地交给农民；他毫无疑问地知道他不应该扔下卡秋莎不

管，应该去帮助她，应该不惜任何代价赎清他对她所犯下的罪；他毫无疑问地知道他必须研究、分析、明白、理解所有同审判和处罚之类相关的事件，他觉得自己从中看出了一些别人没有看出来的东西。

所有这些会有什么结果，他不明白，但他清楚，不管是第一件事情，还是第二件事情，还是第三件事情，他都必须做不可。这种坚定的信念让他感到快乐。

乌云靠近了。现在看到的已经不是远处朦胧的电光，而是照耀整个院子、破屋子和倒塌门廊的光亮闪电。雷声在头上隆隆作响。鸟雀都已停住鸣叫，但是树叶却飒飒地作响起来，风一直吹进聂赫留朵夫坐着的门洞里，吹拂着他的头发。大粒的雨点一滴一滴地掉下来，敲打着牛蒡叶子和铁皮房顶。一道光亮亮的闪电照亮整片天空，一瞬间万籁俱寂。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从一数到三，一道霹雳就在头上打响，接着空中轰隆地响过一阵响雷。

聂赫留朵夫走进房里。

“对了，对了，”他想。“我们的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一切事情，这些事情发生的全部意义，是我所无法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为什么世界上有过我的姑姑们？为什么尼科连卡·伊尔捷涅夫死了，而我却活着？为什么世界上有一个卡秋莎？为什么我有过那种疯魔状态？为什么有过那一次战争？为什么我后来过那种放荡的生活？理解这一切，理解上帝安排的全部事情，在我是无法办到的。不过，执行那铭刻在我灵魂上的上帝的旨意，我却能办到，这一点我清楚地知道。我只有这样做，心里才安宁，这是毋庸置疑的。”

淅淅沥沥的小雨已经变成瓢泼大雨，雨水从房顶上流下来，灌进下面的小木桶里，咕咕地响。闪电不再那么频繁地照亮院子和房屋。聂赫留朵夫回到房间里，脱掉衣服，在床上躺下。他有点担心臭虫，他有些怀疑它们藏在破旧而肮脏的壁纸里面。

“是的，应当认为自己是仆人而不是主人。”他暗想，并且因为这个想法而暗自高兴。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他刚熄掉蜡烛，那些虫子就爬到他身上来，开始叮他。

“交出土地，滚到西伯利亚去，在西伯利亚有的是跳蚤、臭虫、肮脏……那没有什么了不起，既然要受这种折磨，我也受不了。”不过，虽然有这样的愿望，他还是受不了这个折磨。他起来坐到打开的窗户前，欣赏着逐渐远离的乌云和重新露脸的月亮。

九

聂赫留朵夫一直到了下半夜才入睡，因此第二天起得很晚。

中午，七位被选举出来的农夫应管家的邀请聚到苹果园的苹果树底下。管家布置了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全都是用木桩敲进地里，再垫上木板建成的。

聂赫留朵夫和管家极力劝说才使那些农民戴上帽子，在凳子上坐下。那个裹着干净的包脚布、穿着干净的树皮鞋的老兵特别恭敬而又固执地把他的破帽子举在胸前，像在参加葬礼似的。但是当他们中间的一位老人戴上他的大帽子，裹紧了身上的土布新外衣，来到长凳旁坐下，别人也就照他的样子做了。这位老人肩膀很宽，相貌端正，花白的胡子里有些卷毛，像是米开兰基罗笔下的摩西，他那光秃的前额经长期的日晒而显棕黑色，周围长着浓密鬈曲的白发。

等到大家纷纷坐下，聂赫留朵夫就坐在他们对面，把他的胳膊肘撑在桌面铺着的一张写

有他 的方案的大要的纸上，开始叙述这个方案。

不知道是由于今天农民少一点呢，还是由于聂赫留朵夫不计算个人损失而关心大家的事情，他今天并不觉到心慌意乱。他十分自然地主要对肩膀宽宽、留着花白大胡子的老农民说话，看他同意或是反对。但是聂赫留朵夫对于他猜想错了。这个长相端正的老农虽然有时候也赞同地点点他那具有家长气度的端庄的头，有时候听到别人的反驳就皱着眉头摇摇头，其实他不太明白聂赫留朵夫的话，经常要等其他的农民用他们平实的话解释一遍，他才清楚。还是坐在他边上的一个小老头比较明白聂赫留朵夫的语言。这个小老头瞎了一只眼睛，脸上差不多没有留胡子，身上穿一件打着补丁的土黄色布紧身的外套，脚上穿着一双后跟已经磨歪的旧皮靴子。聂赫留朵夫后来才了解他是个砌炉工匠。这个小老头快速地动着眉毛，注意倾听，马上把聂赫留朵夫的语言翻译一次。那位身材矮壮、蓄着雪白大胡子、一对机灵的眼睛炯炯有神的老头儿也可能理解他的话，而且找种种机会插几句嘴戏弄东家，凭此卖弄自己的小机灵。退伍军人看样子也颇懂事，可惜长期的军队生活使他头脑反应迟钝，而军人的习惯又让他说起话来使人摸不着头脑。对这件事情态度最严肃的是那个声音低低、鼻子很长、留着有一撮山羊胡子的那位高个子。他穿着一件很干净的土布衣服和一双新的皮鞋，完全明白聂赫留朵夫的话，而且非到不得已时不开口。

余下还有两个老人，一个就是那个昨天在会场上对聂赫留朵夫的所有建议一概反对、牙齿脱落的老人；另一个老人身材很高、白头发、腿有点瘸，面貌和善，两只瘦脚上紧紧地裹着白色包脚布，外套一双农民的靴子。他们两个人虽然也专心听着，却几乎从没发过言。

聂赫留朵夫首先阐明他对土地所有制的观点。

“依我看来，”他说，“土地既不能买，也不能卖。因为如果土地可以买卖，有钱的人就会把土地全都买去。到那时候，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夺取没有土地的人的东西，因为他们有土地使用权，而别人没有。这样，哪怕你在他的土地上站一下，他们也要你出钱。”他引用斯宾塞的理论补充了一句。

“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将他的翅膀绑起来，瞧他还能不能飞上天。”留着花白大胡子的那位老头眼睛里含着笑说。

“这话说得一点不错。”长鼻子的那位老头声音低沉地说。

“对了，老爷。”退伍的军人说道。

“有个婆娘为她的奶牛割点草，就被抓起来，被送去坐牢。”相貌很善良的瘸腿老头说道。

“我们自己的土地在五俄里之外，地租又昂贵得要命。支付了地租，本钱都挣不回来。”牙齿脱掉的老头儿愤怒地补充说，“人家要求我们长就长，要求我们短就短，实际上，比劳役还糟糕。”

“我和你们心里想的一样，”聂赫留朵夫说道，“我认为占有土地是一项罪孽，因此我想要将土地送交出去。”

“嗯，这可是一件好事。”蓄着摩西式髭曲大胡子的老头儿说道，显然认为聂赫留朵夫想要出租土地。

“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我不想再这样占有土地了。如今就是要思考一下，土地应该如何分配。”

“把它交给庄稼汉就完了。”牙齿脱落的老人气冲冲地说。

起初聂赫留朵夫心里一阵发慌，感到这句话里隐含怀疑他的意图是否诚恳的意味。不过他马上镇定起来，接着那句话，把他所要说的话一古脑儿说了出来。

“我本人是乐意把土地交出来的，”他说，“但是交给谁呢？以什么方式交？交给哪些农民？再说，为什么偏交给你们的村社而不交给杰明斯科耶村社呢？”（那是附近的一个村子，份地极少。）

大家不吭声了。只有老兵说了一句：

“是，老爷。”

“好，那么，”聂赫留朵夫说，“请大家告诉我，倘若沙皇说把地主的土地都拿过来，分给农民……”

“难道真有这样的说法？”牙齿脱落的老人问道。

“没有，沙皇什么也没说。这不过是我自己说的：倘若沙皇说，把地主的土地拿过来，交给农民，那你们会怎么办？”

“怎么办？那就把所有的土地按人口平分。农民有份，地主也有份，”砌炉匠说，他的眉毛忽上忽下地迅速抖动。

“要不然又该怎么办？按照人头平分好了。”相貌和善、裹着白色包脚布的那位瘸腿老头说。

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法，认为它能够让人人满意。

“到底如何按照人头分呢？”聂赫留朵夫问道。“做佣人的也会有份吗？”

“绝对不可以，老爷。”退伍军人说，尽力想作出又快乐又有劲头的样子。

但是，清楚事理的高个子农民不赞同他的意见。

“既然分配，那就应该人人有份，大家平分。”他思考了一下，声音低沉地回答。

“不可以，”聂赫留朵夫事先就预备好了反对意见，说道。“要是大家一起平分，那些自己既不劳动也不耕种的人，比如老爷、听差、厨师、官吏、文书、还有所有的城里人，就每个都能够领到一份，能够把土地卖给有钱人。这样土地就再次集中到财主手中。那些依靠自己一小块地生活的人，他们生儿育女，人口添加，土地就会更加分散。财主就又会把缺少土地的人抓在手中。”

“对，老爷，”退伍军人赶快响应。

“那就禁止买卖土地，只有自己耕种的人才能拥有土地。”砌炉匠打断老兵的话，生气地说。

聂赫留朵夫反驳这个意见说：“一个人究竟是在为自己还是为别人种地，那难以分清。”

这时候，明白事理的高身材农民提出另一个建议，主张大家按劳动组合的方式耕种土地。

“只有种地的人才能分收成。那些不种地的，就什么也得不到。”他用果断的男低音说。

对于这种共同经营的方案，聂赫留朵夫也已经准备了反驳的论据。他说，要做到这一点

大家 就得都有犁，都有一样多的马，谁也不能比谁少；或者一切东西，不论是马、犁，还是脱谷机、各种农具，都归公家。不过，要这样做，就得征求大家都同意。

“我们这班人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同意的。”怒气冲冲的老人说。

“那可就有打不完的架了。”长相和善的白胡子老人说。“那些娘儿们准保会把彼此的眼睛都剌出来。”

“还有，土地有瘦有肥，该怎样分呢？”聂赫留朵夫说。“凭什么有的人该种黑土，有的人就只该种粘土和砂地呢？”

“那就把肥瘦不同的土地划成小块块，由大家平分。”砌炉匠说。

对于这种意见聂赫留朵夫反驳说，问题不是仅划分一个村社里的土地，而是普遍地划分各省的土地。倘若土地是无代价地交给农民，那么凭什么有的人得好地，有的人就得坏地呢？大家肯定是都想要好地的。

“是，老爷。”那个老兵说。

其余的人全部不吭声。

“所以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聂赫留朵夫说道。“这一层不仅我们在思考，很多人都在思考。有一位叫乔治的美国人有了一个主意。我赞成他的意思。”

“总之你就是东家，你想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又会有谁拦着你？你拿主意就是了。”怒容满脸的老头儿说着。

这样的插话让聂赫留朵夫感觉到很窘，但是他高兴地发现，对于这种插话感到不高兴的，不仅他一个人。

“等一会儿，谢苗大叔，你叫他将话说完。”清楚事理的农民庄严地低声说。

他这些话让聂赫留朵夫取得了鼓励，他便向他们解释亨利·乔治所谓的单一税方案。

“土地不应属于任何一个人，土地应该属于上帝。”他讲道。

“对，这话一点也不错，”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土地全都是公有的，每个人都享有同等权利。土地有好地有坏地，每个人都想得到好地。那么，应该如何分才公平呢？应该这么办：只要是分配到好地的人，就应该按照地价付钱给那些没有土地的人。”聂赫留朵夫自问自答道。“但是究竟是谁应该付钱给谁，就很难确定；再说村社的公益事业也是需要筹款。所以得这么办：只要是分到土地的人，都要按照地价付钱给村社以作各种用途。这样就比较公平合理了。你想得到土地，就必须付钱，好地应该多付些，坏地就少付些。你如果不要土地，那就不用出钱，公益金就由那些拿到土地的人代替你支付。”

“这样可就合理了。”砌炉匠动了动眉毛说。“只要谁的地好，谁就应该多出钱。”

“那么乔治倒真的是个有头脑的人。”长相端正、胡子弯曲的老头说。

“不过，所定的价钱必须大家出得起才行。”高身材的农民用男低音说，分明已经看出实施这个办法将会带来的后果。

“钱数应当定得合适，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如果太高，大家就会出不起，导致亏空。如果太低，大家就会互相购买，拿土地做生意。这就是我打算在你们这儿办的事。”

“这比较妥当，也很对。嗯，这个办法不赖。”农民们说。

“嘿，这个人的头脑可真不赖。”肩膀宽阔卷毛胡子老人又说一遍。“这个乔治！他想出来一个多好的办法。”

“哦，如果我也希望得着一块地，那怎么办？”管家笑吟吟地说。

“如果能腾出一块地来，你就拿去自己种。”聂赫留朵夫说。

“你要地干什么？你即使没有地肚子也是饱的。”眼睛里含着笑意的老人说。

会议到此就结束了。

聂赫留朵夫将他的建议又重复一遍，但没有要求他们现场作答，而是劝他们同村社里的人商量，再将结果告诉他。

农民们同意去同村社里的人商量，然后再做出回答。然后就起身告辞，带着激动的心情回去了。很有一会儿大路上还传来他们响亮的谈话声。农民们的谈话声一直持续到深夜，从村子里沿着河道传过来。

第二天，农民们并没有干活，却都在讨论东家的这项建议。全村共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东家的这项建议对他们有利益，没有危险；另一派则认为其中有诈，但是却不知道诈在哪里，所以疑虑重重。但是到了第三天，大家全都同意东家的这项建议，纷纷走过来向聂赫留朵夫宣布整个村社的这项决定。在接受东家这项建议上，有个老太太的一些话起了很大作用。她说东家在考虑着他的魂灵，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拯救他的灵魂。老头儿们全都同意她的话，这就完全打消了他对东家这种行为有诈的忧虑。聂赫留朵夫在达达巴诺沃的这段逗留期间施舍出去了不少钱，这也就证实老太太的解释是有理的。但是，聂赫留朵夫在这里布施钱财，当初原因是他第一次见到本地农民贫穷和困苦的窘境，大为震惊，所以虽然知道施舍是没有道理的，还是禁不住施舍了一些钱。现在他手头上的钱非常多，由于收到了去年卖出库兹明斯科耶树林的钱，还有出售农具的定金。

农民们刚刚听说东家对求告的人都给了钱，顿时就有许许多多的人从附近各地区赶来，向他要求周济，主要是妇女。他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他们，该如何来解决问题，该把钱给谁，该给谁多少。他认为既然他手头有很多钱，就应该把这些钱散发给那些来祈求周济而又确实贫穷的人。不过，这样偶尔把钱散发给那些求助的人却毫无意义。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一走了事。他也确实这么做了，赶紧离开了那个村庄。

聂赫留朵夫住在达达巴诺沃的最后一天，到正房去，着手清理遗留在那儿的一些东西。他在姑姑的一个安着狮头铜环的红木旧衣橱底下抽屉里发现了许多信件，其中夹着一张许多人合照的相片，上面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有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有当时还是个大学自己的自己，还有纯洁、娇嫩、美丽、充满生活的乐趣的卡秋莎。在正房里保存着的全部物件中聂赫留朵夫自己只留下了这张照片和那些信件。他把剩余的东西全都让给一个磨坊主人，这个人在笑吟吟的管家的怂恿下，以原价的十分之一买下那些东西，还打算拆掉达达巴诺沃的正房，连同全部家具一齐运走。

聂赫留朵夫回忆起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的时候怎样舍不得放弃财产，感到很奇怪：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如今他越来越感觉放下包袱的轻松快乐，而且像探险家发现新大陆那样感觉到新鲜。

十

聂赫留朵夫这次返回城里，感到这个城市特别闹。傍晚，他在一片光明的街灯下从火车站走回到自己的寓所。

各个房间里还充溢樟脑的气味，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和柯尔涅伊都万分疲惫，怨气满腔，甚至为收拾衣物吵起架来，而那些衣物的用处似乎只在于挂出来透一透风，再收藏起来。聂赫留朵夫的房间里没有人住，可也没有收拾利落。许多箱子挡着通道，以致于进

出房间都相当费劲，所以聂赫留朵夫这时候回来，显然妨碍了这所宅子里由于某种奇异的习惯而进行的工作。这种工作聂赫留朵夫从前也亲身参加过，可是农村的贫困印象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子里，现在这种工作在他看来就极其荒唐，使他极不愉快。他准备第二天搬到旅馆里去住，听凭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随她自己的心意去侍弄那些衣物，等到他的姐姐来了，再由她最后处理这所房子里的一切东西。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这所房子，就在监狱的附近随便寻找找到了一家简陋、肮脏的带有家具的公寓，开了两个房间，叫仆人们把他从家里挑选出来的东西挪到这里，自己便去找律师。

外面天气很寒冷，在雷雨过后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春寒。天那么寒冷，风又是那么刺骨，聂赫留朵夫穿着一件薄大衣觉得身上很冷，就赶快加快步伐来暖和身子。

他回忆着农村形形色色的人：妇女、孩子、老人，还有他们的贫困和劳累，特别是那个面容像个小老头、不住微笑的婴儿，乱蹬着两条没有腿肚子的蚯蚓似的腿。这在他仿佛是第一次见到似的，他不由自主地拿农村的景象同城里的情形相比。他路过肉店、鱼店、服装店，发现衣冠楚楚、肥头胖脑的小店老板竟有这样多，不由得暗暗吃惊，这在他也仿佛是第一次见到似的，他们都露出衣食饱暖的神态，这样的人在农村里是一个也没有的。显然，这些人坚信，他们想方设法诈骗不识他们货色的人，并非是在干什么无聊的事，却是在做很有益的工作。还有一些臀部肥大、背上钉着几排纽扣的马车夫，头戴帽檐上滚着丝绦的帽子的看门人，头发髻曲、系着围裙的女仆，特别是那些剃光脑袋后面的头发、舒适地坐在四轮轻便马车上、轻蔑而淫荡地打量着行人的出租马车的车夫，也都露出衣食饱暖的神态。现在聂赫留朵夫情不自禁地看出所有这些人其实都是丧失了土地而被迫进城的乡下人。这些乡下人，有的善于利用城市的条件，开始过上流人那样的生活，暗自庆幸自己所取得的社会地位。可是有的在城里却过着比乡下更糟更可怜的生活。聂赫留朵夫觉得那些制靴工人就属于这类可怜的乡下人，他从地下室的窗子里看见他们在那儿做工。那些身体枯瘦、面色惨白、头发凌乱的洗衣女工也属于这类可怜的乡下人，她们裸露着瘦胳膊，在敞开的窗子前熨衣服，窗口冒出一股股混合着肥皂味的蒸汽。聂赫留朵夫迎面遇见的两个油漆工人也是如此，他们系着围裙，从头到脚沾满油漆，趿着一双破鞋，脚上没穿袜子。他们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上面，瘦弱的胳膊晒得发黑，一根根青筋暴起，手里提着油漆桶，不停地彼此对骂。他们脸色疲劳，神情气愤。运货的马车夫也是这样的脸色，他们坐在颠得摇摇晃晃的大板车上，满身尘土，面容乌黑。有些沿街乞讨的男女也是这样，面容浮肿，衣衫褴褛，身边还带着孩子。聂赫留朵夫路过一家小饭铺，从敞开的窗口望进去，也看见了同样的脸色。

在那儿，在几张摆满酒瓶酒杯和茶具的肮脏桌子之间，穿着白色衣服的堂倌正在摇摆着身子，来回穿梭，在桌子周围坐着一些满头大汗、脸色通红然而神情呆板的人，嘴里又叫又唱。只有一个人坐在窗前，皱着眉头，嘟出嘴唇，眼睛呆滞地瞪着前方，好像在拼命回忆什么事。

“他们聚在这儿有什么事呀？”聂赫留朵夫想，不由自主地呼吸着让寒风带来的尘土和空气中清新油漆的呛味儿。

在一条马路上，一队装运着铁器的货车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发出可怕的轰隆声，很快追上他了，振动得他的头和耳朵阵阵作痛。他加快步子，想追到货车前头去。在这铁器的轰隆

声中，他忽然听见有人正在叫着他的名字。他停住脚步，只见前方不远处停着一辆轻便马车，在车上坐着一位军官，神采奕奕，肤色红润，蓄着两边翘起的八字胡子，胡子上边涂过油。他热情地冲聂赫留朵夫招了招手，笑得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聂赫留朵夫！是你吗？”

刚一听到这句招呼，聂赫留朵夫感觉很高兴。

“啊！申博克！”他快活地说，不过他立刻明白过来，这其实不值得这么快活的。

这个人就是当初到他姑姑家里去过的申博克。聂赫留朵夫与他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但听

说他尽管欠下很多债，而且从他的兵团调到骑兵队里，却不知为何凭借某些手段始终厮混在富人的圈子里。这一点他那踌躇满志的神态就可以证明。

“见到你可真高兴！眼下，我在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了。哎，老兄，你倒是显老了。”他说着，从那辆轻便马车上下来，舒展舒展他的胳膊。“我仅从你走路的姿势就认出了你。哦，怎么样，咱们一块儿去吃饭？你们这儿哪家馆子的菜还不错？”

“我不知道是否有时间陪您。”聂赫留朵夫回答，一心只想尽快摆脱这位朋友而又不会得罪他。“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他问道。

“有事情啊，老兄。有关于监护的事。我如今当上监护人了。在经营着萨玛诺夫的产业。说真的，他是一个财主。他患了脑软化症。但他拥有五万四千俄亩的土地呢！”他活灵活现地说，好像他自己具有这么多土地。“他那份资产糟蹋得很多。土地全部都租给了农民。但是他们一个钱也不上交，欠款就达到八万多个卢布。我去了仅仅一年就扭转了局面，让东家添了收入百分之七十。你说如何？”他得意洋洋地讲。

聂赫留朵夫回忆起，他听人讲过，申博克由于荡光了家产，还欠下许多债，这才利用特殊关系，当上一个浪费成性的老财主的资产监护人。如今他就依靠这种监护工作生活。

“怎样才能摆脱他而又不会得罪他？”聂赫留朵夫一边想，一边瞧着他那张神采奕奕、胡子光光的胖脸，听着他亲切地讨论哪家饭馆的菜式好，吹嘘他作监护工作的本领。

“哦，那么我们到底上哪儿去吃饭呢？”

“可惜我没有时间了。”聂赫留朵夫看了看他的怀表说。

“那么你听我说。今天傍晚赛马。你去看吗？”

“不，我不去。”

“你去吧。我现在已经没有马了。但我老是赌格里沙的马。你还记得吧？他有一匹好马。晚上你去吧，咱们一块儿吃晚饭。”

“晚饭我也不能去吃了，”聂赫留朵夫陪着笑脸说。

“噢，你到底怎么了？你现在准备去哪儿？如果你乐意，我用车送你去。”

“我去找一个律师。他住得不远，拐过弯去就是。”聂赫留朵夫说。

“啊，对了，你在忙监狱里的什么事吧？你在忙着给犯人疏通？科尔卡金家的人说给我听了。”申博克笑着讲起来。“他们已经到乡下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讲给我听听！”

“对，对，这些全都是真的，”聂赫留朵夫回答，“但是街上怎么好说呢！”

“是的，是的，你从来就是个怪人。那么你要去看赛马吗？”

“不，我没时间去，也不愿意去。请你千万别生气。”

“口害，生气，哪里的话！你现在住在哪儿？”申博克问道，突然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眼神呆滞，眉头锁起。他显然想起一件什么事。聂赫留朵夫见到他脸上有一种呆滞

的表情，同他刚才从饭店惊奇地看见的那个锁起眉头，嘟出嘴唇的人一模一样。

“天气好冷啊！真的？”

“对呀，对呀，很冷。”

“我买的东西还在你车上吗？”申博克转过身问马车夫。

“嗯，那么再见。碰见你真是高兴，真是太高兴了。”申博克说，紧接着紧紧地握握聂赫留朵夫的手，接着跳上马车，把他那只戴着白鹿皮手套的一双大手举到他红润的脸庞前，挥了挥手，照例显露出白得奇怪的牙齿笑了笑。

“莫非我以前也是这个样子？”聂赫留朵夫想着，继续朝律师家里走去。“是的，尽管我不完全是那样，可是也很希望那样，并且认为自己会那样过一辈子。”

十一

律师跳过其他要求接见的人，提前接见了聂赫留朵夫，立刻讲到梅尼绍娃母子的案子。

他看过了这份宗卷，对指控他们缺乏证据表示愤慨。

“这个案件真叫人气愤，”他说，“火很可能是房东他自己放的，其目的是要捞到一笔保险费用。但主要问题由于梅尼绍娃母子的罪名根本没有得到证明，连一点点罪证也都没有。这都是侦讯官过于卖力，副检察官粗枝大叶弄出来的。”

“这个案子只要不是在县里而就在此地审讯，我就敢担保他们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而且我不取分文报酬。好，现在我们谈另一个案子：我已经帮费多霞·比留科娃写好了呈给皇上的诉状。如果您到彼得堡去，您就自己把它带去，亲自往上递，再托一下人情。否则他们就随便问一声司法部，那边回答也敷衍了事，匆匆地就把这个案子推出去，也就是把诉状驳回，最后，事情毫无结果。您要想办法托一托地位最高的人才行。”

“去见皇上吗？”聂赫留朵夫问。

律师笑起来。

“那倒是最高一级，高到无法再高了。我说的‘地位最高’指的是上告委员会的秘书或者主任。那么，现在还有别的事情吗？”

“有，我这里面还有宗教信徒写给我的信。”聂赫留朵夫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如果他们写的都是事实，那么可真是奇怪了。我今天一定要与他们见个面，了解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瞧您已经变成了一个漏勺或者瓶颈，监狱里的冤假错案都要通过您一个个流出来了。”律师笑嘻嘻地说着。“实在太繁多了，您应付不过来的。”

“不，这可就真是咄咄怪事。”聂赫留朵夫说道，接着就简单扼要地讲了讲情况。有一个村子，老百姓聚集在一起诵读福音书。一位长官走来，将他们驱散。但是下一个礼拜日他们又聚集在一起。长官于是派了警察来，并起草了个公文，把他们送到了法院。法院侦讯官审讯他们，副检察官起草好了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了起诉，他们于是被移送到庭审判。副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桌上放一件物证——那本福音书，他们于是被判处流放。“这可真是骇人听闻。”聂赫留朵夫说道。“难道确实有这种事情吗？”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好多方面都很奇怪。喏，乡村警察是奉命捕人，这我倒能理解，但是写起诉书的是副检察官，他总归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嘛。”

“错就错在这儿。我们一向认为检察官和一般的法院工作人员都是自由派，都是所谓的新人。他们曾经倒是这样的，可现在却完全变成另一种人了。他们这些官僚，只关心每月的二十号。他们领薪水，希望加薪，他们做事奉行的全部原则就是这么一套。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告一个人，然后审判他，定他的罪。”

“可是难道一个人只因为跟别人一块儿读《福音书》，就能被判处流刑吗？这是什么法律？”

“只要能够证明这个人读《福音书》的时候敢于违背教会的解释，不按照规定向别人讲解《福音书》，那就不仅可以把他流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而且可以把他送去服苦役刑。当众诋毁东正教的信仰，按照第一百九十六条，就要判处永久流放。”

“这不可能。”

“我老实地告诉您，我一直对法官老爷们这样说，”律师继续讲下去，“我看他们不可能不感激涕零，因为如果我没有坐牢，而且您没有坐牢，如果我们大家都没有坐牢，那就必须得感谢他们的恩德。以至于要剥夺我们每人的特权，流放到一个地方，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如果检察官和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的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还要法院做什么？”

律师大笑起来。

“哈哈，看看您都提出什么问题来了！哎，老兄，这可算是个哲学问题呀。当然，这种问题也是可以讨论。您星期六来吧。在我的家里，您可以碰见学者、文人或画家。到那个时候咱们就能够谈谈一般性的问题了，”律师说这个“一般问题”时带有明显的嘲讽的口气，“我妻子您是认识的。您就过来吧！”

“好，我尽量来。”聂赫留朵夫回答说。他觉得自己在说假话。他所说的尽量来，其实是尽量想办法不来参加律师的晚会，尽量不与在他家里的学者、文学家、画家周旋。

刚才聂赫留朵夫讲到如果法院工作人员可以凭自己的喜好随意应用或者不应用法律，那么审判就不具备任何意义，律师听完后却报之以哈哈大笑，而且律师在谈到“哲学”和“一般问题”这些字眼时，用的是那样的一种口吻，这一切都让聂赫留朵夫感觉他与律师，而且可能也同律师的朋友们，对事情的一些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聂赫留朵夫觉得，虽说他现在跟申博克这班旧友已经有了一些区别，然而他跟律师以及律师那个圈子里的人们的距离要更大得多。

十二

距离监狱的路很遥远，时间已经不早了，聂赫留朵夫就雇用了一辆马车。车夫是一个中年人，看上去聪明而且善良。走在一条街上，车夫向聂赫留朵夫转过身子来，指点给他看一座正在破土修建的高楼。

“您看看，他们正在盖一座多么阔气的大楼。”他说，那副神气活现的劲头仿佛他也是这座房子的主人，所以得意洋洋。

那所房子的确造得很大，格局复杂，样式新颖。高耸的建筑物由坚固的脚手架围绕着，坚固的脚手架用大松木搭成，再用铁钩扣紧，一道薄板墙把建筑物同街道隔开。工人们拎着石灰浆，在脚手架上像蚂蚁似的走来走去，有人在砌墙，有人在劈砖头，有人把沉甸甸的灰篓和泥桶提上去，再把空的放下来。

有一个身体壮实的老爷，大概是建筑师，穿着讲究的服装，站在脚手架旁边，用手指点着上边的什么东西，在对一个弗拉基米尔县的包工头讲话，那个人毕恭毕敬地听着。有些载着货物的大车从大门口走进来，有些空车走出去，都从建筑师和包工头跟前经过。

“做工作的人也好，强迫他们做工作的人也好，全部认为应该按照这个样子过日子。虽然有些工人们的妻子怀了孕，却还得在家里面干着不能够胜任的繁重活，他们的小孩子戴着碎布小圆帽，在面临饥饿时像小老头似的露出一丝苦笑，乱蹬着小小的细腿，他们自己却还得为一个愚蠢而且没有作用的人，一个掠夺他们和强迫他们破产的人筑造这么一座愚蠢而没有用处的宫殿。”聂赫留朵夫看着这座房子，心里想着。

“是的，盖这样的房子简直就是荒唐。”他把心里面的想法说出口来了。

“怎么会荒唐呢？”马车夫气愤地说，“老百姓依靠它吃饭，不能够说它荒唐！”

“要知道这种工作是没有用处的。”

“既然别人造它，那就证明它有用处，”马车夫反驳说，“老百姓靠了它才有饭吃。”

聂赫留朵夫不再吭声，尤其是因为车轮辗地时辘辘地响，谈话也难以听清。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这辆马车从石子路上拐弯走上一条大路，因此谈话方便了，马车夫就又与聂赫留朵夫闲聊起来。

“现在老百姓从乡下纷纷涌进城里，多得不得了。”他说着，在驭座上转过身来，对聂赫留朵夫指了指一伙迎面走来的从农村来的工人，他们肩膀后面背着锯子、斧子、短皮袄、袋子。

“比往年多吗？”聂赫留朵夫问。

“多得没法说！今年各处都挤满了人，简直多得要命。那些雇主像刨花一样把老百姓丢来丢去。哪儿都是满满的。”

“怎么会这样？”

“人越来越多嘛。根本没地方容纳。”

“人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待在乡下？”

“待在乡下没有活干，没有土地耕种呀。”

聂赫留朵夫好像是一个负了伤的人，觉得其他人经常是有意触碰他的伤疤，其实那是由于碰到痛的地方才有这样的感想。

“难道所有地方都是这样吗？”他偷偷地想，并且询问马车夫，他们村子里面有多少土地，他自己家里面有多少土地，为什么他要等在城市里。

“我们在乡下的土地，老爷，每个人平均只有一俄亩土地。我们家里有三口人的土地，”马车夫兴趣高昂地讲起来。“我家里面有父亲，一位兄弟，还有一位兄弟参军去了。他们在耕地里干活，可是活计不多，一做就做完了。因此我那个弟弟也就想到莫斯科来。”

“你们难道不能租点土地来种吗？”

“现在上哪儿去租土地？原先的地主老爷都把资产吃尽卖光了。商人们把土地全部抓在手中。你休想从他们的手里租到任何土地，他们全部自己经营。我们那里过来了一个法国人，他把我们那位老东家的土地全买了下，自己进行经营。他不愿意出租土地，你就没有

任何办法。”

“那是个什么样子的法国人？”

“那个法国人姓杜法尔，您也许听说过。他在一家大戏院里给演员们装假头发。那是个挺不错的差事，所以发了财。他买下了我们女东家的所有田产。现在他骑在我们头上，由着性儿，欺侮我们。感谢上苍，他本人倒还算是好人。但他那个俄国老婆是一只凶残的母老虎，我的上帝啊。她搜刮老百姓，可厉害了。得，监狱到了。您在哪儿下车？大门口吗？我看他们不会放我们过去的。”

十三

聂赫留朵夫拉了拉监狱大门口的铃，心想不知道玛丝洛娃今天的心情怎样。他想到不论她心里还是聚集在监狱里那群人的心里他都觉得保守秘密，心里就不由得一阵发紧，战战兢兢。

他对着出来开门的看门人说明求见玛丝洛娃。看守就回去询问了一下，告诉他玛丝洛娃现在正在医院里。聂赫留朵夫于是上医院。在医院看门的是个和气的小老头，马上放他进去，差问他要去见什么人，于是就把他带到儿科病房里。

一位青年医生，全身散发着一股石炭酸味，在过道里接见了聂赫留朵夫，严肃的询问他有什么事。这位医生事事体恤囚犯，所以经常与监狱当局，甚至与主任医生发生矛盾。他只怕聂赫留朵夫提出什么过分要求，那就表示他对于任何人一视同仁，还假装出一副怒气冲天的样子。

“这儿没有女病人，这儿是儿童病室。”他说。

“我知道，不过这儿有一个从监狱里调来担任杂差的女助理护士。”

“没错，这儿有两个这样的人。那么您到底有什么事？”

“我与其中的一个熟识，她叫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说，“我现在想跟她见一见面，我不久要去彼得堡为她的案子上诉了。喏，我还想把这个东西交给她。一张照片而已。”聂赫留朵夫说着，从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来。

“行，这个没问题。”医生态度缓和地说，接着嘱咐一个系白围裙的老太太把助理护士玛丝洛娃叫过来。“您是否要在这儿坐一会儿？到候诊室去吧。”

“谢谢。”聂赫留朵夫说，忙趁医生态度好转，就向他打听玛丝洛娃在医院里的工作情况。

“还可以，主要是考虑到她过去的的生活，应该说很不错了。”医生说。“喏，她不是来了嘛。”

老太婆是从一扇门里走出来的，后面紧跟着玛丝洛娃。玛丝洛娃身穿条纹连衣裙，外面系着一道白围裙，头上包着一块三角巾，把她的头发盖住。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她的脸刷地涨红了，迟疑不决地站住，又皱起眉头，耷拉下眼睛，踩着走廊里的长地毯朝他快步走来。这时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身边，本想不用同他握手，但后来还是向他伸出手，不用说，她的脸变得更红了。自从上次他们谈话时她发了一顿脾气并且还道了歉以后，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这样见到过她。他料想她今天的心情可能又同上次一样。可是此刻她完全不同，脸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神态：拘谨，羞怯，这让聂赫留朵夫觉得她很反感他。和医生说的话一样，他对她也这么说了。他告诉她他将会去彼得堡，随后他把装着从达达巴诺沃带来的照

片的信封也交给她。

“这张旧照片是我在达达巴诺沃找到的，您准会喜欢的。拿去吧！”

她的黑眉毛微微扬起，她那斜睨的眼睛惊讶地打量着他，仿佛在问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她一言不发地接过那个信封，把它放在围裙里边。

“我在那儿见到了您的姨妈。”聂赫留朵夫说。

“是吗？”她淡淡地说。

“您在这儿过得好吗？”聂赫留朵夫问。

“是的，挺好，”她说。

“不太苦吗？”

“不，不算苦。只是我还没有习惯。”

“我很为您感到高兴。这儿总比那边好。”

“‘那边’是哪边？”说着，她脸上泛起了红晕。

“那边就是监狱里。”聂赫留朵夫赶紧说。

“这儿又好在哪儿呢？”她问。

“我想，这儿的人好一些吧。他们跟那边的人不一样。”

“那边也有许多好人，”她说。

“告诉你梅尼绍娃母子的事我处理过了，保证他们能被释放，”聂赫留朵夫说。

“只愿上帝保佑，那老太婆人真不错。”她说，又一回表示她对那个老太婆的想法，接着抿起了嘴。

“我今天要去彼得堡。您的案子马上就会被受理。我祝福能改变原判。”

“改也好，不改也好，如今对我都没什么区别。”她说。

“为什么对我说：‘如今都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用询问的目光瞅了一下他的脸，她说。

聂赫留朵夫却把她这句话和这个目光解释为她很想知道，他会不会坚持他的决定，或是接受了她的拒绝就改变了想法。

“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会对您无所谓。”他说。“不过这对我来说，您无罪释放也罢，还是不释放也罢，倒的确都是一样的。不管情况会变成怎样，我都将照我答应过您的去做。”他坚决地表示。

她终于昂起头来。用那两只斜睨的黑眼睛似乎瞅着他的脸，又似乎瞅着其他的地方。当然她整个脸上洋溢着都是快乐的神气。就是这样她嘴里所说的同她眼睛所流露的完全相反。

“您何必告诉我这些呢！”她说。

“我说这些只是要让您了解我的一点心意。”

“您关于这件事，话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她说，费力地忍住笑容。

病室里不知为何突然乱哄哄的。孩子们的啼哭声传了过来。

“他们好像在叫我，”她说，不安地回过头去看了一眼。

“好，那么再见。”他说。

她假装没有看见他伸过来的手，没有同他握一握就扭转身，极力掩饰住她的快乐心境，

顺着 过道上的长地毯快步走去。

“她究竟起了什么变化？她是如何想的？她有什么样的感受？她是打算考验我呢，还是真的 不肯原谅我？她是没法说出她所想的和所感受的呢，还是不愿意说出来？她的心肠已软下来 了呢，还是依然怀恨在心？”聂赫留朵夫不停地问自己，可是却总不得而知。只有一点他是 知道的，那就是她变了，她的灵魂正在发生一种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但把他和她联结在 一起，而且把他和促成这个变化的上帝联结在一起。这样的联结使他感到温暖又激动，满心 欢愉。

玛丝洛娃回到摆有八张童床的病室里，听从护士的吩咐，开始整理一张床上的被褥。她在铺 床单的时候腰弯得太厉害，脚底下一滑，差点摔了一交。一个正处于康复之中的、脖子上扎 着绷带的男孩瞧见她这个样子，笑起来，玛丝洛娃再也忍俊不禁，就往床边上一坐，大笑起 来，她笑得那么具有感染性，惹得好几个孩子都哈哈大笑起来。那个护士生气地对 她嚷道：

“傻笑什么？你以为你还是原来那种地方的人吗？快去给我拿饭来。”

玛丝洛娃不敢说话，拿起食具走到护士命令她的地方去，这时她跟那个打着绷带、又被 护士 禁止再笑的男孩相互瞪了一下，又哧一声忍不住笑出来。这天白天，只要当房间里没 有人时，玛丝洛娃就会三番五次从信封里取出照片，静心欣赏一会儿。晚上，下班以后， 她回到跟 另一个助理护士一起住的小房间里，又把照片从信封里拿出来，温情脉脉地凝视 着像片上 的那几个人的容貌、他们的衣服、阳台的台阶、灌木丛，包括灌木丛前面熟悉的 他的脸、她 的脸跟两位姑妈的脸，一看又是好半天。对于这张泛黄的褪色照片，她怎么也 看不够，尤其 是对她本人，对那张她额上秀发飞舞的年轻秀丽的脸总是看得出了神。这样 专心致志，连那 个跟她一起住的助理护士大手大脚走进屋子，她都没有觉察到。

“这是什么？是他给你的照片吗？”身体胖胖的、心地善良的助理护士费劲地弯下腰来拿 过照 片看着，问道：“莫非这是你吗？”

“不是我还会是谁？”玛丝洛娃微笑地瞧着同伴惊异的脸回答。

“那么能否告诉我这是谁？这是他吗？这是他和蔼的妈妈吗？”

“这是我的姑妈。难道你看不出来？”玛丝洛娃追问。

“我怎么能认得出来？一辈子恐怕也不会认出来。你瞧，整个样子都不一样了呀。我看 距现 在快都有十年了吧！”

“不是十年，是差了一辈子呀。”玛丝洛娃说。话未尽，她的活泼样儿马上不见了。神 情变 得阴郁不说，眉宇之间还凹进了一条皱纹。

“如何，那里的生活一直是很轻松吧。”

“是啊，轻松。”玛丝洛娃闭上眼睛，跟着说了一遍，又摇摇头。“比做苦工还不如哟。”

“怎么会呢？”

“就是这样。从傍晚八点钟起到凌晨四点钟止。周而复始。”

“那她们为什么不放弃那种生活呢？”

“她们倒是想放弃，可是办不到。不过，何必再谈这些！”玛丝洛娃说着，霍地站起来， 把 照片扔进小桌子的抽屉里，极力强忍因愤怒压眶而出的眼泪，砰的一声带上门，跑到外 面过 道上。她刚才端详着照片，觉得自己依然还是照片上那个人，梦一般地回想起那时候 的她 多么幸福，想着现在跟他在一起也还是能够幸福。她的同屋人的话却让她猛然醒悟她

现在的 模样，让她想起在那边她做过什么样的人，使她想起过去生活中的种种可怕的情景，而这一切她以前只是模糊地感觉到，却不强迫自己去深刻地体会的。直到现在，她才清楚地记起所有那些让人害怕的夜晚，特别是记起一个谢肉节的夜晚，她等候一个大学生，他曾应许给她 赎身的。她想起那时她穿着一件敞着领口的、沾满酒迹的红缎子连衣裙，蓬松的头发上扎着一个红蝴蝶结，身子疲惫不堪，衰弱无力，酩酊大醉，到凌晨两点钟才把客人们送走，趁跳舞休息的间隙，就在给小提琴伴奏的女钢琴师身边坐下，那是一个瘦成皮包骨头，脸上长满紫疱的女人。她开始对这个女人抱怨她的令人苦恼的生活，女钢琴师也向她诉说自己厌恶并想改变一下现在的地位。正在这时克拉拉走到她们跟前来，她们三个就突然决定一齐抛弃这种生活。她们以为这个夜晚到此就已经结束了，正想分手，谁知前厅里忽然来了几个醉醺醺的客人，声音喧闹。小提琴师又奏起舞蹈的序曲，女钢琴师又不得不使劲按响琴键，弹着卡德里尔舞曲第一节，用的是一个极其欢畅的俄罗斯歌的曲调。有一个身材矮小、脸上冒汗的男人，满嘴酒气又不住打呃，身上虽穿着燕尾服，扎着白领结，但当舞曲奏到第二节，就脱掉燕尾服，走到她面前，搂住她的腰。另一个留着大胡子的胖子，也穿着燕尾服(他们刚从一个舞会上出来)，搂住克拉拉。这样，他们又开始跳舞，旋转，叫嚷，酗酒，闹了很久……而就这样，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她的相貌怎么能不改变！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他。她原先对他的愤恨忽又浮现在心头，一心想辱骂他，训斥他。她后悔今天错过机会没有再向他阐明自己的看法：她很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决不会向他屈服，决不容许他像从前在肉体上利用她那样现在又从精神上利用她，借此拯救自己和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她一边怜惜自己，一边又徒劳地指责他，为了摆脱这种苦闷的心境她很想喝点酒。如果她现在是在监狱里，她就会打破她的诺言，喝起酒来。

如果要想享受酒的滋味，除了找医士，就别无他法了。可是她又那么害怕医士，因为他一直是缠着她。现在她最厌烦同男人交往。她在过道长凳上才坐了一阵儿，就回到小房间里，也没有理会同伴，便躺下为自己坎坷的命运哭了一阵子。

十四

经决定，聂赫留朵夫去彼得堡要办三件事：首当其冲的是向枢密院提起上诉，请求再审理玛丝洛娃案件；把费多霞的案子经审理提交并上告委员会，然后因受薇拉之托到当地的宪兵司令部或者第三厅要求释放舒斯托娃；并安排关在要塞里的儿子能让为思念所苦的母亲见上一面。为了这事薇拉写信给他。

他把这两件事合并起来看成第三件事。第四件事是关于那些教派信徒的事，他们因为阅读和讲解《福音书》而被迫同家人分离，流放到高加索。他与其说是向他们作出了承诺，不如说是向自己作出了承诺：一定要竭尽所能来澄清这个案子。

聂赫留朵夫自从上次拜访过马斯连尼科夫以后，特别是他到乡间去旅行过一次以后，他倒不是拿定了什么主意，而是全身心地感觉到他讨厌他到目前为止一直生活在其中的圈子，因为这个圈子里的人竭心尽力地掩盖他们为了确保少数人享福而强迫千千万万人受苦受难的事实，这个圈子里的人没有看见，也不可能看见别人遭受的苦难，因而也不可能看见他们自己生活的残酷和罪恶。现在要同这个圈子里的人来往，聂赫留朵夫已经感到非常别扭，非常自责。

不过，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又吸引他去那个圈子中，他的亲友也这般吸引着他。主要是因为他要办理他此刻唯一关注的事情——帮助玛丝洛娃和他倾心帮助的其他一切受难的

人，他不得不恳求于那个圈子里的人，虽然那些人不但无法让他尊敬，而且经常让他感到愤慨甚至蔑视。

聂赫留朵夫不一会儿就来到彼得堡，暂住在姨妈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中。先前他的姨父当过大臣。刚来到姨妈家，就落到同他无法沟通的贵族社会的核心中。尽管这使他很反感，但又无计可施。要是不住姨妈家而住旅馆，那就会得罪这位姨妈。并且他知道姨妈交游广泛，可能对他要奔走的各种事会有帮助。

“啊，我都听到些关于你的什么样的话呀？简直是稀奇古怪。”当他来到姨妈家以后，她立刻请他喝咖啡，并对他说。“Vous posez pour un Howard!你在帮助犯人。你在对监狱私访。你在为冤案平反。”

“不是这样的，我想都没有这么想过。”

“没关系，这是好事呢。不过，这里头好像还有什么风流韵事。嗯，你给我讲讲吧。”

聂赫留朵夫就把他和玛丝洛娃的关系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当年你住在那两个老婆子家里的时候，可怜的艾伦就对我谈起过这么一件事：她们似乎准备叫你与她们的养女结婚。”卡吉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一直看不起聂赫留朵夫的两个姑姑。“……原来就是她呀？Elle est encore jolie?”

这位姨妈今年已经六十岁了，身体还算健康，精力相当充沛，兴致勃发，语言犀利。她的身材又高又壮，唇上缀有黑色小汗毛。聂赫留朵夫并不讨厌她，从小就受她生气勃勃和快活开朗的外向性格的影响。

“不，姨妈，不瞒你，那件事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只想怎样帮助她。因为再怎么说她被冤枉判了刑，我有责任，而且她这辈子会弄到如此悲惨地步，我更是难责其咎。我觉得我应该尽一切所能替她奔走。”

“怎么会有人说你会同她结合呢？”

“是的，我曾有过这样的想法，那仅是单方面的，她不愿意。”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扬起眉毛，垂下眼珠，惊讶地瞧了瞧她也同样喜爱着的外甥。不用一会儿功夫，她的脸色就变了，现出一副高兴的样子。

“嗯，她果然比你聪明一点，嘿，你可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你真的想同她结婚吗？”

“我设法使自己不这么想。”

“她曾是个妓女，你还愿意同她结婚吗？”

“没什么可以成为理由的。由于我是罪魁祸首。”

“你是个地道的傻瓜，”他的姨母忍住微笑说。“你是个傻透了的傻瓜，但我却正因为你是这么一个地道的傻瓜才喜欢你。”她翻来覆去地说着“傻瓜”这个词，显然在她看来这个词准确地形容了她外甥的智力状态和精神状态。“你要知道，也真是事有凑巧。”她继续说。“阿林办了一个出色的马格达林娜收容所。我去过一次。她们真叫人嫌恶。回来后我把自己周身上下洗了个够。不过阿林全心全意地办这件事。那我们就把她，你那个姑娘，交给她好了。谁真能改造这些人，那就只有阿林了。”

“但是她已经被判决去做苦工了。我来彼得堡就是为撤销这个判决而奔走。这也正是我

请求 您帮忙的头一件事。”

“原来是这样！那么，她的案子归哪儿管呢？”

“归枢密院。”

“枢密院？啊，我那亲爱的表弟廖武什卡就在那里工作。是啊，然而他是在那儿的蠢货局里，当承宣官。嗯，那些真正的枢密官，我却一个也不认识。天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或者是什么日耳曼人，什么盖啦，费啦，德啦，*tout l'alphabet*；或者就是各式各样的伊万诺夫、谢苗诺夫、尼基丁京等等，再不然就是伊万年科、西蒙年科、尼基丁坚科，*pour varier. Des gens de l'autre monde*。哦，没关系，我对我的丈夫说一下就行了。他认识他们。他简直认识所有著名的人。我会跟他讲的。不过你得自己对他说个明白，因为他从来也听不清楚我的话。不管我说什么，他总是说他一点也弄不懂。他存心故意，别人都听得懂，唯独他听不懂。”

这时候有一个穿长统袜的听差用银托盘端来一封信。

“这信正好是阿林写来的。现在你可以听一听基泽维捷尔的讲话了。”

“谁是基泽维捷尔？”

“基泽维捷尔吗？你今天晚上来一会吧。你马上就会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他讲得那么动人，就连罪犯听了也会内疚跪下来，痛哭忏悔。”

不论这事有多蹊跷，也不管这事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一贯脾气多么不吻合，她却狂热地相信基督教的精神相信赎罪的说法。她会常到宣传这种学说的聚会场所，没事时会把信徒召集到家里。这种风靡一时的学说不仅否定了一切宗教仪式和圣像，而且还否定圣礼，但执著的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却在每个房间里都挂着圣像，甚至连私人床头上都有圣像，一如既往，她说，这同赎罪说有什么矛盾。

“别忘了，应该让你的抹大拉听听他的讲道，她会皈依的。”伯爵夫人兴奋道。“你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呆在家里。去听听他的讲道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不得不承认，对这种事不会感兴趣的，姨妈。”

“告诉你，这很有意思。你一定要来。要不，你倒说说，还要你这位姨妈帮什么忙？全说出来吧！”

“还有，好的，在要塞那边也有一件事没完成。”

“在要塞那边？没问题，我可以给你写一封信，你到那边试着去找克里斯穆特男爵。你会明白他这人人品极好。大家有口皆碑的。他是我父亲的同事。他就是对一些事着了迷。不过，这也没太大关系。他这人心地挺好。能告诉我你在那边有什么事？”

“我恳求他们特许一个做母亲的同关在那边的儿子见一次面满足她的意愿。不过我听说这种事不归克里斯穆特管。它归切尔维扬斯基负责。”

“我可不喜欢切尔维扬斯基，但是因为这个人 是玛丽叶特的丈夫，倒可以拜托拜托她。她会为我出力的。*Elle est très gentille*。”

“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事相求，关于另一个女人的。她已被关了好几个月的监狱，谁也不知道她到底犯了什么罪。”

“哼，不对，她自己一定清楚自己干了些什么。她们心里明明白白。她们也是活该，这班剪短头发的家伙。”

“我们不清楚她们是否活该。但是她们在受苦受难。您是一个基督徒，相信《福音书》，没想到您的心肠却如此硬……”

“这可是两码事。《福音书》是《福音书》，邪恶是邪恶。既然我受不了虚无主义者，特别是那班剪短头发的女虚无主义者，我就当然不会喜欢他们，否则更不对了。”

“但是您究竟为什么受不了她们呢？”

“既然出了三月一日的事，你还有什么好问的？”

“但事实上，那些女人并非全部都参加了三月一日的事。”

“那也还是一样，她们干嘛要去插手与她们没有关联的事。那不是女人的事嘛。”

“哦，可是您却认为玛丽叶特能够过问此事。”聂赫留朵夫说。

“玛丽叶特吗？玛丽叶特，哦，是玛丽叶特。可是天知道她来自什么路数。一个轻佻的女人倒想教训起这么多人。”

“不是我想教训人，只是想帮助帮助老百姓。”

“没有这帮人，人家也知道谁该被帮助，谁不该被帮助。”

“别忘了，您又不是不知道，老百姓穷得很。喏，我也是刚从乡下回来。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干活干得死去活来，还吃不饱肚子，养活不了自己，我们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这难道合理，这难道公平吗？”聂赫留朵夫忍不住得受他姨妈善心的影响，把心里话都一股脑儿倒了出来。

“那你是不是也要求我也去做工而别吃饭呢？”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聂赫留朵夫回答，自己却笑了，“我只是要人人都工作，个个有饭吃。”

姨妈又一次拧紧眉头，垂下眼睑，好奇的定定地瞅着他。

“我的好外甥这样做这样想，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她善意地说。

“那是什么原因呀？”

这时候，一个身材高挑、肩膀宽阔的将军模样的人走进房间里来。这位就是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丈夫，一位早年退休的大臣。

“啊，是你吗？德米特里，你好。”他说，凑过刮得干净的脸颊让聂赫留朵夫亲吻。“你几时来的？”

他只是默默地吻了一下妻子的前额。

“噢，他是个很少见的人。”卡吉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转身对她丈夫说。“他叫我到河边去洗衣服，靠吃土豆维生。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笨蛋，不过你还是替他办一下他求你的事吧。他是个十足的傻瓜。”她又说一遍。“你已经听到了吧，据说卡缅斯卡娅万分伤心，大家很忧虑，她的性命是否能够保住，”她对丈夫说，“你最好到她家里去一趟。”

“是啊，这真可怕。”她丈夫说。

“好，你跟他聊聊吧。我去写信了。”

聂赫留朵夫刚刚走进客厅旁边一个房间里，却又被她叫住了：

“那么要给玛丽叶特写一封信吗？”

“那就让您费神了，ma tante。”

“那么我就在信上留下一段空白，你自己写上关于那个剪短头发的女人的事。她会嘱咐她的丈夫去办的。他也肯定会照办。你别把我想得太坏。她们，那些 protégées，都惹人厌恶，可是 je ne leur veux pas de mal。让上帝降福于她们！好，去吧。但是今天傍晚你一定得留在家。你会听见基泽维捷尔讲话的。我们还要一起祈祷。只要你同意，你不反对，这将对您大有裨益。我本来就知道你们和艾伦在这方面都很落后。好了，再见吧。”

十五

察尔斯基伯爵因其特殊的地位，对一些事情自然有自己坚定不移的想法和说道。

他从年轻时候起就坚信，鸟儿生来就要吃昆虫，要披羽毛和绒毛，会在空中翱翔，同样的道理，他生下来就应该吃名厨烹调的山珍海味，应该穿轻暖舒适的华贵衣裳，应该坐最快最稳的大马车，而这一切都得由上帝为他准备妥当。

另外，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还认为，他从国库领取的各种现款越多，他获得的各种勋章，包括钻石勋章越多，他同皇亲国戚会见和交谈的次数越多，那就越妙。与这些基本的信条相比，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认为其他一切东西统统无关紧要，毫无价值。其他一切事情能够这样，也能够完全相反。本着这种信心，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在彼得堡一连生活和活动了四十年，在四十年届满时终于取得了大臣的职位。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借以谋到这种职位的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他能够看懂公文和法规，能够起草虽然不流畅但可以让人读明白的公文，而且不会写出什么错字；其次，他的仪表非常庄严，在必要的场合他不仅能够装得自负傲慢，而且能够显得高不可攀，威风凛凛，但在另一些必要的场合，他又可以肉麻和卑鄙下贱地对人奴颜婢膝；再者，不管是在道德方面还是在处理公事方面，他都没有自己固定的原则或标准，所以当必要时他能够赞成一切办法，在另一些必要的情况下又能够一律反对。他做这些事时，只须尽量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气派，不过分自相矛盾就行了。他根本不会在乎他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合乎道德，根本不会在乎他的行为对于俄罗斯帝国乃至全世界到底会产生极大好处还是极大坏处。

自打他当上大臣以来，不仅所有依赖他的人（因为依赖他和他的亲信极多），包括一切局外人和他自己都坚信不移，他是一个英明的治国人才。可是事隔不久，他却毫无建树，政绩并不斐然。于是按照生存竞争的法则，就有一些与他相同能起草公文和看懂公文、仪表堂堂而且毫无原则的官僚把他排挤出去，他只好退休。直到这时大家才理解，察尔斯基伯爵不仅并不英明卓越，深谋远虑，而且鼠目寸光，不学无术，却还刚愎自用。真实的程度只能勉强读懂庸俗的保守派报纸的社论而已。的确，他同那些以一样的程度把他排挤出来的官僚没什么区别。这一层他自己也明白，但这丝毫也不会动摇他的信念，就是这样，他也应该年年领取大笔公款，年年获得新的勋章来装饰他十分讲究的丝制衣服。这种信念十分顽强，因此任何人也不敢阻止停止给他这些东西。他依旧每年从政府领取几万卢布，一部分算是养老金，一部分就算是参与国事的报酬，不为别的因为他在最高政府机关里挂了个名，又辞职后担任各种各样委员会的名誉主席。除此之外，他又年年获得他所珍爱的肩上或长裤上的丝绦，礼服上的新绶带和珥琅星章。因为这种身份和长年累月不间断的俸禄，察尔斯基伯爵的交游就越发广泛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像以前听主管部务的官员报告一样地听聂赫留朵夫讲话。听完后，就答应他要给聂赫留朵夫两封信，其中一封是送交上诉局的枢密官沃尔夫的。

“关于他，大家褒贬不一，不过 dans tous les cas e'est un homme très comme il faut,” 他说。“他欠我一份情，一定会尽力去办的。”

察尔斯基伯爵替他写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上诉委员会里一个有权有势的实力派人物的。

他对聂赫留朵夫所说的费多霞一案颇感兴趣。聂赫留朵夫对他声明，他想就此事写个呈文给当今皇后，察尔斯基伯爵听后，说这事确实很动人，有机会要向那边提一提。但他不能就草草说定，上诉还是照章办理的合适。他想，要是有机会，要是礼拜四官僚们如期举行碰头会，他可能会不辞劳苦谈一谈这件事。

聂赫留朵夫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伯爵写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丽叶特的信，马不停蹄立刻就到那计划中的几个地方去。

他先去玛丽叶特家。他刚认识她时，她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生长于一个不富裕的贵族家庭里。后来他得知她与一个官运亨通的人结了婚。不过他听到一些关于那个人的不好的议论，主要的是听说他对待成百成千的政治犯残酷无情，虐待他们就是他的专职。这时候聂赫留朵夫像往常一样，心头沉重得难以忍熬，他想到自己为了救助被压迫者而必须站到压迫者那一边去，这就俨然默认了压迫者的行为的合法性，因为他得向他们求情，要求他们对某几个人稍稍收敛一些他们那种习以为常的残酷，而这种残酷他们自己大都也没有觉察。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感到自相矛盾，对自己不满意，而且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该去求情，但他最终打定主意应该去求情。要知道，虽然他很别扭于同这个玛丽叶特和她丈夫周旋，他也因此感到羞惭和不高兴，但如果他这样做了，或许那个关在单人牢房里遭罪的可怜女人就能被释放，她和她的亲人也就不会再痛苦了。他原本就感到自己跑到那班人当中去向他们求情的做法未免太虚伪，因为他早已不把那班人认为是自己人，而那班人倒把他看做是自己人；此外他一走进那班人的圈子里，就感到好像陷进了以前那种习以为常的轨道，经意不经意地就容易降伏于那班人当中盛行的轻浮和不道德的作风之中。这一点他在姨母卡吉琳娜·伊万诺夫娜家里就已经感觉到。今天上午他与她谈及一些一本正经的问题时，说话就已经用玩笑的口吻了。

不管怎么说，阔别已久的彼得堡照例又对他起了肉体上的刺激和精神上的麻痹作用：你看，一切都是那么清洁、舒适、方便和自由，主要是人们因为在道德上无所追求无所负担，过日子就特别轻松安逸。

干净整洁、彬彬有礼的马车夫，载着他在虚荣漂亮、彬彬有礼的警察身旁经过，而后，沿着洒过水的干净漂亮的街道，经过干净漂亮的屋子，来到河滨玛丽叶特的房子前。

大门口又停着一辆马车，而且是套着两匹戴眼罩的英国马。他在模仿英国人，这从马车夫身上看得到，下半截面颊上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穿着整齐号衣，手拿马鞭，神气活现地坐在属于他的驭座上。

打开通门廊的大门的是一位穿着一身非常干净的制服的门房。门廊里站着一个跟班，号衣更加干净，上面镶着让他眼熟的丝绦，络腮胡子梳理得更加整齐还有点好看。还有一个值班的勤务兵，穿一身干净的崭新军服，身上带着耀眼的刺刀。

“将军现在不会客。对了，将军夫人也没时间会客。她马上要出门。”

聂赫留朵夫取出卡吉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信，拿出他的名片，然后走到一个放着来宾留言簿的小桌那儿，开始写道：来访不晤，甚感遗憾。他刚写到这儿，听差就朝楼梯口走过去，看门人走出大门外，大叫：“来一辆车子！”勤务兵挺直身子，把两只胳膊贴在裤缝上，一动也不动，双目迎接从楼上走下来的太太，而且盯着她。她身材不高而苗条，脚步快得与她的显贵身份不相称。玛丽叶特头戴一顶大帽子，上边插有一根羽毛，

身着黑色连衣裙，外披黑色斗篷，手戴一副黑色新手套，一块面纱遮住了她的脸。

她看到聂赫留朵夫，就撩起面纱，露出她那漂亮的脸蛋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她用探问的眼光盯着他。

“啊，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公爵！”她用快活而悦耳的声音说。“我应该认得……”

“怎么，您连我的昵称都还记得吗？”

“可不是吗，我跟我的最大的妹妹当年还爱上过您呢。”她用法语笑道。“唉，真别说呀，您的模样可变化多了，可惜我现在真要出去。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回到楼上去谈吧。”她刚说完，迟疑不决地又站住了。

她抬头瞧了瞧墙上的挂钟。

“不，不可以。我是要到卡敏斯卡雅家去参加丧事礼拜的，我怎么忘了。她该伤心坏了。”

“能告诉我卡敏斯卡雅是谁吗？”

“难道以前您没听说吗？……是这样的，她的儿子在决斗中让人打死了。他去跟波森决斗，可他还是独生子，真是可怕呀。他母亲伤心坏了。”

“对，是的，我听说了。”

“不行，我还是去一下比较好，您明天要不今天晚上来吧。”她说完，迈开轻快的步子径直向大门口走去。

“今天傍晚我不能来。”他一边和她往外面门廊上走一边回答说。“你知道，我来找您是有事的，”他说话的当儿那两匹栗色马往门廊这边靠拢来。

“什么事？”

“这儿有我姨母寄过来的一封信，信上说的就是这件事。”聂赫留朵夫边说边把那封信交给她，狭长的信封上边印着大个的花字。“您读过信就会明白的。”

“我知道卡吉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以为我能够左右我的丈夫行事。她错了。我是没有任何法子，我也不愿意过问他的事。但是，为了伯爵夫人和您，我准备破例一次。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她边说边伸出一只戴着黑手套的小手去找她的衣袋，却没有找到。

“有一个有病的姑娘监禁在要塞里。她与那个案子没有任何牵连。”

“她姓什么？”

“舒斯托娃。丽朵琪娅·舒斯托娃。信上写得有。”

“好吧，这样我去试试。”她说完，轻盈地跳上挡泥板在金色的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皮座弹簧新马车，还打开阳伞。跟班随后在驭座上坐下来，就示意车夫赶快赶车。马车刚一移动，她就用阳伞碰了碰车夫的后脊梁，那两匹俊美的细皮英国种的母马就被紧紧的马勒拉住了，仰起好看的马头，定住，但不住地活动着它们的细腿。

“您务必要来呀，但不光只是为了办您那些小事。”她说完话又跟着嫣然一笑，可能已经明白这一笑的力量。接着，仿佛才演完一部戏放下幕布似的，她把面纱也放下了。“好，我们走吧。”她又一次用阳伞碰碰车夫的脊梁。

聂赫留朵夫举起帽子示意了一下。那两匹纯种棕黄色的母马喷着鼻子，蹄子得得地敲响马路，飞奔离开了，马车在马车夫的驾驭下，新橡胶轮胎还会偶尔跳动一下，在道路坎坷的地方。

聂赫留朵夫从未想到他竟然会同玛丽叶特相对并且微笑，禁不住摇摇头，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不满意。

“你还没来得及回顾一下，就又陷入这种生活里去了。”他暗想，内心感到了分裂和怀疑，这是每当他不得不讨好他不尊敬的人的时候，总会产生的。聂赫留朵夫考虑一下他该走的路线，免得走冤枉路，就动身先到枢密院。有人带着他走进办公室，在那个极其豪华的房间里，他见到很多非常有礼貌的、整洁的文官。

那些文官对聂赫留朵夫说，已经收到玛丝洛娃的诉状，而且已经上交枢密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聂赫留朵夫把姨父所写的信带来，就是为了交给这个枢密官的。

“枢密院本星期会开庭重审许多案，玛丝洛娃一案未必能在这次就轮上审理。但要是托一下人什么，本星期三或许开庭时可能审理。”一个文官讪讪地说。

当时，聂赫留朵夫就在枢密院办公室等待他们查明玛丝洛娃案的案情，又听见他们不时地在谈论那场不合时宜的决斗。他们详细地谈到小卡敏斯基被人打死的经过。难怪他在这里才最终明白这个轰动整个彼得堡的大事的详情。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几个军官在彼得堡的饭店里吃牡蛎，照例喝了许多烈性酒。有个军官出言不逊，对卡敏斯基所属的那个军团说了几句非常不中听的话，卡敏斯基当面斥责他造谣诽谤。那个军官勃然大怒就动手打卡敏斯基。第二天两人约定进行决斗，卡敏斯基不幸腹部中了弹，没过两小时后就惨死了。虽然凶手和两个副手都已被捕，但据说关了两星期禁闭就重见天日。

聂赫留朵夫走出枢密院办公室，坐车去拜访上告委员会中一个有权势的官员沃罗比约夫男爵。他占据着公家宿舍里一所豪华的房子。门卫和听差用严厉的口吻告诉聂赫留朵夫在会客日以外是不可能同男爵见面的，又说男爵今天在皇上那里，明天还要做报告。聂赫留朵夫交给他们那封信，又驱车去拜访枢密官沃尔夫。

沃尔夫刚刚吃过早饭，照例拿来一支雪茄烟吸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目的是帮助消化，就是这个时候他接见了聂赫留朵夫。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沃尔夫确实是 *un homme très comme il faut*，他把他的这种品质看得高于一切，而且从这种高度看待所有其他的人。他也不能不高度评价这种品质，因为他全凭它才使他那辉煌的事业得以成就，他所渴望的事业，也就是借助于婚姻而得到的一笔财产，每年给他带来一万八千卢布的收入，另外他又靠努力工作而谋到了枢密官的职位。他不但认为自己是 *un homme très comme il faut*，而且是具有骑士的正直品格的人。不在暗地里接受私人的贿赂视作所谓的正直。至于他向国库请领各种的出差费、旅费、房租费，不管政府让他办什么事，他都像奴隶般地照办，他却认为是不正直。当初他在波兰王国某一个省里担任省长的时候，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事：在那里有好几百个无辜的人民，只因为那些人民爱他们的民族和辈辈相传的宗教，他就横加摧残，弄得那些人民倾家荡产，有的被监禁，有的被流放，可是他不但认为这是不正直，反而认为是高尚、勇敢、爱国精神的丰功伟绩的表现。他霸占着疼爱他的妻子和他姨妹的财产，他却同样认为是不正直。他反而认为这是对他的家庭生活的合理安排。

沃尔夫的家庭当然包括他那没有个性的生命的另一半，财产也被他侵占的小姨子——他卖掉她的田产，却把钱存在沃尔夫名下——和那温柔胆怯、其貌不扬的女儿。这个可怜女儿过着孤独痛苦的生活，仅仅是为了排遣愁闷，近来信奉了福音教派，应邀常常参加一些阿林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的聚会。

沃尔夫的儿子原来天性善良，十五岁就开始长胡子，自此开始喝酒，放荡不羁，到二十岁那年就被从家里撵了出去，他没有从任何一个学校毕业而且交了那么多坏朋友，欠下如

此多的 债务，败坏父亲的名声。做父亲的无奈之下有一次替儿子偿还了二百三十卢布的债，另一次 又偿还了六百卢布的债，但同时向儿子声明这是最后的机会，他要是不洗心革面，就要被逐 出家门，父子间恩断义绝。儿子不仅没思悔改，而且又欠下一千卢布的债，甚至毫不示弱地 对父亲说，他在家一直就觉得憋气。于是沃尔夫就向儿子宣布，他要到哪里去都随便，但 他不再是沃尔夫的儿子。从那时起，沃尔夫就称自己没有儿子，家里谁也无胆向他提到儿 子的事，这样沃尔夫就自以为妥善地安排了平静的家庭生活。

沃尔夫停下他在书房里的走动，同聂赫留朵夫打了招呼，习惯性地露出亲切而又略显讥诮的 笑容，这种笑容总是不经意地表明他自己为人正派，也是比大多数人高明之处。他看了一遍 聂赫留朵夫带来的信。

“劳驾，您请坐，不过请您原谅我。要是您不介意的话，我就走来走去。”他边说边把两 只手插在上衣的口袋里，在这个装饰得很庄重的书房里沿对角线式的踱过来，又踱过去，步 子 轻快柔和。“认识您非常高兴。当然，我是非常乐意为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效劳的。”他边说边喷出一口芬芳的天蓝色烟雾，小心地从嘴里取下雪茄烟，免得烟灰落下来。

“我只要求尽快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假如被告不得不去西伯利亚，那就可以动身早一点。”聂赫留朵夫说。

“对，对，那就可以搭下诺夫哥罗德的第一班轮船动身了，我晓得。”沃尔夫边说边露出 他那自认为高人一等的笑容。人家一开口对他说话，他就总是事先知道人家要说什么。“被告姓什么？”

“玛丝洛娃……”

沃尔夫踱走到写字台的旁边顺手翻了翻公文夹。

“哦，哦，是玛丝洛娃。好的，我这就去跟同事们商量一阵子。快的话我们礼拜三就可以办 这个案子。”

“我可以打电报先通知一下律师吗？”

“您为什么还请了律师？那又何必？不过，也随您的便。”

“上诉理由或许不够充足，”聂赫留朵夫说，“不过我想从案卷上或许也能看出，这个判决 是由于一个误会吧。”

“是的，是的，这也有可能，但枢密院不可能完整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沃尔夫眼睛 瞧向 烟灰，严厉地说道，“枢密院只审查和引用法律和解释法律是否正确。”

“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很特殊的。”

“我知道，这些我知道。个个案子都是无法不特殊的。我们会照章办事。就是这样。”烟灰 残留在雪茄上，并且已有裂缝，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您难得到彼得堡来的，是吗？”沃尔夫问，把雪茄竖起来，免得烟灰又落下。但烟灰仍是摇摇欲坠，沃尔夫小心翼翼地把它挪到烟灰碟旁，烟灰果然就落下了。“卡敏斯基的事真是太悲惨了！”他说。“他是一个 很好的青年，又是独生子。做母亲的不知伤心到哪儿去了，”他说，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着 彼得堡盛传一时的有关卡敏斯基的故事。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另外还谈到卡吉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谈到她热中于新的 宗教思潮，他既不责难这种宗教思想，也不袒护它，从他的 *comme il faut* 观点看来，这种东 西对他来说明显是多余的。说完这些话，他拉了拉铃。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

“如果您方便的话，请您来吃顿便饭，”沃尔夫边说边伸出手去握手，“星期三来就可以。到那时候我也可以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了。”

天色已经很晚，聂赫留朵夫就坐上马车回到他姨母家去。

十七

察尔斯基伯爵家总是七点半钟开饭。吃饭用的纯粹是一种聂赫留朵夫尚未见过的新式办法。菜事先都先摆在桌上，摆好后仆人就退出餐厅，吃饭的人可以自己动手取菜。男人们摆出一付男子汉气概，不让虚弱的太太们过分劳累，二话没说毅然承担起给太太们和自己分菜斟酒的重任。才吃完一道菜，伯爵夫人就要按一按桌上的电铃，仆人就又悄没声儿地赶进来，熟练地迅速地把用过的菜碟收走，然后返回再端来下一道菜。

菜和酒都是上等的。厨师长是一个法国人，他带着两个身着白衣服的助手在明亮的大厨房里工作。今天请来吃饭的有六个人，有伯爵、伯爵夫人和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是一个面色阴沉的近卫军军官，把胳膊肘支在桌上，此外还有聂赫留朵夫、法国女教师还有伯爵家里从乡下来的总管。

甚至在这儿，大家所谈的仍然还是那场决斗。

大家滔滔不绝地说起皇上对这事的态度。不用说大家知道，皇上很同情死者的母亲，当然大家也都很为她惋惜。不过大家仍然知道，皇上虽然很同情死者的母亲，但又不愿严惩身为军人的凶手，既然如此因此大家对身为军人的凶手也就不再追究宽大为怀。餐桌上只有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敢想敢说，无甚顾忌，对凶手作了批评和责难。

“他们再这样喝酒胡闹，随时会把一个个好端端的青年都打死的，我说什么也不能宽恕他们。”她激动地说。

“你这话我可明白不了。”伯爵说。

“我知道你一向听不懂我说的话，”伯爵夫人回过头来对着聂赫留朵夫说道，“除了我丈夫人人都听得懂。我是说我可怜那个母亲，我不想让凶手杀了人还心安理得。”

本来一直沉默着的儿子，这时候却出头为凶手辩护，抨击他的妈妈，相当粗鲁地对她证明军官应当这样做，否则他就会被军官法庭从军团里赶出去。聂赫留朵夫没有插嘴，只是一直听着。他从前当过军官，对年轻的恰尔斯基的理由虽然不能认同，却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同时又不由自主地把杀人的军官和他先前在监狱里见过的一个年轻英俊的犯人相比，那个犯人就是因为在打架当中误伤人命而被判决去做苦工的。这两个人都是因为酒醉杀人，一个是农民，一时性起打死了人，就拆散了他和他的妻子、家人、亲属，戴上镣铐，剃光半边头，动身去做苦工；而另一个呢，却坐在一个漂亮的禁闭室里，吃着上好的饭菜，喝着上等的好酒，读书阅报，过了一两天就会放出来，仍然照原先那样生活下去，却变成一个特别有趣的人了。

他没什么顾忌，把心里的想法都说了出来。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一开始还同意外甥的话，后来却默不作声。其他的人也赞同了一会儿，然后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才意识到他讲这些话是绝对失礼的，在这个贵族圈子里。

晚上，吃过饭以后，宽敞的大厅里像开会似的摆了几排雕花高背椅，甚至桌子后面还放着一把圈椅，旁边有一个干净的茶几，上面放着几个玻璃水瓶，听说那是给讲道的人喝了饮用的。外国人基泽维捷尔将在这里讲道，所以听的人纷纷来到目的地。

大门口已经停着许多高雅华贵的马车。在讲究摆设的大厅里，坐着许多身穿绸缎、丝绒和花边衣服的高兴的贵妇人，她们在头上戴着假发，腰身勒得很细很苗条。在贵妇人中间还夹杂着坐着一些男人，有军人，有文官，还有五个老百姓：两个扫院子的老人、一个小店老板、一个听差、一个马车夫。

基泽维捷尔是一个很结实、头发花白的人，讲英语，他带着一个年轻消瘦、戴着夹鼻眼镜的姑娘作翻译，那姑娘既快又恰当地把他的话翻译成俄语。

他说我们犯这么大的罪，我们为此所要受到的惩罚这样重，这样在劫难逃，所以一面等着惩罚，一面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只要想想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的生活，想一想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在怎样生活，我们在怎样触怒仁慈的上帝，我们在怎样驱使基督受苦，我们就会懂得我们要得到宽恕，找到出路，得到拯救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注定了要灭亡。可怕的毁灭，永久的苦难正在等待着我们呀。”他用颤抖的哭声说。“怎样才能获救呢？兄弟们，怎样才能摆脱这场让人可怕的烈火而获救啊？我们的房子已经被烈火围住了，没有出路了。”

他沉默了不到一会儿，眼泪真的就沿着脸颊流了下来。这八年来，每当他讲到这个无法不令他十分得意的地方时，总会让人感到喉咙哽塞，鼻子发酸，眼泪夺眶而出。眼泪一钻出来，他自己就更加受感染。房间里霎时响起了一片哭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坐在一张精工细雕的小桌旁，两手抱住头，肥胖的肩膀不住拍动着。不明事理的马车夫惊奇地瞧着这个讲道的德国人，仿佛他这时正赶着一辆车，车杠眼看就要撞到该德国人身上，而德国人却不肯让开似的。多数人坐的姿势都跟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一样。沃尔夫的女儿，这个人相貌酷似父亲，穿着一件时髦的连衣裙，双手捂住脸，跪在地上祈祷。

滔滔不绝的讲道人突然又容光焕发，露出那种只有演员表示欢乐的可以以假乱真的微笑，声音温柔亲昵地说：

“不用说，现在有救了！这是一种轻松令人愉快的拯救。它令人轻松愉快是因为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流了血，他甘愿为我们受苦遭受磨难。用他的苦难，用他的鲜血拯救了我们。兄弟姐妹们！”他又挂着泪珠说，“让我们来感谢上帝吧，只有上帝才会这样为了替人类赎罪而献出他的独生子。他的宝贵的鲜血……”

聂赫留朵夫感到十分憎恶，就悄悄站起来，皱起眉头，忍住羞臊的咳嗽声，悄悄地走出大厅，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了。

十八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刚穿好衣服，准备下楼，忽然有一个听差送来一张莫斯科的律师的名片。原来律师到此地是来办他自己的事，同时如果玛丝洛娃的案子在这几天受理，他就打算顺便在枢密院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出庭。聂赫留朵夫发给他的电报，他恰好因为上了路而没有收到。他从聂赫留朵夫嘴里听说玛丝洛娃的案子开庭的时间，由哪些枢密官审理，就微微一笑。

律师说：“看起来这三个枢密官恰恰是三种类型，”“沃尔夫是令人厌恶的典型的彼得堡官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呢，则是个有满腹学问的法学专家，贝则是比较起来稍好的一个实事求是的法学家，因此在三人中间他算是最有生气的一位，”“希望也放在他身上。嗯，那么上诉委员会那方面的事进行得如何了？”

“对，今天我就要驱车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里去，因为昨天没有机会见到他一面。”

“您不想知道沃罗比约夫是怎么当上男爵的吗？”律师说，流露出滑稽莫名其妙的口吻。当 聂赫留朵夫在提到这个纯粹的俄国姓和外国爵位的人时他说：“这大概是 保罗皇帝因什么事赐给他 祖父的，他祖父或许是个听差。他不知什么事讨得了皇上的欢心。皇上就说：‘这样吧，我 封他为男爵吧，这是我个人的旨意，谁也不准阻拦。’这样就莫名其妙地冒出一个沃罗比 约夫男爵来了。你说为什么，他为此很得意。其实说到底是个老滑头。”

“我现在马上要去找他。”聂赫留朵夫说。

“哦，那正好，我们一块儿走。我用车子送您一程。”

在他们出门之前，有个听差在前厅向聂赫留朵夫走过来，手里拿着的信是玛丽叶特写给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Pour vous faire plaisir, j'ai agi tout à fait contre mes principes, et j'ai intercedé auprès de mon mari pour votre protégée. Il se trouve que cette personne peut être relachée immédiatement. Mon mari a écrit au commandant. Venez donc 专诚。Je vous attend. M.”

“居然有这样的事！”聂赫留朵夫对律师说，“这岂不可怕！他们送一个女人进单人牢房关了七个月，也不管她是否有罪，现在仅凭一句话就又把她的释放出来了。”

“我明白这种事向来如此。嗯，至少您的个人愿望算是实现了。”

“是的，但事情这样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反而使我觉得不对劲儿。请问：那里究竟都在干什么？什么人究竟为什么把她关起来？并还控告她？”

“算了，这种事最好还是不要盘根究底的好。我马上送您去吧。”律师紧张地说，这时他们也已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不多会儿律师所雇的那辆漂亮轿车就来到门前。“您现在准备要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儿去，不是吗？”

律师告诉了车夫到什么地方停。几匹漂亮的骏马就把聂赫留朵夫送到多情的男爵家门口。男爵在家。进门第一间里有一个身穿笔挺文官制服的青年官员，他的脖子特别细长，喉结突得很厉害，步伐特别轻慢。另外还有身边的两位太太。

“贵姓，先生？”喉结突出的青年官员非常潇洒地从两位太太那里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大声问道。

聂赫留朵夫于是就报了自己的姓名。

“男爵曾经谈到过您。请稍等一下！”

青年官员于是走进一个房门紧闭的房间，不多会儿从那里领出一个身穿崭新丧服、满脸泪痕的中年太太。这位太太习惯性地用瘦削的手指垂下随便卷起的黑色面纱来掩饰她的未干的泪痕。

“请进。”青年文官回头对聂赫留朵夫说，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到书房门口，推开门，自己留在门口站住。

聂赫留朵夫走进书房，看见对面有个中等身材、留着很短头发的胖子，身穿礼服，坐在大写字台后面的一把圈椅上，愉快地瞧着前面。他那张友善的脸上留着白唇髭和白胡子，因而他脸颊上的红晕特别引人注目。他一见聂赫留朵夫，脸上就露出亲热的笑容。

“很高兴见到您。我和您的母亲是老相识，老朋友了。从您幼年到长大做军官，我都见过您。好，请坐，告诉我我能够帮您做些什么。是的，是的。”他一边听聂赫留朵夫叙述费

多霞的案件，一边摇着白发剪得很短的头说。“您所說的，我全听懂了。不错，不错，这件事确实让人感动。怎么样，您已经把诉状交上来了吗？”

“上诉书我早已准备妥当了。”聂赫留朵夫说着就从口袋里拿出新写的诉状。“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请您对这个案子多多关照。”

“您做得很好，说得也不错。我一定会亲自把这个案子向上面奏明。”男爵说，尽管他那张兴奋的脸上想装出一副怜悯的样子，但还是装不出来，“这个案子很感人。看样子她可能还是个孩子，先是丈夫待她粗暴不堪，使她讨厌他，但过了一阵，他们又和好如初了……是的，我要把案子向上奏明。”

“察尔斯基伯爵说过，他打算去向皇后求情，宽恕这位姑娘。”

聂赫留朵夫话音刚落，男爵的脸色顿时僵住了。

“请等一等，您先把上诉书送到那边的办公室去吧，我尽我全力帮助您。”他对聂赫留朵夫笑笑说。

同时，青年官员又这样走了进来，显然有意炫耀他那种潇洒俊美的步态。

“先生，那位太太要求再同您说几句话。”

“好，就请她来吧！唉，老弟，你也知道你在这儿会看到多少辛酸的眼泪，我也只能尽力帮大家，要是能把大家的眼泪都擦干就好了！我只有尽力帮这个忙。”

那位太太不多时就走了进来。

“我刚才忘记求您，可不能让他把自己的女儿抛弃，因为他告诉过我他已经横了心……”

“我不是说过我会尽力而为吗？难道你没听见吗？”

“看在上帝的份上，男爵，您救救我这个做母亲的吧。”

她抓起他的一只手，开始吻它。

“一切都会办好的。”

等到太太走出去，聂赫留朵夫也起身告辞。

“我会尽力去办的。我们要同司法部接洽一下。他们会答复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尽我们的所能去办理。”

聂赫留朵夫走出去，然后穿过一个办公室。如同在枢密院里一样，他在这个漂亮的房间里又看到许多漂亮的文官，整洁，有教养，无论从装束还是谈吐都很规矩，讲起话来既清楚又严肃。

“他们这种人何止是多呀，简直多得不能再多了。并且他们保养得那么好，他们的衬衫和手洗得那么干净，所有这些人的皮靴擦得多么亮呀。是谁在供养他们？他们这班人，就别说跟囚犯们相比，就是跟乡下人相比也显得那么优裕阔绰。”聂赫留朵夫又情不自禁地暗想。

十九

谁都知道操纵彼得堡全体囚犯命运的就是一个曾是德国男爵出身的老将军。在他一生中战功卓著，得过许多种勋章，但平时他很谦虚地只在钮扣孔里挂一个小小的白十字章。据说目前他已头脑混沌了。他在高加索服役时，获得了这枚他非常引以为自豪的十字章。当时的他统率剪短头发、身穿军服的一群俄罗斯农民，手持步枪和刺刀，宰了一千多名愿意保卫自由、自发保卫家园和亲人的人。

后来他在波兰工作，他又驱使那儿的俄罗斯农民犯下很多各种各样的罪行，为此他又得到勋 章和军服上的新装饰品。后来他还在另外的一些地方工作过，如今已经成了一个衰迈的老人，就接受了他现在正在担任的职位，也因此得到了一所好房子、一笔薪金和人们的尊敬。他 严格执行上级的命令，并且执行得非常卖力。他把这类命令看得特别重大，认为世界上一切 事情都可以改变，惟独这些上级的命令不可更改。他的职责就是将男女政治犯关押在地牢和 单人牢房里，把这些人囚禁得不出十年就死掉一半，其中一部分发疯，一部分死于肺病，一部分自杀：其中有的人绝食而亡，有的人用玻璃片割破血管，有的人悬梁自尽，有的人放 火自焚。

老将军什么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他眼前发生的，真真切切的，但所有这些事都没有打动他，责难他的良心，就像雷击和洪水等天灾人祸的苦难不会打动他的良心一样。因为这一切都 是在执行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的结局。这些命令都非执行不可，因此再这样考虑这 类命令的后果是全无裨益的。老将军也不能让自己去考虑这些事，也认为军人的爱国天职不 容许他这样考虑，免得在执行时一念不忍以致辜负了天皇。

老将军依他职责的规定，每个星期都巡查一次各囚室，问一下被囚禁的人是否有什么要求。但当他平心静气地听被囚禁的人对他提出的各式各样的要求后，就闭紧嘴巴一言不发，他一 向置之不理那些要求，因为在他看来所有的要求都不符合法令。

聂赫留朵夫乘车来到老将军的寓所的时候。塔楼上的自鸣钟正用尖细的铃声奏着《上帝多么 荣耀》，然后敲了两响。聂赫留朵夫听着这钟声，禁不住回想起十二月党人的回忆录，他从中读到 过这种每个钟头响一回的美妙音乐如何令那些终身监禁的囚徒心情激荡。聂赫留朵夫坐车 来到老将军的住宅门口的时候，将军正好在并不亮堂的客厅里，坐在一张桌面嵌花的小桌旁， 与一个青年人一块儿在纸上推动一个茶碟。那个青年人是他的一个部下的弟弟，是画家。画 家那湿润、无力、纤细的手指头嵌在老将军的皮肤发皱和骨节僵直的硬手指头当中，他们 合在一起的手共同按紧一只倒扣着的茶碟，在写满全部字母的纸上推过来推过去。那个茶碟 在解答将军的一个疑问：人死后彼此的灵魂怎样才能相互认识？

慌慌张张的勤务兵拿着聂赫留朵夫名片进来的时候，贞德的灵魂似乎正通过茶碟说话。贞德 的虚缈的灵魂用一个个字母拼成的语句说：“他们彼此相互认识是……”这几个字才刚记下 来。勤务兵一走进屋，神奇的茶碟刚拼完“通过”两字，正在滑来滑去地转动。茶碟所以之 这样移动不定，老将军认为这是由于下一个字或许应该是“清”，也就是贞德要想告诉人们， 人的灵魂只有通过清除一切俗世杂念，才能相互了解。而画家认为下一个字应该是“灵”，贞德的灵魂要说，他们相互认识只是通过灵魂本身自动发出的光。老将军话毕阴郁地拧紧 两条代表年龄的白眉毛，仅仅盯住茶碟上面的两只活动的手，拼命把茶碟往拼成“清”的活 动字母上推，却还以为那是茶碟自己在活动。脸色苍白无力的年轻艺术家则把稀疏的头发拨 到耳根后面，一双无力无神的浅蓝色眼睛瞧着会客室里那个阴暗的角落，却又在神经质地动 着嘴唇，把正折磨着的茶碟往拼成“灵”的字母那里推。可是老将军因为手头的事被打断而 极为不满，沉默了不一会儿，接过名片，马上戴上夹鼻眼镜，仅仅因为他的粗腰作痛哼了一 声，马上站起来，挺直高大魁梧的身躯，揉揉发麻的僵硬手指。

“请他到书房里去，我一会儿过来。”

“大人，您让我一个人把这件事做完吧。”画家站起来说。“我觉得灵魂还在这儿。”

“好，您把它做完吧。”将军果决而严肃地说，然后伸出僵直的双腿，大步朝书房那边走去，步态果断而匀称。“见到您真高兴，”将军对聂赫留朵夫指了指写字台旁边的圈椅，说了这句亲热的话，声调粗硬，“您来彼得堡很久了吗？”

聂赫留朵夫说他到这里的时间并不很长。

“令堂大人，公爵夫人，身体好吗？”

“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请您原谅，听到这个消息我真很难过。我儿子对我提起过他遇见过您。”

将军的儿子干着与他父亲同样的事业。他在军事学院毕业以后就奉派到侦察局里工作，为他在那里担任的工作洋洋自得。他的工作就是管理暗探。

“是啊，我跟令尊共过事。我们是朋友兼同事。怎么样，您在机关里担任什么工作吗？”

“不，我没有在机关里工作。”

将军不以为然地低下头。

“我有急事要拜托您老人家，将军。”聂赫留朵夫咽了咽口水说。

“太好了，告诉我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哇？”

“事情是这样，要是我拜托您的事不合时宜，那就请您宽恕我。但那件事我看在上帝的面面上，不得不来叨扰您。”

“什么事啊？你说。”

“听说，您这儿关着一个叫古尔凯维奇的好小伙。他的母亲要求前来探望他，或者至少能通 过您把一些书转交给他。”

老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的问题，既没有表示特别的高兴，也没有表示特别的不高兴，只是歪 着头，眯缝着老花的眼珠，仿佛在考虑什么似的。或许他根本不会思考，对聂赫留朵夫提出 的问题也丝毫没有兴趣，因为他心里明白他无论如何只能照章回答。他只是在休养一会儿， 根本无需想无需思考。

“对于这件事，老实说，我无法做主。”他歇了一会儿说。“探监的问题，只有最高当 局批准的法令明确规定，凡是法令明文许可的，可以同意探监。至于书籍，你也不用操心， 我们这儿有个图书馆，凡是许可的书，都可以借给他们看。”

“是的，这我知道，不过他需要学术性的书籍，他告诉母亲要研究学问。”

“您别相信他们那一套。这些把戏我见的多了。”将军沉吟了一会儿，说。“他们根本不是 要研究什么学问。他们只是没事找事罢了。”

“不过，他们处境都这么令人同情，总得找些活动消磨消磨剩下的时间吧。”聂赫留朵夫开 始生气了。

“他们老是诉苦，我耳朵都快生茧了。”将军说。“我们可知道这帮人。”他谈到这帮人就 像谈到一种品质极为恶劣的身分极为怪异特殊的人。“其实你也知道这里给他们提供的条 件 很优越，这在监狱里是少有的。”将军继续喃喃道。

紧接着，他仿佛要证实他的话似的，开始详细列举为囚徒们提供的各种舒适条件，倒仿佛 这个机构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为囚徒安排愉快的住处似的。

“诚然以前的条件是相当严峻的，但他们现在在这儿却能享受很好的照顾。他们吃三道菜， 其中一道总是肉菜：肉饼或者牛排。每逢星期日，他们还可多添一道甜食。因此，求上帝 保佑，但愿每个俄国人都能吃到这样好的伙食。”

将军与所有老年人一样，一旦讲起他所熟知的事情，总要把他翻来复去讲过好多遍，借以证明那些囚徒是如何贪得无厌和不知感激的。

“他们既有宗教方面的书可读，又有旧杂志可翻。我们的图书馆里有大量适合阅读的书。但他们几乎从不翻看。他们刚开始似乎还有兴趣，不过到后来，新书倒有一半书页没裁开，旧书干脆就无人问津了。我们甚至做过试验呢，”将军说，脸上现出似笑非笑的表情，“我们特意将一些纸片夹在书里。结果那些纸片也就始终夹在里面了。再者这儿也是允许他们写字的，”将军接着说。“这儿既发石板，也发石笔，因而他们完全可以写字消遣。他们可以将石板擦净再写嘛。可是他们也不写。不，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安定下来的。起初他们只不过是心浮气躁罢了，一段时间后甚至会胖起来，而且变得十分安宁，”将军说，根本没有意会到他那些话里所隐藏的残酷含义。

不耐烦的聂赫留朵夫仔细地听着他那衰老嘶哑的声音，瞧瞧他那僵直的手脚和白眉毛下没有生气的眼睛，又瞧瞧他那只有被军服直领撑住的松弛皮肉的光光的颧骨，包括他特别引以为荣的白十字章——那只是因为极端残酷和血腥屠杀而获得的沾满鲜血的酬劳，——心里明白，反驳他或者说出他这话的实质意义，都是无聊的。但他还是强自镇定，又巧妙地牵扯到另一个案子，打听囚犯舒斯托娃的现状，还说他今天得到确切消息，上面已下令要释放她了。

“舒斯托娃吗？是舒斯托娃……我当然记不住所有犯人的名字，因为人数太多了。”他说，显然责怪犯罪的人太多。他按了一下铃，吩咐去把办事员叫来。

这位将军趁办事员还没有来的功夫，就劝说聂赫留朵夫去政府担任些差事，说什么凡是品德情操正直的人（他自以为是其中的一员）都是皇上……“以及祖国”所特别需要的。他加上“和祖国”三个字，显然只是强调为了说起来音调更动听而不会使人误会罢了。

“你看，我虽然老了，但还要尽力在这当好差。”

进来的办事员瘦小而结实，长有一双聪明灵活的大眼睛，走来对将军报告说，舒斯托娃关在一个戒备森严的特殊地方，目前有关她的释放的公文还没有收到。

“只要公文一到，我们当天就会把她释放。我们不会留住这些犯人的，说真的他们的光临我们并不太高兴。”将军说完，又试图现出调皮的微笑冲他乐一下，结果只是使他的老脸显得更加丑化。

聂赫留朵夫马上起身告辞，竭力克制自己的感觉，免得流露出对这个可恶的甚至处世过分的老年人又厌恶又同情的复杂心态。老头儿呢，他则认为对老军人的这个轻浮而正邪不分的儿子不必太过分严厉，只要顺便教训他几句就可以了。

“再见，我亲爱的，您别责怪我，我对您说这些话只是因为爱护您。我告诫您不要跟我们这儿监禁着的人来往。他们都是些犯过罪的人，都是些最不道德的人，我们是了解他们的。”他说，用的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他确实毫不怀疑自己的这些话，这并非因为事实原本如此，而是因为如果事实不是如此，他就必须承认他自己并非一个正在当之无愧地过完美好的一生、值得尊敬的人，而是一个以前就出卖自己的良心，到了老年仍旧在出卖自己良心的坏蛋。“您最好还是到机关里去工作，”他接着说，“沙皇需要正直的人……国家也需要。”他补充了一句。“是啊，倘若我们每个人都像您这样不工作，那怎么了得？还有谁愿意工作呢？我们动辄就批判当前的制度，但我们自己却并不愿意帮助政府。”

聂赫留朵夫长叹一口气，深深地鞠了一躬，握了握友爱地向他伸过来的那只瘦骨嶙峋的大手，走出房外去了。

将军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揉揉他的腰，又回到客厅。客厅里的画家已经记下他所得到的

贞德 灵魂的答复，正在等候将军。将军戴上夹鼻眼镜，看了一遍：“他们相识是借了灵魂的透明 体所射出来的光。”

“啊，”将军赞同地说着，闭上眼睛。“但倘若大家的光都是一样的，那又怎么区分到底是谁呢？”他问道，又在小桌旁边坐下，他的手指头又同画家的手指头交叉在一起。

此刻聂赫留朵夫雇的出租马车走出了大门。

“你说，这地方真气闷哪，老爷，”马车夫对聂赫留朵夫说道。“我本来想不等您出来就走了。”

“是的，很让人气闷。”聂赫留朵夫同意道，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像卸了千斤重的石头似地望望空中烟灰色的浮云，又望望涅瓦河上波光粼粼的水纹。

二十

第二天就要开庭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聂赫留朵夫一大早就坐车去枢密院。在枢密院大厦门口，已停了好几辆装饰一新的马车。他兴奋地注意到阿纳托思律师也乘车赶来。他们沿着金壁辉煌的楼梯登上二楼休息间。

律师对这里的一切通路都很熟悉，就往左拐，走进一个刻着制定诉讼条例的年代的门。阿纳托思在头一个长方形房间里脱掉大衣，从看门人那里打听到枢密官们都已经到齐，最后一个也刚刚走过去，他就带着快活自信的神情走进第二个房间，身穿燕尾服，白胸衬的上方打着白领结，一副煞有其事的模样。在第二个房间里，右边放着大橱，旁边有一张桌子，左边是一道盘旋的楼梯，这时候正好有一个举止文雅、风度翩翩的文官，他从楼梯上走下来，身穿制服，胳肢窝里夹着皮包。房间里有一个家长模样的留着长白发的小老头特别引人注目，他穿着短上衣和灰色的长裤，身旁站着态度特别恭敬的两个跟班。

这位满头白发的小老头钻进充作换衣室的大柜子，关上柜门。这时候，阿纳托思又看见一个同行——跟他一样穿着燕尾服、系着一条白领带的律师，阿纳托思马上兴致勃勃地同他交谈开来。聂赫留朵夫乘机观察一下房间里所有人。大约有十五个左右的人，来旁听，其中有两个是女的：其中一个年轻的戴一副夹鼻眼镜，还有另一个头发花白。因为今天同时要审理一个报纸诽谤案，因此旁听的人格外地多，主要是来自各地的新闻界人士。

一个满面红光、相貌堂堂的民事执行吏，穿着整齐的皇上赐予的制服，手里拿着一张公文纸，走到律师阿纳托思跟前，问他办哪一个案子的。听说是办玛丝洛娃案，于是就在纸上迅速地记下来，便走开了。这时候大柜子的门也开了，一位家长模样的小老头从里间出来，已经不穿上身的衣裳，而换上一身镶满丝绦的官服，而且胸前挂满各种各样的闪闪发亮的勋章和奖牌。他的模样就像一只大活鸟。

显然小老头本人也很发窘这身可笑的衣服，他赶紧快步走进口对面的房门。

“这个人就是贝，一个德高望重的人，”阿纳托思对聂赫留朵夫说，接着他介绍他的同行跟聂赫留朵夫相识，然后又讲起目前要审理的案子，依他看来那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案子。

不一会儿，那个案子就开审了。聂赫留朵夫与其他旁听的人一起往左走到法庭里。这些人，包括阿纳托思，都走到栏杆后面的旁听席上。唯独彼得堡的那个律师走到栏杆前头的斜面写字台旁边。

枢密院的法庭比地方法院的法庭小一些，陈设也更简单，唯一的差别就是枢密官们面前

的桌子上不是铺着绿呢，而是边上镶着金丝带的深红色的丝绒。不过只要是行使审判职能的地点，所永远有的标志，例如守法镜、圣像、皇帝的肖像等，这里也一应俱全。民事执行吏也那样庄严地宣布说：“开庭了。”所有的人也那样站起来，穿制服的枢密官们也那样走进来，也那样在带扶手的高背椅上坐下，也那样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尽量装出自然的模样。

枢密官一共是四名。首席枢密官尼基丁长着一副丁型脸，没留胡子，还有一双银灰色小眼睛。沃尔夫故作潇洒地噙起自己的嘴唇，用他那双白皙的小手翻阅着卷宗，紧跟着是斯科沃罗德·尼科夫，体魄魁梧，满脸麻子，可能是个有满腹学问的法学家。第四个是贝，可能就是外表看起来像个家长的干瘪老头，他走在最后。此时跟枢密官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位书记长和副检察官。看起来副检察官是个不高不矮的年轻人，身体又干又瘦，脸色很差，胡子刮得溜光，生有一双极为忧郁的黑眼睛。尽管当时他穿着一身奇装异服，聂赫留朵夫可能也有六年没有见过他，但聂赫留朵夫马上就认出他曾经是他大学时期的最好朋友。

“请问副检察官是谢列宁吧？”聂赫留朵夫疑问了半天然后问律师。

“是的，那怎么样？”

“可是我跟他关系很不错，他人品也不赖……”

“恐怕也是个很好的副检察官，我知道他，很能干。顺便说一句，您本来应该拜托他的。”阿纳托思说。

“他不管办任何事都是挺真诚的。”聂赫留朵夫说，突然想起他和谢列宁的密切的关系同深厚的友谊，想起谢列宁的种种高尚品质，比如说纯洁、真诚和正派的作风。

“但现在恐怕来不及了。”阿纳托思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案情简要的部分，低声说道。

现在开庭就是审理对高等法院的裁定所提出的上诉，因为高等法院的裁定并没有更改地方法院的判决。

聂赫留朵夫认真倾听着，极力要弄清楚在他面前开审的案子的意义。然而正像以前在地方法院的法庭上一样，使他理解产生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所讲的完全是些次要的东西，并不是理应成为要点的东西。这个案子涉及报纸上登载的一篇文章——揭发一个股份公司的董事长的舞弊行为的文章。看起来，理应成为要点的东西只可能是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否真的侵占了股东们的利益，应该如何做才能制止他的这种行为。然而关于这一点，法庭根本没有提到。他们所谈的仅仅是按照法律那家报纸的发行人是否有权刊登小品文作者的文章，既然现在已经刊登了，那么他犯的是什么罪，到底是诬蔑还是诽谤，是诬蔑中隐含诽谤，还是诽谤中隐含诬蔑。此外还牵涉到某个总署的各种法令和决定，那更是普通人所无法理解的了。

聂赫留朵夫仅仅理解一点，那就是提出案情的沃尔夫尽管昨天对他严厉地说，枢密院决不会审查案件的事实曲直，现在在报告时却明显有意偏心被告，有利于撤销高等法院的判决。谢列宁呢，一反以前的沉稳作风，用令人想不到的激烈言词发表了别的意见。一向稳重的谢列宁也能如此激愤，使聂赫留朵夫感到震惊，却是有理由的。因为谢列宁了解到这个董事长在金钱方面手脚不干净，又无意中了解，沃尔夫几乎就在接近开庭的时候参加了这个商人的豪华盛宴。现在沃尔夫在汇报案情，虽然措辞非常小心，但分明在保护这个商人。谢列宁听了十分愤怒，就用非常愤激的语气痛加骂斥。他的话明显触犯了沃尔夫：他脸都红了，身子发抖，默默地装出十分惊讶的表情，带着非常生气而又深受冒犯的模样跟其他那些枢密官一起朝着议事室走去。

“劳驾，您过来办哪一个案子？”等枢密官们走后，民事执行吏又问阿纳托思。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就是要办玛丝洛娃的案子。”阿纳托思说。

“好，好，今天要办理这个案子。但是……”

“但是怎么样？”律师问。

“您不知道，这个案子早就不公开辩论了，所以枢密官先生在公布案子的判决以后，不可能再出来。所以我可以去通报……”

“如何去通报？……”

“我马上去通报的，马上去通报的。”那个民事执行吏又在纸上写了些什么。

二十一

果真如此，枢密官们准备在裁定诽谤案以后，不再走出议事室，而是在里边一边喝茶，吸烟，一边处理包括玛丝洛娃一案在内的其他案子。

枢密官们在议事室里刚刚围着桌子坐下，沃尔夫就很兴奋地列举出必须撤销这个案子的原判的种种理由。

首席枢密官尼基丁丁做人一向小气，今天心情尤其坏。在审案的时候，他在听着案情汇报过程中就有了想法。现在他坐在那里听沃尔夫发表演讲，心里却在想着他自己的事情。他在回忆昨天写在备忘录上的一件事，那件事就是他想了很久很久的一个肥缺，没有分派给他，却分派给了维梁诺夫。尼基丁丁自信不疑，凡是在他任职期间接触过的各色各样的一二等文官，他们对那些评价将成为重要历史文献。昨天一整天他写了一章备忘录，强烈批评几个一二等文官，批评他们阻碍他救助俄国，但是他却要让俄国避开被现在那些统治者所毁灭的结局。实际上，他们仅仅是阻挠他领到更多的薪水而已。此时他正在想，如何使子孙后代对这些事有个截然不同的认识。

“对啊，那当然。”他回答沃尔夫说，事实上他压根没有在听。

满面愁容的贝一边听着沃尔夫的发言，一边在面前铺开的纸上画着一个个花环。贝完全是个自由派。他神圣地捍卫着六十年代的传统，即使有的时候退却到严格的公正立场后面，那也总是为了保卫自由主义。所以就目前这个案子而言，贝就主张驳回上诉，其理由在于第一，那个提出上诉、控告诽谤的股份公司董事长是一个卑劣的人，第二，控告报刊工作者犯诽谤罪就是压制新闻自由。当沃尔夫终于结束他的报告时，贝就放下他那没画完的花环，带着满脸的愁闷，（他愁闷的是这种人所共知的真理，居然还得让他费力解释），用温和好听的声音，简明扼要而又有力地说明上诉是缺乏根据的，然后他就低下生满白发的头，继续画他的花环。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就坐在沃尔夫面前，不住地用粗手指把上下胡子放进嘴里嚼着。等到贝的话音一停，他就没有咀嚼胡子，用十分尖厉刺耳的嗓音说，尽管董事长确实是个坏蛋，但是如果有法律根据，他觉得还是主张取消原判，既然没有法律依据，那他就支持贝的提议。他说完心里暗暗高兴，因为他借此时机对沃尔夫狠狠挖苦一番。首席枢密官同意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说法，这个案子就如此被否决了。

沃尔夫十分不高兴，尤其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那种不正当的偏心行为似乎被人看穿了。但是他装得什么事都没有，翻开下一个由他提议的玛丝洛娃案的案子，专心阅读。枢密官们此时打了打铃，叫人把茶送上来，又纷纷谈起另外一件和卡敏斯基决斗案同时发生的轰动

整个彼得堡的事。

这是关于另一个局长的案子，他触犯刑法第九百九十五条，被别人揭发检举。

“真下流。”贝嫌恶地说。

“可是这有什么不好？我可以在我们的文献里找出一篇文章来给您看一看，是一位德国作家写的，他明确阐明这不能算是一种罪行，男人同男人一样也可以结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着，扬声大笑起来，并贪婪地、咝咝作响地吸着一支夹在指根中间、已被揉皱的纸烟。

“这不可能。”贝说。

“我拿给您看就是。”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接着说，并说出那本著作的全名，甚至说出了著作出版的时间和地点。

“据说，他已经调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城市去担任省长的职务了。”尼基丁京说。

“那倒不错。主教会举着十字架迎接他。主教应该也是他那样的人才对。我倒可以给他推荐一个那样的主教。”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着，把烟蒂扔在茶碟上，尽量把所有的胡子和唇髭都塞进嘴里，开始咀嚼起来。

这时民事执行吏走进来报告说，阿纳托思律师和聂赫留朵夫公爵希望在审理玛丝洛娃一案的时候能够出席。

“谈及这个案子，”沃尔夫说，“这倒是一宗十足的风流韵事呢。”他就把他所了解的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的关系讲了一遍。

枢密官们根据这事谈了一会儿，吸好烟，喝完了茶，接着回到法庭上，宣布对上一个案子的裁决结果，接着开始审查玛丝洛娃的案子。

沃尔夫用他那尖细的嗓子十分详细地报告了玛丝洛娃要求取消原判的申诉，他的措辞十分不公正，显然他希望撤销法庭的原判。

“您还有什么别的要补充的吗？”首席枢密官回过头来问阿纳托思。

阿纳托思马上站起来，挺起穿白衬衫的胸膛，说话说得庄重而得体，逐条证明法庭一共有六条违背法律本义。另外他还简要提一下本案的事实，指出原判的不公平使人震惊。阿纳托思对此作了十分简洁的发言，他的语气好像表示歉意，因为他所坚持的原因，诸位枢密官按他们细察入微的目力和深厚的法学知识肯定看得比他更加明白，理解得更加清楚，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是出于所承担的某种责任罢了。阿纳托思这些话似乎令人感到，枢密院肯定会撤销原判。阿纳托思发言结束以后，得意扬扬地轻轻一笑。聂赫留朵夫看看律师，见到这种笑容，觉得这场官司肯定会打赢。但是，他向枢密官们看了一眼，才发觉仅仅是阿纳托思一个人在笑，一个人在洋洋得意。枢密官们和副检察官却没有笑，也没有洋洋得意，却露出烦闷的表情，仿佛在说：“像你们那种人的讲话我们听得太多了，毫无意义。”直到律师发言完结，不再耽误他们了，他们才觉到满足，律师发言才结束，首席枢密官马上转身对副检察官讲话。谢列宁发言简明，认为要求取消原判的种种理由都缺乏根据，决定维持原判。所以枢密官马上又纷纷站起来，去开会商量。在议事室里意见不同。沃尔夫决定撤销原判。贝了解本案的本质所在，也一口主张撤销原判，同时根据他的恰当理解，给他的同事们生动地描述当时开庭的情景及陪审员们发生种种误会的经过。尼基丁丁照常主张严格办事，严守官样文章，坚决反对撤销原判。于是，本案就完全取决于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姿态。他主张驳回上诉，主要原因是聂赫留朵夫出于一种道德要求一定要同那个姑娘结婚，实在令人厌恶。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唯物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抽象道德的任何表现，或者说得更坏一点，宗教信仰的任何表现，不仅是一种可鄙的疯狂，甚至是对他本人的一种侮辱。为这个妓女惹出这样一场麻烦，再加上为她辩护的名律师和聂赫留朵夫夫人都到枢密院来出庭，在他看来是可恶之至的。他就做出一脸的苦相，不停地把胡子塞进嘴里，极其天真地装做对这个案子一点也不了解，只知道请求撤销原判的理由不充分，因此同意首席枢密官的意见，不批准本案的上诉。

就这样，上诉被驳回了。

二十二

“真是可怕之至！”聂赫留朵夫同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时说道。律师在整理他的皮包。“这样一个清楚明白的案子，他们却在形式上挑毛病，驳回上诉。这真是可怕！”

“这个案子是在原判法庭上弄坏的。”律师大声说。

“就连谢列宁都主张此案驳回。毫无道理，真是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重复说。“此时怎么办呢？”

“最好向皇上告个御状。趁着您在这儿，亲自把这个状子递上去。我会给您起草状子。”

此时，个儿矮矮的沃尔夫身穿制服，衣服上佩着几枚星章，直接走进接待室，走到聂赫留朵夫面前。

“有别的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公爵，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哇。”他闭上自己的眼睛，耸耸肩膀说，马上就走开了。

谢列宁紧跟着沃尔夫走出来了。他刚刚从枢密官那里知道他的老朋友聂赫留朵夫也在这里。

“哦，我没料到会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一丝笑意浮现在他的唇边，但忧郁的神情仍留在他的眼睛里。“我甚至不知道你到彼得堡来了。”

“我也不知道你当了检察官。……”

“副的，”谢列宁纠正道，“你怎么会到枢密院来了？”他神色忧郁又无精打采地瞧着他的朋友问。“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是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到这儿来原指望能找到正义，挽救一个冤枉被判刑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的案子里的那个女人。”

“哦，玛丝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了，说道。“那个诉状是完全缺乏根据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个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被判处苦刑。”

谢列宁叹了一口气。

“这十分可能，只是……”

“不是可不可能，而是确实……”

“你如何知道？”

“因为我就是审理这个案子的那个陪审员，我清楚我们在那里犯了错误。”

谢列宁思考起来。

“那时就应该说清楚的呀。”他说。

“我说过了。”

“必须把它笔录下来，上诉时一块送上来就好办了……”

谢列宁一直公务很忙，很少参加这种社交活动，对聂赫留朵夫过去显然毫无所闻。聂赫留朵夫看到这一点，觉得不便提他同玛丝洛娃之间的关系。

“是的，但是就是此时这样，原判很显然也是很合理的。”他说。

“枢密院是没有权说这话的。如果枢密院觉得原判不公正，就把它取消，那么暂时不说枢密院可能没有立场，不能保护正义，相反就有破坏正义的嫌疑，”谢列宁一边回忆刚才的案子，一边说，“暂时不说这一点，就连陪审员的裁决就会变得无足轻重。”

“我知道这一点，那个女人应该完全没有罪的，把她从不该的惩罚中拉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线希望此时也没有了。最高机构竟批准了这种完全非法的行为。”

“枢密院没有批准非法的行为，因为它没有审查，而且也不能审查案子本身的是非曲直。”谢列宁眯细了眼睛说。“你大概住在你姨母家里吧。”他补充了一句，显然是想转换话题。“我昨天听她说你在此地。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块儿参加一个外国传教士讲道的集会。”谢列宁说，唇边又浮现一丝笑意。

“是的，我去听过，但我觉得厌恶，中途走掉了。”聂赫留朵夫气愤地说，并因为谢列宁转换话题而非常懊恼。

“哦，这又何必呢？这毕竟是一种宗教感情嘛，虽然它有失偏颇，有点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简直荒谬到了极点。”聂赫留朵夫说。

“哦，并非如此的。只有一件事说来倒是很奇怪，我们对我们教会的教义知之甚少，倒经常把一些基本的教条错看做某种新的发现了。”谢列宁说，仿佛急于告诉他的老朋友他以前没发现的新见解。

聂赫留朵夫惊讶又仔细地瞅着谢列宁。谢列宁的眼睛没有低下，他那对眼睛不仅现出忧郁的神情，而且流露出一种恶意。

“你竟相信教会的教条？”聂赫留朵夫问。

“是的，我当然相信。”谢列宁回答说，眼睛死盯着聂赫留朵夫的眼睛。

聂赫留朵夫长叹一声。

“太奇怪了。”他说。

“好吧，我们后来再谈。”谢列宁说。“我马上去。”他转身对那个恭敬地走到他面前的民事执行吏说。“马上得找个机会下次见面，”他十分有感触地说，“我找得到你吗？对于我，晚上七点钟吃饭前总是在家里。我就住在纳杰日津街。”他写下了他家的门牌号码。“我们大概有多少年没见面了！”他加了一句，嘴唇上又显出一丝笑意，走了。

“如果有时间，我会去见你的。”聂赫留朵夫说，感到这个原本和蔼的人，经过这段短暂的交谈，变得陌生、隔膜并且不能理解，即使没有敌意。

二十三

谢列宁还在大学读书的时间里，聂赫留朵夫已经认识他了。那时他是个十分优秀的人，好朋友，上流社会里有教养的年青人，待人接物十分有分寸，同时长相英俊，风度翩翩，又非常正直诚恳。虽然他并不十分用功学习，不过书读得非常好，所写的论文还有几次得到过金质的奖章，但没有一点书生气。

他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人们谋利益当作他青春生活的目标。他认为服务人们唯一途径是在政府机关里工作，因此他大学一毕业，就系统研究了一下他能够贡献

自己力量的各种工作，断定他在掌管制订法律事宜的某部大臣办公厅第二处工作最为合适，于是就进了那个机关。然而虽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办理着每一件他应该办理的事，可是他仍觉得这种服务没有能够满足他想做一个有益于人的心愿，他的心里也没有因为付出了这种服务而产生一种应有的自豪的感觉。再加上他与那个浅薄无知、虚荣心强的顶头上司发生了冲突，那种不满就更为强烈，因而他从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了。在枢密院里他感觉稍好些，但那种不满的感觉依然伴随着他。

他现在感到，所有都和他的期望恰恰相反，所有和该有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枢密院当官时期，他的亲戚为他奔走求情，替他求得宫中侍从的职位。所以他只好穿上绣花官服，佩上白麻布胸衬，坐车到一家家向他们道谢，因为他们使他当上了侍从的职务。他左思右想，也无法解释这种职务的意义。他觉得这种差事比起在政府机关任职更加“不合适”，但是，一方面他又无法拒绝这项任命，否则就会激怒那些热心操心的人。另一方面，这项委任又适合他的劣根性，他在镜子里看着穿着金绦制服的自己，见到别人对他肃然起敬，心里感到很高兴。

在婚姻方面他也遇到类似的情形。人家为他撮合了以上流社会的眼光看来要算是很风光很完美的婚事。他之所以结婚，主要也是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就会得罪希望婚姻成功的新娘，得罪撮合亲事的人们，使得大家伤心，另外还因为娶一个年轻漂亮、门第高贵的姑娘使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使他感到愉快。但这门婚事很快就证明它比机关里的工作和宫廷里的职位更加“不对头”。他的妻子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就决定不再要子女，开始过奢侈的社交生活，而且也不管他愿意与否，迫使他也参与其中。她长得不算特别美丽，对丈夫忠实不二，可是先不论她用这种生活方式使她丈夫扫兴，就说她自己，从这种生活方式里除了消耗大量的精力、换来过度的疲劳以外，似乎也一无所获。尽管如此，她依然辛苦地经营这种生活。他想方设法要改变这种生活，可是他的所有尝试一碰到她的信念，就像撞在石头墙上那样很容易粉碎了，她深信生活原本就该如此，她所有的亲友也都支持她这种信念。

他们生了个女孩，有着很长的金黄鬃发，露出两条白的小腿，但做父亲的却不喜欢她，因为她根本不是按照他的愿望培养的，夫妻之间常常发生隔阂，直到双方都不希望互相了解对方，所以一场不动声色、隐瞒过别人耳目、碍于礼节而保持一些分寸的明争暗斗就使他的家庭生活变得非常痛苦。因此，他的家庭生活就比宫廷事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

但最“不对头”的却是对宗教的态度。他与他那个时代和那个圈子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随着智力的成长，不费吹灰之力就挣脱了熏染过他的宗教迷信的枷锁，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是何时得到解放的。他在年纪很轻、在大学里读书、同聂赫留朵夫相好的时候，作为一个严肃正直的人，公开宣布他摆脱了官方宗教的迷信。然而随着岁月流逝，随着官位的步步升高，特别是随着保守的反动势力的逐渐抬头，这种精神的自由就开始与他的生活“不对头”了。且不说家庭方面，尤其是他父亲死后要为父亲做安魂祭，也不提他母亲希望他持斋，以及社会舆论或多或少给他的压力，单是在机关里任职就得被迫接二连三地参加各种祈祷式、供奉式、谢恩式等等类似如此的礼拜式，要想有一天不与宗教的外在形式发生某种关系，要想避开它都是不可能的。他要应酬这些礼拜，就得在两条道路当中选

择一条：要么假装信仰他所不信仰的东西(凭他诚实的性格，这他是怎么也无法做到的)，要么承认所有这些外在形式都是弄虚作假，改变他的生活，不再参加这些他认为虚伪的事情。可是为了做到这件似乎无关紧要的事，却不得不做许许多多的事。他必须与自己接近的一切人进行长期的斗争，他还必须改变他的整个地位，放弃他在机关里的工作，牺牲他自以为通过这种工作正能为人们带来，并且期望以后还会带来更多的利益。还有，他为了做成这件事，就得坚定地相信自己观念的正确。他确实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就象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凡是受过教育，稍微懂一点历史，大体知道宗教的起源，了解基督教教会的起源和分裂，就不可能不相信这种观念的正确性。他深深明白他不承认教会的教义是真理的观念是正确的。

但是，周围环境的强迫下，他这个老实的人只能自己骗一下自己。他只能对自己说，由于证实不合情理的事是不合情理的，开始就得对这些不合情理的事进行深究。这是一点小小的谎言，但是它却导致了他撒了更大的谎，使他越陷越深。

他是在那种东正教的氛围下生出来和长大的，周围的人都要他信仰东正教，如果不承认这个教，他因此不能继续从事那些有益于人们的活动。所以，对于他自己提出的东正教是否是正确这个问题，他心中很早已经有了答案。所以为了摆脱这个问题，他从来不读伏尔泰的书、叔本华、斯宾塞、孔德的著作，而读黑格尔的哲学和维奈、霍米雅科夫的宗教著作。当然，他在那些著作里找到了他所想得到的东西：精神上的安慰和对教义的维护。他从开始就受宗教教义的教诲，但是他的理性却已把它否决了。但是，没有宗教信仰，整个生活肯定会充满种种烦恼，而只要接受它，所有烦恼就会没有了。另外，他也学会了种种时尚的诡辩术，例如个人的智慧不能认识真理，仅仅人类智慧的加起来才能发现真理；接受真理的唯一办法就是神的启示，而神的后发仅仅教会才能保存，等等。从那个时候起，他就理所当然地参加祈祷、安魂礼拜、弥撒、守斋，对着那些圣像画十字，继续在机关干事，并不感到在自欺欺人。而在机关干事就使他感到对人有好处，并且给他缺少欢乐的家庭生活带来了不少安慰。他认为自己是信仰东正教的了，可另一方面，却又整个身心地空前强烈地感觉，他的信仰是完全“不对头”的。

正因为此，他的眼睛才总是那么忧郁。也正因为此，他见到聂赫留朵夫以后，才想起他与聂赫留朵夫认识的时候，那时候所有那些虚伪还没有在他的心里生下根，他是多么诚实、高尚。特别是在他急忙向聂赫留朵夫表白他的宗教见解以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到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对头”，他的心情就郁闷极了。聂赫留朵夫见到了这个老朋友，在最初一阵高兴过去以后，也产生了同样“不对头”的心情。

也正因为此，虽然他们两人互相约定以后还要见面，却都没有寻求再次见面的机会，于是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逗留的这段时期，这两个人没有再见面。

二十四

聂赫留朵夫和律师从枢密院走出来，一起沿着人行道走去。律师先吩咐他的马车紧跟在后面，然后开始给聂赫留朵夫讲述方才在枢密院里提到过的那个局长的事情，讲他如何被揭发检举，又如何非但没有被依法制裁，反而被送到西伯利亚当省长去了。

律师讲完这件事的全部经过及其丑陋的内情以后，另外又眉飞色舞地讲起一件事，说的是好几个地位极高的人如何吞没了一笔用作建立他们这天早晨坐车路过的那座一直未竣工的纪念碑的捐款。他又讲起某人的姘妇在证券交易所里发了几百万的横财，讲起某人把自己的老婆卖出去，某人又把她买来了。此外，律师还谈政府的高级官吏们如何营私舞弊，

如何犯下种种罪行，可是他们并没有被判刑，依然坐在各机关的首要交椅上。显然这类故事从律师那儿取之不尽，他讲得津津有味，因为这类故事充分显示他自己赚钱的方式与彼得堡的高级官吏们用来达到同样目标的方式相比，是正当而且清白的。因此当聂赫留朵夫没有等他讲完高级官吏们的罪行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向他告辞，另外雇了一辆街头马车，回到堤岸街他姨妈家里去的时候，律师不禁感到非常惊讶。

聂赫留朵夫心里万分愁闷。

他之所以心里愁闷，主要原因是枢密院驳回上诉，这样无辜的玛丝洛娃就必须忍受毫无意义的苦难；而且因为驳回上诉这件事，使他原本要和她同生死、共患难的坚定的决心更加难以实现了。再者，他想起律师兴致勃勃地讲到的那些令人觉得可怕的丑闻，以及时常浮现在他脑海中的谢列宁的眼神——以前是多么的坦率、高尚、可爱，现在却是多么的凶恶、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所有的这一切都使他愁闷不已。

聂赫留朵夫刚回到家中，看门人就多少带点鄙夷的神气地交给他一张字条，照看门人的说法，字条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他一看，原来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写的。她写道，她特意来向她的女儿的救命恩人致以感激和谢意，并邀请他光临瓦西里耶夫岛五马路某号。在字条里她还写道，薇拉非常盼望他的光临。还说他不必顾虑，她们不会说过多感谢话以致亵渎了他的高尚情操，她们只不过想见见他而已。如果可能的话，她们希望他明天早晨就能光临。

另外还有一张字条，是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罗夫写的。他是聂赫留朵夫的旧同事，聂赫留朵夫曾经托他把聂赫留朵夫准备好的那些教派信徒的状子亲自递交皇帝。鲍加狄罗夫用果断有力的笔迹写道，他一定重承诺，将状子直接面呈皇帝，但他认为，倘若聂赫留朵夫能先去拜望另一个可以左右此案的官员，当面托他一下，情况会更好。

经过最近几天在彼得堡停留期间所得到的种种印象，聂赫留朵夫已经伤心绝望，认为可能任何事都办不成了。他在莫斯科拟定的那些计划，在他眼里就像是青年人的梦想，倘若带着那样的梦想走进生活，就不可避免地碰壁、失望。但既然他已经住在了彼得堡，他就认为他仍然有责任执行原来的计划，因而他决定明天先上鲍加狄罗夫家去一趟，然后再依他的忠告，去拜望那个可以左右教派信徒们的案子的人。

他从皮包里拿出教派信徒的那份状子，正想再读一遍，这时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听差敲门进来了，请他上楼，去喝茶。

聂赫留朵夫答应说他马上就上去。他把那份状子放回皮包里，走出门，到姨妈那儿去。在走上楼时，他望了一眼窗外，瞧见了玛丽叶特的那对枣红马，不由得高兴起来，心里直想笑。

玛丽叶特头上戴着一顶帽子，不过身上没再穿黑色连衣裙，而是穿一件花花绿绿的连衣裙。此时她手里正拿着一杯茶，在伯爵夫人圈椅旁坐着，嘴里尖声尖气地不知正说着什么。那双满含笑意的眼睛很美丽，而且闪闪发亮。当聂赫留朵夫走进来时，玛丽叶特刚刚说完一句很好笑的话，而且是一句不成体统的笑话——这是聂赫留朵夫从听到的笑声中分辨出来的，——逗得善良而嘴边有毛的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大笑起来，整个肥胖身子也抖动不已。玛丽叶特脸上现出特别调皮的神情，微撇含笑的嘴，把她那张精力旺盛、容光焕发的脸扭过去，默默地看着和她聊天的女主人。

聂赫留朵夫从所听到的几个字就能猜到，她们正在谈的是当时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那

是关于西伯利亚新省长的故事。玛丽叶特刚才就是在这故事上讲了一句极为好笑的话，把伯爵夫人逗得好久都忍不住笑。

“你要把我逗笑死了。”她笑得都咳嗽起来了，说道。

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在她们旁边坐下。他刚要批评玛丽叶特举动轻浮，不料她已经改变了脸上的表情，甚至改变了她的整个心境，因为她已发现他那严肃和略带不满的神情而她又愿意讨他欢心。自从她同他见过面以后，她就有意要他喜欢她。现在她忽然严肃起来，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似乎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这倒并非她有意假装，而是她的心里确实恰好产生一种与聂赫留朵夫当时相同的心境，尽管她无法用话语来表达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她问他办的事情怎么样了。他就讲了讲他在枢密院失败的经过，还讲了他同谢列宁的相遇。

“啊！他有一颗多么纯洁的灵魂！他分明就是个 *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纯洁的灵魂啊。”那两个女人都引用了上流社会称呼谢列宁的这个绰号。

“他的妻子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她呀？噢，我并不想说她的坏话。可是她不了解他。怎么，莫非他也认为该驳回上诉吗？”玛丽叶特带着真诚的同情问道。“这真是太糟了，我真可怜她呀！”她叹息着，又说了这样一句。

聂赫留朵夫不由皱起眉头，想改变她们的话题，于是谈起那个被关在要塞里、经玛丽叶特说情才得以放出来的舒斯托娃。聂赫留朵夫向她道谢，感激她在她的丈夫面前说情。然后他说，这个女人和她的一家因谁都没有同情他们所以受苦，这件事让人想起来就觉得可怕，可是他不让他说下去，自己先表示了她的愤慨。

“您不要对我说这样的话，”她说，“当我的丈夫告诉我说她可以放出来，我就怔住了。既然她并没有罪，那为什么还要把她关在那地方呢？”她正好说中了聂赫留朵夫自己所想说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看得出玛丽叶特是在向外甥调情，心里觉得很有趣。

“你听我说，”她等到他们沉默下来以后说，“你明天傍晚得上阿林家去，基泽维捷尔要在她那儿讲道。而且你也得去。”她转过头来对玛丽叶特说。

“他注意到你了。”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全跟他讲了，他告诉我说你所说的都是好兆头，你一定会走近基督身边的。明晚你务必要到阿林家去。玛丽叶特你叫他一定要去。你自己也去。”

“我呢，伯爵夫人，第一，我没有任何权利要求公爵做任何事情。”玛丽叶特瞧着聂赫留朵夫说，她的目光仿佛表明他和她之间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这些话上和对待福音派的态度上，已经达成一种充分的默契。“第二，您知道，我不大喜欢这个……”

“你什么事都爱顶牛，总是自作主张。”

“我怎么会自作主张呢？我是像最普通的农妇那样信教的。”她微笑着说。“何况第三，”她接着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啊！你已经看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卡吉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说。

玛丽叶特说出那个著名的法国女演员的姓名。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她演得非常好。”

“那我先去看谁好呢，*ma tante*，先去看女演员呢，还是先去看传教士？”聂赫留朵夫

笑盈盈地问。

“劳驾，别找我的碴儿。”

“应该先去看传教士，再去看法国女演员的好，否则就不会有什么兴致去听那些讲道了。” 聂赫留朵夫说。

“不，我看最好还是先去看法国戏，然后才去忏悔。” 玛丽叶特说。

“哼，你们不要拿我取笑。讲道归讲道，做戏归做戏。想拯救自己，用不着把脸拉得两尺长，还哭个没完。人应该有自己的信仰，那样才会快活。”

“您啊，我的姨妈，传教起来并不比哪个传教士差呢。”

“我看这样好不好，” 玛丽叶特笑了笑，说，“您明天不如到我的包厢里来吧。”

“我担心我去不了呢……”

一个听差走进来，说有客来访，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原来是伯爵夫人主持的那个慈善团体的秘书。

“哦，那是个乏味极了的先生。我还是到那边去招待他吧。我等会儿就来。您给他斟点茶吧，玛丽叶特。” 伯爵夫人说道，急忙向客厅里去了。

玛丽叶特脱下她的手套，露出一只有力而略平的手，那只手的无名指上戴着戒指。

“您要茶吗？” 她说，边拿起酒精灯上的一只银茶壶，小手指翘起，很古怪。

她的脸色严肃而且忧郁。

“我非常尊重别人的见解，但他们总是把我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弄得我觉得非常不好受。”

玛丽叶特说到最后几个字时，好像要哭出来了。她的这些话，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其实没有任何意思，或者说其实没有任何特别意思，不过聂赫留朵夫却觉得她的话极为深刻、诚恳、善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位年轻美丽而且衣着讲究的女人说这些话时，她那对水汪汪的、美丽的眼睛，完全把聂赫留朵夫给迷住了。

聂赫留朵夫扭过头来默默地望着她，眼睛没法离开她那迷人的脸。

“您一定以为我并不了解您，并不了解您心里的各种想法。其实您所做的谁都清楚明白。那其实是公开的秘密，而我赞赏您的所做所为，对您非常钦佩。”

“老实说，我没什么值得钦佩的，我做的还很少。”

“那也还是一样。我了解您的感情，也了解她……哦，好吧，好吧，这件事就不再提了。” 她看到他脸上表现出不愉快的神情，就打断自己的话。“而且，除此之外我还了解一件事，” 玛丽叶特说，满心期望他能迷恋自己，而且出于女性的敏感她已经猜出什么是他认为重要和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您亲眼目睹监狱里发生的种种苦难和种种惨状以后，打算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他们在另一些人的支配下，受到冷漠和残忍的折磨，痛苦万分，痛苦万分啊……我知道，有些人是愿意为这种工作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我自己也希望如此。但人的命运各有不同……”

“难道您不满意自己的命运？”

“我？” 她问，仿佛非常惊讶居然有人向她提出这样的问题似的。“我不能不满意，所以也就满意了。但，我觉得心里有一条虫子正醒过来……”

“那就不应该让它再睡觉，而要相信它的呼声。” 聂赫留朵夫说，完全被她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了。

事后，聂赫留朵夫很多次羞惭地想到自己同她的全部谈话，想到她那些与其说是虚假不如说是有意逢迎他的话，想到她听他讲起监狱的惨状和他对乡村的印象的时候脸上流露的

既感动又关切的神情。

等到伯爵夫人回来，他们谈得已像两个老朋友那样投机，而且像是在一群不了解他们两个的人中，独独只有他们两个能够相互了解。

他们谈起当权者的种种不公正，谈起不幸的人们的种种苦难，谈起人民的贫困，然而在谈话间却眉来眼去，好像是在问：“你能爱我吗？”而对方会回答说：“我能。”相互的魅力由想象不到的迷人方式使他们两人相互吸引到一起了。

玛丽叶特临走时对他说，她永远都乐意为他效劳，并且要求他明天一定要到戏院去找她，哪怕他只去一分钟。因为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同他谈一谈。

“那好了，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您呢？”她叹了一口气，又说了这样一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套在那只戴满戒指的手上，“那么请您说您一定会来吧。”

聂赫留朵夫答应了她。

当天晚上，聂赫留朵夫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床上躺下，然后灭了蜡烛，但好长一段时间都睡不着。他想起了玛丝洛娃，想起了枢密院的裁决，想起他是怎样的决心跟她一起走，想起他放弃的土地所有权。忽然，仿佛是同这些想法作对似的，他眼前浮现出玛丽叶特的脸，想起她的叹息，想起她说“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您呢？”这句话时的眼神和她的迷人的笑容，这些形象是那么清晰，就像她就在他眼前一样。他不禁笑了起来。“我如果到西伯利亚去，这样做好不好呢？我要放弃自己财产，这样做又好不好呢？”他问自己。

在这个明亮的彼得堡的夜晚，月光从窗帘的隙缝里透进来，可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不明确的。他的头脑里乱糟糟一片。他想唤起以前的心境，继续思索以前那些事情，但是他已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了。

“假若这一切仅是我的胡思乱想，我无力那样生活，我对自己所做的事后悔了，那可怎么办？”他问自己，可又无力解答，不禁又产生一种很久没有感到过的苦闷绝望的心情。他无力分析和理清这些问题，睡得很不踏实，就带着与以前打牌输了一大笔钱后一样难受的心情进入了梦乡。

二十五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醒来，头一个感觉就是他昨天做了一件可鄙的事。

他开始回想。他没做过卑劣的事，也没有什么坏行为，但曾有过一些想法，坏的想法，也就是他现在的一些打算，比如同卡秋莎结婚，还有把土地交给农民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都是无法坚持的，都是脱离实际的，不自然的，他觉得应该像从前那样生活才对。

坏事确实没有做过，但有过比坏行为要坏得多的东西，那就是产生种种坏行为的种种思想。坏事可以不再做，可以忏悔，然而坏思想却常常产生坏行为。

一种坏行为只是为其他各种坏行为铺平道路而已，而坏思想却拖着人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一发不可收拾。

这天早晨，聂赫留朵夫暗自回味着昨天的那些想法，不禁非常惊讶：他怎么能够有那些想法呢，哪怕是只有一分钟？不管他准备要做的那些事是多么新奇和困难，他都知道眼下他

所能走的只能是这样的道路。不管回到从前的生活去是多么合乎习惯和轻松，他都知道那只是死路一条。现在依他看来，昨天的诱惑，仿佛是睡得过久的人们醒来以后常常发生的那种情形：虽然已经没有睡意，虽然自己也知道这时候应该起床，去做那等着他去做的工作了，可是还想赖在床上，再舒服一忽儿。

这天是他在彼得堡停留的最后一天。他一早就起来，到瓦西里耶夫岛去看望舒斯托娃。

舒斯托娃住在二楼。聂赫留朵夫照扫院子人的指点，从后门进去，顺着又陡又直的楼梯走上，踏进闷热的、食物味道很浓的厨房。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戴着眼镜，系着围裙，卷着袖子，正站在炉子旁边，在一口冒着热气的锅里搅拌着什么。

“您找什么人？”她从眼镜架的上边瞅着走进来的人，厉声问道。

没等聂赫留朵夫通姓报名，那女人脸上已现出惊喜交集的神情。

“啊，是公爵！”那女人用围裙擦干净手，叫起来。“您为什么走后楼梯呢？您是我们的恩人啊！我就是她的母亲。本来他们要把我们的姑娘彻底给毁掉的。我们的救星啊！”她说着，激动地抓住聂赫留朵夫的手，吻着。“我昨天去过您那儿一趟。是我妹妹特意要求我去的。她就住这儿。请您跟我来，这边走，这边走。”舒斯托娃的母亲边说着，边领着聂赫留朵夫穿过一道狭门，一条黑暗的小过道，一路上把掖起的衣襟放下，理理她的头发。“我的妹妹叫柯尔尼洛娃，您大概也听人讲起过吧。”她在门前站住，小声说了一句。“她被牵连到政治活动里去了。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

舒斯托娃的母亲推开走廊里的门，把聂赫留朵夫带进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摆着一张桌子，桌子后边一个小小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儿不高、体态丰满的姑娘。她穿着条子花的布上衣，淡黄色髻曲的头发，披在她那白皙的圆脸的四周，她长得很像她的母亲。她对面的圈椅里坐着一个身穿绣花领子的俄国式衬衫、长着黑唇髭和稀疏的胡子的青年男子，此刻他深深地弯下了腰。他们两个人显然谈得非常投机，一直到聂赫留朵夫走进房门，才回过头来看。

“丽朵琪娅，这位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就是他……”

面色苍白的姑娘赶紧跳起来，把一绺从耳朵后面披散下来的头发撩回去，睁着灰色的大眼睛，紧张地瞅着走进来的人。

“那么您就是薇拉·叶夫列莫夫娜托我营救的那个危险的女人了？”聂赫留朵夫说着，微笑地伸出手去与她握。

“没错，就是我，”丽朵琪娅说着，嫣然一笑，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她的笑容善良又具有孩子气。“我姨妈很想见见您。姨妈！”她对着另一扇房门叫一声，声音柔和悦耳。

“薇拉·叶夫列莫夫娜为您被捕而很难过。”聂赫留朵夫说。

“请在这儿坐，或者在这儿坐更舒服一些。”丽朵琪娅指着那个青年男子刚坐过的那把软和而破旧的圈椅说。“这是我的表哥扎哈罗夫。”她察觉聂赫留朵夫在打量那个青年男子，就说。

那青年男子也像丽朵琪娅一样和善地微笑着，与客人打招呼。等到聂赫留朵夫在位子上坐好，他就搬来窗口边的一把椅子，在旁边坐下。从另一扇门里又走进来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一头浅黄头发，一句话没说地坐到窗台上。

“薇拉是我姨妈的好朋友，但是我简直可以说不认识她。”丽朵琪娅说。

这时候从隔壁房间里走进一个女人，长着一张极讨人喜欢而且聪明的脸，身穿着白色短上衣，腰上束着皮带。

“您好，谢谢您特意跑到这儿来，真是非常感谢，”她挨着丽朵琪娅在长沙发上坐下，说，“哦，我们的薇拉怎么样了？您见过她了？她过得怎样？”

“她没有抱怨，”聂赫留朵夫说，“她说她自己觉得好得不能再好了。”

“哦，我的薇拉，我了解她的。”姨妈笑着，摇摇头说。“应当了解她，她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什么都为别人，从来不替自己打算。”

“是啊，她自己没有要求什么，只为您的外甥女操心。她说，她难过的主要原因是您的外甥女无缘无故被捕了。”

“就是这样啊，”姨妈说，“这事多么糟糕啊！真的，她是在替我受罪。”

“完全不是那样的，姨妈！”丽朵琪娅说。“即使您没托我，我也应该保管好那些文件的。”

“你得承认我比你了解得更多。”姨妈接着说。“您要知道，”她转过脸去对聂赫留朵夫接着说，“这都是因为有一个托我暂时保管一些文件，我自己没有住处，就把那些文件带到这儿来了。谁知当天晚上，这儿就遭到搜查，文件和她本人都被带走了。她一直被监禁到现在，人家逼问她是从谁手里拿到这些文件的。”

“我始终也没有说出来。”丽朵琪娅很快地说，神经质地撩一下她那绺并不碍事的头发。

“我没有讲你说出来了。”姨妈反驳说。

“他们逮捕了米京，那也绝不是我把他供出来的。”丽朵琪娅的脸涨得通红，心神不宁地往四下里看，说道。

“你别再提这件事了，丽朵琪娅，”母亲说。

“为什么不提？我偏要讲嘛。”丽朵琪娅说，她已经收敛笑容，但脸色依然通红。她不再撩那绺头发，却把她的一绺头发缠在手指头上，不停地朝四下里张望。

“要知道，你昨天一谈起这件事就出了什么样的岔子。”

“根本就没出什么岔子……您别管我，妈。我没有说，我始终一言不发。他两次审问我，问起我的姨妈，问起米京，我什么也没回答。我告诉他我什么话也不会回答。于是那个……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暗探，宪兵，大坏蛋。”姨妈插嘴向聂赫留朵夫解释道。

“于是他，”丽朵琪娅神情激动地快速说，“就开始劝我。‘凡是您对我讲出来的话，’他说，‘都不会对谁有害处，而且恰恰相反……如果您说出来，倒会使得那些无辜的、也许被我们冤枉折磨的人获得自由。’哼，我依然坚持不讲。于是他说：‘嗯，好吧，那您就什么也别讲。不过我说的话您也别否认。’他就列举出人名来，提到米京。”

“啊，你不要说了。”姨妈说。

“唉，姨妈，您别打岔……”她激动地不断地拉扯她那一绺头发，老是往四下里看。“到了第二天，您猜怎么着，突然有人敲着墙告诉我说，米京

被捕了。啊，我想是我把他给出卖了。我难受极了，难受得几乎都快发疯了。”

“但其实他被捕同你根本没有关系，”姨妈说。

“但我当时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是我出卖了他。我由这边墙跟前走到那边墙跟前，走过来，走过去，脑子里止不住地想着，总以为是我把他出卖了。我躺下睡觉，盖上被子，就

听见有什么人在我耳边说：‘你出卖了米京，你出卖了米京，是你把米京出卖的。’我明白 这是幻觉，但又无法不想。我想睡着，但睡不着；我不能不想。哦，我觉得真是可怕！”丽朵琪娅越来越激动，把一绺头发缠在自己手指上，再松开，不住地往四下里看。

“丽朵琪娅，你冷静一下吧！”母亲说着碰一下她的肩膀。

可是丽朵琪娅已克制不住自己了。

“这种事可怕是因为……”她又开口跳起来，但没等说完她哇地哭了，她从沙发上跳起来，衣服不小心被圈椅钩了一下，便冲出房间。母亲跟着跑了出去。

“应该把那些混蛋统统绞死才对！”坐在窗台上的中学生说。

“你说什么？”母亲回头问。

“我没说什么……我随便说说的。”中学生回答道，抓起桌子上放着的一支纸烟，点上火，吸起来。

二十六

“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单身牢房是可怕的。”姨母说着，摇摇头，也点上一支纸烟。

“在我看来，对一切人来说都是如此。”聂赫留朵夫说。

“不对的，不是对谁都如此。”姨妈回答。“听人说，对真正的革命者而言，这却是一种休息，一种静养。地下工作者的生活总是动荡不定，缺衣少食的，并且总是为自己、为别人和为事业提心吊胆，但一旦被捕，反而没事了，一切责任都解除，你可以坐下来休息。我听人家说，他们被捕时甚至高兴呢。可是，对那些没有罪的年轻人——像丽朵琪娅那样，总是首先被捕，——对这些人来说，最初的打击真的很沉重。这并不是因为被剥夺了自由，受到粗暴的待遇，伙食非常差，空气非常坏，总之，这种种困苦都无所谓。困苦即使再加两倍，也是可以忍受的，但难以忍受的是第一次被捕时所感到的精神上的打击。”

“您也经历过这种打击吗？”

“我？我坐过两次牢。”姨母含笑说道，她的笑容凄苦而动人。“我头一次平白无故地被捕的时候，”她接着说，“仅二十二岁，有一个孩子，而且又怀着孕。尽管当时失去自由，被迫同孩子和丈夫分离，在我是很痛苦的，然而比起我精神上遭受蹂躏的那种感觉，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了。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人，而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东西。我想跟我的女儿告别，可是人家却逼我出去，坐到雇来的马车上。我问他们要将我带到哪儿去，他们回答说你到了自会明白。我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他们毫不理睬。当受过审问以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给我穿上编有号码的囚衣，把我押到一个拱门，打开一扇牢门，把我推了进去，锁上门就走了，只留下一个扛着枪的哨兵，默默无语地走来走去，偶尔透过我房门上的一条缝往里看，那时候，我简直痛苦不堪。我记得当时有一件事最让我震惊，一个宪兵军官审问我的时候，递给我一支烟，要我吸。由此可见他知道人是喜欢吸烟的，由此可见他也知道人是喜欢自由和光明的，知道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可他们又怎么会残酷地把我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散，把我当做一头野兽锁起来呢？一个人遭到这样不公正的对待就不可能不产生恶果。即使一个再相信上帝的人，相信人们相亲相爱的人，他经历过这样的事，他以后也不会再相信所谓的上帝和人们的善良了。我就是从那时候起不再相信人，心肠变硬了的。”她结束她的话，微微一笑。

丽朵琪娅的母亲从丽朵琪娅跑出去的那个门口走进来，说丽朵琪娅心情非常糟，不再进来了。

“唉，为什么要毁掉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姨妈说。“我非常难过的是，我竟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求上帝保佑，她呼吸一下乡下的空气就会复元的，”母亲说，“我们应该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了。”

“是啊，要不是您的话，她就完全被毁了。”姨妈说。“非常感谢您。我要跟您见面，是因为有一封信想托您帮我转交给薇拉。”她说，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信没封口，您可以看一下，然后把它撕毁，或者把它转交也成，总之，您觉得怎么做好就怎么办吧，”她又说，“信里并没有会损害别人的名誉的话。”

聂赫留朵夫接过信，答应把它转交给薇拉，然后站起来告辞，走到外面街上。

他没有看信的内容，把口封好，决定把信转交给薇拉。

二十七

聂赫留朵夫要逗留在彼得堡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那些教派信徒案子。他想通过军队里的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罗夫替他们把状子呈交给皇上。

上午，他坐车去拜访

鲍加狄罗夫，正好碰上他还在家吃早饭，可是即将出门。鲍加狄罗夫身材不高、筋肉壮实，天生就力大无穷，能够空手把马蹄铁扭弯。可是他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至有自由主义思想。尽管他具备这些优秀的品质，他却是一个同宫廷关系密切的人，热爱沙皇和皇族。生活在这个最上层的社会里，有一种惊人的本领，那就是只看到这个社会里好的一面，而且他自己绝不参与任何坏事和不正派的事。他从不指责任何人，也从不指责任何措施。他要么沉默不语，要么用大胆响亮的、仿佛叫嚷一般的嗓音说出他所要说的话，而且在说话时常伴着响亮的笑声。他这样做倒不是耍什么手段，而是出自天性。

“啊，好极了，你来了。你要不要吃点早饭？要不，你就稍坐一会儿。”

这煎牛排真不错。我吃了一顿饭向来是开头和收尾都要吃点扎实的东西。哈，哈，哈！好，你喝点酒吧。”他指着红葡萄酒，大声嚷道。“我一直都想着你呢，你还是先到托波罗夫那儿去一下比较好。”

一听见提到托波罗夫，聂赫留朵夫就不禁皱眉头。

“这件事全得由托波罗夫作主。无论怎样总是要去问他。说不准他当场就可以满足你提出的要求的。”

“既然你这么劝我，我就去一趟吧。”

“这太好了。嗯，彼得堡给你的印象如何？”鲍加狄罗夫大声问，“你说说看，啊？”

“我觉得自己好像受了催眠似的，”聂赫留朵夫说。

“受了催眠？”鲍加狄罗夫重复了一遍，响亮地大笑起来。“你不想吃，随你便好了。”他用餐巾擦了擦唇髭。“那么，你去找他？啊？如果他不答应，你就把状子交给我，我明天递上去就是。”他一边嚷着，一边从桌旁站起，在胸前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他做这件事分明就像擦嘴那么漫不经心。他开始佩上军刀。“现在，我得走了，再见。”

“我们一块儿走吧。”聂赫留朵夫说着，高兴地握了握鲍加狄罗夫有力的大手，然后跟以往一样，带着一种由健康的、朴实的、生气勃勃的东西所留给他的愉快印象，在鲍加狄罗夫家的门廊上跟他分手了。

虽然聂赫留朵夫预料到去一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他还是依照鲍加狄罗夫的劝告坐车去了托波罗夫那儿，去了那个能够左右教派信徒案子的人那儿。

托波罗夫的职务，从它的职责而言，本身就含有一种矛盾，只有头脑愚钝和失去道德(托波罗夫正好具有这两种缺点)的人才会看不出来。它的矛盾就在于那种职责是不择手段——包括运用暴力——护卫教会，而按教义而言，教会是由上帝建立起来的，绝不是被地狱之门或什么人力所能动摇。但就是这个由上帝创建且绝不能被任何力量动摇的神的机构，却要由托波罗夫以及像他一类的人所主管的人的机构来护卫。托波罗夫看不到这种矛盾，或许是不想看到，因而他百倍警惕，只恐会有什么天主教教士、耶稣教牧师或者别的教派信徒来破坏连地狱之门都不能征服的教会。托波罗夫就像一切缺乏基本的宗教感情和平等博爱的思想的人一样，相信老百姓是跟自己截然不同的生物，即使有一种东西老百姓一定得有，而他也没有也无关紧要。他在灵魂深处没有信仰，而且觉得只有这样精神上才会无拘无束，很愉快，但害怕老百姓也会百无禁忌，因此按他的说法，把老百姓从这种精神状态里解救出来就是他的神圣职责。

正如一本烹调书上所说的龙虾喜欢活活地被煮死，他也充分相信老百姓喜欢成为迷信的人，所不同的是，都烹调书用的是转义，而他的话是直意。

他对待自己所维护的宗教，犹如养鸡的人对待他拿来喂鸡的腐肉。腐肉很让人嫌恶，然而鸡喜欢吃它，因此就应当用腐肉来喂鸡。

不消说，所有那些伊维利亚圣母像啦，喀山圣母像啦，斯摩棱斯克圣母像啦，都是极其粗鄙的偶像崇拜，然而老百姓喜欢它们，信仰它们，因此就应当维护这种迷信。托波罗夫就是这么考虑的，然而他没有想到老百姓为什么喜欢迷信，也正是因为从古到今都有像他托波罗夫这样残酷的人。这些人自己虽然获得了知识有了光明，却没有把这种知识运用到应该运用的地方，帮助老百姓摆脱愚昧，逃离黑暗，反而使老百姓更加愚昧。

当聂赫留朵夫走进托波罗夫接待室的时候，托波罗夫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同女修道院院长谈话。那女院长是一个活跃的贵妇，在俄国西部那些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信徒们中间传布东正教和维护它的势力。

一位在接待室的值班官员问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要办。聂赫留朵夫说他准备替教派信徒向皇上呈送一份状子。值班官员问能否让他先看一下。聂赫留朵夫把状子递给官员，他接了状子就走进办公室。女修道院长走了出来，头戴修道帽，脸上戴一块面纱，飘动着，身后拖着黑色的长裙。她手拿一串茶晶念珠，两只雪白的手合抱在胸前，手指甲剔得很干净，朝出口走去。可是聂赫留朵夫却没被请到办公室里去。托波罗夫在办公室看状子，摇着头。他读着那叙述清楚而有力的状子，感到惊奇和不自在。

“万一皇帝看到这个状子，他可能会提出一些不愉快的问题，惹出一些麻烦。”他读完状子，心里暗想。他于是把状子放在桌上，拉了拉铃，吩咐请聂赫留朵夫进来。

他记起了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他以前就收到过他们的状子。案情是这样的：那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先是受到告诫，后来被交到法院去受审，可是法院判决无罪将他们释放。于是主教就和省长一起，以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为理由，将那些丈夫、妻子、儿女强行拆散，流放到不同的地点去。那些父亲和妻子就要求不要拆散他们。托波罗夫记起这个案子当初落到他手里的情形。他那时倒也踌躇了片刻，不知道是否应该阻止这种事。但是他很清楚，

如果批准 原来的命令，把那些农民的家庭成员分配到不同的地点去，那不会产生丝毫害处，如果把他们留在当地，却极可能影响其他居民，促使他们也脱离东正教。再者，主教对这件事特别关切和热心。所以他就听凭这个案子以原来的方式发展了。

可是现在，这个案子突然有了一个像聂赫留朵夫这样的辩护人，并且这个人在彼得堡有着广阔的人事关系，那么这个案子就极可能当做一件残暴的事呈交皇帝，或者在国外的报纸上刊登出来，因此他迅速做出一个让人惊奇又意外的决定。

“您好，”他装出很忙碌的样子，边说边站起来迎接聂赫留朵夫，然后就马上谈起这个案子来。

“我知道这个案子。我一看到那些姓名，就马上想到这个不幸的案子。”他边说，边拿起状子向聂赫留朵夫晃了一下。“您提醒了我这件事，我很感激您。这件事省当局做得太过分了……”聂赫留朵夫没说什么，嫌恶地看着这张苍白而毫无表情、像假面具的脸。“我马上命令撤销决定，把这些人送回原籍。”

“那么，我就不必把这状子呈送上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完全不必。这事我已经答应您了。”他说时把“我”字说得很重，显然完全相信他的诚实，他的话是最好的保证。“我最好立刻就写个命令。麻烦您再稍坐一会。”

他走到桌旁，坐下写起来。聂赫留朵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看着那个狭长的秃顶，看着他那只急速挥动钢笔的有青筋的手，心里暗自惊奇，不明白他这样一个对一切不关心的人现在为什么肯做这件事，还做得如此卖力。这是为什么？……

“啊，写好了，”托波罗夫封上信口，说，“您拿去告诉您的那些当事人吧。”他补充说，撇一下嘴唇，做出微微笑的样子。

“可是，这些人是因为什么才受罪的呀？”聂赫留朵夫接过信封，问道。

托波罗夫抬起头，淡淡一笑，好像觉得聂赫留朵夫的话很有意思。

“这我无法跟您说。我能说的是，我们所捍卫的人民利益极为重要，因而对宗教问题非常热心，但决不会比现在普遍存在的对这种问题漠不关心有害而可怕。”

“但如何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的要求，弄得人们妻离子散呢？……”

托波罗夫仍然照那么宽厚地微笑着，显然认为聂赫留朵夫所说的话很可笑。托波罗夫坚信自己看问题是立足于广阔的国家立场的高度上的，因此不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他一率觉得可笑又偏颇。

“从私人的立场看来，事情也许是这样，”他说，“但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事情就有所不同了。哦，请原谅，我要说再见了。”托波罗夫说着，低下头，伸出他的一只手。

聂赫留朵夫握了一下那只手，然后，一声不吭地匆匆地走了出去，很懊悔与他握手了。

“人民的利益，”他模仿着托波罗夫的腔调说，“事实上完全是你的利益，纯粹是你的利益。”他走出托波罗夫的房子，心里想道。

聂赫留朵夫暗自回想了一下这些申张正义、维护宗教信仰、教育人民的机关到底对哪些“罪犯”施加了惩罚。他想起因贩卖私酒而受到惩罚的农妇、因偷盗而受到惩罚的少年、因流浪而受到惩罚的流浪汉、因纵火而受到惩罚的纵火犯，因侵吞公款而受到惩罚的银行家。他还想起可怜的丽朵琪娅，仅仅因为可以从她那里搞到必要的情报而被处以惩罚，此外还有违反东正教而受到惩罚的教派信徒们、要求国家有宪法而受到惩罚的古尔凯维奇。聂赫留朵夫想来想去，不由得明确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所有这些人被捕，被监禁起来，或者被流放出去，根本不是因为违反了正义，或者有不正当的行为，仅仅是因为他们

妨害那些官僚 和富人强占他们搜刮来的民膏民脂罢了。

有碍他们进行剥削的事包括贩卖私酒的农家妇人，在城里游荡的小偷，收藏传单的丽朵琪娅，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们和要求制订宪法的古尔凯维奇。因而聂赫留朵夫觉得很清楚，所有的官僚，上至他的姨父、枢密官和托波罗夫，下至政府各部里坐在办公桌旁官微职小却衣冠楚楚的先生们，他们对于无辜的人的遭遇，完全不关心，全心关心的只是消除一切危险的人。

因而不但没有人遵守情愿宽恕十个有罪的人也决不会冤屈一个无辜的人那种原则，而正好与此相反，宁可利用消除十个没有危险的人的方法，为了挖掉一个真正危险人物，犹如为了挖掉烂掉的皮肉，往往不惜连带把好的皮肉也一块挖掉。

这种对现今的一切事情的解释，聂赫留朵夫认为真是非常简单清楚不过的了，可是就因为非常简单清楚，聂赫留朵夫反倒有点犹疑，不敢接受这种的解释。这种复杂的现象总不可以用这种简单和可怕的理由进行解释吧。一切关于正义、善、法律、信仰、上帝等等的話，总不可以仅仅是空话，只利用来掩盖最粗暴的贪欲和恶行而已吧。

二十八

聂赫留朵夫原来打算那天傍晚动身离开彼得堡，可是他已经答应过玛丽叶特去戏院里看她。虽然他清楚知道不应该到戏院去，但他仍旧违背自己理性，认为履行诺言才对，于是就去了。

“我能抵抗这种诱惑吗？”他的心情十分矛盾。“姑且试最后一次吧。”

他换上礼服，来到剧院。这时候，《*Dame aux camélias*》正演到第二幕，那个从国外来的女演员正在再一次地用新的方式表演害肺结核病的女人如何慢慢地死去。

剧院里满座。聂赫留朵夫向人问到玛丽叶特的包厢在什么地方，马上就有人非常恭敬地指给他看。过道里的一个穿号衣的听差，就像见到熟人一样向聂赫留朵夫一鞠躬，为他推开那包厢门。

对面的几个包厢里坐着一排排的人和站在后面的人，那些坐在包厢墙边座位上的人，正厅里的头发苍苍、头发花白、头发全秃、头顶半秃、涂过发蜡、头发鬈曲的观众，总之，无一不全神贯注地观看那个女演员身裹绸缎和花边、瘦得皮包骨头的在扭捏作态地念着独白。包厢门被推开时，什么人嘘了一声，同时还有两股气流，一冷一热地向聂赫留朵夫脸上吹来。

包厢里坐着玛丽叶特和另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那个女人身披红披肩，头盘又大又重的发式。另外还有两个男人，一个就是玛丽叶特的丈夫，他是一个将军，仪表堂堂，高大魁伟，脸色严峻又高深莫测，长着钩鼻子。他雄赳赳地挺起用棉花和土布做成的胸衬垫高的胸脯。另一个男人头发淡黄，头顶光秃，庄严的络腮胡子中间露出一小块剃得溜光的下巴。玛丽叶特显得娇媚、苗条、雅致，她礼服的领口开得很低，袒露出两个从脖子那儿斜溜下去的饱满结实的肩膀，以及在脖子和肩膀相连的地方的一颗黑痣。聂赫留朵夫一走进包厢，她就立即回过头来，拿扇子对他指了指她身后的一把椅子，并微微一笑，表示欢迎和感激，而且在他看来这笑容似乎还别有一番深意。她的丈夫平静地看聂赫留朵夫一眼，点了一下头。他的姿态，他同妻子交换的眼神，任谁都可能一眼看出他就是那个漂亮妩媚的女人的主人和占有者。

等到女演员念完独白，剧场里就响起雷般的掌声。玛丽叶特从座位上站起，提着 作 响 的绸裙裾，向包厢后边走来，把聂赫留朵夫介绍给自己的丈夫。将军眼睛里不住露出笑意， 说着“幸会，幸会！”就平静而又高深莫测地不再说话了。

“我原打算今天就走的，但我答应您要来的。”聂赫留朵夫扭过身子说道。

“您如果不想来看我，就来看这个出色的女演员吧。”玛丽叶特针对他那句话中的意思说。“刚才她在最后一幕中演得太好了，是吗？”她转脸对丈夫说。

丈夫点了一下头。

“这打动不了我的，”聂赫留朵夫说，“因为今天已经我看过了那么多真正不幸的事情……”

“那请您坐下来，讲吧。”

她的丈夫听着，眼睛里露出的讥笑越来越浓了。

“我去探望过那个坐牢很久、刚刚被放出来的女人。她已经彻底垮掉了。”

“那个就是我曾向你提起过的那个不幸女人。”玛丽叶特向丈夫说道。

“是的，她能够得到自由，我非常的高兴。”他点点头，平静地说，他的小胡子底下现出聂赫留朵夫觉得明显是讥笑的笑容。“我要出去吸吸烟。”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等着玛丽叶特对他讲她说过要对他讲的某些话。可是她什么话也没对他讲，甚至连想讲的意思也没有，她只是开开玩笑，谈谈戏剧，她认为这个剧一定会特别打动聂赫留朵夫的心。

聂赫留朵夫看出她其实并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讲，只不过是想让他瞧瞧自己穿着晚礼服，露出 肩膀和黑痣的艳丽模样罢了。这使他既愉快又厌恶。

她以前遮盖了一切的那艳丽外表，此刻对聂赫留朵夫来说，虽然还不能说已经被揭开，但他 毕竟可以看到那里面隐藏着的东西了。他瞅着玛丽叶特，欣赏她的娇美，然而他明白她是个 善于装假的女人，知道她同她那丈夫生活在一起，完全无动于衷于他可以为博得高官厚禄 利用成百上千人的眼泪和生命，知道她昨天所说的都是一片谎言，知道她一心要使他爱上她，至于想让他爱上她的原因，他就不得而知了，何况她本人也并不知道。这种情形又对他产 生吸引力，又惹他讨厌。他好几次拿起帽子打算走掉，可又莫名地留了下来。最后，她丈夫 回到包厢里来了，浓密的唇髭散出烟草的气味，他用居高临下的轻蔑眼光看聂赫留朵夫一 眼，仿佛不认得他似的。聂赫留朵夫没有等到包厢的门关上就走出去，来到走廊上，找到他 的大衣，走出了剧院。

聂赫留朵夫沿着涅瓦大街走回家，注意到有一个女人静静地走在前面宽阔的人行道上。她个 儿非常高，身材很好看，装束妖艳。由她的脸上和整个身态上都可以看出，她明白自己有一种令人着迷的性感。所有迎面走过来的人或是从后面赶过她的人，都要看她一眼。他走得 比她快，同样不由自主地朝她的脸上看了一眼。她的脸涂过脂粉，非常美丽。她眼睛闪烁着，朝聂赫留朵夫灿烂地一笑。真是奇怪，聂赫留朵夫立刻又想起了玛丽叶特，因为他又有了 在剧场里产生的既迷恋又讨厌的那种感觉。聂赫留朵夫急促地赶到她的前面，不禁生自己的 气。他转弯拐进海军街，接着又走到滨河街，在那里走来走去，引得警察注意起他来。

“方才我走进剧场包厢时，那个女人也是这种灿烂一笑。”他心想，“无论那个女人的微笑 和这个女人的微笑的含意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这个女人直接地表示：‘如果你需要我，我就由你摆布。你要是不需要我，那就自管走你的路。’那个女人假装完全没有这样想而 生

活在高雅的感情中，然而骨子里是一样的。这个女人还算老实些，那个女人只是一直装假。更何况这个女人仅因为穷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而那个女人却只是放纵这种既可爱又可恶和可怕的情欲去取乐。这个街头上的女郎好比一杯肮脏的臭水，专提供给那些口渴得顾不上恶心也会喝的人；剧院里那个女人却如一剂毒药，只要接触她，就会毫无知觉地被毒死。”聂赫留朵夫想到他同首席贵族妻子的关系，那些可耻的往事就一下子全涌上脑海。“人的兽性非常可憎的，”他心想，“当它赤裸裸地显露时，如果从精神角度观察它，就可以看清它，蔑视它，因而不管你是否上钩，本质上是不会被影响的。但是，当这种兽性有一层很有诗意的漂亮外衣，使你迷得神魂颠倒，然后就会对它敬若神明，摔进它的陷阱里，分不清东南西北。这真是可怕呢。”

这一点聂赫留朵夫现在完全看清楚了，正如他清楚地看见他眼前的皇宫、哨兵、要塞、河流、木船、交易所一样。

今晚似乎没有使人安静、催人入眠的黑夜，却有一种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朦胧的、隐约的、不自然的亮光一样，聂赫留朵夫的灵魂里也不再有了愚昧的黑夜来催他入睡了。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清楚明白：凡是人们认为重要和美好的事物，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卑鄙龌龊的。

然而一切光辉夺目、富丽堂皇的外衣，总是掩盖着常见的各种罪行。那些罪行非但不受惩罚，还风靡一时，人们费尽心机对它加以美化。

聂赫留朵夫非常想忘掉这些事，不过他不可能视而不见。然而他仍旧不知道为他照亮一切的光是从哪里来的，正如他不明白照亮彼得堡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即使这种光很朦胧，暗淡，古怪，他也能看见这种光为他照亮的东西。他心里既快乐又惶恐。

二十九

聂赫留朵夫回到莫斯科的头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里去，把枢密院维持法庭的原判这个不幸的消息通知玛丝洛娃，并告诉她现在要作好准备动身去西伯利亚。

那份由律师起草、现在带到牢里由玛丝洛娃签字呈送皇上的状子，让他觉得所抱的希望不大。说也怪，他如今并不希望这事会成功。他为去西伯利亚做好准备，生活在流放犯、苦役犯当中。因而，如果玛丝洛娃被无罪释放，他真是非常难以想象他将如何安排自己和玛丝洛娃的生活。他想到美国作家梭罗的话。在美国还有奴隶制的时候梭罗说过，在一个使奴隶制合法化和能得到庇护的国家里，正直的公民的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监狱。聂赫留朵夫同样有这种想法，尤其是他到彼得堡访问了种种人，见到过种种情景以后。

“没错，在当代的俄国，正直的人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他想。他坐着马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围墙的时候，这种感受特别深刻。

医院的看门人认出聂赫留朵夫以后，马上告诉他说，玛丝洛娃已经不在他们这儿了。

“那她到哪儿去了？”

“又回监牢里去了。”

“可是为什么将她调走呢？”聂赫留朵夫问。

“她们原本就是那种人嘛，老爷，”看门人笑着说，鄙夷不屑地说，“她和这里的医士勾勾搭搭，主任医师把她打发走了。”

聂赫留朵夫实在没料到玛丝洛娃的精神状态竟和他这样的像。听到这个消息，他好像突然知道大难将至，愣住了。他觉得非常难受。他听到这消息，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羞愧。他起初觉得自己非常好笑，因为他居然得意扬扬地觉得她的精神方面有了变化。他心想，她不接受他的牺牲，以及他的责备和他的眼泪，这所有的都是她这堕落女人的诡计，想尽可能从他身上捞到多点好处而已。他现在感到，上回探监时由她身上觉得她这人不可救药，现在更显得非常清楚。他随手戴上他的帽子，走出了医院，头脑中就掠过这种想法。

“现在怎么办呢？”他自问道。“我还要将自己与她连在一起吗？如今既然她有了这种行为，我不是可以自由地离开她不管了吗？”

不过他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就顿时明白过来：他认为自己已经可以自由地抛弃她，那么受到惩罚的并不是他想惩罚的玛丝洛娃，却是他自己。他心惊胆战起来。

“不！她做的这件事，不能够动摇我的决心，只能够更坚定我的决心。她顺应自己的精神状态乐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她愿跟医士胡弄就随她去跟医士胡弄吧，那是她的事……我却 是本着我的良心去做我应该做的事。”他对自己说。“我的良心要求我牺牲我的自由来赎我的罪。我已经拿定主意要跟她结婚，即使只是形式上的结合也罢了，而且我已经下定决心跟她走，无论她流放到哪儿去，那么现在我的决心就绝不更改。”他带着誓不罢休的执拗心情 自言自语，走出医院，果断地向监狱大门走去。

他来到监狱大门跟前，要求值班看守去向狱长报告，说他希望同玛丝洛娃见面。值班看守认出聂赫留朵夫，就好像见了老朋友一样，告诉他一件监狱里的特大新闻，说原先的上尉已经被免职，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了他的职位。

“如今办事比以前严格，非常地严格，”那看守说，“他在这儿，我马上去通报一声。”

典狱长真的在监狱里，不大一会儿就出来见聂赫留朵夫。这位新典狱长得有高有瘦颧骨突出，沉着脸动作非常缓慢。

“只在规定的时日才能在探监室里和犯人见面。”他眼睛没看聂赫留朵夫，说道。

“我想让她在呈送皇上的状子上签字。”

“交给我吧。”

“我想见一见她。从前一直准许我来探望她的。”

“那是从前的事了。”典狱长急促地瞧了聂赫留朵夫一下，说。

“但我有省长签的许可证。”聂赫留朵夫坚持说，还掏出皮夹子来。

“给我看一看。”典狱长说，还是没有看他的眼睛，瘦长白净的手的食指上戴着金戒指，伸过去接过聂赫留朵夫递来的文件，慢悠悠地看了一遍。“请您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他说。

这回办公室里别的人。典狱长在办公桌后面坐下，翻看着桌上的文件，很明显想在他们会面时待在这里。聂赫留朵夫问他能否和鲍加狄罗夫斯卡娅见面，典狱长很直接地回答说不 能。

“政治犯不许探望。”他说，又埋下头去看公文。

聂赫留朵夫衣袋里原本装着那封准备交给鲍加狄罗夫斯卡娅的信，此刻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 正企图犯法的人，谁知预谋被揭穿，遭到了挫败。

等到玛丝洛娃走进办公室，狱长就抬起头来，但眼睛既不看玛丝洛娃，也不看聂赫留朵

夫，只说了一句：

“可以谈话了！”说罢，又继续专心地读他的公文。

玛丝洛娃又回到了从前那样的装束：白上衣、白裙子、白头巾。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一看见他那冷冰冰的、气呼呼的脸色，满脸就涨得通红，手指不住地揉捏上衣的底边，低下双眼。依聂赫留朵夫看来，她的窘态正好证实了医院看门人的话。

聂赫留朵夫有心像上次那样对待她，然而他已不能向他所期望的那样主动伸出手去同她握手，现在她在他眼里极其可恶。

“我给您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他声调平稳地说，眼睛没有看她，也没有朝她伸出手去，“枢密院驳回上诉了。”

“我早料到会这样。”她说，声调奇怪，仿佛在喘气似的。

如果在从前，聂赫留朵夫会要问她如何会想到的，不过此刻他只是看了她一下。她的眼眶泪水盈盈。

可是这不但没有让他心软，反倒让他觉得更为恼火。

典狱长从座位上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虽然聂赫留朵夫现在对她非常反感，他仍旧觉得要对这事为她遗憾。

“请您不要失望，”他说道，“向皇上递交的状子可能会有结果。我想……”

“我没有再想这事……”她眼睛泪汪汪的，凄苦地斜瞧着他，说。

“那么您是想些什么事呢？”

“您已经到医院看过了，他们也许对您讲过我了……”

“啊，那是您自己的事。”聂赫留朵夫眉头紧皱，冷淡地说。

他的自尊心因被触犯而有的强烈的反感原本已经平息了，现在她一说到医院，那种反感就更浓了。“他这种有财势的人，随便哪个上流社会的姑娘都会认为嫁给他就意味着幸福，而他却愿意做这种女人的丈夫，但她却又等不及似地去调逗一个医生。”他生气地看着她，心想。

“哪，请您就在这份状子上签字。”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大的信封，把里面的状子放在桌上。她用自己头巾角擦干眼泪，坐在桌旁，问该写在什么地方，写什么。

他告诉她应该写什么，应该写在哪儿。她就在桌子旁边坐好，用左手理了理右臂的袖子。他站在她的身旁，居高临下地，默默地瞧着她向那张桌子俯身下去，因为得强忍住呜咽，时不时颤动一下的后背。在他的灵魂里，两种感情正在交战，恶与善的感情，受了侮辱的自尊心与对这个不幸的女人的怜悯心，正在作着激烈的斗争。结果，后者战胜了。

他记不得首先产生的究竟是哪一种感情：是先从内心怜悯她呢，还是先想起了自己、想起了自己的罪恶、自己的可耻行径，而现在他竟然为她做了同样的事而责备她。总之，他忽然感到自己有罪，同时也就怜悯她了。

她在状子上签了字，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头在裙子上擦干净，然后站起来，看他一眼。

“不管结局怎样，也不管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的决定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的。”聂赫留朵夫说。

他一想到自己原谅了她，他对她的怜悯和疼爱就越发强烈起来，他一心想安慰她。

“我以前怎样说的，我就要怎样做。不论人家把您发配到哪儿，我都跟您一起去。”

“用不着这样。”她急忙打断他的话，整个脸色豁然开朗。

“您想一想您在路上需要些什么东西。”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东西了。谢谢您。”

狱长走到他们跟前来。聂赫留朵夫不等他开口，就向她告辞，走了出去，他心里产生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宁静且欢乐的心情、一种心平气和以及热爱所有人的心情。聂赫留朵夫感到不管玛丝洛娃做出何种行为，他对她的爱情都不会改变，这一发现使得聂赫留朵夫万分喜悦，他的精神上升到了他从未经历过的高度上去了。由她去与那个医士胡弄吧，那是她的事。他爱她并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然而，聂赫留朵夫信以为真的关于玛丝洛娃和医士调情，并被逐出医院的事实际上却是：玛丝洛娃有一回被派遣，到走廊尽头的药房里去取些草药，在那儿遇到那个脸上长满粉刺的高个子医士乌斯基诺夫。他一直和她纠缠不休，她非常讨厌他。这一回玛丝洛娃想摆脱他，用力推了他一下，他碰到药架上，上面两个药瓶就从架上掉了下来，碎了。

当时，主任医师正好经过走廊，听到瓶子碎的声音，看到玛丝洛娃面红耳赤从里面跑出来，于是生气对她喊道：

“嗨，小娘们，你如果是在里面跟人家调情，我就要把你送走。这成何体统？”他扭过身去，严厉地从眼镜架上瞧着医士，说道。

医士陪着笑脸，说些为自己开脱的话。医师没有听完他的话，扬起头，透过眼镜瞅着他，然后到病房去了。当天他要求典狱长另派一个比较老实的女助手来接替玛丝洛娃。所谓玛丝洛娃跟医士调情，其实就仅这么一回事罢了。玛丝洛娃在同男人调情的罪名下被赶出医院，她对此感到特别痛苦，因为她早已厌恶跟男人发生关系，自从她与聂赫留朵夫重逢以后，她就认为那种关系尤其可憎。所有的男人，包括满脸紫疱的医士在内，却依据她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状况来判断，认为他们有权利侮辱她，而且现在看到遭她拒绝，不禁觉得诧异，她对此不由得感到万分委屈，从心底里可怜起自己，伤心得落下泪来。刚才她来见聂赫留朵夫，估计他一定听说了她的罪名，就准备为自己辩白一下，说明这个罪名是冤枉的。但是当她刚准备开口辩白，却感到他不会相信自己的话，辩白只是徒然，倒更证实他的怀疑，于是泪水哽咽在喉，她说不下去了。

玛丝洛娃还是认为而且竭力使自己相信，正如第二回见面时她向他所说的那样，她不原谅他，而且她恨他。但实际上她早已再次爱上他了，并且爱得非常深，只要他让她做的，她就不知不觉地去做。她不抽酒，不喝酒了，不再风骚，而且到医院里当杂务工。她做这些，就因为他想她这样做。每次他提到要同她结婚，她就断然拒绝，拒绝接受这样的牺牲。这当然是由于她有一回高傲地向他说过这样的话，不想再改口，不过主要却是因为她知道，和她结婚，他就会遭到不幸。她决心拒绝接受他的牺牲，不过一想到他看不起她，觉得她仍旧是原来那样的人，而不看她精神上的变化，她就觉得非常委屈。他如今也许觉得她在医院里做了丑事。这样一想比她听到最后被判服苦役的决定还要让她伤心。

三十

玛丝洛娃也许随第一批犯人遣送，因而聂赫留朵夫主动做着出发的准备事项。

然而要做的事情有那么多，他觉得无论有多少空暇时间，也绝对做不完。现在的情形，同以前截然不同了。以前他得考虑应该要做什么，而且他做事情的目的，只是为了一个人，为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不过那时虽他生活的全部目的只是为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一个人，可是所有那些事情都枯燥乏味。现在一切事情都关联到别人，而不只是关联到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所有这些事情倒都变得有趣味，吸引人了，而且

这类事情多得数不清。

再者，以前专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办事，他心里却老是烦恼和气愤。现在为外人做事，他的心里倒欢畅愉快。

聂赫留朵夫如今要做的事有三类。他凭他的古板习惯把事情作了分类，并且照此把有关文件分类放在三个不同文件夹里。

第一类是关于玛丝洛娃和对她的帮助。这类事主要是为告御状奔走，力争取得支持和为去西伯利亚做好全部准备。

第二类是处理他的地产。在达巴诺沃，土地已经交给农民，让他们交地租来做农民用的公益金。可为了让这件事有法律效应，要定下契约以及遗嘱，而且签上字。在庫兹明斯科耶，事情还是像他原本安排的那种，就是他接受地租，要规定交租日期，而且明确从这笔钱中提出一些作为生活费，剩下一些给农民当作福利。他仍旧不知道西伯利亚之行要花多少钱，因而这笔收入他仍旧不敢全部不要，仅减去一半。

第三类事情是帮助犯人们，而且求他帮忙的犯人越来越多了。

最初，他接触那些求他帮忙的犯人们后，总是立即替他们四处奔走，极力减轻他们的苦难。可是后来，求他帮忙的犯人那么多，他感到无法帮助每一个人，就情不自禁地承担了第四类工作，最近这类工作比其他几类工作更激发他的兴趣。

第四类工作就是要解答这么一个问题：所谓刑事法庭这种奇怪的机关，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为什么存在？它从何而来？它不仅产生使他同关在其中的一部分人相识的监狱，而且还产生了从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起到库页岛止的各种监狱，而成千上万的人在那些地方受苦受难，正是由于受到这么一部莫名其妙的刑法的祸害。

聂赫留朵夫凭他同囚徒的一些私人关系，凭他同律师、监狱牧师以及典狱长的讲话，以及清楚被监禁人的遭遇，他把犯人，也就是所谓的犯人，分为五类人。

第一类是彻底无辜的，是被法庭错判的无辜的人。比如被诬告的纵火犯梅尼绍娃，又比如玛丝洛娃和别的人。这类人并不多，按神父的估计，大概是百分之七，不过他们的遭遇尤其让人同情。

第二类人是因为狂怒、嫉妒、酗酒等特殊情况而做了坏事才被判刑的。审判他们的那些人，如果处在一样情况下，大多数也会做出那样的坏事来。这类人，据聂赫留朵夫想，也许超过全部罪犯的一半。

第三种人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他们自以为极其平常、甚至很好的行动，然而那样的行动，依那些制定法律的、同他们不同的人的理解，就算是犯罪。属于这种人的有偷卖私酒的，有走私的，有在地主和公家的大树林里割草打柴的。属于这种人的，还有那些经常盗窃的山民和不信教的、打劫教堂的人。

第四种人被列为罪犯，仅仅因为他们在道德方面高于一般社会水平。属于这种人的有各教派的信徒们，有为争取独立而造反的波兰人和契尔克斯人。有由于反抗政府当局而被定罪的政 治犯、社会主义者和罢工者。这一类人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一类人，据聂赫留朵夫观察，所占的百分比很大。

最后，第五类是社会对他们所做的坏事要比他们对社会所做的坏事错得多的人。他们因

为被 社会抛弃，常常受到压迫、诱惑，因而头脑迟钝，好像那个偷过旧地毯的小伙子和聂赫留朵夫曾在监狱内外所看到的好几百名罪犯一样。他们常受到生活上的压力，因而做出一些所谓 犯罪的事情来。聂赫留朵夫觉察到，有好些盗贼和凶手就是这一类。最近他同那些一部分 人接触过。至于一些道德败坏、堕落的，通过进一步了解，他觉得也可归到这一类。不过犯罪学新派却认为他们是“犯罪型”，觉得社会上有这种人，就是刑法和惩罚中不可缺少的主要证据。聂赫留朵夫觉得，社会对这些人所做的坏事，其实比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还多。但是，社会并没对他们本人直接犯罪，却是先对他们的父母和祖先犯了罪。

这些人当中，在这方面特别吸引他的注意的是惯窃犯奥霍京。他是妓女的私生子，从小在 夜店里长大，显然一直活到三十岁都没见过一个道德比警察更高尚的人。他小时就与一伙窃 贼厮混，而且他又天生具有超寻常的滑稽才能，使人们乐意与他在一起。他请求聂赫留朵夫 帮他出狱，却又常常嘲笑自己，嘲笑法官们，嘲笑监狱，嘲笑所有的法律，不仅嘲笑刑法，而且嘲笑神的戒律。另一个引他注意的人是长相英俊的费多罗夫，他曾带领一伙人打劫过一个年老的官吏，并把他打死了。费多罗夫原是农民，父亲的房屋被人完全非法霸占了，后来 他自己当了兵，在军队里因为爱上一个军官的情妇而吃了不少的苦头。这个人天性热情，招人喜欢，为了寻欢作乐可以不顾一切，他从没见过有谁为某种目的而克制自己不去享乐，也从没听说过人生在世除了享乐还有什么别的生活目标。聂赫留朵夫清楚地看到这两个人都 具有很高的天赋，只不过因为缺乏培养才畸形发展，就像那些没有人看管的植物往往会乱 生乱长一样。他还看见过一个流浪汉和一个女人，他们的冷漠迟钝和外表的残忍使人们望而 生畏，可是他不管怎样也看不出他们就是意大利学派所说的犯罪型，只认为他们是一些惹他 厌恶的人，就像他在监狱外面见过的一些身穿礼服、肩佩徽章的男人和装饰着花边的女人 一样惹他厌恶。

如此一来，为什么那些各种的人都在坐牢，但另一些和他们一样的人却逍遥法外，还能对他们进行审判？这是聂赫留朵夫关心的第四类事情。

他起初打算从书本上找出这问题的答案，他就把只要同这问题有联系的书全买来，有龙勃罗梭的、嘉罗法格的、费利的、李斯特的、摩德斯莱的、塔尔德的，专心阅读，可越读越 觉得失望。一些人研究学问，并不是要为学术方面做贡献，比如写作、辩论、教书等等，却是在寻觅一些普通的生活问题的答案，而且结果常让人灰心。聂赫留朵夫如今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了：学术方面给他回答了许多同刑法有联系的深奥问题，但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想出的问题非常简单。他问：为什么一些人能把另一些人关在牢中，还虐待、鞭挞、流放、杀害，但他们本人却同被他们虐待、鞭挞、杀害的人一样？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解答 他的问题却是各色各样的议论：人是否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权利？能否用头盖骨判定法 来测定一个人是否属于“犯罪型”？遗传在罪犯中起怎样作用？是否有天生道德沦丧的人？到底什么是道德、疯狂、退化、气质？气候、食物、愚昧、摹仿、催眠、情欲是否对犯罪有 影响？什么是社会？社会责任是什么？等等，等等。

这些议论使得聂赫留朵夫想起那次一个放学回家的小男孩怎样回答他提出的问题。聂赫留朵夫问那个男孩是否已学会用字母拼字。“学会了。”男孩回答说。“那么，你拼一拼‘爪子’这个词。”“什么爪子？是狗爪子吗？”那个男孩神情狡猾地回答说。聂赫留朵夫为他的主要问题在那些学术著作里所找到的唯一的答案，正巧也是这种反问式的答案。

那些书里的许多见解聪明、渊博、有趣，然而它们没能解答他主要的问题：为什么某些

人有 惩罚另一些人的权利呢？书里不但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且所有的议论都归结到一点，那 就是对惩罚作出解释，替惩罚辩护，认为惩罚必不可少，实施惩罚是不辩自明的公理。聂赫留朵夫读了很多书，但都是间断地读的，于是他认为找不到答案是因为自己的研究工作还 不深刻的缘故，希望日后会找到答案。也正因为此，他并不自信于最近越来越频繁地涌上他 心头的那个答案的正确性。

三十一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一批犯人，计划七月五日起程。聂赫留朵夫打算在那天和她一块走。动身的头一天，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和姐夫一同进城来，和弟弟再见一面。

姐姐娜塔莎比他大十岁。他的成长受到她的一些影响。小的时候，他姐姐非常喜欢他。直到她快出嫁时，他们尤其谈得来，简直如同龄人那样，尽管她已经二十五岁了，而他还是 十五岁。

那时候她爱过弟弟的朋友尼科连卡·伊尔捷涅夫，后来他死了。姐弟俩都爱尼科连卡，都爱 他和他们自己所具有的那种广泛的博爱的优良品质。

但后来，他们俩都堕落了：他因为从军沾染了不良的生活习气，而她因为出嫁，她只在肉体 上热爱丈夫，但那个人不仅不热爱她和德米特里以前认为最神圣宝贵的一切东西，甚至无法 理解那是怎么回事，反而按自己的理解把她以前的生活目标，在道德方面追求完美和为人们 服务的志向，归结为完全是虚荣心做祟，想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而已。

姐夫拉戈仁斯基并没有名望，而且没有产业，不过是个能干的官场老手。他周旋在自 由派同保守派之间，手腕灵活，左右逢源，尽可能利用当时能为他的生活送来最大好处 的那个派系。但是，他能飞黄腾达，步步高升在司法界中，主要是因为依靠某种可以讨 得女人欢心的特别本领。在国外他认识聂赫留朵夫一家时，他已经不是非常年轻了。他让 年纪也不是非常年轻的姑娘娜塔莎爱上了他，简直违背她母亲的心愿和她成亲。她母亲觉 得这门亲事并不门当户对。他讨厌姐夫，尽管竭力控制这样的情绪，避免想到这些。聂赫留朵夫会对姐夫反感，是由于姐夫感情庸俗，目光短浅却又自负。但，他反感的主要原 因是姐姐竟然会那么热烈、那么自私、从肉体上爱着这个精神贫乏的人，而且为了博得他欢 心而摒弃自己的所有美德。聂赫留朵夫每一回想到，姐姐就是那个浑身汗毛、秃顶发亮 而自负的人的妻子，心中就非常痛苦。他甚至认为这个人的孩子也让人按捺不住地觉得讨厌 。每回听到娜塔莎就要生孩子，他立刻就会有一种痛惜的感觉，好像她从这个和他们不融 洽的人身上又感染到了一些臭东西。

拉戈仁斯基夫妇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这一回是他们自己来的，没有带 孩子；他们夫妇住在一家上等旅馆的上等房间里。娜塔莎·伊万诺夫娜立刻坐马车到母亲 的 故居去，但在那儿没有碰到她的弟弟，听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说，弟弟已经搬到一个 备有家具的公寓房间去住，于是又乘马车到那儿去。在光线阴暗、气味难闻、白天也点 着灯 的那个过道里，一个肮脏的杂役迎面朝她走来，告诉她公爵不在家。

娜塔莎·伊万诺夫娜准备去她弟弟的房间，留一个字条给他。杂役就领着她去了。

姐姐走进他那两个小房间，用心观看了一遍。她能看到她一直熟悉的整齐清洁样子，不过还 发觉房中的摆设简单得让她惊讶。她看到写字台上摆着一个镶着铜狗的吸墨纸床，以及几个 文件夹、一堆纸张和文具、几本《刑法典》、一本英文的亨利·乔治的英文书和一本 塔尔德 的法文著作，书里还夹带一把她一直熟悉的弯曲大象牙刀。

她在桌子旁留了一张字条，请他一定到她那儿去一回，并且今天就要去。她看着眼前的景象摇摇头，然后回自己旅馆去了。

姐姐现在关心弟弟的两件事：一件是他要和卡秋莎结婚，她已经在她居住的城里听到过的，那里对这事说法很多；另一件是他要将土地交给农民，这也是大家都已知道的，而且被许多人当作危险的政治活动。他要和卡秋莎结婚，娜塔莎一方面是有些高兴的，她欣赏他的果断行为，从这一点她似乎看见了她出嫁之前他们姐弟俩的原本面目，不过一想到自己弟弟居然要和这种下贱的女人结婚，又觉得恐怖。后一种感情比较强烈，她打算竭力去劝阻他，尽管明白这是很难做到的。

至于他要把土地交给农民的另一件事，并不怎么让她揪心。可是丈夫对这件事非常愤慨，让她劝阻她的弟弟。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说，这种行动无非是轻举妄动、轻率高傲的极端表现，如果非得解释弟弟的这种行动，那也只能解释为他特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招引人家来议论他罢了。

“把土地给与农民，把租金也交给农民，这到底有何意义？”他说，“如果他真乐意这样做，他尽可以通过农民银行把土地卖出去。那于情于理还说过得去。总之，他现在的这种行动近乎神智失常。”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说着，已经在考虑他应该做聂赫留朵夫田产的监护人了，他要求妻子一定得跟弟弟好好谈一谈他那种奇怪的意图。

三十二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在桌子上发现了姐姐留下的字条，就马上乘车去找她。

此时已经黄昏。娜塔莎的丈夫在另一个房间里躺着小憩，娜塔莎自己迎接弟弟。她穿着一件小腰身黑绸连衣裙，扎在胸前一个红花结，蓬起的乌黑头发梳成流行的发式。她尽力打扮得年轻美丽，让人觉得是要博取年龄一样的丈夫的欢心。她见弟弟进来，霍地就站起来，急忙向他走过去，她的绸连衣裙的下摆在作响。他们彼此吻过，笑眯眯地看了一下对方，很有意味地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那种姿态神秘却不能用语言表述，但感情真挚。

接着他们开始谈话，他们的话就没有那么真诚了。由母亲去世以后，他们不再见过面。

“你胖了，好像更年轻了。”聂赫留朵夫说。

她愉快得嘴唇都翘起来了。

“你可是瘦了。”

“那么，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还好吧？”聂赫留朵夫问。

“他在休息。昨晚他没睡好。”

他们这时候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一句也没有说出来，倒是彼此的眼神说出了他们应该说而又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去过你那儿。”

“哦，我明白。我已经搬出来住了。房子非常大，我住在那儿感到孤独、寂寞。现在我也不需要什么了，你把东西都拿走吧，就是家里的家具什么的。”

“哦，阿格拉斐娜告诉了我，我到那儿去了一趟，那太感谢你了。但是……”

这时，旅馆茶房送进来一套银茶具。

茶房放茶具时，姐弟俩都不吭声。娜塔莎在茶几后面的圈椅上坐着，默默地倒茶。弟弟也不说话。

“哦，德米特里，我都听说了。”娜塔莎瞧了他一眼，断然说道。

“啊？你听说了，我非常高兴。”

“不过她经历过那样的生活，你还能指望她改邪归正吗？”娜塔莎·伊万诺夫娜说。

他笔直地坐在一把小椅子上，胳膊肘并没有倚在什么地方，只是认真地听她讲话，极力听明白她的意思，极力清楚地回答她的话。最近他同玛丝洛娃的见面在他的心里所引起的这种心情，依然使得他的灵魂里充满宁静的欢乐和对一切人的好感。

“我不指望她改邪归正，而是要我自己改邪归正。”他回答说。

娜塔莎·伊万诺夫娜长叹一声。

“除了结婚以外，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

“但我认为这个办法是最好的。而且这会把我引到另一个世界去，在那里我能够成为一个有益于人们的人。”

“不过我认为，”娜塔莎·伊万诺夫娜说，“你不可能幸福。”

“我个人的幸福无关紧要。”

“是的，不过她要是善良的，也不会幸福，甚至不该指望这种幸福。”

“她原本就不指望。”

“我知道，但生活……”

“生活怎么样呢？”

“生活是都有别的要求”

“生活并不会要求别的什么，只要求我们去做该做的事。”弟弟说，瞅着姐姐那张还很漂亮、但眼角和嘴边已显现细纹的脸。

“我不懂。”她叹息着说。

“我可怜的姐姐、亲爱的姐姐！她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聂赫留朵夫想起娜塔莎出嫁之前的模样，想。许多童年的记忆交织在脑海，唤起了他对姐姐的亲切感觉。

这当儿，姐夫像平常那样高昂着头，挺起宽宽的胸膛，轻轻地走进来。他脸上带着微笑，他的眼睛闪闪发亮，秃头和黑胡子也是一样。

“您好，您好。”他矫揉造作地说，把重音念得很不自然。

(尽管在婚后的最初一段时期他们极力约定用“你”相称，结果他们仍旧用“您”称呼。)

他们握了握手，接着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轻松地坐在一圈椅里。

“我没有妨碍你们的交谈吧？”

“没有。我说话和做事是从不须隐瞒任何人的。”

聂赫留朵夫一看见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的那张脸，一看见那双满是汗毛的手，一听 到那种高高在上、刚愎自用的口气，他的安宁的心境就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是啊，我们正在谈他的打算。”娜塔莎·伊万诺夫娜说。“你想来一杯茶吗？”她拿起茶壶来补问了一句。

“好，麻烦你。请问，聂赫留朵夫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决定跟那批犯人去西伯利亚，因为里面有一个女人我觉得我对她做了错事。”聂赫留朵夫说道。

“我知道您不但陪送她，而且其他的打算。”

“对，如果她愿意，我还计划同她结婚。”

“原来这样！如果您不嫌烦，您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这样做。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这样做。”

“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这个女人……她之所以堕落……”聂赫留朵夫想着用什么恰当的措词，不由得觉得气恼。“我这样做就是因为，我犯了罪，而她却被关押。”

“那她都受到惩罚了，就不可能没有罪。”

“她并没有罪。”

聂赫留朵夫很激动地把事情一五一十讲了一回。

“对，这是审判长的不对了，使陪审员在回答时没考虑好。但，这种事情还可以到枢密院提起上诉。”

“枢密院已经驳回上诉了。”

“枢密院驳回上诉了，这就知道上诉理由不充分。”姐夫说，显然大家都觉得法庭口头陈述的结果肯定是真理。“枢密院不会审查案情。如果法庭审判真的有错误，那就要上告皇上了。”

“状子已经呈交皇上了，可是毫无成功的可能。他们会查问一下司法部，司法部查问一下枢密院，枢密院就把它的裁定重述一遍，于是，无罪的人照例受到惩罚。”

“第一，司法部不会去查问枢密院，”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脸上现出鄙夷的神色说，“司法部会直接向法庭调来案子的原卷，一旦发现有错误，就会纠正原来的判定。第二，无罪的人绝不会受到惩罚，即使有这样的例子，也只是偶然中的偶然。大凡受到惩罚的人总是有罪的。”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从容不迫地、得意洋洋地笑着说。

“我认为事情恰恰相反，”聂赫留朵夫对他的姐夫极其反感，开口说道，“我相信经法院判刑的人，大多数都没有罪。”

“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无罪是单就这两个字的字面意义而言的，例如这个被指控犯毒害人命罪的女人就无罪，例如我最近认识的一个犯杀人罪的农民也根本没有杀过人，他也就根本没罪，例如有母子两个人被指控犯了纵火罪，事实上那场火是由酒店老板自己放的，他们没有罪却差点被定了罪。”

“没错，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审判方面的错误是一向就有的，以后也还会有。人类的机构不可能十全十美。”

“还有，有大量的犯人无罪，因为他们是在某种不一般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采取的行动是犯罪。”

“对不起，这话就不正确了。每一个贼都知道偷窃是不好的、不道德的行为，不应该偷。”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说，露出他那种让聂赫留朵夫尤其恼火的心安理得、自以为是、略带轻蔑的笑容。

“不对，他们不清楚。人家叫他们别偷东西，但他们知道，工厂老板通过压低工资的方式来剥夺他们的付出劳动，政府和政府官员通过收税的方法不断地剥夺他们的财物。”

“你说的是无政府主义理论。”拉戈仁斯基静静地说，对妻子的弟弟的话下了断语。

“我不清楚这是什么主义，不过我说的全是事实，”聂赫留朵夫接着说，“他们明白，政

府在剥削他们的财物。他们清楚，我们这样的地主掠夺了本该成为公共财物的土地，向来在剥夺他们的财物。后来，他们在被剥夺的土地上拾了一些柴火当柴烧，他们就被关进牢里，还说他们是偷东西。但他们知道，盗窃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从他们手里剥夺土地的人，因而，让被剥夺的财物送还原主，是他们为家庭本该尽的责任。”

“您的话我不懂，就算明白，也不会同意。土地一定要成为私有财产才行。如果您把土地分给大家，”拉戈仁斯基说，觉得聂赫留朵夫是社会主义者，觉得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全部土地平分，且平分土地是很不聪明的做法，他能轻易驳回这种理论，“如果您今天把土地平分给大家，明天可能它又转到勤奋的人手里。”

“没人打算把土地平分，可土地不该成为什么人的私有财产，不能成为买卖和租佃的对象。”

“人类的天赋之一是私有财产权。要是没有私有财产权，那么耕种土地就会毫无意思。只要消灭私有财产权，我们就可能回到蛮荒时期。”拉戈仁斯基似乎很有道理地说，一再说着维护私有财产权的陈年旧话。这样的论调让人觉得是驳不倒的。其主要意思就是，人们土地的占有欲就是土地得私有的标志。

“与这相反，只有消除土地私有制，这样土地才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浪费掉。现在地主占着土地，就如狗占马槽，自己不懂种，又不让懂种的人种。”

“我说，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您简直是疯了！莫非我们今天可以消灭土地私有制吗？我懂得它是您一直以来心里一直想着的一个问题。不过恕我直截了当地说一句……”拉戈仁斯基说到这时脸色苍白，声音抖着，显然这问题击中了他的要害。“我想奉劝您在开始处理这问题之前，先认真考虑一下。”

“您指的是我的私人问题吗？”

“是的。我认为所有我们这些有一定地位的人，应当承担这种地位同时赋予我们的职责，应当维护这样的生活条件，因为我们自己就生活在这种条件里，这是我们的祖先传给我们的，而且将来我们必须传给子孙后代。”

“我认为我的责任在于……”

“请允许我把话讲完，”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不允许别人打断他的话，继续说下去，“我说这些话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我挣的钱足够我们花销了，而且我认为我的孩子们将来也不至于过穷困的生活。所以，请允许我坦诚地说出我的意见，我不赞同您那种没有经过充分考虑的行动，这并非是从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原则上我就不能同意您的想法。我奉劝您多想一想，多看一点书……”

“哦，我的事还是我自己来解决吧，我自己明白该读什么书，我不该读什么书。”聂赫留朵夫说道，他脸色苍白，还觉得双手冰凉，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停下话来，喝着茶。

三十三

“哦，您的孩子们怎样呢？”聂赫留朵夫稍为平静了一下，问姐姐。
姐姐讲到她的两个孩子，说起他们和奶奶住在一块了。

她看到弟弟和丈夫不再争论了，非常高兴，就开始讲她的孩子们是如何玩旅行游戏的，简直就与从前她弟弟用两个玩偶——一个黑人，一个法国女人，所玩的游戏一样。

“哦，你还记得那种游戏？”聂赫留朵夫含笑说道。

“你无法想象，他们的玩法跟你的简直一样呢。”

一场不愉快的谈话就此结束。

娜塔莎觉得放心，但她不想当着丈夫的面谈只有她的弟弟才能听得懂的话。为了使大家可以能参加话题的讨论，她就讲起那件刚刚传到这里的彼得堡新闻：卡敏斯基决斗死了，他母亲因为这个独子身亡悲痛不已。

拉戈仁斯基说不赞成把决斗身亡排除在一般刑事罪之外。

他这种说法遭到聂赫留朵夫的驳斥，为此他们又争吵了起来，但最终一切都没有解释清楚，双方都没有讲清楚各自的观点，各执己见，互相谴责对方。

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觉得聂赫留朵夫在责难他，小看他全部事业，于是他竭力对聂赫留朵夫指出他的见解是完全不正确。

聂赫留朵夫觉得，姑且不说姐夫妨碍他土地方面的一些事而让他恼火(他在心里深深感到，姐夫、姐姐和他们的孩子，当作他财产的继承人，是可以干预他要做的事的)，他觉得愤恨的是，一些显然荒唐和充满罪恶的事，这个鼠目寸光的人却以为是正确和合法的。姐夫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激恼了聂赫留朵夫。

“啊，这种事法院会如何处理呢？”聂赫留朵夫问道。

“法院将判处决斗时的一方去服苦役，就如一般的杀人犯一样。”

聂赫留朵夫的手又发凉了，他又讲了起来，情绪非常激动。

“哦，那又怎么样？”他问。

“那就主持了正义了。”

“俨然主持正义是法院工作的目标似的。”聂赫留朵夫说。

“难道还有什么别的目标吗？”

“维护阶级利益。法院，在我看来，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罢了，用来维护有利于我们的阶级的现行制度。”

“这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想法。”拉戈仁斯基没事一般地笑着说。“普遍认为法院是有其他使命的。”

“我觉得理论上可以这样认为，但实际不是这样。法院的只有一个宗旨就是维护社会现在的样子，因此它要迫害和解决那些品德比一般水平高并想提高这种水平的人，也即所谓政治犯，还要迫害和解决那些品德比一般水平低的人，也就是所说犯罪型。”

“首先，说政治犯被判决是由于他们的品德比一般人高，这我不会同意。他们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社会败类，跟您认为品德比一般人低的犯罪型一样堕落，尽管表现方式有点不同。”

“但是我认得一些人，他们的品德比审判他们的法官们高明许多倍。所有那些教派的信徒就都是道德高尚的、品质坚强的人……”

然而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养成了说话时不容别人打岔的习惯，所以他根本不听聂赫留朵夫讲话，只是继续讲自己的话。这一点惹得聂赫留朵夫特别冒火。

“您的另一个看法我也不能同意，说什么法院的目标在于维护现行的制度。法院自有法

院的目标，那就是要么改造……”

“好一个关在监狱里的改造。”聂赫留朵夫插嘴说。

“……要么消除那些堕落的人，”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不理睬他的插话，固执地继续说下去，“以及那些威胁社会生活的野兽一般难驯的家伙。”

“问题是现在的社会不但不能做到这些，也不能做到那一些。如今的社会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您的话什么意思呀？我不懂。”拉戈仁斯基强自露出笑容说。

“我意思是，合理的惩罚本来就只有两类：那就是古代一般用的体罚和死刑，不过随着社会习气的变化，这些刑罚运用得越来越不多了。”聂赫留朵夫说道。

“哦，这些话从您这里听到真是非常新鲜。”

“对，痛打那人一顿，让他以后不能再做挨打的事情，这是合理的；把一个对于社会有害的危险分子的脑袋砍掉，这也是很有道理的。这两类惩罚都是合道理的。但把一个无所事事、没事做而变坏的人关押在牢里，让他不愁衣食但又被迫游手好闲，而且同非常堕落的人住在一起，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另外，为了一点事把一个人从图拉省押送到伊尔库斯克省，也或者从伊尔库斯克省押送到其他地方，而国家却要在人人头上消耗五百多卢布，那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说实在的，这类公费旅行人们是害怕的。如果没有这类旅行同监狱，我同您就不会这样安心地坐在这儿了。”

“那些监狱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是永远关在监狱里，他们终有被释放的一天。这样，恰恰相反，那些人在那种机构里会沾染更多的恶习，更加腐败下去，那就是说他们的危险性更大了。”

“您是想说，必须改进惩治制度。”

“这是不可能改进的。为改进监狱而花费的钱，会比国民教育方面所需要的花费还多，那就会给人民造成新的重负。”

“可是，惩治制度的某些缺陷决不意味着法院本身就应该废除。”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没有听他内弟讲话，又接着讲他自己的话。

“那些缺陷是无法补救的。”聂赫留朵夫提高喉咙说。

“那怎么办？索性把犯人全杀掉？或者依某一个国务人员所提议的办法，把他们的眼睛全挖出来？”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得意地微笑着说。

“是的，这虽说残忍，但总归有效验。如今的做法，却仅仅是残忍而已，不仅没有效验，而且极其愚蠢，简直使人无法理解，那些神智健全的人如何能够参与像刑事法庭这样既荒谬又残忍的工作。”

“可是我就参与了这种工作。”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说着，脸色煞白。

“哦，那是您的事。不过我不能明白。”

“我觉得您不明白的事还很多呢。”拉戈仁斯基颤抖着说。

“在法庭上看到，副检察官如何千方百计硬把一个男孩判刑，但那个男孩仅会让所有头脑健全的人产生同情心。我还了解到一个检察官审问教派信徒，居然觉得读福音书是触犯法律。总的来说，法院的一切工作就在于干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勾当。”

“我如果这样认为，就不至于干这职务了。”拉戈仁斯基说着，站起来。

聂赫留朵夫看到姐夫的眼镜底下产生一种古怪的亮光。“莫非那是眼泪吗？”聂赫留朵夫

心想。确实，那是屈辱的眼泪。拉戈仁斯基走近窗口，拿出手帕，清了清喉咙，动手擦净眼镜，接着又擦了擦眼睛。他走回沙发旁，点起一支雪茄，没再说什么。聂赫留朵夫看见他得罪姐夫和姐姐已经到这个地步，心里觉得既难过又羞愧，尤其是因为他第二天就要起程，从此不会再见到他们了。他很窘迫地和他们告别，就回家去了。

“可能我说的话大多正确，至少他没有什么可以驳倒我的话。但我讲话的态度过于激烈。我既然能够被邪恶的感情这样迷了心窍，把他侮辱得这么狼狈，让可怜的娜塔莎这么伤心，可见我的变化并不多。”他想。

三十四

那批犯人，包括玛丝洛娃在内，定于下午三点钟从火车站启程。聂赫留朵夫为了看到那批犯人从监狱里走出来，跟他们一起到火车站去，因此，他打算在十二点钟以前到达监狱。

当聂赫留朵夫捡好行李和文件的时候，看见日记，就停下来一再阅读前段时间写的一些话：“卡秋莎不愿接受我做的牺牲，而情愿自己去牺牲。她和我都胜利了。我认为她的心灵已经发生变化，我不肯相信，不过非常高兴；我不肯相信，不过我认为她在复活。”然后还有这样一些话：“碰到一件非常痛苦但又非常快乐的事。听说她在医院时不规矩。我立刻觉得很痛苦。”

我没想到自己会这般痛苦。我带着既嫌恶又憎恨的心情跟她讲话，后来我又忽然想起自己，想起我痛恨她所做的这种事，我自己就做过许多次，即使在最近，也还做过，虽然仅仅是在思想上。于是那刹间，我又是痛恨自己又是怜悯她，心境竟舒畅极了。如果我们总能见及时看到自己眼睛里的梁木，我们就会变得更善良。”他写上今天的日子，接着又写道：

“我去了娜塔莎那里一趟。正因为我的一些自满情绪，我就不那么善良而变得凶狠了，现在心里还觉得很沉重。哎，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从明天起，我就要过崭新的生活了。别了，旧生活，从此永远地别了。我心里百感交集，但理不出头绪来。”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就立即懊悔不该跟他姐夫那么激烈地争论。

“这样走掉可不好，”他想，“要去向他们道歉才对。”

不过他看了下表，觉得已经晚了。他要赶快动身，才不至于错过那批要去西伯利亚的犯人从监狱起程的时间。聂赫留朵夫急忙收拾起行李，让看门人和费多霞的丈夫塔拉斯起来——他要和聂赫留朵夫一块出门，——直接送行李到车站，然后雇了首先遇到的那辆出租马车，朝监狱直奔去。流放犯坐的那列火车要比聂赫留朵夫搭乘的邮车早出发两小时，因而他把公寓房钱付清，计划不再回来。

正是闷热的七月天气。街道上的石头、房屋、铁皮房顶经过闷热的夜晚以后，依然没有冷却，又将它们的余热传递到炎热而停滞的空气中。此刻没有风，但即便有风，也只能搅动一下那股又臭又热的饱含灰尘和油漆味的空气。街道上行人稀少，就连那少数的行人也尽量走在房屋的阴影里。只有修路的农民坐在街道中央，脸色被太阳晒得乌黑，脚上穿着树皮鞋，忙着用铁锤把石子砸到滚烫的沙地里。还有些脸色阴沉的警察站在街心，身穿没有漂过的白制服，橘黄色武装带系着手枪，他们都无精打采，时不时地替换两只脚。还有些公共马车响着铃铛，在街道上川流不息，车厢朝阳的一面挂着窗帘，拉车的马戴着白布头罩，两只耳朵从头罩的缺口里钻出来。

聂赫留朵夫坐车到了监狱，那批犯人仍然没有出来。监狱里面，从四点钟起已经开始移交和验收犯人。这种工作非常紧张，到此刻仍然没有结束。那批有六百二十三名男犯和六十四名女犯被流放，都得按名册依次核对，有病的和体弱的要挑出来，全部移交给押解队。新任的典狱长和两名副典狱长，以及一个医师、一个医士、一个押解官和一个文书，全坐在院子中靠墙阴凉处的一张桌子周围，桌面上放着公文簿册同办公用具。他们依次报出犯人姓名，依次进行审查，问讯，登记。

此刻桌子已经有一半被阳光晒着了。这里非常热，一点风也没有，站在周围的犯人还常吐出热气，使得更加闷热难受。

“这是怎么搞的，简直没完没了！”押解官一面说，一面不停地吸着纸烟，一团团烟雾不断从那盖住了嘴的唇髭里冒出来，这个人生得壮实，高身材，红脸膛，肩膀耸起，胳膊很短。

“这真要把人活活累死。你们打哪儿弄来这么多的人？还有很多吗？”

文书员查了查名册。

“还有二十四个男的和一些女的。”

“喂，你们还站在那儿不动干什么，走过来！……”押解官对那些还没有核对过的犯人吆喝道，他们正一个挨一个地站在那里。

犯人们排列成行，等着轮次，已经在没有任何遮蔽的太阳直射下呆站了三个多钟头。

这种工作是在监狱里进行的，至于监狱外面，大门外照例站着一个荷枪的哨兵，还有大约二十辆大车停在那儿，准备装载犯人的行李和体弱的犯人。街角上站着一些犯人的亲友，等候与走出来的犯人见一见面，而且，倘若可能的话，就同那将启程的犯人再谈几句话，

将一点东西送给他们。聂赫留朵夫也夹在这群人里站着。

他站在这儿将近一小时了。终于门里响起了铁镣的哐啷声、人们走动的声音、长官的喝斥声、起伏的咳嗽声和人群压低的交谈声。这样过了差不多五分钟光景。在这段时间中，几个看守不断在小门里进进出出。最后来一声口令传出来。

隆隆地开了大门，铁镣铐拖动的哐啷声更响了。一大批穿白军服的押解兵扛着枪走到街上，在大门外排成一个整齐圆圈，显然这是他们熟练了的事情。他们站好队之后，又传出了一声口令。头发剃光的男犯人，头上戴着像薄饼一样的囚帽，每人都背上背着袋子，两人一排，一步步困难地拖着脚镣走出来。他们一只手扶着背上背的袋子，另一只手前后摆动着。最先出来的是苦役犯，他们都穿着灰色的长裤和囚袍，每个人的囚袍背上缝着一块方布，标志是苦役犯。他们中间有的年轻，有的年老，有的瘦，有的胖，有的脸白，有的脸红，有的脸黑，有的小留胡子，有的留大胡子，有的不留胡子，有俄罗斯人，有鞑靼人，有犹太人，每个都哐啷啷地拖着铁镣，拼命摆动一条胳膊，好像要走到远处去，但走了十步左右就站住了，温顺地四人一排，依次站好。接着，大门里又涌出一群剃光头的男犯。他们也穿着囚服，却没有戴脚镣，只是每两人被一副手铐铐在一起。这些是流放犯……他们同样快速地走出来，站住，之后四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是被各村社判处的流放犯，接着是女犯，也按同样的顺序，前面是穿灰色囚袍、系灰色头巾的女苦役犯，然后是女流放犯，还有穿城里服装或者乡下服装自愿伴随着丈夫一起被流放的女人。其中有几个女犯手里抱着娃娃，用她们囚袍的前襟包着。

还有一些孩子，男孩女孩都有，跟那些女犯人一块儿步行。这些孩子夹在女犯人当中，

就像 夹在马群里的小马一样。男人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只是偶尔咳嗽几声，或者简短地说几句话。但女犯人那边的说话声却一刻也不停。聂赫留朵夫觉得他好像看见玛丝洛娃出来了，可她 又消失在一大群人当中，不见了。他只看见一群丧失了人类的特征、尤其是女性的特征的灰 色的生物。那些女犯带着孩子和背包，在男人后面排好队伍。

虽然全体犯人在监狱的围墙里已经清点过，可是押解兵现在又重新清点一遍，同原来的人数 核对一下。这次清点花了很长时间，因为有些犯人走动起来，换了地方，打乱了押解兵的 清点工作。押解兵于是大声辱骂那些犯人，将他们推来推去，犯人们顺从地听凭摆布，但都 在生闷气。接着押解兵又清点了一次。等到重新清点完毕，押解官就发出一道什么命令，人 群顿时大乱起来。那些体弱的男人、女人、孩子，一齐争先恐后地朝大车那边跑过去，先把 背包放在车上，然后自己也爬上去。抱着啼哭的小婴儿的女人、兴高采烈地争抢座位的孩子、无精打采脸色阴郁的男犯人也纷纷爬上大车坐好。

有几个男犯摘下帽子，走到押解官跟前，向他请求什么事。聂赫留朵夫事后才知道，他们原 来是要求坐到车上。聂赫留朵夫只看见那押解官，对要求的人不理不睬，只顾他自己吸烟， 后来忽然对那犯人举起他的短胳膊，那犯人一看要挨打，赶忙缩起光头，拔脚跑开。

“我倒要叫你尝一尝做贵族老爷的滋味，好叫你一辈子忘不了！老老实实走着去！”押解官嚷 道。

押解官只准许了一个戴脚镣的个子高高的颤颤巍巍的老头。聂赫留朵夫看见那老头脱下薄饼 般囚 帽，画了个十字，走向大车，可是他那衰老的腿拖着脚镣，爬了好一会也都爬不上车。幸亏 车上有个好心的女人抓住他的一只手，才把他拉上去了。

直到那几辆大车都被装满袋子，被允许坐车的人在袋子上坐好，押解官才脱掉军帽，用手绢 擦了擦他的前额、秃头和红红的粗脖子，然后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全体，开步走！”他命令道。

那些士兵肩上的步枪当郎当郎地响。犯人们脱掉帽子，有的人是用左手脱的。他们开始在胸 前画十字。送行的人叫喊着叮咛，犯人们也叫喊着回答。哭号声从女人们中间传来。这批 由穿着白军服的兵士们包围着的犯人队伍，就走动起来，套着锁链的脚扬起了满天尘 烟。走在前排的是兵士们，身后跟着戴脚镣的犯人，每四人一排，铁链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他 们的后面是流放犯，随后是由村社判处流刑的农民，每两个人用一副手铐锁在一起，接着就 是女犯人。最后就是装满背包和体弱的人的走动的大车，其中一辆大车上，有一个 女人坐在 高处，裹严身上的衣服，不住地哀号和恸哭。

三十五

队伍排得非常长，前面的人都已经走的远得差不多看不见了，后面载满了行李和老弱病残的 大车才刚刚出发。等大车刚一出发，聂赫留朵夫就坐上自己的马车，吩咐车夫赶紧追上队伍， 他想找一找在男犯中间有没有熟人，然后在女犯中找到玛丝洛娃，问问她收没收到送去 的东西。天气热得更厉害了，空中没有一丝风，上千只脚踏起的灰尘，一直飘浮在走在街心 的犯人们头上。

犯人们走得很快，聂赫留朵夫坐的那辆马车走得不快，只能缓缓地赶到他们前头。那一

排排 他不认得的、外貌古怪的可怕生物，身上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向前迈着上千只穿着相同 鞋袜的脚，他们合着脚步的拍子甩搭着空手，似乎是在给自己打气。他们人数如此众多，外表又如此相同，又都处在那么奇特古怪的条件下，因此在聂赫留朵夫看来，他们似乎并不是人，而是一种可怕的特别的生物。直到他在苦役犯的人群里认出杀人犯费多罗夫，在流放犯当中认出幽默诙谐的奥霍京和另一个求他帮过忙的流浪汉，他心里的那种印象才得以破灭。所有的犯人差不多都扭过头来，斜睨着赶到他们前头去的四轮轻便马车和坐在车上不停打量他们的老爷。费多罗夫将头扬了扬，表示他认出了聂赫留朵夫；奥霍京光挤了挤眼睛。但这两个人都没有点头，认为这是犯禁的。聂赫留朵夫的马车赶上那些女犯人，他一眼就认出玛丝洛娃。她在第二排女犯人当中走着。这一排紧边上的那个女犯人红脸膛、黑眼睛、短腿，模样丑陋，把长囚衣底襟掖在腰里，她就是“美人儿”。她身旁是一个孕妇，正吃力地拖着两条腿往前移。第三个就是玛丝洛娃。她肩上搭着背包，目不斜视，脸色镇静而刚毅。这一排的第四个女人长得年轻漂亮，步伐矫健，穿着短短的囚衣，头巾以农妇的款式扎在头上，她就是费多霞。聂赫留朵夫从马车上下来，向正朝前走的女犯队伍走过去，打算问一下玛丝洛娃是否已收到那些东西，想问一下她感觉如何。可是在队伍这一边走着的一个押解犯人的 军士，他发现有人往这边走来，就立刻迎着聂赫留朵夫跑过去。

“不行，老爷，靠近队伍是不允许的。”他一边赶忙走过来，一边大声向聂赫留朵夫喊道。

那个军士走过来，认出原来是聂赫留朵夫（在监狱里人人都认识聂赫留朵夫），赶忙把手举到帽沿上向他敬了个礼，他站在聂赫留朵夫身边说：

“现在不行。到火车站就行了，这儿是不行的。别掉队，快赶上去！”他对犯人们吆喝道。然后不顾天气炎热，抖擞精神，抬起穿着漂亮新皮靴的脚，迅速地跑回原来的位置。

聂赫留朵夫转身回到人行道上，吩咐马车夫赶着马车跟在他的身后。他自己看着队伍，同它并排朝前走。不管那支队伍走到哪儿，总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都既怜悯又恐惧地看着它。坐车路过的人都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目送那些犯人，直到看不见为止。过路的行人纷纷止住脚步，惊讶而恐惧地瞧着这个可怕景象。

有些人走过去，施舍一点钱。押解兵就把那些钱收下。有些人像被催眠似的，跟着队伍向前走，但走了一会儿又站住，摇摇头，只是目送着队伍。人们纷纷跑出屋子，互相打着招呼，也有人探出窗子。他们都默默地呆望着这支可怕队伍。在一个十字路口处，队伍拦住了一辆豪华的四轮马车。马车驭座上坐着一个油光满面、屁股肥大的车夫，身穿一件背上有两排钮扣的号衣。马车后座上坐着夫妻两个人：妻子瘦削，苍白，头上戴一顶浅色的帽子，手上还打着一把色彩艳丽的阳伞；她的丈夫头上戴着一顶高礼帽，身穿一件讲究的浅色大衣。他们的两个孩子面对他们坐在前座上：女孩打扮得非常漂亮，娇嫩得像朵小花，长着一头浅色头发，也打着一把色彩艳丽的阳伞；八岁的男孩长着细长的脖子，锁骨突出，头上戴一顶水手帽，拖着两条长带子。他们的父亲怒气冲冲地责骂车夫，埋怨他没有来得及赶在队伍前面穿过马路；做母亲的厌恶地眯细眼睛，皱起眉头，把遮阳伞放得低低的遮住脸，来遮挡阳光和灰尘。大屁股的车夫听着主人不公道的指责，皱起眉头，面带气色，因为走这条路，恰恰是主人命令的。他使劲地勒住那几匹笼头底下和脖子上闪着汗光、还在猛劲儿往前奔的黑马。

警察一心想为豪华的马车的主人效劳，让犯人停住，放马车先过去，但他发觉这支队

伍 里有一种阴森肃穆的气息，即使是为了这样一位阔老爷，他也还是别去破坏的好。

于是他光是把手举到帽沿上行个礼，表示一下他对有钱人的尊敬，然后神情严肃地瞅着那些 犯人，俨然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马车的坐客，以免受到犯人的侵袭。所以那辆马车只得等整个队伍走完，一直等到最后一辆满载背包和坐在背包上边的女犯人的大车轰隆轰隆地 走过去，才得以继续走动。那辆大车上的女犯人当中，有一个神经质的女人本已止住哭声，现在看见这辆豪华的马车，就又开始恸哭和哀号。直到这时，马车夫才轻轻地抖动一下缰绳，那几匹黑毛快马就撒开蹄子朝前走了，一阵清脆的响声在石子路上响过，把安着胶皮轮子而微微颤动的四轮马车拉到别墅去，车上那对夫妇、那个女孩和那个脖子细长、锁骨突出的 男孩就是到别墅去消夏避暑的。

父亲也罢，母亲也罢，都无法对他们的女孩和男孩解释他们所看见的事情包含的意思。因此 那两个孩子只好自己来解答这种景象到底含有什么意义。

女孩子观察着父亲的脸色，这样来回答疑问：这些人与她的父母和亲友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都不是好人，所以就该这样对待他们。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女孩子只觉得恐惧，直到那些人走得看不见了，她才轻松下来。

但是，脖子细长的男孩一直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犯人的队伍。他对这问题的想法完全不同。他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启示，坚定地相信他们，跟他自己，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也是人，因此一定有人欺侮他们，对他们做了一些不合理的事。他怜悯他们。他既害怕这些被戴上镣铐、剃光头发的囚犯，同时也害怕那些迫使他们戴上镣铐、剃光头发成为囚犯的人。

正因为此，男孩的嘴唇才撇得越来越厉害，拼命忍住眼泪，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哭出来是丢脸的。

三十六

聂赫留朵夫像犯人们一样快步往前走。他虽然只穿着一件薄大衣，可是仍旧觉得异常燥热了，主要的是街上漫天尘埃，空气停滞而炎热，使人憋闷得透不过气来。他走了四分之一俄里，再坐上马车往前走，可是坐在马车上，走在街当中，他觉得更热了。他极力回想昨天同拉 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的谈话，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却不再像今天早晨那样使他心神不宁了。这件事已经被那批犯人走出监狱和列队出发的种种印象淡化。

主要是因为天气实在热得让人受不了。在矮围墙旁边的树荫底下，有两个实科中学学生站在一个卖冰淇淋小贩前，其中一个孩子正不停地舔着牛角小匙，津津有味地吃着；另一个孩子还在等待小贩把那些黄糊糊的东西往玻璃杯里盛。

“这儿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喝点东西来解解渴？”聂赫留朵夫觉得非常口渴，也想喝点什么，就问他的车夫。

“这儿有一家不错的饭店。”车夫说，赶着马车绕过街角，把马车停在一家挂着大招牌的饭馆门口。

肥胖的店老板身上只穿着衬衫，站在柜台里边。侍者穿着白底色的脏工作服，因为没有顾客而闲坐在桌子旁，此时都怀着好奇心打量这个很不同凡响的客人，赶紧迎上去伺候他。

聂赫留朵夫要了一瓶矿泉水，在离窗子较远的地方挨着一张小桌坐下，桌上铺着肮脏的桌布。

另一张桌旁坐着两个人，桌上放着茶具和一个白色的玻璃瓶。他们擦着额头上的汗，和和气气地算着帐。其中一个人肤色发黑，头顶光秃，后脑壳上有一圈黑头发，与拉戈仁斯基·尼基丁佛罗维奇一样。这个特征使得聂赫留朵夫回想起昨天他与姐夫的谈话，回想起他在临行之前很想同他和姐姐再见一见面。“出发前我恐怕抽不出时间来了，”他暗自思忖，“我最好还是给他们写一封信吧。”于是他向侍者讨来纸张、信封、邮票，一边喝着清凉冒泡的矿泉水，一边开始考虑应该怎么写。但他的思绪太乱，这封信怎么也写不好。

“亲爱的娜塔莎！昨天与姐夫那席沉重的谈话给我留下痛苦的印象，我不能带着这种印象一走了之……”他开了个头。“往下写些什么？难道要求他原谅我昨天的说话吗？可我说的都是心里真正想法呀。他会以为我放弃原来的想法了。而且他这是在干涉我的个人的事……不，我不能这样写。”聂赫留朵夫又唤起了他对这个与他格格不入、又自以为是的人的满腹憎恨，把那封没有完成的信放进衣袋里，付了帐，走到街上，坐上车去追赶那些犯人。

天气热得更厉害了。墙壁和石头都似乎在冒热气。

滚烫的石子路似乎在烧烤行人的脚，聂赫留朵夫的手一碰到马车上漆过的挡泥板，就觉得像被火烫着似的。

马有气无力地慢吞吞地在街上跑着，在尘土飞扬的坎坷的路上踩出一连串均匀的马蹄声，马车夫不住地打盹儿。聂赫留朵夫坐在马车上，脑子一片空白，眼睛冷漠又呆滞地盯着前方。在一条倾斜的路边的街道，一所大厦门前，围着一小群人和一个荷枪的押解兵。聂赫留朵夫吩咐车夫停下来。

“这是怎么了？”他向一个打扫院子的人打听。

“有一个犯人出了事。”

聂赫留朵夫从马车上跳下来，走到那群人跟前。在靠近人行道的倾斜又坎坷的石砌路面上，躺着一个头在坡下而脚在坡上的已经年老的男犯人，肩宽膀圆，留有棕红色的胡子，脸色通红，鼻子扁平，身穿灰色长囚衣和灰色长裤。他躺在那儿仰面朝天，两只布满雀斑的手摊开，手心朝下。他睁着呆滞不动的、充血的眼睛望着天空，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他那高大隆起的胸脯就均匀地起伏一下，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他身旁站着一个皱起眉头的警察、一个叫卖的小贩、一个邮差、一个店员、一个打着太阳伞的老太婆、一个手提一只空篮子的光头男孩。

“他们太虚弱了。他们被关在监狱里，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可是现在还把他们带到这么毒辣的日光底下来。”店员对走过来的聂赫留朵夫说，口气分明是在责备什么人。

“他怕是就要死了。”打阳伞的女人带着哭音说。

“应当赶快把他的衬衣解开，”邮差说。

警察哆嗦着粗手指笨拙地解开那囚犯暴满青筋的红脖子上的带子。他明明是又激动又紧张，却依然认为必须把周围的人呵斥一顿。

“你们围在这儿干什么？天气又热得这么厉害，你们还要把风挡住。”

“应该先找个医生来为他们检查一下。留下身体虚弱的犯人。不要把那些半死不活的都拉出来。”店员说，他意思显示自己通情达理，懂得规矩。

警察解开那犯人衬衣上的带子，然后挺直了腰，向四下里看了看。

“跟你们说，快点儿走开！这儿的事与你们无关，有什么可看的？”他说，然后转过脸来对着 聂赫留朵夫，想要得到他的支持，可是他在聂赫留朵夫眼神里没有看到同情，就又转向押解兵。

可是押解兵只顾站在一旁，看着自己踩歪了的鞋后跟，对那个警察的困难处境不理不睬。

“该管事儿的人什么都不管。非要把人折磨死，天下哪里有这样的规矩吗？”

“囚犯虽然是囚犯，可终归也是人哪！”人群中有人说。

“让他的头枕得高点儿，再给他点水喝罢。”聂赫留朵夫说。

“已经有人去找水了，”警察答道，把手伸到犯人的腋窝下，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个囚犯拖到 高一点的地方。

“这么多人围在这儿干什么？”忽然传来一个威风凛凛的声音。一个警官穿一身耀眼的白色制服和一双亮得更加耀眼的高高的皮靴，迅速地朝人群走来。“赶快都走开！围在这儿干什么？”他实际上还没有看清楚人群围着干什么，就大声呵斥道。

他走到紧跟前，看到那个奄奄一息的囚犯，表示肯定似的点点头，好像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事。接着转向警察道：

“这是怎么回事儿？”

警察报告说，刚才有一批犯人路经此地，这个犯人倒在地上，押解兵吩咐将他留下来。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把他送到警察分局去得了。叫一辆马车来。”

“有一个打扫院子的人已经去叫车了。”警察说，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

店员开口讲了一句天气很热的话。警官就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这关你什么事？啊？走你的路去吧。”店员就闭嘴不响了。

“应当让他喝点水。”聂赫留朵夫说。

警官也恶狠狠地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可是没说什么话。等到打扫院子的人拿来一杯水，警官就吩咐警察给犯人喝水。警察托起犯人向后仰着的头，想把水灌进他嘴里，可是犯人没有往下咽，水顺着他的胡子流下来，把外衣的胸口和满是灰尘的麻布衬衫都浸湿了。

“把水泼在他脑袋上！”警官命令道。于是警察脱掉犯人头上的薄饼般的帽子，往他那棕红色的鬃发上和秃顶上泼了点水。

犯人突然害怕似的睁大了眼睛，但他的姿势没有变。一道道沾着尘土的污水顺着他的脸庞淌下来，可是他的嘴里仍旧发出均匀的呻吟声，整个身子不停地颤抖着。

“这儿不是有一辆马车吗？就坐这辆好了，”警官指着聂赫留朵夫雇来的马车对警察说。

“把车子赶过来！喂，让你过来呢！”

“我已经有客了。”马车夫并不抬起眼睛，阴沉着脸回答。

“这是我雇的车，”聂赫留朵夫说，“不过你们随使用好了，我来付车钱就是。”他对马车夫补充一句。

“喂，你们还呆站着干什么？”警官嚷道。“快动手呀！”

警察、打扫院子的人、押解兵就将那个奄奄一息的人抬起来，送到马车上，让他在座位上坐下。但他自己坐不稳，头老是朝后仰，整个身体从座位上滑下来。

“让他平躺着！”警官命令道。

“没关系，长官，我把他就这样送去。”警察说，在垂死的人旁边坐稳，用强壮的右臂

伸到 他的胳肢窝下，扶住他的身体。

押解兵托起犯人没有包裹脚布只是穿囚鞋的脚，放到马车夫的座位下，让他的两条腿伸直。

警官四下里看了一下，看见犯人那顶薄饼似的帽子被扔在马路上，就过去把它捡起来，戴在 犯人向后仰着的湿淋淋的头上。

“走罢！”他吩咐道。

马车夫气愤地回头看了一眼，摇了摇头，由押解兵监督着向警察分局慢腾腾地走去。警察 跟犯人并排坐着，不时地把犯人滑下去的身体拖上去。犯人的脑袋不停地前后左右摇晃着。押解兵跟在马车旁边，不时放好犯人的腿。聂赫留朵夫走在他们后面。

三十七

马车载着犯人，经过站岗的消防队员跟前，驶进警察分局的院子里，在一个 门口停住。

院子里有几个消防队员卷起袖子，高声说笑，正在刷洗几辆不知做何用途的车子。

马车刚一停下，就有几个警察围住它。他们从胳肢窝下抬住犯人僵硬的身体，抬起他的脚， 将他从马车上抬下来。他们踩得马车吱嘎作响。

把犯人送来的警察跟着跳下马车，电电发麻的胳膊，摘掉帽子，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他们把 犯人抬进门，送到楼上。聂赫留朵夫随着他们走进去。他们把犯人送到一个很小的肮脏屋子 里，那里面放着四张床。其中有两张床上坐着两个穿睡衣的病人：一个歪着嘴，脖子上打着 绷带；另一个害着肺病。另外两张床空着。那犯人就被放在其中一张床上。这时候有一 个矮个子的人，身上只穿衬衣裤和袜子，闪动着两眼，不断地活动着眉毛，他轻手轻脚地走 到犯人旁边，对他左瞧右瞧，然后又看了看聂赫留朵夫突然放声大笑起来。显然他是一个被 关在候诊室里的疯子。

“他们想吓唬我，”他开口说，“那可不行，他们办不到。”

警官和一个医士紧跟在抬着死尸的警察们的身后走进来。

医士走到死尸跟前，摸了摸犯人那只手蜡黄的布满雀斑的手，那只手虽然还柔软，却已 现出 死人的惨白色。他把那只手拿起来，然后松开。那只手就疲沓地耷拉在死尸的肚皮上 了。

“他已经完了。”医士摇了摇头说，可是他分明要按规矩办事，就解开死尸湿漉漉的粗布衬 衫，又把自己的髻曲的头发撩到耳朵背后，弯腰将耳朵贴在犯人发黄的、已停止跳动的高胸 脯上。大家都默不吭声。医士站直身子，又摇了摇头，伸出手指头去先拨开犯人的这只眼皮， 又拨开那只眼皮，那两只原本睁着的、呆滞不动的淡蓝色眼睛就闭上了。

“你们吓唬不了我，吓唬不了我的。”那疯子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往医士那边吐唾沫。

“他怎么样？”警官问道。

“他怎么样？”医士也照样说了一遍。“应该被送进太平间里去了。”

“您得再小心点儿。他是真的死了吗？”警官问。

“都到这地步了，不会错的。”医士说，不知什么原因他拉起死人的衬衣盖住他的胸脯。

“我让人去找马特维·伊万诺维奇，让他来看看。彼得罗夫，你过去一下罢！”医士说着，从 死人那里走开。

“把它送到太平间去。”警官说。“你一会儿到办公室来一趟，签个字。”他转头向那个 一

直跟着犯人的押解兵说。

“是，长官。”押解兵回答道。

那几个警官把死人抬起来，又抬他下楼。聂赫留朵夫想跟他们出去，但却被疯子拦住了他。

“您应该没参与他们的诡计吧，那么您快给我支烟抽！”他说。

聂赫留朵夫掏出一盒烟来，递给他。疯子扬起眉毛，急速地讲起来，说到人们如何用各种转弯抹角的方法折磨他。

“您不知道，他们全都跟我唱对台戏，用他们那套借刀杀人的办法欺负我，折磨我……”

“请您原谅，我得先走了。”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听完他的话就走到院子里，想要看一看他们将死尸抬到什么地方去。

抬着死尸的警察们已经穿过整个院子，刚走进地下室的门。聂赫留朵夫想跟上他们，却被警官拦住了。

“您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聂赫留朵夫回答说。

“不干什么，那就请您走开。”

聂赫留朵夫听从了他的话，向自己的马车那边走去。马车夫正在打瞌睡。聂赫留朵夫叫醒他，坐上马车，又向火车站赶去。

马车走了还不到一百步远，聂赫留朵夫看见对面又过来了一辆大车，也是由拿着枪的押解兵押送着。车上也躺着一个犯人，看来已经断气了。那犯人仰面躺在大车上，长着黑色大胡子，剃光了头发的脑袋上顶着一顶薄饼似的帽子，那顶帽子已经滑到他的鼻子上。大车每颠簸一下，他的脑袋就晃动一下，不断地撞着车板。马车夫脚穿大皮靴，在大车旁边边走边赶着车。马车后面有一个警察押着。聂赫留朵夫拍了拍他的马车夫的肩头。

“他们搞的到底是什么鬼啊！”车夫勒住马说。

聂赫留朵夫从马车上跳下来，跟在那辆大车后面，走过站岗的消防队员，走进警察分局的院子。这时候，院子里的消防队员已洗好车子，都走开了。只留下高高瘦瘦的消防队长。他戴着一顶镶蓝帽圈的帽子，两只手插在衣袋里，目光严厉地打量着一匹被消防队员牵来的颈部有着厚膘的淡黄色公马。公马的一条前腿有些瘸，消防队长气愤地对站在旁边的兽医讲着话。

警官也站在这儿。他看到又一个死人被拉来，就走到大车那边。

“从哪儿运来的？”他不太在乎地摇了摇头，问道。

“从老戈尔巴朵夫街拉来的。”警察答道。

“他是犯人吗？”消防队长问。

“是的，长官。”

“这是今天的第二个了。”警官说。

“哦，他们竟这样办事！不过天气也确实太热，”消防队长说着，又转过身去对那个牵走浅黄色瘸腿马的消防队员嚷道：“把它牵到墙角那个单马棚去！你这狗崽子，我真得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些马比你这个混蛋值钱得多，都活活地让你搞残废了！”

这具死尸也由警察们从大车上搬下来，抬到候诊室。与刚才那具死尸的程序一样，聂赫

留朵夫仿佛中了邪似的，紧跟在他们身后走。

“您有什么事？”一个警察问他说。

他没有回答，径直朝他们送死尸的地方走去。

疯子正坐在一张病床上，贪婪地吸着聂赫留朵夫送给他的纸烟。

“啊，您又回来了！”他说着，哈哈大笑。他看见死尸，不禁皱起眉头。“这边又来了。”他说。“我都看得不耐烦了。我总不能算是小孩子吧，不是吗？”他转过头来对聂赫留朵夫说，脸上带着疑问式的微笑。

此时的聂赫留朵夫正在看死尸，这具死尸现在已没有人来遮住它了。他的脸先前盖着一顶帽子，现在也完全暴露在外。

刚才那个犯人长得很难看，但是这个犯人面貌和体型都长得很好。他体格健壮，正值盛年。虽然他被剃了模样怪异的阴阳头，可他那饱满的额头和那双现在虽已毫无生气的黑眼睛却显得很好看，还有那个不大的高鼻子和黑色的短短小胡子，也都长得很美。他的嘴唇发青，可唇边带着一丝笑意。他的大胡子只遮住下半张脸，在那张剃光头发的半边脑袋上露出一只结实好看的小耳朵。脸上的神情安静、严肃并且善良。不用说从这张脸上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原可以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发展，现在却被断送了——单凭他双手和套着脚镣的双脚的修长的骨骼和匀称的四肢的健壮肌肉就可以断定，他是一个优秀、健壮和灵巧的人类动物。即便是作为一种动物来说，他在同类中也要比那匹由于受伤而让消防队长如此生气的浅黄马完美得多。可是他却被活活地折磨死了，人们对他的死不仅没有表现出对一个人的死的哀悼之情，甚至没有表现出对一个被活活折磨死的会做工的动物的怜悯之意。他的死在所有的人心里引起的唯一情感，就是厌烦，因为他的尸体马上就要腐烂，必须得赶快收拾掉，而这给他们添了麻烦。

由警察分局局长陪同的医师和医士，来到了候诊室。医师个子不高，肥胖墩实，穿一件茧绸上衣，他的茧绸裤子将粗壮的大腿裹得紧紧的，似乎太小了。警察分局局长也是个矮胖结实的人，他那张红润的脸庞像球那么圆，由于养成了习惯，喜欢先把吸进去的空气存在腮帮子里，然后再将它慢慢地吐出去，这样那张脸就愈发圆滚滚了。医师挨着死尸在病床上坐下，像先前那个医士一样摸了摸死人的两只手，听了听他的心脏，然后站起来，理了理自己的裤腿。

“已经无救了。”他说。

警察分局局长慢慢地吐出嘴里吸满的空气。

“他是哪个监狱的？”他扭过头问押解兵。

押解兵回答了他的话，并且对他提起要收回死人的镣铐。

“我会让他们拿下来的。谢谢上帝，我们这里总算还有一个铁匠。”警察分局局长说，然后他鼓起脸颊走向门口，才慢慢地把气吐出来。

“怎么会做这种事？”聂赫留朵夫向医师问道。

医师透过眼镜对他看了看。

“怎么发生这种事吗？您是问，他们为什么会中暑死掉吗？您想，整整一个冬天呆在牢里，没有活动过，没有见阳光，突然给带到像今天这样的太阳底下，又那么多人挤在一起走路，空气又不通畅，怎么会不中暑呢！”

“那么，为什么要让他们流放出去？”

“那您就得去问他们。不过，请问您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是局外人。”

“哦！……对不起，我可忙着呢。”医师说，又厌烦地往下拉拉裤腿，走向病人床铺。

“嗨，你觉得怎么样？”他向那个苍白着脸、脖子上扎着绷带的歪嘴病人问道。

这会儿疯子坐在自己的床铺上，停止了吸烟，只是向医师吐唾沫。

聂赫留朵夫走下楼，来到院子里，经过消防队的马和母鸡旁边，又经过戴着铜盔的门岗面前，走出了大门，坐上他的马车(马车夫又在打盹儿)，然后往火车站赶去。

三十八 聂赫留朵夫到达火车站时，犯人们已经全部坐在装有铁格窗的火车车厢里了。月台上站着几个送行的人，押解人员不许他们接近车厢。这些押解人员今天尤其烦躁。从监狱到火车站的路途上，已中暑倒毙了五个人。除了聂赫留朵夫见到的两名以外，还有三名：有一名像前两名一样送到就近的警察局去了，另外两名却仍留在这儿，他们是在火车站上倒下的。

押解人员感到麻烦的，倒不是在他们的押解下五个本来可以活着的人死掉了。这事根本不会放在他们心上，他们烦恼的只是必须要办理各种法律的手续：把死人和有关他们的文件、杂物送到应该送的地方，把他们的名字从要被押送到下城的犯人名册中勾掉。

特别是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办这些事是很麻烦的。

押解兵这时正在忙于办理这些事，所以在这些事没有办妥以前，不允许聂赫留朵夫和其他人走近车厢。不过聂赫留朵夫还是得到走近车厢的许可，因为他塞给了押解的军士一点钱。这个军士就让聂赫留朵夫走过去，但要求他谈得快一些，谈完就赶紧走开，免得被长官看到。总共十八节车厢，除了长官坐的那一节以外，其他的车厢都被犯人挤满了。聂赫留朵夫从那些车厢窗口走过，留神听了听里面在做什么。每节车厢里都充满了嘈杂的镣铐声、忙乱声、交谈的声音，其中还掺杂着毫无意义的下流话，可是在聂赫留朵夫的意料之外的是，没有一个地方在谈论路上死掉的同伴。他们谈的多数是关于他们的袋子、喝的水和挑选的座位问题。

聂赫留朵夫凑着一节车厢的窗子朝里面张望，瞧见押解兵在过道上给犯人们卸手铐。犯人纷纷伸出手来，一个押解兵拿着钥匙打开手铐上的锁，将手铐卸下。另一个押解兵把手铐收集在一起。聂赫留朵夫走完男犯的全部车厢，来到女犯车厢跟前。一阵均匀的呻吟声从第二节车厢里传出来，一个女人在哼哼：“哎哟，哎哟，哎哟！天呐，哎哟，哎哟，哎哟！天呐！”

聂赫留朵夫听从一个押解兵的指点，走过这节车厢，来到第三节车厢的窗口。聂赫留朵夫刚刚把头凑近窗口，就感到一股热气迎面扑来，充满汗酸臭。女人喊喊喳喳的说话声也清楚地传了出来。座位上坐满了妇女，全都满脸通红，大汗淋漓，身穿长囚衣或短上衣，正在高声谈论着什么。聂赫留朵夫的脸一凑近铁格窗口，就引起了她们的注意。离他最近的女人都止住说话，朝他走过来。玛丝洛娃坐在对面窗口那边。她只穿着短上衣，脱掉了长囚衣，也没有戴头巾。肤色白皙、面带微笑的费多霞坐在她身旁，离他这边较近。她认出了聂赫留朵夫，就连忙碰了碰玛丝洛娃，伸出手来对她指了指窗口。

玛丝洛娃赶忙站起来，用头巾围住乌黑的头发，红润流着汗的脸上带着活泼的微笑，走近窗口，双手扶住窗上的铁栅。

“天气可真热呀！”她快活地笑着说。

“那些东西收到了吗？”

“收到了，谢谢。”

“还需要其他的什么吗？”聂赫留朵夫问，感到车厢里的阵阵热气就像从浴室里冒出来蒸汽的一样。

“不需要什么了，谢谢。”

“要是能弄点水喝就好了。”费多霞说。

“是啊，能有点水喝就好了。”玛丝洛娃也跟着说。

“难道你们没有水喝吗？”

“有人送来过，可是都喝光了。”

“我马上就去，”聂赫留朵夫说，“我去向押解兵要点水来。我们要到下城才能再见面了。”

“可是难道您也去吗？”玛丝洛娃好像不知道这件事，快活地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问。

“我坐下一趟车走。”

玛丝洛娃默然不语，过了几秒钟后才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是怎么回事儿，老爷，听说有十二个犯人折磨死了，这是真的吗？”一个神情严肃的年纪很大的女犯用男人似的粗嗓音说。

她就是柯拉勃列娃。

“十二个我倒没听说。但我看见过两个。”聂赫留朵夫说。

“听说有十二个。他们干出这种事，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分明就是些魔鬼！”

“妇女当中有人得病吗？”聂赫留朵夫问。

“娘儿们身子倒硬朗一点呢，”另一个个子不高的女犯人笑着说，“只是有一个要生孩子了。听，她在那儿哼哼呢。”她说，指了指旁边的一节车厢，呻吟声不断从那儿传来。

“您刚才问还需要什么，”玛丝洛娃，极力忍住唇边流露出来的快活的笑意，说，“那么您跟那些长官通融通融，能否把这个女人留下不走呢。她太遭罪了。”

“好的，我去说。”

“还有，能否让她同她丈夫塔拉斯见上一面呢，”她补充一句，用眼睛指了指笑容可掬的费多霞。“要知道，他就要跟您一块儿上路了。”

“老爷，禁止跟她们谈话。”一个押解的军士说话的声音传了过来。他不是那个放聂赫留朵夫过来的军士。

于是聂赫留朵夫走开去找长官，想为就要分娩的那个女人，为塔拉斯，向他求情，可是找了很长时间也都没能找到，也无法从押解兵那儿得知。他们忙得厉害：有的领着犯人去了什么地方，有的跑去给自己买吃食，有的把自己的行李装到车厢里，有的服侍跟押解官一同出发的太太，谁都不乐意回答聂赫留朵夫的问话。

聂赫留朵夫看见押解官时，第二遍铃声已经响过了。这个军官用一只肥胖短粗的手擦了擦遮住了嘴的唇髭，耸起肩膀，正在为一件什么事训斥司务长。

“您到底有什么事？”他向聂赫留朵夫问道。

“这车上有个女人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我想是不是应该……”

“那就让她生好了，等她生出来再说。”押解官说，正向他自己那节车厢，使劲摆动两条短胳膊。

这时候，列车长走过去，手里还拿着哨子。跟着响起了最后一遍铃声和哨子声，在站台上送行的人群中间和女犯们的车厢里传出一片哭号声。聂赫留朵夫同塔拉斯并排站在站台

上，目送着一节节安着铁窗的车厢和车窗里许多剃光头发的男人脑袋从面前闪过去。接下来是第一节女犯车厢，从铁窗子可以看到里面的女犯，有露着头发的，有扎着头巾的。之后第二节车厢驶过，从里面传出那个临产女人的痛苦的哀叫。后面的就是玛丝洛娃乘的那节车厢。玛丝洛娃和另外几个女犯站在窗口，她看着聂赫留朵夫，向他凄苦地微笑着。

三十九

聂赫留朵夫所乘的那列客车，还有两个钟头才开。聂赫留朵夫原想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去他姐姐那里一趟，可是现在，他觉得极其兴奋、疲劳，脑子里今天上午的种种印象，令他感慨万千。当他在头等客车候车室一张小小的长沙发上坐下时，更是感到十分困倦，他刚刚侧着身子躺下，把一只手心垫在脸颊底下，就立刻睡着了。

一个穿着礼服、胸前戴徽章、胳膊上搭着餐巾的仆从唤醒了他。

“老爷，老爷，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吗？那边有位太太在找您呢。”

聂赫留朵夫猛地跳起来，揉了揉眼睛，这才明白他是在什么地方，想起来今天上午发生的那些事情。

那些在他的头脑里留下的印象是：拥挤的犯人的队伍，几个死人，装着铁窗的车厢和被关在车厢里的女囚，其中一个还在分娩的阵痛中，无人照顾，另一个在铁栅后面对他凄苦地微笑。可是此时在他面前出现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景：一张宽大的桌子，上面摆放着酒瓶、花瓶、美丽的大烛台和餐具，几个伶俐的仆从在桌子旁边侍候客人。候车室深处有个柜台，柜台里面一个侍者站在酒架前，柜台上放着许多果盘和酒瓶，旅客都背朝外站在柜台前。

聂赫留朵夫刚把躺在沙发上的姿势改为坐起，头脑渐渐清醒过来，却发现房间里所有的人都好奇地瞅着门口。他也往那边望过去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这才瞧见一大班人抬着一把圈椅走进来，一位头上包着轻纱的太太坐在上面。走在最前面抬圈椅的那个听差，聂赫留朵夫看着觉得很面熟。在最后面的那个戴着镶金绦制帽的看门人，聂赫留朵夫也认识。圈椅后面跟着一个头发髻曲、装束优雅的女仆，她身上系着小围裙，手里提着一个包袱，一个装着什么东西的、圆滚滚的皮盒子和几把阳伞。再后面就是头戴旅行帽的科尔卡金公爵，他生着两片厚嘴唇和容易中风的脖子，胸脯挺起着。随后是米西和她的表哥米沙，另外还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那个脖子细长、喉结突出的外交官奥斯登，他的脸色和心情总是很快活。他一面走，一面郑重其事地用开玩笑的口气同微笑的米西讲话。最后是吸着烟的医师，神情却颇为气愤。

科尔卡金一家人正在从他们城郊的庄园搬到公爵夫人姐姐的庄园里去。那个庄园就在通往下城的铁路线上。

抬着圈椅的仆从、侍女和医生依次走进女客候车室，他们引起在场的所有人的好奇和尊敬。老公爵在桌旁一落座，马上把茶房叫到跟前，向他点了一些酒菜。米西跟奥斯登也在餐厅里站住，刚想坐下，突然看见门口有个熟悉的女人，就向她走去。她原来就是娜塔莎。娜塔莎在阿格拉斐娜陪同下走进餐厅，不停地四下张望。她差不多同时看见了米西和弟弟。她只是向聂赫留朵夫点点头，先朝米西走去。不过她同米西互吻以后，马上转身对弟弟说话。

“我终于找到你了。”娜塔莎说。

聂赫留朵夫站起身来与米西、米沙和奥斯登打招呼，站住与他们谈话。米西告诉聂赫留朵夫他们乡下的房子着火、迫使他们搬到姨妈家去的事。奥斯登才趁此机会开始讲一个同

火灾有 关的笑话。

聂赫留朵夫不再听奥斯登说，转过身同姐姐谈话。

“你能来，我真是非常高兴了。”他说。

“我早就来了。”她说，“我是和阿格拉斐娜一同来的。”她指了指阿格拉斐娜道，那个女管家头上戴着帽子，身着防雨布大衣，显不出亲切而稳重的神态，羞怯地在远处向聂赫留朵夫鞠了一躬，不想打扰他们的谈话。“我们正在到处找你。”

“而我却在这儿睡觉。我真高兴，你来了，”聂赫留朵夫又重复了一遍，“我刚才已经动笔给你写信了。”他说。

“真的吗？”她惊恐地说。“你准备写什么呢？”

米西和她的男伴看到姐弟两人有私事要谈，就退到一旁了。聂赫留朵夫和姐姐在挨窗的小丝绒长沙发上坐下来，长沙发上还放有别人的行李、方格毛毯、帽盒。

“昨天我从你们那儿出来以后，本想回去道个歉，但我不知道他会如何看待这件事。”聂赫留朵夫说。“我很难过我同你丈夫谈话不投机。”他说。

“我知道，”姐姐说，“我相信你并非有意那样的。你一定知道……”

她的眼眶噙满了泪水，她伸出手来碰了碰他的手。她最后那句话表述得并不明确，但他显然已充分领会了，并为她所要表达的那种意思感动。她的话包含着如下的意思：她除了对丈夫抱有满腔的热爱以外，她对弟弟手足之情的热爱，也是重要而宝贵的，因此他们之间的任何裂痕，对她都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谢谢，谢谢你……哎，你不知道，今天我看到了什么样的事啊。”他忽然想起第二个死掉的犯人，于是说。“有两个犯人被害死了。”

“怎么会被害死的？”

“天气这么热，还把他们押出来。有两个就这样中暑死了。”

“那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呢？今天吗？就在刚才吗？”

“是的，就是刚才。我亲眼看见他们的尸身。”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被害死呢？是什么人把他们害死的？”娜塔莎问。

“就是那些硬要把他们押解出来的人。”聂赫留朵夫充满愤怒地说，感到她对这事也是用丈夫那种眼光来看的。

“噢，我的上帝！”阿格拉斐娜走到他们身边，说。

“不错，这些可怜的人曾被怎样对待过，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但我们肯定是应该知道。”聂赫留朵夫看着老公爵说。老公爵这时已经在脖子上围好餐巾，坐在放着一瓶混合酒的桌身旁，转过头来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

“聂赫留朵夫！”他喊道，“过来喝一点解解暑气怎么样？出门之前喝一点最好不过了！”

聂赫留朵夫婉言谢绝了，转回身来。

“但是你到底想要怎么办呢？”娜塔莎接着问道。

“尽我的最大努力去做。我还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总觉得应该做些事。我一定用我的全部能力去做。”

“是的，你说的不错，这我了解。可是，你和这一家人，”她微笑着看了看科尔卡金，说，“莫非就真的断绝往来了？”

“完全断绝了。我认为，这样我们两方面都不会感到遗憾的。”

“可惜。我觉得很遗憾。我喜欢她。唔，即便是这样吧那你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娜塔

莎低声胆怯地说，“你有什么必要一起去呢？”

“只是由于我应该走一走。”聂赫留朵夫严肃而冷淡地说，仿佛不再想再谈这事。

不过他立刻很羞愧于自己对姐姐的冷淡。“我何不把我所有的想法都告诉她呢？”他暗想。“干脆让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也听一听好了。”他瞅了老女仆一眼，自言自语道。有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在场，倒让他下定决心对姐姐重说一遍自己的想法。

“你是指我打算跟卡秋莎结婚这事吗？然而，你看，我倒是决定这样做了，而她明确而坚定地拒绝了我。”他声调发抖地说，每逢他说到这件事，他的声调总要发抖。“她不愿意接受我的牺牲，反倒愿意自我牺牲，而对于现在的她来说，她做出的这种牺牲太大了。我不能接受她这种牺牲，倘若这种牺牲只是一时冲动的話。所以我打定主意跟着她去，她走到哪儿，我也跟到哪儿，而且我要尽我所能帮助她，减轻她的苦难。”

娜塔莎·伊万诺夫娜沉默不语。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则用疑问的眼光看了看娜塔莎·伊万诺夫娜，又摇摇头。这时候，刚才那班人又从妇女候车室里走出来，仍旧由英俊潇洒的听差菲利普和看门人抬着公爵夫人。她吩咐抬她的人停下来，招手要聂赫留朵夫走到她身边去，露出疲惫万分的可怜模样，对他伸出一只戴满戒指的白手，惊恐地等着他有力的一握。

“真要命！”她说，指的是炎热的天气。“这真叫我受不了。我可真被这种天气折磨坏了。”接着，她谈了一会儿俄国气候的可怕，又邀聂赫留朵夫上她家里去玩，再对那些抬圈椅的人做了个手势示意他们继续赶路。“您可一定要来哟。”她坐着圈椅往前走的时候，又转过她那张长脸来朝聂赫留朵夫补充一句。

聂赫留朵夫走出候车室来到站台上，公爵夫人的一群人向右拐了个弯，朝头等车厢走过去。聂赫留朵夫和运行李的脚夫和背着背包的塔拉斯一同走向左边。

“哦，他是我的同伴。”聂赫留朵夫指了指塔拉斯对姐姐说，有关塔拉斯的事情他前一次已向姐姐说过了。

“莫非你真的要坐三等车吗？”娜塔莎看到聂赫留朵夫站在三等车厢跟前，脚夫提着行李同塔拉斯一块走进那节车厢，问道。

“不错，这样对我方便些，我和塔拉斯结伴而行，”他说，“噢，还有一件事要和你谈一下，”他补充说，“我现在还没有把库兹明斯科耶的土地分给农民，要是我死了，就让你的几个孩子继承吧。”

“德米特里，不要讲这样的话。”娜塔莎说。

“即便我将那些地分给了农民，我也要说明清楚这件事，就是我其余的财产都将由他们继承，因为我怕是不会结婚，即便结了婚也不会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里，我求求你，不要讲这样的话。”娜塔莎说，可是聂赫留朵夫却看出来她听到这些话暗自高兴。

在前面的头等车厢跟前，围着一小群人，仍然看着抬进科尔卡金公爵夫人的那节车厢。其他的人都已经到了各自座位上。匆匆走过几个迟到的乘客，他们踩着站台的木板嘎嘎作响。列车员猛地关上车门，请乘客坐好，请送行的人下车。

聂赫留朵夫走进车厢，那里被太阳晒得又热又臭，马上又走出来站到车尾的小平台上。

娜塔莎戴着一顶时髦的帽子，披着披肩，和阿格拉斐娜并肩站在车厢跟前，显然想找话题，但又找不到。她觉得连说一句“写信来。”都不可以，因为她和弟弟以前就嘲笑过给人送行的那套老话了。一说到财产和继承的事儿，他们的姐弟之情就被破坏了；他们觉得互

相疏远了。等到这列火车开动，她只是点了点头，表现出惆怅而亲切的神色说：“哦，再见，德米特里，再见！”这时，她心里却感到轻松愉悦了。可这节车厢刚刚开过，她就记起她该如何把与弟弟交谈的话告诉丈夫，她的神情立刻变得严肃并且紧张了。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姐姐抱着极其善良的感情，而且从没对她隐瞒过什么事情，可是现在与她待在一起，却觉得郁闷难受，只盼望着早一点离开。他感到当初与他那么亲近的娜塔莎现在已经消失了，她已变成了一个与聂赫留朵夫极不相容的、面目可憎、肤色发黑、胡子拉碴的丈夫的奴隶。他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因为当聂赫留朵夫一讲起她丈夫所关心的话题，也就是讲起是否把土地交给农民和给他们继承的问题时，她的脸色顿时就鲜亮起来，异常兴奋。这使得他感到尤为凄凉。

四十

三等客车的大车厢，经太阳晒了整整一天，又是满满的一车厢人，闷热得几乎使人无法喘气，聂赫留朵夫干脆不走进车厢，一直站在车尾的小平台上。可是即使在小平台上也呼吸不到什么新鲜空气，直到这列火车启动，脱离了四周房屋的包围，车厢里有了穿堂风，聂赫留朵夫才张开整个胸膛深吸了一口气。

“不错，他们正是被害死的。”他自己重复了一遍向姐姐讲过的话。今天他的头脑里被各种印象充满了，这时却非常清楚地回忆出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好看的脸和他那挂着微笑的嘴角、严肃的额头、剃得发青的头皮的头盖骨和头盖骨下很小的结实的耳朵。“最为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可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害死了他，但他的确是被害死了。他也和其他犯人一起，是按照巴斯连尼科夫的命令给押解出来的。可是巴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不过用他丑陋的花体字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签上名，他当然认为自己理应不承担责任。那个专门为犯人检查身体的监狱医生则更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他严格执行自己的责任，剔出体弱的犯人，根本没有想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押解出来又那么晚，并且不得不那么紧紧地拥挤在一起。而典狱长呢？……典狱长只是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若干的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打发上路而已。押解官也一样的没有责任，因为他的责任不过是按名册点收那些犯人，再到一个地方再点交出他们来。他照例按照规定把那些犯人押解上路，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像聂赫留朵夫见到的那样两个健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掉。谁也不应承担责任的，可是有人却被活活害死，并且归根到底是被这些对那些人的死不应承担丝毫责任的人害死的。

“这样的事之所以会发生，”聂赫留朵夫心想，“就是因为所有那些人无论省长，狱长，还是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种使得人们无须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局势。说实在的，所有那些人，无论马斯连尼科夫，还是狱长或押解官，所有那些人，倘若他们没有做省长、狱长、军官，他们也会翻来覆去考虑二十次：这样炎热的天气能够让人们排成如此拥挤的队伍上路吗？他们即使上了路，至少也得停下来二十次，如果看见有人变得衰弱，呼吸急促，也会把他从人群里带出来，送到阴凉的地方去，给他水喝，叫他休息一下。如果发生了不幸，他们也会表现他们的怜悯。现在他们没有这样做，甚至不允许别人这样做的原因，完全是由于他们认为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人，他们心目中没有对人应有的责任感，他们眼里只有官职和这种官职的要求，把这些东西看得高于人与人的关系和要求。这就是问题的症结。”聂赫留朵夫暗自思忖。“只要承认有那么一种东西，不论是什么东西，比爱人之心更重要，那么哪怕只承认一个钟头，而且是在某种独特情况下承认，那么损害别人的

任何一种罪行都可以干出来,而且干出来时还自以为无罪呢。”

聂赫留朵夫低头思索着,都没有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前面低垂的云朵遮住了太阳,从西方地平线那里涌出来一大片浓密的浅灰色雨云。远处田野和树林上空已经下起了倾斜的大雨。随着雨云飘过来湿润的空气。不时的闪电划开灰云,刺耳的雷鸣与列车越发急促的轰隆声交响成一片。雨云越来越近,斜雨开始落在车尾的小平台上,也落在聂赫留朵夫的薄大衣上。他走到小平台的另一边,呼吸着湿润而又清新的空气和久旱待雨的土地散发的作物清香,看着眼前掠过的果园、树林、正变得发黄的黑麦地、依然碧绿的燕麦地和黑色田畦上正在开花的深绿色土豆。大地万物都仿佛被涂了一层清漆,绿的益发翠绿,黄的变得金黄,黑的更黑了。

“再下一些,再下一些吧!”聂赫留朵夫说,看到田野、果园、菜园在天降甘霖后生意盎然,心里不由得非常高兴。

这场大雨下的时间并不长。雨云有一部分随着雨落下来,有一部分飘走了。最后直着落下来的、洒在潮湿的土地上的,只是暴雨后残留下来的蒙蒙细雨。太阳又出来了,一切东西都闪闪发亮。东方地平线上架起一道长虹,位置不高,颜色鲜艳,紫色尤其明显,可惜长虹的一端有些残缺。

“哦,刚才我在想什么来着?”聂赫留朵夫自言自语,这时候自然界的种种变化已经结束,火车正在往下走,驶入一道两旁都是很高斜坡的山沟。“对了,我在想:所有那些人,狱长啦,押解官啦,所有那些担任官职的人,原本都是温和善良的人,但因为担任了官职才变得凶恶可憎。”

他回忆起他谈到监狱里各种情景时巴斯连尼科夫那种漠然的神情,想起典狱长的严厉以及押解官的残酷,想起押解官竟不允许病弱的犯人搭乘大车,也不理睬临产的女犯在火车上痛苦哀叫。“这些人全部都是铁石心肠,对别人的苦难无动于衷,不过是因为他们当着官。他们一旦成了官,心里就再也不含仁爱人的感情,就像雨水渗不进石砌的地面一样。”聂赫留朵夫看着山沟两旁各种颜色石头砌成的陡坡想。他看着雨水渗不进地里去,却汇合成一股股水流淌下来。“或许山沟两边的斜坡必须用石头砌,可是这些土地本来应该能同坡顶上土地一样,让庄稼、青草、灌木、树林生长,现在却不生寸草。这景象看了真让人痛心。人也是一样,”聂赫留朵夫思索着,“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或许都必须有,可是看到这些人丧失了人的主要品质,也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怜悯,那真是太可怕的事!”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聂赫留朵夫心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看成法律,却不承认由上帝亲自刻印在人们心灵上的那种永恒的、不可更改的、不能违背和抛弃的戒律才是法律。也正因为此,我才跟那些人没法相处得融洽。”聂赫留朵夫想道。“我几乎有些怕他们了。他们倒也确实可怕。比强盗还要可怕。强盗毕竟还懂得怜悯人,但那些人却不懂。就象他们跟怜悯绝了缘,正如石头跟植物绝了缘一样。他们因此让人感到可怕。人们说普加乔夫和拉辛之类的人是可怕的。事实上那些人比他们更可怕。”他继续想道。“假如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说是应该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那些基督徒、人道主义者、单纯善良的人,采取最残暴的行动而又不认为自己有罪,那就只能有一个答案,也就是必须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必须让那些人去当省长、狱长、军官、警察。这也就是说,

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国家官职，从事这种工作就可以把人当做物品一样看待，人与人之间无须保持亲如手足的关系；第二，要那些担任国家官职的人串通一气，这样他们就不必单独承担他们对人们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假如没有这些条件，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可能发生像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们承认世界上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不必心存一份爱意，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对待物品可以不必心存爱意，例如砍树，造砖，打铁等等，可是对待人就不能不心存爱意了，这正如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蜜蜂的本性决定了你就得如此。倘若你不小心地对待它们，你就会伤害它们，同时也伤害了你自己。对待人也得如此。而且也不能不如此，因为人与人之间互敬互爱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诚然，人不能强制别人爱自己，像强制别人为自己工作那样，然而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人与人之间不必心存爱意，尤其是在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假若你对别人没有爱心，那你就老老实实坐着好了。”

聂赫留朵夫自言自语道：“你就自己顾着自己，干些活，就是不要去同人交往。只有肚子饿了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相同地，只有当你充满爱心的时候，去跟人交往才会有益无害。只要你纵容自己不带爱心去对待别人，就如同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亲眼看到的种种对他人的残酷行为就会无穷无尽，我这辈子所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苦，也会无穷无尽。对啊，对啊，就是这么回事。”聂赫留朵夫想。“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不停地对自己说，感觉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因为酷热之后凉快下来了的天气，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缠绕在心头的问题突然得到了解答。

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所坐的那节车厢只坐了一半的旅客。

他们的身份各异，有仆役、作坊工人、工厂工人、肉铺老板、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妻子。还有一个士兵，两个太太，其中一个较年轻，另一个却上了岁数，裸露的胳膊上戴着好几只手镯。此外车厢里还有一个戴着佩有帽徽的黑制帽的神情严肃的老爷。所有这些人都已经找到座位，心情安宁下来，悠闲地坐着，有的在嗑葵花子，有的在吸纸烟，有的正同邻座乘客热闹地闲谈。

塔拉斯神情欢愉地坐在过道右边的一条长椅上，给聂赫留朵夫留了一个座位。

他兴奋地与对面一个乘客交谈着。那人敞着乡下的粗呢上衣，肌肉发达。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名花匠，正乘车去外地工作。聂赫留朵夫在距塔拉斯还有一段距离的一个神态庄重的老头儿旁边停下来了。那老人长着雪白的大胡子，穿着一件腰部打褶的土布长袍，正与一个乡下装束的年轻女人谈话。这女人身旁坐着一个七岁左右的小女孩。小女孩身穿一件崭新的无袖长衬衣，浅得像是白色的头发被扎成一根辫子，她的脚高高地晃着，嘴里一直在嗑着葵花子。老人转过头来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撩起长袍前摆，从磨得发亮的长凳上让出一个位置，热情地说：

“您请坐吧。”

聂赫留朵夫道了谢，在让给他的位子上坐了下来。聂赫留朵夫刚坐定，那个女人就继续讲被打断了的话题。她讲的是她丈夫在城里如何招待她，现在她正是从丈夫那里回乡下去。

“先前在谢肉节我到他那儿去过一趟，托上帝的福，现在我又去了一趟。”她说。“往后，

求上帝保佑，到圣诞节我还要去呢。”

“这是好事，”老人看聂赫留朵夫一眼，说，“你应该常去看看他，否则一个年轻人住在城里，是极容易学坏的。”

“不，老大爷，我们当家的可不是那样的人。他从不胡来，像个大姑娘一般规矩呢。他把所挣的钱全都寄回家，自己一个子儿也不留。他见了我们这个小妞儿就高兴。别提多么高兴了，”女人说道。脸上笑意盎然。

小姑娘一边吐着葵花子壳，一边听母亲讲话，就像在证明母亲的话，她用那双聪明文静的眼睛看了看老人的脸，又看了看聂赫留朵夫的脸。

“看起来是个聪明人，再好不过的了。”老人说。“那么，他不喜欢这东西吗？”他补充了一句，把眼睛朝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两夫妇示意了一下。他们可能都是工厂里的工人。

那个丈夫把嘴对住一瓶伏特加的瓶口，抬起头，喝着酒；当妻子的手里拿着装酒瓶的袋子，眼睛盯着丈夫。

“不，我丈夫既不喝酒，也不吸烟。”跟老人交谈的那个女人答道，逮住机会接着夸耀自己的丈夫。“像他那种人，老伯，可以说天下少见。喏，他就是这种人。”她又转回身来跟聂赫留朵夫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老人瞧了瞧喝酒的工人，又说一遍。

那个工人凑着酒瓶喝了几口，就将酒瓶递给他的妻子。妻子接过酒瓶来，笑呵呵地摇摇头，把酒瓶也凑近嘴边。工人发觉聂赫留朵夫和老人盯着自己，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

“怎么了，老爷？看我们喝酒呢？我们干活的时候，谁也没瞅见，现在我们一喝酒，大家可是都瞧见了。我干活挣下了钱，自己喝一口，也请我的老婆喝一口。就这么简单。”

“是啊，是啊。”聂赫留朵夫说，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说的没错吧，老爷？我的老婆是个规规矩矩的女人！我对我的老婆挺满意，因为她懂得疼我。是不是，玛芙拉？”

“行了，喏，你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他。“你又嚼什么嘴呢。”她补充一句。

“你瞧，她就是这个样子，”工人接着说，“她一会儿挺好的，一会儿又吱吱嘎嘎地没完了，就像没上油的大车似的。玛芙拉，我没说错吧？”

玛芙拉格格地笑着，带着酒意挥了挥手。

“口害，他又瞎说起来……”

“嗯，她老是这样子。当然好，可只是一时的。要发起牛脾气来，没什么事干不出来的……我说的可全是老实话。老爷，您可得担待着点。我喝了些酒，嗯，现在怎么办呢？……”工人边说着边躺下来打瞌睡，把头枕在微笑着的妻子的腿上。

聂赫留朵夫又与老头儿一同坐了一会儿。老头儿谈起他的情况，说他当了五十三年的砌炉匠，这辈子砌的炉子不知道有多少，想歇一下，可老是没有时间。这次他在城里，为孩子们找到了活儿，现在回家去看望家里人。聂赫留朵夫听老头儿说完话，站起身来，赶回塔拉斯为他留的座位那里。

“噢，老爷，您坐。我把背包放到这边来。”坐在塔拉斯对面座位的花匠仰起头来看了看聂赫留朵夫的脸，热情地说。

“不怕挨挤，就怕挨气，”塔拉斯快活地唱着歌似的说，随后伸出两条有力的胳膊把大约有两普特重的袋子举鸿毛似地轻轻举起来，挪到窗口。“地方多着呢，站着也可以，钻到椅

子下面去也可以。这儿却是最太平的，没有人吵架！”他笑容满面，和气亲切地说。

塔拉斯谈到自己时，总是说：不喝酒就没有话说，一喝酒可就有好多话要说了，而且能说个不停。确实如此，在清醒的时候，塔拉斯大半总是默默无语，喝了酒才谈笑风生，但是喝酒对他而言是极其难得的，他只有偶尔在特殊情况下才喝一点。在那些特殊情况下的话常说得多又好，而且十分朴实真诚，十分亲切，这种亲切也时常洋溢在他那对善良的浅蓝色眼睛里，闪耀在不离他唇边的殷勤笑意里。

今天他就是处于这种状态。聂赫留朵夫走过来，他暂时住了嘴。但是当他把背包放好以后，就又照刚才那样坐下，将两只干惯农活的、有力的大手搁在膝盖上，坦诚地瞧着花匠的眼睛，继续他的谈话。他在对他的新朋友详细地讲他妻子的事，讲她为什么被判处流刑，讲自己为何要跟她一块儿到西伯利亚去。

聂赫留朵夫从来也没有听过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因此他现在认真地听着。他听的时候，塔拉斯正讲到下毒的事已经发生了，他家里的人已经搞清楚这件事是费多霞干的。

“我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亲切地转过脸来对聂赫留朵夫和善地说。“我恰巧碰上这么个热心肠的朋友，就聊了起来，我也就讲起我的事来了。”

“讲吧，讲吧。”聂赫留朵夫说。

“嗯，老兄，这件事就这么被发现了。我妈那时拿着那块馍说：‘我去报告警察。’我爹是个仁慈大度的老头儿。他说：‘等等，老太太，这小姑娘还是孩子，她自己也不明白干了什么，咱们得饶恕她。说不准她会改过来的。’但是没什么用，我妈听不进一句话。她说：‘要是我们让她留下，她就会把咱们像蟑螂那样全部给害死的。’老兄，她说完就跑去叫来警察，警察立刻冲进我们家里……接着就把证人都传了去。”

“那，你那时怎么样呢？”花匠问。

“我吗，肚子痛得一个劲儿打滚，嘴里还呕吐个不停，吐得肠胃都翻过来，说不出一句话。我爹马上套好马车，让费多霞坐上去，就跑到警察局，又从警察局到法官那里。她呢，老兄，一开始就全都服了罪，然后又向法官一五一十招认了。

她从哪儿搞来的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面饼里，她一五一十全说了。法官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回答：‘就因为我讨厌他。我宁愿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想跟他一块儿过。’她这时说的是不想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含笑说道。“就这样，她全盘招供了。当然，她被关进了监牢。我爹就一个人回到家。这当儿，正是干农活的时候，可是我们家里却只有我妈一个娘儿们，而且她还气力不济。我们寻思：这可如何是好，能否把她取保放出来呢。我爹就去找当官的，找了一个，不成，就再找一个。他接连这么找了五个。我们正准备放弃希望了，没想到又碰上一个衙门里的小官儿。那家伙非常机灵，简直天下少有。他说：‘你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后来讲了讲价，三个卢布谈定了。这样，大哥，我就把她织的粗麻布抵押出去，把钱给了他。他噼里啪啦就写好了公事，”塔拉斯拖着长音说，仿佛讲的是开枪似的，“一眨眼的功夫就写成了。然后我赶紧站起来，亲自驾车到城里去接她。大哥，我就到了城里。我将那匹母马在客栈里拴好，拿着那个公事直奔监狱。他问：‘你有什么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一遍，谈我的老婆就关在你们这儿。他说：‘有公事吗？’我赶紧把手里的公事递给他。他看一遍，就说：‘你等一会儿吧。’我就在那儿一条长凳上坐下。时间已经过了中午。一个长官走出来，问：‘你就是瓦尔古绍夫吗？’我说：‘是的。’他说：‘那么，你把她接回去吧。’大门立刻开了。她给押了出来，穿着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行了，咱们走吧。’我说。她就问：‘难道你是走着来的？’我说：‘不，我是赶着车子来的。’

于是我们走到客栈，付清了钱，把那匹母马套上车子，将剩下的干草铺在大车上，盖了一块麻布。她上车坐好，扎上头巾后，我们就坐着车子走了。一路上她一声不吭，我也一语没发。直到我们快要到家了，她才说：‘怎么样，妈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又说：‘那么爹呢？’我说：‘也没事。’她就说：‘塔拉斯，你要原谅我干的糊涂事。当时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在做什么。’我就说：‘没必要再说这些了，反正我早就原谅你了。’别的话我也没再说。我们到了家里，她立马跪在我妈面前。我妈说：‘请上帝饶恕你吧。’我爹跟她打招呼，说：‘干嘛还提旧事呢。你好好地过日子吧。目前也没时间再讲这些，’他说：‘现在该下地收庄稼了。在斯科罗德诺耶那边，’他说：‘那块黑麦地上过肥，靠上帝保佑，长势真不赖，穗子跟穗子缠在一块儿，一大片一大片地倒在那儿，连镰刀也下不去。如今该去收割了。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一块儿去吧。’大哥，从那时候起，她就动手干活。她干得那么带劲，让大家瞧着都吃惊。那时我们家里租了三俄亩地，靠上帝保佑，无论黑麦还是燕麦，都是少见的大丰收。我割麦，她打捆，要不就我们俩一块儿割。我干活利索，勤快得很，她呢，不管动手干什么活，比我还麻利得多。她是个很年轻的娘们儿，聪明伶俐，筋强力壮。老兄，她干活简直是拼命，我只好让她停一会儿。我们干完活回到家，手指头都肿了，胳膊又酸又痛，该歇一阵儿才行，可是她连晚饭也顾不得吃，就跑到仓库里，打第二天用的草绳。她可真是变了个人似的！”

“那么，她和你要好了吗？”花匠问。

“那还用问嘛，她同我可真是太知心了。我心里打算什么，她都明白。我妈本来是很生她的气，可连她也说：‘我们的费多霞像是被人掉了包，换了个人似的。’有一回我俩赶两辆车运装麦捆，我和她一块儿坐前面那辆车。我就问她：‘费多霞，那时你怎么想起干那种事来？’她回答说：‘我怎么想起干出那件事来？就是想不跟你一块儿过罢。我想好了，我宁愿死，也不愿跟你一块儿过。’我就问：‘那现在呢？’她说：‘现在啊，现在你可成了我的心上人了。’”塔拉斯停一会儿，露出快活的笑容，然后疑惑地摇了摇头。“我们从地里干活回来，把大麻浸在水里，刚一到家，”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哪想到，法庭传票来了，要开庭审判。但是我们已经想不起为什么要审判她了。”

“这肯定是鬼附上身了，没有别的，”花匠说，“莫非一个人自己会没有缘故地去害死别人吗？对了，我想起我们那里有过这么一个人……”花匠刚想开始讲故事，可是火车到了站。

“好像到车站了，”他说，“咱们到外头去喝点什么吧。”

谈话到此中断了。聂赫留朵夫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月台上湿漉漉的木板上。

四十二

聂赫留朵夫还没走出车厢，就已经注意到车站广场上停着几辆华丽的轻便马车，有套着四匹马的，有套着三匹马的，马儿都膘肥体壮，脖子上还系着叮当直响的小铃铛。

他走出车厢站到被雨淋得潮湿发黑的站台上，立刻就看到头等车厢旁站着一群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高高胖胖的太太，头戴插着珍贵羽毛的帽子，身披雨衣；还有一个高高的青年，双腿细长，穿一套骑自行车时的衣服，手里拉着一只脖子上套着珍贵颈圈的壮硕的大狗。几个仆人站在他们后面，手上拿雨衣雨伞，还有一个马车夫，都是来接客人的。这一群人，无论是胖太太还是手提长袍前摆的马车夫，全都显得生活优裕，怡然自得。在这群人周围立刻围了一批过于好奇、有拜金癖的人，其中包括戴红色制帽的站长、一个宪兵、一个身穿俄罗斯民族服装、脖子上戴项链、夏天里只要有火车到站肯定会赶来凑热闹的瘦姑娘、电报员和一些男女乘客。

聂赫留朵夫认出那个牵着狗的年轻人就是在读中学的科尔卡金家少爷。

那位胖太太正是公爵夫人的姐姐，科尔卡金一家人就是准备搬到她的庄园去。身穿金绿闪亮制服，脚蹬亮晃晃皮靴的列车长，拉开车厢门，而且为了表示恭敬，一直用手拉住那扇门，好让菲利普和系着白围裙的搬运工小心地抬着长脸的公爵夫人的那把可以折叠的圈椅走出 来。两姐妹见了面，暄寒问暖之后，传来一阵法语，他们在商量公爵夫人究竟是坐轿车好还是坐篷车好，然后这个队伍以头发鬈曲、手里拿着阳伞和帽盒的使女殿后，往车站出口走去。

聂赫留朵夫不想同他们再次相见，再告别一次，就停住，等那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走出车站。公爵夫人同儿子、米西、医师和女仆走在前面，老公爵与他妻子的姐姐跟在后面。聂赫留朵夫站在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只能听到他们用法语交谈的只言片语。在公爵所说的话中，不知怎么回事有一句——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常发生的——连同他讲话时的腔调和声音都深深印进聂赫留朵夫的记忆中了。

“啊！他可是个真正的上等人，是个真正的上等人。”公爵用洪亮并且自信的语调谈着什么人，在恭恭敬敬的列车员和脚夫的簇拥下，同他的妻姐一块儿走出车站。

正在这时，车站的拐角处出现了一群不知从何而来的工人，他们背着羊皮袄和背包，脚穿 树皮鞋，正走向月台。工人们迈着坚定矫健的步伐走到离他们最近的一节车厢跟前，准备上去，但马上就被站在车厢门口的列车员赶走了。那些工人没有停住脚步，急急忙忙地继续往前走，踩着彼此脚，来到旁边的一节车厢，准备上车，他们的背包不时地撞在车角和车 门上，不料在车站出口另外一个列车员看见他们想上车，就冲他们严厉地叫嚷起来。上车的工人又立刻慌忙地退下来，迈开坚定矫健的步伐走到下一节车厢，也就是聂赫留朵夫乘坐的那节车厢。但又被列车员拦住。他们停住脚，准备再往前走，然而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们车厢里有空位置，他们自管上去好了，工人们听了他的话，纷纷上了车。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工人们正想分头找座位，可是那个戴着佩有帽徽的帽子的老爷和两个太太，看见他们竟想在车厢里坐下，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极端不尊重，于是坚决反对，想动手将他们赶出去。

这些工人有的年纪很老，有的年纪很轻，大约共二十人左右，全都又黑又瘦，风霜满面。他们被老爷太太驱赶，显然认为自己犯错了，立刻穿过车厢继续向前走，他们背上的背包不停地撞着车座、板壁和车门。他们的神情像是准备走到海角天涯，坐到人家让他们坐的任何地方，即使是坐到钉子上也行。

“你们往哪儿闯去，鬼东西！就在这里找个位子坐下！”另一个列车员朝着他们走来，喊道。

“Voilà encore des nouvelles！”那两个太太中较年轻的一个说，非常自信自己那口流利的法语会引起聂赫留朵夫的注意。另一个戴着手镯的太太只是耸起鼻子嗅来嗅去，皱起眉头，嘴里唠唠叨叨，抱怨说跟这些臭烘烘的乡巴佬坐在一块儿可真是得益匪浅。

可是工人们却象那些度过重大危险的人们一样，感到欢乐和安心，停下脚步，纷纷找座位坐下，动一肩膀抖落背上沉重的背包，并把它塞到长椅底下。

同塔拉斯交谈的花匠坐的不是他自己的位子，这时候就回到他自己的位子上去。这样一

来，塔拉斯的身旁和对面剩下三个空座位。三个工人在这些空位子上坐下了，但是当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他们一看见他那身阔老爷的装扮就紧张起来，并立即站起来想走掉，然而聂赫留朵夫让他们坐在那儿别动，他自己在靠近过道的座位的扶手上坐下来。

那些工人中，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头与一个年轻的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露出困惑得几乎是恐惧的神情。聂赫留朵夫不仅不像其他做老爷的那样对他们呼来喝去，赶走他们，相反却让座给他们，这让他们感到很惊讶，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甚至担心最后是不是会发生什么对他们不利的事。但是，他们看出并没有什么阴谋诡计在这件事里面，聂赫留朵夫也很随便地同塔拉斯谈话，他们才放心起来，吩咐一个小伙子坐在自己的背包上，请聂赫留朵夫坐回自己的位子上去。那个年纪很大的工人起初畏畏缩缩的坐在聂赫留朵夫对面，使劲缩起穿着树皮鞋的脚，以免碰到老爷的脚，可他后来与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谈得很投机，当他希望聂赫留朵夫注意自己说话的时候，还伸过手背碰一碰聂赫留朵夫的膝盖。他谈起有关自己的各种情况，谈到在泥炭田的活儿。原来他们在泥炭田里工作了两个半月，每人差不多挣了十个卢布——有一些工资在自己被雇时已经先付了，——他们现在就是带着工钱回家去。据他说，他们总是在没膝深的水中干活，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只中午吃饭时休息两小时。

“当然，那些没有干惯这些活儿的人，都觉得很苦，”他说，“但只要干熟了，也就无所谓了。不过伙食必须得好。最初伙食很差。得，后来大家发脾气了，伙食才有所改善，干活也就轻松了。”

接着他讲到，他已在外做了二十八年的工，总是把他挣来的工钱统统寄回家去，从前是交给父亲，后来是交给哥哥，现在是交给当家的侄子。他一年挣五六十卢布，自己只留下两三卢布花，找点乐子，也就是买点烟叶和火柴。

“我也有点不好，有时太疲劳了，我也还要喝一点白酒呢。”他歉疚地微笑着，补充了一句。

他还讲到男人出门在外，女人得如何当家，又讲到今天启程以前包工头怎样请他们喝了半桶白酒，讲到他们这班人中已经有一个死掉了，另一个生了病，现在由他们送回家去。他提及的那个病人就在这个车厢的角落里。他还是个年纪很小的孩子，脸色灰白，嘴唇发青。显然他害的是热病，至今还没有退烧。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但那个男孩瞅了他一眼，眼光是那么严厉，那么痛苦，弄得他不便于打搅他，不便于问他话。聂赫留朵夫只能劝那位老人买些奎宁来给他吃，并且将药名写在一张小纸片上交给他。聂赫留朵夫还想给一些钱，可是那位老工人拒绝了，说他自己有钱去买。

“哦，我出过许多次门，像这样的老爷还没有看到过。他不但不揍你，还给你让位子。所以老爷也不是全都一样。”他总结似的对塔拉斯说。

“对啊，这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地，一个全新的天地。”聂赫留朵夫看着这些筋骨强壮却又骨瘦如柴的四肢、他们粗糙的土布衣服，以及黧黑、疲惫而热情的面庞，心里想着，同时感到他周围这些人们，过的才是真正的劳动者的生活，他们才具有严肃的乐趣、喜悦和苦痛，他们才是完完全全的新人。

“看，他们才真正是上等人。”聂赫留朵夫想到科尔卡金公爵说过的这句话，也想到了科尔卡金之类的那个无所事事、奢侈糜烂的世界以及他们无聊可怜的兴趣。

他就像一个旅行者，找到了一个陌生而美丽的新世界，为此感到无比兴奋。

第三部

一

那批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犯人，走了差不多五千俄里路程。在到达彼尔姆之前，玛丝洛娃一直和刑事犯一块儿乘火车，坐轮船。

直到彼尔姆，聂赫留朵夫才算疏通成功，将玛丝洛娃调到了政治犯队伍当中，他这样做是因为听从了跟那批犯人同行的薇拉的主意。

从起点到彼尔姆的那段路程，玛丝洛娃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感到痛苦难耐。她肉体上的苦，是因为环境肮脏，拥挤，还有那些不容她安宁的讨厌的虫子。

精神上痛苦，是因为和虫子一样让人讨厌的男人——尽管到每一站都换一批，但是都是一样的无耻地纠缠，纠缠不清，让人得不到安宁。女犯人跟男犯人、男看守、男押解人员淫乱成风，所以一个女犯人，特别是年轻的，若是想要保护自己做女人的贞洁，就必须时刻小心戒备才行。经常处在这种恐惧和斗争中，那是很艰苦的。玛丝洛娃由于有着迷人的相貌和人人皆知的过去，更加容易受到这样的骚扰。现在她对纠缠她的男人全部坚决抗拒，这就让他们觉得受到了侮辱，他们就会变得恼羞成怒。这种情况在她与费多霞和塔拉斯密切交往后有所改善。塔拉斯得知妻子受到男人的骚扰后，就主动加入犯人队伍来保护她，所以从下城开始他就以犯人身份跟他们一块儿赶路。

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的队伍中，使她的处境在各方面都得到了一些改善。先不论政治犯的住处和伙食较流放犯好，在这里所受的粗暴待遇也比较少，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当中以后，她的处境得到改善，首先表现在她不再遭到男人的纠缠，可以安心生活，一些她目前极想忘却的往事不再有人提起。不过这次调动的主要好处，却在于她认识了几个对她起了极为良好的影响，对她的前途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人。

玛丝洛娃被允许在旅途中跟政治犯一起住，但由于她身体健康，赶路还必须跟刑事犯一块儿。她自托木斯克就开始这样步行。跟她一块儿步行的还有另外两名政治犯：一名是谢基尼娜，她也就是聂赫留朵夫到狱里看望薇拉时，他惊讶地发现的那个长着羔羊般眼睛的美丽少女；另外一名是被流放到雅库茨克省的名叫西蒙松的男犯，他浅黑的肤色，蓬松的头发，眼睛在前额下深深的凹进去，聂赫留朵夫那次探监也看到过他。谢基尼娜步行是因为让给一个怀孕的女刑事犯坐了她的座位。至于西蒙松步行，那是由于他觉得享受阶级特权是不公平的。这三人和其他政治犯不同，一大早就和刑事犯一块儿上路。另外的政治犯坐大车，要迟一点上路。这种方式一直这样保持到到达大城市之前的最后一个旅站。到达大城市，就会换一个新的押解官来接管。

那是九月间一个阴雨连绵的早晨，天色还早。天空中时而飘雪，时而落雨，还夹杂着阵阵寒风。那批犯人中男子大约四百名，妇女大约五十名。他们都已经出来，聚集在旅站的院子里，有一部分人围着押解官，他正在向犯人们的班长发两天的伙食费，有一部分人向获取了许可而走进旅站院子来的女贩们购买吃食。犯人纷纷数钱购买食物，女贩们也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人声嘈杂。

卡秋莎和玛丽亚·巴夫洛娃两个人都穿着高统皮靴和短羊皮袄，扎着头巾，从旅站的住房来到院子里，向女贩走去。女贩都坐在北面墙根底下一块背风的土地上，争先恐后地叫卖各自的货物：新鲜的面包、馅饼、鱼、面条、麦粥、牛肝、牛肉、鸡蛋、牛奶等等。有个女贩甚至在卖一头烤熟的乳猪。

西蒙松身穿一件橡胶的短上衣，脚上穿着毛袜，套着胶鞋，然后用带子扎紧（他是个素

食主义者，不用皮革制品)。他也走到院子里，等着出发。他在台阶旁站住，在笔记本里记下刚想到的话：

“如果细菌能够观察并且研究人类的指甲，它一定会认为它是无机物。因此，我们同样地观察地球外壳，并且认为地球是无机物。这也是不正确的。”

玛丝洛娃买了一些鸡蛋、一串面包圈、几条鱼和几个新鲜的白面包，将这些东西装进一个袋子，玛丽亚·巴夫洛夫娜在同女贩算账和付钱。这时候犯人们都停止了谈话，纷纷站好队。军官走出来，向犯人做出发之前的最后指示。

一切都照程序进行：清点人数，检查镣铐是否牢固，把排成双行走路的犯人们用手铐锁在一起。可是，忽然，大家听见军官的既严厉又愤怒的训斥声、殴打人的响声和小孩的啼哭声。所有的人顿时安静下来，随即人群里又响起低低的埋怨声。玛丝洛娃和玛丽亚·巴夫洛夫娜向吵闹声传来的方向走去。

二

谢基尼娜同玛丝洛娃走到吵闹的地方，看到这幅景象：一个长着很长浅黄小胡子的强壮军官，正皱着眉，左手搓揉着因打犯人耳光而发麻的右手掌心，嘴里一直地骂着难听的粗话。他前面站着一个剃着阴阳头的瘦高的男犯人。这犯人上身披着一件短囚袍，下边穿一条更短的裤子，他一只手擦着打出来血的脸，另外一只手抱着一个高声尖叫的包头巾的小姑娘。

“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军官骂了一句很粗野的话，“叫你尝尝反驳的味道……”接着他又骂一句。“把孩子交给娘儿们。”军官嚷道，“你必须戴上手铐。”

原来，军官要强行给那个被村社判处流放刑的农民戴上手铐，而那个农民的妻子已经在托姆斯克害伤寒病死掉，把小女孩留给了他。他一路上必须抱着她走路。犯人就声明说他戴着手铐无法抱小孩，这句话让当时心情不佳的军官火冒三丈，他于是举手毒打这个没有立刻服从命令的犯人。

他对面站着一个押解兵和一个长着黑色大胡子的男囚犯。这个男犯一只手铐着手铐，阴沉着脸皱着眉头，一会儿看一下押解官，一会儿看一眼那个挨打的抱小孩子的囚犯。押解官又一次命令押解兵抱走小女孩。犯人们埋怨得越来越大声。

“自从托木斯克起从没让他戴过手铐。”一个沙哑的嗓音从后面传出来。

“这又不是狗崽子，那还不过是个娃娃呀！”

“叫他把这小孩儿怎么办？”

“这样是不符合法律的。”另一个声音说。

“这话是谁讲的？”那押解官好象被蛇咬了一口，冲向人群，嘴里喊道。“我要叫你明白什么叫法律。这是谁说的？是你吗？是你吗？”

“大家都在说。因为……”一个脸膛宽、个儿不高的男犯人说。

他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完。军官就举起两只手，扑面朝他打来。

“你们造反了！我得给你们一点颜色瞧瞧，让你们尝尝造反的味道。我要开枪把你们象狗一样统统打死。上司知道了，还会向我道谢呢。快将小妞儿带走！”

犯人们没敢再吭声。一个押解兵把拼命哭喊的小女孩夺过去。另一个押解兵开始给那个农民戴上手铐，他顺从地伸出手。

“把小妞儿送到娘儿们那边去。”军官对押解兵嚷道，整了整他那根挂军刀的皮带。

小女孩拼命从头巾里伸出小手来，大哭不止，满脸涨得通红。玛丽亚·巴夫洛夫娜从人

群里走出来，走到押解兵跟前。

“军官先生，这个小姑娘让我来带领吧。”

抱着小姑娘的押解兵停住脚。

“你是什么人？”军官问。

“我是政治犯。”

谢基尼娜好看的脸蛋和她那双美丽的金鱼眼睛，明显的对押解兵产生了作用（他在接收犯人时已见过她）。他默默地对她看了看，好象在斟酌什么似的。

“我是不在乎的，你想照顾，就抱去吧。你可怜他们没关系，可是要是有一人跑掉，让谁负责呢？”

“他抱着孩子怎么能够跑？”谢基尼娜说。

“我可没时间跟你们在这儿闲扯。你想要，就抱她过去吧。”

“您说交给她吗？”押解兵问。

“交给她。”

“你过来吧，到我这里来！”谢基尼娜呼唤着，努力让小女孩走到自己身边。

可小女孩却从押解兵怀抱里朝他爸爸探过身去，仍在高声啼哭，不愿意去谢基尼娜那边。

“您等一会儿，谢基尼娜，看着，她会来我这里的。”玛丝洛娃从袋子里拿出一个面包圈，说。

小女孩认识玛丝洛娃，看到她手里的面包圈，就朝她走过去。

风波终于停止了，人群又安静下来。这时大门敞开了，那批犯人走到门外，排好队伍。押解兵重又清点一遍人数。大家把背包放在大车上，捆扎在一起，让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坐上车。玛丝洛娃抱起小女孩，回到妇女的队伍中，与费多霞站在一起。西蒙松一直在一旁观看刚才发生的事，这时候迈着果断又坚毅的大步走到已经料理完一切事情，正要坐上自己的四轮马车的军官面前。

“军官先生，您做的不对。”西蒙松说。

“回到您的队伍里去，这与您无关。”

“怎么无关呢？我就是要向您指出您做的不对，而且我已经指出了。”西蒙松说着，两道浓眉底下的眼睛紧盯着军官的脸。

“准备好了吗？队伍听着：起步走。”军官没有理睬西蒙松，大喊一声，然后借助赶车的士兵的肩膀，跨上了他的四轮马车。

犯人们走动起来，整个队伍拉得老长，沿着夹在两条水沟中间的布满泥浆和车辙的道路，穿过茂密的树林向前行进。

三

最近六年来，卡秋莎经历了城市里的那种放荡、奢侈的生活，近来，卡秋莎又在监狱同刑事犯们一起生活了两个月，现在同这些政治犯呆在一起，尽管他们的处境极其艰苦，可是她觉得心情异常舒畅。

每天走二三十俄里的路，吃得很好，走两天的路后休息一天。渐渐的，她的身体开始逐渐强壮起来。而且，与一批新朋友结识，这令她发现了从前毫不了解的生活乐趣。她认为现在跟她一起赶路的人都出奇的好，这对于她不但是在从前从未见过，甚至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不错，被判刑时，我哭了，”玛丝洛娃说。“可我将生生世世感谢上帝。现在我明白了许多事，要是在从前就是一辈子都不会明白的。”

她毫不费劲，极自然地就理解了这些革命者行动的动机。她原本就出身于平民，对人民自然就十分同情。她明白这些人是站在人民一边反对那些贵族老爷和太太的。这些人本身就是高贵的老爷太太，却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特权、自由和生命，这就让她特别敬仰这些人，钦佩这些人。

她敬佩她全部的新朋友，可最敬佩谢基尼娜。她不但敬佩她，并且怀着一种特别的敬重热爱着她。令她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出身富裕将军家庭的好看的少女，能懂三种语言，却生活得像个最普通的工人，她把有钱的兄长寄给她的所有东西都分赠给别人，自己的穿戴朴素得几乎可以说是寒碜，而且她毫不在意自己的外表。谢基尼娜从未卖弄风情，这令玛丝洛娃觉得非常惊讶，所以对她分外钦佩。玛丝洛娃看得出来谢基尼娜意识到自己长得好，并为此觉得高兴，可她却因男人欣赏她的美貌而感到不舒服，而且有点恐惧，她甚至觉得谈情说爱非常令人嫌恶和害怕。只要是了解她脾气的男人，虽然爱慕她，也不敢有所表示，并且一直对待她就象对待男朋友那样。那些不了解她的男人，常常对她纠缠不休，可据她自己讲，全靠她力气大而摆脱掉他们，因而她也就因力气大而骄傲。她笑着说：“有一回，有个老爷在街上纠缠着我不放，我就抓住他用劲摇晃了他几下，吓得他拔脚就逃。”

她自己说，她之所以会成为革命者，是因为她从小就厌恶上层人的生活，喜欢普通人的生活。她当时就因为经常呆在使女的房间、厨房和马房，却不肯呆在客厅而老是挨骂。

“我与厨娘和马车夫呆在一起时，总是非常快活。而与那些老爷太太们相处，我却觉得无聊透顶。”她讲道。“当我懂事后，我才看出我们的生活实在很糟糕。我的母亲早已去世，我又不喜欢我的父亲。于是十九岁那年我就离开家庭，和一个女朋友一块儿到工厂里去当女工。”

谢基尼娜离开工厂后住到农村去。然后又回到城里，住在一所设有秘密印刷所的房子里，最后被逮捕，判她去服苦役。这些事她自己从未说过，可玛丝洛娃听别人说，她被判服苦役，是因为宪兵们搜查那所房子时，有名革命者在黑暗里打了一枪，她却将开枪的罪名揽到自己身上。

玛丝洛娃打从认识她起就看出，无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谢基尼娜从来没有顾及自己，碰到一切事情，总是只想到怎么为别人提供帮助，为别人尽份力量。她如今的同志中有个叫伏诺德伏罗夫的，谈到她时总是开玩笑地称她为慈善迷。这话一点儿也不错。她全部的生活乐趣就在于寻找机会为别人帮忙，犹如同猎人寻觅猎物一样。这种爱好已变成习惯，变成她的毕生追求的事业。她做得十分自然，以致所有知道她的人都毫不在意地要求她帮助，并且对这些帮助失去了感激之情。

玛丝洛娃刚加入他们当中时，玛丽亚·巴夫洛夫娜有些憎恶和厌弃她。这一点卡秋莎注意到了，不过后来又发现玛丽亚·巴夫洛夫娜极力克制自己，对她也很友善和蔼。这种和蔼和友善出之于这样一个不平常的人，玛丝洛娃不禁被深深打动，结果她把自己整个的心都交给她，无形之中就接受了她的见解。不知不觉卡秋莎也从各方面模仿她。她这种忠诚

的爱感动了 玛丽亚·巴夫洛夫娜，她也从心底里喜欢卡秋莎了。

使这两个女人更加亲近的另一缘由，是因为她们对于性爱都感到憎恶。一个痛恨性爱，是因为亲身受过性爱的种种摧残，另一个尽管从未体验过这样的事，但认为这是一种有辱人格并且难以理解的令人憎恶的事。

四

谢基尼娜的影响是玛丝洛娃主动示意接受的。玛丝洛娃之所以示意接受，是由于她喜欢谢基尼娜。另一种影响是西蒙松带给她的，这种影响的产生却是因西蒙松爱上了玛丝洛娃。

人的生活 and 行动，基本上都是一部分依照自己的想法，一部分依照别人的想法。人与人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也就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依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依照别人的想法生活。有些人，在大多数场合下，运用自己的思想总像做智力游戏，对待自己的理智如同对待一个卸去了传动带的飞轮似的，然而他们在行动中却总是顺应别人的思想，顺应风俗、传统、法律。有些人却认为自己的思想就是自己生活的灯塔，他们在行动中几乎永远倾听自己理智的要求，并顺应这种要求，只是偶尔，而且是在经过认真的分析批判以后，才顺应别人的意见行动。西蒙松属于后一种人。他对一切事情都理智地反复思考后再决定，而且一旦做出决定，就一定实行。

当他还在读中学的时候，他就认为父亲当军需官所得的钱是不义之财。他请求父亲把那些财产还给老百姓，但父亲不但拒绝，而且痛骂他一顿，他就离开家，从此不再用父亲的钱。他认为现在的一切罪恶就是因为老百姓缺乏知识，所以他就离开大学，加入到民粹派，去乡下当教师，勇敢地向学生和农民宣传他断定正确的东西，驳斥他认为荒谬的东西。

直到他被逮捕，被审讯。

在受审时，他的思想告诉他法官们无权审问他，于是他公然说出自己的想法。可是法官们对他的话不予理睬，继续审问他，他就决定不予回答，对他们的提问一概置之不理。他被判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在那里他自己形成了一种宗教性的学说，他的一切行动也遵循这种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活的，世上不存在死的东西；那些我们认为死的和无机体的物体，仅仅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宏大的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罢了。那么，人作为这个大有机体的一小部分，就有责任维护这个有机体以及它那些活着的各个部分的生命。正因为此，西蒙松认为消灭活物是犯罪，他反对战争、死刑、屠杀，而且不仅反对杀人，甚至反对屠宰牲畜。在对待婚姻上，他也有自己的独特理论。他认为人类的繁殖仅仅是人的低级职能，人的高级职能却在于为当前活着的人服务。他从血液当中存在吞噬细胞这一事实，找到了能证实他的理论的根据。在他看来，独身者就类同于吞噬细胞，它的使命就在于帮助有机体中衰弱病态的部分。尽管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沉湎于酒色，可是自从做出这个决定以后，他就照这样生活下去。现在他认为自己与玛丽亚·巴夫洛夫娜一样，就是人间的吞噬细胞。

他对玛丝洛娃的爱情，并不与这个理论相悖，因为他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他认为这样的爱情非但不会妨碍他如同吞噬细胞向弱者提供帮助，还会激励他更努力去这样做。

不仅对于精神问题的解决他有自己独特的办法，就是处理实际问题，他也大多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他解决各种具体的问题都依照自己的理论，并制定了一套规则：每

天工作多长时间，休息多长时间，吃什么饭，穿哪件衣服，如何生炉子，怎么点灯，等等。

尽管这样，西蒙松与人交往却十分胆怯和谦逊。可他一旦决定了一件事，那就没什么能阻拦他。

就是这么一个人的爱情对玛丝洛娃有非常大的影响。玛丝洛娃靠着女人的敏感很快感到他爱上了她。她想到她竟然能被这样一个非凡的人感到可爱，她的自信心也就增强了。聂赫留朵夫对她求婚是出于宽容大量以及过去那些事；西蒙松爱的却只是现在的她，并且单纯得是由于喜欢她。另外，她感到西蒙松认为她是一个非凡的女性，有高尚的品德。与一般女人不同。她不太明白他到底认为她具备什么品德，但无论怎样，为了不让他失望，她就努力表现出她认为自己具有的最优秀的品德。这样也就促使她努力成为一个她所能达到的最好的人。这种情形早在监狱里就已经开始了。那一天是政治犯们会晤探监人的日子，她就察觉他那对纯洁善良的深蓝色眼睛，在隆起的前额和眉头下，特别固执地瞅着她。早在那个时候，她就留意到这个人有些特别，而且瞧她时的神情也有些特别，留意到他那竖起的头发和紧皱的眉毛显得非常严厉，留意到他目光中的稚气式的纯洁善良，而这种严厉与这种纯洁善良竟然结合在同一张脸上，确实出乎意料。后来，在托姆斯克，她调到政治犯队伍中时，她就又见到他了。尽管他们彼此也没有交谈过一句，可是他们四目相对时的那种眼光却表露了他们依然记得对方，而且感到彼此之间是休戚相关的。在此之后他们也没有谈过什么具有特殊意义的话，但玛丝洛娃觉得，如果有她在场，他讲话似乎总是为她而发，为她而讲的，而且总是尽量将话说得简单明了。自从西蒙松同刑事犯一起步行开始起，他们的关系就更加接近了。

五

从下诺夫哥罗德到彼尔姆的这段路上，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只见过两次面：

一次在下城，在犯人们乘上围着铁丝网的驳船之前；另一次是在彼尔姆的监狱办公室。这两次会面时，他发觉玛丝洛娃寡言少语，神态冷漠。聂赫留朵夫询问她身体的情况，是否需要什么东西，她回答时吞吞吐吐，神情慌张，而且他感到还含有一种责备的意味，那在从前也有过的。这种阴郁的心情是因为她被男人的纠缠才出现的，这让聂赫留朵夫觉得很烦恼。他害怕一路上处于艰苦的条件和淫猥的环境下，她会再次自暴自弃，对生活绝望，用烟酒来让自己麻木，并对他产生怨恨。可他又没法帮助她，因为在旅程的初始阶段，总是没有机会与她见面。一直等到玛丝洛娃被调到政治犯队伍中后，他才确信自己的担忧毫无理由。不但如此，聂赫留朵夫每次见到她，都越来越明确地看到她内心的改变，而那正好是他所盼望的。在托姆斯克第一次相见时，她又变得同出发前一样。她看到他，不再皱眉头，也不慌乱，相反，还高高兴兴、神态自若地去与他见面，感谢他为她做的事，尤其是调她到她现在所处的人们中间来。

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她内心的改变在外表上也表现了出来。

她比以前消瘦，而且晒黑了些，仿佛苍老了似的。一些细纹出现在她的两鬓和嘴角，她将所有的头发都包在头巾里，不再故意让一绺头发飘到额头上来。现在，无论她的装束，她的发型，还是她对人的态度，再也没有从前那种卖弄风情的迹象了。她这种已经发生而且仍然在进行的内心变化，使聂赫留朵夫心里不断产生一种特别欢快的心情。

现在他对她的那种感情是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这种感情完全不同于最初那种诗意的迷恋，更不同于他后来所感到的肉欲的爱慕，甚至跟在法庭判决以后他决定同她结婚而产生

的履行责任的思想感情和混杂其中的虚荣心理也毫不相同。这种感情就是一种最纯粹的怜惜和感动。这种心情在他去监狱里跟她初次见面的时候就产生过，后来他去过医院以后，极力克制自己的厌恶，原谅她同医士的所谓调情事件的时候，又更加强烈地产生过（至于她是被冤枉的，后来他已得知）。现在的心情跟先前已经有过的那种心情其实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先前那种心情是暂时的，现在却变成经常的了。现在不管他在想什么事，或在做什么事，他总是怀着这种怜惜和感动的心情，而且不仅对她一个人这样，对一切人也都如此。

这种情感为聂赫留朵夫心灵打开了闸门，使原来找不到出路的爱的浪潮汹涌地滚滚向前，奔向他所遇到的所有人。

聂赫留朵夫感到自己在这次旅行中总是情绪激昂，他情不自禁地关心和照顾所有人，无论是马车夫和押解兵还是与他打过交道的典狱长跟省长。

在这段时期中，由于玛丝洛娃已经被调到政治犯队伍里，聂赫留朵夫就有机会同许多政治犯接触，先是在叶卡捷琳堡与政治犯自由地一起住一个大牢房，后来是在途中又与玛丝洛娃一起走的五个男犯和四个女犯认识。聂赫留朵夫与流放的政治犯交往后，完全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

自俄国革命运动开始以后，尤其是在三月一日事件之后，聂赫留朵夫一直对革命者怀有恶感，老是抱着轻蔑的态度。他们对他怀的恶感，首先来自于他们反对政府所用的残酷和秘密的手段，特别是惨无人道的暗杀手段；其次由于他们都有一种自命不凡的优越感。在同他们接触之后，他才了解到他们经常被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他们被迫无奈才这样做的。

不管一般所谓的刑事犯所遭到的残酷折磨多么荒诞不经，可是在他们判罪的前后，毕竟多多少少还能见到一点依照法律办事的影子，然而在政治犯们的案子里却连那一点影子也见不到，这一点在聂赫留朵夫见到的舒斯托娃一案里，以及后来结识的许多新朋友的案子里都得到了证实。政府对付他们犹如用大渔网捕鱼：将所有落网的鱼一古脑儿拖到岸上，然后从中挑出那些合乎需要的大鱼，至于那些小鱼，就无人过问，任凭它们被太阳晒干死在岸上。就是这样，政府捉住几百个显然不仅没有犯罪而且根本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关进监狱，囚禁起来，而且有时一关许多年。于是他们在监狱里被传染上肺病，或者发了疯，或者干脆自杀以减轻痛苦。他们之所以被囚禁在监狱里，仅仅是因为缺乏释放他们的理由，再者将他们关在监狱里，因为近在咫尺，倘若到了需要他们做证时，也可以方便把他们提出来说明某一个问题的。所有这些人，即使站在政府的角度上看，也往往是无罪的，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完全由宪兵、警官、暗探、检察官、侦讯官、省长、大臣等操纵，取决于他们的专断、闲暇和心境。这样一些官僚，如果闲得无聊，或者有意立功，往往就会大肆逮捕，然后根据他自己或者上司的心境，决定把他们或关进监狱，或释放。至于高一级的上司，也要看是否有意立功，或者与大臣的亲疏关系，把他们或是发送到天涯海角，或是关进单人牢房，或是判处流刑，做苦工，直至处死，或者倘若遇到一个什么太太来求情，就将他们释放。

别人用暴力对待他们，他们当然也不得不用同样手段反击。军人一般总是被社会舆论所影响，掩盖起他们的血腥罪行，还说是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样，政治犯总是被他们团体舆论所左右，他们不顾失去自由、生命和一切人世间珍贵东西的风险，从事残酷的活动。依他们的看法，这非但不是罪恶，甚至还是勇敢的行为。这就为聂赫留朵夫解释了一种奇

怪的事件，为什么那些本性善良温和的人，不仅不忍心随便伤害什么生物，甚至不忍心看它们受苦，现在却能毫不在乎地动手杀人。他们几乎全部都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用杀人这种手段，来保护自己 and 达到全民幸福这一高尚目标是合法的，正当的。他们认为他们从事的事业十分崇高，因此也自视很高，实际上这是政府很重视他们，残酷惩罚他们的结果。不错，为了能承受他们所忍受的苦难，他们不得不自视很高。

聂赫留朵夫接近他们以后，对他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深信他们不像某些人所假想的那样是地道的坏蛋，也不像另外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十足的英雄，而是些平平常常的人。和各个地方的人一样，他们当中也有好人、坏人和不好不坏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从事革命活动，是出于一种真诚和责任感，认为自己有必要与当前的恶势力作斗争。但是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选择这种活动是出于利己的虚荣心。不过大部分人向往革命，却是出于聂赫留朵夫在战争时期所熟悉的追求危险和刺激的愿望，以玩命为乐趣，像这种感情原是一般精力充沛的青年所共有的。他们同普通人的区别以及超越普通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道德水准高于普通人所公认的道德水准。他们不但认为节制欲望、艰苦朴素、真诚老实、大公无私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认定为了他们共同的事业可以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牺牲他们的生命。

就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些人中间，凡是具有很高品质的，常常远远高于普通水平，是德行高超的典范；凡有品质低劣的人，常常能弄虚作假、虚张声势、刚愎自用、骄傲自大。所以聂赫留朵夫对有些新朋友不仅充满敬意，而且衷心热爱，可是对另外一些新朋友却敬而远之。

六

聂赫留朵夫尤其喜欢一个名叫克雷里卓夫的生着痼病的年轻人。克雷里卓夫与玛丝洛娃在同一个队伍里，被流放去服苦役。聂赫留朵夫还在叶卡捷琳堡就与他结识了，在途中又和他见过几次，还跟他谈过话。

有一个夏日，在旅站上休息，聂赫留朵夫跟他几乎消磨了一整天，克雷里卓夫畅谈起来，

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他，并告诉他自己是怎样变成革命者的。他入狱前的经历非常简单。他父亲是南方某省的一个富有的地主，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是独生子，由母亲抚养长大。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他都念得相当轻松，大学毕业名列数学系第一名，获得了硕士学位。学校让他留校，日后送他出国，可是他踌躇不决。当时他已经爱上一个姑娘，正考虑结婚，准备到地方自治局去工作。他想做每一件事却总是拿不定主意该做哪一样好。这时候有几个大学同学来要求他为公共事业捐一点钱。他知道这个公共事业就是革命事业，当时他对它并无半点兴趣，只是出于同学的情谊，又爱面子，唯恐人家以为他怯懦怕事，就捐了钱。不料收钱的人被捕了。从那里搜到一张字条，根据那张字条查明钱来源于克雷里卓夫。于是他也被捕了，先是押在警察分局，后来送进监狱。

“在我坐的那个监狱里，”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说道（他胸部凹陷，两肘支着膝盖，坐在高高的板铺上，不时用他那双害热病的聪明、善良、美丽的闪亮的眼睛对聂赫留朵夫看看），“那个监狱不算太严，我们不但可敲敲墙壁互通消息，而且可以在过道里随便走动和交谈，互相分发食物和烟叶，在晚上甚至可以一同唱歌。我本来嗓音很好。真的，若不是我妈太伤心，我在牢里过得也还不错，甚至很快乐。我在这里结识了鼎鼎大名的彼得罗夫（他在后来的要塞里用碎玻璃割喉自杀了），还有其他的人。但那时我还没有成为革命者。我还结识了隔壁牢房里面的两个人。他们都是由于偷带波兰宣言案被逮捕，后来又在押到车站

途中想要逃跑而被审判。一个是姓罗卓夫斯基的波兰人；另一个是姓罗卓夫斯基的犹太人。对啊，那个罗卓夫斯基几乎还是个小孩儿。他说他已经十七岁，但看起来只有十五岁。他瘦瘦小小的，两只黑眼睛亮闪闪的，人挺伶俐，也跟所有犹太人那样具有音乐才能。他还在变音，可唱起歌来很动听。是啊！他们被提审我是看见的。他们一早给带出去，傍晚才回来，说是被判处死刑。谁也没料到这件事。他们的罪行实在很轻，只不过想要从押解兵手里逃跑，也没有伤什么人。再说，把罗卓夫斯基这样一个小孩儿判处死刑，实在太没有人情。我们那些关在牢里的人，全都以为这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上头是不会允许的。开始大家激动了一阵，后来平静了，又过原来那样的平静日子。是啊！不料有一天晚上，看守走到我的门旁，偷偷摸摸地告诉我说，来了几个木匠，正在架绞架。我开始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什么绞架不绞架的。但看守老头非常激动，我看了他一眼，这才想到是为我们牢房里那两个人准备的。我想敲敲墙壁，告诉大家这事，可是又怕被他们两个听到。大家也都不作声，看来全知道了。那天晚上，走道里和牢房里一直如同死一般地寂静。我们没人敲墙壁，也没人唱歌。十点钟左右，看守又过来告诉我，一个刽子手从莫斯科调过来了。他说完就走了。我正要叫他回来，突然听到罗卓夫斯基在他那走道对面的牢房里冲我喊道：“您怎么了？您叫他到底什么事？”我吞吞吐吐地说，他给我拿烟叶来了，可罗卓夫斯基好象猜到是怎么回事，就问我们为什么不唱歌，不敲墙壁。我记不清楚那时跟他讲了些什么，但我赶紧走开，以免他再问我什么。对啊！那真是个恐怖的夜晚。我整个晚上留神听着种种声响。第二天清早，突然听到过道的门开了，走进了好几个人。我站在窗洞旁。走道里燃着一盏灯。第一个走进的是典狱长。他是个胖子，平常非常神气，行动果断，但这会儿苍白着脸，垂头丧气，好像吓得胆战心惊。他后面是副典狱长，紧锁眉头，神情严肃，再后面跟着一个卫兵。他们走过我的门口，在旁边那间牢房门前停住。我听到副典狱长用奇怪的声音喊道：“罗卓夫斯基，起来，穿上干净衣服！”对啊！接着听见牢门嘎吱响了一下，他们走到他跟前，后来就听到罗卓夫斯基的脚步声。他走向过道另一头。我只能看到典狱长一个人。

典狱长站在那儿，脸色惨白，一会儿将胸前的衣扣解开，一会儿又扣上，还时不时地耸耸肩膀。是啊。忽然，他好象害怕什么似的，闪到一边去了。原来罗卓夫斯基从他面前走过，向我的门口这边走过来。您要知道，他是个很英俊的年轻人，生着波兰人那种好看的脸型：额头宽阔平直，厚厚的一层鬈曲细密的金黄色头发覆盖着头顶，生着一对迷人的天蓝色眼睛。这个年轻人血气方刚，精力充沛，身强力壮。他在我的小窗口跟前停下来，因此我看得见他的整张脸庞。他的脸那么地消瘦、灰白、可怕。“克雷里卓夫，有烟吗？”我正要拿出烟来给他，可是副狱长仿佛怕拖延了时间似的，取出自己的烟盒来，递给了他。他取出一根，副狱长给他划亮火柴，点上烟。他吸了起来，好象在思考着什么。忽然，他似乎想起什么事似的，开口说：“这种事太残忍，太不公平。我没犯过任何罪。我……”我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他那年轻的、白皙的脖子，后来他喉头发颤，说不下去了。是啊。这时候我听见罗卓夫斯基在过道上用他那尖细的犹太人嗓音嚷了一句话。罗卓夫斯基扔掉了烟头，离开了我的牢门口。紧接着，罗卓夫斯基就在我的小窗口出现了。他那张稚气的脸上一对黑眼睛水汪汪的，满脸涨得通红，正在冒汗。他也穿着干净的衬衣，长裤却太肥，他不时地伸出两只手把它往上提，浑身不停地颤抖。他将他那张可怜的脸凑近我的小窗口，说：“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医生让我吃润肺汤药，不是吗？我有些难受，我还想再吃点润肺汤药。”没有人回答他，他就疑问似的先瞧瞧我，再瞧瞧狱长。他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一直都没有想明白。是啊。忽然，副狱长板起了脸，尖声尖气地嚷起来：“开什么玩笑？我们走吧。”显然，罗卓夫斯基并不知道什么事在等着他。他匆匆忙忙地往前走去，抢在其他人的前头，沿着那条过道，几乎是跑步般地行进。可是后来，他站住不肯走了，

我听见他尖着嗓子大声哭叫。一阵乱哄哄的喧哗声和顿脚声从那边传来。他在尖声喊叫，痛哭。后来，声音越去越远，过道的门哗唧一响，然后就一片寂静了。……是啊。他们就这样受了绞刑，就这样被绳子勒死了。有一个看守当时在现场，他告诉我说罗卓夫斯基没有反抗，罗卓夫斯基却挣扎了很长时间，于是他们硬把他拖上绞架，拼命地把他的头塞进绳套里。是啊。那个看守是一个愚笨的家伙。他说，‘老爷，人家都说行刑是可怕的。事实上一点也不可怕。他们受绞刑的时候，只是肩膀这么动了两下，’他说着，做了一个肩膀猛地往上一耸，随后又耷拉下来的姿势，‘后来刽子手一拉绳子，喏，就是把绳套拉得紧一点，这样就完事了，他们再也不动了。’‘一点也不可怕，’克雷里卓夫又重复了一遍看守的话，他本来想笑，却没有笑成，竟放声大哭。

然后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吃力地喘息着，硬压下涌到喉咙里的哽咽。

“自打那时起我就变成了革命者，对啊。”他平静下来道，简要地说完了他的身世。

他加入了民意党，还成为破坏小组的负责人，专门针对政府官员采用恐怖手段，迫使他们放弃政权，由人民掌权。他为这个目的四处奔波，一阵儿去彼得堡，一阵儿出国，一阵儿到基辅，一阵儿到敖德萨，取得了许多次成功。后来却由于一个他十分信任的人的出卖，他被捕了，遭到审讯，关在监狱里两年，被判处死刑，后来改成终身苦役刑。

他在狱中得了肺病。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显然他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了。这一点他自己也清楚，但他对自己做过的事并不后悔，而且说，如果有来生，他也仍然会做同样的事，那就是破坏这种社会制度，免得他目睹的种种罪恶再有可能发生。

自从聂赫留朵夫了解了克雷里卓夫的身世和他接近以后，懂得了他以前所不理解的许多事情。

七

押解官和犯人在旅站出发时为一个孩子发生争吵的那天，聂赫留朵夫在客店里正好醒得很迟，起床后又写了几封信，打算带到省城去寄，所以坐车离开客店迟了一点，没同往常那样在途中追上大队人马。他到达犯人们留宿的村子时，已经傍晚了。聂赫留朵夫借住的是由一个身体肥胖、长着又白又粗的脖子的老寡妇开的店。他在店里烤干衣服，在装有许多圣像和画片的干净客房里喝足了茶，匆忙赶到旅站去找押解官，请求允许他与玛丝洛娃见面。

在过去的六个旅站上，押解官虽然不断更换，可是谁都不准聂赫留朵夫走进旅站的房间，所以他已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见到卡秋莎。押解官如此严格，只是因为有一个主管监狱的大官将路过此地。但是现在，那个长官已经从这里过去了，根本没有对这些旅站看上一眼。聂赫留朵夫就抱着希望，但愿今天早上接管这批犯人的押解官能够象过去那些军官一样准许他同犯人见面。

客店老板娘劝聂赫留朵夫坐马车去村尾的旅站，可聂赫留朵夫宁可走着去。一个宽肩膀、体格健壮的年轻茶房，穿着一双刚刚过油、柏油味很沉的大皮靴，为他带路。空中全是迷雾，天色黑得厉害。带路的茶房在照不到灯光的地方只要走出两三步，聂赫留朵夫就不能看到他，只听到他的大皮靴在厚厚的泥浆里吱吱作响。

聂赫留朵夫跟着带路的人穿过教堂前面的一个广场，走过一条两边房子灯火通明的长街，最后来到一片漆黑的村头。可是没过多久，这片漆黑中出现了亮光，这些亮光就是车站附近点着的一些路灯，透过迷雾射过来的。渐渐地，这些颜色发红的光点越来越大，越来越亮。栅栏的木桩、走动的哨兵的黑色身影、漆着斜条纹的木桩和岗亭也依稀可见了。哨兵注意到有人走过来，照例吆喝一声：“是谁？”当他看清他们不是自己人时，态度顿时严厉起来，坚决不准他们在栅栏旁边逗留。可是给聂赫留朵夫带路的人看见哨兵如此严厉，却一点儿也不慌张。

“呵，你这家伙。脾气倒挺大呀！”他对哨兵说。“你去把你们的头儿叫出来，我们在这里等着。”

哨兵没有回答，只得向边门喊了一声，站住脚，眼睛看着那宽肩膀小伙子，看他如何借着灯光用木片把聂赫留朵夫靴上的泥巴刮掉。栅栏里传来男男女女热闹的谈话声。过了大约三分钟左右，角门咣的开了，队长披着军大衣，从黑暗中走到路灯下，问他们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把预备好的名片同一张写明有私事求见的纸条交给队长，让他转交给押解官。那队长不如哨兵那么严厉，但好奇心非常强。他非得要知道聂赫留朵夫到底有什么事要见押解官，他是谁。显然，他已觉得有油水可捞，不愿放过机会。聂赫留朵夫说他有一件特别的事，让他把字条交上去，办成后他会感谢他的。队长拿过字条，点着头走了。他走后不大一会儿，角门又哗啦响了一声，几个女人走出来，手里拿着篮子、树皮篮、牛奶壶和口袋。她们响亮地用西伯利亚方言谈着话，迈过角门的门槛。她们全都不是乡下人装束，而是同城里人一样穿着大衣跟皮袄，裙子高高地别在腰里，头上围着头巾。她们就借路灯的光奇怪地看着聂赫留朵夫和给他带路的人。她们中间的一个女人看到这个宽肩膀的年轻人，显然非常高兴，马上用西伯利亚骂人话亲切地骂起他来。

“你这个树林里的该杀的妖精，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她对他说。

“喏，我是来送客人的。”小伙子回答说。“你送什么东西来了？”

“奶制品。他们让我们明天早晨再送一些来呢。”

“那么，他们倒没让你们留下过夜吗？”小伙子问道。

“你这个不得好死的，烂什么舌根！”她笑着嚷道。“咱们一起回村子去吧，你送一送我们。”

那个带路的人又开了一句什么玩笑，不但招得女人咯咯地笑起来，而且连哨兵也给逗笑了。然后，他转过身来对聂赫留朵夫说：

“怎么样，您自己回去能认得路吗？不会迷失方向吧？”

“能找到，能找到。”

“走过教堂，从那座两层的楼房数起，左手第二家就是。噢，给您根拐棍。”他说，把他随身带着的那根一人多高的棍子递给聂赫留朵夫。然后他踩着吱吱作响的大皮靴，同那些女人一同在黑暗中消失了。

当角门又一次哗啦响着打开，队长请聂赫留朵夫同他一块儿去见押解官时，还能听见迷雾里传来的那年轻人的说话声，中间不时传来女人的声音。

八

与西伯利亚沿途所有的旅站一样，这个旅站也座落在一个用尖头圆木桩围起来的院子里，院子里有三所住人的平房。

最大的一栋装着铁窗，是供犯人住的，另一栋住着押解兵，还有一栋设有办公室的住着军官。这三栋房子此时灯火通明，照例让人误以为里面肯定很漂亮舒适，尤其是在这个旅站。每栋房子入口的地方都点着灯，围墙周围还有五六盏灯，照亮整个院子。一个军士带着聂赫留朵夫走过一块木板，走到那栋最小的房子门口。他走上三级台阶，请聂赫留朵夫在前面走，走进点着一盏小灯、充满煤烟味的前厅。火炉旁站着个穿粗布衬衫和黑色长裤、打着领带的士兵，他一只脚穿着长统黄皮靴，弯着腰，用另一只靴统子为茶炊扇风。他一看看到聂赫留朵夫，就不再管茶炊，为聂赫留朵夫脱下皮衣，然后走到里屋去。

“他到了，长官。”

“哦，叫他进来。”一个气呼呼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您从门口进去吧。”那个士兵说，又立刻动手烧茶炊。

第二个房间里点着一盏吊灯，有一个脸色通红、留着很长淡黄色唇髭的军官挨着桌子坐着，一件奥地利式的短大衣紧裹着他那宽阔的胸脯和肩膀。铺了桌布的桌上，放着一些吃剩的饭菜和两个酒瓶。这个暖和的房间里，除了烟草味以外，还弥漫着一股浓重而刺鼻的劣等香水的的气味。军官见到聂赫留朵夫，稍稍欠了欠身，瞧着他的神情既含讥讽又含疑惑。

“请问您有何贵干？”他问，但不等对方答话，就对着门口喊起来：“别尔诺夫！茶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烧好？”

“马上就好。”

“我马上给你点厉害看看，好让你记住！”押解官瞪了他一眼，骂道。

“来了！”士兵嘴里喊到，手上端茶炊走进来。

聂赫留朵夫在士兵把茶放好之后（军官恶狠狠地瞪着一双小眼睛，凶恶地盯着这个士兵，好象要选一个部位，动手揍他）。等茶具放好，押解官就动手煮茶，然后从自己的箱子里取出一个装有高级白酒的玻璃瓶和一些压缩小饼干。他把这些东西扔在餐桌上，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

“能告诉我我能为您做些什么事吗？”

“我要求看望一个女囚。”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没有坐下来。

“不是政治犯吧？法律规定，严禁探望。”押解官回答。

“这个女人确实不算政治犯。”聂赫留朵夫说。

“那么，坐。”押解官说。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

“她不是政治犯，”他重复了一遍，“不过根据我的请求，并经由高级长官批准，她可以同那些政治犯待在一起……”

“啊，我明白了。”军官打断他的话说。“就是那个黑头发的娘儿们吧？没问题，可以照办。您吸烟吗？”

他将一包纸烟推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然后小心地斟满两杯茶，把其中的一杯送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喝吧。”他说。

“谢谢您。不过我希望能见一见……”

“夜长得很。您有的是时间。我吩咐人去把她叫来见您就是了。”

“可是能否不让她出来，让我自己到他们的住处去看她呢？”聂赫留朵夫说。

“到监狱那儿去吗？这是不允许的。”

“我去过好多回了。要是您担心我把什么东西送去给政治犯，这样的话我通过她也可以转送。”

“不，她准是会被抄身的。”押解官说，现出不高兴的神色。

“哦，那您不介意先把我搜一搜。”

“哦，不检查也行。”押解官说，提起一个开了瓶盖的酒瓶，放到聂赫留朵夫的杯子上。

“多放一点好不好？哦，那么随便吧。一个人住在西伯利亚这种环境下，能见到一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真是太兴奋了。实话实说，我们这一行，真是再苦恼也没有了。一个人习惯别种生活，来到这地方，烦死了。您要明白，别人一提到做我们这工作的，当押解官，都会认为是没有修养的大老粗，怎么就不想想，我们投胎干别的事也当然可以。”

押解官涨红了脸、他的浓烈的香水味、他的指环，尤其是他那刺耳的笑声，都特别让聂赫留朵夫恶心。不过，聂赫留朵夫今天也好像整个旅行期间一样，抱着严谨肃然的态度。他对待任何人都不紧不慢，也不轻视，与谁说话都如此“正儿八经”，这是他给自己规定的态度。他听完押解官这些回答，认为押解官很理解受他管制的那些人的困苦，因此押解官心情烦闷。聂赫留朵夫就认真地告诉他说：

“我想，倘若您利用自己的职务，帮着人们减轻痛苦，您的心里就会受到一些安慰。”他说。

“他们还能有什么痛苦？他们本来就是那号人嘛。”

“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聂赫留朵夫说。“他们跟我们大家一样。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根本没罪。”

“的确，他们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的确，他们都很可怜。别的押解官一点也不肯马虎，我呢，只要力所能及，总是想方设法减轻他们的痛苦。我宁可自己吃苦，也不愿意叫他们吃苦。别的押解官碰到一点什么事，马上就依法处置，或者干脆就将他们一枪毙了，而我总很怜惜他们。您需要再来点茶吗？您再喝点吧。”他说着，又给他倒茶。“您要探望的那个女人，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问。

“她是个不幸的女人，流落在一家妓院里，后来在那儿遭到诬告，被指控犯了毒死人命罪。事实上她是个很不错的女人。”聂赫留朵夫说。

军官摇了摇头。

“是啊，这样的事是有的。我跟您说吧，在喀山就有过一个这样的女人。她名叫埃玛，是个匈牙利人，生着一双地地道道的波斯人的眼睛。”他接着说，一回想起往事就忍俊不禁。

“她长得非常体面，风度简直能与伯爵夫人相比呢……”

聂赫留朵夫中断了押解官的话，扯回到从前的主题上。

“我认为，如果他们现在归您管，您就应该减轻他们的苦难。您如果能如此做，我认为

您会感到幸福的。”聂赫留朵夫回答，尽量把话说得明白些，就好似与外国人或者孩子说话一般。

押解官眼珠子闪闪发光，瞅着聂赫留朵夫，特别急不可耐地指望他把话说尽，好仍然讲那生有一双水月弯形眼睛的匈牙利女人。她的形象肯定生动地显现在他的大脑里，把他的所有注意力都吸引了。

“是的，这话不错，确实是如此。”他说。“我也很同情他们。不过我还愿意跟您说说那个埃玛。您知道她干出什么事来了……”

“我对这事没什么劲头，”聂赫留朵夫回答，“不愿骗你，我从前也是另外一种人，可现在我特别烦这种不理解女人的态度。”

押解官奇怪地对聂赫留朵夫瞅瞅。

“这样，再给您倒杯茶吧？”他说。

“不，不用客气。”

“别尔诺夫！”押解官喊，“请把这位先生送回到瓦库洛夫那边去，对他说清，这位先生去政治犯房间里，然后让他呆到点名。”

九

聂赫留朵夫于是让传令兵送着，紧跟着来到路灯昏黄的漆黑院子里。

“上哪儿？”一个押解兵迎面走来，向护送聂赫留朵夫的传令兵问道。

“到隔离的第五号牢房去。”

“这儿走不通，已经上锁了。你们得穿过那边的门廊。”

“干嘛上锁呢？”

“是长官锁上的，他到村子里去了。”

“哦，那么您从这边走吧。”

传令兵让聂赫留朵夫朝另一个门廊过去，就顺着铺木板的路，回到另一个门口。然后在院子里就听见杂乱的讲话声和人们运动的声响，似乎一群将要离窝的马蜂。聂赫留朵夫靠上前去，推开门，嘈杂声就更响亮了。听得出有叫嚷、谩骂和哄堂大笑。还听见叮哩光啷的镣铐声。空中散布着熟悉的大粪和煤焦油的腥臭。

镣铐的咣口当声和刺激的腥臭，这两样东西合在一块，总是让聂赫留朵夫觉得不舒服，精神上觉得厌恶，又逐渐变成生理上的反应。这两种东西掺合在一块儿，互相促进，的确使人觉得尤其难受。

这时候聂赫留朵夫刚踏进小旅站的前堂，那里放着一个被称作“马桶”的臭烘烘的大木桶。聂赫留朵夫头一眼就看到一个女人正坐在木桶边上。她面前站着一个男人，剃成阴阳头的脑袋上歪戴着一顶薄饼般的帽子。他们似乎聊得正投机。那个男犯人一看到聂赫留朵夫，就挤了挤眼睛，说了一句：

“就连沙皇也憋不住尿啊。”

而那个女人把长囚衣的底襟放下来，垂下了头。

自门廊朝里走是一条过道。过道旁边的牢房门都没有关。第一间是同家属在一块儿的牢房，第二间是单身犯人的群体牢房。过道尽头有两间小牢房，住的是政治犯。这个驿站的房子本来是可关一百五十人的，如今却住了三倍的人，非常拥挤，牢房不够犯人住，挤满

了过道。有人坐在地板上或是躺着，有人把空茶壶拿出去，或是把装满开水的茶壶提回来。塔拉斯也在这些人当中。他追上聂赫留朵夫，热情地跟他招呼着。塔拉斯那张亲切的脸变得丑陋了，由于鼻子上跟眼睛下面有好几块变得乌青。

“你这是怎么回事？”聂赫留朵夫问。

“出了一点事。”塔拉斯笑吟吟地回答。

“他们老是打架。”押解兵鄙夷地说。

“都是为了娘儿们，”一个跟着他们走过来的男犯人补充一句，“他跟独眼龙费特卡干了一场。”

“费多霞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她身体很好。喏，我现在就是打开水来给她沏茶的。”塔拉斯说着，走进带家属的牢房。

聂赫留朵夫往这个牢房的门里看了一眼。整个牢房里，无论是在板床上边还是在板床下边，都挤满了男男女女。

牢房里挂着湿衣服，充满着水蒸气。还听得到女犯们不断的叫喊声。紧挨着的是关单身犯人的房间。这间牢房更为拥挤，甚至在门口和过道中都挤满一群群吵闹的囚犯。他们披着湿囚衣，正在瓜分什么东西，或者讨论什么事情。押解兵跟聂赫留朵夫说明道路，监狱中有个开赌场的囚犯，专门借给钱其他的犯人，谁不能马上还他就把纸牌剪成纸片当借条，这时犯人正按照纸片扣下伙食费中的钱来返还赌场老板。那些离得近的犯人看到士兵跟一位老爷，就不作声了，凶狠地打量着他们。从分钱的人之中，聂赫留朵夫认出苦役犯费多罗夫。费多罗夫旁边总跟着一个肤色白净、面部浮肿、紧锁眉头、模样可怜的年轻人。此外，他还看到一个麻脸、糟鼻、面目丑恶的流浪汉。听说这人在大森林中把同伴杀死了，吃了他的肉。他一个胳膊上搭着湿囚袍，在过道中站着，讽刺而大胆地看着聂赫留朵夫，没有让路给他。聂赫留朵夫绕过他身旁。

当然聂赫留朵夫非常熟悉这种情况。

尽管接连三个月来，他在各种极不相同的场合下经常看到这四百名刑事犯，例如在那些炎热的天气，在他们拖着脚镣行进而扬起滚滚灰尘的大道上，或者在大道旁边他们休息的地方，或者遇到天气暖和的时候，在旅站的院子里他们之间公开通奸的可怕场面，可是尽管如此，每当他来到他们中间，象现在这样注意到他们的眼光全盯着他时，在他们面前他仍然会产生一种痛苦的羞愧心情和负疚的感觉。最让他难受的是，除了那种羞愧和负疚的感情以外，他的心里还夹杂着种难以克制的厌恶和恐惧的心情。他很清楚就这些人当前所处的环境而言，他们变成这个样子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尽管如此，他依然无法消除自己对他们的厌恶。

“他们这些寄生虫，倒逍遥自在得很，”当聂赫留朵夫往政治犯的牢房门口走去时，听见背后有人说道，“他们这些魔鬼，有什么忧心的？反正他们的肚子不会痛。”一个沙哑的声音说，然后还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话。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怀有恶意的嘲讽的哄笑。

十

把聂赫留朵夫护送过单人牢房时那士兵跟聂赫留朵夫说，他会在点人数前来接他，然后

转身走了。军士刚离开，就有一名男犯提着镣铐上的铁链，打着赤脚，上步跨到聂赫留朵夫身边，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汗酸臭，悄悄地跟他说：

“您出面管管吧，老爷。那个小伙子中了圈套。他们把他灌醉了。今早交接犯人的时候，他竟自称是卡尔马诺夫。您出面管管吧，我们是没法管，否则我们会被他们打死的。”男犯人说，神情紧张地张望了一下四周，又立刻从聂赫留朵夫身边走开了。

原来有一个叫卡尔马诺夫的苦役犯，怂恿一个跟他面貌相象、判处终身流刑的小伙子跟他互换姓名，为的是让自己去流放，让小伙子顶替他去服苦役。

聂赫留朵夫早就知道这件事，因为刚才那个犯人上星期就已经把这个骗局告诉过他。聂赫留朵夫点了点头，表示他已经听明白，他会尽力而为。然后头也不回地径直朝前面走去。

聂赫留朵夫从叶卡捷琳堡时就与这个犯人相识了，他那时请聂赫留朵夫为他求情，允许他去服苦役，带妻子一块儿去。聂赫留朵夫对他的请求感到奇怪。这人中等个头，长着一张最常见的农民脸型，三十岁左右，因故意谋财害命而给判处服苦役。他的名字是马卡尔。他犯罪的过程非常奇怪。他跟聂赫留朵夫讲，这罪并非是他马卡尔犯的，而是由魔鬼犯下的。他说，有位过路人去找他父亲，愿意以两个卢布的价钱让他父亲拿雪橇送他到四十俄里外的村庄去。父亲就命令马卡尔送他去。马卡尔套上雪橇，穿好衣服，就跟那过路人一块儿喝茶。过路人一边喝茶，一边跟他讲他要回家结婚，身上带着在莫斯科挣到的五百卢布。马卡尔听到这些，就去院子里，把一把斧子在雪橇草垫下藏着。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究竟为什么要带上那把斧子，”他说，“只知道有个声音说：‘你带上那把斧子。’我就带上了。我们坐着那辆雪橇，上了路。我们一路走着，一切都挺好的。我甚至已忘了那把斧子。眼看我们就要到达那个村子了，只剩下六俄里的路了。我们的雪橇拐离了乡间土路，走上大道，往山坡上爬。我从雪橇上下来，跟在后面走，这时他就小声说：‘你究竟在考虑什么呀？你到了山上，大道上就有人，前头就是村子。这个人可就带着钱走掉了。你要干，现在就得动手，还犹豫什么？’我弯下腰去凑近雪橇，装作要将雪橇上铺着的草整理一下，那把斧子竟仿佛活了似的，自己就跳到我手里来了。他回过头来看我一眼，问：‘你要干什么？’我抡起斧子来，想劈死他。这个人非常机警，立马就从雪橇上跳下来，一把抓住我的手。‘你这个坏蛋要干什么？……’他说。他把我推倒在雪地上，我也不还手，任他摆布。他就用一根宽腰带将我的手捆住，把我扔在雪橇上。不一会儿他把我送到区警察局。就这样我坐了牢。后来受到审判。我们的村社为我求情说好话，说我不是个坏蛋，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我的雇主也替我求情。可是我们没有钱请辩护人，我就被判处四年的苦役刑。”

如今，就是这么一个人想搭救同乡。他很明白，这事有生命危险，可他偷偷的告诉了聂赫留朵夫犯人中的秘密，一旦别人知道是他做的这件事，肯定会活活勒死他。

十一

政治犯住在两间小牢房里，房门外面的那一截过道与外界隔绝。聂赫留朵夫走进这段被隔离的过道，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西蒙松。他穿着短外衣，手里拿着一块松木，正蹲在生了火的炉子跟前，炉门被热气吸进去，正在不断地颤抖。

西蒙松刚与聂赫留朵夫见面，没有起身，只抬起两道浓眉下的眼睛，并跟他握手。

“您来这儿，我非常高兴，我正想见您呢，”他注视着聂赫留朵夫的双眼，显出意味深长的模样说。

“有什么事吗？”聂赫留朵夫问。

“一会儿跟您讲。现在我得先忙这事儿。”

西蒙松接着生火，使用他那套最大限度减少热能损耗的理论。

聂赫留朵夫走进头一间牢房的门时，正巧玛丝洛娃从另一间牢房的门里走出来。她弯着腰，手里拿着笤帚，正朝炉子那边扫着一大堆垃圾和尘土，今天玛丝洛娃穿着一件白色短上衣，裙子的下摆掖在腰里，脚上穿着长袜子，头上扎着齐到眉尖的白头巾，显然是为了挡灰，她见到聂赫留朵夫，就站直了身子，放下笤帚，并将手在裙子上擦了擦，脸涨得通红。

“您在收拾房间吧？”聂赫留朵夫说着，伸出手去同她握手。

“没错，这可是我的老行当。”她微笑着说。“这儿脏得太不象样了。我们打扫了又打扫，还是如此，怎么样，那块方格毛毯烤干了吗？”她转过脸去问西蒙松。

“差不多了。”西蒙松说，他望着她的眼光那么特别，不禁使聂赫留朵夫暗暗吃惊。

“哦，那我待一会儿再来取，同时把我那件皮袄拿来烤烤干。我们那些人都在这儿。”她指了指近处的门口，又对聂赫留朵夫说道，自己却朝远处的门口走去。

聂赫留朵夫把门推开，进到一个很小的牢房中。牢房里，板床上有一盏很小的铁皮灯，发出微弱的光。牢房里非常阴冷，空中充满着尘土、潮气跟烟草味。铁皮灯只把一小块儿地方照亮，板床处在阴影中，墙上映着跳跃的影子。

在这个很小的牢房中，除了两名掌管伙食的男犯去倒开水跟食物了之外，其他的人都在。聂赫留朵夫早就认识的薇拉也在这儿。她越发的又瘦又黄，瞪着一双惊恐不安的大眼睛，额上突起一根粗粗的青筋，剪得短短的头发，身披一件灰囚衣。她在一张铺开的报纸前坐着，报纸上撒着烟叶。她正在不住地往纸筒里装烟叶。

这中间还有一个聂赫留朵夫感到非常可爱的女政治犯——艾米丽雅。她负责管理内务，在他的印象中，虽然处境艰苦之极，她也发挥着女性持家的才能，而且富有魅力。这时她坐在灯边，挽着衣袖，用她那双晒得黝黑的灵巧而优美的手把大小杯子擦干，将它们放在板床的毛巾上。艾米丽雅年纪不大，并不漂亮，却聪明而和善，笑起来让人觉得快乐、活泼和让人着迷。她这时就这样微笑着迎接聂赫留朵夫。

“我们原以为您已经回俄罗斯，再也不会来了呢。”她说。

玛丽亚·巴夫洛夫娜也在这儿。她坐在远处墙角的一个阴暗角落，为一个头发淡黄的小女孩做一件什么事，而女孩正用一种好听的、童稚的声音不停地数说着什么。

“您来了，这真好。见过阿柯修特卡了吗？”玛丽亚·巴夫洛夫娜问聂赫留朵夫。“瞧，我们这儿多了一个什么样的客人啊。”她指了指女孩。

阿纳托利·克雷里卓夫也在这儿。他弯着腰，盘着腿坐在较远角落的板床上，脚上穿着毡鞋，双手揣在皮袄的袖管里，他用害着热病的目光瞧着聂赫留朵夫，脸色憔悴苍白，浑身还在发抖。聂赫留朵夫本想走到克雷里卓夫跟前去，可是房门的右边，坐着一个浅棕色鬈发的男犯人，戴着眼镜，穿着橡胶的上衣，一边整理他背包里的东西，一边跟长相漂亮、面带微笑的格拉别茨讲话。这个人就是很有名望的革命者诺沃德沃罗夫。聂赫留朵夫跟他匆匆

打了个招呼。他所以特别匆忙地与他打招呼，是因为在这批政治犯当中，他唯独不喜欢这个人。诺沃德沃罗夫眨着淡蓝色的眼睛，透过镜片看了看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又伸出一只细长的胳膊来同他握手。

“如何，旅行顺利吗？”他说，明显的带着嘲讽的语气。

“不错啊，有许多有趣的事。”聂赫留朵夫答道，假装没有听出他的嘲讽，当它是亲切的表示。他说完，就走向克雷里卓夫那里。

聂赫留朵夫外表上装作若无其事，可心中却对诺沃德沃罗夫怀着很深的芥蒂的。诺沃德沃罗夫所说的，以及他惹人生气的意图，让聂赫留朵夫的心情变坏。他觉得沮丧而且恼怒。

“您身体如何？”他握住克雷里卓夫冰冷的颤抖的手说。

“没什么，只是身子暖和不过来，衣服都淋湿了。”克雷里卓夫说道，连忙把手揣进皮袄袖筒中。“这里也冷得要命。您看，窗户都坏了。”他指了一下铁栏杆外面玻璃窗上的两个大洞。“您怎么好久没来？”

“他们不许我进来，长官非常严。今天这个还算和善。”

“哼，他是还算和善的长官！”克雷里卓夫道。“您朝谢基尼娜问问，他今天一早做了什么好事。”

谢基尼娜仍坐在那里，讲了今天一早从旅站出发的时候那个小女孩的事。

“依我看，必须集体提出抗议。”薇拉坚决地说，同时胆怯而犹豫地看了看这个人，又看了看那个人。“西蒙松提过抗议了，可这还不行。”

“还要提什么抗议？”克雷里卓夫烦躁地皱起眉头，说。显然，他早已反感了薇拉·叶夫列莫夫娜的华而不实、装腔作势和神经质。“您是来找卡秋莎吧？”他扭过脸对聂赫留朵夫说。“她总是不停地干活，打扫。我们男犯人的这个房间，她已经打扫干净了，现在去打扫女犯人的那一间了。可是跳蚤怎么也无法打扫干净，咬得人不得安宁。玛莎在那儿干什么？”他说着，用头指了指玛丽亚·巴夫洛夫娜所在的那个墙角。

“她在为她的养女梳头呢。”兰采娃说。

“那她不会把虱子弄到我们身上来吧？”克雷里卓夫说。

“不会，不会，我很小心的。现在她非常干净了，”玛丽亚·巴夫洛夫娜说，她又转过脸对艾米丽雅说，“您带着她吧，我得去帮帮卡秋莎了。还要给她把那块方格毛毯拿来。”

艾米丽雅就把女孩接了过来，带着母性的温柔将孩子的两条裸露的小胖胳膊贴在自己的胸脯上，抱起她来放在自己的膝头上，并给她一小块糖吃。

谢基尼娜走出了牢房，那两个去拿开水和食物的男犯紧跟着回到牢房中。

十二

进来的两个犯人其中有一个是年轻人，个头不高，干瘦的身材，披一件有挂面的皮衣，脚穿一双高高的皮靴。他步履轻快地走进来，手中提着两壶冒着热气的开水，胳膊下夹着一块由头巾包起来的面包。

“哦，原来是我们的公爵来了。”他说着，将茶壶放在那些茶杯中间，把面包交给玛丝

洛娃。“我们买到些顶好顶好的东西，”他说着，脱掉皮袄，把它仍过人们的头顶，落在板床的角落里。“马卡尔买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开跳舞会了。啊，艾米丽雅老是将各处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他瞧着艾米丽雅含笑说道。“好，现在你来沏茶吧。”他对她说。

这个人的整个外表，他的动作、他的腔调、他的眼神都透露出活泼，洋溢着欢乐。

进来的另外一个人，个头也不高，瘦骨嶙峋，灰白的脸上高高的颧骨，长着两只距离很宽的漂亮的浅绿色的眼睛跟两张薄薄的嘴唇。他跟前面那个人恰好相反，神情郁闷，精神不振。他身上穿了一件旧的棉袍，靴子外面穿着套鞋，手中拿着两个瓦罐跟两只树皮篮。他将东西放在艾米丽雅前面，只冲聂赫留朵夫点了一下头，可眼睛不停地看着他。然后不情愿地朝他伸出一只满是汗的手，慢腾腾地拿出篮子里的食物在那里放好。

这两个政治犯原本都是平民：前面那个是农夫纳巴托夫，后面那个是工人玛尔凯。

玛尔凯三十五岁的时候才参加革命活动，已经到了中年，纳巴托夫参加革命活动时却只有十八岁。纳巴托夫先是在乡村学校读书，后因才华超群而进了中学，后来一直靠当家庭教师糊口，读到毕业，荣获了一枚金质奖章，但没有进大学，因为他还在七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打定主意：既然自己是从人民中间来的，就应回到人民中间去，去教育那些被遗忘的弟兄。他确实照这样做了：起初他在一个大村子里做文书员，然而不久就因为给农民们朗读小册子，在农民中间创办一个生产消费合作社而被捕入狱。头一次，他在监狱里囚禁八个月，被释放出来后，暗中仍受到监视。而他出狱以后，立刻到另一个省的一个村子去，在那里当教员，继续做他原来做过的那些事。这样他又被捕了，这一次被囚禁一年零两个月，在监狱里他越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第二次出狱以后，他被流放到彼尔姆省。

他逃出了那里。他再一次被抓住，又在牢中呆了七个月，然后被放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他在那里又由于不对新沙皇宣誓效忠，被判放逐到雅库茨克区。所以他成年后有一半日子倒是在牢房和流放中度过的。这种东奔西走的流浪生活并没有令他变得暴躁，也没有消磨掉他的精力，相反的却使他更加精力充沛。他喜欢运动，胃口非常好，总是精力旺盛，充满生气，干这干那，不停地忙着。无论干什么事，他从未后悔，也不海阔天空地幻想，而是一直把全部智慧、聪明和经验投入到现实生活中。他从监狱中出来，总一直是朝自己确定的目标努力，即教育并且团结以农村平民为主的劳动人民。即使坐了牢，他依然精力旺盛、踏踏实实地与外界保持联系，而且就现有条件尽可能地安排好生活，不但为他自己，更为集体。他首先是名村社成员，一直把村社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本人毫无奢求，安于现状，可处处替集体谋利益，并且能够废寝忘食地一直工作，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他出身农民，勤奋机智，做事利落，善于掌握情绪，对人非常有礼貌，不仅能照顾别人的感情，而且能尊重别人的意见。他的老娘是位寡妇，不认得字，满脑的迷信。纳巴托夫一直照料着她，在坐牢之前常去看她。他每次回家，总是详细了解她的生活，帮她做事，并且跟他从前的伙伴，那些农村的年轻人，经常来往。他同他们一块儿吸劣等烟叶卷成的狗腿烟，跟他们摔跤斗拳，跟他们宣传，说他们都是被骗了，应该从这种骗局中清醒过来。每当他考虑或解释革命会带给人们哪些好处时，他这个出身平民的人，总认为人们的生活条件将会跟原来差不多，只不过是拥有土地，并且消灭了地主跟官僚。他认为，革命应该不去改变人民主要的生活方式。在这一方面，他跟诺沃德沃罗夫同诺沃德沃罗夫的信奉者玛尔凯存在着分歧。依他看来，不应该消灭这栋他所热爱的壮丽、坚固、雄伟的古老大厦，

只需重新分配一下里面的房间就可以了。

在宗教方面，他也采取地道的农民态度。他从不思索种种玄虚的问题，不去考虑万物的起源，不去遐想死后的生活。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他的看法与阿拉戈一样，只是目前他认为还没有必要提出这样一种假设。他毫不关心，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开创的，到底是摩西说的对，还是达尔文说的正确。他的同志们认为达尔文学说非常重要，而他却认为这种学说与“六天创造了世界的说法”一样，不过是思想的玩物罢了。

他所以对世界是如何开创的问题不感兴趣，恰恰是因为在他面前永远摆着人应该如何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更好的问题。他从不曾考虑来世的生活。他的灵魂深处保持着一种坚定稳固的信念，这种信念是从历代祖先继承下来的并且为一切种田人所共有，那就是，正如动物界和植物界的任何东西都不会消灭一样，它们只是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粪肥变成麦粒，麦粒变成母鸡，蝌蚪变成青蛙，青虫变成蝴蝶，橡实变成橡树，人也同样，不会消灭，仅仅是发生变化罢了。他坚信这一点，所以他总是精神饱满，甚至面对死亡也高高兴兴地，勇敢地承受种种导致死亡的痛苦，不过他不喜欢谈，也不善于谈这种信念。他喜欢工作，总是勤劳务实，而且推动他的同志们也致力于实际事务。

在这些犯人之间，另一个来自平民的政治犯玛尔凯的气质就完全相反。他十五岁成为工人，开始抽烟喝酒，借以忘记心头模模糊糊感觉到的耻辱。他头一次觉察到这种屈辱，是在过圣诞节时。那时他们这些童工给带到工厂老板娘打扮好的圣诞树前面，他跟同伴们收到的礼物是只花一戈比的小笛、一只苹果、一个用金纸包起来的核桃跟一个干无花果，但老板的儿女获得的，全是些奇妙的玩具，他以后才明白那东西在五十卢布以上。他二十岁时，有 名著名的女革命者去他们厂里当了工人，她觉察到玛尔凯具有超人的才能，就把书和小册子送给他看，而且与他交谈，向他说明他处于这样悲惨地位的原因和改善生活的方法。自从他明白自己同其他人能从这种被压迫的境况中得到解放，他就更加觉得这样不合理的处境是残酷至极可怕至极的，他不但强烈希望获得解放，并且要求对造成和保护这样的不合理局面的人给予惩罚。别人说，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知识，玛尔凯就废寝忘食地学习知识。他不明白，怎么去依靠知识来把社会主义思想变成现实，可他相信，知识既然能让他明白他的处境是反常的，那么知识也一定能消灭这种反常的现象。而且，有了知识，也可以显得比其他人高明。所以他就戒绝烟酒，一有时间就读书，而他自从成为仓库管理员之后，闲暇的时间就更多了。

女革命家指导他读书，对他迫不及待地吸取知识的非常能力觉得吃惊。两年之中，他学会了代数、几何和他尤其喜欢的历史，涉猎了几乎所有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尤其是社会主义学说。

后来女革命者被捕，马卡尔也同她一起被捕，因为在他的住所搜出了禁书。他先是被囚禁在监牢里，后来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在那里他结识了诺沃德沃罗夫，阅读了更多的革命书籍，全都记在心里，这使他的社会主义观点越发坚定了。流放期满以后，他领导一次工人大罢工，最后砸毁工厂，打死了厂长。他再次被捕了，判处褫夺公权，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宗教方面，他同对待现行的经济结构一样，持否定态度。自从他看清楚他从小信奉的宗教的荒诞可笑之后，他就努力抛弃了这种信仰，起初不禁有些胆怯，后来却很轻松高兴。这以后，他仿佛要为他自己和他的祖辈们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似的，一有机会就要尖锐又

激愤地嘲笑教士和宗教教义。

他已经习惯了禁欲主义者的生活，满足于极少的一点点物质要求。就象所有从小习惯于劳动，练就一身发达肌肉的人一样，任何体力劳动他都能承担，并能轻松、愉快地胜任，但他最珍视的还是有闲暇时间，这样他在监狱里和旅站上就能够继续学习了。目前他在钻研马克思的第一卷。他万分小心地把这本书藏在自己的背包里，当做无价之宝。他对所有的同志都疏远、冷淡，唯独特别倾心于诺沃德沃罗夫，无论诺沃德沃罗夫发表什么见解，他都认为是不庸置疑的真理。

他对女人怀有难以克制的轻视态度，认为女人会妨碍所有正经工作。但是他对玛丝洛娃很同情，对她很和气，认为她是下层人民受上层贵族剥削的一个活生生的范例。就由于这个缘故，他讨厌聂赫留朵夫，不跟他谈话，不跟他握手，除非聂赫留朵夫先问候他，他才把手伸出与他握手。

十三

生好了炉子，房间里暖和多了。茶水烧好了，倒进玻璃杯跟带把的杯子中，混上牛奶，成为白色。

那些小面包圈、新鲜的细面粉面包、小麦面包、煮老的鸡蛋、牛油、牛头、牛蹄都摆了出来。大家就都凑到被当作饭桌用的板床上来，一起喝茶、吃东西、聊天。艾米丽雅在箱子上坐着，帮大家倒茶。其余的人都围在她的周围，除了克雷里卓夫。他已经脱掉淋湿的皮袄，裹上那条已经烘干的方格毛毯，躺在床位上，跟聂赫留朵夫谈话。

今天大家一路上淋雨受冻跋涉至此，到了这儿却发现既脏且乱，于是又辛辛苦苦把这里收拾整齐，现在吃到可口的食物，喝下热茶，他们的心情就变得欢畅愉快了。

隔壁传来的刑事犯脚踏地板、喊叫和诅咒的声音，让他们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样，坐在屋中就觉得分外舒服。他们像是处在大海中的孤岛上，不会因为周围的屈辱和痛苦

而烦恼，所以情绪激昂，兴高采烈。他们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地谈论，可是对他们的境遇和前途则避而不谈。除此之外，他们也同所有的年轻男女那样，朝夕共处，自然培养了错综复杂的感情，有意气相投的，也有勉强凑合在一起的。差不多所有人都在谈恋爱。

诺沃德沃罗夫对长得美丽而且总是笑脸相对的格拉别茨很喜欢。格拉别茨从前是个高级女校的学生，年纪很小，思想简单，对革命毫不关心，可她也因时代大潮的冲击，在某个案件中给卷进来，被判处放逐。入狱之前，她生活中的主要乐趣就是讨得男人的喜欢。后来在受审时，在监狱中，在流放路上，这种爱好始终没有改变过。现在在流放途中，因为诺沃德沃罗夫对她的迷恋，她觉得安慰，同时也爱上了他。薇拉非常多情，但不能使人家对她产生爱情。但是，她一会儿喜欢上纳巴托夫，一会儿喜欢上诺沃德沃罗夫，总是希望对方也能对她产生感情。克雷里卓夫对谢基尼娜的感情近似爱情。

他象一般男人爱女人那样地爱着她，不过他很清楚她的恋爱观，就巧妙地将自己的感情掩藏在友谊和感激的外衣底下，而他之所以感激她，是因为她特别温柔地照料他，且照顾得周到细致。纳巴托夫和艾米丽雅之间的爱情关系显得颇为复杂。犹如玛丽亚·巴夫洛夫娜是十足贞洁的处女一样，艾米丽雅也是一个对丈夫十足贞洁的妻子。

当她刚十六岁，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就爱上了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兰采夫。她十九岁那年，同他结了婚，当时他还在大学念书。她的丈夫大学四年级时，卷入这个大学的学潮，

被驱逐出彼得堡，从此成为革命者。于是她也放弃自己正在学习的医学课程，同他一起出走，做了革命者。倘若她丈夫在她心目中不是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就不会爱他，而且倘若不爱他，也就不会嫁给他。但是既然她爱上她心目中这个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而且同他结了婚，那她就自然而然，完全依照这个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的观念来理解生活和生活的目的了。起初他认为生活就是学习，她也就这样认为了。后来他做了革命者，她也就做了革命者。她能够很好地证明现行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永远存在，每个人都有责任同这种制度作斗争，力求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在那种结构中个性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等等。她认为自己确实是这么想的，这么感觉的，然而事实上她只是相信凡是她丈夫所想的都是绝对真理罢了。

她一心追求的，不过是在精神上与丈夫互相协调，水乳交融。只有这样，她才能在精神上觉得满足。

她离开了丈夫，离开了她的孩子——由她母亲带去抚育——她觉得痛苦。可分开时她坚强且镇静，因为她明白她承担这种痛苦是因为丈夫，因为事业——那个事业毫无疑问是正义的，因为她丈夫在为她努力。她在精神上与丈夫永远在一起。她从前没有爱过其他人，现在除了丈夫，也不会爱上其他人。可是纳巴托夫对她的一片真诚和纯洁的感情却打动了她的心，让她无法平静。他为人正直并且坚强，还是她丈夫的朋友，努力跟对待姐妹似的对待她，但他对她的情感却与兄妹情谊不同。这令他们两人都觉得不安，但却令他们眼下艰苦的生活变得容易过些。

因此，在这个小团体里，同恋爱完全不相干的，只有玛丽亚·巴夫洛夫娜和马卡尔。

十四

往常聂赫留朵夫总是等大家喝过茶，吃完晚饭以后才同卡秋莎单独谈话，这一次他照例抱着同样的希望，在克雷里卓夫身旁坐着，同他聊天。聂赫留朵夫顺便对他提起马卡尔向他提出的要求，还讲了马卡尔犯罪的经过。克雷里卓夫认真倾听着，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紧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

“不错啊，”克雷里卓夫突然说，“我经常这么想：我们与他们一块儿赶路，一块儿赶路——‘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我们不怕艰苦长途跋涉，就是因为他们。但是，我们与他们并不相识，也不想与他们相识。他们呢，更可怕，他们还恨我们，把我们当作敌人。看，这有多可怕。”

“这没什么可怕的，”诺沃德沃罗夫一直注意着他们的交谈，这时插嘴说。“普通人总是只对权力才屈服，”他用尖利的声音叫道。“政府拥有权力，他们对政府崇拜，仇恨我们。只要我们掌权，他们就会对我们崇拜了……”

这时隔壁忽然传来一阵诅咒声、击墙声、镣铐的咣当声、尖叫声和喊声。有人在挨揍，有人在喊叫：“救命啊！”

“瞧瞧他们这帮畜生！我们和他们哪能谈得上交朋友呢？”诺沃德沃罗夫冷静地说。

“你说他们是畜生，可是刚才聂赫留朵夫还提及这么一种行为。”克雷里卓夫愤怒地驳斥道，然后讲起马卡尔如何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一个同乡的事。“这可不是什么畜生干得出来的，分明是一种英雄行为。”

“你也太多情多义了！”诺沃德沃罗夫嘲弄地说。“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人的情绪以及他们行为的真正动机。你以为他心肠厚道，然而说不定他这么做只是因为嫉妒那个苦役犯呢。”

“你怎么老不愿意看见别人身上的一点好东西呢。”玛丽亚·帕夫罗夫娜突然激昂地说道。（她对所有的人一概称呼“你”。）

“根本没有的东西，当然无法看见。”

“人家顾不得横死的危险，怎么能说根本不存在呢？”

“我认为，”诺沃德沃罗夫说，“我们如果想完成我们的使命，”玛尔凯原本是在灯下读书，这时把书放下，也注意听他的师长讲话，“就这样，最重要的就是别去胡思乱想，而应该承认现实。应该尽全力为群众工作，可是不要希望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那些人是我们做工作的对象，可只要他们一天跟现在似的糊里糊涂，他们就一天都不能变成我们的同事。”他跟演讲似地说道。“就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还没实现帮助他们发展完毕之前，如果指望他们来对我们提供帮助，那简直是幻想。”

“完成什么发展？”克雷里卓夫涨红着脸说。“我们常讲，我们反对专横霸道和蛮横无理，这难道不是最可怕的霸道吗？”

“完全与霸道不同，”诺沃德沃罗夫镇定地说。“我不过是说，我清楚人民应该走什么样的路，而且能为他们指明这条路。”

“然而你凭什么就相信你所指出的道路是正确的呢？这不就类似于以前产生过宗教裁判所和大革命的残杀的那种专制吗？当初他们也是根据科学且相信那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他们犯了错误并不能证明我也犯了错误。何况，思想家的空想与从实际出发的经济学的论据之间，区别是很大的。”

诺沃德沃罗夫的说话声响彻了整个牢房。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大家都沉默不语。

“老是没完没了地争论。”在诺沃德沃罗夫沉静了一忽儿以后，玛丽亚·巴夫洛夫娜说道。

“那么您自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聂赫留朵夫问玛丽亚·巴夫洛夫娜。

“我认为克雷里卓夫说得对，我们不当把自己的见解强加给人民。”

“哦，那么您呢，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微笑着问她，等着她回答，却又暗暗担心，唯恐她说出什么不适当的话来。

“我认为老百姓在受欺负，”她说，满脸涨得通红，“老百姓太受欺负了。”

“没错，米哈依洛娃，你说的很对，”纳巴托夫叫道，“人民受尽了欺负。我们应当不让他们再受欺负才对。我们全部工作的目标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点。”

“这样解释革命任务可太奇怪了。”诺沃德沃罗夫道，接着就沉默下来，只充满怒气地吸着烟。

“真是同他没法谈。”克雷里卓夫低声说，接着也沉默了。

“最好还是不要谈。”聂赫留朵夫道。

十五

虽然诺沃德沃罗夫被几乎全部的革命者所尊敬，虽然他很有知识，并被认为是非常聪明，可聂赫留朵夫却觉得他这样的革命者的品德比不上一般人。这个人的才智——就如同是分子——是大的，可他对自己的评价——就如同是分母——却远远超过他的才智。

这个人在精神生活方面，与西蒙松具有一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西蒙松这种人具有男性的气质，他们的行动主要由思想活动产生，为思想活动所决定。而诺沃德沃罗夫属于具有女性的气质的另一种人，他们的思想活动主要是考虑如何达到由感情所确定的目标，以及如

何致力于 证明由感情所引起的行动是对的。

尽管诺沃德沃罗夫善于用各种极其动听的理由将他的全部革命活动解释得头头是道，但是依 聂赫留朵夫看来，他这样做仅仅是出于虚荣心，不过是想出人头地，高居于人们之上罢了。开始，他依靠善于体会其他人的思想并进行准确表述的才能，在高度评价这种能力的教师 跟学生中间(在中学、大学同硕士学位进修班)确实名列前茅，出人头地，他觉得非常得意。可是在他获得文凭，从学校离开后，就不能再出人头地了。后来，与讨厌诺沃德沃罗夫的 克雷里卓夫跟聂赫留朵夫所讲的相同，为了在新的环境中再出风头，他就忽然改变方式， 从一个渐进的自由主义者，摇身变成了红色的民主党人。因为他生来缺乏怀疑和犹豫不决这种道德和审美上的特征，他迅速的由革命者成为党的领导人，如此一来他的虚荣心也就获得了满足。他只要选定了目标，就再也没有怀疑，不再犹豫，所以相信自己肯定不会犯错误。他觉得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简单明了，从来都毫无疑问。因为他的想法狭隘、片面，所有的事情的确显得简单明。按他的话说，人只要有逻辑头脑就可以了。他具有过于坚定的自信心，所以人家要么对他敬而远之，要么唯命是从。他是在年轻人中间开展活动的，他们常常把他的过于自信看成是深谋远虑。这样，许多人都服从他的命令，他在革命者中间也就 获得了很高的威信。他的活动就是为起义作准备，通过起义取得权力，然后举行重要会议，并在会议中通过由他起草的纲领。他对这个纲领将解决一切问题深信不疑，所以必须执行。

他的勇敢果断赢得了同志们的尊重，可是大家并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任何人。他将一切杰出的人都看作自己的敌人，如果可能的话，他很想以老公猴对小猴的办法来对付他们。他恨不得剥夺别人的一切智慧和才能，以免他们妨碍自己才能的表现。他只对那些崇拜他的人才好意相待。当前，在流放途中，他对待接受他的宣传的工人马卡尔，对待那两个钟情于他的女人，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和长相漂亮的格拉别茨，就是这样。虽然他在原则上也赞成应该解决妇女问题，然而他在灵魂深处却认为所有的女人都笨不可言，微不足道，只有那些他所迷恋的女人才例外，例如他现在爱着的格拉别茨。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他才认为她们是些不同凡响的女人，只有他自己才能发掘她们的优点。

他认为婚姻关系也同其他所有的问题一样的简单明了，只要对恋爱自由加以承认，就把问题根本的解决了。

他有过一个情妇，还有过一个名正言顺的妻子，可后来与正式的妻子离婚，觉得 他们之间不存在真正的爱情。现在他想要与格拉别茨结成自由婚姻。

诺沃德沃罗夫蔑视聂赫留朵夫，觉得他在对待玛丝洛娃的事情上“装模作样”，尤其是因为在对现行制度的缺点的看法和纠正办法上，居然敢与他诺沃德沃罗夫不同，甚至敢于有他自己的态度，公爵老爷的态度，愚蠢的态度。聂赫留朵夫虽然一路上心情非常好，可明白 诺沃德沃罗夫对他具有这种态度，也没有办法，只得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怎么也不能克制对他的极度厌恶。

十六

长官的说话声从隔壁牢房里传来，大家都安静下来。随后就有一个队长带着两名押解兵走进牢房来。点名的时候到了。队长伸出手指头依次指着每个犯人，清点人数。他指到聂赫留朵夫的时候，就亲热而和气地说：

“爵爷，现在点过人可不能再留在这里了。您还是走罢。”

聂赫留朵夫明白这话的意思，走到他身边，将事先预备的三卢布钞票塞进他手中。

“嗨，真拿你没法！您就再坐一阵儿吧。”

队长刚想出去，另外有个士兵走进来，有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犯跟在后面。那男犯长着一缕稀疏的胡子，一只眼睛下面有疤痕。

“我是到这来看我那个小闺女的。”那个男犯说。

“瞧，爸爸来了。”孩子清脆的嗓音忽然叫了起来，紧接着从艾米丽雅身后探出一个生着淡黄色头发的小脑袋。艾米丽雅正跟玛丽亚·巴夫洛夫娜和卡秋莎一起用艾米丽雅捐出来的一条裙子给小女孩做一件新衣服。

“对了，孩子，是我。”犯人布佐夫金亲热地说。

“您的孩子在这儿挺好的。”玛丽亚·巴夫洛夫娜说，怜悯地望着布佐夫金那张被打伤的脸。“您就把她留在我们这儿吧。”

“这几位小姐在给我做新衣服呢，”小女孩对她的父亲指了指艾米丽雅手里的活计，说，“多好看呀，漂亮极了。”她叽叽喳喳地说。

“你乐意在我们这里住吗？”艾米丽雅摸着女孩的头说。

“乐意。爸爸也住下来。”

艾米丽雅脸上浮起笑容。

“爸爸可不能这样。”她说。“那么就留她在这儿住吧。”她回头对她的父亲说。

“行，那就住下吧。”在门口站着的队长说，说完就同军士一块儿走了出去。

押解人员刚走出去，纳巴托夫就走到布卓夫金身边，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道：

“嗨，老兄，你们那边的卡尔玛诺夫真的要跟别人交换吗？”

布佐夫金亲切随和的脸容立刻变得非常忧郁，他的眼中也像蒙上了一层白雾。

“我没听说，大概不会吧，”他回答道，眼睛上依然蒙着一层白翳似的，接着说：“哦，阿柯修特卡，你就在小姐们这儿享福吧。”他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这件事他全知道。他们果然调换了，”纳巴托夫说，“那您怎么办呢？”

“到了城里，我就去告诉长官。他们两个人的模样我都认得。”聂赫留朵夫说。

大家都默不吭声，显然，担心又会重新引起一场争论。

西蒙松一直躺在角落里的板床上，把两只手枕在头下，沉默不语，这时却突然果断地坐起来，从床上下来，小心地绕过那些坐着的人，来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现在您可以跟我去谈几句话吗？”

“当然可以。”聂赫留朵夫边说边站起来，想同他出去。

卡秋莎看一眼聂赫留朵夫，眼睛跟他的目光碰上了，她马上涨红了脸，像弄不清楚似地摇了摇头。

“我有这么一件事要同您谈一下。”聂赫留朵夫跟在西蒙松身后来到过道中，西蒙松张嘴说。在过道中，刑事犯牢房中的喊叫和说话声听得尤其清楚。聂赫留朵夫皱紧眉头，西蒙松却一点也不介意。

“我清楚您同玛丝洛娃的关系，”他把那双温和的眼睛留神地直盯住聂赫留朵夫的脸，接着说，“因此我想必须……”他说到这儿被迫下来，牢房门边有两个人同时大喊起来：

“我跟你说话，蠢货，这不是我的！”一个声音喊道。

“真想呛死你这恶棍。”另一个嘶哑着嗓子说。

这当儿，谢基尼娜走到过道中。

“在这个地方哪能谈话呀，”她说，“你们去那边的房间吧，那儿只有薇拉一个人。”说着，她就在前面带路，走到邻近的一个很小的、分明是单人牢房的门口，这个房间如今拨给女政治犯居住了。薇拉·叶夫列莫夫娜躺在板床上，盖着被子，头也蒙在里面。

“她害偏头痛，已经睡着了，听不见的。那我走了！”玛丽亚·巴夫洛夫娜说。

“噢，不，你就留在这儿吧，”西蒙松说，“我原本就没有什么要瞒住外人的秘密，更不要说瞒你了。”

“那么，好吧。”玛丽亚·巴夫洛夫娜说着，在板床上坐下，象小孩子一般地扭动着身子后移，移到板床里边坐定，准备听他们讲话，她那双羔羊般的、美丽的眼睛望着远方。

“我要跟您谈的是这么一件事，”西蒙松又讲起来，“我很清楚您与卡吉琳娜·米哈依洛娃的关系，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您说明我对她的态度。”

“那么您究竟有什么事呢？”聂赫留朵夫问，不禁很佩服西蒙松对他讲话的这种直率坦诚的态度。

“我准备跟卡吉琳娜·米哈依洛娃结婚……”

“这倒出人意外！”玛丽亚·巴夫洛夫娜定睛瞧着西蒙松，说。

“……我决定向她求婚。”西蒙松接着说。

“我能做些什么呢？这事必须由她自己决定。”聂赫留朵夫说。

“不错，可是这事她得不到您的同意是没法决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您同她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确定之前，她是无法作出她的选择的。”

“在我这方面来说，事情早已明确了。我想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同时减少她的痛苦，可我绝不想约束她什么。”

“不错，但她不想接受您的牺牲。”

“根本说不上什么牺牲。”

“可是我知道她这个想法是绝不改变的。”

“噢，那么有什么必要看我对这件事的意见呢？”聂赫留朵夫说。

“她想让您也赞同这一点。”

“但是，我怎么能同意不去承担我应承担的责任呢？我只能这么说：我是没有自由的，可她拥有自由。”

西蒙松思索起来，沉默着。

“行，我就这么跟她说。您不要以为我是被她迷住了，”西蒙松接着说，“我爱她，由于她是个稀有的好人，却受尽了苦。我对她毫无要求，可我真想帮她一下，减轻她的痛苦……”

聂赫留朵夫听见西蒙松的嗓音发颤，不禁暗自惊讶。

“……减轻她的痛苦。”西蒙松继续说。“倘若她不想接受您的帮助，那就让她接受我的吧。倘若她能同意，我就会要求上边把我调到她的监禁地点去。四年并不算太长。我会陪

伴在她身边，这样或许能减轻一点她的厄运……”他又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那么，我还能说什么呢？”聂赫留朵夫说。“我自然十分高兴，她能找到一个象您这样的保护人……”

“喏，这正是我所想知道的。”西蒙松接着说。“我很想知道：既然您爱她，希望她幸福，那么您认为她跟我结婚，会感到幸福吗？”

“嗯，应该会的。”聂赫留朵夫果决地回答。

“这件事全得由她做主，我只是期望能让这个受苦的灵魂松一口气罢了。”西蒙松带着孩子般稚嫩又温柔的表情瞧着聂赫留朵夫。这个神色一向阴沉的人的脸上居然会出现这种表情，实在让人意想不到。

西蒙松站起来，抓起聂赫留朵夫的一只手，把脸凑到他跟前，腼腆地微笑着，吻了他一下。

“那我就这么去同她讲。”西蒙松说着离开了。

十七

“哦，怎么回事？”谢基尼娜说。“他是恋爱了，是真的在谈恋爱了。嗨，西蒙松几乎跟一个孩子似的，竟然这样傻乎乎地谈起恋爱来，这可是一点也没想到。实在是太奇怪了，说实 话的，也是太令人不快了，”她说完叹息了一下。

“不过，卡秋莎呢？您认为她会如何处理这件事呢？”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玛丽亚·巴夫洛夫娜暂时停了下来，显然想尽可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她吗？您是知道的，尽管她的过去并不光彩，可是她天生却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而且她的感情非常细腻……她爱您，真心实意地爱您，只要能为您做一件好事，哪怕是消极的，让您不再受她的牵累，她就感到很满足很欢乐了。对她而言，跟您结婚是一种可怕的堕落，比以往的一切堕落都更厉害，因此她绝不会同意这件事的。而且从另一方面看，您老是在她身边出现，这又使她心神不宁。”

“我怎么办呢？我必须离开这里吗？”聂赫留朵夫说。

谢基尼娜天真地微笑了一下。

“不错，多多少少得这么做。”

“多多少少，我怎么能多多少少离开这里一些呢？”

“我这是瞎说的。可是，她的事，我想跟您说，她多半看出他那样的狂热的感情有些荒唐（他实际还没有跟她明白的讲过），所以有些惊喜。跟您说实话，这种事我是不了解的，但我 想，他的爱情尽管比较含蓄，也跟其他男人的那种感情类似。他说这样的爱情令他在精神上变得纯洁，又说它是柏拉图式的。可依我看，这种爱情即便将与众不同，它的基础还是一样 的肮脏……就如同诺沃德沃罗夫对格拉别茨那样。”

玛丽亚·巴夫洛夫娜撇下本题，谈起自己心爱的题目来了。

“可是，我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问道。

“我认为您最好对她说明一下。把事情讲个清楚明白总是不错的。您跟她谈谈吧，我去把她 叫来。好吗？”玛丽亚·巴夫洛夫娜说。

“那就麻烦您了。”聂赫留朵夫说。于是玛丽亚·巴夫洛夫娜走了出去。

聂赫留朵夫独自一人留在小小的牢房里，他听着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发出轻微的呼吸

声，间或夹杂着几声呻吟，又听着隔着两个房门从刑事犯们那边不断传来的嘈杂说话声，一种古怪的情绪不禁涌上心头。

西蒙松对他所说的那番话，使他可以卸下他所自愿承担的责任了，这种责任，在他意志不坚定的时刻，经常使他感到压抑、沉重、难受。然而此刻，他的心情不仅不愉快，反而有些痛苦。

他的心中还有这种想法，就是西蒙松让他无法实现独特的高尚，让他的自我牺牲在他本人心中和别人心中贬值了：既然这么一个与她毫无关联的人都想与她分担痛苦，那么他的牺牲就显得不足为奇了。或许这其中还有一种常见的妒意，由于他已经习惯了领受她对他的感情，无法忍受她再爱其他人。而且，这么一来也让他的计划完全打乱了：在她服刑期间与她一起生活。她如果与西蒙松结婚，他没必要再在这儿呆下去，他就必须要重新思考一下生活计划。他还没顾得上琢磨自己的感情，房门匆忙打开了，传来刑事犯更慌乱的嘈杂（今天他们那儿出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紧跟着玛丝洛娃走进来。

她迅速地走到聂赫留朵夫身边。

“是谢基尼娜让我来的。”玛丝洛娃站在他身边说道。

“不错，我想跟您谈谈。您请坐。西蒙松同我谈过话了。”

玛丝洛娃双手搭在膝盖上，坐下来，模样很镇定，可聂赫留朵夫刚提起西蒙松的名字，她的脸就变得通红。

“他跟您谈了些什么？”她问道。

“他跟我说，他想与您结婚。”

她的脸忽然痛苦似的皱起来。她一言不发，只是低下了眼睛。

“他要求我同意他的想法，或者说说我的看法。我说这完全由您自己做主，应当由您自己做出决定。”

“哎，这都是怎么了啊？为什么这样呢？”她用一种奇怪的斜睨的眼光瞧着聂赫留朵夫的眼睛，那种眼光一向使他特别心动。他们四目相对，都默默地看着对方，彼此的眼神都意味深长，就这样，过了几秒钟。

“这事应该由您自己决定。”聂赫留朵夫重复了一遍。

“我没什么要决定的。”玛丝洛娃说。“所有的都早就决定了。”

“不，您应该决定是否接受西蒙松的求婚。”聂赫留朵夫道。

“像我这么一个苦役犯怎么能跟人家结婚呢？我为什么要毁了西蒙松呢？”她锁紧眉头说。

“嗯，如果能得到特赦呢？”聂赫留朵夫说。

“哎，您不要管我。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边说边站起身，走了出去。

十八

聂赫留朵夫随在卡秋莎身后回到男犯人的牢房，这时候那边每个人都很激动。纳巴托夫原是一个无处不去的人，他同所有的人都有来往，对各种动静都留心观察。他刚刚带回一个让所有人都震动的消息：他在一堵墙上发现一张由被判决做苦工的革命者彼特林写的字条。大家原以为彼特林早已到达卡拉河流域，现在才突然发现他不久前才刚刚单独同刑事犯们一起路过此地。

“八月十七日我一个人跟刑事犯一块儿上路。涅维罗夫本来是同我一块住的，但他在喀山疯人院中上吊了。我身体很好，精力充沛，希望万事如意。”他在这本中这么写着。

大家全在谈论彼特林的近况跟涅维罗夫自杀的缘故。克雷里卓夫却全神贯注，默不作声，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直视着前面。

“我丈夫跟我讲过，涅维罗夫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时就精神不正常，常说看到鬼魂。”艾米丽雅说。

“没错，他是个诗人，是个空想家。这样的人是无法承受单身监禁的痛苦。”诺沃德沃夫说。“至于我，在蹲单身监禁的日子里，就不容许自己发挥想象力，而是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正因为如此，我总能很好地熬过去。

“没什么难熬的！每逢被关进监狱，我倒暗自庆幸呢。”纳巴托夫用活泼的声调说，显然他想驱散大家心头的阴郁。“往日里，人总是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被捕，又唯恐牵连别人，毁掉这个事业，可是一旦关进监狱，那就什么责任都了结，倒可以歇一歇。你就乖乖地坐下来，抽几口烟吧。”

“你跟他很熟吗？”玛丽亚·巴夫洛夫娜焦虑地望着克雷里卓夫那张顿时神色大变的瘦脸，问道。

“涅维罗夫是位空想家？”克雷里卓夫忽然喘着气说，像是他刚叫嚷或者歌唱了好一阵。“涅维罗夫这人哪，就跟我们的神似的，天下少有……不错……他是个跟水晶似的通体透明的家伙。不错，他不但不会撒谎，甚至不会做作。他不但脸皮薄，全身上下都跟给剥掉了皮似的，所有的神经都暴露在外面。不错……他的性格非常复杂，可不是那样的……嗨，说这些没什么用了！……”他停了一会儿。“我们争论到底该怎么干，”他充满怒气地锁着眉头说，“是先对人民进行教育，再改变生活方式呢，还是先把生活方式改变了，再教育群众。还有，我们争论该怎么去斗争：是采取和平宣传，还是采取恐怖方式？不错，我们一直是不停地争论。可他们根本不争论，他们明白要怎么办。杀死几十个人，几百个人，无论那是怎样的好人，可他们不在乎！相反，他们盼望着好人都死掉。不错，赫尔岑说，十二月党人一被解散，社会的整体水平就下降了。哼，怎么会不下降呢！之后，甚至赫尔岑同他那伙人都给解散了。现在又轮到涅维罗夫这样的人……”

“人是不能被消灭光的。”纳巴托夫情绪激昂地说。“肯定有人会活下来的。”

“不，如果我们容忍他们的话，就会没人能留下来。”克雷里卓夫提高嗓门，让大家不要打断他的话，接着说。“递我一支烟。”

“但是，安纳托里，抽烟不利于你现在的身体，”玛丽亚·巴夫洛夫娜说，“请你别抽了。”

“哎，别管我。”他生气地说，点上一支烟，吸起来，但立刻开始咳嗽，难受得好像要呕吐出来。他吐了一口唾沫，继续说：“我们干得不对头，是啊，不对头。我们不应该只发表议论，而应该将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去消灭他们。对了。”

“可是，他们也是人啊。”聂赫留朵夫说。

“不，他们不算人，凡是能够干出他们所干的那些事来的，就算不得人……嗯，听说有人发明了炸弹和飞艇。是啊，我们应当坐着飞艇上天，将炸弹扔在他们头上，像消灭臭虫一样的将他们统统消灭掉……是啊。因为……”他还想说下去，可是满脸忽然涨得通红，

咳嗽得 更加厉害，鲜血从嘴里吐了出来。

纳巴托夫跑出房外去取雪。玛丽亚·巴夫洛夫娜拿来缬草酊给他喝，可是他闭上眼睛，伸出 苍白而枯瘦的手推开她，呼吸沉重而急促。等到湿雪和凉水使得他略微镇静下来，大家服侍 他睡下，聂赫留朵夫就与各位告辞了，跟那个早已来找他并等了很久的军士一起走出去。

刑事犯这时都已平静下来，多数都睡着了。虽然牢房里板床上跟板床下都睡满了人，过道里 也睡满了人，还是住不下全部的囚犯，所以有一些就头枕在包裹上，身上盖着潮湿的囚袍， 躺在走廊地板上睡觉。

从牢房门内，从走廊中，传来阵阵的打鼾声、呻吟声和呓语声。各处可以看到身上盖了囚袍 的身子，紧紧地挤在一块儿。只是在刑事犯的单人牢房中，有几个犯人还没睡，他们在墙角 里围在一个蜡烛头旁边坐着，刚看到士兵走去，就吹灭它。有一个老头子坐在过道的灯下， 赤裸着身子在抓衬衫上的跳蚤。政治犯牢房中充满了细菌的空气，与这间牢房中臭气熏人 的浑浊空气相比，像是干净多了。那正冒烟的油灯看起来像是在雾中闪着光。人在这中间呼 吸都觉得困难。

为了穿过这条过道而又不踩着或者绊着睡熟的人，他就必须预先看清前面可以落脚的空地方， 将一只脚放下去，然后再为另一只脚找地方。有三个犯人显然就连在过道上也没找到睡觉 的空地方，干脆躺倒在前堂里一个臭烘烘的、能从裂缝里渗出粪浆来的便桶旁边睡下了。其 中，有一个是聂赫留朵夫常常在旅途上见到的痴呆老人。还有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他躺在两 个男犯人当中，一头枕在一个男犯人的腿上，一只手托着脸颊。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外，收住脚，挺起胸脯，张开整个肺部，长时间地大口呼吸着凛冽的 空 气。

十九

房子外星光灿烂。聂赫留朵夫顺着结了冰、只有很少几处还有泥泞的道路走回客店，敲 了一下熄 了灯光的窗户，肩膀宽宽的茶房打着赤脚来为他开门，让他走进门廊。从门廊右 边的 披房里传来马车夫响亮的打鼾声；前边院子中传来很多马匹咀嚼燕麦的响声。左边有 一扇门， 通往一间干净的正房。在这间干净的正房中散布着苦艾跟汗酸的味道，隔板之后， 不知什 么人的强壮肺部呼出均匀的鼾声，圣像前面燃着一盏红玻璃罩住的神灯。聂赫留朵 夫把衣 服脱掉，将方格毛毯铺在漆布作面的长沙发上，搁好皮枕头，躺下来，脑袋中重温 着这一 天的所闻所见。

在聂赫留朵夫今天所见的种种事情当中，他认为最可怕的就是那个睡在从便桶里渗出来 的粪 浆当中、头枕在男犯人大腿上的男孩 。

尽管今晚西蒙松和卡秋莎与他的谈话使他感到意外，而且意义重大，可是他不再仔细推 敲 这件事。他同这件事的关系太复杂，何况也太不明确，因此他干脆不再考虑它了。但是 那些蒙 受苦难的人们的种种情形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们在令人窒息的空气里 喘息， 睡 在臭烘烘的便桶渗出来的粪浆当中。那个天真无邪的男孩把头枕在苦役犯腿上的 模样又浮现 在他的脑海里，尤其生动。

意识到远处，有人对另一些人折磨，让他们受到许多种腐蚀、非人的屈辱和痛苦，这是

一回事。在三个月中接连不断地亲眼看到一些人腐蚀和折磨其他的一些人，那可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聂赫留朵夫如今就有这种感觉。他在这三个月中不停地问自己：“究竟是我疯了，所以才能看见人家无法看到的事，还是做了我所看到的那种事的人疯了？”但是，既然做出那种让人吃惊和可怕的事的人（他们有那么多的人）都心安理得，满心相信他们所做的不但必要，并且非常有益，那就不能把他们称作是疯子；可他也不能自认为是疯子，因为感到自己头脑清晰。就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直觉得迷惑不解。

这三个月中的见闻，让聂赫留朵夫得到这种印象：一些人利用法院同行政机关的权利，从自由人中间把那些最神经质、最激烈、最易于冲动、最有才华和最坚强的人抓走。

这些人比别人少了一份狡猾和慎重，对社会来说也丝毫不比那些正享有自由的人更有罪，更具危险性。第一，这些人长年累月被关押在监狱里，旅站上，或者服苦役的地点，过着无所事事、衣食无虞的生活，他们处于人类的自然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条件之外：脱离自然界，脱离家庭，脱离劳动。第二，这些人在那些机构里遭到各种不必要的屈辱，例如戴镣铐，剃阴阳头，穿丢脸的衣服，也就是说被软弱的人剥夺了追求过美好生活的动力：在意道德舆论的束缚，羞耻心，人的尊严感。第三，他们时时都有丧命的危险，因为在监禁地点经常有传染病流行。再者，犯人们体力不支，还经常遭到狱吏的殴打，更不用提中暑、水淹、火灾等等例外情况了。即使最善良、最具道德的人一旦落到这地步，出于自卫的心理也会干出极其残忍可怕的事情，并且看到别人干这类事情，还会原谅他们，何况这些人？第四，这些人被迫结交一些淫棍、凶手、歹徒等，那些已经极端腐化的人对这些还没有

完全腐化的人所起的作用，完全类同于酵母对面团所起的作用。最后，第五，大凡身受这种影响的人，无不通过极有说服力的方式使人明白一个道理。而这种极具说服力的方式恰恰是通过别人强加给他们的种种不人道的行为，例如虐待儿童、妇女、老人，殴打，用树条或皮鞭抽打，对那些抓回活的或者死的逃犯的人给予奖励，拆散夫妻，使得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私通，枪决，绞杀等等。而这些犯人从中明白的道理是：各种暴力、酷行、兽行，在对政府有利的时候，不但不会遭到禁止，反而会获得政府的批准，那么这类行为对那些丧失自由、贫困而不幸的人来说，就更加是可以容许的了。

这全部的办法好象都是精心计划出来的，从而方便于制造在其他条件下没有可能产生的根本性的腐化和罪恶，而且最为充分地散发到全民中去。“几乎跟规定任务似的，要用最有效的方式尽力地多腐化一些人，”聂赫留朵夫分析监狱跟流放路上的见闻，暗自想。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被侵蚀很深，等他们腐败透了，又被放出来，目的是把他们在监狱里养成的坏习惯传播到广大群众中间去。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托木斯克等地监狱里，在各旅站上，聂赫留朵夫看到这个似乎是由社会本身所提出来的目标正在顺利地实现。那些平平常常的、本来具有俄罗斯的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基督教道德要求的普通人，现在却放弃了那些道德要求，吸收了监狱中流行的新观念，其核心就是在有利可图的时候，一切对于人的凌辱、暴力，以至杀害，都是可以容许的。于是坐过牢的人都体会到：教堂的教士和道德的导师大肆宣扬的那些关于尊敬人和怜悯人的道德原则，在现实生活里其实是一概废弃不用的，因此他们也不必再遵守那些原则。这一点聂赫留朵夫在他认识的所有犯人的身上都看到了，费多罗夫如此，马卡尔也是这样，就连塔拉斯也堕落了，他同犯人们一起呆了两个月以后，他的观念也变得不那么道德了，这不禁使聂赫留朵夫担忧。一路上聂赫留朵夫还听说，有些流浪汉潜逃进原始森

林，并且怂恿同伴们跟他们一起逃，后来却把同伴杀死，将他们的肉吃掉。他亲眼看见过一个被控犯了如此罪行的人，而且犯人 也供认不讳。最让人胆惊心战的是这种吃人的事实决非仅此一次，而是经常发生的。

唯有经牢房和流放地培植出来的独特的坏习惯，才可以令一个俄罗斯人成为胆大妄为的流浪汉，他们的意识几乎超过尼采的新学说，对任何事都不存顾虑，简直无所顾忌，而且 将这种理论传播给犯人，而后再传播到广大人民中去。

如今这一切行为，按书本里的说，全然是为了控制罪行，实行警戒，使罪犯改过，依法治罪。可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上述这四种用途。这样做非但不可以制止罪行，还会传播罪行；这样做非但不可以实行警戒，却会鼓励犯罪，很多人就如流浪汉那般自愿入狱；这样干非但不可以改造罪犯，反而会把各种恶习系列地传染给别人，政府的处分非但不能减少报复，反而使人民中间的这种情绪高涨。

“他之所以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聂赫留朵夫问自己，却毫无答案。

最让他震惊的是，这一切并非出于偶然或由于误解，也不是仅此一次。这一切却是经常发生，几百年来绵延不断的，对犯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以前是将他们的鼻子削掉和割耳朵，后来是 在他们身上打上烙印，拴在铁杆子上，现在则给他们套上镣铐，运载他们不是用大车而是用 火车和汽船而已。

据政府官员对他说，那些使他愤慨的事情都是因为监禁和流放地点的设施不完善的缘故，一旦新式监狱建立起来，这一切就能够得到纠正，然而聂赫留朵夫对这种论调并不满意，因为 他认为，让他感到愤慨的事并非因为监禁地点的设备较为完善或者不够完善。他读过塔尔 德的著作，那里推荐一种改良监狱，装有电铃，使用电刑，可是这种经过改良的暴力让他愈 发愤慨。

使聂赫留朵夫愤慨的，主要是坐在法院里和政府各部门里的那一批人，领取从人民身上搜刮而来的大笔薪金，却致力于查阅由同一类官僚出于同一种动机所写成的书本，把违背他们 所制定的法律的种种行为归到各个法律条款下面，然后依照这些条款把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发 送到从此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地方去，到了那种地方这些人就处在 一批粗暴残忍的狱长、看守、押解人员的专横跋扈下，成百万人在精神和肉体上死亡。

聂赫留朵夫逐渐认识了监狱和旅站的情况后，意识到犯人中间流传的恶习：酗酒、赌博、暴行和别的令人丧胆的罪行，人吃人也包括在内，都不是偶然情况，也不像那些思想陈腐的学 者为了偏袒政府而强硬地声称他们是退化、犯罪或者畸形发展，而这种必然的后果是人可以惩罚人这种谬论造成的。聂赫留朵夫觉得，人吃人这种事不是从原始森林开始的，而是开始于政府各部、各委和各局，只是最终结束于原始森林。他看出，类似他姐夫的那些人，和所有的法官及其他文官，从民事执行官到大臣，他们对平时挂在嘴上的正义和人民福利根本漠不关心，他们每个人追求的只是那种因为他们出力造成腐化和苦难而赏给他们的 卢布，

这是很明显的。

“这一切难道都是因为误会吗？怎么做才能使那些官僚停止做他们现在做的事？宁愿照样发 给他们薪水，甚至加上奖金……”聂赫留朵夫想。他一直这样思考到鸡啼第二遍，尽管他的 身体一动，跳蚤就像泉水一样都落到身上，他还是沉沉睡着了。

二十

当聂赫留朵夫醒过来时，马车夫们早已赶着车子上路了。老板娘已喝足茶，用手绢擦着汗涔涔的粗脖子，走进来告诉他说，旅站上有一个士兵送来一封信。信是玛丽亚·巴夫洛夫娜写来的。她写道，克雷里卓夫这次发病比他们所预想的严重。“我们会想把他留下来，我们自己也留下来陪他，可是这没有得到批准。我们只能带着他上路了，但又担心路上会出事。麻烦您到城里后找长官疏通疏通，倘若能够把他留下来，那就让我们当中也留下一个人来陪他。假若因此必须由我嫁给他，那么我，当然，也情愿这么做。”

聂赫留朵夫吩咐跑堂的去驿站叫马车，自己连忙收拾行李。他还没有喝完第二杯茶，一辆带铃铛的三套马的驿车就来到了大门前。驿车车轮滚动在冰凉的泥地上隆隆作响，像在石板路上。聂赫留朵夫给脖子粗粗的老板娘付清了帐，匆忙走出门，坐到马车软座上，打发车夫尽量快赶，一心想追上那批犯人。果然在离牧场大门不远处，赶上了他们的大车。载着袋子和病人 的大车，在冰冻的泥地上缓慢行进。押解官不在这儿，他赶到前面去了。士兵们看起来喝过酒，兴趣盎然地东扯西聊，跟随着车队，走在马路的两边。车辆很多。前面大车每辆坐着六个刑事犯，拥挤不堪；后面的大车每辆坐着三个政治犯；最后的一辆大车上坐着诺沃德沃罗夫、格拉别茨和玛尔凯；倒数第二辆上坐着艾米丽雅、纳巴托夫和一位患风湿症的虚弱女人。谢基尼娜让给她自己的座位。克雷里卓夫躺在倒数第三辆车上，车上铺满了干草和枕头。谢基尼娜就坐在他旁边的驭座上。聂赫留朵夫命令车夫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停住，然后自己走向他。一位醉酒的押解兵朝聂赫留朵夫挥挥手，但聂赫留朵夫不理他，一直走到大车跟前，拉住大车的木柱，走在旁边。克雷里卓夫身上穿着土皮袄，头上戴着羔皮帽，嘴上盖了一块手绢，看上去更加消瘦和苍白。那双漂亮的眼睛更加显得又大又亮。他的身体在大车上轻轻地摇晃着，眼睛盯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询问他的健康，他只是闭上眼睛，恼怒地摇摇头。

他的全部精力分明都消耗在大车的颠簸上了。玛丽亚·巴夫洛夫娜坐在大车的另一边。她意味深长地对聂赫留朵夫瞅了一眼，表示她对克雷里卓夫的情况极其担忧，但随即又快活的声调讲起话来。

“那个军官似乎有些难为情了，”她喊叫道，为的是让聂赫留朵夫在车轮的辘辘声中能听清她说的话，“现在，布佐夫金的手铐取下来了。他自己抱着那个小女孩，阿柯修特卡和西蒙松同他们一起赶路，薇拉也跟他们在一起，接替了我的位子。”

克雷里卓夫用手指了指玛丽亚·巴夫洛夫娜，说了一句话，可是谁也没有听清楚。他的眉头皱起来了，显然在忍住咳嗽，又摇了摇头。聂赫留朵夫把头凑过去，好听清他的话。于是克雷里卓夫把嘴从手绢里露出来，轻微地说：

“现在好多了。只要不着凉就行。”

聂赫留朵夫毫不否定地点头，递了一个眼色给谢基尼娜。

“喂，三个天体的问题怎么样了？”克雷里卓夫又喃喃地说，无力地苦笑了一下。“很难解决吧？”

聂赫留朵夫不懂他的意思，谢基尼娜给他讲述，这是一个确定日、月、地球三个天体关系的有名的数学问题，克雷里卓夫逗乐，将聂赫留朵夫、卡秋莎和西蒙松的关系比作三个天体的关系。克雷里卓夫点头，表明谢基尼娜很理解了他的玩笑。

“我不是解决这问题的关键。”聂赫留朵夫说。

“您收到我的信了?这件事情您负责办吗?”谢基尼娜问。

“我一定会办的。”聂赫留朵夫回答。他看见克雷里卓夫脸上有些不悦，就回到自己的马车，坐在凹陷的车座上坐下，因为坎坷不平的道路和车子颠簸得很厉害，双手便扶住马车两侧。他开始追赶身穿囚服囚袍、戴脚镣和双手铐的囚犯队伍。这个队伍展开有一俄里长。聂赫留朵夫看出道路另一边有载蓝头巾的卡秋莎、穿黑大衣的薇拉和穿短上衣、戴绒线帽子的西蒙松。西蒙松跟妇女们肩并肩走着，嘴里起劲地讲一些事情。

妇女们看到聂赫留朵夫，都朝他点头，西蒙松彬彬有礼地举了举帽子。聂赫留朵夫没什么话跟他们说，便没停车，一直赶到他们前头去。他赶着马车来到坚固的大路上，走得更快了。为了超车，马车时常离开大道，绕过很长的车队，赶到前头去。

这条车辙累累的道路穿过一片阴暗的针叶林。道路两旁栽着桦树和落叶松，树叶还没凋落，现出耀眼的土黄色。刚走到这段路程的一半，树林就到了尽头，道路两旁又展开一片田野，也能看清修道院的金黄色十字架和拱顶了。天空完全放晴了，云雾四散，太阳高高地升到树林上空，无论是潮湿的树叶和水塘，还是教堂的拱顶和十字架，在阳光的照耀下都熠熠发光。右前方，在蓝灰色的远处，有一道颜色发白的遥远的山峦。聂赫留朵夫的那辆三套马的驿车走进城郊的一个大村子。村街上人山人海：有俄罗斯人，也有戴着古怪的帽子，穿着古怪的长袍的外族人。带着醉意的和清醒的男人和妇女，都在店家、小饭铺、酒店、货车旁边挤来挤去，沸沸扬扬。显然，这儿离城很近了。

马车夫扬鞭打了一下右面拉边套的马，紧了紧缰绳，侧着身子坐在驭座上，好让缰绳往右边收。显然，他要露一露身手，就赶着马车顺着宽广的街道一路奔驰而去，没有放慢速度，一直跑到河边。那条河必须坐渡船才能过去，此刻渡船正从对岸划过来，已经到达水流湍急的河心。这边岸上大约有二十辆货车等着过河。聂赫留朵夫没有等多长时间，渡船就逆流而上，到达上游的高处，又被急流冲下来，不久就靠拢这边码头的跳板上了。

渡船上的工人穿着羊皮袄和长统靴，沉默寡言。他们都生得身材高大、肩宽膀圆、肌肉发达。他们灵巧而熟练地甩出缆索，套在木桩上，然后打开船门，让停在渡船上的货车上岸，再把候船的货车放上船来，车辆和马匹装满了整整一船。

又宽又急的河水敲打着渡船的两舷，绷紧了缆索。等渡船装满旅客，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和卸下的马匹，拥挤在周围大车中，得在渡船边停住，船夫便关上船板，也不理睬那些没有上船的旅客，解开缆索开船。渡船上一片沉静，只听见沉重的脚步声和马脚踏船板的声音。

二十一

聂赫留朵夫站在渡船边上，远望着宽阔湍急的河水。他的头脑里交替出现着两个形象：一个是快死的克雷里卓夫，他满脸愤容，脑袋被大车颠得摇摇晃晃；一个是同西蒙松一起在路边的卡秋莎，她精神抖擞。使他沉重悲伤的便是垂死挣扎的克雷里卓夫；

后一个印象，生气蓬勃的卡秋莎得到西蒙松这样的人的爱情，如今已经走上一条稳固可靠的正路，这原本是可喜可贺之事，而聂赫留朵夫却觉得并不轻松，内心也没法克服这种沉重的感觉。

城里教堂的大钟敲响了，洪亮的钟声和震颤的铜音在水面上荡漾。站在聂赫留朵夫身旁的马车夫和所有赶大车的都纷纷脱掉帽子，在胸前画十字。只有一个身材不高、头发蓬松的老人例外。聂赫留朵夫起初并没有注意他，他站得比别人都靠近船栏杆，此刻正抬起头来，打量着聂赫留朵夫。老人上穿一件打补丁的褂子，下穿一条粗呢长裤，脚上穿一双带补丁

的旧长筒靴；他的肩膀后面背着一个小包袱，头戴一顶高高的破皮帽子。

“老头子，你为什么不做祷告？”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夫把帽子戴上，拉拉正，问道，“难道你不是基督徒吗？”

“你叫我向谁祷告？”头发蓬乱的老头儿生硬地回答。他说得非常快，但每个字都说得很吐词清晰。

“当然是向上帝口罗，”马车夫讥笑地说。

“那请你告诉我，他在哪里？上帝在哪里？”

老头儿的神情非常严肃坚决，马车夫感觉到和他打交道的人很刚强，有点心慌，但表面上不露声色，尽力不让自己被老人的话堵住嘴，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就赶紧回答说：

“在什么地方？当然是在天上。”

“那你去过那个地方吗？”

“去没去过无所谓，反正大家都知道应该向上帝祷告。”

“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一个什么地方见过上帝。上帝是由活在天之父亲心里的独生子说出来的。”老人严厉地皱起眉头，又快速地说。

“看来，你离经叛道，你是个洞穴崇拜者。你就向洞穴祷告吧。”马车夫说着，把马鞭杆子插进腰里，扶正拉边套的马的皮套包。

有个人笑起来。

“那么你信什么教呢，老大爷？”挨着船边的一辆货车站着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人问道。

“我什么教也不信。我除了相信自己外，对谁都不相信，对谁都不相信！”老人回答道，声音依然既急速又果断。

“但是人怎么能只相信自己呢？”聂赫留朵夫也加入了这场谈话说。“这样做容易错误。”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错事。”老头儿扬一扬头，果断地回答。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呢？”聂赫留朵夫问。

“世界上之所以有各种宗教，是因为每个人都相信别人，却不相信自己。我以前也是这样相信别人，结果迷了路，像进了原始森林一样迷失方向。我完全迷失方向，再也找不到出路。

有人信旧教，有人信新教，有人信安息会，有人信鞭身教，有人信教堂派，有人信非教堂派，有人信奥地利教派，有人信莫罗勤教，有人信阉割派。各种教派都只说自己好。实际上他们都像狗崽子瞎眼一样，只会在地上乱爬。信仰很多，但灵魂只有一个。我们大家都有。每个人只要相信自己的灵魂，就能共同渡过。只要每个人保持自己的特色，就能齐心协力。”

老头儿声音很大，不住地向四周打量，显然希望能引来更多的人听他讲话。

“哦，您这样说教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吗？”聂赫留朵夫问他。

“我吗？好久了。我已遭受了二十三年的迫害。”

“他们怎么迫害你？”

“他们就像当年迫害基督一样迫害我。他们抓我去吃官司，又送到教士那儿，然后送到读

书人那儿，送到法利赛人那儿。他们甚至还把我送到疯人院。可是他们对我无计可施，因为我是个自由人。他们问我：‘你的名字叫什么？’他们认为我肯定会有名字，可我什么名字也不要。我放弃任何东西，我没有名字，没有居住地，没有祖国，一无所有。我就是我。

我的名字叫什么？叫做人。人家问我：‘你年龄多大？’我说我从来不数，也没有办法数，因为我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活着。别人问我：‘那么你的父母是谁？’我回答，我没有父亲母亲，只有上帝和大地。上帝就是我的父亲，大地就是我的母亲。别人问我：‘你承认不承认皇帝？’我为何否认？他是他自己的皇帝，我是我自己的皇帝。他们说：‘简直没办法和你说话。’我说，我又没有要求你跟我说话。他们偏要如此折腾。”

“那么您现在到哪儿去？”聂赫留朵夫问。

“上帝指引我到哪儿去，我就到哪儿去。有活干，我就干活，没有活干，我就讨饭。”老人看到渡船就要靠岸，就结束了他的发言，得意地瞥了一眼所有听他讲话的人。

渡船在对岸停下，用缆索系住。聂赫留朵夫取出钱夹，拿出一点钱给老人。老人不肯接受。

“我不要这种东西，我要面包。”他说。

“哦，我很抱歉。”

“谈不上抱歉不抱歉。你又没有得罪我。何况，想得罪我也办不到。”老人说着，动手把原已卸下来的背包重又放到肩上。这时候，聂赫留朵夫的驿车已经套上马，上了岸。

“老爷，您没有必要跟他说那么多话，”马车夫等聂赫留朵夫给了健壮如牛的船夫酒钱，坐上车，就对他说。“哼，这个流浪汉不规矩。”

二十二

马车爬上斜坡，车夫转过身来问道：

“您想去哪一家旅馆哪？”

“哪一家比较好？”

“最好的就是西伯利亚旅馆了。不过玖可夫旅馆也很好。”

“那就随你吧。”

马车夫又侧身坐好，加快了赶车速度。这个城市同俄国所有的城市一样，也有带阁楼的房屋和绿色的房顶，也有一座大教堂和小铺，大街上也有商店，而且也有那样的警察。唯一的差别只在于房屋几乎都是用木头造的，街面没有铺石子而已。马车夫把那辆三套马的马车赶到一条最热闹的街道上，停在一家旅馆门口前。可是恰巧这家旅馆没有空房间，因此不得不上一家去。另一家旅馆还有一个空房间。这是两个月以来聂赫留朵夫第一次住在他生活习惯的、比较清洁舒适的环境里。尽管聂赫留朵夫下榻的房间并不算奢华，可是在经历过驿车、客店、旅站的生活以后，他仍然感到非常舒适。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清除他身上的虱子，自从常在旅站里进出以来，他就从不曾彻底摆脱过他们。他将行李安顿好，立刻坐车到澡堂去，然后换上城里人的装束，穿着浆硬的衬衫、搁在箱底而压出了皱褶的长裤、礼服、大衣，动身去拜访当地的长官。旅馆的看门人从街头叫来一辆马车。那是一辆四轮马车，由膘头很肥的、吉尔吉斯种的高头大马拉着，带着吱嘎的响声，一路颠簸地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所富丽堂皇的大厦跟前，几个卫兵和警察站在大厦门前。

屋前屋后都是花园，叶子早已凋落的杨树和桦树，露出光秃秃的树枝，而夹在其中的枞树、松树和冷杉的枝叶却很茂密，苍绿得可爱。

将军身体不是很舒服，不想见客。但聂赫留朵夫仍然要求听差替他递名片进去。听差回来，带着令人满意的回答：

“将军请您进去。”

前厅、听差、传令兵、楼梯和擦得锃亮的铺着镶木地板的客厅都同彼得堡一样，就是肮脏些，古板些。听差把聂赫留朵夫带到书房里。

将军是个多血质的人，面孔浮肿，鼻子象土豆，额头上鼓起几个紫疱，头顶光秃，眼眶底下眼袋很大。此刻的他身穿一件鞑靼式的绸料长袍，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支纸烟，正用一只带银托的玻璃杯喝茶。

“您好，阁下！请您原谅我穿着长袍接待您，不过这样总比不接见要好。”他说着，拉起床褥来盖上他的粗脖子，脖子后面的肥肉形成一道道皱褶。“我身体不大好，呆在家里没有出门。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个边远的小城里来了？”

“我是随着一批犯人来到这儿的，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跟我关系密切，”聂赫留朵夫说，“现在我拜访阁下，一部分就是为这个人的事情求您帮忙，另外还有一件别的事。”

将军深吸一口烟，喝下一口茶，将纸烟放在孔雀石的烟灰碟上，他那狭窄的、浮肿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刻也不曾离开过聂赫留朵夫，专心致志地听他讲下去。他只有一次打断了聂赫留朵夫的话，问他要不要吸烟。

这位将军就是那些往往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可以同他们的职业相协调的一些有学问的将军之一。他天性聪明善良，不久就发现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他渐渐地沉湎于军人中盛行的酗酒恶习，以解除内心经常出现的各种苦恼。在军队任职了三十五年之后，他就变成了医生们戏称的嗜酒如命的酒鬼。他什么酒都喝，浑身每一个细胞都渗透了酒精。喝酒已成为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只要能觉得醺醺然就好。不喝酒他就无法度日，每天傍晚他总是喝得酩酊大醉，但他已习惯这种状态，因此大醉的时候走路不会摇晃，说话也不至于太出格或有失体统。由于他地位显赫，即使偶尔说出什么蠢话来，别人反而会把它当作警世格言。只有此时聂赫留朵夫找他说的那段清晨时光，他才会头脑清醒，听懂人家对他的讲话，恰恰证实他那句心爱的谚语：“喝酒不糊涂，难能又可贵。”最高当局知道他是个酒鬼，但他接受的教育毕竟比别人多一点（他的学识仍停留在酗酒成癖前的水平），而且为人胆大、灵活、威严，即使喝醉酒也没有做出有失自己身份的事情，因此一直让他留在这个地位显赫而又重要的位子上。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他所关心的人是被错判了罪的女人，为改判她的刑罚，他已经向皇上递了御状。“哦！那又会怎么样？”将军说。“彼得堡方面答应我，最迟这个月能通知我有关这女人命运的消息，通知书将会寄到这里……”

将军伸出很短且粗壮的手指头，按了按桌上的铃，眼睛依旧盯住聂赫留朵夫，然后喷出嘴里的烟，特地响亮地清了清喉咙，又静静地听下去。“因此我请您能批准我的要求，在没有收到那个状子的批复以前，如果可能的话，暂时让她留停在此地等候几天。”这时候，走进来一个穿军服的听差。“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起来了没有，你去问一下，”将军对勤务兵说，“另外再送点茶过来。那么，您说说另一件事是什么？”将军问聂赫留朵夫。

“我的另一个要求是，”聂赫留朵夫说，“这会涉及到这批犯人中的一个政治犯。”“哦，是这么回事！”将军意味深长地点头说。“现在他病得十分厉害，都奄奄一息了，必须让他留在这儿的医院里进行治疗。有一名女政治犯自愿留下来照顾他。”“大概她不是他的亲属吧？”“不是的，但如果允许她留下来照顾他，她随时准备嫁给他。”将军默默地听着，那双目光锐利的眼睛一直盯着聂赫留朵夫，他不住地吸着烟。显然想用这种目

光把对方逼得局促不安。等到聂赫留朵夫讲完这一切，他从跟前桌上拿起一本书，舔湿了手指，迅速地翻动书页，找到有关结婚的条款，看了一遍。“她被判的是什么刑？”他抬起眼睛问。“判处她服苦役。”“哦，判了这种刑的犯人，即使结了婚，也不可能改善待遇。”“可是您要知道……”，聂赫留朵夫焦虑地打断了他的话。“请您让我把话说完。即使她同一个自由人结了婚，照样得服满她的苦役。这儿有个关键问题：他或她，哪一个判的刑更重？”“他们俩人都是判了苦役。”“嘿，他享受什么待遇，她也享受什么待遇，这倒是地位相当。”将军笑着说。“有病的可以留下来住进医院，”他继续说，“当然会尽量设法减轻他的痛苦。不过她不可能留在此地，即使嫁给他……”“将军夫人正在厅里喝咖啡。”勤务兵报告说。听罢将军点点头，又继续说：“不过可以让我再考虑一下。请您在这儿写上他们的名字。”聂赫留朵夫迅速地写下他们的名字。“对不起，对这种事我也无能为力，”听到聂赫留朵夫要求同这位病人见一面，将军这样说。“您关心他，关心别的人，您又有钱。对您我当然不会怀疑，”他说，“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钱确实是万能的。上面要求我彻底查清并杜绝贿赂。可如今怎么杜绝得了？大家都在接受贿赂，官位越低的人，收得贿赂就越多。唉，怎么查得出来？他在五千俄里外是否受贿，在那边就像我在这儿一样，他也是个土皇帝。”他说到这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不过看起来您似乎常跟政治犯见面吧，只要您给了他们钱，他们就会畅通无阻地放您进去，不是吗？”他笑嘻嘻地说。“我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吧？”“是的，确实如此。”我明白您可怜那个政治犯，想要见一见他，您只能这样做。于是典狱长或者押解兵就会接受您的贿赂，因为他得养家糊口，他的薪水只有那么几个钱，非得这么做不可。如果我是处在您的地位或者他这样的地位，我也会照此办的。因为我也是个人，也会动恻隐之心的，然而就我目前的地位来说，违反最严格的法律条文是不能容许的。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法官，要凭自身一定条件才得到上司的信任，我不可能辜负这种信任。好吧，这件事就说到此为止吧。现在您能不能给我讲讲，你们京城里还做些什么新闻吗？”随后将军就开始向聂赫留朵夫发问，自己也就将听到的新闻不时地发表意见，分明是想听听新闻，又想显露出自己的才识和人道主义精神。

二十三 “哦，请问您在玖可夫旅馆下榻吗？哦，那可是糟透了的地方。待会儿您到我这儿来吃晚饭吧，”将军一边往外送聂赫留朵夫，一边说，“下午五点钟。噢，您会说英语吗？”“会的，会说。”“哦，简直太好了。实不相瞒，不久前我们这儿来了一位专门研究西伯利亚流放和监狱的情况的英国人，是个周游世界的旅行家。今天我们邀请他来这儿吃饭，您也来吧。我的妻子要求严格遵守时间，我们五点钟准时开饭。我下午给您答复，关于怎样处理你说的那个女人，还有那个垂死的病人，也许可以破例留下一个人来照顾他。”辞别将军，聂赫留朵夫的心情特别兴奋，就连忙乘车赶往邮政局。设在一个低矮的拱顶房间里的邮政局，坐在斜面办公桌后的几名邮务员正把堆成小山似的邮件分发给聚集在那里等候的人群。一个歪着脑袋的邮务员，熟练地将一个个信封拉到面前，不停地盖着邮戳。聂赫留朵夫说出自己的名字，没有久等就交到他手里一大堆邮件。其中有汇款、几封信、几本书，还有一本最新的期刊《祖国纪事》。聂赫留朵夫拿起这堆邮件，走到屋里放置的木板长凳旁边。长凳上坐着一个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正在等着领什么东西的士兵。聂赫留朵夫坐在他旁边，翻阅收到的这几封信。其中有一封很显眼的挂号信，十分讲究的信封，上面还盖有颜色鲜红，字迹清楚的火漆印。他拆开了信封，信是谢列宁写的，里面还附着一份公文，他的心顿时缩紧了，仿佛血一下子都涌上脸孔。这就是关于玛丝洛娃案的最终批复。难道是驳回吗？究竟是个怎样的批复呢？聂赫留朵夫用目光匆匆地浏览了一下字迹很小、难以辨认、但笔迹刚劲的信，不由得高兴地松了一口气。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批复。

“我最亲爱的朋友！”谢列宁写道。“你我之间进行的那次谈话，至今令我记忆深刻。关于玛丝洛娃一案，我仔细查阅了这个案件，看出她确实受到不白之冤，你所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这确实令人感到无限愤慨。不过只能由你递交状子的上诉委员会来改这件案子。

我协助了他们重新裁决这个案件，现随信寄去减刑公文的副本，是叶卡吉琳娜·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给我的这个地址。公文正本即将转到西伯利亚总署，现已送往当初她受审的监禁地。我想尽快地把这个喜讯告诉你。友好地紧握手。你忠实的朋友谢列宁。”公文内容如下：“皇帝陛下亲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案由某某号，案卷某某号。某某种，某年，某月，某日。奉皇帝陛下受理的上告御状办公厅主任令，因皇帝陛下亲自披阅玛丝洛娃的御状，体恤民情，恩准所请，兹特通知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将该犯所判的苦役改为流放，并在西伯利亚较近处执行即可。”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聂赫留朵夫盼望着为卡秋莎和自己所做到的事，如今已经真的实现了，这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不错，她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同她的关系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了。以前他提出要同她结婚，可她是个苦役犯，至多能稍稍改变她的处境罢了，其余都是徒具形式，如今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止他们生活在一起了。况且聂赫留朵夫从心底里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昨天她对他所说的那番话究竟有什么含义？她同西蒙松的关系又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她同意跟西蒙松在一起，究竟会变成好事还是变成坏事？这些问题搅得他一塌糊涂，怎么也理不清思绪，索性就不去想它们。

“以后这一切都会清楚的，”他想，“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赶快去见她，告诉她这个喜讯，把她从那种可怕的地方立即释放出来。”他天真地认为凭着拿到手的副本就足以办成这件事。一走出邮政局，他吩咐车夫立即送他到监狱。聂赫留朵夫凭借以往的经验知道，尽管将军没有准许上午探监，但在上级长官那里绝对办不成的事，在下级官员那里倒是很容易办得到的，因此决定先去到监狱，告诉卡秋莎这个喜讯，也许当时就可以把她释放出来，同时再打听一下克雷里卓夫的健康情况如何，并转告他和谢基尼娜关于将军对他们的处理。

这个满面威风的典狱长很严厉地接待了聂赫留朵夫，粗暴、直率地声称未经上级长官的批准，任何人不允许进去探监。聂赫留朵夫忙解释说，在京城里他也常去探监。典狱长听了这话回答说：“这很有可能，但在这里我不容许这样做。”他说这话时的口气仿佛还表示：别以为你们这些老爷是从京城里来的，就可以吓唬住我们，弄得我们诚惶诚恐地听从你们的吩咐，虽说这里是东西伯利亚，但我们也知道严守法纪，必要时还会给你们点颜色瞧瞧。聂赫留朵夫天真地以为他一出示公文副本，玛丝洛娃就可以当场获得释放，不料皇帝陛下办公厅下发的公文副本对典狱长没有丝毫作用。他态度蛮横地断然拒绝聂赫留朵夫去探监。典狱长对他只是轻蔑地微微一笑，声称必须持有他顶头上司的命令，才能释放任何人犯。通知玛丝洛娃，告诉她说她已获得减刑，这是他能做的唯一事情。一旦接到上级的批文，不会耽搁一个钟头，就会立刻把她释放。他还拒绝提供关于克雷里卓夫的目前健康状况的任何情况。他说他还不清楚有没有这样一个犯人。聂赫留朵夫毫无所获，无可奈何坐上马车回旅馆。典狱长之所以态度这样严厉地对待聂赫留朵夫，主要是因为监狱里收容了比平常多一倍的犯人，牢里拥挤不堪，而且在犯人中大面积地流行伤寒。在回去的路上聂赫留朵夫的车夫告诉他说：“监狱里已经死了很多犯人，正流行瘟疫，每天都有二十多人被埋葬。”二十四 尽管在监狱里碰了壁，但聂赫留朵夫还是兴奋异常地乘车去了省长办公室，查问关于玛丝洛娃的减刑正式公文有没有到达。查问后得知公文还没有到，于是聂赫留朵夫乘车一回到旅馆，立刻写信告诉谢列宁和律师这件事。写完信，他看了看表，已经到了去将军家赴宴的时间了。在路上他思绪万千，想着以后会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卡秋莎知道对她的减刑判决后会有什么想法？她将被规定在什么地方居留？他将如何跟她一起生活？西蒙松又怎么办？她对他现在究竟抱什么样的态度？聂赫留朵夫想起她精神上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想起了她的一些往事。“现在必须把那些事一笔勾销，彻底忘记。”他想，连忙把头脑里有关她的念头全部驱除掉。“到时候一切都会清清楚楚的。”他自言自语道，接下来又在考虑，在这次晚宴上该对将军说些什么。将军家的宴会充分显示出富豪奢侈和达官贵人的生活排场，十分豪华气派。尽管聂赫留朵夫以前已经习惯了这种排场，但由于他已长期没有享受这种奢侈，甚至连最起码的舒适条件都没有，因此参加

这样盛大的宴会就使他心里格外愉快。曾在尼古拉宫廷里做过女官的女主人是那种彼得堡的老派贵夫人，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俄语对她来说反而有点陌生。她不论做什么事，总是身子挺得笔直，臂肘贴住腰部。她文静而有点忧郁，尊敬和体贴丈夫，对待客人照顾周到而亲切，但在不同程度上因人而异。她待他特别殷勤，把聂赫留朵夫当作自己人看待，奉承他而使人丝毫没有察觉。这一切重新唤起聂赫留朵夫尊贵的意识，并为此而感到得意洋洋。她使他觉得西伯利亚之行虽然有些古怪，却是品德高尚的行为，而且显示出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将军夫人这种令人回味的微妙奉承和将军家里豪华气派的奢侈生活，使聂赫留朵夫陶醉于漂亮的陈设、美味的食品以及同那些教养有素的人们的愉快周旋之中，仿佛这两个月来的生活是一场可怕的恶梦，如今从梦中醒来，又重新回到现实中来。除了将军的女儿和她丈夫以及将军的副官等家里人之外，在筵席上就座的，还有那个刚来不久的英国人、一个开采金矿的暴富的商人和一个来自西伯利亚边城的省长。因为心情愉快的缘故，聂赫留朵夫觉得这些人都那么和蔼可亲。那个身体强壮、脸色红润的英国人，尽管法语讲得很蹩脚，英语却讲得像演说家一般优美流畅。他讲到美国、印度、日本和西伯利亚的见闻，这种见多识广的谈吐，使大家都觉得他是个知识渊博而有趣的人。如今穿着一身在伦敦特意定做的燕尾服，衬衫袖子上配着钻石钮扣的开采金矿的年轻商人，原是个农民的儿子，信奉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家里藏书万卷，知识丰富，为慈善事业募捐过很多钱，给聂赫留朵夫留下不错的印象。这是通过教育，使一个健康农民接受欧洲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楷模。至于那个长得胖乎乎的，生有稀疏的鬃发和一双温和的浅蓝色眼睛的边城省长，原来就是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时听说的那个因贪污问题而被调往西伯利亚任省长的人。此人下身特别肥胖，两只戴满戒指的手被保养得很好，脸上时常浮着使人看上去很舒畅、很愉快的微笑。因为在城里大批惯于接受贿赂的官员中间，唯独他不接受任何贿赂，深受男主人的赏识；而热爱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的女主人，之所以很赏识这位省长，是因为他也是个相当出色的音乐家，二人常常四手联弹。因为玛丝洛娃被减刑的事得到证实，聂赫留朵夫今天心情特别愉快，连这个人也没能引起他反感。下巴刮得发青，精力充沛，情绪极好的副官，处处忙着为别人效劳，殷勤而周到细致的态度招到所有人的喜爱。不过，还是将军的女儿和她的丈夫这对年轻夫妇令聂赫留朵夫更加喜爱。长得并不美的将军的女儿，生性忠厚，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她的两个幼小的孩子身上。她与她丈夫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为此同父母长期争吵过。信仰自由主义的丈夫，天资聪明，为人谦逊，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副博士学位，现在官府做统计工作。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喜爱百姓，非常关心非俄罗斯人的问题，尽自己的全力来拯救这些面临绝种危险的非俄罗斯人。为在这里遇到这样一位有趣而又高贵的伙伴并能结交感到很高兴，人人对聂赫留朵夫都很亲切殷勤，将军身穿军服，脖子上挂着白十字章，亲自出来主持宴会。将军像对老朋友似的对聂赫留朵夫打了个招呼，热情地邀请客人们品尝冷盘和伏特加。然后问聂赫留朵夫离开他家之后又做了些什么，聂赫留朵夫说他到过邮政局，已经收到了早晨谈起的那个女人已得到减刑的公文副本，同时请求将军准许他再次探监。在吃饭期间谈公事，将军显然很不满意，他皱了皱眉头，一言不发。“您还想来点伏特加吗？”他转过身去用法语招呼那个向他走过来的英国人。干了一杯伏特加之后，英国人说他今天已经参观过那座大教堂和一座工厂，还希望能参观一所大的关押犯人的监狱。“那真是太巧了，”将军对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可以一起去。您去给他们开一张特殊通行证。”他对副官说。“您觉得什么时候去合适？”聂赫留朵夫问那个英国人。“我很愿意在晚上去参观监狱，”英国人说，“所有的人都像原来那样呆着，一切都保持本来面目，事先没有做好准备。”“哦，你真想看看其中的内幕吗？那你就随便去看吧。我曾向上司写过呈文，可是他们根本不睬我的建议。那就让他们在外国报纸上去领教吧。”说着将军走到餐桌旁，女主人礼貌热情地招呼着客人们入席。聂赫留朵夫坐在彬彬有礼的女主人和英国人中间，他的对面坐着温和善良的将军的女儿。

和肥胖的、保养得很好的某局前任局长。筵席上谈论得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气氛时而热闹非凡，时而庄严肃静，首先谈到了印度——是那个英国人谈到的，后来谈到法国人远征东京——对这事将军声色俱厉地加以谴责，又谈到在西伯利亚普遍流行的官员欺诈和受贿行为。聂赫留朵夫对这些谈话都不太感兴趣。饭后大家来到客厅里一起喝着新鲜、可口的咖啡，聂赫留朵夫却津津有味地跟英国人和女主人谈起了格拉斯顿。他自我感觉良好地发表了许多使他们很感兴趣的精辟的见解。吃了一顿好饭，喝了一些美酒，这会儿坐在将军家那柔软舒适的沙发上，一边喝着热咖啡，一边同亲切和蔼、富有教养的人谈话，聂赫留朵夫的心里越来越感到畅快无比。仿佛又回到从前那种美好生活之中。这时，那个英国人请求女主人跟那个肥胖的西伯利亚省省长合弹一曲他们已经弹得很熟练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在这音色优美的交响曲中，聂赫留朵夫产生一种好久没有产生过的自我陶醉的幻觉，仿佛现在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个品德多么高尚的好人。那架音色优美的大钢琴，把交响曲又弹得很出色，使人的心里产生了一种美的感觉，至少喜欢和熟悉这支交响曲旋律的聂赫留朵夫此刻就有这样的感觉。听着优美而熟悉的旋律，不禁感到鼻子发酸，对自己这段时间所做的各种高尚行为十分感动。即将告辞之前，聂赫留朵夫非常感谢女主人如此盛情的招待，说他好久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快乐。孰料女主人的女儿涨红着脸，神情果断地走到他跟前，说：“您愿意去看看，您刚才问到的我那两个孩子吗？”“她总是傻乎乎地认为谁都想看看她的孩子呢。”做母亲的看到女儿如此天真不懂事，微笑着说。“人家公爵对这些才不感兴趣呢。”“不，您恰恰说错了，我很感兴趣，非常感兴趣。”被这种浑身洋溢着母爱的母亲所感动的聂赫留朵夫说。“那么，请吧，请您带我去看看您可爱的孩子。”“她居然邀请公爵看她的小娃娃了。”正同他的女婿、金矿主和副官一起打牌的将军，从牌桌那边笑着叫起来。“您快去吧，去尽义务吧。”一想到尊贵的，来自大都市的客人马上要对她的孩子进行评判，少妇显然很激动，领着聂赫留朵夫快步走到里屋，来到第三个房间。那个房间的房顶很高，一盏小灯照着四周的墙壁，小灯上扣着一个深色灯罩，屋里显得幽暗素雅，在并排放着两张小床的房间里，中间坐着一个看上去像是西伯利亚人的，颧骨很高、模样忠厚、身穿白披肩的奶妈。奶妈赶忙站起来，向他们鞠了个躬。做母亲的面带温柔的爱意向第一张小床弯下身去，亲吻了一下她那宝贝儿，床上安静地睡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胖呼呼的娇嫩脸蛋，微微张开小嘴，长长的鬈发披散在枕头上。

“喏，这个孩子叫卡嘉。”做母亲的说，轻轻地向下拉拉天蓝条纹的线毯，把从毯子底下伸出来的一只白嫩小脚丫盖好。“漂亮吗？她才两岁呢。”“美极了！”“这个叫华秀克，是他外公给起的名字。他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他是个真正的西伯利亚人，不是吗？”

“同样是个很可爱的孩子。”聂赫留朵夫看着背朝天睡的胖娃娃，说。“是吗？”做母亲的不禁洋洋自得地笑着说。看着这两个甜甜入睡的孩子，聂赫留朵夫想起一路上所见到的脚镣手铐、阴阳头、殴打、淫乱，想起奄奄一息，即将死去的克雷里卓夫，想起不幸的卡秋莎和她的全部的悲惨身世，想起牢房里睡在粪便中的小男孩儿，心里十分羡慕，巴不得多享受些这里温馨、恬静的幸福。幸福的母亲听着聂赫留朵夫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两个孩子的赞美之词，怀着满足的心情与他一起回到客厅。准备一起乘车去监狱的英国人已等在客厅里。聂赫留朵夫告辞了将军一家老少，同英国人一起走出将军府的富丽堂皇、守卫森严的大门口。此时已变得阴沉沉的天上飘起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的雪花儿掩盖了一切，屋顶上，花园路里，光秃秃的以及枝叶茂盛的树上，都覆盖上白白的雪花儿；门前的台阶，道路都变成白茫茫的一片，看不出哪是哪儿；门外的马车和马匹也像披上了一层白白的薄被。英国人自己有一辆轻便马车，聂赫留朵夫就吩咐英国人的车夫把车驾到监狱里去。他自己坐上四轮马车，心情沉重地去履行一项不愉快的令人痛苦的义务。就这样他默默地一言不发地坐在柔软的马车上，跟在英国人的马车后面，在雪地上剧烈颠簸着，飞快地向监狱驶去。

二十五 阴森森的监狱，门前站着岗哨，门口点着风灯，尽管蒙着一

层洁白的雪幕，使大门、屋顶和 墙壁都显出一片雪白，尽管监狱正面一排排窗子灯火通明，但是它给聂赫留朵夫的印象却比 早晨更加阴森。 走到大门口的威风凛凛的典狱长，凑近门灯，仔细地看了看聂赫留朵夫和英国人的特别通行 证，困惑不解地瞧了瞧这两个人，耸耸强壮的肩膀，但还是忠实地执行命令，请这两位来访 者 跟他进去。他先领着他们走进了院子，又走进右边的门，最后沿着楼梯走上他的办公室。他 请他们坐下之后，询问需要他们两位先生效劳什么事情，听说聂赫留朵夫要跟玛丝洛娃 见一 面，就马上派看守去把她找来，自己则准备回答英国人向他提出的一些问题，由聂赫留朵夫 做翻译。 “按照规定这座监狱最多可以容纳多少人？”英国人问。“而目前又关着多少人？有多少男人，女人，儿童？有多少苦役犯，流放犯，自愿跟着来的？有多少害病的？” 聂赫留朵夫想到即将同卡秋莎见面，心里不禁有点紧张。虽说嘴里翻译着英国人和典狱长 彼此对话，脑子里却根本没有思考他们对话的含义。刚给英国人翻译到一半，听见楼道里越 来越近的脚步声，随即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了，像以往历次探监的情景那样，先是走进一个看 守，后面跟着身穿囚服、包着头巾的卡秋莎。一见卡秋莎，他的心立刻感到坠了下去。 当时卡秋莎低着头，没有抬起眼睛，只是快步走进房间里，聂赫留朵夫头脑里掠过这样的念 头：“我要生活，我要家庭、孩子，我要过正常人的生活。” 他立刻站起来，迎着她走上前几步。他觉得她就像上次责备他时那样，脸色严肃而痛苦。她 的手指机械地卷着衣服的边。一会儿望望他，一会儿又垂下眼睛，脸上一会儿通红，一会儿 又变得苍白。 “您知道吗？减刑批准了！” 聂赫留朵夫说。 “知道了，看守已经告诉我了。” “所以呢，只要等正式公文一到，您高兴住哪里都行，去哪里也行。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 ……” 她立刻紧张地打断他的话：“西蒙松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没有什么可考虑的。” 尽管她十分激动，仿佛事先准备好了似的。这两句话说得又快又清楚，却抬起眼睛来盯着聂 赫留朵夫。 “哦，原来是这样！”聂赫留朵夫说。 “嗯，倘若西蒙松要跟我一块儿生活，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她忽然发觉自己说露了嘴， 连忙停住，然后纠正了自己的话说，“如果他希望我能够永远待在他身边，对于我这样的女 人来说，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愿望呢？我还图个什么呢？我只会认为这是我的福气。……” “也许她真的从心里爱上了西蒙松，根本不在乎我为她作的任何牺牲；或许她仍旧爱我，拒 绝 我是为了减轻自己内心的负罪感，不惜破釜沉舟，情愿将自己的命运同西蒙松结合在一起。二者必居其一。”聂赫留朵夫这样一想，不觉感到羞愧，他觉得自己脸涨红了。 “如果您真的爱他……”他说。 “我早已丢弃了那一套。有什么爱不爱的！只不过，觉得西蒙松这人确实与众不同而已。” “是啊，那是当然。”聂赫留朵夫又说。“我想，他是个非常出色的理想人选……” 她又连忙打断他的话，仿佛生怕他在这里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或者生怕她自己来不及把 自己想要说的话都说出来。 “嗯，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如果我做出的选择不合您的心意，那只有请您原谅我吧。” 她 用她那斜睨的目光神秘地瞧着他的眼睛，说。“嗯，您自己也得生活呀。看来只好这样办了。” 她说的恰好是他刚才在路上一一直在思考的，但此刻他的思想和感情已完全发生了转变，他已 不再这样想。只是感到羞愧和惋惜，惋惜自己从此将永远失去了她。 “我真没料到结果会是这样。”他说。 “您受的罪也够多了，何必还待在这儿继续受这份罪呢？”她说，神态怪异地微微一笑。 “我觉得自己过得挺好，并没有感到受罪。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愿意为您效劳呢。” “我们，”她在说“我们”两个字时有些不好意思地瞅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您为我出的力 已经够多了。我们再也不需要什么了。如果不是您……”她还想往下说些什么，可是声音颤 抖地说不下去了。 “您根本不用谢我，用不着。”聂赫留朵夫说。 “算什么账呢？上帝会给我们算这个账的。”她说，那双乌黑的眼睛里闪着莹莹的泪花儿。 “您是个多好的女人哪！”他说。 “我好吗？”她含着眼泪说，凄苦的微笑使她焕发出另一种美。 “您说完了吗？”这时英国人问。 “马上就说完了，”聂赫留朵夫回答。接着焦虑地向卡秋莎打听克雷里卓夫现在的病情如何。 她勉强使自己镇定下

来，平静地告诉他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情况：一路上，克雷里卓夫的身体很虚弱，一到这里马上就被看守送进了医院。谢基尼娜为此事很不放心，再三请求要到医院去照顾他，可是一直没有获得准许。“那么现在我可以走了吧？”她发现英国人在着急地等着聂赫留朵夫，忙说。“现在我不会与您告别的，我还要再见您一面。”聂赫留朵夫说。“真的，请您原谅我。”她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清。此刻他们的目光相遇在一起了。从她那有些古怪的眼神里，从她说的“请您原谅”而不是说“那么我们从此分手罢”时带有伤感的微笑中，聂赫留朵夫心里恍然明白，正因为她爱他，认为如果自己同他结合，就会彻底毁掉他的一生幸福，而她跟西蒙松一起走掉，他就可以恢复自由。她作出决定的原因是后一种。现在她为自己最终实现这种愿望而感到高兴，同时又感到从此跟他分手而觉得惆怅而忧伤。她匆匆地握了握他的手，慌忙转身走出办公室。望了望消失在楼道里的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回头瞅了瞅那个英国人，准备跟他一起走出去，可是英国人正埋着头在笔记本里急急地记着什么。聂赫留朵夫没有打断他，忽然感到整个身心疲劳极了。就在靠墙的木榻上坐下来，他之所以感到如此疲惫，不是由于旅途辛苦，不是由于夜里失眠，也不是由于心情过于激动，而是他对整个生活感到非常厌倦，才使他产生这种感觉。他懒懒地靠着木榻的背，疲乏地闭上眼睛，顿时像死人一般沉沉睡去。“你们觉得怎么样，现在去看看牢房好吗？”典狱长问道。聂赫留朵夫被典狱长的话惊醒过来，不禁惊讶地发现，自己怎么竟在这里睡着了。已写完笔记的英国人，很想再参观一下牢房。无奈之下，聂赫留朵夫跟着他疲劳而茫然地向外走去。

二十六 在几个看守的陪同下，典狱长、英国人和聂赫留朵夫穿过黑暗的门廊和臭得令人作呕的过道，让他们感到震惊不已的是：他们看见两个男犯在过道里直对着地板正在小便。走进第一间苦役犯牢房，一排破旧、肮脏的板床放在牢房中央。里面大约有七十个犯人。他们头挨着头，身子紧挨着身子躺在那儿睡着了。参观的几个人一走进来，他们就个个都惊恐地从床上跳下来，手脚上的铁链咣当发出响亮的声音，他们都默默地、规矩矩地站在床边，新剃的阴阳头在昏暗的牢房里闪闪发亮。躺着没有起来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脸色通红的年轻人，显然正在发高烧；另一个是嘴里不住地呻吟着的老头儿。那个英国人问，那个年轻人是不是病了很长时间。典狱长说是今天早晨他才发病的，至于那个不停哼哼的老头儿，闹胃病已有好久，因为医院早就住满了人，实在是没有地方可安顿。英国人漠然地摇了摇头，对典狱长说他想对这些犯人讲几句话，并要求聂赫留朵夫给他当翻译。原来英国人这次到俄国来旅行，除了要写一篇能够真实地反映西伯利亚流放和监禁地的文章以外，还要向那里的犯人宣讲通过信仰和赎罪才能拯救自己灵魂的道理，这是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请您告诉他们，基督爱他们，怜悯他们，而且愿意为他们而死去。”他对聂赫留朵夫说。“如果他们诚心地、虔诚地相信这个道理，那他们就可以得救，可以升入天堂，与基督同在。”他讲话的时候，全体犯人都直挺挺地纹丝不动，双手规矩地贴住裤缝，默默地站在板床前面。“请您告诉他们，”他结束了他的布道说，“这儿有识字的人吗？所有的道理都写在了这本书里。”英国人刚从手提包里取出从国外带来的几本精装的《新约全书》，立即就有从粗麻布衬衫袖口里伸出几只手指粗大、生有坚硬黑指甲的大手，争先恐后地向他要书。原来这里有二十多人识字。在这个牢房里英国人只发了两本福音书，就继续向下一个牢房走去。下一个牢房情况差不多。里边也是那样闷得令人喘不过气，那样令人作呕；牢房里一面墙上的两个窗子中间挂着圣像；左边放着一个臭气熏人的便桶；犯人都同样是这样身子紧挨着身子，头挨着头，拥挤地躺在那里；他们同样都迅速而惊恐地从床上跳下来，挺直身子规矩矩地站在那儿；同样也有三个人病在床上，下不了地。其中两个勉强爬了起来，颤巍巍地佝偻着身子坐在床上，还有一个干脆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对进来的人丝毫没有反应。英国人又重复了一遍在上一个牢房里讲的话，同样发给们两本福音书。一阵嘈杂的叫嚷声和吵闹声从第三个牢房里传了出来。典狱长生气地在

外面敲了敲门，叫道：“立正！”房门随即被打开，除了几个不能起来的病人和两个打架的人以外，全体犯人也都面露恐惧地挺直身子站在床边。那两个满脸怒容，扭在一起打架的人，其中一个使劲抓住另一个的头发，另一个也使劲揪住这个的胡子。等到看守迅速地跑到他们跟前，他们才彼此松手。一个被打破鼻子，鼻子里不住地向外流鼻涕和血，他不停地用外衣袖子擦着；另一个手里拿着被对方拔下的一根根胡子。“班长！”典狱长怒气冲冲地叫道。从排好的队伍中，一个身强力壮、相貌端正的人走了出来。“长官，我怎么也管不住他们。”眼睛里露出快乐的笑意的班长，说。“那我来对付对付这两个家伙。”典狱长皱着眉头说。“为什么事他们相互打架？”英国人问。聂赫留朵夫就问那个班长，为什么事他们相互打架。“不就是为了一块包脚布，这个错拿了那个的包脚布。”班长仍旧忍不住笑着说。“这个推了他一下，那个立刻就还了一拳。”聂赫留朵夫把情况转告给了英国人。“让我对他们说几句话吧。”英国人对典狱长说。等到聂赫留朵夫翻译过来这句话之后，典狱长说：“行。”于是英国人又从包中拿出他那本包装精美的福音书来。“麻烦您再给我翻译一下。”他对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吵嘴、打架，可是为我们而死的基督，却给我们提出另一种办法来解决争端。您问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按基督教义该怎样对待欺负我们的人？”聂赫留朵夫清楚明了地翻译了一遍英国人的话和问题。“告诉长官，听候长官的任意处罚，好吗？”有一个人斜视着威严的典狱长，小心试探着说。“狠狠地揍他一顿，那他以后就再也不会欺负人了。”另一个干脆地说。笑着表示赞成的有几个人。聂赫留朵夫直截了当地把他们的回答翻译给英国人听。“请您告诉他们，基督教义告诉我们行事的准则正好相反：有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你应该把左脸转过来由他打。”英国人一边说，一边做出把脸送给人家任由人家打的姿势。聂赫留朵夫又对犯人们作了翻译。“最好他自己来尝一尝那种滋味。”有人说。“如果他两边脸都挨了揍，那还让人家打他什么地方呢？”躺在床上的那个病人说。“那就让他把你揍个稀巴烂。”“嘿，那就让他来试一试吧。”有个人在后面快乐地笑着说。突然，整个牢房里爆发出一阵难以控制的大笑。就连那个挨打的人也一边用袖子擦着流血，吐痰，一边跟着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连那几个躺在床上起不来的病人也笑了。英国人的脸上仍旧毫不变色，只是要求聂赫留朵夫再转告他们几句话，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一些事，但是只有真正的信徒能够办到，而且是举手之劳。“您问问他们喝不喝酒。”“经常喝，老爷。”一个人说，接着又传来一片嗤鼻声和大笑声。这个牢房里也有四名病人。英国人问典狱长，为什么不将所有的病人集中在一个牢房里。典狱长回答说，这些病人害的都不是传染病，他们自己又不愿意，况且还有一名狱中医士治疗他们并及时照料他们。“都有一个多星期没见到他。”有人愤愤不平地说。典狱长根本没有理那个说话的人，就带客人到下一个牢房。在第五个牢房，第六个牢房，在过道右边，在过道左边，个个牢房里都是同样的景象：打开房门，全体起床站好，肃静无声，英国人给犯人们发福音书。从苦役犯的牢房到流放犯的牢房，从流放犯的牢房到村社判刑农民的牢房，再到自愿跟随犯人的家属房间。他们看到的每个牢房里都是同样的情况，到处都是受冻挨饿的、无所事事聚赌打架的、染上疾病的卧床不起无人照料的、受尽凌辱的、就像畜生一样的丧失自由的人。难堪的景象是：英国人向每个牢房里发送两本福音书，发到一定数量时，便不再发了，甚至不再向犯人们讲道了。显然那令人窒息的空气，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从这个牢房走到那个牢房，无精打采地听着典狱长对每个牢房的基本情况的介绍，只是随口说一句：“行了。”聂赫留朵夫感到浑身筋疲力竭，心灰意懒，像梦游一般踉踉跄跄地跟他们走着，又没有中途退出，尽早离开这地方的勇气。二十七 在流放犯的一个肮脏，而又拥护不堪的牢房里，聂赫留朵夫不由惊异地看见早晨在渡船上见到过的怪老头。这个头发蓬乱，满脸皱纹的老头儿，上身只穿一件肩头早已磨破的灰色脏衬衫，下身穿着同样破旧肮脏的长裤，赤着脚坐在板床旁边的肮得不堪入目的地板上，严厉而充满疑惑的目光盯着从门外走进来的人。从他的

脏衬衫的破洞里露出他那瘦骨嶙峋的身架来，显得十分虚弱可怜，但脸上的神色比在渡船上更加庄重，更富有生机。也像别的牢房里那样，看见长官进来，都跳下床，挺直身子站着；可是老头儿却坐着不动。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双眉愤怒地皱起来。“你站起来！”典狱长对他大声喝道。老头儿却只是轻蔑地微微一笑，纹丝未动。“我可不是你吆来喝去的奴才，只有你的奴才见到你才会恭恭敬敬、俯首贴耳地站起来。瞧瞧你头上的那个烙印……”老头儿指着典狱长的前额说。“你说什一么？”典狱长凶狠地向他逼近一步，威胁说。“为什么逮捕他？我认识这个人。”聂赫留朵夫慌忙对典狱长说。“因为他没有身份证，警察局把他送到这里来了。我们已经要求他们别再将这种人送到这里来，可他们不听，还是把他们送来。”典狱长怒气冲冲地斜视着老头儿说。“大概你也是个反基督教的家伙吧？”老头儿对聂赫留朵夫说。“不，我只是来陪同参观的。”聂赫留朵夫说。

“哦，你们是来见识见识这些反基督的家伙究竟怎样折磨人的吧？那您们就好好地看吧。他们大批大批地抓人，然后把所有抓来的人关在铁笼子里。本来应当靠辛勤劳动而生活的人，都被他们关在这里，不让干活，像养猪一般养着，最后弄得人都变成了畜生。”“他坐在那儿说什么呢？”英国人问。聂赫留朵夫翻译说，老头儿在谴责典狱长把人像畜生一样都关起来。“那么您再问问他，依他看来对不遵守国家法律的人应该怎么办？”英国人说。

聂赫留朵夫把这个问题向老头儿翻译过来。老头儿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怪样地大笑起来。“法律！”他不屑一顾地重复了一遍，“那些反基督教的家伙们先肆意掠夺大家，霸占百姓们养命糊口的所有土地，再夺取人家的财产，再把所有提出要反对他们的人和对他们对着干的人统统消灭光。然后他们再定出所谓的法律来，说是不准杀人抢劫，不准霸占他人财物。他们早就应该定出这样的法律来了。”聂赫留朵夫又把这些话翻译过去。英国人听后又微微一笑。“那么，您问问他，对付小偷和杀人犯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又给老头儿作了翻译。老头儿严厉地皱起眉头。“你就这样告诉他，他只有先除掉自己身上反基督教的烙印，这样他就不会再遇到小偷和杀人犯了。”“他简直是疯了。”听了聂赫留朵夫给他翻译过来的老头儿所说的话，英国人不解地说，耸耸肩膀，然后走出牢房。“你干你自己的事，他干他自己的事，可别操心费力地去管人家。各人管好各人的事就行了。上帝会知道，谁该受惩罚，谁可以得到宽恕，这一些根本不用我们操心。”老头儿说。“自己随意做自己的长官，这样哪里都不需要什么长官了。走开，都走开！”他补充说，生气地皱着眉头，那双有神的眼睛锐利地瞧着待在牢房里迟迟没有离去的聂赫留朵夫。“喂，反基督教的家伙，你看得也够了，这监牢里是怎样拿人喂虱子的，走吧，走吧！”

走到过道里，聂赫留朵夫看见英国人和典狱长却停住了，站在一个开着门的空牢房门口。英国人问这是做什么用的。典狱长说，这是停尸室。“哦！”听了聂赫留朵夫的翻译，英国人要求进去看一看。这是一间不大的普通牢房。黑黝黝的墙上点着一盏昏暗的小灯，暗淡的灯光照着屋角的几个破旧的背包和一大堆木柴，光线模糊地照着右边板床上的四具尸体。第一具穿着麻布衬衫和麻布衬裤的尸体，留着山羊胡子，剃着阴阳头，身材高大。这具尸体早已僵硬，原来一定交叉在胸前的双手，现在已经变得发青而且分开了；两只光脚也分开，脚掌僵硬地竖了起来。旁边躺着一个又黄又皱的、脸盘瘦小枯干、鼻子很尖的老妇人。她身上穿着白裙白袄，没包头巾，外面露出一条短短的稀疏辫子，老妇人旁边还有一具穿着紫色衣服的男尸。看到这颜色，聂赫留朵夫不禁一怔。他慢慢地走上前去，仔细看了看那具尸体。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往上翘起的山羊胡子，挺拔秀气的小鼻子，白净的高高前额，稀疏的鬃发，这些都是他再熟悉不过的特征。昨天他还看见这张充满激愤和痛苦的脸，如今却变得如此宁静、面态安详而且呈现出一种出奇的美。是的，这就是克雷里卓夫，这就是他物质生命留在世上的唯一的遗迹。“究竟为了什么他受苦受难？他活着又究竟是为了什么？他现在明白这些问题了吗？”聂赫留朵夫想，觉得他无法解答这些问题，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没有跟英国人告

别，聂赫留朵夫只要求看守领他到院子里透透气。他觉得必须好好独自思考一下今晚所见到的、令他感到惊异的一切，就坐上马车回旅馆了。二十八 回到旅馆，聂赫留朵夫久久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而没有急于上床睡觉。他跟卡秋莎之间的恩恩怨怨都已经结束，使他感到伤心和羞愧的是她不再需要他。不过此刻痛苦地折磨他的倒不是这件事，而是另外一件不仅没有结束的事情，而且更加痛苦地折磨着他的事情，需要他立即去做，去完成。

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特别是在今晚，亲眼目睹了发生在这座可怕的监狱里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毛骨悚然的罪恶以及那毁掉了亲爱的克雷里卓夫生命的种种罪恶，正在到处泛滥成灾，他不仅没有看到战胜它的可能性，甚至茫然地不知道如何去战胜它，消灭它。浮现在他的头脑里成百上千人的影子，被冷酷无情的将军、贪污掠财的检察官、粗暴残酷的典狱长以及那些看守们关在病菌弥漫的空气污浊的、令人作呕的牢房里，受尽了欺压和凌辱。桀傲不驯、敢于当面痛骂长官的怪老头被看作疯子。他还想起相貌俊美，脸色腊黄，夹在其他几具尸体中间，含恨而死的克雷里卓夫。他越来越弄不明白的老问题此刻又更加执拗地出现在他面前，要求他解答。究竟是他聂赫留朵夫疯了，还是那些自认为头脑清醒却干出那些残酷勾当来的人疯了。脑子也思索得有点累了，来回走得也有点累了，他坐在靠近灯光的沙发上，随手打开他刚才清理口袋时丢在桌上的，英国人赠送给他留作纪念的福音书。“据说可以在那里找到任何问题的答案。”他边思索着边翻开了这本福音书，开始阅读他翻到的那一页，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一、当门徒走进来，问耶稣道：“在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二、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让他站在他们当中。三、说：我实话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仍不回转，就会变成这个小孩子的模样，永远不能进入天国。四、所以凡是使自己谦卑的像这个小孩子一样，那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噢，对了，确实如此，”聂赫留朵夫想起每当自己谦卑的时候，就能真正地领略到生活的宁静和欢乐。

五、凡是为了我的名誉，接待任何一个人人都像接待这小孩子一样，那就是在接待我。

六、凡是使任何一个信仰我的人跌倒，就应该把沉重的大磨石拴在这人的脖颈上，沉入大海。“为什么说：‘凡是为了我的名誉，接待任何一个人人都像接待这小孩子一样’？那是在什么地方接待？‘凡是为了我的名誉’是什么意思？”聂赫留朵夫在心里问自己，觉得这些话很晦涩难懂。“还有，为什么要把沉重的大磨石拴在人的颈项上，还要沉入大海里？不，这话有些不对劲，不确切，又不清楚。”他想到在他生平中也曾读过好几次福音书，每次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就读不下去。他又读完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和第十节。这几节讲到如何将人绊倒，讲到他们怎样才能获得永生、灵魂不灭，讲到应该把人丢在地狱的火里以此作为惩罚，讲到孩子们的使者可以经常见到天父的面。“可惜这些话很不连贯，”他说，“但还能看出其中有些好东西。”

十一、为拯救将来失散的人，人之子就会降临。十二、一个人如果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会如何去做，他会不会扔下这九十九只，执意往山里去寻找那只迷路的羊么？十三、如果找着了，我实话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还要欢喜呢。十四、你们那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里失去任何一只的。

“是的，天父的意愿并非让他们死亡，但他们仍在成百上千地死去。而且没有任何办法来拯救他们，”聂赫留朵夫想。二十一、那时彼得走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总是得罪我，我应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二十二、耶稣说：我对你说，这不应该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二十三、天国里好像有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帐。二十四、刚算的时候，有一个人带了一个欠别人一千万两银子的人进来。二十五、因为他没有能力偿还，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并一切财物都卖了去偿还。二十

六、那仆人害怕地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一定要还清。 二十七、那仆人的主人见他这样，就动了恻隐之心，释放了他，并且免去了他的债务。 二十八、那仆人出来后，遇见了他的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便上前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欠我的都还给我。 二十九、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一定还清欠你的债。 三十、那个仆人不肯，竟去把他关在监狱里，等他偿还所欠的债。 三十一、众同伴看见他所作所为，就甚忧愁，就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三十二、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可恶的奴才！你苦苦地央求我，我就免了你所欠的债。 三十三、你不应当像我怜恤你一样去怜恤你的同伴？

“难道不就只是这么一回事吗？”读完这些字句聂赫留朵夫，忽然大声说。立刻有个声音在他心里回应说：“对，就是这么一回事。”于是聂赫留朵夫也遇到了一切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常常遇到的问题一样。那就是他起初觉得奇异、荒诞甚至有些可笑的思想，经过生活不断地加以证实，忽然有那么一天他发现这原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无可怀疑的真理。现在他已经懂得了这样一点：要使人们饱受苦难的骇人听闻的罪恶，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既不该惩罚别人，也无法纠正别人，只有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恶。现在他才懂了，他在各地监狱里亲眼目睹的所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罪恶，以及制造出这样种种罪恶的人所表现出的那种泰然自若的态度，是由于他们想做一件他们根本无法做到的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罪恶，却强行纠正别人在骨子里的罪恶。腐化堕落的人想去纠正那些表面上腐化堕落的人，并采用强硬、残酷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是一些缺钱而贪财的人就以这种蛮横的无理的方法把惩罚人和纠正人作为一种职业，自己却更加腐化堕落，反过来又不断地影响着那些受尽折磨的人。他还明白了，他亲眼目睹的一切惨事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才能完全彻底地加以消灭。他找不到满意的答案，其实答案就是基督对彼得说的那番话：要学会永远饶恕所有的包括你的亲人和不认识的人，要永无止境地饶恕他人，因为世界上还不存在任何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 “事情总不会如此简单吧。”聂赫留朵夫自言自语道，但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与他早已形成的习惯相悖的说法，尽管乍看起来有点儿古怪，无疑却是正确的答案，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是这样。“究竟怎样对待作恶的人？难道可以随意放任他们不受惩罚吗？”对这一类常见的反驳，如今他已不会感到为难了。假如惩罚真的能达到减轻罪行，改造罪犯的效果，那么，采用这样的反驳似乎还有点道理。但所有的事实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既然一部分人没有权力改造另一部分人，那么唯一合理的办法，就是停止这种非但无理、有害，甚至是残忍荒谬的做法。“几个世纪来，你们一直理直气壮地惩办所谓有罪的人，最后导致的结果如何呢？这种人有没有绝迹呢？答案是否定的，他们不仅并没有绝迹，人数反而增加，因为不仅增添了一批因受惩罚而变得腐化的罪犯，还增添了一批因审判和惩罚别人而自己堕落的审判官、检察官、侦讯官和狱吏。”聂赫留朵夫现在才醒悟，社会和社会秩序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尽管社会存在这种腐败的现象，善良的人们毕竟还是彼此相怜相爱的，而不是因为那些受到法律保护罪犯审判和惩罚别人。为了能希望在这同一本福音书里找到他所希望的能够证实这种思想的文字，聂赫留朵夫开始从头读起。一向使他感动不已的《登山训众》，直至今日他才第一次悟出这段训诫并不是很抽象的美好思想，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并不过分，而且是简单明了切实可行的戒律，但难以实现。一旦彻底实行这些戒律（而这完全是人有能力办得到的），人类社会就能形成崭新的秩序，届时在世上就能建立并实现天国，人类就会享受到无比的幸福，使他极其愤慨的那些种种暴行就会自行消失。那些戒律总共有五条。第一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六节）就是人不可以杀害其他人，不可对自己的弟兄动怒，不可骂人家，轻视别人。如果同人家发生争吵了，就应该在向上帝奉献礼物以前，也就是祷告以前同他和好如初。第二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至第三十二节）就是人不可奸淫，不可贪恋女色。一旦同一个女人结为夫妇，就要与她白头

偕老，永不变心。 第三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三节至第三十七节)就是人在允诺什么的时候不可发誓。 第四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至第四十二节)就是人不可以牙还牙，当有人打你的右脸时，你要把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要宽恕别人对你的欺侮，完全无条件的加以忍受。不论人家求你做什么，都不可拒绝。 第五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节至第四十八节)就是人不可恨仇敌、打仇敌、要真心地去爱仇敌，帮助仇敌，甚至为仇敌效劳。 聂赫留朵夫凝视着那盏油灯发出的光晕，出神地想着。想到生活中那种种丑恶现象，又设想着如果人们接受了这些箴言，我们的生活又将变得怎样。他的心仿佛经历了长期的劳累和痛苦以后忽然获得了宁静和自由，顿时充满了一种好久没有体验到的欣喜。 又一个通宵过去了，就像许许多多读福音书的人那样，读着读着，忽然第一次对以前读过多 次却没有加以注意的字句的含义，透彻地领悟了，现在他完全领悟了。他像海绵吸水那样，拼命吸取着。面对眼前这本书里重要而令人喜悦的道理，这一切似乎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似乎把他早已认识却没有充分领会和相信的道理再一次重新加以证实，彻底使他领悟和相信。 这一次，他真的领悟和相信，人生唯一合理的意义就在于，人们能真实地履行这些戒律就能得到至高无上的幸福，只要人人忠实地履行这些戒律就行，不必再做其他的。从全部教义归纳出来的道理是，所有违背这些戒律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会立刻招来惩罚。而采用葡萄园的比喻说法尤其具有说服力。园户被主人派到葡萄园工作，但他们却将那座葡萄园看作他们自己的私产，仿佛葡萄园里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而置办的，他们杀害了凡是向他们提到园主、提到他们对园主应尽义务的人，并抛弃了园主，认为只有他们才有权在那个园里享乐。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作所为也是如此，”聂赫留朵夫想，“我们是抱着一种荒诞、贪婪的信念，以为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享乐没有别的目的，我们自己主宰这种生活，这显然是毫不讲理的、错误的。我们被派到世界上来，那是按照某人的意志，为了能尽快实现某种目标。可是如果我们只顾及我们自己活着，只是为了自己贪图快乐。当然，就像那不执行园主意志的园户那样，我们也不会有好下场，主人的意志就充分体现出那些戒律。如果人们去按照那些戒律执行，那么人间就会建立起一座天堂，幸福的人们都能获得无与伦比的快乐和幸福，不再会发生令人愤慨的人间悲剧，到处是一片欢乐祥和。 “只要你们诚心诚意地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要的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可是我们却只要求要这些东西，而且显然没有求到手。 “看来做完一件，再去做另一件。这将会成为我的终身事业。” 经过这一个晚上的苦苦思索，聂赫留朵夫终于对福音书上所讲的道理大彻大悟，在这段时间里他所看到的，遭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他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自己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至于在这个新的世界上他怎样去生活，怎样为他的事业去奋斗，将来会有分晓。